河南通史

HNTS

HENAN TONGSHI

第四卷

主编　程有为　王天奖
本卷主编　王天奖
副主编　王全营

河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郑　荣
　　　　　王卫国
责任校对　李　勇
封面设计　孙宪勇
版式设计　胡颖君



定价：380.00元（全4卷）



主编　程有为　王天奖
本卷主编　王天奖
副主编　王全营
主要撰稿人　王天奖　王全营　万新芳　翁有为等

河南人民出版社

《河南通史》编委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南通史/程有为,王天奖主编.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12(2007.2 重印)
ISBN 978-7-215-04985-7

Ⅰ.河… Ⅱ.①程…②王… Ⅲ.河南省-地方史
Ⅳ.K29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1132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23341）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8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　158

字数　2188 千字　插页　22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定价:380.00 元

河南省『八五』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成果



安阳袁世凯墓



郑州北伐阵亡将士纪念碑

开封朱仙镇清真寺



确山杨靖宇纪念馆



新县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旧址



新县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

郑州二七纪念塔



赤城县苏维埃旧址



罗山铁铺乡红二十五军司令部旧址



郑州花园口1938年黄河扒口东口门界碑



八路军渑池兵站



渑池刘少奇旧居



确山竹沟中共中央中原局办公室旧址



清丰单拐村中共中央平原分局与冀鲁豫军区司令部旧址



四一二阵亡将士及殉难同胞公墓



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旧址



夏邑八里庄彭雪枫殉国处



永城淮海战役纪念碑



刘邓大军供物证



淮海战役总前委
左起：粟裕、邓小平、
刘伯承、陈毅、谭震林



中共中央中原局、
中原军区宝丰会议旧址

永城淮海战役烈士陵园





开封大清银行银票



豫泉官银钱局兑换券



鄂豫皖省苏维埃银行币



中州农民银行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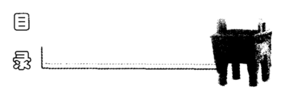

淮阳泥玩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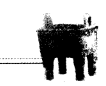
朱仙镇木版年画

豫西社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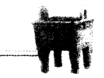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四卷）





第三十三章
近代史的开端

第一节　新时期的肇始

一、烟毒泛滥

19世纪前半纪，当整个清帝国沿着封建主义的故辙趋向衰落，河南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各个方面都随之愈显滞后的时候，欧美资本主义却呈现出迅速发展、殖民主义四处扩张的势头。特别是当时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英国，在将印度变成其独占殖民地后，又进而将其侵略魔爪伸向土广民众、资源丰富的中国，紧随其后的还有法、美、俄等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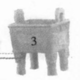
当时在清封建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是个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的东方大国；地处内陆的河南，人民日常生活所需，除食盐等少数几种须从外省输入外，其他一切均"应有尽有"。加上清帝国长期执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使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的正常商品，无法打开中国的大门，只能利用中国统治阶层和地主富人腐朽生活的需要，通过鸦片走私，对中国进行殖民主义掠夺。到19世纪30年代后半期，从广州等沿海地区走私入口的鸦片，高达3.5万箱。这不仅毒害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而且每年从中国掠夺了数百万两的白银（当时的主要货币）。据统计，1821—1840年（道光元年至道光二十年），中国因此外流的白银高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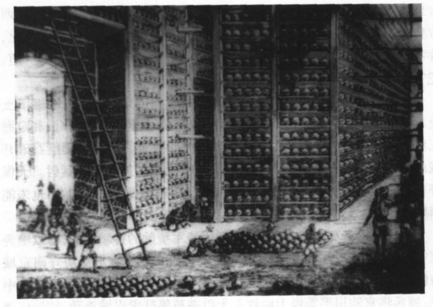
亿两，大体相当于当时清政府3年财政收入的总和。

鸦片走私最猖獗的地方自然首推当时惟一的口岸——广州，次之是“洋船”所能驶达的其他沿海城镇。可是，地处腹里的河南也不能独免其灾。随着封建统治的日趋腐朽，河南各级官吏以及城乡部分地主富商，吸食此种毒品的也越来越多。在省城开封，奸商江汝茂，多年在此做“挑广货摊生理”，1838年又“由广（东）贩鸦片”，而被官府捕获。在省内其他各府州县，烟毒也泛滥日广。像舞阳这样的普通县份，19世纪20年代，知县就针对县境各乡存在的陋习特发告示，内称：从前本地向无种植罂粟和吸食鸦片之徒，后来由广东传来此物，致使一些人上当吸食成瘾，贫困破产，甚至过早丧生。由此不难推知，当时河南全境鸦片流毒也已达到相当的深广度，以至引起了一些尚能关心民瘼的地方官的注意，认为不能听之任之。省——府——州（县）各级封建官府虽然不断重申朝廷查禁鸦片的通令，发现烟贩，即行“按律行杖、充军”，但因当时封建统治已十分腐朽，各级官吏和衙门吏役对这种“洋药”钟爱难舍，所以此类禁令虽有实无，烟毒的泛滥在全省大部分州县越来越严重，不仅奸商，就连一些官吏也参与鸦片的运销。像1838年省方奏报所获贩、吸鸦片的人犯中，就包括候补县丞温观尧等。这一年，各州县官府拿获贩、吸人犯36名，缴获鸦片1.46万余两，又民间交缴0.3万余两。实际贩、吸者和未曾交缴者无疑数十倍于此。

因为鸦片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祸患，所以1839年在林则徐领导下的禁烟运动，就在广东大张旗鼓地展开。接着，英国殖民主义者便以此为借口，派4 000多名侵略军，分乘40多艘战舰，于1840年6月，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侵略军先是进犯福建厦门、浙江定海和直隶天津，接着又突入长江，气焰十分嚣张。

深受封建统治祸害的河南人民对清王朝虽然憎恶已久，但对正义的禁烟运动却竭诚拥护；虽然生活在腹里省份，但在外敌入侵时，仍同仇敌忾地投入反侵略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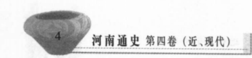


英国在印度存储鸦片的仓库

二、参与反侵略战争

为了击退英国侵略军，清廷连续下令征调中原地区的武装力量，除正规军队——绿营兵外，还鼓励绅民组织地方武装——乡勇，驰赴沿海反侵略战争的第一线。于是，从省城开封到邻近苏、皖各州县的民众，包括许多"结捻"反抗地主、官府的群众，都踊跃从军拒敌。一些爱国士子，如祥符廪生谢宝树；一些地方杰士，如业已获得都司职衔的睢州刘天保；许多武艺高强的豪侠，如光州（潢川）一带的"旧捻小中奇材剑客"，也都慷慨请缨，同赴江浙前线。光在浙东前线，清军统帅扬威将军奕经指挥下的中原壮士，就有 3 000 多人，包括 2 000 多名河南绿营和刘天保、谢宝树等统带的河南乡勇。

使这些中原壮士深感悲愤的是，他们日夜兼程赶到浙东反侵略战争的最前线后，发现统帅奕经等只顾贪污自肥，吃喝玩乐，各军所能得到的只是一点点"薄饷"，连一日三餐均须自行筹措；战场指挥上，这些皇家亲贵更是一窍不通，毫无像样的部署；战术使用上，又不顾敌我双



方装备上的优劣，只知照着传统的老办法，让各军与拥有近代火器的西方殖民强盗“排阵对战”。尽管如此，河南健儿们仍以民族大义为重，并不泄气退缩，“气锐甚，思生擒（敌方）渠酋”①，与他省的兵勇一道，把“洋鬼”赶出国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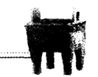
可是，骄盈、昏聩的奕经一伙，却在1842年3月，命令各军撇下土枪、土炮，手持刀矛等冷兵器，分三路攻袭英军占据的镇海、宁波和定海三城。刘天保力谏不从，只好遵命率部进取镇海。待他们用巨石砸开城门时，早已闻声集结在门内大道上的英军，立即迎头排枪猛射。天保等只好且战且退，返回驻地。另队河南乡勇随正规军进攻宁波，也未能奏功。

英国侵略者凭借其近代船炮，利用清军统帅的昏聩无能，得以狼奔豕突，由浙江转攻江苏，1842年8月，闯至南京下关。奉命协守南京城防的河南兵弁，目击耳闻侵略军在四乡奸淫掳掠的罪行，无不怒火中烧；领兵将官陈川平等极力向钦差大臣耆英等吁求出城杀敌，结果反遭耆英等严斥。陈川平怒火郁结，竟至病倒。随后，耆英等又秉承道光皇帝意旨，于8月底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次年，又签订了作为《南京条约》附件的《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消息传来，河南人民深感悲愤。修武一位士子为此做诗慨叹②：

> 倏报南中又议和，居然城下罢干戈！
> 沉冤谁念焚巢酷，咬敌全凭纳币多。
> 子女伤残通玉帛，甲兵坐老让关河。
> 一民尺土非轻授，其奈王孙议和何！

紧随英国之后，其他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也都来趁火打劫。1844

① 蒋湘南：《七经楼文钞》卷七，道光二十七年刊本。
② 修武县志编纂委员会：《修武县志》，第72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美国、法国先后胁迫清廷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还有其他许多欧洲国家也依样画葫芦，向清政府勒索了同样的侵略权益。其中最主要的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向英国赔偿2 100万元；割让香港给英国；海关关税中外共同商定税率，中国政府无权自定；给予外国以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外国教会可以在通商口岸建堂传教。（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签订的《天津条约》中，又进而规定可自由出入内地传教）

这些不平等条约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清朝统治的衰敝，倚仗“坚船利炮”，胁迫清廷签订的。凭借这些“条约权利”，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就可将其侵略魔爪“合法”地伸向包括河南在内的中国各个省区，使国家的领土、独立和主权完整遭到严重的破坏，中国开始由一个独立国家而沦为一个半独立——半殖民地国家；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以此为护符，经由沿海地区，不断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向全国各省扩张其侵略势力，使原先已处于封建社会晚期的中国社会不能沿着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常规，而是沿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沉沦和演变。无论对全国或是对河南，这确实是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奇变”。对此，当时河南人士当然不可能有清楚的认识，但一些敏感的士子也意识到“天下从此多事矣”，为此用心研究海防问题，以抵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①]；有些则跳出八股时文的小天地，用心研究现实问题，致力于“经世之学”。

以鸦片战争为发端，开始了中国，也开始了河南近代的历史。

第二节　深重的社会危机

一、末世颓风

鸦片战争的失败、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扩

① 《获嘉县志》卷八，第20页，民国24年刊本。

展，直接或间接地给河南带来的影响是相当深广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应追述一下鸦片战争前——跨入近代门槛前河南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村的概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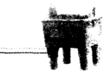
当时的河南，可以说完全是个农业社会。虽然从乾隆朝（1736—1795 年）以来，社会经济中（主要在矿业和一些城镇手工业中）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较之江南和华南省区，发展程度较小，主要手工业产品都是在初级市场上供本地人民采买消费，农业人口——农民，占总人口的 95% 以上。他们是社会生产和国家赋役的主要承担者，也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最大受害者。

与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清王朝的财政收入几乎全部来自赋税，主要是按土地征取的田赋，包括地丁和漕粮（后多折征银两，称“漕折”）。除此之外，河南为了防治黄河而令各县额外征解的“土防加价”、“河工帮费”和各种“河工物料”（这些物料，后因运送不便，也都改以银钱随同田赋一起交纳），民间称之为“小粮”。按照定制，这种“小粮”只在沿河 30 多个州县征取，实际上“于河隔远，全于河工无涉（州县），亦令一体均摊”[①]。特别沉重的正规钱粮和他省所无的“小粮”加在一起，就使得河南农民负担分外沉重。

除钱粮之外，河南又因“居天下之中”，往来东西南北者，多须取道于此，因此旧式交通干线密布于大河南北，往来的官员、军队、各种公差和官运粮饷、物资，所经各县，农民都要随时无偿地供应车马和劳力，而由官府强迫应役。官府吏役又逾章滥派，普遍是“用一派十”，而一次次地强令农户折价交纳，成了又一种变相的、无定额限制的“钱粮”。因此，河南差徭的繁重，又甲于全国，以至于有“豫民所苦者，不在（田）赋，而在差（徭）”的说法[②]。

除此之外，地方一切所谓“公益”、“公差”，如修城、筑寨、浚河、建庙、迎送过境官员等，地方官府都用“杂派”方式，随时向四乡摊征。如

① 《河南通志稿·经政志·豫河经费考》，第 28 页，1942 年通志馆印本。
② 王诜桂：《王丹君先生文集》卷下，第 34 页；张之万：《张文达公遗集》卷二，第 37 页。



在山僻县份嵩县，19世纪30年代，县令刘彬借修庙为名，“勒派至万余金”，接着又以侍应本省巡抚巡阅为名，再次苛派全县民户。这些额外的负担因无定章可循，全凭地方官和衙门书役任意定数，农民受累也很重。

河南农民负担虽然特别沉重，但如果真的按清政府的定章办理，那还是可以勉强承受的，可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拿田赋来说，按照定章，每亩土地负担地丁银0.014—0.227两，“有漕州县”另交漕粮0.01两或粮2.00升不等，分别于春、秋两季，即“上忙”和“下忙”交纳。农民收获以后，虽然市场粮价最低，也都得尽快粜卖新粮，以便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于县库。卖粮所得，是民间最通用的制钱，完粮时却必须按官府规定的银、钱比价如数交纳。按照清政府前期的规定，制钱1 000文（一串）折合白银1两（市场实际比价，有时1两银只兑钱800文）。可是在鸦片战争前的近百年，主要由于国内商品经济发展，对作为贵通货的白银的社会需要量大大增加，又由于英美等国的鸦片走私换走了中国为数至巨的白银，致使银价日高，“银贵钱贱”成了各省普遍的社会问题。到19世纪20年代末，河南白银1两，兑钱1 400文上下，而官府在收粮时，又强令农民按每两2 000—2 300文交纳。这样一来，农民早先粜粮1.5石就可交纳1两的额赋，后来就得加粜一石多才行，无形中加赋一倍左右。

钱粮是随地权占有征收的，差徭按定章也按农户占地和役畜多少而摊派。也就是说，两者的盘剥对象主要应是有地农户，占地越多，负担越大。就清代的河南来说，全省土地在前期大约70%把持在地主阶级手中，到鸦片战争前后，地主连同富农在地权分配中所占的份额，估计降至50%—60%[①]，中、贫农占有40%—50%。可是，地主官僚可以凭借权势而不纳或少纳钱粮，其中获得秀才、举人功名者并可照章免其差徭，所以衙门书吏和乡村里书之类，就将这部分粮额分摊到中、贫农和“土鳖户”（没有权势的地主、富农）身上，差徭也然。这样，就使河南

① 参见王天奖：《晚清时期河南地权分配蠡测》，载《史学月刊》，1993(6)。

一般农户的负担越发沉重。

因为地主富农占有了一半以上的土地，所以无地或少地的雇农、贫农在农户中占很大比例（综合有关资料估算，当不下40%）。他们虽然可以较少或不必直接向官府交纳田赋，但却得租种地主的土地，在封建租佃关系下，承受多方面的封建剥削。在这方面，河南也因其特有的自然和社会历史条件而与他省有所不同，显得特别酷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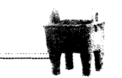
在当时的中国，特别是在南方各省，随着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农村租佃关系大都采用定额租，河南一则由于水旱等灾害特别频繁，收成无保障，因而地租就不能"定"死；二则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程度比较低下，贫苦农户无力自备耕作所需的牲口乃至农具和种子，而不得不仰赖于地主，所以各地通行的主要就不是实物定额租，而是实物分成租，货币地租尤为稀少。所以河南农村"田主如主人，而佃户如奴仆，有事服役（随时应地主之召，一家男女去地主家无偿服役），不敢辞劳"[①]。这种分成租的剥削率（不算力役）就不是50%，而大都为70%—80%（视地主供应房屋和各种生产资料为等差），只有少数除土地外其他均无赖于地主的佃农，能"分成"50%。所"分"均不止是夏粮一季，而是麦、秋两季（连同秆料）。如嘉庆《汝宁府志》就记各县情况，说地主均视佃农为"佃仆"，"肆行役使，过索租稞，甚有呼其妇女至家服役，佃户不敢不从者。且有佃户死亡，欺其本家无人，遂嫁卖其妻若子，并收其家资，占以为利"[②]。这就不仅存在着力役地租的残余，而且还保有一定的人身隶属关系。这一切，就使得河南为数至多的贫、佃农景况特别悲苦。

因为农民生活出奇的贫困，另一种残酷的封建剥削——高利贷在河南也就特别猖獗，像舞阳一带，高利贷者惯于春间"约计新麦每斗值钱四百，放给（贫民）大钱二千文，届期还麦一石。三四月间，利倍于本。秋间，大豆钱、秫秫钱、芝麻钱，亦色色皆然"[③]。农民一经落入这

①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室：《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上册，第11页，中华书局，1979；《新建设》，1963（11），刘永成文。

② 《汝宁府志》卷二十三，《艺文》，嘉庆元年刊本。

③ 《舞阳县志》卷六，道光十五年刊本。



伙吸血鬼的魔掌，就很难有解脱的日子，如道光朝泌阳一个县令所作的一则《训俗俚言》所说："医疮剜肉最伤贫，避债无台旧又新，堪叹倾囤还倒廪，胼胝终岁为他人。"①这是又一根紧勒在农民脖子上的绞索，使河南农业和农家经济愈加衰敝不振。

经济盘剥之外，清王朝腐朽的封建政治给河南人民带来的苦难同样是分外沉重。

乾隆、嘉庆以降，整个清朝封建统治日趋腐朽。河南，因为地处近畿，历来被清廷视为"腹心"要地；加上"额赋甲天下"，是当官作宦者捞取油水的难得"福地"。因此，当政的满洲贵族惯常派令亲贵重臣为河南巡抚，其中旗籍（满、蒙八旗和汉军旗）人员尤多。此辈大都靠"恩荫"得官，借"裙带"升擢，是封建统治集团中最腐朽的部分，特别无能和贪鄙。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江苏、山东疆吏奏报近豫各府州大水成灾，要求赈恤或减免钱粮，惟独河南隐灾不报，倒是乾隆帝自行推断河南也难幸免，只是"中州人民淳朴忠厚，不敢报灾"②。这种虚饰浮夸的政风，犹如魔术师的障眼法，把各种各样的封建脓疮和不可名状的民生疾苦，通统掩盖在"天下太平"的假象之中，不断深化社会矛盾，统治危机日趋严重。

虚饰浮夸之外，河南又因为是重点"河工"（治理黄河）省份，从省城开封到沿河各州县设置的河务衙门和河务官员特多。每年上百万两白银的经费、每次数百万两白银的抢险（堵口）费，使各级河官成为官场的头号"肥缺"，其奢侈、糜费、仪节和陋规，也为一般官场望尘莫及，各种私人笔记著录的有关情况，着实令人咋舌。流风所及，就使得通省官场都染上浓重的所谓"河工习气"："粉饰欺蒙"之外，还"竞尚奢靡，扬厉铺张，耗时糜费，各种仪节，各省俱无"。在迎送过往本境的上级官员——所谓"办差"和贿买上司及本省京官——所谓"规礼"、"节敬"上，此种"河工习气"表现得尤为深广，一般州县每年在这方面的糜

---

① 道光《泌阳县志》卷十二。

② 王庆云：《石渠余记·记赈贷》，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

费常需银上万两甚至数万两，这不仅加剧了封建统治的腐朽，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二、社会矛盾的激化

河南就是带着上述这般的态势迎来鸦片战争后“数千年未有之奇变”的。这种空前的历史变故，不仅给水深火热中的城乡人民带来新的灾难，也给江河日下的封建统治带来新的危机，深刻地影响到嗣后河南社会历史的发展。

（一）从社会经济方面说，首先是使广大农民大遭其殃

河南地处内陆，不像邻近通商口岸的沿海各省那样很快受到潮水般涌来的洋纱、洋布等外国机器制品的冲击，以传统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主要是手纺织）相结合为特征的自然经济暂时还没有受到较大的影响；但因鸦片战争后英美等国输入中国的鸦片与年俱增，中国因此每年外流的白银也急剧增加——每年高达 2 000 万两。由此进一步导致银价的上涨：河南 19 世纪 20 年代末的 1 两银兑钱 1 400 文，到 40 年代初增至 1 700 文左右，五六年后再增至 2 200—2 300 文，较清前期增升了两三倍，较鸦片战争前也增升了 70%—80%，而同一时期农村初级市场以制钱计价的粮价却没有多大变化。这就使得农民的田赋负担进一步加重，造成“朝廷虽无加赋之名，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赋”。州县官吏和衙门吏役更因缘为奸，越发逾额浮收，使众多有地农民不胜其苦。

再则，清朝统治者为了弥补战争期间的巨额财政亏空，包括数以千万计的军费、公私损失和对英赔款以及举办各种“善后”，战后几年就进一步对人民加强搜刮，其手段之一就是举办捐输——让民户出银买官或职衔、封典。这种捐输虽说全凭民户自愿，但实际上却大都出于胁迫，而且至再至三；虽说其主要对象是城乡“殷实之家”，但直接或间接给各阶层人民都带来深广的影响。1847 年年末，后来被谥为“文清公”的河内（今沁阳）人李棠阶，在其日记中，就作了“连年荒旱，累次捐输，



农民低价卖粮以交赋税

商贾不行，殷实者皆空虚”①的记录。广大人民因此又蒙受新的深重灾祸。

(二)从政治方面说，主要是各级封建统治愈加腐朽

朝廷捐输越多，“仕途”就越乱，职官队伍就越杂——除由科举等“正途”出身的官员外，还掺杂进来数量巨大的“捐班”人员。如1851年任信阳知州的赵登峻，以捐纳得官，上任后，地方人士记其“吏治”称：

贪婪无厌，声名狼藉。民间讼事以贿之多寡为曲直。甲以贿进，则袒甲而甲胜。乙以贿进，其数过于甲，则又抑甲袒乙而乙胜。甲、乙同时以贿进，而数相当，则授意令之和解。甲、乙先后以贿进，而彼如迭有增益，则堂讯时，甲、乙又迭为胜负。乃至审判终

① 李棠阶：《李文清公日记》卷十，民国石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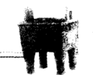
局，则又犹留一隙，以待再诉，以为异日敲索地步……尝有奸民买通花婆入署行贿于赵之妻，妻言之，赵允为遵办。及至堂讯，忽忘前事，宣判竟违妻旨。退后，妻严词苛责。赵急升堂，再予提讯，将前断翻转，并声言“本州一时模糊，细思尔如何能胜诉”。从此，遂有“赵模糊”之称。次年，赵竟升任光州直隶州[①]。

类似事例，在大河南北还有很多。一个多年在河南巡抚衙门任“文案师爷”的南省人士曾举一例：一个县令升堂问案，案头书吏呈文中有“计开犯人某某”字样，“令一见，即云：‘传计开来！’书吏禀：‘此非犯人。’令大怒，云：‘既非犯人，如何开在上面？尔既开上，我偏要传他到案’”[②]！就这样一个略识之无的蠢货，随后竟被上司视为“能员”，先由县令升知府，进而“且保举以道员用矣”。即令那些“正途”出身者，也都大同小异，很难有实心“为民作主”的官员。当时省内人士对吏治情状就曾作了这样的概括：州县官的通病是，一“请托”，二“贿赂”，三“逢迎”，四“软熟”（不管民众疾苦）；“大抵不奉公，不爱民，以官为恒产，而计享富贵、长子孙也”[③]。所以，道光末，固始一个关心时局的士子，就忧心忡忡地说：“河南大势，如人病不仁，耳目手足犹是，而五脏内空，气血不流”，而当政者但敷衍度日，只要“病者一日不死”，自身便可“享一日之利”[④]。

本来，在鸦片战争前，河南人民就已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鸦片战争后，在这种情势下，河南人民可真是“如水益深，如火益热”。破产农民很难找到别的活路，他们便积聚起来，拿起武器，结成武装团伙——“捻子”、“捻党”在大河南北，特别是近皖、近苏和豫西南地区迅速滋蔓。成千上万富有斗争传统的河南农民（包括一些老弱、妇女）愤怒地呼喊：

---

① 民国《重修信阳县志》卷三十一，汉口洪兴印书馆铅印本。
② 沈祥年：《借巢笔记·某太守》。
③ 《李浚文钞》，见江地：《捻军史研究与调查》，齐鲁书社，1986。
④ 蒋湘南：《七经楼文钞》卷四，道光二十七年刊本。



吃没有吃，穿没有穿，日子过的难睁眼！
死也是死，不如拼上老命去随捻！

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清王朝在河南的统治也结束了“太平岁月”，一场惊天动地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暴风雨就要到来了。

第三节　人民反抗的怒火

一、蓄势待发

在清朝前期，河南城乡就有“铁鞭会”、“群刀会”等团伙，参加者多是所谓“流氓游棍”——破产失业的农民，以江湖上“兄弟朋友”意识为纽带聚集一起，以“劫掠”求生。乾、嘉以后，类似的武装团伙——“捻子”（“趟子”）、“刀匪”（“红胡子”）在大河南北，尤其是南阳、汝州、光州、陈州、归德等府县日益滋盛。虽经政府多次镇压，但这种反抗斗争并未沉寂。

秘密教门，主要是白莲教及其各个支派——这是对清朝统治的又一潜在威胁。

作为民间的“叛逆”组织，白莲教在元、明两代就已在河南城乡广泛传习。此后三四百年，河南均为白莲教潜在势力特大的省区之一，不管封建统治者如何严厉镇压，始终未能遏止其在大河南北秘密传播，捕杀了老教主，即有新教主（一般为老教主的后裔或亲属）接替。该教虽有浓重的迷信色彩，组织上实行严格的家长制，却适应内陆省份“农业社会”农民小生产者的心态和习俗，特别是它所宣传的“三劫”说——现实社会是“青阳”、“红阳”当世，所以动乱不已，民生困苦，只有改变这种现实，使“白阳”当世，人民才能跳出苦海，进入“极乐世界”，尤能寄托无力抗御封建暴政和自然力量的小生产者的憧憬。所以随着社会危机的深化，白莲教及其支派“收元教”、“八卦教”、“天理教”等，与两

湖传入的“斋教”一道，不断在南北各县暗滋潜长，成为威胁清朝封建统治的又一“中原隐患”。

二、“盗匪肆横”

河南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遇上1840—1842年鸦片战争历史事变的。清朝封建统治者在战争中暴露出的极端腐败无能，特别是战后人民苦难的急剧加深，对于日趋高涨的河南人民反抗斗争无疑要起火上浇油的作用。到1851年（咸丰元年），连欺蒙成风的统治集团中，也不断发出阵阵惊呼：

“河南民风向称淳朴，近年盗匪肆横，日甚一日”①——项城籍官僚袁甲三的评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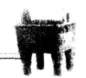
“河南近年盗匪肆横，南阳府属尤甚”②——湖广道监察御史张澧翰的奏报。

“河南之捻匪……结党成群，几于所在皆有”③——给事中焦友麟的呼号。

刚登上宝座的咸丰帝奕詝，对此也忧心忡忡，春初特发上谕称：“河南捻匪横行，实属目无法化。”④

确实，清王朝的“法纪”，包括上述诸种严厉的律例，再也阻遏不了河南人民的反抗斗争了，往日的暗火已煽旺成越来越大的明火，旧日的“伏莽”发展成冲击封建统治的“捻匪”。炽烈一些的，如泌阳、南召、唐（河）县、邓州、桐柏、淅川、新野、内乡等地，已经蔓延成片，多的有众一两千，少的也有数百、数十人，不仅“肆行劫掠”，而且还“几至围城”。豫东、豫南情况也大同小异，永城、商丘、夏邑、睢州、鹿邑、沈丘、息县、光山、新蔡、罗山、正阳等地，以至于豫北的彰德、卫辉等府，捻党也日趋

① 袁甲三：《袁端敏公奏议》卷一，《筹剿河南捻匪折》。
② 朱学勤等：《剿平捻匪方略》卷一，第4页，同治十一年刊本。
③ 王先谦：《东华录》，咸丰元年七月。
④ 朱学勤等：《剿平捻匪方略》卷一，第2页，同治十一年刊本。



活跃，有的还公然抗官杀兵。秘密教门也在南北各府县加速发展徒党，积聚力量，等待“起叛”的时机。

作为风暴逼近前的一种征候，其他各种形式的农村骚动也此伏彼起，如：

1838 年(道光十八年)，辉县“民变”，反抗官府无端苛派；

1842 年(道光二十二年)，河内、修武、安阳、汤阴、封丘、浚县农民，先后聚闹县署大堂，反对官府无理勒捐；

1844 年(道光二十四年)，林县人民组织联庄会，抗交“河工物料”；

1846 年(道光二十六年)，新乡县民贾学彦等聚众闯闹县署，要求减征钱粮，打伤官、役；

1847 年(道光二十七年)，武陟农民聚集万余人，抗交漕粮；

1848 年(道光二十八年)，孟县人民反抗知县加收河堤土方折价，推监生张来法为首，齐集县衙，要求减免……

一些地主士绅也加入“作乱”的行列，如 1848 年(道光二十八年)，商城廪贡生林翠皎，聚众树旗造反，攻占了豫鄂边境重镇宣化店；孟县监生张来法聚众轰闹县衙，反对县官借修河苛征；阳武团练首彭凤池、李昌等聚众围城，反抗官府滥征差徭。这种现象是过去十分罕见的，反映出鸦片战争后城乡人民确实难以照旧生活下去了，一场基础深广的农民起义高潮正在这个腹里省份酝酿成熟，封建统治者的“太平岁月”就要完结。

正是在这样的局势下，1851 年(咸丰元年)在广西爆发了震动全国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以此为标志，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高潮。在冲击反动统治上从不落后于人的河南人民，就从四面八方愤然而起，汇集成浩浩荡荡的农民反封建大军——捻军，成为这次革命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十四章 席卷中原的农民起义怒涛

第一节 太平军北伐入豫

一、挺进中原

正当以捻党为中心的农民反封建烈火在中原大地延烧的时候，1851年1月，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掀动了一场具有时代意义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起义大军在洪秀全、杨秀清等农民领袖领导下，以破竹之势挺进湖南、湖北，于12月末一举攻占了号称“九省通衢”的武汉三镇。随后数十万起义大军沿江东下，直取江宁（南京）。1853年3月20日，起义军攻占了这个历史名城，改其名为天京，作为太平天国的首都。这一辉煌的胜利，犹如惊天动地的春雷，震撼了神州大地，宣告了中国近代第一次全国性的农民起义高潮的来临，也揭开了河南人民反抗斗争的新篇章。

“居天下之中”的河南，战略地位本来就十分重要，加以清朝建都北京，河南更成了屏障京畿的关键省份，历来被清朝统治者视为“腹心要地”，一旦“腹心”不保，作为号令全国的“首脑”——北京连同整个封建王朝就生命危殆。因此，不论是太平天国或清王朝对河南都异常关注。1852年太平军才入湖北时，就不断派遣侦察人员入豫收集情报，省城开封和洛阳等地的地方官府均不止一次地查获太平军派来的“奸



细”。次年太平军攻克南京之初，洪秀全、杨秀清还曾打算进取河南，以此争夺天下的基业，只因有人提出“河南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最后才确定在南京建都。接着，太平天国就派出西征大军；进取长江中下游各省区，为新政权开疆拓土；派出北伐大军，攻取北京，结束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河南，自然是北伐大军的必经之地。



林凤祥等率师北伐

统率这支北伐军的是三位太平天国勇将——地官正丞相李开芳、天官副丞相林凤祥、春官副丞相吉文元。全军两万余人，于 1853 年 5 月从天京北岸的浦口出发，入皖北，于 6 月 10 日出亳州，以猛虎下山之势长驱入豫，头一个攻取目标就是豫东门户归德(今商丘)。

太平军 6 月 10 日离开亳州，12 日就进抵归德所属的宋家集。河南巡抚陆应谷驱赶所带的 4 000 名官兵迎敌，自己则坐着 8 人抬的大轿在后“压阵”。炮声一响，众兵扔下武器，争先逃命，陆应谷也赶忙溜下轿子，在亲兵的扶护下直奔柘城。次日，太平军就在当地捻党和民众接应下，从南、北两门同时攻入归德府城，歼敌 3 000 多人，还缴获火药 2 万多斤和大批其他军实，取得了入豫初战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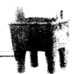
太平军一出手就消灭了陆应谷亲自指挥的清军主力，更使开封和省内各地的文官、武将乱作一团。短短的几天内，省城各官员眷属都外逃一空，不明底细的铺户、户民也十走七八，被调出征的各路清军更是

“馁气乘心，魂魄先丧”[①]。但太平军的任务，不是来河南攻据州县，而是以此为通道进军北京。所以在攻占归德后，李开芳、林凤祥等就率大队人马赶往西北40里外的刘家口，以求尽速寻船抢渡黄河。正愁没法向皇帝交代的陆应谷以为有机可乘，就督令从豫东各处赶调而来的清军5 000人，于14日反扑归德。留守的太平军虽然人数有限，立即大开东门，分两路袭击敌人。这一仗又杀敌2 000余人，缴获大批火药、火炮和骡马、车辆。陆应谷像一只丧家之犬，短衣乔装，连夜狂奔200里一直到陈州（淮阳）城才停歇。

刘家口对岸是山东地界。山东巡抚李僡不久前任河南巡抚，对河南省情比较了解。他获知太平天国北伐军出动的消息后，就将两省沿河船只全都收泊北岸，并在刘家口渡口北岸部署了东北调来的马、步2 000多人，用重炮封锁河南；曹县知县进而又将押在北岸的船只全部烧毁。太平军觅船不得，用木筏试渡又被敌炮击沉，只好改变原定由山东北进的计划，于15、16日全军沿河西进，连克宁陵、睢州、杞县、兰仪、陈留等县。因为不断有贫苦人民和捻党参加部队，所以队伍大为扩大，从陈留往西，横排二三十里，像怒潮一样向省城开封席卷过来。先头部队到达开封时，殿后部队才撤离归德。

留守开封的署布政使沈兆沄、按察使林祖祥聚集存兵和乡勇1万多人，先把城外民房烧个精光，然后闭门拒守。太平军只想早日过河，无意攻城，19日先头部队到达后，只在东、南两面作试探性的进攻，旋即退屯繁塔寺和附近各村。大队人马则马不停蹄地赶往20里外的朱仙镇，继续觅渡。20日，留在开封城下的小部队冒着倾盆大雨和劲风迅雷，挖掘地道，想用火药炸坍城墙。但因十多年前黄河在中牟、祥符（开封县）两次决口，开封城外浮沙堆积，深达丈余，地道随挖随坍；而城郊旷阔，没有村落、民房掩蔽，火药又被滂沱大雨淋湿，复加两道城壕经日夜大雨之后，变成两条不易逾越的小河。在这样的情势下，太平军遂弃城不攻，持续开赴朱仙镇。可是，离镇70里外的柳园口黄河河南

① 张守常：《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第264页，齐鲁书社，1984。



所有的船只亦被地方官府拘屯在黄河北岸，太平军好不容易找到几只小船，也因对岸炮火封锁，试渡不成。21、22日，全军只好继续西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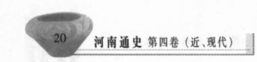
清廷获知太平军入豫，急忙调派江宁将军托明阿、江北大营胜保、都统西凌阿等，分别从苏北、皖北率部星夜北上追击；又命直隶等周边省份火速抽调马步入豫拦截。但各路清军都慑于太平军的声威，越发迁延缓进。6月12日，托明阿部从永城出发，12天后才到陈留与西凌阿部会合，因太平军业已西去，两军才进至开封。由西向东的陕甘清军6月中旬总算进至郑州，又一住5天，不敢再进。后经巡抚令箭催逼，才逡巡出城，刚走四五里就诓称太平军已到离城12里处，蜂拥回城，被城内官民所拒，不得不进至中牟。喘息稍定，正好遇上西进的太平军，除数十人逃得活命外，绝大部分"束手受戮"。倒是龟缩在开封城里的清朝官、将，原以为太平军"若竟围攻，不堪设想"①，如今死里逃生，于是凶焰陡长，连日派兵勇去太平军留驻过的村子捕杀所谓"贼匪"，向朝廷报功请赏，居然得以加官晋级各有差。

太平军于23日攻克中牟后，一面随处搜集粮草，一面继续西进。沿途布告人民，嘱其勿在大道5里内活动，以免误伤。中经郑州、荥阳，于25日抵达濒河的汜水城（今属荥阳），随即又突过虎牢关，进占巩县城，杀当地人民咒为"恩犬"的知县王恩泰。然后，"打粮、括人（招兵），禁止奸杀"。"民有献物（犒军）者，厚赐之"②。

巩县是洛河与黄河交汇之处，有大小船只数百常年在两河河面运送煤、粮、盐等商货，但太平军到来前也多被官府收泊北岸，只是洛阳、偃师、巩县共管的洛河因三县官府互相推诿，船户得以藏匿一些小船。这些船对连月望"河"兴叹的太平军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太平军立即征归军用，并选定汜水骨牌口，于28日开始抢渡黄河，迅速占领了北岸理想的滩头阵地——绵延十多里、并遍植柳树的柳林滩。当日，即攻占了温县城。随后继续北进，于7月8日入围怀庆（今沁阳）府城。太平

① 张守常：《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第254页，齐鲁书社，1984。

② 《巩县志》卷五，第53页，民国26年开封泾川图书馆刊本。



军从进入河南的第一天起力求实现的渡越黄河的目标,终于胜利实现,只是时间推后了一个来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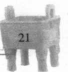
因为船少人多,太平军在巩汜河面抢渡三日三夜还没有渡完,而清军托明阿部数千在清廷的严催下,于7月1日赶到汜水,一面用火器封锁河面,一面攻击滞留在河南的太平军。太平军冒死续渡,最后剩下两三千的掩护部队因被敌人紧紧咬住,只好掉头南向,借以牵引敌人,减少北岸的压力。作为一支脱离主力的偏师,这支太平军仍然保持着农民军队的严格纪律和勇猛战斗的锐气,于8月攻克密县,9月经新郑、长葛,复取道许州(今许昌)、临颍、西平、遂平,渡涉沙河,再入正阳,渡过淮河,于23日进克罗山。所经各县,或只"焚衙署、城隍庙、戏楼而去",或"发(官府或富户)库金,置之街市,任穷民所取",遇见读书人,则"劝从行",如不愿,亦"释之去"。城乡人民看到这支陌生的军队根本不是官方所说的到处"奸淫掳掠"的"长发贼",而是纪律严明的起义军——许多人称之为"红巾队"(因义军头裹红巾),纷纷要求参军。太平军志在入鄂,无意在豫南盘桓,连夜冒着倾盆大雨,从罗山突过大胜关,疾速进入鄂北,又间关入皖,汇入太平天国西征大军。

二、怀庆战役

这个时候,大河北岸的太平军正在与各路清军进行北伐以来的第一个战役——怀庆战役。

当太平军屯驻朱仙镇之日,李开芳等3位统帅曾联名向天京发出一份禀报,一方面报告在归德等地取得的胜利,另一方面也陈述了这支无后方作战的北伐大军所遇到的困难:沿途吸收了大批河南籍新战士,使"兵将日日加增",火药、武器等因续有缴获,"俱皆丰足,但欠米谷一事"。抵怀庆后,获知这一带近年麦、秋均收成较好,又盛产硝磺、火药和火器,所以决心攻取这座府城,在此筹集军实,以便远征京津。清廷忙不迭地谕令托明阿、胜保等南岸追军火速渡河"追剿",复命陕甘总督舒兴阿、山东巡抚李僡和理藩院尚书恩华,分别统率该省兵勇入豫助攻,并特命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统一指挥。

然而,诸路清军慑于太平军的声威,"畏之如虎";各统帅"皆自扫



门前之不暇”，只求不被太平军歼灭就算万幸。身为钦差大臣、总统诸军的讷尔经额7月8日到卫辉后就“迁延不进”，后得知同僚要借机“奏参”，才不得不进驻清化镇（今博爱）；山东巡抚李僡则报称“病笃”，跑回济南，留下恩华与讷尔经额一起驻军在清化至二十里铺一线；托明阿、西凌阿、胜保等部则挨至中旬末、下旬末才进抵怀庆外围，布防于怀庆东南申楼等村；加上陕西调来的数千军队和怀庆城内紧急组建的一万数千兵勇，总兵力有三万数千人，超过了太平军。他们不仅后勤供应十分充裕，而且还配备大量火炮，其中的万斤巨炮射程近十里，但却始终不敢真正合围，主要在东、北两面对太平军摆出进攻态势，有些且远离府城数十里，西、南两面都“虚无人马”，太平军仍能往来自如。



太平天国北伐军从朱仙镇发出的军情报告

怀庆城形如卧牛，历来易守难攻，在太平军到达前，地方官府又决开沁河河堤，使河水灌满环城城濠，以阻滞攻城之敌；城内粮储火器比较充足，兵勇也有一万数千人。太平军外线有诸路清军逼攻，自难迅速拿下这座府城。为了对付内、外线之敌，太平军在怀庆近郊和沁河北岸赶筑起七八座木城，各城之间均有通道联通，另又在沁河河面搭起浮桥，往来更加便捷。敌人看见太平军壁垒森严，越发“观望逡巡”，只是隔着沁、丹两河，不断出兵“放枪炮、烧民房而归”，尔后捏造“战绩”上报清廷。只是各乡人民，大遭其殃。据一个在籍官僚记述，各军“扎营左右村庄皆被骚扰，黑龙江兵尤甚，打仗则闻炮即遁，惟

日肆搜抢，民间桌、椅、门窗、鞋袜等物、零星杂货，皆掠卖之，竟至成市”[①]。相反，太平军却能所谓“假仁假义，以收人心”：如有淫杀掳掠者，“头目知则必诛”，怀庆东关“妇女逃避不及，用车送至十里铺”[②]。两相比照，人民更归心于太平军，不仅怀庆四周各乡，甚至济源、孟县人民也纷纷将粮食、火药、铅丸送入太平军，均得厚值而归。远近宣传，来者日众，“源源不绝，竟至成市”[③]。靠着人民的支援，太平军筹集了远征必需的大量军实。

对于外线清军，太平军以逸待劳，先后在7月18日、19日和26日，出队大败直隶大名镇总兵董占元、江宁将军托明阿等部。在内线，太平军先用劲弓将告示射入城内，宣示义军宗旨，告诫军民人等及早归顺。随之，太平军就试架云梯攻城，但未能得手。接着又施用地道战术——因巩县一带许多煤窑工人参军，挖掘技术尤为精湛。但因豫北产煤，怀庆城里也不乏深谙此道的煤工，故太平军所挖的20多条地道，被城内守敌发现而难以使用，只有两条地道隐蔽较好，得以填药引爆，先后将东城、西城城墙炸开两个缺口。因城内守敌舍命堵截，太平军仍未能破城。但经过数十日围困，城内存粮已很少，而太平军则已筹足了各种军实。在这样的情势下，李开芳、林凤祥等决定弃怀庆不攻，继续北伐。鉴于东、北方向有敌人重兵拦截，而西北方向的山西并没有设防，因此从9月1日开始，全军轻装转移。2日攻克济源，取道白莪村，顺利地跨越王屋山，穿过封陵口、邵源关，进入山西，随即转入直隶。移营之前，太平军在怀庆城外各木城中巧布了疑兵阵，成功地迷惑了城内外的敌人。空垒3天之后，敌人才发现，这才分路猛攻各木城，除了见到太平军树下的“小妖免送”的木牌和撇下的20多尊大炮外，找不到一个“发匪”[④]。于是，诸将帅连夜草奏，凭空铺陈各军如何分头进兵，“奋勇”猛攻，“痛歼发匪”，最后“大获全胜”。清朝统治者居然又论“功”

① 李棠阶：《李文清公日记》卷十三，民国石印本。
② 张守常：《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第284页，齐鲁书社，1984。
③ 李棠阶：《李文清公日记》卷十二，民国石印本。
④ 这20多尊大炮，留至清末才由河北镇总兵派人送开封善后局储存。



行赏。

这支太平天国北伐军离豫后，1854 年初春，太平天国又派出夏官副丞相曾立昌等率领的北伐援军。3 月上旬，这支军队由皖北经豫东夏邑、永城等地转入苏北、山东省境。前后两支长途远征的太平军虽然都曾取得一连串的胜利，但终因孤军深入重兵汇集的清朝统治中心，最后都陷于失败。尽管如此，这两支农民军队在北方驰骋一年余，不仅给清封建王朝以沉重的打击，而且还成为一种驱动力和催化剂，把河南和邻近各省的农民起义推向新阶段，在蔓延着反抗烈火的黄淮大地，四处都高扬起捻军的猎猎战旗。

第二节　农民反抗的烈火

一、"天下起反闹大乱"

太平天国天京建都和大举北伐，将清王朝推向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对长久苦于封建暴政的各族人民来说，则是一个巨大的鼓舞，纷纷揭竿而起，从四面八方向这个封建王朝发动勇猛的冲击。短短的几年间，农民起义的战鼓在南北各地擂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黄淮流域的捻军起义，福建、上海和两广地区的天地会、小刀会起义，贵州的苗民和云南的回民、彝民起义（有不少汉族农民参加）。有着悠久反抗传统的河南人民自然也决不落在人后。"竹竿开花猫生蛋，咸丰只有二年半"的鼓动性歌谣在大河南北不胫而走，意思是说，发生非常事变的年月到来了，清王朝要在咸丰皇帝统治了两年半的 1853 年完蛋。成千上万的黄河儿女加入"起反"的洪流，在中原这个"腹心要地"埋葬清朝地主阶级的统治。1853 年后，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农民起义或反暴政斗争就四处掀起，其主干和中心力量就是由过去的捻子发展而成的捻军，另外还有以联庄会为组织形式的抗粮斗争，以及其他分散的反暴政斗争。此呼彼应，把延续已久的人民反封建斗争推向新阶段，使河南成为黄河流域和整个北方人民反抗运动的一个中心地区。

在豫东归德一带，随着太平天国北伐大军转战而西，各处就“土匪蜂起，白昼抢劫，官兵力不能敌”[1]。

在豫西南和豫南的南阳、汝宁、光州各府县，“向之匪（捻）党不过数十人，多者百人，（官府）捕力足以相制，官兵率众往，则散去。自粤匪入豫……官兵迁延不能遏，而捻匪亦嚣然无畏矣”[2]。

就全省来说，确如学政张之万所概括的：“查河南捻匪，南、汝、光、归、陈，各处皆有，旋聚旋散，从前并无成千大股。自（1853 年）粤匪窜扰豫省，各处捻匪乘机纠集……党羽日众，焚掠愈甚，渐成不易解散之势。”[3]记述咸丰、同治年间河南兵事的《豫军纪略》，在回顾省境“大乱”的形成时也说：“自粤匪陷金陵，犯河南，中州土捻乘间窃发，所在蜂起。”[4]

影响较大的“土捻”——地方性的农民反抗武装，光 1853—1854 年间就有：

永城苏天福起事于安徽亳州，率部 2 000 人入占永城；接着又有李月、王贯三等继起，分建红、黑、白三旗，有众数千人。

夏邑骆三群等树旗聚众，围攻县城，接着又有宋喜元等以马牧集（今虞城）为基地，队伍发展至数千，屡攻县城。

确山雷六在太平天国南旋的北伐军到来时就起事响应，此时扩展队伍，破桐柏城，杀县令。桐柏本地捻众亦以黄岗为基地积极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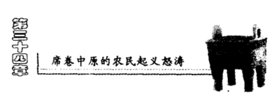
信阳王东、汝阳刘文郎等联袂发动，与雷六部联合，攻正阳城；正阳戴永年等也随同起事抗官。

沈丘、项城刘允吉、刘疙瘩、邓跃林等起兵攻沈丘城，并击败署河南按察使牛鉴所统清军。

光州、固始、息县一带也捻军四起，总数达数万人，分置东、南、西、北四路元帅。

---

① 光绪《虞城县志·杂记》，光绪二十一年刊本。
② 周玉瓒：《周憩亭集》卷八，第 11 页。
③ 张之万：《张文达公遗集》卷二，第 14 页。
④ 尹耕云：《豫军纪略》卷三。



其他如荥阳、新郑、许州、鹿邑、兰仪（今兰考）、郑州、汜水、汝阳（今汝南）等地，不同规模的农民武装也风起云涌。仅夏邑、商丘、永城、虞城四县，见于文献记载的“土捻”就近百起，其他府县失载的更多。巡抚英桂在一次奏报中说“几乎无郡不有”，确系实情。

四处“起反”之后，农民武装的斗争水平和政治品位也不断提高——这是跃登新阶段的另一个重要征象。过去，小团伙的“捻党”，主要从事“派饭肆抢”、“劫富济贫”等活动，基本上是经济性的、地方性的所谓“土匪”，一般“聚则为捻，散则为民”，多数时间依然务农，用统治者的词汇说，乃是“作乱”——扰乱地方封建统治秩序，还不是“叛逆”——冲击或企望倾覆王朝政治统治的起义军。1853 年后，“渐渐聚而不散”，集合上千的人马，不断围攻府、县城，“戕官劫库”之外，“竟敢伤及副将大员”；所至之地，“以纠抢衣物，散给贫穷无业之人，窥其意，非徒思纠抢财物，实有不轨之心”①，也就是说，有心汇聚众多贫苦人民向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挑战。这样，以往的“捻党”、“捻子”，就逐步发展、提高成为正规的农民起义军——捻军。以后几年，各支捻军在战斗中愈益发展壮大，成为黄淮流域人民反封建斗争的中坚和主体。

二、联庄会抗粮斗争

与捻军崛兴的同时，以联庄会为组织形式的农民反暴政斗争也在省内一二十个州县轰然并起。

联庄会，本来是封建官府倡导和支持的、地主豪绅操纵的一种“自卫”组织，凡属“庄”内农户，均参加其中，一庄有警，各庄赶去协同“御匪”，本旨是维护农村的封建统治秩序，给地主富人护庄护院。鸦片战争前每逢战乱岁月就多次出现，与传统的“团练”近似。随着“天下起反闹大乱”的形势的出现，许多州县官府和地主豪绅为了防止农民反抗烈火的蔓延，又纷纷重组联庄会。然而形势不同了，在全国性农民起义高潮到来的年月，长久苦于封建暴政的农民无不“人心思乱”，一旦组织和武装（尽管十分简陋）起来，那就不再听从官府和豪绅的约束，

---

① 张之万:《张文达公遗集》卷二,第 15 页;卷三,第 30 页。

而是根据自身的利益和意愿行事了。如禹州各乡在1853年组织联庄会，开始时一如既往地“以各大户主其事”。旋因这些大户遇事“袒富民”，于是村民群起反对，迫使“各大户请退”，群众就拥戴刘化振为首，转而“闹粮抗官”。其中声势较大的，在1854年有：

禹州联庄会在刘化振领导下，拥入州城要求知州取消钱粮浮收，被拒后，四乡会众遂围攻州城；

辉县秀才杨景福、塾师戴蓥等在周镇设局，聚众抗纳“土防加价”，围城3日，有众四五千，获嘉、新乡、陈留等县人民闻讯，也多拖抗钱粮；

封丘人民在刘超等领导下，反抗官府苛派差徭和逼催欠赋，闯入县城焚毁县署；

安阳朱谷、邓玉麟等聚众抗粮抗官，同时林县人民在宋超凡等率领下，反抗官府滥征“土防加价”，汤阴乡民亦纷起响应；

杞县、原武士子“联社结会”，带领四乡群众反抗官府苛征钱粮。

这些抗粮、反暴政斗争，虽然在官府镇压下很快失败，领导人如刘化振、宋超凡等牺牲，但1855年间，类似斗争又接连掀起，而且形成高潮。先是禹州联庄会余众在李贤、袁西成等领导人的率领下扩展队伍，抗官劫富，并攻入密县，后又连攻郑州、禹州等城。入夏，新乡联庄会首张炳又聚众千余，进围县城，四乡群众闻风而至，人数几及万人；获嘉联庄会继起行动，控制了县城；浚县、原武、阳武（今原阳）、济源、温县、安阳、内黄、河内、林县的联庄会也继起抗官，声势很大。封建统治者除赶调省内存兵前来镇压外，还调动直隶、山东、山西等省防兵协同防堵和入豫“援剿”，河南巡抚英桂亲至卫辉“督剿”。尉氏、洧川、陈留、杞县、荥阳、长葛、洛阳、偃师、巩县、登封、汜水等地农民也用不同的形式，四起呼应。

中原大地的真正主人——农民“起反”百十年来被封建统治者视为“乐土”的河南，阶级力量的对比和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就是广大尚未“起反”的农民，再也不像以往那样“淳朴易治”，而是威不可犯。

盘踞在省城开封的河南统治当局也意识到形势的剧变和事态的严



重。他们惊呼，“豫中民气，强悍日形，如此丰年，不安于室”；“四路贼氛，此后又不知是何情形，是何局势，真令人不堪设想”①。于是，封建统治者就作困兽之斗：除了动用整个国家机器特别是调集兵勇极力镇压外，又多方将其统治基础——城乡地主阶级动员和组织起来，让他们广泛组织团练、乡勇或联庄会。（后来转而“闹粮抗官”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在1853年春，清廷就特命在籍前广西巡抚周之琦、内阁学士祝庆蕃等办理河南团练。在朝廷和地方统治当局的督促下，许多州县的地主团练和联庄会就如雨后毒菇一样陆续涌现，仅太康知县祝岂指挥下的团练，总数即达20万人。这些地主武装魁首歇斯底里地叫嚷：处于眼前的“乱世”，就不应心存丝毫“忠厚之见”，要的是大开杀戒，“辟以止辟”——用大杀农民来防止地主富人的被杀。他们与官府互为狼狈，用极端残暴的手段来滥杀所谓“匪类”（包括一些“言语不逊”的农民），“杀不及则以铡草刀断之”，刽子手们杀得手软了，“令瞽者代之。先后死者不知凡几”②。光是永城一地，1853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遭难的“捻首”就近1 000人；在邻近的夏邑，也“日戮贼十数人或数人不等”，杀之不足，有的还被活活钉死在城门上“示众”③。其他如南阳府、汝宁府和罗山、确山等县，不长的时间内，被官府和团练残杀的也数以千计。结果自然不能“止辟”，反而促使更多的农家子弟接受捻军“报仇”和“恶乡团”的所谓“邪说”，唱着“磨磨镰，贡贡刀，俺上城里杀清妖”的战歌，加入起义的行列。

这样，当时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农民和地主阶级都摆开了阵势，依托中原大地进行大较量、大搏斗，构成此后十四五年河南社会历史的基本内容。

三、在战斗中成长壮大

作为农民武装的主干力量驰骋在中原大地的捻军，除了河南本省

① 中国史学会：《捻军》第5册，第15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② 龚淦：《耕余琐闻》，甲集，第1页。《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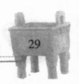
③ 《夏邑县志》，民国9年亳县福华石印本，卷五，第9页；卷九，第20页。

捻军外，还有连番入豫的皖北捻军，即所谓“土捻”和“皖捻”。除此之外，还有不时崛起的白莲教系统和联庄会反清武装，以及连续出入河南的太平军、山东的长枪会武装和黑旗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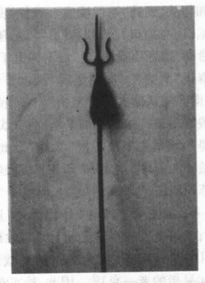
1855 年秋，豫东和皖北各部捻军在安徽亳州雉河集举行“会盟”。风云际会，群雄毕集，正如民歌所记述的，“雉河集，像京城，五色彩旗飘在空，各路趟主（首领）都来到，商商量量打北京”。为了尽早实现这个战略目标，“趟主”们共推皖北著名捻军首领张乐行为盟主，并将诸路捻军按五色旗帜分别建制，以改变过去互不联络、各自为战的状态，在与清王朝和地主阶级的大决战中夺取更大的胜利。豫东捻首苏天福，被推为“黑旗”总首领。随后，以张乐行名义发布告示，声讨清朝封建统治的罪行，宣示义军“救我残黎，除奸诛暴”的宗旨和决心。这是一次豫、皖捻军的大聚合，以后的所谓“皖捻”，实际上包罗豫东和豫东南的众多捻军。消息传出，河南近皖府县的贫苦农民更踊跃投军，许多村庄，“杀鸡又宰羊，黑旗飘满寨”，队伍扩展至五六万人。因为河南清军防御力量薄弱，所以就在当年秋、冬和次年春季，张乐行等连续挥师入豫，先后攻克夏邑、马牧集（今虞城）、柘城等地，并多次围攻归德府城，屡败“督办（豫、皖、苏）三省剿匪事宜”的河南巡抚英桂所指挥的清军武隆额、邱联恩、崇安等部。夏邑、永城捻军傅伉、司顾彦、王贯三等部也积极行动，擒杀夏邑县令郭凤恩等。据后任入驻开封“剿办”豫皖捻军的都统胜保奏报，称豫、皖、苏三省捻军“已成燎原之势”，在豫东、豫东南到安徽亳州、蒙城的广大地区与清军攻战，而“剿办豫匪”，最为当务之急。由此可见所谓“豫匪”在捻军战场上的地位和威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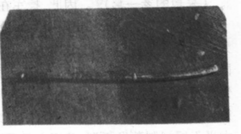
在河南的另一角——豫西南，又一支规模较大的捻军也在发展壮大。1856 年夏秋之交，裕州（今方城）、泌阳捻军李太春、王四老虎等部在两县交界的角子山会合后，进入宝丰、鲁山、郏县地区活动。3 个多月后，湖北襄阳捻军 2 000 余进军豫西南，南阳邓大公、张九，内乡岳牛、岳猪等随后又举旗响应。豫西南农民反抗斗争的烈火自此也越烧越旺，成为河南捻军又一个滋生地和重点活动地区。

为了确保河南这个腹心要地，清廷先后严令河南巡抚英桂和在皖



北专责“剿办捻匪”的项城官僚袁甲三等加紧攻剿，后又加派胜保率部助攻，复赶调陕甘、山西等省清军数千入豫，交由英桂、胜保指挥。他们利用联庄会领导成员复杂、组织松懈又各自为战的弱点，在1855年夏、秋，成功地镇压了上述十数州县“闹粮抗官”的联庄会，并以武力为后盾严令解散。但对于河南农民反抗运动主流并迅即壮大的捻军，他们却无计可施。因为各支捻军所到之处，没收地主富人的存粮和钱财，让贫苦群众分取，于是就如当时民谣所说，“苦了日子主（财主），好了穷光蛋”。因此，不论封建统治者如何渲染“捻匪”烧杀掳掠，诱胁城乡组织地主团练，但“乡愚”们多“束手坐视，扬扬自得，甚且为酒食以待”①。加上捻军对敌作战均“不畏死”，更使清军闻风丧胆。负责三省“剿办”事宜的河南巡抚英桂，只要探马报告20里外发现十来个“打粮贼马”，就惊恐万状，一天六次要胜保赶紧派兵驰救。豫西南捻军初起时，人数不满一千，清廷命他赶紧往“剿”。他只好率众从陈州（淮阳）转进。到西华时，军装本来都有船运载，却硬要当地供应上等大马车400辆，且“故意刁难需索”，每车额外加钱8串。他本人“每日供膳，动至百金”。随从文武分乘30多顶大轿，外带大批兵





捻军使用的武器

① 王诜桂：《王丹君先生文集·与太康陈练长书》。

卒和仆从，到处“百般凌虐”，致使“商民歇业，市肆一空”。就这样经由周家口（今周口）、许州、叶县等地，随处停留，等这位“大帅”赶到裕、泌一带时，豫西南捻军已扩展至四五千人。然而，他仍然一次又一次向清廷奏报“大捷”。实则全属“纸上空谈，任意装点”，“不独英桂梦所未到，即其随从诸人何曾目击”?！即便是号称“精锐”的胜保部，士卒也因粮饷多被克扣，“朝铺未周，而夕炊已缺”，一天连勉强吃到两餐都很难得[1]，居然也屡次奏报“大捷”。此类“大捷”再多，也无法掩盖捻军日益壮大的事实。1857 年 3 月，清廷以英桂“剿办捻匪，日久无功”，予以革职留任，“以观后效”。但整个“剿捻事宜”仍无起色。其所以致此，一个豫东士子道出个中原因：一是力量对比上，“贼众我寡，贼强我弱”；二是士气和临阵表现上，“贼致死，我贪生”；三是军纪上和在人民心目中，“贼有道，我无纪”；四是战术上，“贼用奇（机动灵活），我守正”（呆板的老一套）[2]。因此，捻军在清方不断“奏捷”声中日益壮大。

1857 年 3 月，张乐行等领导的捻军主力与李秀成、陈玉成率领的太平军在安徽霍丘、六安交界处会师，随即达成协议：捻军接受太平天国的政治领导，张乐行等接受太平天国北征主将等封号，不过在军事上仍保留捻军独立行动的自由——“听封而不能听调用”。这是继雉河集会盟后捻军史上又一重大事件，自此以后，黄淮流域各支捻军都仿效太平天国规制蓄发不剃，并用太平天国名义和纪年发布文告，表示与太平天国一样，都要推翻清朝统治，创辟“新天新地新世界”。此后两年左右的时间里，这部分捻军主力主要在皖北与太平军协同作战，偶有偏师入豫，也不久折回，河南战场抗击清军的主要是上述豫西南捻军。他们在 1857 年 5 月间取道叶县、禹州、汝州等地，折入确山、西平、郾城、临颍一带活动，先于许州境击溃开封营守备程金升等部，复于禹州城北设伏击败河南按察使周士镗部，队伍发展到 4 000 余人。接着，由南阳赊旗店（今社旗）出击的捻军五六千人，又于 10 月中旬进围泌阳县城；

---

① 尹耕云：《心白日斋集》卷二，第 14—16、38 页。
② 《李浚文钞》；江地：《捻军史研究与调查》，第 299 页，齐鲁书社，1986。



继而东进，于下旬与遂平捻军萧况部同围确山。因清军龙泽厚、邱联恩等部四面堵追，各支捻军乃于月底返回角子山基地。他们吸取了孤军作战的教训，就与皖北的张乐行等取得联系，决定于11月间同至周家口“合捻”。陈太安、萧况等5位首领亦将所部分建五色军制。可惜两处捻军均受厚集的清军和练勇的堵截（包括从山西、陕西等省调入豫西和豫西南的马步数千），“合捻”难成，豫西南捻军只好在角子山继续待机。

1859年春，皖北捻军为了甩掉敌人，决定再次进军河南。3月中旬，孙葵心、刘天福等率两三万人，取道商丘进破宁陵。随后，复围归德，破睢州，转进太康、通许、扶沟等地，与南阳镇总兵邱联恩所率河南清军主力相持于郾城、舞阳一带。捻军选择舞阳北舞渡沙河两岸设伏以待，终于在29日将邱部团团围住，在杀虎桥头将邱联恩击毙，3 000清军除少数逃归许州外，大都被歼。邱是前些年在“剿捻”战场上磨炼出来的著名悍将，有“邱老虎”之称。捻军获得这一大捷后，于4月初带着大批战利品返回皖北。过了夏收大忙，又于8月下旬聚集万余人马，由汝阳、正阳、罗山一线挥师入豫。一路汇聚当地捻军，队伍扩展数倍。9月初，在汝阳野猪岗击败清军，随后转入豫东，于10月上、中旬，先后攻夏邑、睢州等城，击败承惠所部清军，下旬向杞县、兰仪（兰考）转进，开封震动。“督办河南剿匪事宜”的副都统胜保和署理河南巡抚瑛棨十分惊恐，急命开封全城戒严。但孙葵心等无意攻坚，南下尉氏、新郑、禹州。另部捻军在姜台凌、李大喜等率领下，复由皖北进入豫东南，至舞阳与孙葵心部会合。9月底至11月上旬，捻军或分或合，在郾城、临颍、鄢陵等地与清军副都统关保、总兵崇安等部清军搏战，于11月下旬带着战利品由豫东转归皖北。于是，瑛棨于11月底向清廷报捷，声称全省“一律肃清”。

从1853年捻军大起至50年代末所谓全省“肃清”，可以说是河南捻军战争的第一阶段。这六七年间，河南虽是捻军的一个重要战场，但真正的大战并不多。这是因为捻军与江南的太平军不同，转战各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补充军实，除非战机难得，一般均无意攻城掠地，更不

想久据某城。清军将帅深知这一点，所以只在捻军前后装模作样地追截，就可以不断奏报"剿贼获胜"，"杀贼"几千几百，最后得能"肃清"。这样，河南捻军战争的第一阶段就军事上说，双方的有生力量均没有较大的损失。而这一点，对于长期习惯于游动作战、没有后方基地作依托的捻军来说，却潜伏着失败的危机。

第三节 捻军的兴起

一、敲骨吸髓的盘剥

19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性的农民起义高潮，核心力量是建都在天京(南京)的太平天国，黄淮流域的捻军在政治上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就封建统治者方面说，镇压农民起义的主要力量不是清王朝的正规军队——业已十分腐朽的绿营和八旗兵，而是以曾国藩、胡林翼为魁首的两湖汉族地主武装——湘军(19世纪60年代后又增加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的楚军)，主战场是在长江中下游各省。正是在这关系全局的主战场上，1856年、1857年以后，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太平军原先占有的湖南、湖北、江西的广大地区以及皖南的几个要地都被湘军夺据，太平军渐趋颓势。但就河南来说，总的态势正好相反，捻军的力量继续发展。其所以至此，固然与河南封建统治者昏聩无能、军事力量相对薄弱有关，但根本原因则是19世纪50年代后大河南北社会矛盾激化，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封建统治者敲骨吸髓的盘剥。

为了支应与年俱增的镇压人民起义的军事费用，从清朝中枢到河南省、府、州(县)官府都加紧对城乡人民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搜刮：

(一)捐输

在各省人民大起义爆发前，清廷为了应付鸦片战争后的财政亏空，就已多次举办捐输(包括捐纳)。到1847年，全省已因"连年荒旱，累



次捐输，商贾不行，殷实皆空虚”[①]。1851年，清廷又颁发《筹饷事例条款》，进一步在各省推广捐输，特由户部行文河南等省督抚，“劝谕官绅士民量力捐输，以济要需”。1853年春，再次通令各地“绅士商民捐资备饷”[②]。随后，以巡抚陆应谷为首的河南统治当局拟定章程4条，加紧在各府县勒捐，而且至再至三，“虽数十亩之地户皆勒之”[③]。有地80亩者，勒捐至100串；300余亩者，勒捐至300—500串不等，以致“民欲卖物，无物可卖；民欲鬻产，无主可售”[④]。可见，逼勒是相当厉害的。

（二）加征赋税

河南以土地为计征对象的赋税——主要是地丁和漕粮，在鸦片战争前后已日趋沉重，五六十年代用兵期间，官府又连续加征。拿漕粮来说，均改征折色，1857年每石由清前期的征银0.8两增为1.25两，而各地官府又在银钱比价上额外浮收，实征制钱6串余，合银近4两。1862年，巡抚张之万以此为由，复奏定每石征银3.3两，较前期定制加征4倍以上。州县官吏在此明定章程之外“又任意多取”，于是“民间完纳银有达六两九钱者，钱有近九千二百者”[⑤]。就是说，相当于早先定章的9倍以上。在地丁的征收上，州县官吏也大幅度地提高银钱比价，尤其是南路各府县，每两折征至3 000文上下，东、西、北三路也征至2 500—2 600文，较当时实际银价（一两兑钱一千五六百文），浮收加倍。此外，官府还巧立名目额外加征。如商城，原额每亩征银0.048两，在19世纪50年代末，按制钱177文勒征，相当于原额的2倍，致使一些农户“卖媳完纳”[⑥]。西平、遂平、罗山一带，官府以举办团练为名，每亩加征“养勇钱”200—300文，或择肥而噬，“勒派勇费，勒借（预征）

---

① 李棠阶：《李文清公日记》，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七，民国石印本。

② 王先谦：《东华续录》，咸丰朝，卷十四，第7页；卷二十一，第21页。

③ 李时灿：《中州文征续编》卷三，第25页，1924年开封经川图书馆刊。

④ 王诜桂：《王丹君诗文集》卷一，第17页。

⑤ 《重修林县志》卷五，第35页；《太康县志》，卷三，民国22年铅印本。

⑥ 《详议前任（商城）知县任正训被参一案详稿》，河南省档案馆存档。

次年钱粮"[①]。这些，还只是官方明定的数额，衙门吏役和里长、柜书之属又上下其手，借端苛索，农民实际负担远过此数。以河阴（今属荥阳）为例，官府规定每两地丁折钱2 750文，漕米每斗折价700文，"开征时，役即将愚懦者粮名揭出，名为垫解，（粮户欲）即完，不可得。迟日索重价，粮有四五千文、漕米有千余（文）者"。这些，在全省均具代表性，说明农民土地的实际赋税负担较清代前期加重了近10倍。

（三）抽厘等杂捐

"厘金"是1853年新创的搜刮手段，19世纪50年代中推广于南北各省。河南报告清廷开始抽厘的时间是咸丰八年（1858年），行于陕州、淅川、孟县等地，以上市或运销途中的盐、药材、棉花等为抽征对象，以后逐渐扩大于大河南北和其他诸种商货。有些研究者查考全省在1858—1861年间，每年厘金总收入在50万—90万两，个别年份高达120多万两，1862年后，平均每年50多万两[②]。因为此种新创的厘金与划归国家财政的田赋不同，既没有统一严格的制度，抽征的伸缩性很大，又归地方军政当局自行掌握使用，所以州县官府和各支清军就往往擅自设卡收厘。如五六十年代之交，南汝光道赵书升在所属各州县"借养勇为名，设立厘局，勒索商贩"[③]，督办河南军务的胜保，又自行派员在周家口（今周口）等商业城镇设局抽厘，"苛扰万状，商民弗堪"[④]。此种税款虽说主要取之于商民，但最后都落在一般民众特别是农民身上。除此之外，州县官府又以各种名义，或按田地、或按民户另外杂派银、钱或粮食。如咸丰末年，叶县知县以修城为由，随粮另征钱4.5万串；商丘知县以养勇为名，每年派征7万两，相当于全县田赋之1.5倍；上述的赵书升在抽厘之外，又勒逼盐税、盐规、游河集罚款和城工等捐，

① 《详查前署罗山知县周祐被参一案详稿》，河南省档案馆存档。

② 见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据云这些数字采自户部有关档册，但光绪、宣统年间，河南商货运销较五六十年代战争期间大大发展，而奏报全年所获厘金数大都不足10万两，罗玉东所列数字是否确切，有待查证。

③ 《重修信阳县志》卷十八，第15页，民国25年汉口洪兴印书馆铅印本。

④ 王诜桂：《王丹君诗文集》卷二，第32页。



"尽入私囊"。据地方人士记载，当时各县受命编练地方武装1 200—1 500名，"一县终岁之需几十万余，殆倍于正赋之额"[①]。与此同时，统治当局又强令大河以南各县，于四乡修筑堡寨，一县多至数十甚至上百所，农民除出工、兑料和分摊费用外，还要常年出钱、出粮豢养"寨勇"。

（四）差徭

如前所述，河南人民差徭负担之重，久已远过他省。19 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战争期间，军队调动、军饷和各种军需物资的运送更络绎于道，河南人民的差徭负担从而也成倍增加，即使封丘这样的"荒僻小邑"，仅1860 年就支应兵差（不计"流差"、"杂差"）69 次，农户常年所交差费较之正额田赋"数倍而不止"[②]。1855 年，河南学政张之万奏报，称各地通例是："官用者一，而吏蚀者百，而乡、保、里长各色人等得者不啻倍蓰……乡民无力支应，胥吏倡为借垫之说，事过则倍息取偿。"[③]"是以各乡民等一见差使到境，无不魂胆俱销，有情愿弃地而不得者。"[④]

除清朝封建统治者的经济盘剥外，其他人祸，尤其是各支清军和地方武装的残杀和劫掠带给河南人民的灾难也很沉重。19 世纪 60 年代中，一位豫东士子综述此前 10 多年间河南各支官军所到之处，"害民甚于贼，惨于贼"，搜抢财物自不消说，还"掠其妇女而污之，而鬻之，习以为固然也。（民）少拂其意，以为抗兵矣，截兵矣，聚而歼旃，犹以为未快也"[⑤]。这样，城乡人民在屡受官府盘剥后即使稍有剩余，最后仍被这些官军洗劫以去。对于所谓"贼匪"，这些官军更"戮及妇孺"[⑥]，大小"贼寨"，一经他们"克复"，那就会变成人间地狱。如 19 世纪 60 年代初沈丘、项城之间的西芦"贼巢"被清军攻陷后，寨内 2 000 余间房

① 李时灿：《中州文征续编》卷十一，第 10 页，1924 年开封经川图书馆刊。
② 《封丘县续志》卷十九，第 7 页，民国 26 年开封新豫印刷所刊本。
③ 张之万：《张文达公遗集》卷三，第 37 页。
④ 《封丘县续志》卷十九，第 2 页，民国 26 年开封新豫印刷所刊本。
⑤ 李时灿：《中州文征续编》卷十一，第 20 页，1924 年开封经川图书馆刊。
⑥ 王诜桂：《王丹君先生文集 · 寄李文园军机书》。

屋，"尽已毁为平地"，周围十八里的地面，也"大半化为灰烬"，"尸骸枕藉，马在人上行，惨不可言。（幼孩、女尸约以千计——原注）尤可恨者，凡有女尸，兵勇尽将阴户挖割，一丝不留……计十余里地面，绝无人迹。附近贼巢未被焚烧之户，辄称为'通匪之家'，任意株累。是以（民）不敢归来者十居八九"①。许多农民弃地外逃，致使土地大片抛荒，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的破坏，祸害是十分深广的。

在19世纪50年代初，河南农民就已发出这样的呼喊："吃没有吃，穿没有穿，日子过的难睁眼，死也是个死，不如拼上老命去随捻！"以后封建统治者又火上浇油，使更多的农民，包括有田产者"日子过的难睁眼"，"其不变为（捻）贼者几希矣"②。这就为捻军等农民起义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异常深广的社会基础。

二、皖豫捻军驰骋中原

1860年（咸丰十年）暮春，捻军刘天祥、王怀义等部三四万人由淮北进军豫东，军行神速，4月上旬就迂回至开封。受命督办河南军务的副都统胜保日夜在省城"流连声色"，与新任巡抚庆廉一道，龟缩在坚城之内，不敢拦截，待捻军转往兰仪、考城后，才虚报在城外25里的白酒店"剿贼"获胜③，而捻军却迅速掠过许州、禹州等地，进往汝州、郏县境。随后，复折返豫东。5月初，皖北捻军后队又取道太康，进至柘城，在马埠（马铺）歼灭清军川北镇总兵王凤祥、荆紫关副将王庆长等部。不久，两队捻军都汇集在皖豫边境，摆开随时再入河南的态势。胜保因此又连遭京官的参劾，说他在豫连遭败仗，军械损失殆尽，清廷也责其"畏葸无能，有负委任"，召其还京，改命庆廉督办河南军务。庆廉遂于7月亲至归德"督剿"，复上奏清廷，说河南马步兵勇合计不过一万数千人，实在无力阻挡数十万皖北捻军，为自己无力"灭贼"预留地步。

果不其然，8月下旬，刘玉渊、宋喜元等率捻军4万多人，又由亳州

① 中国史学会：《捻军》第5册，第185、18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② 饶新泉：《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九，第16页，江右双峰书屋刊本。
③ 李时灿：《中州文征续编》卷四，第29页，1924年开封经川图书馆刊。

挺进河南，驰骋于豫东和豫东南广大地区。9月20日，在汝阳城南野猪岗歼灭庆廉所派的总兵承惠等所统的8 000豫军精锐，击毙承惠等清将十余人。本来就比较孱弱的河南清军再经此败，“士马精锐略尽，全省嚣动”①。陈大喜等领导的汝宁捻军遂乘机崛起。



捻军在河南形势图

1861年(咸丰十一年)2月上旬，陈大喜在平舆，张凤林、彭玉升在正阳张家岗分别聚众起事。这一带历来是捻党、捻军的活跃地区，人民反抗斗争一直连绵不断，封建统治者的屠戮和盘剥也十分残酷。所以，陈大喜等义旗一举，附近县、乡人民纷起响应，短短的几个月内，新蔡、汝阳、正阳、罗山、遂平、确山、信阳、光山、息县、项城、沈丘、桐柏、泌阳、商城、固始等地的许多村寨，都高扬起捻军的白(陈大喜)、黄(张凤林)两色战旗，除了县城还大都被官府控制外，数百里地面内到处“贼寨林立”，就连豫南重镇信阳也“民变附逆，几无净土”②。参加者除广大农

① 缪荃孙:《续碑传集》卷十三,《毛昶熙传》。

② 《重修信阳县志》卷二十六,第31页,民国25年汉口洪兴印书馆铅印本。

民外，一些地主富人也因受不了封建统治者无止境的搜刮，或为形势所迫，“迎拜马首，屈膝贼庭”[1]。陈、张等与后期太平天国的顶天柱——英王陈玉成取得联系，用太平天国纪年，并遵太平天国制度，军民都蓄发不剃，按各户土地多少征收钱粮，事实上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居然一方政府”。这在长期习惯于流动作战的捻军斗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将河南捻军起义提高到一个新阶段。这个“政府”像一座大山一样横堵在南北通道之上，截断了清军的粮饷转运和文报交通，无论对豫皖两省的其他捻军或对长江中下游太平天国战场，都是有力的支援，因而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患在咽喉，祸延腹心”。为此，继任河南巡抚的严树森就亲至陈州，指挥豫军主力张曜等部极力“督剿”。攻战数月，陈大喜等坚守的捻寨屹然不动。

在这个时候，以张乐行为盟主，刘狗、苏天才、姜台凌、孙葵心、王怀义、宋喜元等为主要首领的豫东归德、陈州和皖北蒙、亳捻军声势依然很大，豫、皖、苏三省交界的数百里地面内，“无处非贼巢”，不时“装旗”（集队）出动进入豫境。在豫西南，桐柏、唐河、泌阳、邓县等地，捻军也时伏时起。在豫北，获嘉等地的联庄会众在李占标、姚天英、刘金山等领导下，也再次奋起，分建红、蓝、白三旗，新乡、辉县等地的原联庄会群众纷起响应，与进入豫北的山东长枪会武装联合行动，转战黄河以北各县，一度曾过河逼近省城开封。在此前后，宝丰、沈丘、项城、正阳、商丘的白莲教，也聚集徒众，蓄发、竖旗，起事抗清，一些苦于封建暴政的“乡里殷富之家”，也参加其中。力量最大的是1861年9月起事的商丘郜永清一支。郜三代为白莲教“离”卦教主，徒众遍布城乡，不少为捻军“堂主”。他们以金楼寨为基地，并与皖、豫捻军取得联系，四周民众归之者如市，拖住了河南团练大臣毛昶熙部兵勇，使张乐行各部捻军出入豫东更加便捷。至于其他规模较小，形式多样的地方性反抗斗争，也此伏彼起，如徐四万等起于项城，时纯一、杨方衡等起于新蔡，刘象功等起于唐县，或广据民寨，或围攻县城。加上太平军英王陈玉成等部，

---

① 《重修正阳县志》卷六，第56页，民国25年铅印本。



又从皖、鄂边境进窥河南，一时“环豫之贼，较往岁增10倍”[1]。而河南本省清军名义上有2万余人，“可用者不过十之三四”，有限的几个“宿将”和“后起敢战之士”如邱联恩、承惠等又相继被捻军击毙，因而镇压力量越发薄弱，“前不能遏截，后不及追蹑，贼踪所至，任其蹂躏”[2]。出现这样“兵力日单，贼势日众”的形势，正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

清廷于1860年6月特派顺天府丞毛昶熙为督办河南团练大臣，专责组建各县地主武装和修筑堡寨，接着又于12月挑选严树森代昏聩无能的庆廉为河南巡抚，以求扭转局面。因为严任湖北布政使多年，协助湖北巡抚胡林翼镇压农民起义军很有经验。严抵任后，“日夜筹划”，决心“改弦更张，力图振作”[3]。为此，他亲驻开封省城以“固根本”，分派毛昶熙和布政使郑元善等负责东（驻归德）、南（驻汝宁）和东南（驻陈州）各路守边事宜，进而更用心“选将练兵”。因为过去河南将帅均腐败成风，每月耗饷银7万余两，而“所养皆疲员冗卒”。军营之内，各种名目的“委员”数以百计，“类多歌呼饮博，以待奖叙，其保举之优、薪水之费，倍于他处。故凡游河南者，率视为牟荣利之捷径”[4]。至于兵卒，则大都虚冒，实有人数不过所报的1/3，而且常年欠饷不发，普遍是“老弱未能裁汰，伤亡未能募补，技艺未能教训”，“有鸠形鹄面，终月不得一饱者”，因此战斗力很差，“不能制贼而徒以扰民”[5]。所以严树森就一面裁汰旧有兵勇，一面调用湖北湘军将领，在湖南和河南本省另募新军8 000人。与此相配合，毛昶熙也以团练大臣身份督催黄河以南各府州县官绅加紧组建乡勇，赶筑堡寨。两三个月内，每县多者筑寨三四十座，少者十数座，乡勇多者四五千，少者数百。清廷对这些“改弦更张”的举措均一一照准，并再次加派兵部侍郎胜保“督办安徽河南剿

① 方宗诚：《柏堂集》续编，卷六，《书严中丞抚豫奏稿后》。
② 尹耕云：《豫军纪略》卷四，第9页。
③ 尹耕云：《豫军纪略》卷四，第9页。
④ 薛福成：《庸庵文外编》卷二，《治捻寇》。
⑤ 方宗诚：《柏堂集》；张之万：《张文达公遗集》卷三，第17页；《剿平捻匪方略》卷一四三，第10页；《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三，《复查吴昌寿、张曜参案析》。

匪事宜”，期望能由此“肃清”中原要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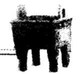
1861 年开春，捻军姜台凌、王怀义等部马步数万人，又由安徽亳州挺进豫东，负责豫东防务的毛昶熙无力阻截，捻军一路如入无人之境，迅速进入豫中，连攻长葛、襄城、叶县等城，转进豫西南，3 月中，破唐县，连围邓州、裕州和南阳府城。严树森的“楚军”还未成军，只好龟缩在开封省城。与此同时，陈大喜等豫东南捻军也不断出击，队伍发展至数万人，兵锋直达汝宁府城城关，声势日盛。严树森赶调豫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张曜部与布政使郑元善一起“会剿”，随后又亲至陈州（今淮阳）“督剿”。张、郑等凭借火器优势，经连月搏战，才攻下平舆外围的王、曹等寨，但平舆大寨始终屹然不动，并与正阳萧文信（据陡沟）部、许万钧（据萧王店）部和信阳厉麻院等部（据信阳东北各寨）互相联络，不断分兵攻取各寨，使严树森等无可奈何。随后，刘狗、宋喜元等部又于 8 月、11 月于皖北连续入豫，均于一个多月内纵横在豫东、豫中和豫东南、豫西南的三四十个州县，一度曾威胁开封省城。山东长枪会等农民武装，以及商丘金楼寨白莲教抗清武装，在豫北、豫东都成功地抗击了毛昶熙指挥的清军，开封亦曾为之震动。加上大河南北陆续揭竿而起的小部农民武装，全省“四境皆贼”，农民反封建的烈火越烧越旺。

于是，毛昶熙、胜保等以及在京的豫籍御史陈廷经、刘毓楠等交章参劾严树森，说他“坐拥重兵，株守汴梁，于省城以外郡县，听任发、捻各匪焚掠，一筹莫展，不敢出省城一步”，胜保甚至陈言河南军务败坏、贻误全局，“实属严树森一人之咎”[①]。1862 年 1 月（咸丰十一年十二月），清廷遂调严回鄂，改命郑元善为河南巡抚。同时又拨西安马队 1 000名赴河南“助剿”，命湘将李续焘等在湖南募勇 6 000 名来豫供郑元善调遣，并责成山西、陕西两省每月各解银 2 万两协济河南军饷。

从捻军方面说，虽然在河南清军将帅的奏报中业已被“剿灭”很多，但是官场“讳败为胜”的惯伎，“故贼中檄文有‘不畏大帅武略，但畏

---

① 王先谦：《东华续录》，同治朝，卷三，第 20 页。



大帅文案——一摇笔便杀我数十万'之嘲"[①]。多年来，捻军在河南始终往来自如，声势越来越大。不过，作为一支北方内陆省区的农民起义队伍，捻军也存在着不少弱点，而且长期未能克服。对此，项城一个地主士子经过多年考察后作出如下评述：(1)缺乏在政治上建基立业，以取代清王朝的远大目标；(2)不知攻据要地、重镇，"以为进战、退守之基"，又没有资粮储积，"朝不谋夕，难以持久"；(3)大小首领都是乡曲贫民，缺乏"枭雄过人之略"，又不留心"网罗英俊，以济所用"；(4)组织松懈，部伍、军律很不严整，人马虽然铺天盖地，但一半是老弱妇孺，有的牵牛，有的挑担，犹如"蝗蝻扑食，漫无纪律"；(5)缺乏统一指挥，"同行异股，同股异心，后被截杀，前亦不顾"；(6)装备极差，就是最精锐的马队，也大都仅有马棒而少兵器。马步统扯，有兵器者20人中不到一人[②]。除去用词上照例充满诬蔑成分外，所述大体是符合实际的。因而，尽管捻军声势很大，给封建统治者和城乡"日子主"以连续不断的打击，但只能在当时当地打乱旧的统治秩序，或如民谣所说，"闹得清家不得安"，却不能动摇、倾覆地主阶级的统治，无论在政治上、社会经济上(更不用说文化教育上)都没有多少建树，就是在军事上，也没有消灭掉敌人多少有生力量，与江南的太平军比较，差距是明显和巨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封建统治者的力量不断加强(包括军力和财力、物力)，镇压和作战经验的不断积累，捻军"起反"的悲剧结果是不可避免的。

---

① 宣统《项城县志》卷十六，第24页，民国3年石印本。

② 李时灿：《中州文征续编》卷十一，张安雅文，1924年开封经川图书馆刊。沈用增在其所作《棠溪文钞》中亦记豫捻"既无炮火之精，又乏弓矢之利"。

第四节 血沃中原

一、清军连续反扑

1861年（咸丰十一年）8月，咸丰帝在热河行宫病死，同治帝继位，经过11月发生的“辛酉政变”，清朝中枢政权落入西太后那拉氏手中。在这个精明的女人的主持下，清廷的内外政策都作了一些重大的调整，包括：(1)全力倚仗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的汉族军阀官僚集团——湘系、淮系镇压太平天国；(2)更用心取悦和勾结西方帝国主义，取得其军事援助，共同扑灭国内人民起义的烈火；(3)整肃封建纲纪，“明赏罚”，驱策各省区、各战场文武官员，在镇压各族人民起义上尽心尽职。通过这些调整，缓和了统治集团中的满汉矛盾、满洲贵族与外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加强了镇压人民起义的力量，迈出了所谓“同治中兴”的步子。1861年9月，屏障天京的安庆被湘军所攻占，太平天国首都直接处于敌人水陆的进攻之下。在黄淮流域，清廷也调集北方清军主力——号称“北方长城”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部和胜保等部，与皖、苏、豫等省的兵勇一起，加强对捻军的镇压。1862年（同治元年）8月，清廷特命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统辖河南、山东两省军务，提督、总兵以下各官均归其调遣。这个蒙古亲王既以“忠勇”也以“暴躁”闻名，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抗击英法联军的战斗中曾有较好的表现，所部又以马队为主，装备较好。他率部自皖北入豫后，对各地州县官吏固然视如“奴隶”，勒其供应军粮和各种物资，稍不如意，即饱以老拳，就是对毛昶熙这个三品大员，也因其久围金楼寨不克，摘除其花翎顶戴，“限五日破寨，过限则杀头”[①]。对巡抚郑元善，僧也劾其奏报不实、“办事迟钝”，致使郑在任不及一年，就被清廷视为“有负委任”，而被张之万所取代。张名为巡抚，实际只办僧军的后勤供应，“羽书一至，咄嗟

① 民国《禹县志》卷二十一，第56页，民国26年刊本。

立办”。清军在黄淮地区镇压捻军战场上事权和指挥权较前统一，力量也随之加强。由于捻军存在着前述诸种严重缺陷而又长期不能克服，豫、皖捻军、白莲教反清武装和进入河南的太平军虽互相呼应，但各自为战，从而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

最先被镇压的是商丘白莲教反清武装。

从1861年9月起，河南团练大臣毛昶熙、南阳镇总兵塔图纳等部就凭借炮火优势，围攻金楼大寨。全寨军民连月抗击，至11月，因孤立无援，大寨失守，郜永清牺牲。但余部在郜永清弟媳姚氏领导下，不久又据寨再起，而且数败清军。一直相持到1862年3月，僧格林沁部赶至金楼，悉锐进攻，激战至6月26日（五月三十日），清军在付出了重大伤亡后才突入寨内，包括姚氏在内全寨一千数百名战士、民众均遭残杀，全寨被夷为平地。持续奋战了9个多月的商丘白莲教反清斗争乃告失败。


清军统帅僧格林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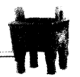
随后遭难的是豫东南和豫南捻军。

攻打陈大喜等领导的这部分捻军的，是郑元善、张曜等统率的河南本省兵勇，尤其是张曜部，被时人视为两支“北方能战之军”中之一支。然而，在“官（清）民相仇”的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豫东南、豫南捻军靠着民众的支持，虽时有小挫，弃守了平舆外围的一些寨堡，却始终斗志不衰，还不时主动出击，数败总兵穆正清等部，南至正阳、罗山、信阳，都成了捻军控制地区，以致地主士绅们感到“剿灭”无望，转向湖北请兵。1862年2月中，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等领导的西北远征军由安徽颍州挺进，在新蔡捻军杨方衡等部邀接下，围攻新蔡城。稍后，刘大老渊、苏天福等带领的捻军由亳州入豫，数万大军与清军毛昶熙、僧格林沁等部周旋于杞县、尉氏、睢州、柘城等地；张宗禹率领的皖北捻军又从豫东转攻至豫东南，更使清军将帅感到招架不易。只是因为太平军旨在西进，所以在围困新蔡月余，于

3月初连续击败清军张曜、尹嘉宾等部后，即于3月底撤围西进，风驰电掣般地经由确山、汝阳、镇平、内乡等地进往陕西；皖北捻军则重在来豫补充军实——所谓“志在掳掠”，依然如前几年那样快速流动于各地，4月上旬，由西平、舞阳、汝州转往豫西，5月上旬返回亳州。郑元善、张曜等于是就与鄂军一道，得以全力进攻豫东南捻军，4月间攻据了平舆外围的多数捻寨。7月上旬，郑元善所派湖北宜昌镇总兵李续焘新募的湘勇“威振”6营复赶至信阳，从中路进攻捻军，正阳陡沟、肖王店一带的许万钧、萧文信等部捻军寨堡相继沦入敌手。9月3日，陈大喜平舆大寨也被敌军包围。在不利的形势下，陈大喜等仍率众顽强抗击，激战至9月9日，平舆失守。陈大喜率部五六千人突围而出，转至汝宁，在陈寨重建大营，但无力扭转颓势。清军将帅乘机开展政治诱降活动，即所谓“易剿为抚”。因为捻寨中鱼龙混杂，地主士绅也“被胁”附从，这就给敌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南汝光道蒯贺荪用心物色“旧绅耆陷身贼中者”，“假以礼貌，晓以大义”，以他们为内应，成功地进行了策反。信阳境内的捻军先被清军“肃清”，连张凤林也变节降敌（后仍被杀）[①]，淮河以南均被清军所占有。张曜和新建的余际昌部湘勇在此期间，也陆续攻占了陈寨周围数十个捻寨，进而于12月24日攻破陈寨。陈大喜等虽率余众转据陡沟以西的萧王寨，但立足不易，遂转入湖北随州境。豫东南、豫南捻军基本上被镇压。

在陈大喜等捻军被围困时，皖北捻军也遭到从豫东转往的僧格林沁部以及从安徽、山东、江苏等省调集而至的清军的更大规模的进攻。经连月激战，捻军损失巨大，张乐行也被捕杀。1863年（同治二年）3月，捻军在张宗禹等带领下，被迫退出淮北，转入河南活动。始终坚持反清斗争的陈大喜率余部与皖北捻军联合在一起，穿插于豫东南和豫鄂边境州县，相机剿敌，声势复振。5月26日，在息县方寨设伏重创余际昌部，杀余及属下官弁三四十名。随后，乘僧格林沁等部调往山东之

① 《重修信阳县志》卷二十六，第31页，民国25年汉口洪兴印书馆铅印本；《信阳县志采访稿·蒯贺荪传》（未刊稿）。



机，从豫南取道颍州，复回亳州雉河集老基地。

但这时的雉河集地区经清军的大屠杀、大破坏后，已今非昔比，加上僧格林沁又遵清廷谕令迅速南返，张宗禹等遂于 1863 年 9 月再次取道豫东转入河南。僧格林沁等紧追不舍。捻军疾走太康、西华、郾城等地，于许州境分作两路：张宗禹部围禹州，未克，转入登封大金店一带山地，与清军张曜等部相持；程二老砍部进襄城，转战豫西南，于 9 月转往湖北枣阳、随州境。随后，张宗禹等弃大金店，转进豫西南，打算入陕与西征太平军会合抗清，但被张曜、僧格林沁等部拖住，只好退入南召李青店一带，依托山地与清军周旋。在此期间，汝宁、光州捻军乘张曜等调走之机，曾一度重新崛起，陈大喜亦率余部入据正阳小王寨，但到次年初，仍被清军扑灭。就整个河南战场来说，捻军已转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在此期间，进入陕西的太平军曾在 1862 年 5 月末折返豫西，以求挽回安徽战场的不利态势。6 月 14 日，在新安铁门设伏，歼灭豫军主力之一的杨飞熊部，旋即向豫西南急进。清廷赶调守卫开封的副将杨长春部、当时还在汝宁围攻陈大喜的张曜部以及已入皖北的胜保等部，赴豫西堵截。太平军避实击虚，南下活动于汝河北岸。7 月 27 日，在桐柏平氏镇与由皖北、新蔡转战而来的太平军、捻军会师。原先在栾川一带山地与清军相持的张宗禹部捻军也闻讯出山，赶来会合，汇聚成一支近 10 万人马的大军，一边围攻南阳城，一边搜集军实。10 多天后，取道内乡、淅川等地，进入湖北。不久就获得安徽战场失利、英王陈玉成就义的噩耗，陈得才等乃于初冬重经豫西南再入陕西，以求“招足人马”，“解救(天)京围”。到 1864 年(同治三年)初春，陈得才等在汉中一带得知天京在湘军猛攻下，形势险恶，就决定再次东旋。全军分作三路，日夜兼程前进，计划到河南会齐，并联合河南境内的捻军，共同驰救天京。3 月 17 日，其前锋部队进抵淅川西坪。上年即撤入南召山区的张宗禹等部捻军闻讯，分别北上或西向接应。清军僧格林沁、张曜等部虽拼命拦截，最后仍不能阻挡捻军与太平军于 4 月下旬先后在内乡和淅川会师，形成一支十数万人的大军，转战于豫鄂边境数百里地面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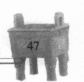
清廷大为震动，严令河南、湖北、安徽各部清军全力堵截，使太平军、捻军东进不易，一时很难及时赶至江南。7月19日，天京终于被湘军攻陷，天王洪秀全也在几日前殉国。清军将帅于是凶焰大张，太平军和捻军则士气顿衰，一些将领竟反水投敌。在四面扑来的清军的袭击下，太平军、捻军在湖北、安徽各地被各个击破，陈得才愤而自杀。封建统治者为“荡平粤匪”而弹冠相庆，全国革命形势则趋向低潮。

二、新捻军的奋战和失败

然而，久受清王朝封建暴政蹂躏的黄淮人民并没有就此屈服，久经战火磨炼的太平军和捻军战士并没有就此停止战斗。遵王赖文光和淮王邱远才领导下的太平军，张宗禹、任化邦和陈大喜领导下的捻军，很快又在豫鄂边境汇聚起一支三万人的农民反帝、反封建大军——新捻军，“以期复国（重建太平天国）于指日”[①]。他们总结了此前长期作战的经验教训，根据自身装备和北方地形特点，确定“易步（兵）为骑（兵）”，增强机动性和战斗力。于是，以这支新捻军为核心的新的一轮反清战争，又在华北大地继续开展。

1864年秋冬，在豫鄂边境各府县活动的新捻军巧妙地与清军僧格林沁、宋庆等部周旋，众多农民和捻军老战士携马投军，实力大增。在赖文光等指挥下，捻军先后于罗山九里关、萧家河等地激战获胜，击毙敌将总兵苏克金、都统舒通额等多人，接着又在光山柳林寨设伏，大败清军，杀信阳协副将巴扬阿等。12月13日，由湖北襄阳入攻邓州，于唐坡围歼僧格林沁自带的清军。僧总算留得活命，仅带数十骑逃入邓州城，上奏自请处分。河南巡抚张之万赶忙亲至舞阳，令河、汝、陕各县地主团练坚壁清野，防捻军北进。次年1月中，捻军在鲁山殷店北击败豫军主力张曜部，月末，再败僧格林沁部，杀其都统苏伦保、翼长恒龄等，僧本人靠骁将陈国瑞力救，又一次逃得活命。捻军连获大胜，士气更振。在赖文光、张宗禹、任化邦等指挥下，全军娴熟地运用盘旋打圈的成功战术，取道叶县、襄城、禹州、新郑、尉氏等地，南下鄢陵，再一次

① 《赖文光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58—559页，中华书局，1979。



击败尾追而至的僧格林沁部。随后又迅速南下，3 月 12 日，攻信阳城。及至清军兜集而至，捻军又掉头北上，经确山、遂平等县境，围攻扶沟，未克，于 3 月末取道兰仪、考城进向山东曹州。这样，捻军用两个来月的时间，盘旋几千里，将僧格林沁军拖得精疲力尽，终于在 5 月 7 日在菏泽高楼寨全歼了这支华北清军主力，僧亦被击毙。

捻军歼灭了僧军，等于收走了满洲贵族的老本，清廷只好借重汉族军阀官僚集团——湘系的头子曾国藩，以曾为钦差大臣，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三省军队和文武各官均归其节制。曾吸取了僧格林沁等多年“剿捻”失败的教训，精心设计了新的作战方略，“变尾追之局为拦头之师”，在河南周家口、山东济宁、安徽临淮、江苏徐州分设四镇，各驻重兵，期望“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①。为此，他将主力刘铭传部淮军调驻周家口，重点负责西南路防线；进一步实行寨堡政策，动员广大农村的地主士绅加筑坚寨，大县多至二百余所，小县亦过一百所，借以把农民圈住，使捻军得不到兵员和粮食补充。

7 月下旬、8 月上旬，已由山东转战至皖北的捻军，乘各路清军调防、豫边守御力量薄弱之机，分别在张宗禹、赖文光的统率下，先后取道豫东、豫东南，大举向河南挺进。这时的捻军，在全歼了僧格林沁部后，“如虎生翼”，不仅军威大增，而且人马扩充至五六万，且以骑兵为主，还配有从敌人处缴获来的火器（包括少量洋枪）；经过整编之后，加强了集中领导，即使分兵活动时，也基本上分成两大支（张、赖各领其一）应敌，不像过去捻军各“股”分散行动，这就使得其攻击力量大大提高。张宗禹一军入豫后，很快就突破了张曜、蒋希夷等部河南兵勇的拦截，半个来月就穿越商丘、睢州、扶沟、西华、临颍等十来个州县；赖文光一军也很快经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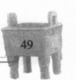
赖文光的战刀

① 曾国藩：《钦奉谕旨复陈折》，《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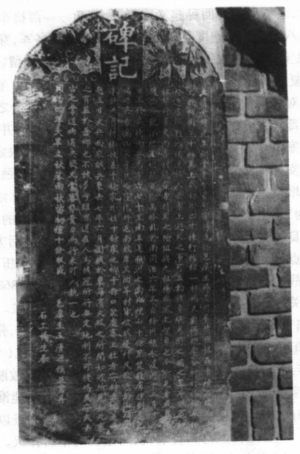
沈丘、淮宁、临颍、许州进向舞阳。而这时河南本省清兵，因所有马队均已被僧格林沁带走而全部覆没，故只剩步队1万人左右，加上吴昌寿赴任时带来的新募楚勇2 300来人，老本已很有限；装备不全，战斗力更加孱弱。以这样的“疲师羸卒”守备辽阔的中原，“备左则右虚，备右则左虚”，“屯扎一隅犹不足以制其出入，又安能无处不防，无处不固”①。新任巡抚吴昌寿对这一切虽然也了然于心，但身为巡抚，仍不得不赶至许州，调集军队在郾城、舞阳之间，说是防止两支捻军会合。中旬，曾国藩复调刘铭传部驰返周家口合击。张、赖为分敌势，分向西南、东南两路各进，分别于8月下旬进至唐县、邓州和上蔡、汝阳境。曾国藩急调刘铭传部联同豫军、皖军重点包围赖文光部。赖部在豫东南与敌盘旋了一个多月，于10月中旬取道睢州、考城再入山东，在鲁西南和苏北打了个圈，补充了粮食和兵员，又由归德、陈州边境直趋鄢陵。张宗禹部在南阳各县抗击豫军主力张曜、宋庆等部，转战月余后，于10月下旬取道宝丰、郏县，走禹州、密县境，11月底与赖文光部在扶沟会合。随后，张、赖又分道而行：赖部自临颍、郾城进豫南，张部自襄城、叶县走豫西南，随后均进向鄂北。捻军连续数月在中原大地穿梭往来，业已证明曾国藩“重点设防”、“静以制动”方略的破产。

于是，曾国藩转而提出“聚兵防河”的方略：在黄河、运河沿线重兵防守；河南境内则设沙河、贾鲁河防线，分段由曾国藩和河南、安徽两省兵勇专责防守。因为捻军已于1866年六七月间进入豫东南和豫南，曾国藩企求先把捻军圈死在这个防线之内，然后用湘、淮精锐合组而成的“游击之师”聚而歼之。但不等清军部署就绪，赖、张两支捻军就在8月上旬分途转进豫西南。9月21日，两军复于禹州、许州一带会合在一起，迅即经尉氏、中牟北趋，24日，在夜色掩护下，一举冲过开封城外10余里的芦花岗河防堤墙，又马不停蹄地进往山东，使曾国藩的“河防”方略又成为画饼。这个因镇压太平天国而“负天下重望”的一等

① 尹耕云：《豫军纪略》卷十一。



侯，在为时将近一年半的“剿捻”战争中“毫无成效”[①]，使清廷深感失望，于是就在这一年的11月26日改命淮系魁首李鸿章代曾国藩为钦差大臣。



修武捻军过境碑

捻军在太平天国覆亡后持续奋战两年余，虽然取得一连串胜利，但

① 朱学勤：《剿平捻匪方略》卷二六一，第30页，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7辑。

仍有“独立难支，孤军难立”[①]之忧。为了开拓更加宏阔的局面，赖文光、张宗禹等于10月中由山东曹州再入河南，在扶沟分兵为二：赖文光、任化邦等继续留在黄淮流域，力挽危局——东捻军；张宗禹、邱远才等远征陕甘，联络那里的回民起义军，以为犄角——西捻军。随后，西捻军以每日八九十里的速度，甩掉后追、旁攻的湘淮各军，穿越豫西，于11月初由灵宝、阌乡长驱入陕；东捻军则取道中牟、陈留、考城入鲁。12月上旬，复折回豫东，南向渡过沙河、淮河，转往湖北。新任钦差大臣李鸿章面对这种情况，决定将各部十来万众分为“堵击之师”（驻信阳的李昭庆部淮军6 000余即其中之一）和“兜击之师”，并亲来归德，随后又至周家口坐镇指挥。经与河南巡抚李鹤年会商，决定张曜和宋庆所统的两支豫军添募马、步万余人，使河南也有两支“劲旅”——嵩武军、毅军，增强“兜击”力量。因为李鸿章吸取了僧格林沁和曾国藩的教训，作为“堵击”和“兜击”主力的淮军都是悉听号令的旧部，又有当时最为精良的洋枪、洋炮等装备，所以就能抓住捻军无后方作战和孤立无援的弱点，于1867年（同治六年）冬在山东和苏北镇压了东捻军。正在陕北鏖战的西捻军为了驰救东捻军，火速东援，于1868年1月3日越过邵源关进入济源境，10多天即横过豫北，进入直隶。但为时已晚，全军已陷于各路清军的四面堵击之下。为了摆脱困境，张宗禹等于3月下旬由直隶成安南渡漳河，经滑县、新乡等地，在清化（今博爱）略事休整，把步兵全部改为骑兵，继续奋战。先后在封丘大败湘军刘松山部和皖军郭宝昌部，击毙其记名提督周盈瑞；在滑县，击毙淮军提督陈振邦等；于阳武，击毙总兵何明顺等。但终因敌强我弱，难以在河南立足，复于4月13日由长垣再入直隶，秋间也被清军所扑灭。以此为标志，延续了一二十年的农民战争宣告结束，清王朝实现了所谓“同治中兴”。

① 《赖文光自述》，载《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

第三十五章
19 世纪末叶的社会经济与人民斗争

第一节 “吏治日偷”

一、战乱的影响

10 多年的战事，给河南带来的第一个严重后果是，田地荒芜，民生凋敝。人们在辽阔的中原所见到的是一片户口耗减、土地荒芜、生产破坏的萧索景象。拿豫东来说，前已提及，还在 19 世纪 50 年代后期，方圆数百里的地面内，就已村落为墟，人烟稀少，以后十来年破坏更加严重。像陈州府属项城、沈丘等县，许多地方“村落皆墟，四望草莽，兽蹄鸟迹索户外，数百村之家，存者十一而已”；这有限的“遗民”，“类皆鹄形鸠面，悬鹑百结，挑挖野菜草根，杂以糠秕为食，尚且一日不获两餐，形容憔悴欲倒”。豫西南南阳府境，也“残破如陈（州）”①。在豫南信阳一带，许多乡村也是“流离转徙，十室九空，蓬蒿没人，骸骼枕藉”；受祸较轻之地，亦因“乡民逃亡他乡，流离转徙，瘟疫伤寒，死亡过半”②。省内其他府县破坏程度虽稍轻，但也多满目疮痍。

① 《项城袁氏家集・文诚公集・函牍》卷一，第 10 页；杨凌阁：《钝庵先生遗集》卷九，第 23 页。

② 《重修信阳县志》卷六《寨堡》，第 12 页，民国 25 年汉口洪兴印书馆铅印本。

第二个严重后果是，旧的土地占有关系的变乱和转移。一些农户（包括地主）或全家死绝，或在战乱、流徙中失掉地契，四野阡陌、经界也多消失，而河南又与他省不同，州县衙门仅有征收钱粮的粮册，而反映地权归属的鱼鳞册却久已无存。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只能随处复垦荒废的土地，由此造成地权的错乱。像夏邑贡生彭恩泽，算是地方缙绅，经多年“转徙迁越”，“旧时田业，荒乱后多见侵夺”①。毫无权势的农民，丧失原有田产的自然为数更多。有些农民虽然保有旧时地产，亦因“田地荒芜，糊口无资，耕种无具，典质无物，告贷无门”，只好将其祖业以“每亩数百文”（不过往时地价的1/10）脱售②。与此同时，封建官府和地主豪绅又实行反攻倒算，手段之一就是查抄所谓“叛产”——曾经参与反清斗争的民户的产业。如在正阳南周庄，“有涉匪嫌者，尽收（其）宅、地拍卖之”，一些有财有势者就乘机“买为己有”③。新蔡反清志士杨方衡曾为本地捻军领袖，接应太平军入境，此时即因其“从发逆”，所有土地都被没收改作祭田。因为河南在以往10多年中“从逆”者人数众多，因此被剥夺的地权也不在少数，有些村寨，甚至全部民户的田产都遭此劫（因过去曾是“捻寨”）。在此重新分配地权的过程中，一些农民固然可以通过垦辟无主荒地而获得其中的小部分，但大部分必然落入有钱有势的地主富人之手（一些转充祭田、学田的“公产”，实际上亦由此辈把持），一般尚在卖地求活的农民是无法染指的。

第三个严重后果是，农村地主豪绅势力的膨胀。因为在农民大起义期间，清王朝为了控制和镇压各乡农民，广泛动员和依靠地主士绅举办团练、编练乡勇和建造寨堡，让他们充当团练首和寨主，许多地主和士子都走上镇压农民的第一线，其中不少人且因军功获得相当的职衔或官职，有些且被擢任为州县正印官。战乱过后，随着清王朝政权重新获得巩固，州县官府也获得了旧日的统治权威，但地方豪绅势力因坐大

① 《夏邑县志》卷六，第92页，民国9年亳县福华石印本。

② 《项城袁氏家集·文诚公集·函牍》卷一，第10页。

③ 《正阳县志》卷四，第32页，民国25年铅印本。



已久,官府仍不能不对他们倚任有加。民国《正阳县志·民政》篇中追述县境情况说:咸、同人民大起义期间,“县政失驭”,“各筑寨自卫,与官府关系无形中断”,也就是全由寨主、团练首宰制人民;“同治中兴以后,大乱初平,官民相与,骤难惬洽”。官与绅争夺统治权,以互相迁就来解决:官府“汲引士绅——在城则下交(城关团练首)袁报来、王均礼等,筹商要政;在乡则分店择贤,协助政治,名曰‘首事’。是为官治开明、民治萌芽时代”。文中所谓“民治”,自然是牵强附会之词,实际上是绅权侵越官权,改变了传统的完全“官治”局面。这在其他许多州县均有一定的代表性。全省从总体上说,城乡封建势力虽在农民大起义期间,因捻军等农民武装杀逐了不少地主豪绅而受到不小的冲击,但却因上述机缘而恶性膨胀,河南农民所受的封建压迫较以前更为沉重。

第四个严重后果是,对传统教育文化事业的损害。在这场农民与地主阶级的大搏斗中,各级封建统治者集中其全部精力、人力和财力,镇压“起反”的农民,教育文化事业被搁置一边;就连农村“义学”,也都完全停废;灵宝到同治中,“城内不闻书声,乡间迄少学塾”。大河南北其他州县,情况大同小异,进一步扩大了河南在文化教育上与其他许多省份的差距。另一方面,连续10多年的农民“起反闹大乱”,也冲击了封建统治秩序,削弱了封建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对人民的羁绊。地方人士和州县官吏在记述了上述现象的同时,又忐忑不安地提到,“少诗书之气,即易起凌竞之心,浸假而礼让衰,讼狱繁,醇者日漓,朴者日侈”,“上失其教,民不兴行,风俗淫靡,趋利好讼,甚至父子、兄弟不相顾,非世风之大变乎”[1]。自然,“世风”之所以“大变”,与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变化也有密切的关系,但10余年农民起义的洗礼和传统教育文化的衰落,确使封建统治者借以捆缚城乡人民的精神绳索日渐松脆,使封建统治者深感不安和忧虑。因此各级封建统治者就努力重振儒学,恢复城乡的书院、社学、义塾,使此前10多年被严重削弱的封建教

① 同治《叶县志·风俗》,第98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光绪《灵宝县志》卷七,第22页。

育文化逐步恢复，以此作为“同治中兴”的一项内容。尽管如此，较之嘉庆、道光时期毕竟大为不如。加上其他诸种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因素的影响，此种衰颓的局面终清之世迄未改观。郾城人士记述光绪后期地方情况时说，“周历四邑，不闻有弦诵声”①，虽然言过其实，但传统的教育文化毕竟明显衰落。

二、封建统治愈益腐败

太平天国、捻军大起义失败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统治者一方面多方促进所谓“中外和好”，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

从内政方面说，河南从省——府——州、县——乡村保里，都弊端日积，愈过益甚。这在州县一级表现得十分明显。以往，州县官员主要是以所谓“正途”出身者，即经由科举考试得中进士（少数符合特殊条件的举人、贡生）的人充任，10多年的战争期间，由于大办捐纳，许多地主商人只要交银一千数百两，就可买得实缺知县（此辈统称“捐班”）；各支清军和地主武装中，又有一批人因有或真或假的“战功”，获得相应的品秩而授职（此辈统称之为“军功”）。三条途径汇聚在一起，遂使等待知县、知州实缺的候补官员队伍逐年增大。因为僧多粥少，于是官场“奔竞成风，廉耻道塞，一缺出，而谋干者数十员，一局开，而求差者百余辈。未得则汲汲经营，既得则孜孜为利”②。在激烈的“猎官”争夺中，“捐班”和“军功”人员“类饰车服，捷趋对，希大府欢；其中进士出身，大府辄慢为‘书生’，乃至以无用相谑，无推毂者，十年或终世不补一官”③。结果就如光绪初年一个御史所说，“胸无学术，且忝高官，目不识丁，亦膺社寄。其巧者逢迎奔走，粉饰相工，其拙者，谬妄昏庸，颠危迭见。至其假手胥吏，百弊丛生，叩其图治之方，甚或茫无以应”。“至有仳隶皂胥，合数人以捐，一人得缺后，余为手足，俟获重利，次第

---

① 《郾城县记》卷三十，第7页，民国23年刊本。

②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总第1336页，中华书局，1958。

③ 《考城县志》卷十二，民国13年铅印本。



报捐。如此荒唐,至堪痛恨!"[1]

例如,光绪初年任新安县令的邹蕚棠,"初到任,访知民间富户。遇乡里有争讼者,即罗致案内而拘囚之,不满欲,不释也。民由是多犯法且破产矣。光绪三年(1877年),又宰斯邑。春大荒,发仓赈饥。夏秋不雨,无麦无禾,鸠面鹄形者性命且在旦夕,蕚棠迫令纳谷还仓。逮系敲比,殃及邻里。新(安)民坐是流离死亡,十损六七,地荒人稀矣"[2]。

作为这种腐朽县政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所谓"胥吏政治"。

如前所揭,州县官员都是"假手胥吏"行使职权、体现封建政治的。这些胥吏,包括"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亦有分设至13房者)房书及其爪牙(与房书有师徒名分的书吏),还有"快、壮、皂、捕"四班衙役,每部分头、二两班,合称"四部八班"(亦有多至12班者)。按照定制,每房书吏限定10人,各班衙役不得超过50人。而到同、光时期,一般州县光登记在册的正式衙役膨胀到数千人。这些衙役"形同鬼魅,日与鸦片相周旋,贪比凶狠,时以敲诈为生计……承缉要犯,则累月经年而十无一获;传集词证,则东推西诿而案终不齐……每出一案,同往者率10余人,烟酒饭食,种种需索,票费、脚费,名目尤多。或甘言诱骗,百计招摇,或非法诈讹,视同鱼肉,非使被讼之家倾家荡产,终不足以快其心。其有被盗供扳,或挟仇指控者,则拏逮拷掠,私押班房,更是无所不至。如词讼中有待质妇女,则由该总役看管于其家中,其中隐情,益复不堪闻问"[3]。

除州县衙门的"百万虎狼"之外,河南人民还备受乡村诸种基层人员鱼肉之苦。像上蔡县境,以往每"里"设保正1名,每年除借公需索外,还按户收钱一次,名曰"告助",算是"工食",总数在七八十串上下。晚清时,光是"告助",每年麦、秋两季均添索小麦和秋粮,甚至一年"告

---

①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总第26—27页,中华书局,1958。
② 《新安县志》卷四,第36页,民国28年同文印刷所石印本。
③ 《河南官报》第295期,《唐县县令钱祥保禀》。

助”多次，保正亦由1人增至数人，“有利任意勒索”①。淮阳旧制每里设柜书1人，后添加司账、催征各1人，至晚清时，三者均增至十来人，“皆借浮收以资赡养，且有加无已。屡控屡禁，勒索益甚”②。因此，河南就有“册书想一想，银子几十两”等旧谚，正是此辈借公肥私的历史概括。这样，在各州县衙门的“百万虎狼”之外，人民又要备受里保的鱼肉，封建统治之黑暗、人民苦难之深重是可想而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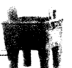
第二节 “民生日蹙”

一、土地和人口

晚清时期河南之所以“民生日蹙”，固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封建统治极端腐败造成的，但更直接的原因还是社会经济日趋凋敝的缘故。

作为农业社会，基本生产资料就是土地，它不仅代表户主的财产，也关系着户主的社会地位，因此，“贪买地”就成为各阶层共同的经济取向，促使地价日昂，土地垦辟也渐多，土地利用较充分。1865年河南巡抚吴昌寿在奏报豫西山区情况时，说到“因生齿日繁，山田日辟，淆、函、渑、陕古人一夫当关之地，皆已犁为田畴，耕牛孺子，可以上下”③，平原或丘陵地带，垦辟程度自然更高。但另一方面，如前所述，由于长期战乱、黄河泛滥和其他各种自然灾害，又使得许多耕地由熟变荒。（也有河水新淤而成的土地，但为数有限）只因当时缺乏认真的土地丈量和陈报制度（有之亦徒有其名），所以全省耕地总面积无法确指。据官方记录，全省耕地面积在19世纪40—70年代均为478.7万公顷，1887年因黄河溃决减为477.3万公顷；另有记载，1873年为456.7万公

① 《河南官报》，宣统二年第57期。
② 《淮阳县志》卷三，第8页，民国23年铅印本。
③ 尹耕云：《豫军纪略》卷十一。



顷,1893年近648.7万公顷①。但这些数字均与实有耕地面积差距不小。参以民国时期统计的746.7万公顷上下,估计晚清时期全省耕地当不下800万公顷。其中绝大部分为旱地,水地不到10%。

这800多万公顷土地全靠人力、畜力耕作。因此人口的多少,就成为影响农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一环。那么晚清时期河南到底有多少人口?这个问题与土地问题一样,官方虽然几乎年年有记录,但同样极不确切。因为除官方统计数字外,再无其他全省性的人口统计数字,所以我们只好利用道光十年以前相对有参考价值的数字来进行估测。据载,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至道光十年,全省人口共增加276万人,年均增长率为0.28%。以乾隆五十一年的2 090万人为基数,照此增长率测算,54年后,即1840年,全省人口当有2 434万人;到1853年,即全省性的战乱发生前,当有2 525万人。这是河南进入近代之时全省人口约数,也是长期战争前人口高峰期的约数。

接着而来的连续10多年的"大乱",继之又发生光绪初年"千百年未有之奇灾",全省人口又大为耗减。据载,全国人口由1849年的41 298万人减为1875年的32 265万人,减少了25%左右。河南在此期间,破坏程度远不及苏、浙、皖和陕、甘等省,但较其余多数省区为重。如扶沟,到1891年人口还只及1829年的82%;禹县,至1904年人口还只有1831年的86%。因此,不妨折中以10%的耗减率估算,拿1853年的2 525万人为基数,则在19世纪60年代末全省人口当在2 270万上下。光绪初大灾,人口再次锐减。1878年较上年减少了180多万人。到宣统年间,在"预备立宪"期间,河南各县也对户口作了粗略的调查,据报在清朝覆亡时,全省人口约2 611万人。

根据以上考索,晚清时期河南人均土地5亩左右,多于南北多数省区。凭此进行的农业生产是全省国民经济的基础,也制约着政治和社会生活。具体情况分述如下。

---

①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380—38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60页,三联书店,1958。

二、地权和租佃

（一）地权分配

这120多万顷土地，在当时河南两个基本阶级——地主和农民中是如何分配的？这个问题，因材料欠缺，难得其详。从一些片段性的记载来看，在清朝前期，虽经明末农民战争的扫荡，河南地主阶级很快就卷土重来，霸占了各州县大部分土地，滋生了一批广有田产的大地主。据近人研究，在乾嘉之世，全国大约70%的土地被地主阶级所占有。河南地权集中程度即使不及江苏等省，但加上占地一万亩以下以至百十亩的中小地主，估计地主阶级占地的份额也不会低于总面积的60%—70%。但进入近代后，地权集中程度较前期有所降低。具体情况，可大体勾勒如下：

豫南、豫东和豫西、豫西南部分州县地权相当集中。如正阳，咸、同时人记称，"富者沃壤连阡，财币山积，贫者至无立锥之地，丰年啼饥"[①]，固始在光绪末，土地"绅富占者十七八，民间已业自种者不过二三"[②]。豫西洛宁山区大地主广占山地，不按"亩"而按"段"收租，其中张、乔、商、马、雷诸家或"挂千顷牌"，或有地数十、数百顷。其他如宝丰杨姓地主，也"挂千顷牌"；南阳玄妙观，地产七八百顷；在豫东，考城首富吴家，田产七八百顷。这些事例在该地区当有一定的代表性，地权固然未必都是"十居八九"归地主阶级，但至少60%上下在他们手中。

但包括上述地区在内的其他许多州县，地权看来比较分散。就是在信阳，据嘉庆中地方官府报告，全州地丁银之2/3出于纳赋银1钱（丰年可收谷10石）以上的业户，其余的1/3以上土地为少地农民所占耕[③]。在此2/3中，除去为数不少的中农，地主所占约不会超过1/3。此后数十年即使有所变化，估计地主占额也不会太大。在以"多富室"著称的淮阳，据1911年知县禀报，称县境钱粮主要出自"粮银不过数钱

---

① 李时灿：《中州文征续编》卷十八，1924年开封经川图书馆刊。
② 《河南官报》，第175期。
③ 《重修信阳县志》卷八，民国25年汉口洪兴印书馆铅印本。



或数分、数厘"(占地数亩、十数亩)的小户[1]。地权较集中的商丘,清末民初,地主加上富农占地也不过40%左右[2]。

因为缺乏全省性的统计数字,故只能作上述的窥测。看来各地很不平衡,地主占地有高达七八成者,亦有五六成及不到三成者。高低通扯,姑定50%左右为地主阶级所占有,也许是比较接近实际的。无论如何,地主阶级占地不会超过60%—70%,较之乾嘉之世减少了10—20个百分点。

从这里,透露出地主阶级在近代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趋向没落的消息——如果他们一味"守成"而不思变通的话。其所以致此,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前面述及的长达10余年的农民战争的扫荡,使一些地主"遭乱中落";清朝封建统治者赋税、捐输和差徭的空前严重,一般无权势可凭的地主地租所入"(十)去其五六",有些走向没落。另一方面,由于受资本主义新潮的侵蚀,地主阶级中的"奢风"(包括吸食鸦片)也日甚一日,使一些守旧地主日渐陷于入不敷出的窘境。加以传统的封建宗法制度在此种新潮的冲击下日渐松解,多世同堂(共财)的"美俗"被"析居分爨"所代替(大户析为中、小户后还可减少差徭负担),遂使诸子均分财产的传统旧制,进一步发挥其分解封建地产的作用,一些旧地主经子孙多次、多家析产,分解成富农以至中、贫农。尽管在此过程中也存在着逆向运动——不少地主仍在不断兼并土地(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没落地主的土地),在农民(包括富农)、商人中又发展起一批新地主。因为有这些后续力量,遂使晚清时期地主阶级在地权分配中仍能保持50%左右的份额,但毕竟没有其先代多。

(二)地租和高利贷

地主阶级占有这一半左右的土地,一如既往地用以下两种传统方式经营:按封建租佃形式让农民佃种,这是主要的;自家雇工耕作,这是次要的。两种形式在全省各县、乡普遍存在,惟豫北地区雇工经营较为

① 《淮阳县志》卷四十,民国23年铅印本。

② 商丘县志编纂委员会:《商丘县志》,第104页,三联书店,1991。

流行。其具体剥削方式、剥削率因地因户而大同小异，选择的自由自然全属于地主。

租给农民佃种的部分，因其地租榨取方式不同，可分作以下三类：

1.“课地”（“课种”），征取定额地租——绝大多数是实物地租，极少数是货币地租。地主光租出土地，其余各种生产要素均由佃农自筹，不论丰歉，均按议定的粮食（或银钱）数量交纳地租。有麦、秋两季均交的，交租量一般相当于该块土地年产量的50%；亦有光交小麦而不交秋粮的，其所交麦租约占所产小麦之60%—70%。大地主或城居地主大都采用这种方式，承租者大都是人力、畜物和其他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民。

2.“分种”（“平种”），业佃双方按议定的比例分取土地收获物（包括秸秆）。具体办法，因不同县份、不同土地和业、佃双方的不同情况而有所差异。一般是地主仅供土地（或兼供农舍），其他一切全由佃农自备者，双方“所获皆均（分）之”，业主出种子者，“佃得十之四”；业主复提供车、牛和草料者，“佃得十之三”[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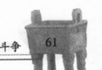
3.“拉鞭”（“小佃”、“把牛”），是一种帮工分益制。地主自家经营土地，而向佃种农民提供房舍，佃农仅带赶牲口的鞭子或简单农具，种子、牲口、肥料和大件农具均由地主自备。收获后，佃农仅得麦季的2/10、秋粮的3/10。有些地方、地块，佃农仅得全年收获的1/10。

用定额租制剥削农民者，还常在租佃关系成立时，先由佃农向地主交付押租——“顶首”、“佃礼钱”，佃农不能按时交租者，即以此押租顶充；或先交“顶课”——预租，即提前交付一年的全部或一半地租。

用分成租制剥削农民者，均附有力役地租。佃农须随时应地主召唤，用自家人、畜，无偿地为地主（“田主人”）服劳役，诸如赶车、挑水、拉土，以及平时或“红白喜事”期间的各种家务劳动，还要为地主护院、守夜。分成租的租粮数额，则有“死课”、“活课”之分。前者在庄稼收割前，双方估定产量，尔后由佃农按规定的成数送交地主；后者则在收割完毕后，双方“临田照（规定成数）分”。

---

① 宣统《项城县志》卷五，第47—48页，民国3年石印本；光绪《鹿邑县志》所记同。



就封建地租的剥削量——地租率来说，以定额租制为主的省份，其地租率一般均为50%。河南亦然。但河南的“均分”系麦、秋两季（有不收秋粮而单收小麦者，那就不是50%，而是60%上下），与南方佃农之只交水稻之50%而秋季不再交租的通则比较，又显得分外沉重（豫南稻作区一般也同南方）。至于河南最为盛行的分成租制，其剥削率那就更高，不算力役地租，光地面收获物就有70%以上归地主所有。又因为常年“分成”，使佃农常年粗放耕作，不愿投入较多的肥料和劳力，以免为人作嫁。加以地主凭其“田主人”地位，可以干预佃农的耕植（包括种植何种作物），使佃农不仅没有生产的积极性，而且没有经营的主动权。凡此种种，都严重地束缚了河南作为国民经济主要部门的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处于极端贫困境地的农民

除了榨取地租和雇工剥削外，地主对农民的另一种残酷剥削就是高利贷。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种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形态在清朝前期就特盛于河南各县，进入近代后，经过太平军、捻军的扫荡，来自外省的吸血鬼受到致命的打击，但土著地主富人却代之而兴，剥削面很广。同治年间纂修的一部地方志书记四乡农民“出息以称贷者，十常八九”[①]，可谓是全省缩影。其名色至为繁杂，大别之有钱贷、粮贷两大类。前者以银、钱出贷，最低“三分行息”；或出贷时将本金折算成粮食，麦后或秋后按粮贷办法还粮；或出贷时付原粮，而按春荒时高价折算成现金，届时本息合计，让债务人以低价粮抵交。后者多在春荒时出借玉米、高粱，麦后或秋收后加30%的息粮偿还，灾荒年份或对特困户剥削率高达100%—200%。光绪以后，随着农民贫困化程度的加深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高利贷在各县城乡也更加猖獗。它与地租剥削交织在一起，使广大农民在这两条绞索的羁勒下更加穷困不堪，由地主“准折地亩”——兼并农民土地也越来越多，在维系和修补地主阶级土地占有制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官府盘剥的加重和农业经济的凋敝

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官府添增的种种盘剥，包括丁漕浮收、差徭改折、各种苛派、厘金、捐输等，除筑寨和练勇等费不能不有所免除外，多数因多年“随粮附征”而延续下来（有些变个名义），有些还有所加重。拿最主要的丁漕来说，漕折同治年间每石已提为银3.3两，光绪时又加至4两余。地丁名义仍守其“永不加赋”的“祖训”，没有增加定额，但各州县地方官无不大肆浮收，衙门书吏和里保人员借端勒索也愈过益甚。尤其因为河南与南方一些省份不同，像江苏、安徽、江西等省在太平天国失败后，曾统一规定田地钱粮征交数目（制钱），各州县不得自行改动，河南则无此制约，各州县“自为风气”，不仅“大户”和“小户”、“绅户”和“民户”、“大粮”和“小粮”有不同的征收办法（或重或轻，或交银或交钱），而且银钱比价亦由各州县官府自定。大体情况

① 同治《叶县志》卷一，第19页，同治十年刊本。



是："以征粮论，每正银一两，有收银一两三四钱或一两四五钱，乃至一两七八钱不等；以征钱论，每正银一两收钱两千四五百文或两千七八百文，乃至三千四五百文不等。"[①]所说虽系20世纪初的情况，但却是光绪年间诛求办法的延续。如1880年(光绪六年)在淮阳，正额一两"概勒价为二千七百文"[②](市价只一千五六百文)。有个豫籍御史综述光绪后期河南各县丁漕收取情况时，也称："每额征银一两，计纳制钱二千六七百文至二千七八百文者，比比皆是，而省南之州县如信阳、罗山、正阳等处，竟有折纳至三千文以上之多者。又创其名'柜规钱'、'粮券钱'、'补数千底钱'、'辛工纸张钱'，按粮数之多寡，正额外复递有增加。"衡以一千三四百文的实际银价，光正额即浮收一倍以上，均成为州县官的"羡余"而入其私囊。对此，北京朝廷和本省抚署均予默许，并借此提取河南"羡余"银年10万两上解户部，"更使州县明目张胆，并有以提款照每两加制钱50文转征于民者"[③]。这是就全省大体情形而言，至于各县在实际交兑时，又按地产多少，分"两户"、"钱户"、"分户"(赋额分别在银1两以上、1钱以上和1钱以下)规定不同的银、钱比价，田产越少的"民户"、"小户"负担越重，最重的有每两银折交制钱10余串者。除此以外，乡里各种催征人员还要花样翻新，额外勒索。

正赋以外的杂税，同样是名目杂出，有增无减。如睢州官府就硬性规定每里"月报税契"，不管实际买卖地产多少，大、中、小里均须分别报纳三百余千、二百余千、一百余千文，"不报者，里书必受挞罚……里书不胜痛楚，则控名以欺有司，生事以讹乡里"[④]。诸如周家口这类商业市镇，厘局更是"骚扰抑勒，偷漏中饱，弊端不可究诘"，以致"行旅为之裹足，商贾日益萧条"[⑤]。因"吏治日偷"而造成"民生日蹙"，自然成了晚清时期河南的必然趋势。

---

① 《河南官报》，宣统二年第12期。
② 《淮阳县志》卷四，第11页，民国23年铅印本。
③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总第4431—4432页，中华书局，1958。
④ 施景舜：《松心堂文钞》卷下，第35页。
⑤ 《项城袁氏家集·文诚公集·函牍》卷一，第25页。

在此期间，河南自然灾害也有增无减。

河南地处平原，大多数州县地势平衍，因此水利对农业兴衰的关系尤为重大，称之为“命脉”。进入近代以后，一则由于封建统治日趋腐朽，“于民瘼漠不关心”；二则由于10余年战争的破坏，像项城“民风凋敝，道路平淤，沟渠淤塞”[①]者不在少数；三则封建统治者须支付多次对外战争的费用和赔款，还有兴办各种“洋务”事业的巨额开销，因此从上到下，“直不知水利为何事，惟日持三尺法以催比征徭而已”[②]。结果遂使大河南北水利大坏，各州县早先修挖的沟渠大都平淤。河流更少疏浚，所以除了不断为灾的黄河外，淮河、贾鲁河、惠济河、洪河、沙河、沁河等，每当夏秋遇雨，就不断溃决泛滥，不少河段竟至“无岁无之”。特别是黄河，给河南带来的灾难尤为深重。19世纪下半叶，光有记录的较大黄河决口就有10余次。这固然与这条大河的特性有关，但很大程度上是封建统治腐朽化的结果。当时，大小河务官员，从总督到员弁，对治河经费（本已大大缩减）大肆侵渔中饱，所备防河物料，“中多积灰土及陈朽不堪之料”；各级河官平时均远离河防，“及闻河臣查阅之时，始星夜赶赴”；所设河兵、河工，“备名充数，惟期虚直钱粮”。“是以并无（河水）盛涨之时，间亦有漫溢之事”。尤有甚者，这些河务官员不以“安澜”而“以有工程为得计”，因为在堵复工程中既能“渔利”，又可“邀功”[③]。此种封建统治的“人祸”越来越烈，黄河的肆虐也愈过益甚。拿1887年（光绪十三年）农历八月中郑州石家桥大决口来说，堤岸经上游盛涨的洪水冲击10余天，业已险象环生，但身为河道总督的成孚却一直不闻不问。到十八日，河堤已危险万分，附近上万民众“呼号震天，咸思效命”，自动聚集堤上，舍命抢护，“无如河干之上，曾无一束之秸、一撮之土，（民众）束手待溃，徒唤奈何”[④]。长达四五百丈的大堤终被洪水冲决。大溜奔腾直泻，郑州、中牟以下豫东和豫东南15个

① 宣统《项城县志》卷三，第47页，民国3年石印本。

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30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③ 李时灿：《中州文征续编》卷五，第5—8页，1924年开封经川图书馆刊。

④ 蒋艮：《蒋仲仁奏稿》（抄本）。



州县遍地汪洋，尉氏、扶沟、淮阳、西华8/10—9/10，中牟6/10—7/10的土地，均被"一斗水、七斗沙"的黄水淹没，灾民近200万人。灾情之重，举世震惊。封建官场却上下振奋，"大工未开，而钻营差事已达数千人"。历经一年有余，耗费了3 000余万两白银，才得在次年冬季堵复合龙，但"善后事件仍不完密"[①]。就这样，黄河在晚清时期漫决特甚。据粗略计算，沿河400多万亩耕地因此变成了不毛的沙丘。

随着晚清封建统治的日趋腐朽和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河南的自然灾害也日趋频繁和酷烈。像汜水县境（今属荥阳），地方人士记称："同治以来，非无麦，即无秋……丰年甚少。"[②]这在全省多数州县均有一定的代表性。尤其是1877—1878年（光绪三年至光绪四年）几遍全省的大旱灾，更震惊中外。尤其是豫西、豫北，景象更惨不忍睹，"人民转徙流亡，十居七八"，"妇女则贩卖略尽矣，房屋则拆剩四壁矣，牲口则或宰或卖矣，农具则当柴烧尽矣"，就连"人相食"也不能持续，因为活着的饥民"既无割人之力，又无可食之肉"[③]。

全省无数家庭家破人亡，无数村庄无一完屋，有些竟至无有遗民，就此在地方舆图上消失。幸好1879年、1880年雨水比较调匀，遗民陆续返乡，但仍然满目萧索，"两三年后才闻犬，四五村中偶见人"[④]等诗作，就是当时社会情景的如实写照。1880年，陕州地方官报告辖境情况，说"不但城市荒凉，乡村寂寞，直有三二十里之远，一片瓦砾，四顾无人，乡间未拆之屋寥寥落落，所存之户零零星星"[⑤]。新安全县灾后人口只5万余人，较之灾前减少了近17万；辉县南平罗村，灾后人口480余人，只及灾前的1/3。全省据官方估计，1878年人口较1876年减少了1 800多万人。尤其是妇女，耗减最多，以致灾后不少地方只能

① 《郑县志》卷十，第15页，民国5年刊本。
② 《汜水县志》卷十，第3页，世界书局，1923。
③ 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卷三十二，第43页，光绪三十年刊本；《豫灾征信录》卷一，第29页。
④ 《阌乡县志》卷十二，第58页，光绪二十年刊本。
⑤ 严作霖：《陕卫治略》，《禀致浙江官绅》。

数男共娶一妻。有些地方，如河内清化镇的李家凹村，人口死绝，耕地全荒，直到20世纪初，数百亩土地还无人垦辟。历年大旱对经济和社会破坏之重，较之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国内战争有过之无不及。

这一被称为河南历史上"千百年未有之奇灾"的形成，固然与久旱缺雨有直接关系，但破坏如此严重，却与封建统治的黑暗和残暴分不开。当时被派回省救灾的项城籍官僚袁保恒就曾指出，河南人民之所以特别贫困，抗御天灾能力之所以特别微弱，"一由于差徭、杂派太重，再由于积谷经理不善（指各县捐自农户的备荒仓储粮食，均被官绅中饱），三由于水利久未兴修"，加上"大吏遏抑报灾，穷黎无所控诉"①，遂致雪上添霜，造成浩劫。像豫北一些地方官在1876年旱象业已相当严重时，曾向省府报灾，藩司刘齐衔斥为"恫吓"，"立予撤任"，还通令各府州县，无论被灾轻重，钱粮均须按8成征交，"致道府州县，相诫不敢言灾"。次年灾情更重，刘仍"执意不回，变本加厉。州县慑于期限，严为催比。黠者勒令大户分完代纳（过后自然要小户加倍偿还），愚者逞其武断，肆意诛求。致令歉岁余生，卖儿鬻女以完正供，舂石和泥以延残喘"②。此类令人发指的"人祸"，更大大加重了天灾的破坏性。在此期间，清廷中枢因上海等地和海外报刊连续报道了河南、山西灾区情状，一些豫籍京官也奏请赈济，这才派员来豫查察，河南当局才向清廷求赈。但却遭到户部的批驳，"文书往复，互相推诿，坐视两省灾民靡有孑遗而悍然不顾"③。

这次奇灾对河南的打击实在太大了，教训也十分深刻。因此，一些州县在元气稍复之后，曾组织地方人民疏河、挖渠或打井，但只能是局部和小规模地进行，农业生产条件恶化的态势并未改变，自然灾害依然"无岁无之"，全省每年多则七八十个州县，少则四五十个州县总有旱、水、蝗、风等灾，其中1887年黄河决口和19世纪末的大旱最为严重。

---

① 《项城袁氏家集·文诚公奏议》卷五，第24页；卷六，第55页。
②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总第499—500页，中华书局，1958。
③ 张佩纶：《涧于集》卷一，《请恤民片》。



这种情况，是清朝此前200多年历史上所未曾有过的，全省"民生日蹙"，自然是势所必然了。

上述种种加在一起，必然使河南农业生产日趋衰退，广大农民的生活日趋贫困化。

"大户骛兼并，利诱更势攘，田多租(赋)或寡，坐食侔君王。小户供耕作，隐盗(佃耕土地上之收获物)以为常。最苦田卖尽，空券犹追粮。"[①]封丘士子的这首诗，如实地反映了晚清河南城乡两个基本阶级——地主和农民的不同处境：前者不劳坐食，过奢侈、糜费的生活；后者尽瘁耕作，卖田续命，还要代地主交纳钱粮。在这样的情况下，河南人民生活的贫困也就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农业生产也随之每况愈下。

以上是就总体而言，并不排除农业生产也有局部性的进展或没有明显衰退。如就灌溉条件、集约耕作等方面说，一些州县吸取了光绪初年大旱的教训，"稍稍讲求水利"，尤其是豫北一些州县，通过地方自筹款项(自然向农民摊征)，开挖了少则数条、多则十数条沟渠，或筑陂建闸以利浇灌。成绩较著的，如武陟，除在沁河上修建惠济、普济等闸四五处外，县东、县西各村也多有"凿井灌田"者。温县、河内等地，还能使河水、渠坝纵横县境，颇得灌溉之便。郑州、辉县、修武、洛阳、浚县等，对河水的利用也较为充分。巩县、获嘉、洛阳、修武等县，凿井也较多，且采用铁轮水车取代旧式的木制辘轳汲水。淮河以南、信阳以东的主要稻作区，沟渠闸坝也设施较全，官方出版物称其"旱潦无虞"、"向无旱涝之患"[②]，虽迹近夸张，但较之旱作区生产条件确实优越得多。武陟农民推广翻土压沙，光山农民推广草子肥田经验，均使单产有较大提高。还有一些州县农民培育、采用"白子粟谷"(能耐碱、耐水又耐旱)、"短秆燥"(抗旱小麦)、"火麦"(能抗旱、抗风)、"冻粟谷"(农历十一、十二月种，次年麦后熟，可免旱、蝗)等良种或技术，均因地制宜而见成效。凡此种种都曾给当时当地的农业生产带来明显的效益，可

---

① 何家琪：《天根诗钞》卷上，第1页。

② 《河南官报》，第287、292期。

惜都是局部性的,而且是少数农家自发进行的,既未在较大范围内推广,也未能经久持续。所好者,棉花、烟草、芝麻、蓝靛等经济作物持续有较大的发展,意味着集约耕作的土地随之日趋增多,从而导致农业生产力和劳动效率有部分提高,但却未能改变整个农业生产日渐衰敝的总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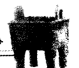
第三节 沉沦中的新机

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逐步深入

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就是在19世纪下半叶,河南的社会经济由于受外来的和内在的诸种因素的影响,既有沉沦、衰退的一面,也有发展、进化的一面。

两次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不断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河南虽地处内陆,但也难以幸免,就19世纪下半叶而言,侵入河南的侵略势力,主要是英、法、美、意、俄等欧美国家,其主要侵略方式是“通商”和“传教”。

通商——一方面向中国大量运销洋纱、洋布等机制消费品,另一方面低价收购中国各种农副产品,把包括河南在内的中国各省变为其工业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这一过程在19世纪70年代特别是19世纪80年代以后,一方面由于西方列强勒索了更多的侵略权益,另一方面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快速发展。河南虽不毗邻通商口岸,但如前所述,早在鸦片战争前,鸦片等外货就已运销省境,两次鸦片战争后,更多的洋纱、布和机制糖等外国机制日用品从通商口岸经由传统的水陆商路,运至道口(由天津沿卫河而至)、周家口(由镇江沿淮河、运河而至)、赊旗(由汉口—老河口沿唐河、白河而至)、漯河(亦由汉口上溯沙河而至)等地集散,分销大河南北各州县,就是一般人民需用量很少的“洋呢”,19世纪50年代后也在省内销行渐广。远在豫西的洛阳,19世纪50年代即不乏应市的洋布。1869年,一则外国人的商务报告中



说到，河南商人过去只能向华商匹头公所购买洋纱、布运销省境，自从1858年对进口洋货实行子口半税制度（加征关税之半后，运销各地不再抽征厘金），这些商人“为现行子口税对货运的便利所动，遂到镇江直接贩运到自己家乡去卖。他们试办的结果，看来很顺利，因为较远的乡镇直接贸易已在继续增长繁荣起来”，其中运销最多的就是棉纺织品和糖[①]。这样，就有更多的“洋货”进入河南城乡。到19世纪90年代，光从镇江进口而分销于开封、归德、陈州等府的洋纱，年达数千担，永城一地在1898年入境洋纱值银23万两。其他如“洋糖”、“洋烟”、“洋纸”、“洋油”和染料等日用品，也日渐拓广了其在河南（主要是城镇）的市场，使这个历来“货不外求”的内陆省份日益成为欧美资本主义的商品销售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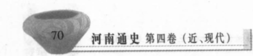
在廉价收购河南的农副土产和其他资源方面，19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外国轮船在沿海和沿江各地买货搭客的越来越多，“商贾一切，被洋人垄断，生意不拘大小，甚至木耳等微物，亦行搜掠，无丝毫余剩”[②]，尤其是茶叶和蚕丝，“搜掠”更多。20世纪初，官方报告回顾本省商货销售情况称，“豫省本非繁富之区，其产货本少，去江海口岸甚远，故商贩颇稀，向来出产，以煤块、（芝）麻、豆为最多，杂粮次之，丝绸、药材又次之”，大都沿着传统商路运销邻近省份，惟豫西南的丝绸部分经张家口远销俄国。“自海禁大开，洋商准入内地采办土货，豫省之药材、烟叶等项，均有海关联单。”[③]参以其他记载，在外销商货中还有光绪中后期较快发展起来的草帽辫。看来，直至19世纪末，由于受诸多客观条件的制约，外国资本主义经华商为中介，从河南收购的商货无论从品种和数量上说，都是有限的，其中的大黄、丝绸等货物出口在鸦片战争前即已存在，半殖民地性质的原料掠夺无论从广度、深度上都远在南方省区之下。而同一时期，各种洋货却在大河南北行销日广，这就意味着河

---

①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辑，第823页，中华书局，1962。

②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第16页，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

③ 陈夔龙：《庸庵尚书奏议》卷四，第20页。



南现银流出日多，成为“民生日蹙”的另一缘由。

传教——主要是天主教、耶稣教，另外还有势力较小的东正教。这是外国资本主义对河南的文化、政治侵略，虽与这一时期的“民生”没有直接关系，但也不妨于此一并叙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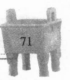
鸦片战争后，法国于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胁迫清廷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其教士即于该年在南阳靳岗建立天主教河南教区，并以此为基地四出传教。1858年（咸丰八年）、1860年（咸丰十年），在清廷与法国签订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进一步规定了中国地方官须“厚待保护”入内地传教的外国教士，发还过去没收的天主教堂墓地，“并使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堂自便”（此条系当时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私自添入中文约本的）。之后，清廷的总理衙门又根据法国驻京公使的要求，知会河南巡抚张之万，要河南当局“秉公”办理天主教会有关事件，将法使送来的“和约告示”在省内各处张贴。此后，天主教势力在鹿邑、林县、桐柏、唐河和其他诸多州县不断扩展，进而在1882年（光绪六年）新建卫辉教区，专管黄河以北25州县的教务。到1900年，据报全省有天主教徒1.3万余人。

接着，耶稣教（基督教）也接踵入豫，19世纪80年代中先在周家口扎下据点①，1885年，又进而在赊旗建立了教会，随后继续在大河南北扩展，如1888年、1889年均有传教士先后在安阳、信阳传播耶稣教。但因毛羽未丰，地方人士又猛烈抵拒，所以开始阶段进展较慢。到1900年，全省建有教堂十来所。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失败和《辛丑条约》签订后，局面才有较大改变。

在此期间，俄国东正教会也派遣一些教士，入豫北设堂传教。因为这三种基督教都来自外洋，与中国旧有的儒、道、佛、回等教迥异，所以当时人们一般统称之为“洋教”。

这些洋教与中国旧有宗教不同之处不止是教义，更重要的是它们均与欧美主要国家的侵华政策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其推进殖民主

① 具体年份，有1883年和1884年两种记载，待考。



义的一种得力工具；就河南这个不通商省份来说，这些洋教士是最早展示在城乡人民面前的“洋人”；“洋教”早期的扩展进程，也就是欧美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原扩展的过程，其对河南人民生活和社会历史的影响也是比较深广的。



入内地传教的外国传教士

因为怀着殖民主义的动因，洋教士们多用不正当的甚至卑劣的手段推进其教务。当时南阳城乡流传这样的顺口溜：“入教，入教，钢洋十吊”；“以十字，圣架号，不打官司不进教”。说的是天主教堂用银洋和包打官司为诱饵，招诱一些见利忘义或强梁霸道之徒（不少是地主富人）“投教”。在其他州县，也少有例外。如禹州早期教徒刘玉海，便是一个平素“行止不端，屡次与人争讼，不为乡里所齿”的土棍。直到19世纪末，美籍耶稣教牧师柏仁来信阳传教时，城乡人民仍“信者甚少，惟涉讼穷迫者或入教乞护符，柏亦辄徇其请，以广招徕”①。同治年间，唐（河）县和南阳地方官府的文告中，就概述洋教士和无赖教民的作为说：“本地土棍多借习教为护身之符，每在各寨任意游行，威逼男妇，稍不如意，擅行责打，否则控诬控告……种种不法，实属教中罪人”，洋教士“附从愈众，恣纵愈甚，其于彼教诱奸妇女，煽惑愚民，种种不轨无论矣，民间诉讼一切判决，稍不如意，一经投入彼教，即复出头相梗”。因此，“宛属绅民苦天主教久矣，恨彼教如切齿”②。例如，1866年端午节，适逢桐柏县平氏镇教堂举行礼拜，一些村民入内观看，教士即“喝令跪听宣讲”，村民不从，教士就指使教民强扭村民耳朵，迫其跪听而后已。由此一例，不难推知这些“福音”传播者的强梁情状。

---

① 《信阳县志采访稿》，《宗教》（稿本）。
② 《教案教务档》河南部分，同治五年、六年，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981。

不仅如此，各洋教堂、洋教士还凭其威势，掠夺农民土地，袭用当地的封建剥削制度盘剥农民。晚清时期曾连任许州、郾城、长葛等州县地方官的徐寿兹就记其切身体验说：各处洋教堂霸占房、地产业的行径"不一而足，得尺则寸，其进无穷，久已毫无公理……只须勾一无赖，串一产行，□一伪契，即可占据我民产业"[1]。据大略估算，南阳靳岗教堂在19世纪末，占有土地就达3 000亩以上，每年剥削租粮60多万斤。次一等的，如确山韩庄天主堂，占地也达1 000多亩。中牟黄河北岸大片河水淤积而成的土地，早被当地农民开垦成熟，而且领得官府执照，但洋教堂却勾通官府将这些土地全行霸占，连地主士绅占的地也不能幸免，然后强令种地农民按照当地封建租佃制度，每年向教堂交纳50%—70%的收获物作地租，另外还要负担教堂繁重的力役。1909年10月，农民夏向阳等不甘土地被占，去地里收割秋庄稼，教堂教士竟开枪打死农民1人，打伤2人。其野蛮和凶恶，使地方恶霸都感到望尘莫及。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就是晚清时期欧美基督教和"西方文明传播者"在河南史册上的实际记录。由此给河南人民带来了许多新的灾祸，引发和逐步激化了河南人民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矛盾。

在上述种种不法活动之外，一些洋教堂还曾附带创办了若干教会学校和医院、育婴堂等慈善机构，耶稣教会在这方面尤为用心。这些学校主要诵读《圣经》，旨在培育传教人员，在乡村人民中培植崇洋、奴化思想，办慈善事业也为着推进教务。后来个别洋教士还曾从欧美带来一些农作物新品种，在当地试种成功，被附近农民仿效推广。与前面诸种不法活动相比，此类活动多少有点积极意义。

二、农产品商品化的扩大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逐步深入，给河南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带来深广的影响。就社会经济方面说，它作为一种外来因素，与本省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内在因素结合在一起，使之逐步摆脱中世纪状态，而

---

① 徐寿兹：《学治识端》续编。



缓慢地走向近代化。作为这种变化的第一步，便是如马克思指出的，促使"那些主要以本人直接需用为目的，把多余生产物转为商品的一切旧生产形态"逐步破坏和解体，逐步使商品生产普遍化。

作为一个"绾毂南北、枢纽东西"又地广物丰的省份，河南在历史上封建经济高度发展。进入近代以后，河南不管在外货输入和农副产品输出上，也与国内、国际市场联系日益紧密。一些地方志书在记述本地习俗的变化时，就映现出这一点。如同治年间修纂的《叶县志》记称：以前，县境城乡交易只限于食盐、铁器之类，人民生活俭朴简单，衣则"取之女红"，食"则市脯园艺，问诸集镇"；今则"俗有佩服文绣，宴会享海错者"，"以故晋魏贾贩，操盈猬集，力穑所获，半归廛肆"[①]。光绪中纂修的《鹿邑县志》亦记称：县境旧俗"安于朴塞"，六七十年代后，"习尚浸侈，筵宴务丰腆，衣服竟华丽，靡费无节，盖藏日匮"[②]。此类文辞虽然不无夸张，省境不同地区的情况也不尽一致，但社会上生活消费的提高，对市场需求的增加却是共同的。在这样的情势下，河南与其他省份一样，社会经济也逐步沿着半封建半资本主义道路演变。经济作物种植日广，农产品商品化加速就说明了这一点。

首先是棉花生产。种植更广，并逐步形成了几个初步专业化的植棉区。据1870年西方游客记述，阌乡一带已成为"广大的棉田区"，从县城东行，"整个下午，极目四望，尽是棉花"；在整个河南（洛阳）府，棉花成为"主要贸易品"，买卖终年不断，洛阳城内每天交易额约银1万两（按当时棉价估算，全年交易量约50万公斤），四乡除去易淹冲积地外，"绝大部分土地都准备植棉"，产品多运销陕、甘、晋、鄂[③]。以后植棉更多，运销更广。据20世纪初记述，产棉最多之地有安阳、邓县、洛阳、通许、商水、孟县等处，年产350多万公斤，少亦一二百万公斤；商丘、虞城、灵宝、阌乡、项城、汝阳、新野、罗山等县次之，其余诸县，除中

---

① 同治《叶县志》卷一《风俗》，同治十年刊本。
② 光绪《鹿邑县志》卷九《风俗》，光绪二十二年刊本。
③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26页，三联书店，19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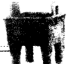
牟、新郑、封丘、武陟外,均产棉不少。有些地段,如安阳西北乡,70%—80%的土地均用于植棉。所产棉花,除大量销售外地外,还有很大一部分经农家加工成商品布出卖。

其次是芝麻、黄豆、花生等传统农作物中商品率较高的农产品也种植日广。到光绪中期,黄豆在豫东、豫中和豫西南各县,芝麻在陈、许两州种植和出产最多,成为与棉花、土药并列的河南主要输出品。19世纪末,全省出境芝麻估计年值银100万两以上。另在豫东、豫北一些州县,花生种植也不断增多,据19世纪末估计,豫东约有10%的土地种植花生。虽然贩运这些河南农产品的行商,"皆汉口、沪上之大资本家"[①],河南土著巨商参与者很少,但种植的增多与国内、国际市场联系的日趋密切,却是明显可见的。

再就是罂粟,因其产值特高,咸、同以后省内外烟毒又泛滥日甚,所以栽植者也迅速增多。有记载19世纪70年代永城情况者,说历经10余年推广,罂粟种植面积"几与麦等"[②]。至八九十年代间,省内许多州县均"广种罂粟,收割其浆,名为'本土',盛行各路",许州、长葛、禹州、沈丘、项城、永城、鹿邑等地,"所种竟有过半",豫西永宁一带亦同,彰德、卫辉、怀庆、南阳、汝州、光州各属,栽植也不少,全省总计,其种植面积有云占耕地总面积7%—8%,有云达10%以上,亦有云5%上下[③]。19世纪90年代末,有人路过豫西,"夜宿逆旅,求一鸡卵不可得,而鸦片则比户有之"[④],可见流毒之广。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据海关总税务司报告,河南全年产土药约6万担,仅在四川、云南之后,居全国第三位。农家生产此种毒物,主要着眼于出卖,其商品率当属最高。

其他如烟叶,各地多有,豫西南种植特多,著名的"邓片"烟叶产地邓州,到19世纪末,"纵横数十里皆烟田",加上淅川,总面积不下二三

① 《河南官报》第105期。
② 赵振先:《惠南自谱》。
③ 严作霖:《陕卫治略》卷八;刘获云:《农曹案汇》,第41页;绍兴县志编委会:《绍兴县志资料》第1辑,第16册。
④ 许珏:《复庵遗集·书札》卷四,第14页。



千公顷。禹县、襄城、上蔡、郏县、洛阳等地,也栽植不少。所产晒烟除当地消耗外,还远销山西和广东、湖北各口岸,经洋商收购,部分运销于欧洲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①]。在19世纪80年代前期,据汉口海关报告,该埠"以供应外销为主"的烟叶,大都是河南邓州所产,其品质之优良,足以与美国"黄金叶"媲美,以致一些外省所出之烟叶也冒称"邓州烟草"。这种来自河南的商货,"使外国人得到利益"的同时,还"大大提高了中国烟草在伦敦市场上的声誉"[②]。这种情势,是以前所没有的。因其销路渐广,"收获之利,数倍于谷",所以其他一些过去只在"偏地"少量种植烟叶的县份,如鹿邑、项城,也"种日多"[③]。再如蚕丝,80年代后因受国际市场的推动,省当局也注意倡导,于省城特设蚕桑局,摒弃本地"土蚕野蛹",引进浙江湖州的桑秧、蚕种,在祥符、永城、荥泽等地推广,均兴起蚕桑。另在南阳、内乡、南召、鲁山、镇平以迄禹州,农民入山植橡、放养山蚕的,增加更快,效果也最显著,逐渐发展成为国内山蚕的主要产区之一。还有像蓝靛、红花之类的园艺作物,因每亩产值高过种麦七八倍,故在近代也受到更多农民的青睐。其他一些土特产,如牛皮,也因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要,外输日多,除运销上海、汉口、镇江、宁波等埠外,还外销东南亚和欧洲,光绪初大旱期间,所出尤多,成为饮誉市场的"南皮"。怀庆、南阳等府和禹州等地所产药材,也随着对外经济联系的扩大而增产、增销。20世纪初,河南巡抚陈夔龙奏报省内情况称:"自海禁大开,洋商准入内地采买土货,豫省之药材、烟叶等项,均有海关联单。"说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因洋商只纳子口半税而不纳厘金,致使河南"绌收厘(金)数已属不少"[④]。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联系日益紧密,这是此前所未曾有过的。

上述种种,不是在生产力发展、生产结构发生本质性变化的基础上

---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43页,三联书店,1958;《河南官报》,光绪三十一年第三期;《庸庵尚书奏议》卷三,第29页。

②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辑,第1132页,中华书局,1962。

③ 光绪《鹿邑县志》卷九,第15页;宣统《项城县志》卷五,第56页,民国3年刊本。

④ 陈夔龙:《庸庵尚书奏议》卷四,第20页。

为着追求利润而进行的，相反，是在传统经济结构的框架内，在农村经济凋敝、农民生活贫困化的态势下，为艰难图存而开展的。因此从本质上说，基本上还是鸦片战争前低层次的农产品商品化的延伸和扩大，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农业商品化。不过因其是在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由此将促进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成长准备条件。

三、手工业和商业的新发展

主要是手工织布业的发展。乾嘉以降，河南农村手工纺织发展很快，产品远销安徽、山西、陕西、甘肃以至西北边境。进入近代后，虽有“洋布”竞争，地方织布业仍能继续发展，除正阳、孟县、孟津等老产区外，禹州、临颍、固始、许州、鄢陵、扶沟、新郑、汲县、滑县、封丘、罗山、光山等县也接踵兴起。据云19世纪70年代间，光、罗两地每年行销安徽怀远、临淮、五河一带的布匹，即达两三万捆。虽然一个熟练织工一日所得不过一两百文，却能使之“家给人足”，也使农村经济更紧密地与市场联系在一起。

丝织业在豫西有较大的发展。著名的南阳绸就发轫于19世纪70年代，开始阶段主要运经北京、张家口而销行于蒙古和俄国。90年代，复向东进入上海市场，并转销印度、埃及等国。光南阳一地，专业机户就发展到七八百家，大小机具3 000余架，年产值银数十万两。另在镇平、南召、内乡、裕州、鲁山、汝阳等地，丝织业也都大有发展，年产值多达数十万或一二十万元。

以上，无论是棉织还是丝织业，绝大多数仍出自个体机户或手工作坊，受雇于同一个资本家、在同一劳作场所分工协作进行生产的手工工场还很难看到，但却使一些原本是副业性的商品生产，进为主业性的商品生产，从而进一步促使“农”与“工”的分离，加快了社会经济近代化的脚步。

手工采矿业也有发展。19世纪三四十年代后，清廷转而鼓励商民开采煤炭等矿，河南丰富的矿产资源较好地得到开发利用。如嵩县德亭和古峪金矿、光山叶家湾银矿、南召九里山铜矿、新安狂口硫磺，均于



19 世纪下半纪开挖，只是成效甚微，开采最广的还是煤矿。同治年间，修武至济源、巩县、鲁山、南召、汝州等地，土煤窑已开办颇多，到 19 世纪末，光河北三府土煤窑工人即达 20 余万人。所采煤炭，主要在本地、本省行销，少部分远运天津等地，给河南近代矿业的产生提供了一些条件。

贯联四方的地理位置、历史上积累的商业基础、进入近代以后外来商货的侵灌，以及上述种种经济进化，这些因素加在一起，遂使河南的商业也有新的发展，特别是部分基础较好、交通较便利的地区，变化尤大。如以前只有旧式杂货铺供应人民生活日用品的南阳城内，到光绪中，经营京广杂货和"洋货"，包括搪瓷、橡胶制品、颜料、钟表等的商铺也陆续开办。因此在黄、淮、洛、卫、沙、洪、颍、唐、白诸河河面上，往来的商船络绎不绝。在沙颍河上的周家口，19 世纪 80 年代后，更成为豫东水陆交通枢纽，"桅樯林立"，吐纳豫东南和皖北的大量农副产品，光镇内粮行、粮坊百家上下，年成交量超过 2 亿斤，其他如金针菜、大豆、芝麻、牛羊皮等，交易也空前繁盛，南通苏、沪和汉口，北通京津以至长城内外。60 年代后期新发展起来的牲口市，除汇集大量的豫南、豫西南和皖北的牛、骡外，蒙古的马匹也远道来此，成为中原地区和华北的一个著名的牲口市场。卫河上的道口镇，七八十年代之交，也是"商贾懋迁，货物骈比，居民鳞鳞"，在"商战"中获得成功的"无虑数百辈"[①]。唐河上的赊旗店（今社旗），光绪时，"南船北马，总集百货"，镇内的 72 街除收纳大量的秦晋盐、茶外，"百货悉备"，河水所经的新野、南阳、唐河等地，商业也日趋繁盛。水道直通天津，随着天津的开埠，粮、盐、药材和百货的往来运销越发兴旺[②]。界联豫、鄂、陕三省的淅川荆紫关，汇集湖北、山西、陕西、江浙和河南的几个大商帮，数百艘商船常来往于此。其他如确山的驻马店、息县的乌龙集（今淮滨）、沁阳的清化镇、陕

---

① 光绪《续浚县志》卷四，第 18 页，光绪十二年刊本。

② 参见河南省交通厅交通史志编委会：《河南航运史》，第 164 页，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

县的惠兴镇等，也均以商业兴旺著名远近，与上列诸名镇一样，愈益发挥其中级市场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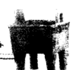
除中级市场之外，地方性的初级市场——集市较前也有所发展。如信阳两河口，原先还是个沙漫的沙滩，1887 年（光绪十三年）开为新集，不几年就“商贩猬集，争营房舍，遂成市焉”①。类似现象，也出现于其他一些州县，都是农村商品交换增长的结果。如鹿邑清前期有集市 33 处，光绪后期增至 50 处；永城前期有集市 36 处，光绪朝增至 89 处。其中有不少由过去的“隔日集”发展为“日日集”。这是晚清时期河南城乡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表征。

与以上情况相应，河南土著商人和商业资本也有新的发展。如僻处豫北的林县，地方人士记称：“县境商业，旧时皆操之晋商之手，泽（州）、潞（安）间人尤多。清季，晋商仅有一二，城乡商号皆林人自营。”②在豫南的信阳，光绪初还是“市面营业，纯系外籍”，后地方人士亦抛弃旧习，“提倡商战”，“风气渐开，从者日多。至清季，本籍商人，居然特树一帜”③。同样，在全省其他许多州县，过去较大的商家大都来自山西，次之是陕、鄂、皖、苏、浙等省，土著很少，光绪中后期也多程度不同地发生上述变化，不仅部分地主富人，就是一些士子也“弃儒学贾”。像浚县武生孙晓山，19 世纪 90 年代转而经商，本着“持之牢、纵之远”的经营之道，往来道口、天津间，20 年间，除自家发家致富外，“族党借其力得长养子孙者以十数”④。由此，温、孟、济源、武陟、沁阳等县以经销药材为主的怀商，固然进一步发展，巩县、汜水、太康、潢川、汝南、新蔡、正阳、郾城、信阳、淅川、南阳等地的商人也日渐崛兴。

四、自然经济的存留

河南由于历史的、地理的和社会经济的原因，就整体而言，商品经济和商业的发展，较之沿海、沿江许多省份还明显落后，在对外贸易上

① 《重修信阳县志》卷六，民国 25 年汉口洪兴印书馆铅印本。
② 《林县志》卷十，第 3 页，民国 21 年石印本。
③ 《重修信阳县志》卷二十六，民国 25 年汉口洪兴印书馆铅印本。
④ 《河南通志稿·清代人物记》（稿本）。



更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人们在这一时期的大河南北所见到的，仍然是较为完整的自然经济图景。

河南人民如前所述，在官府和地主富人的多方盘剥下，连简单的再生产也难以维持，甚至食盐都只能在农忙午"饔"中撮放些许，经济力量极其薄弱，因此只好继续紧附传统的、以小农业与家庭手工纺织业紧密结合为基本特征的自然经济，"男耕"以求食，"女织"以求衣。此种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在沿海、沿江省份，鸦片战争后随着洋纱、洋布的不断输入而渐趋解体，河南则直到19世纪末都基本上维持不敝。光绪中修纂的《扶沟县志》记各乡情形称："妇女无境外之行，尤勤于纺织，至有竟夜不息者。"一位汲县人士亦记该地习俗："吾乡农家新妇入门，给棉花三斤，其夫及子女一生衣履胥从此出。"[①]大河南北各州县，包括"首县"开封在内，少有例外；不光一般"农家"，就是地主富户或仕宦之家，亦沿此习。如淮阳有田3 000余亩的秦先闻、太康有田四五百亩的王开基、信阳有"良田"30石的余振兹等家，妇女都自纺织，甚至"无昼、无夜，无寒、无暑，有小恙亦不离（纺、织）机"[②]。汲县王敬芳中了举人、进士，入京为翰林院编修，其母、妻仍终年不停纺织。这样，"丁壮扶锄犁，妇女织疏布"，就成了中原大地共同的生活图景，用光绪年间宜阳人士的话来说，"依然有《豳风》遗意"[③]——保有《诗经》所反映的上古风情。

无论"男耕"、"女织"，着眼的都是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节余部分送进初级市场（集市），也不过以货币为中介，彼此以有易无、调剂余缺。因此无论城乡，最大的商铺仍然是粮、盐、纱、布和杂货；水陆交通线上，即使"车船如织"之地，亦多"盐来谷往"，载运的主要也是传统的生活、生产日用品（包括煤炭、石灰之类）。此类商品交换并没有腐蚀

---

① 光绪《扶沟县志》卷一，第3页，光绪十九年大程书院刻本；王锡彤：《抑斋文集》卷四，第25页。

② 余振兹：《鲤河文集》，第5页。

③ 刘曾騄：《梦园诗稿》卷六，第9页；《宜阳县志》卷二，第23页，河南商务印刷所铅印本。

而恰恰维系了自然经济。渐趋活跃的商业，不仅多是旧式的，而且既小且少。如在豫西，洛宁从事商业者不过“为糊口计，其利甚微，且有折阅者”；在卢氏县境，且多行“粟易”——以粮食去商铺换取生活、生产必需品；在地处交通要道的淅川厅，也是“几不知懋迁为何事”，在商业领域活动的不过是“聊抟微利”的小铺[1]。长期生活在这种传统经济结构中的各阶层人民，保守观念也较深，对商品经济产生了顽强的抗拒能力和抗拒心理。咸丰年间，官府要各县筑寨抗拒捻军，有些地主坚决反对在本村建寨，理由是：“寨成则商贾集，子弟居近市，染浮嚣，一日之利，累世之害也。”[2]有些地方在演戏之时，还要区划观剧位置：士、农居前，商贾列后，男子居左，妇女居右。如此严格地维护经济生活的自给性，这样守旧的社会习俗，使河南商品经济的活动天地十分窄小，社会经济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也特别滞缓。


农民家庭手工纺织图

这个时候，在沿海沿江省区，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扩大和深入，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商品经济有了较大较快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也陆续创办。与此同时，一批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官僚——洋

① 《洛宁县志》卷二，民国6年铅印本；光绪《卢氏县志》卷二，光绪十八年刊本；光绪《淅川直隶厅乡土志·实业》（抄本）。

② 《民权县志》卷十二，民国33年铅印本。



务派也在南北许多省份创办起一系列近代工矿业。但河南由于受上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一般官绅与南省“崇尚洋风”相反，几乎遇“洋”即反。如19世纪80年代末，因黄河大工需架设电线，开封人士就传帖反对，河南巡抚称述“河南地居中土，风气未开，事涉洋人，不免妄生疑义”，而不得不调和迁就：专用“华匠”而不用“洋匠”。所以在他省兴办洋务运动、创建近代工矿和航运事业时，河南一直守旧不变，在喧腾一时的洋务运动中，这块古老的土地一直沉寂无声，直到19世纪末，且不说近代工矿业未曾出现（洋务运动破产后，才于1897年创办首家使用机器的河南机器局，官资、官办，生产无关民生的军火），就是旧式商业资本也很微弱，在南省相当活跃的买办资本固然无有，就是官僚、地主所着意经营的依然是“求田问舍”和旧式高利贷。所以20世纪初官方出版物概括全省社会情状说：河南承袭“耕稼之遗风”——农业社会的传统，习惯“朴愿之旧俗”，凡属商人，“率不齿于士夫”①。“老大之河南”，因之愈益落后。

第四节 人民反抗斗争持续开展

一、反封建斗争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河南既然“吏治日偷，民生日蹙”，那就决定了以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为中心的中国近代第一次人民反抗高潮过去后，社会矛盾并没有缓和，而是在新的形势下，趋向深化和复杂化：除了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因为封建压迫和盘剥的加重而继续发展外，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逐步深入，人民大众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矛盾也日渐突出起来。在此基础上发生的河南人民此起彼伏的反封建和反侵略斗争，就成为19世纪最后30多年河南历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河南人民反抗斗争的第一个特点。

---

① 《河南官报》，总第87期。

光绪中，一个封建统治集团的要角奏称："时事多艰，民穷财尽，大江南北，盗贼肆行无忌，愍不畏法，日甚一日。"[①]这几句话，可以说是当时全国形势的总概括。河南巡抚钱鼎铭1872年（同治十一年）奏陈省内情形时，也说"伏莽尚多"，"各州县缉捕稍松，即虞窃发"[②]。为此，特于次年仿效直隶办法，编练本省兵勇：在原设三镇绿营中，抽练步队4营、马队3营，另将抚标亲军2营共7 000多人，改为练军，装备洋枪，以加强警备力量。1880年（光绪六年），又进而于练军中挑选3营，成立"精锐营"。1885年（光绪十一年），复购置新式后膛武装军队。以后又陆续添练"豫定"、"豫胜"等营，以应付日益深化的统治危机。因为在此期间，清朝封建统治者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通过举办"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实现了所谓"同治中兴"，而农民反抗力量在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中新受大创，所以无论全国或河南，人民的反封建斗争也转入低潮。这一时期，河南人民的反抗斗争有如下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多种形式的反封建斗争虽然仍不时掀起，但都规模较小，时日不长，零落分散，而且以经济性斗争为主——用封建统治者的话来说，多数是"作乱"（打击地方富户和官府），而不是"叛逆"（指向封建统治）。

第二个特点，是民间秘密会社的发展和参与。这里面，有河南源远流长的教门（白莲教系统），虽历经镇压，却在大河南北广大农村继续传播，名目杂出，诸如弥勒、青莲、白莲、八卦等教（不少团体不以"教"而以"会"名），均以佛、道迷信为思想纽带，以教主授徒方式发展团体，形成一种家长制的秘密结社，主要成员是有家有室的农民。还有19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兴盛起来的会党（哥老会系统），随着清廷在西北用兵期间不断有遣散的兵勇回归内地（河南由张曜统带的嵩武军亦为左宗棠部主力之一），另有由湖北襄樊一带进入豫西南发展势力的哥老会，遂使河南这个北方省份会党山堂也不断出现，有哥老会、江湖会、英雄会、江汉会等不同名目，以"开堂放飘（布）"方式发展组织，以江湖义气

---

① 曾国荃：《曾忠襄公全集・书札》卷二十一，《复崧镇帅》。

② 钱鼎铭：《钱敏肃公奏疏》卷二，第47页。



为思想纽带，其核心成员是破产群众、散兵游勇以至一些衙门吏役。这两种秘密会社思想崇尚、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虽不相同，但均有“叛逆”色彩；虽存在着明显的分散性和落后性，但却给众多的“不逞之徒”提供了既习惯又简便的组织形式，较之以往那种“结捻”的形式进了一步。两者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后适应河南的社会变迁和群众需要而不断发展，成为晚清时期许多群众反抗斗争的组织者和社会政治生活中日趋活跃的力量。

第三个特点，是反封建斗争和反侵略斗争分头开展，并开始呈现会合的趋势。这一时期发生的矛头指向地主、官府和封建统治的反封建斗争，主要有下列三种类型：

1. 饥民暴动。因为这一阶段灾荒频仍，而官府和地主富人的盘剥仍有增无减，这就驱使许多饥民拿起简陋的原始武器，结队“劫富”、“均粮”，武力抗击地方官府和地方武装的镇压。1877—1878年大灾年份，此类饥民暴动尤为滋盛。如阌乡，“土盗结聚剽掠，势寝炽”①；汝阳、伊阳、汝宁、遂平、西平、裕州、叶县等地，饥民亦纷起武装求生；陕州马其林等集结饥民，“滋扰”四乡；卢氏饥民在官道口一带抢粮，击败兵勇；怀庆、汜水饥民在刘黑子等率领下揭竿起事……类似事件在豫西、豫中许多州县先后发生，使不少地主富户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此后，此类斗争仍持续不断。这些斗争一般都没有什么组织，一旦存活有望，饥民就各自归农，对封建统治震荡较小。

2. 抗粮抗捐。因为官府的盘剥不断加重，不堪重负的农民就连续发动抗粮、抗捐斗争，一些城镇商民、乡村士子也参与其中。如在1874年（同治十三年），汜水、陕州、汝州、伊阳、遂平、汝宁、裕州等地，因官府苛征钱粮或契税，吏役又多索“纸墨”等费，四乡农民群聚县（州）城，闯闹县衙，殴打丁役。1890年，洛阳农民群集府城，以交出农具、停止耕作的方式，抗拒官府苛征钱粮。1896年，邓州、襄城、上蔡等地官府苛征烟叶税，人民群起反抗，迫使官府减征。1900年，中牟人民组织

① 《中州艺文录》卷二十五，第14页，1935年开封经川图书馆刊。





河南饥民之危象

“义和拳”,同时开展抗捐斗争。这些斗争虽然无例外地遭到封建统治者的镇压,很快失败,但也迫使官府作些让步(包括减轻税赋和惩处贪吏),并加深了民众对封建统治者的仇恨。

3. 揭竿起事。如果说以上两类基本上还是针对本地地主和官府的经济性的斗争,那么这种因反抗封建暴政而发动的武装起事,就含有较强的政治性——尽管没有提出什么政治口号或政治目标。如:

1871 年,固始李六会同安徽霍丘李昭仁等,聚众千余起事,河南统治当局调南阳镇、河北镇总兵率部会同皖军镇压。李六等与敌周旋于固始、霍丘、商城诸县境,一直坚持战斗到 1873 年年初。

1873年，韩国仓、赵寅史等在裕州、叶县、舞阳、西平、遂平一带，“结捻”聚众，汝阳韩会昌等亦聚众万余起事据角子山。省当局派兵镇压，被弭平。

1876年，温县张火成等利用白莲教组织群众，准备攻取怀庆府城，未成。

1877年，武陟白莲教首朱登鳌假托明皇帝后裔，与修武王凤池等聚众数千起事，在修武、道口、清化一带与清军对战后失败。

1878年，禹州封谷升、鄢陵寇法亮等，亦以白莲教组织群众起事，建军师等名号；邓州、新野有以周火星等为首的民间武装，与湖北民间武装联合，起事抗官，众至数千人；伊阳、鲁山、南召一带，以胡豹子为首的民间武装，占据旗杆街、交口镇等地，抗击赶来镇压的毅军。

1881年，鲁驴子等在正阳、新蔡，徐中义等在光州，先后聚众起事。

1883年，信阳吕元善聚众数百，反抗暴政，吕披黄袍，筑台阅操，准备大举。

1893年，西平张东明等聚众数百，起事抗官。

1894年，宋金龙、潘均可、张玉振等在开封以“仁义会”团聚群众，宋自号修明王，张为总兵，潘为镇殿侯，准备起事占据省城；西华李相成等也“造械制旗，大举为乱”。

1898年，虞城童振清等在与山东单县接壤地带“树旗谋叛”。

1899年，禹州白莲教女教主魏王氏，拟据罗汉洞起事；随后，又有项城饥民数千，起事抗官。

这些起事，虽然规模一般也都不大，集结队伍多则数千，少则数百，持续战斗的时间大都不过数月甚至十数天，有提出政治目标者也不过是传统的“反清复明”，但都具有“叛逆”性质，可以说是武装起义的初始阶段。因主、客观方面的原因，这些起事均未及“大举”即被清军镇压，但却比较集中地反映出清王朝“中兴”以后，河南社会危机仍在发展，人民反抗力量正在集结和成长。19世纪八九十年代间，朝野人士记豫北、豫东好些州县，“有一村为盗”者，“有连村为盗”者，“其联盟结党，犹是长枪会之故伎”，“千百啸聚，乐于从事，至有父导其子，兄率其

弟者”，竟至“中原庶族，十九业斯，黄河南北，跬步荆棘”①。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愈积愈烈的地火终将喷薄而出，变成埋葬封建统治的烈焰。

二、反侵略斗争

这一时期矛头指向西方资本主义者的反侵略斗争，主要是反“洋教”——外国教会的斗争。这里面，持续时间最长、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南阳人民围绕着“还堂案”开展的反对天主教会的斗争。

1861—1862 年（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元年）南阳靳岗天主堂因见城内江浙会馆“修盖整齐”，指认该处系天主教在康熙年间所建教堂旧址，通过法国驻北京公使，要求总理衙门咨请河南当局归还。南阳人民闻讯，大动公愤，群议教堂此种要求“实属毫无凭据”，自然不应屈从。城居士绅也联名具呈，要求据理严拒。据法使报告，当时南阳人民还曾采取行动，将洋教士住处“毁坏殆尽，财物掳劫一空”②。因为绅民同心，态度坚决，府、县官吏对“洋教”也心存疑忌，怕其在城建堂会影响“世道人心”和损害封建统治，所以或明或暗地与绅民站在一起。“还堂案”一时仍难解决。

1866 年（同治五年），河南巡抚李鹤年遵循清廷“曲全邻好”（对外国列强委曲求全）的方针，让南阳地方官府“再三劝谕”江浙会馆首事（时已死）之子，“情愿将会馆捐让”，并允教堂价买城内周姓房地。消息传出，南阳人民“鸣锣纠众，张贴告白，声称要杀尽教士、教民”；绅士高树序等另又联名具呈，反对在城内建天主堂；就是一些教民，因“被奸淫、讹作，多自改悔”。在这样的情势下，正被捻军战争弄得狼狈周章的李鹤年不敢孟浪行事，只好函请总理衙门说“当此捻氛未靖，饷竭兵疲，岂可再贻内哄之忧”，故请该衙门转告法方，“俾知众怒难犯，倘至民怨沸腾，官法亦难禁压”，为共维“中外和局起见”，此时“万难点交

---

① 《王先谦自订年谱》卷中，第 3、4 页；宋恕：《六斋卑议》。

② 《教案教务档》，《河南教务》，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981。本子目所引材料，除另注者处，均出此书，不一一加注。

会馆”。这样,洋教堂的讹诈又一次落空。

但天主堂并不就此罢休,清朝中枢也循法使之请加紧向河南巡抚和南阳府、县催督妥协。1868 年(同治七年),南阳人民获知“上下官长”与本地一些媚外士绅已定议将会馆断给教堂,随即发起一个新的抵制高潮。群众散布揭帖,号召“断不可”入天主教,“致命终生有玷,后悔无及”;颁发全府各县公议条规,共议“赤心守土,尺寸不可让人”,有将房、地典卖、租赁给“天诛教”者,业主应即赎还、收回,其不遵公议,“或有无耻劣绅,(与)官府一气私通天诛教者”,即扒毁其家。为此,特于农历八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在城内城隍庙演戏 3 天,借以汇聚城乡民众,做好行动准备。在这样的情势下,官绅也不敢强撄众怒,“还堂”又一次搁浅。以后几年,靳岗教堂和驻京法使虽一次又一次地重提“还堂”要求,但均因南阳人民坚决抵拒而不能得逞。

1884 年(光绪十年)爆发了反抗法国侵略的中法战争,河南防军精锐被抽调去广西和直隶防守国门,全国南北各省反侵略斗争迅即高涨,南阳城乡也掀起新的反抗“天诛教”的热浪。(因天主教长期以来由法国掌握,在华教务是法国殖民政策的组成部分)士、农、工、商,不令而动,积极准备,择日逐杀洋教士,拆毁洋教堂,以实际行动参加广西边外的抗法战争。吓得主教安西满赶忙离开靳岗老巢,避逃于湖北武昌。南阳府、县官员也异常惶恐,一面派兵“时时保护”教堂,一面对士民“竭力开导,舌敝唇焦”(不断恐吓、诱骗),连续五六个月,均“有日不暇给之势”,真可谓使尽浑身解数,总算直到中法战争结束都没有发生大事故。

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历来是得寸进尺的,但是在南阳“还堂”上,却因南阳人民万众一心,始终据理严拒,最后黔驴技穷,不得不于 1894 年以准其在靳岗教堂四周建筑寨墙“自卫”为条件,“永远不索”城内江浙会馆。次年,靳岗教堂寨墙筑成(实际上是加高、加厚、加固),所需费用均由南阳官府支付。延续 30 多年的“南阳还堂案”遂以南阳人民获得胜利而告终。

此类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也在省内其他一些州县展开。如:

1864年（同治三年），汝阳、唐县、桐柏等地，绅民联合行动，闯闹天主堂，殴辱不法教民。

1865年（同治四年），鹿邑人民驱逐入境传教的洋教士穆裕农，经县衙派县役将穆送回南阳，路经赊旗时，当地人民也群起撵逐。

1866年（同治五年），桐柏平氏镇、南阳桐河寨人民群聚，拆毁天主堂，殴逐传教士。镇民燕潭、贫苦农民王中元等，拒交教堂霸占的土地的租粮。

1872年（同治十一年），禹州人民群起抵制入境买屋建堂的传教士，并惩办与其勾通的教民。

1873年（同治十二年），蕲岗教堂副主教安西满来省城讹诈，开封人民闻讯，即以“豫省四乡民人”名义张贴告白，指斥天主教“混乱豫省，遗害商民”，号召民众齐心反抗，“有不向前者，决非人类；凡赁房屋予夷人居住者，定抄没其家”。城乡民众多起而响应，准备集议抵制办法，吓得安西满仓皇逃离省城。随后，绅民又以“豫省士农工商满汉回民”名义公刊条规，指斥洋人包藏祸心，咸丰年间攻占北京，烧毁圆明园，实为中国“国仇”，河南人民“誓不与共戴天”；规定黄河船户不准载其渡河，寺院、旅店不准让其留宿，城乡宅地不准向其典卖，即“英夷银钱”亦禁其在市面行用。

1876年（光绪二年），云南边境发生反抗英国入窥的“马嘉里事件”。河南人民也同仇敌忾，许多州县都出现各种“闹教”揭帖和其他宣传品，酝酿驱逐洋教士。

1880年（光绪六年），英国基督教浸礼会牧师入开封传教，被市民逐走。

1881年（光绪七年），豫皖边境的民间结社“末后一著教”在汝宁和皖北组织群众，准备袭击亳州天主堂。

进入19世纪90年代，长江流域各省哥老会组织大规模的反洋教起事，并去香港购运枪械，河南邓州、开封等地的哥老会山堂也参与其中，被相关各省官府发觉而遭破坏。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卫辉士绅戴楷等闻知天主教豫北教区主



教贺安德在城内买地盖房，遂联络街邻，以“阖邑绅民”名义发布揭帖，谴责“洋人入境，名为设教，实则坏教，名为通商，实则欺商”，故此公议各处店铺不与洋人交易，饭铺旅店不让洋人吃住，“庶使洋人不得入境，祸患不致贻于将来”。

这些连续发动的“闹教”事件，虽以反对外国教会为具体目标，但均矛头指向“国仇”——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具有民族自卫性质；除去个别秘密会社借此聚众、准备起事外，一般都不把斗争矛头指向清朝封建统治。因而与前列反封建斗争不同，参加的社会阶层比较广泛，除作为主力的城乡劳动群众外，一部分地主士绅和儒生也投身其中，有些且往往成倡导者。这些士绅以“大清子民”自居，主要是从保卫封建“纲纪伦常”、孔孟“圣道”出发，甚至视基督教类同“发逆”（太平天国也崇奉基督、上帝），担心会危害中国的封建统治；即使下层群众也不同程度地受河南“遇洋即反”的保守风习影响，存在着笼统的排外主义，不少人还被洋教堂拐骗儿童和“挖心剜目”等流言所耸动。这里面，有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碰撞，但更主要的，乃是由于前述洋教士、洋教堂的殖民主义活动激成的，是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全国性的民族矛盾——中国人民与资本主义侵略者的矛盾上升的反映。正因为此，同一时期在南北其他省区，类似性质的群众性“闹教”事件都频繁发生，特别是 1894—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后，随着民族矛盾的空前激化，以反对外国教会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人民反帝斗争更迅速地走向高潮，有的且发展成为大规模的人民起义，最后汇集成 1900 年震动中外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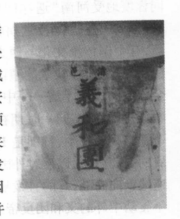
义和团（初期叫义和拳）1899 年兴起于山东，次年初转入直隶，很快就席卷全省，并控制了京津地区，其纲领性口号是“扶清灭洋”。各省人民纷起响应，尤其是北方各省，群众性的反洋教、反侵略斗争更蓬勃开展。在河南，如信阳的“大刀会”，1899 年就打出“助清灭洋”旗帜，开展反帝斗争；林县人民也互相联络，准备驱逐洋教士，牧师司戴望等仓皇逃出县境。义和团进入京津后，不久就顺着卫河、黄河，传入豫北和豫东，随之就出现一股全省性的反帝热潮。但一则因义和团都奋

战在京津反侵略最前线，来豫聚众设坛者很少；二则由于河南各级官府和地方豪绅多方防范和镇压，所以河南人民正式打出义和团旗号的不多，大都均一如既往，用群众性的“烧堂毁教”形式开展。

1900 年（光绪二十六年）夏，河南广大地区苦旱，包括省城开封在内的许多州县，民间就传播“杀了洋人头，猛雨往下流”的反帝歌谣，汝南一带，刘二磨等聚众扒教堂，逐洋人。7 月，八国联军进犯天津、北京的消息传来，河南人民群情激愤，随即在大河南北掀起一场猛烈的反帝风暴。

清廷镇压人民闹教的谕令

7 月 6 日，南阳农民 7 000 多人，手持刀矛、棍棒、农具，打着三角形旗帜，高喊“扒洋楼，报冤仇”的口号，围住了靳岗教堂，惩处了外围一些不法教民。部分群众进入南阳城内，拆毁几家助纣为虐的教民房屋。主教安西满聚集上千教民，配以洋枪，依托寨墙顽抗，同时派教士约翰押运 40 车教堂积聚起来的财物，转移湖北。行经新店时，被群众发现、堵截。约翰蛮横挑衅，杀死民众一人，因而激起众怒，大伙一拥而上，将约翰击毙，并把“洋车”砸毁。



清丰义和团团旗

围困靳岗的群众虽然人数众多，但毕竟没有组织和统一指挥，加上没有有效火器，所以连续 3 日，均难破寨。四乡群众越聚越多，妇女老弱，也都不召而来，总数有数万人。满嘴“仁慈”的安西满下令开枪抗拒，并派徒党乘马持枪，出寨打死、打伤和捕捉农民多人。民众更加愤怒，乡村联庄会鸣炮聚众，发布揭帖，准备更大规模的斗争。官府赶调南阳镇总兵尹嘉宾率部进驻白龙庙一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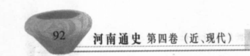


威胁、镇压，同时又勾结联庄会士绅诱骗群众解围，靳岗教堂遂得以幸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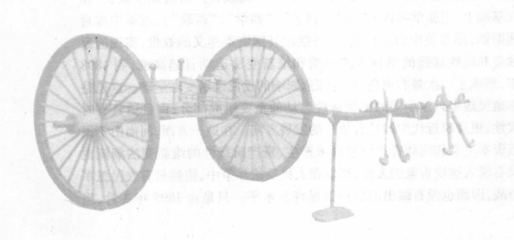
7月24日，确山人民聚集3 000多人，围攻韩庄教堂。堂内天主教士驱策教徒进行顽抗，随后又冲出堂外，凶暴反扑，双方互有伤亡。当晚，一个姓陈的农民潜入庄内，点燃教堂火药库，群众士气更振。25日，周围数十里内村庄群众，都纷集韩庄助攻，终于将教堂攻下，教士乘隙外逃。

在南阳、确山人民围攻教堂前后，其他有外国教士、教堂的州县，如西华、商城、汤阴、内黄、安阳、汲县、滑县、辉县、新乡、获嘉、淮宁、夏邑、光州、杞县、汝阳、南召、舞阳、桐柏、镇平、裕州、叶县、睢州、襄城、遂平、禹州、商水、唐县、泌阳等地，都发生了规模不等的群众性反洋教斗争，不少天主教堂、耶稣教堂均被捣毁，一些教徒也悔悟脱教，交会而成一次全省性的反帝爱国运动，给以洋教士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总起来看，19世纪末叶，以太平天国、捻军为中心的农民起义高潮过后，河南人民的反封建、反侵略斗争一直是持续不断的，成为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出河南人民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历史传统和不甘屈辱、共御外侮的爱国精神。但就全局来说，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有一个重要内容，那就是新的经济力量——民族资本主义和新的政治力量——民族资产阶级逐步成长，在此基础上，主张学习西方（包括“西艺”、“西学”、“西政”），改革中国封建旧制，逐步使中国近代化，最终摆脱外国资本主义的奴役，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的维新变法思潮和维新变法运动日趋高涨，到1898年，形成了一次颇有声色、也有深远影响的戊戌维新变法运动。这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更具有时代性，更反映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在这一方面，河南由于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尚未产生，资产阶级性的维新变法潮流也没有涌入这块古老的大地，所以在人民反抗斗争中，依然只有农民孤军奋战，因而也没有跳出旧窠臼而显现新水平。只是在1895年3月，当



康有为等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要求清廷变法救亡时，几个河南在京应试的举人也列名其中，但因害怕顽固势力的镇压，很快就退出了。1898 年 4 月，康有为等在京组织保国会以推进维新变法运动时，一些豫籍人士，如汲县何兰芳、固始秦树芬等也参加在内，共商强国保种、变法图强之策。但在河南省内，直到戊戌维新运动进入高潮，无论在官场和士绅中，都不见有什么反响（如果说稍有回应，也不过是省当局在接到清廷兴学诏书后，在开封宋门内大王庙后划出一片空地，立上几块“河南中学堂地界”的石条，借以应付，实未开办），显得河南特别闭塞和后进。当然，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在接着到来的 20 世纪，情况就有了变化。



第三十六章
20 世纪初期的新形势和新变化

第一节　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

一、劫夺矿藏和铁路

19 世纪末，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向帝国主义过渡，其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侵略和争夺也随之加剧，清廷被驯化成“洋人的朝廷”。正是处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早先因远离江海而暂免帝国主义就近撕咬的河南，也成为其经济侵略势力的直接掠夺对象。除了外国教会大大扩大其在中原的地盘外，帝国主义又通过修筑铁路、开挖矿藏，向河南输出资本，并以铁路为吸血管加紧经济掠夺，从而给这个以往相对宁静的内陆省份带来前所未有的震荡，也给此后社会历史的发展带来深广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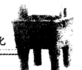
（一）英国福公司掠夺豫北煤矿

河南矿藏丰富，尤其是煤炭资源分布很广，品质又好，因此久为帝国主义所垂涎。1895 年中日《马关条约》给予外国来华设厂的权利，次年，即有意大利人安杰格·罗沙第来河南、山西调查矿藏。随后，罗沙第赶往英国伦敦，联络一批权贵、富豪，组建起“北京辛迪加”——福公司，在英国注册后，于伦敦设立了门面。1897 年（光绪二十三年），罗沙第复至中国，在天津设立福公司办事机构，并与英、意驻北京使馆取得

密切联系。在英、意使馆的资助下,罗沙第很快就在中国官场中,拉拢上翰林院检讨吴式钊、分省补用道程恩培,一起虚构了一个子虚乌有的“豫丰公司”,于秋间炮制出合同草案 9 条,由意大利驻京使馆盖章作保,让吴、程以“华董”身份,托称向福公司借款 1 000 万两,找河南巡抚刘树堂承揽开矿事务。刘于 1898 年 3 月 1 日将此草合同上奏清廷,要求允准。昏聩而又媚外的清廷,即让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奕劻等“以国家最尊严之执政者”身份,在京与罗沙第议订合同章程 20 条,其第一条即给予“豫丰公司”(实即福公司)“专办怀庆左右黄河以北诸山各矿”之权,为英国资本攫夺豫北矿藏敞开了大门。

1899 年,福公司派出勘探队 10 余人进入豫北,不仅在“怀庆左右”勘测,而且遍及洛阳、新安、渑池、陕州、灵宝、阌乡、汝州、襄城、南阳等广阔地域。时任河南巡抚的裕长感到福公司居心叵测,其作为“核与前定合同迥不相侔”,但也无可奈何。只因不久以后发生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福公司才拖至 1901 年 9 月,向河南统治当局提出给予修武县老牛河矿地开采凭单的要求。时任河南巡抚的松寿,因该公司的要求过于笼统,没有指明哪一乡、哪座山、哪种矿,所以提出应待该公司矿师勘定地界后再行计议。福公司却急不可待,悍然于 1902 年 6 月,擅自在老牛河附近的下白作村开办矿厂,以其总董哲美森之名,命名为哲美森厂——中方称之为泽煤盛厂,并运置机器,强行开凿,由此扎下了霸占豫北煤矿的根基。

1903 年 8 月,福公司送出所勘矿区地图,用红线画出区界(即所谓“红界”),要河南巡抚发给开采凭单。巡抚陈夔龙因其所划矿区总面积达 120 多平方里,不敢率尔允准。经反复交涉,最后改用黄线在福公司交来的矿图上画出总面积约 57 平方里的矿区(所谓“黄界”),并发给开采凭单,但仍预留缺口:“嗣后如黄界不敷一矿之用,将来于红界内另请凭单。”英国资本独占的焦作煤矿就此正式成立。随后,福公司大肆经营,野蛮地掠夺地下宝藏,“于人民土地所有,并不明向地主议



价购买，往往迫令矿工恣意吞侵”，致使大片农田纵横坼裂，难以耕种[1]，处处表现出帝国主义劫掠的本性。

福公司上述活动不单纯是一种经济侵略；联系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中外关系，就可知道其中还有更重要的含义。

1. 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正在成长，在起步较晚的河南，其力量尤为幼弱。而矿业在河南已有一千数百年的开采史，是本省资本主义因素最集中的一个产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较快地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矿业。福公司霸占了焦作煤矿，十来年间投入了1 400多万元巨资（约占1895—1907年英国在华厂矿投资总额的1/3以上），相当于同一时期本省4个民族资本主义煤矿资本总额的3.5倍，加上技术上的巨大优势、英国政府的支持和清朝官府的“保护”，更使民族资本主义的煤矿相形见绌，步履艰难，极大地妨碍了民族矿业的发展。

2. 当时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正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河南正处在以俄、法为一方与以英国为另一方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激烈争夺之下。福公司掠夺了豫北煤矿和相应的铁路修筑权，那就意味着要将河南并入英国的势力范围（主要在长江流域）。对于英国的政治野心，多年参与福公司矿务交涉的胡汝麟就有切身体验：“盖福公司名为商业机关，实含有政治意味也……以营业论，将变（黄）河北为英国商业之中心点；以政治论，其势之洪大不可限量。”其尤骇人听闻者，是该公司将矿区称为“租界”，要求中国官府仿照沪、汉租界工部局章程，设立巡警，“其心目中尚有中国主权在耶”[2]？为此，福公司自行在矿区设置武装警卫一队，每日上午8时，都让他们列队向英国国旗致敬，其总工程师利德，还志得意满地叫嚷：“福公司一旦在河南把英国的旗帜挂起来以后，就不愿把它取下来让给俄国或其他任何人。”[3]所以无论从经济上或从政治上说，福公司入踞豫北，其意义均非一般，难怪英国政府对

① 《修武县志》卷十一，第16页，民国20年新乡修文印刷所铅印本。

② 胡汝麟：《福公司矿案述略》，河南省档案馆藏抄本。

③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第86页，中华书局，1962。

此十分看重，除由英国驻京使馆出面，推荐英国原驻上海总领事哲美森出任该公司董事长外，还连年力助该公司索要矿权。河南省内外对此“众议沸腾”，吴式钊、刘树堂等也屡遭朝野唾骂，“力请停办”福公司的呼声很高，驻京英国公使馆却恪遵其政府“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的指示，再三“催迫”清廷外务部，迫河南巡抚就范，甚至胁迫清廷取消吴式钊等因屡受弹劾而给予的惩处，其贪婪和蛮横再一次暴露无遗。

3. 福公司在与所谓“豫丰公司”签订的章程中定明：所采之煤，按5%的税率交纳出井税，另于所得净利中提25%交解清政府，且须于“开采之始”即由福公司出资开办路矿铁路学堂。可是福公司只设厂采煤，1906年后且已出煤销售，却借口“投资甚巨，收效甚迟，所提三项，未便承认”，拒不履行上述义务。赖到1908年，河南交涉局派人与福公司交涉，公司总董白莱喜又借口原合同当事人为豫丰公司，拒绝与河南交涉局商谈。河南官方改派杨敬宸、严良炳作为河南巡抚代表再赴天津与白莱喜商办，白只好在1909年2月与杨、严签订《见煤后办事专条》，承诺在见煤之日起，每吨纳税银5分，矿路学堂则于是年春季开办，至于“报效”25%的净利则只字不提。《专条》又规定，福公司所出之煤，“遵照通商条约，不在内地开设行栈卖煤”。但白莱喜很快翻悔后一条规定，要杨、严与之“续议”。杨、严在其威胁利诱下，复于4月1日与白商定补充条款2条，明定华商可以自去该矿买煤，只是每人所购至少在20吨以上（后经多方争持，改为100吨以上）。这样，福公司就可凭借机器开采的优势，扼杀豫北大批土煤窑，进而独霸豫北煤矿，其用心是十分险恶的。

（二）帝国主义对铁路的争夺

这里只说有关河南的芦（京）汉铁路、汴洛铁路、道清铁路以及浦（口）信（阳）铁路。其中的芦汉铁路早在19世纪末经英、德、俄、法等国激烈争夺后，清廷于1897年5月与比利时财团（实归俄、法掌握）签订芦汉铁路借款合同，将这条南北干线出卖给俄、法。随后，该路即从南北两端同时赶筑，1906年夏郑州黄河铁桥建成，全线通车。（以后复南伸入粤，延长为京广铁路）



1898年8月(光绪二十四年七月),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向清廷索要5条铁路的承筑权,其中有河南、山西两省至长江,浦口至信阳各一条。清廷同意让督办铁路的大臣盛宣怀"与英商议办"。次年1月,盛与英国财团签订了《修筑浦信铁路草合同》。但对前一条铁路,清廷表示"应俟福公司开办矿工后"再议。可是福公司为掠夺豫北煤矿的需要,就悍然决定先修道(口)清(化)铁路。为此,1899年11月,英国政府特训令其驻北京公使朱尔典,要他"对中国政府施以压力",迫其接受福公司的计划。已成为"洋人的朝廷"的清朝统治者只好允准,并由外务部电告河南。1902年8月,与福公司订立道清铁路章程,给该公司道清铁路修筑权。1902年6月动工,至1906年2月全线告成,总长154公里,说是专供福公司运输煤炭之用。但福公司并不以此为满足,1905年诱胁清政府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与之签订《道清铁路借款合同》,以中国铁路公司向福公司借款70万镑(9折交付,实得63万镑)的形式,名义上收归中国自办,而按年息5厘向福公司交付利息。一个英国人评论此事称:"这样的合同对于福公司是非常有利的。因为根据这个合同,福公司不仅获得了非常优惠的利率,同时又收回了所花的资本,而且根据合同的规定,福公司得建筑铁路并有60年的所有权。"[①]真可谓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又一个"文明杰作"。

至于汴洛铁路,原来是由盛宣怀主持的中国铁路公司筹款修筑的。随后俄、法因清廷给予英国修筑浦信、道清铁路之权,也要挟清廷将汴洛路的修筑权给予比利时,于是1903年11月12日(光绪二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俄、法又以比国资本作幌子,由盛宣怀与比利时合股公司代表芦法尔,签订了汴洛铁路《借款合同》和《行车合同》,规定由比公司提供借款2 500万法郎,9折付款,年息5厘,30年还清,以本路财产及进款为担保,全路由比公司包办;并规定,以后如西展至西安,比公司亦有承筑的优先权。这样,这条横贯河南的铁路干线(以后东西向延伸为陇海铁路),又轻易地被清王朝拍卖给了帝国主义。

① 肯德:《中国铁路发展史》,中译本,第121页,三联书店,1958。

作为近代先进交通设施的铁路，在河南陆续修筑，如同列宁所说，似乎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传播文明的事业，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线索像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变成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进行压迫的工具①。一个英国人在其《远东的交通》一书中，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直言不讳地指出："不论在任何情形下，对于中国的逐渐征服，正和这个国家中的新式交通的发展保持着同一的步骤的。"②当时，国人对此更有实际的体验，认识到帝国主义要分割中国，"莫如夺其重要之铁路，则不必显招分割之名，而阴享分割之实。比年以来，各国势力范围之划定，实借攘夺铁路、矿产为张本"③。芦汉、道清、汴洛等铁路以及豫北矿产之被帝国主义所攫夺，不仅意味着他们以此为吸血管，变本加厉地吸取河南人民的膏血，而且也意味着英、俄、法等国力图把河南划入各自的势力范围。无论从经济上、政治上说，都是帝国主义势力长足深入和河南加速半殖民地化的反映。

二、洋货泛滥和原料掠夺

如果说，以前由于河南地处内陆，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势力一时难以深入各府县的话，那么随着铁路的修筑，就一变而为门户洞开；清廷对东西帝国主义各国又"普示怀柔"，来者不拒，于是各类"洋人"、"洋商"和"洋教士""持照来豫游历者，络绎于道"④。他们不顾中外条约的规定，先是在铁路沿线、进而在四周各城镇开设洋行、商铺、货栈，大事扩展其经济侵略。如英美烟公司天津部代理商刘耀庭，于 1909 年在彰德设"德聚成"商号；汉口代理商蒋国清，于 1907 年来信阳、光州等地设置英美烟公司货栈。这些外国商行、公司和买办商人的所作所为，可从郾城人士的记述中略见一斑：芦汉铁路一通至漯河，即有多家"洋行"、"洋行堆栈"、"华洋公司"来此开张，他们"不来县（衙）请验照票，亦未奉有行知，辄挂贴招牌，任意开设，买卖土货、洋货，并代客包运

①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733 页，人民出版社，1960。
② 陈晖：《铁路建设对于中国农村经济的影响》，载《中国农村》第 2 卷第 7 期。
③ 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 3 卷，第 983 页，中华书局，1963。
④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总第 4315 页，中华书局，1958。

货物,承揽车船,人众势强,动辄滋事,欺压商民,垄断罔利,习以为常。其他如窝娼聚赌,酗酒打架,及与铁路、邮政争殴肇衅等事,不一而足。迨至控官传讯,直称地方官不能管理,洋行不服传唤。即漯河向章,筑堤、修路、巡警、支更各项地方有益公事,亦不曾与本地行铺一律摊捐。种种悖谬,不可枚举"①。这些"华洋公司"在各城镇土著商铺物色或培植代理商号,替他们推销洋货。

这样,帝国主义利用铁路提供的便利,很快在大河南北编织起倾销洋货和购运原料的网络。1908年报纸报道说:河南过去闭塞,"现在铁路四达,民智日辟,凡捆载而运出于各处者,皆原质精华之物,为制造近利赖,其灌输而来者,多适人嗜好之物,非日用所必需"②。尤其是"适人嗜好"的洋货,灌输更多。1905年,官方出版物在一篇"论说"中描述"豫省现状"称:"洋货山积,土货寥落,除花纱、呢羽、火油、色布大宗不计外,即日用零星,如针线、纽扣、铁钉、纸张之类,亦复充斥罗列。无论大小市镇,触目无非外货。"③可见外货灌输的势头确实是很猛的。

三、外国教会卷土重来

帝国主义利用天主、耶稣教会进行的侵略,在义和团运动过后也进一步加剧。首先是肆行反攻倒算,向河南有关州县和省府勒逼"赔偿"者"纷至沓来"。光黄河以北诸县,官方与洋教士议结而付给教堂、教民的"赔款"就近20万两,又粮食2 000多石;黄河以南诸县,"赔偿"银六七万两。这些赔款,不论以何种方式交付,最后都成倍地落在人民身上。同时又让省、县官府严惩义和团运动期间的"滋事各犯"。清廷还一再明令各级官吏加意"优待保护"外国教堂、教士和所有教民。外国教会更乘此时机,大肆拓广教务。天主教继1844年、1882年分别成立的河南教区、卫辉教区之后,1907年又新建豫西教区,特派意籍教士贾师谊为主教,总理河南(洛阳)府及陕、汝两州教务(总堂设在襄城)。

---

① 《郾城县记》卷三十,民国23年刊本。

② 上海《时报》,1908年6月11日。

③ 《河南官报》,第71期。

19世纪80年代中始在河南建堂的基督教，20多年来均因“本省民性反对甚烈，故发展弥迟”①，义和团运动后也大力推进，势力膨胀尤快。如加拿大长老会在19世纪末叶只能在卫河一带活动，“范围较狭，影响亦小”，义和团运动后“卷土重来，将其传教中心移至平汉路彰、卫两府，广购教产，大兴土木，其势乃张”②。除19世纪末叶已在河南建堂传教的4个教派外，英、美、加、德等国的其他教派也纷至沓来，其在河南的总堂，由义和团运动前的12个，增至1901—1910年的44个，包括长期因人民抵拒而难以设堂传教的开封省城，1902年后也建起了耶稣堂。这些洋教士“视（中国）官吏如土芥，弃条约若弁髦”③，以殖民主义老爷自居，颐指气使，为所欲为。在这些洋老爷的怂恿和庇护下，各地不法之徒（包括一些不法官吏）竞相“投教”，狼狈为奸，鱼肉乡里，以致“教堂俨如租界，教徒犹如外人”④，其践踏中国主权，干涉地方行政、司法和欺压城乡人民的恶行，较以前更大有过之，甚至像河南巡抚这样的“封疆大吏”的去留，安西满等洋教士也要干预，由此引起城乡人民更大的敌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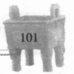
总之，20世纪初叶，随着河南门户洞开，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宗教侵略势力均以空前的速度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四处延伸，给各阶级、阶层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以至文化习俗都带来深广的影响，大大加速了河南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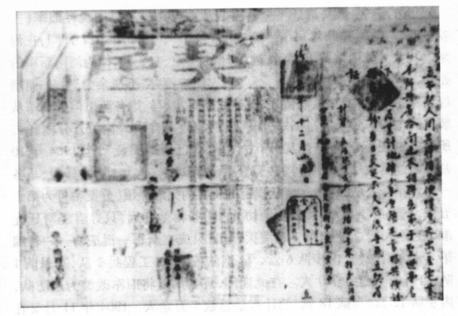
第二节 在“维新新政”的旗号下

一、“新政”种种

与帝国主义侵略深入的同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王朝则打出

① 白眉初：《河南省志》卷六（抄本）。
② 河南《民国日报》，1932年1月25日。
③ 《河南官报》，总第350期。
④ 河南《民国日报》，1932年1月25日。





天主堂强买民房契约

“维新”的旗号，推行种种“新政”，河南社会历史的发展，因此也具有更鲜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特征。

1901 年（光绪二十七年）年初，逃居西安的清廷发布上谕，谕令内外臣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条议“变法”方案①。随后，清廷综合各方条议，于中枢特设“督办政务处”，筹划和督导全国“新政”。由此开展的“维新新政”涉及面虽广，“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都在改革之列，使国家机器更加符合半殖民地半封建体制，“渐致富强”——有足够的力量镇压迅趋高涨的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河南这个过去无论在洋务运动或戊戌变法时期均很少变动的内地省份，从 20 世纪初开始，也逐次推行“维新新政”，其重心也是筹饷练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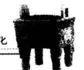
①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总第 4601—4602 页，中华书局，1958。

1901 年 9 月中,清廷下令各省裁汰业已腐朽不堪的现存旧军(主要是练军、防军和绿营),编练新式"常备军"。1903 年 6、7 月间,在河南巡抚张人骏的主持下,募成新军步队中、左、右 3 营,作为河南新军的始基。以后继任巡抚的陈夔龙复"昕夕图维筹办,不遗余力"①,一面增练新军,一面将旧军汰弱留强,扩建成新军步、马、炮各队。但因新军从装备到饷给都远远高过旧军,而河南财政收入有限,"饷源万分枯窘",所以进展较慢,虽经省当局"百方设措,固已力尽筋疲",至 1904 年 10 月才勉强凑成一协(8 营),共有官兵 4 670 名。次年,复增募炮、马各一营和军乐一队,仍然离清廷规定的 4 年内完成 1 镇(分发番号为第十五镇,下辖第二十九、第三十两协)的任务相差甚远,只好奏经清廷允准"展限办理"。直至清王朝覆灭,全省只成立新军一混成协——暂编第二十九混成协,内步队 6 营,马、炮队各 2 营,工程兵 2 队,军乐队 1 队,合计官兵近 6 000 人。在此期间,省当局复将旧军改编为巡防队,内步队 22 营,马队 18 营,约计官兵总数 1 万余人。1904 年 11 月又在开封南关开办河南武备学堂,以培训初级官弁。因为这种新军无论编制、装备、训练等,均效法西方,较之"势类乌合"的旧有防、练各军自然更为得力。从河南的军事制度上说,这也是由传统的封建军制转向近代军制的开始。

在"练兵"的同时,又仿效"西政"创办巡警。最先是 1904 年(光绪三十年)在开封省城试办,随后推广于许州等 5 直隶州州城、商丘等 8 府的"首县"以及淅川厅和周家口镇,进而在其他一些城镇也陆续筹办,另在各条铁路沿线,设置铁路巡警。为此,省府特于 1909 年照章增设巡警道一员,统管全省警政,进一步加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机器。

为了"振兴商务,奖励实业",河南当局谕于 1903 年设置商务农工总局和矿务总局,"要以改良已有之工,创办未有之工为主"。官方出版物也多次载文,阐述河南振兴工艺实业之重要,"如纺纱、织布、丝

① 陈夔龙:《庸庵尚书奏议》卷四,第 16 页。



业、火油各厂，当鸠集公司，集股开办，其余木机、手制各工艺，如毛巾、花毯、地毡、牛羊毛毯、地席、草帽、漆具、木器、洋铁器具之属，各州县宜一律创设"[1]。随后，又让各县筹设实业学堂和工艺厂、习艺所，组建公司，从事纺纱、磨面、纺麻、卷烟、陶器、开矿、烧碱各业，并颁发《实业社会章程》，表示统治当局关心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牧业的发展。

在兴学方面，清廷于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即谕令各省于省城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筹设中学堂，州县筹设小学堂。1903年又颁发《钦定学堂章程》（通称"癸卯学制"），规定了各类学堂等级和规制。河南巡抚锡良遂于1904年秋，将开封一处旧武官衙门改建为河南大学堂（后遵章改称高等学堂），当年招生开学，并令各府州县也按照朝廷功令开办学堂。1905年，清廷又下令废除科举制度，广兴各类学堂。河南当局也于省城设置学务公所，推广学务；办师范学堂，培养师资。新设的提学使复颁发的《劝谕兴学告示》，要求各府州县地方官去除"敷衍"积习，城乡绅耆也"各尽天职"，共同筹款办学。随之，全省各级各类新式学堂也开办渐广，传统的封建教育逐步被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所取代。

二、花样翻新的"筹款"

"练兵"必先"筹饷"，"兴学"必须"筹款"，其他各项"新政"也莫不增添大笔新的耗费（正常经费和多方糜费）。这就给河南财政带来前所未有的重负，也给城乡人民带来新的灾难。

河南财政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基本上还能收支平衡，中日甲午战争后，局面剧变。一则清廷每年要河南协济甘肃军饷银61万两，协济京郊武卫军银12万两，摊交外债本息银50万两，致使河南财政支绌严重。进入20世纪后，清廷又加派河南每年解送《辛丑条约》中规定的赔款银90万两，中枢练兵经费银40万两，出洋考察经费银5万两，海军开办经费银64万两（分4年解清），海军常年经费银8万两。而河南全省最主要的财政收入——地丁，全年不过二百四五十万两（额征

① 《河南官报》，光绪三十年第六期《论说》。

350 多万两），加上其他搜刮所得，总收入也不过四百二三十万两。为了支应上列这些强摊给河南的巨额财政支出，据 1903 年巡抚陈夔龙陈奏，说"本省可筹之款，频年搜刮一空"①，如今又开办各项新政，随后筹办预备立宪事宜，又增加巨额开销，光"练兵"一项，常年军饷（不含创建经费）就需银 100 万两，加上旧军军饷，年需 190 多万两，"用款浩繁，实为向年所未有"②。据报，到 1908 年、1909 年间，省库财政支出 900 多万两，而财政收入经多方"开源"（增加搜刮）后仍不过六七百万两，所以"司库万分支绌"。当局因应之方，就是增加搜刮，竭泽而渔。在省府开封，专设"筹款所"、"清源局"等新机构，多方"开源"：加征旧有赋税，开创新的苛杂，其名目之多，榨取之酷，都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拿原有旧税来说，据 1904 年奏报，钱粮每正额银 1 两，即已加至 1 两 5 钱至 2 两余；杂税，旧章税率为 3%，而实抽 6%—12% 或更高（均按商铺资本或买典房地契价）；食盐户口捐（"盐斤加价"）从 1901—1908 年间，连续加价 4 次，每斤共加税 13 文，是 1867—1897 年的加价 4 文税的 3 倍以上。

至于各地"就地设法"而创行的新税，名目更加繁多，就连当时的人们也诉述不清。从现存的片段资料来看，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类：

一类是"就出产之物而抽收"者，如枣捐、瓜子捐、花生捐、柿饼捐、棉花捐、柳条捐，等等；

二类是"因特定之事而抽收"者，如戏捐、会捐、庙捐、巡警捐、册书捐，等等；

三类是"抽于花户者"，如串票捐、税契捐、亩捐、房捐、随粮捐，等等；

四类是"抽于坐贾者"，如商捐、斗捐、油捐、铺捐、粮坊捐，等等。

---

① 陈夔龙：《庸庵尚书奏议》卷三，第 26 页。
② 甘厚慈：《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卷十一，第 31 页，宣统二年刊本。



据1909年(宣统元年)官方报告,全省有各种名目的新创杂税三四十种,全年收入银约10万两。这里面有很大的隐漏,如长葛一县,开征学务捐、烟酒税等10余种,而官方报告只开列2种。依此类推,总税人当不下四五十万两。按照当时社会公认的官场"获十报一"的通例,人民实际支付的税款当不下四五百万两,相当于田赋的两倍。其中的绝大部分,最后都直接或间接地落到占总人口95%以上的农民身上,即令"抽之于坐贾者"也不例外。

三、"民不聊生"

在如此这般的情势下,河南人民的生活必然进一步贫困化,农业生产也必然每况愈下。上蔡一个知县报告辖境"富者日见其贫,贫者不见其富","小贸则无以为生,佣力则雇觅极少"①。在全省各州县,都少有例外,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据地方人士约计,各阶层人民中,有粮食足供1年吃食者不过1%。宣统初,一个豫籍京官在综述河南社会情况时说:"自庚子(1900年)以后,百物踊贵,谋生日艰,游惰日众,富者率入于贫,贫者率流于盗。"②这些出自不同方面的呼喊和警报,众口一词地揭示了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共同造成的社会危机的严重性,较之太平天国和捻军大起义前夕有过之无不及。这就给正在迅速兴起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准备了深广的群众基础。

与农民生活贫困化互为因果的,是农业生产继续衰退,集中表现在:(1)水利愈益败坏,生产条件进一步恶化,土地利用率降低。因此如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官方出版物所记:"河南一遇雨泽,即有漫溢之害;一经不雨,即有亢旱之害……荒地之多,甲于他省。沙原斥卤、一望无垠者无论矣;或有平板低湿,偶受雨旱,漫成平坦者,皆南方膏腴水田之处,任其荒芜,实属可惜。且有村旁陇畔可耕之地,听其荒莱者……水利不修,高低皆能受害,故听其荒旷。"③(2)自然灾害加剧。据

① 徐寿兹:《学治识端》,第97、110页。

② 陈善同:《陈侍御奏稿》卷一,第4页。

③ 《河南官报》,总第123期。

一个信阳籍的京官奏报，称河南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以来，10 多年中光大水灾即有 3 次，“其余水灾无岁不有”①。至于亢旱，则更是无年或缺。(3)田地荒废加多。据本省巡抚在 20 世纪初奏报，说全省过去钱粮收入年 300 余万两，“近则荒田废地，无邑无之”，钱粮收入一年不过二百数十万两②。特别是沿黄二十余州县，“沙压荒地，一望无际”③。1910 年，河南咨议局综合省内 36 个州县册报，共有荒地 330 多万亩，如再加上 2/3 未报、未计入的州县，数字就会增大一两倍。(4)粮田耕作愈加粗放，收益减少。1905 年报刊记述，“今豫省之农，大都卤莽灭裂，田多之户，即不免草率竣功，田少者又以无力养牛，暂假于乡邻，谷种入土即已”④，



反映人民不堪重负的漫画

即使土脉肥沃之地，也“率岁歉收，一亩之田，未获得半之效”⑤。据报，全省在 1900 年、1905 年、1910 年，107 个州县中收成不满 6 成者，年均

① 陈善同：《陈侍御奏稿》卷二，第 41 页。
② 陈夔龙：《庸庵尚书奏议》卷三，第 4 页。
③ 《东方杂志》第 2 卷，第 5 期，“实业”，第 7 页。
④ 《河南官报》，总第 15 期。
⑤ 《东方杂志》，第 2 卷，第 5 期，“实业”。



有105个上下。所有这些,都反映出河南农业生产的继续衰退。

第三节　民族资本主义新经济的产生

一、商品市场的扩大

20世纪初,河南的经济和社会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其中最具时代特征的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自然经济的解体,以及在此基础上新的经济力量——民族资本主义和新的政治力量——民族资产阶级的诞生。

上章已经说到,河南虽地处腹里,但在19世纪末叶,因受多种因素影响,农业、手工业的商品性生产和城乡商品经济有较大的发展。进入20世纪后,随着铁路的修通和门户的洞开,与国内和国际市场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商品经济的新潮犹如涡轮一样,将"耕稼社会"的死水微澜冲激成喧动多变的市场波涛。如西平县,"自光绪末叶京汉路告成,运输便利,于是,本邑土产如芝麻、黄豆、小麦及牛羊皮等类,多为外来客商所采购,而洪河舟楫,东通汝、蔡,亦为懋迁之一助"[①]。豫东、豫东南和豫西南的油料和成油,也突破了以往地方初、中级市场的小天地,因"铁路既通,贩行甚远",除汉口商人入豫贩运的"络绎不绝"外,经周家口一地出境的芝麻油每年总值就达银100万两以上。豫北盛产棉花的安阳,所产棉花早先的销场主要在黄河以北各县,远运也不过开封、许昌。铁路修通后,北运天津,南向汉口,东去青岛、上海。一些无关紧要的商货,如赊旗镇的烧酒,亦随着铁路的联通而旺销外省,1907年销往两湖、两江、两广者年总值银40余万两。郑州、新郑、巩县、偃师、汜水一带所出的红枣、柿饼等干果,以前不过运销道口、周家口等地,此时也远运南北各省,"各处屯货,售运一空,莫不利市三倍"[②]。1906年,郑州一地外运红枣和棉花总值银300多万两,且呈方兴未艾之势。开

① 民国《西平县志》卷三十六,第10页,民国23年北平文华斋刻本。

② 《河南官报》,总第77期。

封1902年出现首家花生行，次年就发展到3家，宣统初增至7家，呈现出蒸蒸日上之势。1910年湖广总督瑞澂记述河南货物入鄂者，“铁道既通，交易繁盛百倍”①。就是小麦和杂粮，也进一步商品化，作为外埠粮食加工厂原料而被采运出境者与日俱增，尤其是铁路线上的州县，如安阳、卫辉等地，“京汉路轨交通后，运出粮食日多一日”，以致1910年省内粮价“较前数年增至一倍有余”②。豫南大米，据1906年报道，亦因“洋商贩买者多，价值陡涨”，每石（75公斤）涨幅也近1倍③。价格的上涨又进一步促进粮食生产的商品化。像驻马店一地，1904年时有粮行13家，至1911年，增至70余家，转运粮食的商家50户，另有面行9家、油行6家；长葛县城，在咸丰末年至光绪初年，新增粮行3家，至清末民初，新设粮行13家。粮行的成倍增加，从侧面映证出粮食生产商品化在本时期扩展之大。

至于全省每年出境商货增幅到底有多大，总值到底有多少，因资料欠缺，今已无法确知。从运销河南商货最多的汉口出口值变化情况来看，1904年总值为银700万两，1910年增至1 700万两，所增的1 000万两，主要来自河南，是豫鄂“交易繁盛百倍”的结果。如所销大豆，早先都来自湖南，此时基本上为河南大豆所取代。凡此种种，加上前已述及的外货灌输日广日增，都说明河南长期保持的封闭状态已有很大的改变，城乡经济与国内、国际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市场格局大为改观。

由此，在铁路线上就发展起一批新兴的商业城镇。如郾城的漯河，“自京汉路通行，舟车之所辐辏，商贾于此萃焉，视昔且倍蓰过之，因为都会矣”④；确山的驻马店，铁路通后，“遂变荒圻为繁市”⑤；许昌，“商

① 瑞澂：《恕斋尚书牍存·公牍》卷一，第34页。

② 民国《续安阳县志》卷三，第10页；《河南官报》，宣统二年第54期。

③ 天津《大公报》，1906年3月9日。

④ 民国《郾城县记》卷四，第18页，民国23年刊本。

⑤ 白眉初：《河南省志》卷三（抄本）。



业日形起色"[①];渑池10多年间,"城内商业较未通铁路以前发达一倍"[②];其他许多城镇,商业也因铁路而日趋繁荣。在此过程中,社会风气也逐渐改变。民国时期信阳人士有一段记述颇具代表性:"铁路既通,风气稍开矣,而士习近功利,务苟得,先贤谨朴力学之风日熄,次则藉商贾弋暴富,次则以劳力糊口;其服农者,往往辍耕太息,以人不敌出为苦,羡商贾若弗及。"[③]从士夫到农民,都以追逐"功利"、图取"暴富"为目标,这种观念和心态变化,正是传统旧式城镇演变为近代商业城镇的反映,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象征。

上述历史态势的出现,意味着河南传统的自给性经济,包括农业、手工业和各种副业,在时代新潮的冲击下,有了很大的改变。就农业来说,农民减少粮食种植而经营经济作物的是越来越多了,商品率越来越大了。据稍晚(1913年)日本人的调查,称临颍以下京汉路沿线河南各县每年共产大豆200万包(每包约70公斤),10余万包留供本地做种子和食用,其余的90%以上均外销汉口、上海、镇江等通商口岸,小部分运销省内各地区,其中外销汉口一埠的即达一百二三十万包。豫东中牟、陈留一带"老于农者"计算,每亩花生平均年产值相当于种植粮食的10余倍,所以,弃粮而改种花生者"日益加众"[④]。同样,在西平一带,因芝麻等油料销路日广,收益日大,"小民贪锥刀之利,往往逐末忘本,粮食各项因以播种渐稀"[⑤];在信阳一带,因国内外市场苎麻"颇畅销",各处农家"种家颇多"[⑥]。尤其是棉花,据1911年官方出版物报道,安阳(其西北诸乡,70%—80%土地植棉)、邓县、洛阳、通许、商水、孟县等地,年产值均达银700万两,还有不少州县年产总值也达到银二三百万两,这意味着又有更多的粮田改种供出卖的经济作物。这种着

---

① 民国《许昌县志》卷六,第3页,宝兰斋石印本。
② 林传甲:《大中华河南地理志》,第248页,民国9年中华印刷局铅印本。
③ 民国《信阳县志采访稿·风俗》(稿本)。
④ 《支那省别全志·河南省》,第617—618页;开封《河南实业报》,1913年3月5日。
⑤ 《河南官报》,宣统二年,第10期。
⑥ 《河南官报》,总第286期。

眼于市场、着眼于交换价值（而不再像以往那样为了供应家人衣食，着眼于使用价值）的生产的发展，不断销蚀传统的自然经济，加速其解体。

不少手工业和副业也随着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和市场的扩大而有较大的发展。除去手工采煤业在豫北三府和其他产煤州县，土煤窑增开颇多外，像南阳的绸、纱、绉等丝织品因出洋日多，机房增开不少，20世纪初城郊织机即增至3 000多架，年产值银数十万两；南召绸亦远销上海，或售与“洋庄”（主要是俄国），年产值在20世纪初也达银十二三万两；镇平、鲁山等县，丝织业也有较大发展。再就是草帽辫，因市场扩大，且“资本薄而利厚，行销且多”①，所以较前发展更快，好些州县，“无论乡村、集市，老妇少女，皆以编草帽辫为业”②，且多按“洋式草辫”式样编制，以“洋庄”为主要销售对象，如鹿邑等重点产区，每年输出几十万斤。其他如光山一带，农家过去只制作粉条，行销本地和湖北，此时新制“粉丝”（粉皮），成捆运经汉口专输海外，年产总值银数万两。信阳一带的茶叶，20世纪初也开始发展，后来逐渐成为著名的产茶区。类似这些，都进一步活跃了河南的商品经济，加速了自然经济的解体。

不过，河南毕竟是个内陆省份，门户洞开为时较晚，历史上形成的自然经济比较强固，在19世纪受冲击又较小，所以即使在晚清的最后10余年，自然经济的保存程度仍远在南方和沿海诸多省份之上，尤其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结合，在绝大多数州县基本上都还保持或半保持。（不再用自纺土纱，而改用洋纱自织土布）洋布、染料、煤油等机制品虽在河南销路日辟，但主要见于水陆交通便利地区和少数富裕家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连买盐的余钱均费筹措，无力为“美观”和“应酬”购置“洋货”。加以习尚保守，风气迟开，自然经济更得以长期维系。

再就全省农、副、手工业的商品性生产和商货运销来看，较前虽有

① 民国《太康县志》卷二，第35页，民国22年铅印本。
② 民国《项城县志》卷五，第57页，民国3年石印本。



较大的发展，但仍然远欠充分。汴洛铁路在清末，连同客运在内，月收入也不过5万元；全省厘金在光绪最后三年每年收入总数也不过银20多万两，与南方商品经济发达省份年人数百万两者相距甚远。至宣统年间，厘金收数增至40万两，但很大程度上是增设卡局、加重征收所得。全省就总体上说，自然经济的"古风"仍比较浓厚，商品经济的发展还是初步的。

上述这一切，一方面给民族资本主义在河南的产生准备了历史前提，另一方面又使得这种迟生的新经济力量特别幼弱，成长特别缓慢。

二、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业的创办

"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①20世纪初叶河南封建的经济结构渐趋解体，给资本主义新经济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②尤其是摆脱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劳动者——自身劳动力的出卖者犹如汪洋大海，因此如一些投资者特别指明的，"人丁"花费（劳动力价格）只及上海的一层，条件尤为优越。在可变为资本的货币财富的积累上，河南虽尚未产生南方那种家有"巨资"的洋行买办，但有一批官僚、地主和商人敛积有可观的钱财，加以外省富豪也看好河南，所以也不乏购买生产资料、原料和劳动力的资本。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可以变为资本的货币财富三者兼具，在中原大地这个母体中孕育已久的河南民族资本主义幼婴，到了呱呱坠地的时候了。

助成这个幼婴降生的，还有一个历史际遇，那就是前已述及的清朝封建统治者的"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其有关条令和举措虽说大都是"应付功令"的官样文章，或旨在"裕饷"，但毕竟给各种"实业"（包括农、工、矿）的举办创造了较好的氛围，一定程度上起到"开启民智、鼓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3页，人民出版社，1972。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6页，人民出版社，1991。

舞商情”的作用。尤其是本时期在南北各省先后开展了很有声势的抵制美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以及拒法运动、反抗日本的“二辰丸”事件，“挽回利权”、“实业救国”，成为反帝爱国的一种重要途径，推动河南城乡有志之士致力于近代工矿业的创办。

于是，南方省区已于19世纪70年代降生的民族资本主义新经济，至20世纪初也于河南这个内陆省份降生。

河南最早出现的机器工业，是前已提及的河南机器局。该局（厂）系官方沿着洋务运动的故辙，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开办，次年投产。开办经费只银18万两，设备只30马力的引擎和45马力的汽炉各一部，仅“为旧存枪支制造子弹之用”。1898年扩建枪厂，1900年后添造枪炮。产品均用于装备本省防、练军和新军，常年经费均由省库官款拨付，无关国民生计。1902年，该局又添购铸铜元机器，于1902—1907年间铸造铜元供城乡市场需用，才与社会经济有直接联系。局厂完全官款、官办，虽有资本主义成分，但还不是民族资本主义企业。


河南机器局

民间最先使用机器的，据云是豫北的轧花业。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河南布政使署编印的《课吏录》中，有篇答卷述及彰德府“用机器轧花者多至数十家，闻其始自曲沟某姓”[①]。实际购用“机器”的时间，当早于这位作者所闻。只是情况不明，看来仍是使用人力的家庭作坊，并不是“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一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指挥下工作”[②]，因此，没有形成资本

① 瑞良鉴定：《中州课吏录》，癸卯年，第62页，光绪二十九年刊本。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58页，人民出版社，1991。



主义关系。

可以视为民族资本主义首家企业的，是 1902 年（光绪二十八年）禹州知州曹广权（一位有维新思想的浙籍官员，后去日本游学）创办的禹州三峰煤矿，资本银 5.4 万两，“以土法开采，用机器抽水”①。

以后，省内近代工矿业开办者不断增加。截至 1911 年，其大体情况分别列表如下：

（一）矿业（均为商办）

矿　别	开办时间	初期资本（万元）	创办人	备　考
禹州三峰煤矿公司	1902 年	5.4	曹广权 王猃林	
安阳六河沟煤矿	1903 年	银 20 万两	马吉森 谭士桢	初称“官煤矿”，1907 年改为公司，开始土法生产，1910 年后“用新法开采”。
密县煤矿	1906 年前		郝镜塘	称“机器煤窑”。
修武凭心煤矿	1906 年	23.8	靳法惠	1907 年入官股 20 万两。
汤阴崔沟煤矿	1906 年		叶怀古	1907 年购来机器。
武安信成煤矿	1907 年	3.2	马吉森	武安现属河北。
宜阳广益煤矿	1910 年	（数万元）	胡圣之 樊明庶	
汤阴宝善煤矿	1911 年	4.5	马强甫	

（二）工业（除注明者外，余均为商办）

厂　别	开办时间	初期资本（万元）	创办人	备　考
禹州钧窑瓷厂	1904 年	6.9	孙延林	内有官股。
道口继兴面粉公司	1904 年	5	唐玉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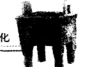
① 王锡彤：《燕豫萍踪》，民国刊本。

续表

厂　　别	开办时间	初期资本（万元）	创办人	备　　考
郑州京汉路机器厂	1904 年			官办。
修武京汉铁路工厂	1904 年			官办。后改"道清铁路汽机厂"。
开封耀华火柴厂	1905 年	2		
安阳广益纱厂	1905 年	70	马吉森等	1909 年开工。有纱锭 29 000 枚。
清化（榨油）实业公司	1906 年	2.8	程祖福	
周家口启新榨油厂	1907 年	1.4	丁殿邦 顾若愚	1910 年投产，不到一年即停。
开封普临电灯公司	1910 年	25	魏步云 杜光俊	
驻马店元丰蛋厂	宣统间		阮文中	
安阳元丰蛋业公司	同上		同上	
许昌元丰蛋厂	同上		同上	
安阳中兴电灯公司	同上		刘冠瀛	屡停。
巩县裕中瓷业公司	同上		刘欣恂	民初停。
新乡豫兴蛋厂	同上		赵忠发	不及三年停。

另外，还有些绅商也在时代新潮的推动下集资筹建矿、厂。如修武一带"本地绅富"在凤凰岭筹建中州铁矿厂，集股 2 万元作为开办经费，然后续招 40 万元，"期为富国之基础"①；豫南绅商组建豫南矿务华宝公司，拟集资 50 万两，开采信阳、禹州等地的铁、煤各矿；光山留学归来的陈世状等，"刻意经营"销路日广的火柴业，"集股甚多"②，在新店设立公司，禀请注册立案；候补知县王应元、道员徐积勋等、绅商王德茂和柯洪元等，或自行筹款，或招股集资数万或数十万元，拟在开封开办

① 汉口《中西报》，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日；上海《时报》，1907 年 7 月 2 日。
② 《江汉日报》，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十五日。



"电灯官局"、"豫华电灯公司"、"光豫合资(电灯)有限公司";京汉路包工头在安阳洪河屯办起翻砂厂,铸卖轧花机……这些"振兴实业"活动,涉及矿业、纺织(棉、丝)、面粉、火柴、陶瓷、水电等诸多行业。可以看出,当时在省内确实已经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兴办近代厂矿、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热潮。

积极参与兴办近代资本主义工矿业的,除一些工商业者(包括土煤窑主)和受过新式学堂教育的知识分子外,还有不少倾向维新,力图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士绅。后一部分人是主要投资者,也是兴办近代工矿业的主体力量。这些人大都是所谓"职商"——既有功名、官衔之"职",又有财力办实业之"商"。在前列诸厂矿(包括未曾办成者)中,创办人身份可以考知者,大都是这类"职商"。如马吉森、程祖福、孙延林、卢洪昶、徐积勋、梁掌卿诸人均为道员,谭士祯、黄玉、郑国贤等为知府或知州,周惟义为副将,姚仁光、李资明、王应元等均为知县。(均为职衔,而非实任官)由此可以窥知河南近代工矿业的初始阶段,资本的形成主要来自官僚、地主("广益"还有大学士孙家鼐投资),次之是旧时的工商业者,如煤窑主办煤矿,油商办榨油厂,等等。包括河南最大的工厂——广益纱厂在内的较大厂矿,多为前一部人所创办,表明这种经济与源远流长的封建旧经济关系特别密切,也表明河南民族资产阶级的初生代主要是由官僚、地主转化而来。

从数量上看,河南民族资本主义尤显幼弱。据统计,全国在1861—1894年间,有清政府官办的军事工业19个,其中在河南的只有1893年才创办的河南机器局一个;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工矿企业133个(包括官办煤矿),河南却是空白。进入20世纪初的10余年,近代民族工矿业虽出现前列诸家,但其资本总额不过200万元(后来有所增加,也不过二百二三十万元),而郑州一地1906年所产红枣总值就有300多万元,相当于全省近代工矿企业资本总额的150%,反衬出后者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实在很小。从全国来看,至1911年,近代工矿资本总额近1.6亿元,河南只占其中的1%强。另据1912年(民国元年)北京政府公布的数字,河南全省于农商部登记的工业资本总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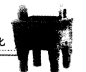
为92万元，而所登记的钱庄、典当等旧式金融业的资本总额则为286万元，超过前者的3倍。与此相关的是，河南近代民族工矿业的机器装备也很差，资本有机构成很低，有些等同于手工工场或土煤窑（少有机器，只用于抽水、提升），只有“广益”、“六河沟”等屈指可数的较大厂、矿，使用机器较多。所以从总体上说，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急需培育、扶植，才能使幼苗顺利成长。

三、民族工商业步履艰难

到了20世纪初，河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自然经济的解体程度，都明显地落后于沿海沿江省份。一方面是封建统治异常腐朽，城乡封建势力和保守习俗异常强固，各种封建盘剥异常苛重，广大人民异常贫困；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致使资本主义经济幼苗的生长土壤十分贫瘠。

与南方许多省区不同，河南城乡富户拥有的货币财富主要由封建地租和高利贷积累而成，数量固然远在南方诸多省区之下，而且又与封建经济结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加以风气闭塞，可以转化为近代工矿业资本的更属有限。1905年，一个县令在禀报“振兴实业”所遇到的难题时，就说道：“本县风气未开，民多守旧，间有一二绅商家道殷实，每议及凑集股份、创设工艺，莫不视为畏途，甚至谓集股即劝捐别名，率皆借词推诿，纵使谆谆开导，亦苦藐若罔闻。”[①]复因当时城乡地租和高利贷剥削率很高，多不愿舍旧图新。有些县份，如宜阳，凭借本地资源（煤矿），可以“经商获利”，但“地瘠民贫，殷实绅商寥寥无几，以致解囊入股之家，或二三股（每股10元），或三四股不等，求有投重资入股至1 000元以上者，宜城实难其选”[②]。类似情况，在省内一般州县也多存在。城镇官绅商人中虽有较大的集股能力，但因受封建习气影响，“往往吴人必招吴股，晋人必招晋股，以致经年积岁，开办无期”[③]。如转向

① 《河南官报》，总第52期。
② 开封《大中民报》，1912年5月22日。
③ 《河南官报》，总第71期。



外省集资，则因河南“阻力”太大，“故各省皆不敢投资”[①]。多方面不利因素的制约，使得资本的筹集特别困难。如本旨在抵制英国福公司、自保利权的修武宏豫公司，竟至凭借官府，用类似“派捐”的手段，“按各村分派担任”办矿经费[②]。因为资金欠缺，许多厂矿就不得不“全恃债款为挹注”。而在当时的河南，近代金融事业尚在萌发阶段，所以此种“债款”就只好求之于“官款”和“洋款”。而这种借着“奖励实业”的美名而放贷的官款，实际上却是窒息企业的高利贷。如“广益”借大清银行银30万两，每年就背上付息16.7万两的包袱，不管企业如何亏损，这“官息”是不能宽容分毫的。结果就如1918年该厂厂主所诉述：“历年以行本缺乏，受债权束缚，百孔千疮，左支右绌，往往明知吃亏，不得不隐忍将就，以顾目前者。操纵不能在我，措置敢谓咸宜?”[③]企业家再精明，也很难在这种高利贷的束缚中打出新天地。难怪“广益”厂主感慨系之地说：在豫北“经商之难，十倍于通商大埠”[④]。

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给河南民族资本主义带来成长“之难”的不止在资本的筹集方面，有间接的，如国民经济凋敝，人民购买力很低，市场狭小，劳动者文化技术水平低下(因而各企业“多费人力”)，等等。也有直接的，除“官利”的重负外，还有诸如：(1)重税。拿河南最有发展条件的采煤业来说，要按产值交纳5%的海关税、1.5%的常关税，另加每吨煤银0.1两的出井税、运销途中的厘金、火车捐等，还有各县官府、乡镇创设的地方杂捐，最后在“净存余利”中，再分别提取25%“报效国家”和支付煤田所属的地主。(2)攘夺。企业主惨淡经营，“一旦

---

① 江苏省商业厅：《中华民国商业档案资料汇编》，第442页，中国商业出版社，1991。

② 河南省统计学会等：《民国时期河南省统计资料》上册，第446、447页，内部资料，1987。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工矿》，第20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工矿》，第20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有利，则上下交争，必至不解散不止”[1]。像禹州三峰煤矿办成之后，始则知州曹广权要完全由他处置“盈利”，继则省府藩司袁大化又“以西法开采”为名，要收归“官办”；地方封建势力又竞起争夺，要三分煤矿，且聚众持械强采。(3)禁阻。如1908年，程祖福拟集资在清化再建硝磺酸水公司，河南商务局和厘税局以“恐碍税务”为名，禁其开设。凡此种种，都给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业的发展，带来了重重障碍。

除封建主义之外，帝国主义制造的障碍也很严重。福公司之霸占豫北煤矿，德、比资本之攘夺六河沟煤矿，就是明显的事例。特别是帝国主义各种机制洋货的倾销和对省内外市场的侵夺（均略如前述），对河南民族资本主义的抑制和摧残，更是既深广又持久。加上铁路这一交通运输利器均为帝国主义所把持，更使民族工矿业不能不仰其鼻息。六河沟煤矿创办人马吉森之兄马士樟“以事与（京汉）铁路总办龃龉，殃及池鱼，该总办竟蛮横地命令路局停运该矿所出煤炭，以至矿区存煤山积，几与太行并峙”。只此一例，就足可显示出以“文明”自诩的帝国主义的蛮横程度，难怪汉口报纸为此慨叹，“中国商业，动遭挫败如此”[2]！

本来，近代工矿业作为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对“开通独晚”的河南来说，完全是个陌生的新事物，哪怕是像出身于大官僚家庭而且社会联系面很广的马吉森这样的人，对此也缺乏基本知识。所以，其所办的广益纱厂在开办章程中订明，企业的财务和人事等管理制度，“悉用晋商成规”，即搬用山西票号封建主义的那一套，在人员的择用上，首要的一条是要“平昔极有操守而能耐劳苦者”。因为办企业的经验实在缺乏，故又特地言明，将函请在江苏南通办纱厂卓有成效的张謇，选派其厂内“妥友一二”来安阳“指导一切”[3]。周家口启新榨油厂虽从上海买来机器4部，但不掌握技术，芝麻出油率只有35%，尚不及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工矿》，第44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② 汉口《中西报》，光绪三十三年一月九日。
③ 天津《大公报》，1906年3月2日。



土榨的44%。因此,要在河南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业,确实是一种需要"百计图维"的难事,也使先进人士"挽回利权"、"实业救国"的美好愿望一再落空。

尽管存在着上述严重缺陷,资本主义新经济毕竟在河南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破土而出和艰难成长,因此,一个新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随着一些官僚、地主、商人的转化而出现于大河南北,而逐渐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显示出其要求和作用。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一个新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群体,作为上述新经济和新政治力量的孪生物和代言人,也涌现于中州大地。

第四节 近代教育和新型知识分子群体

一、近代学校和报刊的创办

(一)新式学校的创设

新式学校的创设,在南方一些省区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起步,河南则迟至20世纪初,才开办河南大学堂(河南高等学堂)。初期功课不过三门:传统中学、算学和"西文"(实际是教授算学和史地),而"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与旧式书院没有太大区别①。又由于社会风气闭塞,一般士子均不愿舍科举而改从"洋学",所以报考者寥寥,最后省当局只好强令在乡试落榜的士人中选取80名(原定学额200名)迫其入学。虽然不伦不类,但总算踱出了兴办近代学堂的脚步。

1905年,清廷下令废除科举制度,城乡地主士子断绝了传统的仕进之路,只好转向学堂。风气所趋,各地"青年志士,稍识时危者,莫不持兴学救亡之策,奔走呼号,日聒于父老兄弟之前"②。如商城刘伯襄,

---

① 王天奖:《河南辛亥革命史事长编》上卷,第19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② 《豫报》,第2号。

原是个笃信程朱理学的旧式士子，接受了西学的启蒙后，即在族人的支持下，本“明耻以教战，强身即以兴邦”之义，在故乡创办起“明强学堂”。在地方官中，也有一些重视兴学的守令，致力于“兴学育才”。如荥阳县令张绍旭，1902 年到任后，“接见绅民，必剀切谕以学校之益，开办宜早，舌敝唇焦”，特派县学训导去湖北调查，办起县境第一所学堂，后又捐备经费，分送学生去日本和天津、保定、北京、开封等地各类学堂学习，成效颇著，城乡青年过去对“洋学”“观望不前”，转而“向学者日众”[①]。这样，新式学堂就在大河南北日渐增多。据 1905 年巡抚陈夔龙奏报，说除省城开封办有高等、师范、武备、客籍等学堂和多所中、小、蒙学堂外，外府县“亦均次第扩充”，“民间逐渐开化，较之往昔，固已改观”[②]。以后，办学进度大为加快，尤其是少数有新型知识分子操持的州县，如汝阳城乡，据云“一时四乡热心劝学之士，闻风而起，如雨后春笋，一发莫遏”[③]。学堂最多的自然是省会开封，至辛亥革命前夕，已有官办、绅办和私立的各级各类正规学堂近 30 所，包括颇有名气的高等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和中州公学。据 1908 年省提学使报告，省外各府州县“除僻远瘠苦州县十余处正在饬催外，其能照章设立、切实奉行者十之七八”[④]。全省各府城一般建有中学堂，县、乡则多两等：高等或初等小学堂，间亦有另建甲（中等）、乙（初等）种实业学堂者，多的有数十所，少则数所。据官方不甚准确的统计，全省至 1909 年，官立、公立、私立的各类学堂共有：专门（高等、理科、法科、体育专修科）学堂 11 所，实业（农业、工业、商业、实业预科）学堂 30 所，师范（优级、初级、传习所）学堂 63 所，中学堂 23 所，小学堂 2 800 多所，女子学堂 17 所，共有在读学生近 9 万人，是 1904 年的 4 000 多人的 22.5 倍（增幅最大的是小学堂和师范学堂）[⑤]。加上历年毕业的各类学堂学生五六千人，拿全

① 《续荥阳县志》卷六，第 6 页，民国 13 年石印本。
② 陈夔龙：《庸庵尚书奏议》卷六，第 9—10 页。
③ 《汝南县志》卷十，第 44 页，民国 27 年石印本。
④ 《河南官报》，宣统元年第 22 期。
⑤ 《河南教育官报》，辛亥年第 4 期。



省总人口 2 600 多万来核计，大约 3 000 人中有 1 名受过或正在受学堂教育的学生，平均每县 900 多名。

在兴办省内学堂的同时，去国外（主要是日本）留学者也日渐增多，其中以官方选送的官费生占绝大多数。最先是 1903 年开始零星派出的，1904 年左右，在日本的豫籍留学生不过 19 人，而且大都为他省送往者，自费生很少。1905 年，省当局从河南武备学堂（后改为陆军小学）中选送 50 名学生，入日本振武学校专习军事，另又选派 60 余人同赴日本其他学校学习。到 1908 年，据云河南留学日本的学生，除在“振武”习军事者外，总共有官费生 76 人、自费生 20 人。在此期间，也有零星自费去欧美留学的，因资料欠缺，详情待考；官费派往者至 1909 年“尚无一人”[①]。

（二）作为“时务”和“新学”的载体和传媒的近代报刊、书籍，在河南也传播渐广

20 世纪初，南北各省和海外各种宣传新学、报道时事、倡导维新、甚至鼓吹革命的报刊大量创办，各种同类性质的出版物大量问世，并通过各种途径逐步流播到河南。1902 年，顺天乡试和本省乡试均在开封举行，云集士子 10 万余人。1903 年春，会试又临时在开封举行，各省举人云集古城，上海开明书店也来此开辟门面，售卖各种介绍新学的图书，士子们争相购阅，“无不利市三倍”。以后，本省先进人士复创办重点推销进步和革命书刊的大河书社，以往“书坊时务各书多不齐备”的状态明显改观[②]。河南官方也趋时附势，先后创办《河南官报》）（1904 年）、《河南白话报》、《开封简报》（均 1906 年）、《河南教育官报》（1908 年）、《自治官报》、《宪政月刊》（均 1909 年）等刊物，附带还出版了《外交阐微》、《富国新典》、《东西国军志译要》（均为译作）等新书。这些刊物虽然在官方的控制下，重在“宣上德，通下情”，但毕竟与旧时“辕

① 《河南咨议局决议案》，第 29 页。刘永之等：《河南地方志提要》下册附列河南留学生名录，列载清末河南留美者 7 人，留法者 2 人，留英者 1 人。但该名录诚如编者所云，有欠准确，如将大名鼎鼎之严复（留英）、吴稚晖（留法）均误为河南人。

② 天津《大公报》，1902 年 8 月 29 日。



河南留日学生留影

门钞”性质的《汇报辑要》（主要报道北京统治中枢动向）大不相同，在官绅士庶中起到“广见闻、通下情”的作用。特别是河南留日学生在此期间创办的《豫报》（1906 年）、《河南》、《中国新女界杂志》（均 1908 年），更放言高论，鼓吹变革，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也在省内城乡秘密传播。封建统治者对所谓“异端邪说”异常害怕，三令五申，严禁人民“购阅谬报、逆书”；但既要“维新”，就不能没有近代报刊、书籍等文化饰品。为此，除了创办上述诸种官报外，省提学使署又在开封开设 5 处阅报处，“广购京、沪、各省持论平正各报章”，供社会各界阅看。各府州县也依照办理，另外还有一些社会开明人士，也捐资创办“醒豫阅报社”（开封）、“益智阅报社”（卫辉）、“医愚阅报所”（信阳）等等，供阅的省内、外报纸常至十余种，范围就不以“持论平正者”为限，有些还备有进步书籍供人借阅。在较为正规的学堂中，此类报刊、书籍订置或暗中传播更多，有的地方，如陈州（淮阳）府城，学校师生还“自行捐资



设立阅报社……购置官、民各报十余种”[①]。从1904年由旧书院改建的项城小学堂的存书目录来看，除传统的经、史、子、集诸书外，还有诸如《欧美政治概览》、《帝国主义》、《宪政论》、《日本明治法制史》、《世界近世史》等60多种新学读物。此种情况，也是河南此前社会历史所未曾有过的。对比19世纪末戊戌变法时期有人学了几个英文字母就受到攻击和迫害，此时的社会风气确实开通了许多。

二、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成长

近代学堂和近代报刊的创办，使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逐步失去了长期保存的神圣光环，而被守旧官绅视为“异端邪说”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则日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不管封建官绅如何用心竭力维护三纲五常，禁止学生接触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但青年知识分子聚集在学堂，就会通过各种途径觅取和吸收有益的思想营养，特别是一些由进步知识分子担任教育会会长或学堂监督、教习的地方，“平时聚徒演说，多平权、自由之语”[②]。复加前述各种报刊、各种进步或革命出版物传播日广，给处于所谓“学问饥饿”状态的青年知识分子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精神食粮，由民主启蒙而潜移默化。1907年官方出版物在概述学堂学生的思想状况时，就忧心忡忡地说他们“尤喜诡辩自主，议者浮慕时尚，辄薄修身为赘科，而所汲汲于科目者，除西文多占钟点外，凡参考、自习，每于谬戾奇衺之书，多未禁止，反啧啧焉誉以开通。即此耳濡目染，心已半病，而复经游学者以异域奸言浸迹而煽惑之”[③]，使守旧官绅至感惶恐。至于留学国外的学生，进步就更快，所以“留学日本归来之学生，殆无一不主张革命者”。就是一些多年接受旧式封建教育的士子，包括一些已获得功名的士绅，也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通过阅读新书报而弃旧从新。这两类——学堂出身的和从旧式士子转化的知识分子汇合在一起，就使得河南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不断扩大。

---

① 《河南官报》，光绪三十二年第61期。
② 《河南官报》，总第276期。
③ 《河南官报》，总第194期。

这些新型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封建士子大不相同。后者株守孔孟儒学的壁垒，在八股时文、科举利禄中讨生活，拥戴清王朝和维护旧秩序，从阶级属性上说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前者虽不少出身于地主家庭，且不同程度地受封建思想文化的羁绊，但倾向于师法欧美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变革封建制度，实现中国的近代化，有不同层次的民主觉悟，从本质上看，属于正在成长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当然，这个新型的知识分子群体在20世纪初的出现和成长，还与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基本矛盾——中国人民与封建主义的矛盾、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空前激化，特别是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分不开。因为根植于中华大地的知识分子，历来具有根深源远的爱国主义传统，国土沦亡的严酷现实，瓜分豆剖的危急形势，有力地驱动他们走上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道路。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有资产阶级民主觉悟和反帝爱国的情怀，只是受各自的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觉悟水平和政治倾向不尽相同：有些在地方上从事“开通风气”、“改良风俗”等活动；有些则进而“干政”，主张君主立宪，通过和平途径，变革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更多的人则接受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感召，先后加入日趋高涨的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洪流。这一新型的知识分子群体，既为时代的产物，也是新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代表，以“先知先觉”的姿态登上20世纪初叶的政治舞台，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弄潮儿。

于是，在20世纪的前10年，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和立宪运动，结束了此前两千多年历史上只有农民阶级孤军奋战的局面，开始了正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阶段。

第三十七章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开展

第一节　革命运动的兴起

一、革命运动的肇始

近代中国正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是在19世纪末兴起的，其标志就是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领导的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在1894年诞生。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社会基本矛盾的迅速激化，这一革命运动也迅即高涨，继兴中会之后，诸如日知会、共进会（湖北）、华兴会（湖南）、光复会（江、浙、皖）、岳王会、信义会（安徽）等纷纷出现。1905年8月20日，在中国革命志士荟萃的日本东京，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联合在一起，组织起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制定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政纲，其第一个目标就是用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从此，早先分散开展的革命运动有了统一的纲领、统一的领导，预示着一场民主革命运动的新高潮即将到来。

在此前两百多年的历史上，农民群众反抗清朝暴政的斗争此起彼伏，就是基于狭隘的民族观念而产生的敌视和反抗满洲贵族统治的怒火，在大河南北也始终没有泯灭，除了以“反清复明”为旗帜的秘密会社在城乡群众中潜滋暗长外，即便在地主士夫中“反满”的暗流也一直

没有中断。20世纪初成长起来的河南革命志士，不同于先辈的抗清反满——他们没有与封建正统观念和君主专制制度决裂的简单继承。他们不仅要“驱除鞑虏”，而且还要“创立民国”，以完成正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职志。新一代有资产阶级民主觉悟的革命志士，在中原大地上发动了一场与旧式农民起义迥然不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

最早踏上民主革命道路的，是开封的车钺，他在20世纪初即与王梅溪、蒋立、刘积学、朱奋吾、安沼白等人一道，在开封创立了一所半日学堂，以为革命之秘密机关，“除传授普通课程外，兼宣传革命思想”，是“河南最初主张革命者”[①]。1906年，这所学堂虽然停闭，但进入武备学堂的刘积学等随之将“革命之秘密机关移至武备学堂”，堂内学生阎子固、刘醒吾、陈伯昂等10余人，“日与刘积学密商革命计划”[②]。另在高等学堂里，还有杜潜、王天杰等一批青年学生也在“积极宣传革命”[③]，且建立起“体育会”组织，借体育为掩护开展活动，因而杜等被学堂开除，王且被当局“捕拿”。因为开封是全省的政治中心，也是各地英俊荟萃之所，因此成为革命志士的重点活动地区是十分自然的。

省城以外，在新蔡，20世纪初已涌现出任芝铭、刘积勋、刘纯仁等一群有志革命的青年士子。1904年，他们去开封，与车钺、安沼白等“访谈甚契”，彼此建立了联系。还有中牟县内，据云1903年有来此避祸的京师大学堂学生张书勋，于县立小学堂“宣传革命意旨”，县人宋子殷等随之购求“革命书籍”，“革命思想日益浓厚”，不过还没有开展革命活动[④]。同年在陕县，据云还有革命党人入境，联络江湖会（哥老会），“图谋起事”[⑤]。这些记载，在时间上容或欠确，但在同盟会成立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已在河南发端和起步，这一点看来是确切无疑的，较之南北多数省份，在时间上并不算晚。

---

①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册，《光复之役》，中华书局，1960。
②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册，《光复之役》，中华书局，1960。
③ 《封丘县续志》，列传，杜潜传，民国26年开封新豫印刷所刊本。
④ 《中牟县志》，党务，第21页，民国25年中牟明德堂石印本。
⑤ 《陕县志》卷一，第13、14页，所记年代可能有误。



二、同盟会河南分会的成立和革命宣传

1905年8月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早先被清政府派往日本学陆军的河南志士曾昭文,原已加入兴中会,此时即成为第一个豫籍会员。次年,河南武备学堂学生50名和其他官、自费学生60多名又至日本,入盟的有刘积学、杜潜、陈伯昂等二十多人[①]。他们虽然身在东瀛,但十分关念省内的革命活动,与省内志士保持密切的联系。因此,1905年同盟会的《民报》一创刊,中牟的宋子般等当年即可"得睹"。根据同盟会总部的统一部署,在日会员于1906年组建了同盟会河南分会,推曾昭文为会长,复撰作和发布《河南讨满洲檄》、《河南留日学生讨满清政府檄》。檄文历数清朝统治河南期间种种残害人民、苛剥百姓和卖国媚外的罪行,特别是晚近几年,"八国联军,入京相继,割地赔款,接踵而至,丧权辱国,已非一一,昏聩腐败,至于斯极!"用沉痛的历史事实论证了"河南之宜革命也,更急于他省"。为此,檄文热情地呼唤:

> 打倒满清,推翻专制,建立民国,欢乐无极。爰布斯檄,希众周知。其各奋起,莫再迟疑[②]!

分会成立后,就通过各种途径,大力推进河南省内的革命运动。为此,封丘籍会员杜潜,当年就受委派返抵省城开封,积极访察和联络革命志士,发展革命组织。自此,省内零星四起的革命力量与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联接在一起,团聚在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开拓出中原地区革命运动的新局面。

---

①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记:1905年同盟会成立,"河南留学生加入者有曾昭文、朱奋吾、杜潜、车钺等"。陈伯昂则记,初时入会者只曾1人,1906年增至17人。考杜、朱是1906年抵日,当年加盟;车是1905年被官方派赴日本留学,是年冬,才加入同盟会。是则河南首批同盟会员当确如陈伯昂所说只曾昭文1人。至1906年,河南在日志士加盟人数,包括未见于会员登记册者在内,综合各种资料约计,当不止17人,而有二十多人。

② 《天讨》,第63—71页;《河南文史资料》第6辑,第1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

同盟会河南分会成立后，即大力开展革命宣传。

留日豫籍志士最早创办的是1906年农历十二月出刊的《豫报》杂志。这是河南留日学生有感于“革命之不可稍缓”而集资创办的，说是“专供我河南父老兄弟披阅，作扩充见闻之用”，借以“唤醒桑梓”，共济时艰。内容主要是剖析和论述帝国主义深入我堂奥，河南和全国一样都面临“剥肤之灾，剖腹之创”，必须急起救亡；揭露清朝统治的腐败及其给国家和河南带来的祸患，必须认真改革。刊物希望家乡父老兄弟“忆过去之腐败，当激其耻心；睹现在之危险，当兴其惧心；更虑将来（沦亡）之苦痛，而矢其奋心。而父诏其子，兄勉其弟，促黄河流域一部开化最早之民族，雄飞于世界”①。但因该刊系留日学生共同集资创办的，内部成员比较复杂——既有主张反清革命的同盟会员，也有主张立宪保皇的立宪派。为了不受牵制地宣传革命思想，廓清立宪派散布的和平变革的迷雾，同盟会河南分会遂决定自办刊物《河南》杂志。尉氏女同盟会员刘青霞为此捐资2万元，使该刊于1907年12月顺利发刊，而相形见绌的《豫报》发行6期后，于1908年5月停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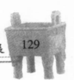
《河南》是一家旗帜鲜明、内容丰富、战斗性很强的革命刊物。该刊由张钟端任总经理（发行人），刘积学任总编辑②。刊物虽以《河南》命名，但各期文章的撰作者及其论述的问题都不局限于河南，是一家既具河南特色，又面向全国的革命期刊。每月一期，到1908年12月，共出9期（第10期在1909年年初尚未问世即被日本政府封闭）。在这9期中，《河南》着重宣传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爱国救亡。刊物在《发刊之旨趣》中劈头就提出：“今日我国

---

① 《豫报》，第1号。

②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记《河南》之总编辑为刘师培；王治秋：《辛亥革命前的鲁迅先生》也如是记载。周和鲁迅是当时《河南》杂志的积极供稿者，所记系亲身经历，当非无根之言。有可能因刘精研国学，著名于时，而被邀承担该刊之实际编务；更大的可能是事隔多年，周作人等记述错误。因包括刘积学本人在内的多种记载，均记刘积学任总编辑；且刘师培不是河南人而是江苏人，1907年正与其妻何震一起编办颇有影响的《天义报》。





留日学生创办的《河南》杂志

最大问题有过于中国存亡者耶?”“不问何者,不问何地,一草一木,一沙一礁”,都已被贪婪的帝国主义端上他们的餐桌,全体炎黄子孙,都惨受东西列强的奴役。文章悲愤地呼喊:“以我四亿之同胞,脑量不减于人,强力不弱于人,文化不后于人,乃由人而降为奴,是稍有人血、人性者所不甘,而谓我志士忍受之耶?”正是从这样的基点出发,该刊就以“激发爱国天良,作酣梦之警钟,为文明之导线”为自己的基本旨趣,几乎每期都刊发有爱国救亡的文章,热切地呼唤黄河儿女和全体中国人民,发扬固有的“爱国心”和“独立不羁之精神,震荡不拔之气概”,用自己的“大好头颅”保卫祖国的“美丽河山”①。类似思想言论道出了当时中国各行业、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心声,具有很大的感召力。

二是推翻已成为“洋人的朝廷”的清王朝。刊物回顾了清王朝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种种卖国罪行,指出国家、民族之所以陷于如此危险的境地,其祸首、乱源就是现今这个“断送土地财产之政府”,列强借以“制吾同胞”之政府,因此全国同胞当“合群策众力,推倒今之政府”。

① 见《河南》杂志《发刊之旨趣》、《日法、日俄协定于中国之存亡》、《劝告亟行地方自治理由书》、《论民气为建立军国国家之要素》等文。

有些论者还特别说明，革命排满这一任务的提出，“非因种族而有异也，乃因平民而有异。孰祸我平民，即孰当吾排斥之中”，是故“满人之平民可不排，而满人之官吏则必不能不排，不特此也，汉人中之在政府，其朋比为奸、助纣为虐者，亦在必排之内”[①]。这就把民主革命的首要对象集中指向卖国的清王朝，消除了革命即“杀逐满人”的误解。

三是用革命武装消灭清朝统治和君主专制制度。许多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革命排满“非诉之铁血不可”，“非竭全国国民之力以赴之不克为功”，从抗捐抗暴到武装起义，最后“扫其庭而犁其穴”。为此，刊物还就当时甚嚣尘上的“预备立宪”、“仿行立宪”的浪潮，发表了一系列战斗性很强的文字，严厉批斥了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立宪派和上层绅商的君主立宪论，以及此辈连续开展的请愿召开国会的活动，强调指出，“鹰狡狐智”之清廷煞有介事地开展的预备立宪，不过是“一副婆面虎心之手段”，目的无非是欺骗人民、瓦解革命；立宪派向这样的政府乞求国会，犹如老百姓向官府喊冤，不仅无效，而且适足“贾祸”。因此，君主立宪的理论，实为“惑世殃民之学说”，必须予以彻底唾弃。他们强调：处于当今中国，“非破坏此非平民的政府不可功”，“舍革命军而外，更无他道以处此也”[②]。

四是创建民主共和制度。刊物提出革命的任务是：“现在——破坏非平民的政府，以改造国家”，“将来——建设平民的政府，以巩固国家”，也就是以“民权立宪”代替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其途径便是建立“平民之代表机关”，即代议会，“代议会以平民之名而行实际之统治权”。各省地方则实行法、美式的（而不能是德、日式的）地方自治，“一切组织，纯由人民自定”，“得以自己独立之意思，处理公共事务”[③]。

另外，《河南》杂志还刊登鲁迅等撰写的多篇文章，从思想文化的

---

① 见《河南》杂志《警告同胞勿受立宪者之毒论》、《对于要求开设国会者之感喟》等文。

② 见《河南》杂志《警告同胞勿受立宪者之毒论》、《对于要求开设国会者之感喟》、《世界竞争之趋势及中国之前途》等文。

③ 见《河南》杂志《对于要求开设国会者之感喟》、《劝告亟行地方自治理由书》、《〈河南〉发刊之旨趣》等文。

角度宣传了民主和科学，对作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和精神支柱的孔孟儒学进行了声讨和批判，进一步拓广和加深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宣传。

《河南》杂志出版不久，即风行海内外，每期销数千份，“以输入本省者占半数。河南人士革命思想之开发，此杂志之力为多焉”①。

在此期间，河南留日学生还创办有《中国新女界》和《武学》杂志。前者于1907年2月出刊，每周一册，由燕斌主编，主旨在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出至第6期，因著论有妇女革命应以暗杀为手段，而于同年7月即被日本警厅勒令停刊。后者由中国留日学习陆军的各省学生八九十人组建的武学编译社发起、发行，河南学生刘基炎、杨曾蔚等负责编务，于1908年5月创办，主旨在探讨中国转弱为强的方策，出版期数不详。这两种杂志革命色彩虽没有《河南》浓烈，但都从不同的角度宣传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

为了使革命理论更快、更广地播撒中原大地，同盟会河南分会特派李锦公等回归开封，于1907年在开封西大街创办大河书社，“专为代理《河南》杂志及各种革命书报之机关”，兼作省内外革命党人通讯、联络②。经由此，大量的革命出版物转输省内各府县，以满足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

省内革命志士的革命宣传也卓有成效地开展。因为河南革命志士绝大多数均聚集在教育文化部门，因此他们的宣传工作就以各地各级学堂为基本阵地，以青年学生为主要对象。除了秘密传阅革命书刊外，他们还创造了多种宣传方式，如组织周末晚会和时事评议会之类，进行鼓动，往往使“一堂师生相对痛哭流涕”；或选择大家关心的现实问题，各抒己见，自由评议，勇敢地抨击时政③。就是封建统治者借以禁锢学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河南志士与辛亥革命运动》，中华书局，1981。其他资料，有记称《河南》发行量至8 000份，亦有记称1万份以上者。

② 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

③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371页，中华书局，1963。

生思想的“经学”课，革命党人也巧为利用。如刘纯仁在卫辉中学“讲经”时，就从“华夷之辨”中极力引申和发挥民族民主革命思想。这些都有效地启导了青年学生的革命觉悟，引导他们走上与清王朝彻底决裂的道路。在一些革命志士比较集中的学堂，如开封的中州公学，成效更著，几乎所有学生都因此加入同盟会。

固然，由于资本主义新经济的幼弱，由于地处腹里的河南“开通特迟”，从封建文化营垒走出来的内地士子们受资本主义新文化熏陶较少，所以从总体上说，河南革命党人，特别是在省内活动的革命党人，无论其自身的理论武装，或在实际的宣传工作上，都存在着明显的、重大的缺陷。他们只是把革命矛头集中指向满洲贵族和清王朝，既没有明确提出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主要对象，也没有注意和宣传同盟会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它直接关联到土地和农民问题；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和社会学说的掌握和阐发也十分欠缺。这些，都反映出出世不久就被历史仓促地推到前台的河南志士以及他们掀动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在思想理论上的不成熟。尽管如此，志士们的革命宣传毕竟把“人心风俗”引导到革命反清、“排满保华”上来，给革命运动在中原地区的开展打下了思想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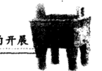
三、革命组织的建立和武装起义的准备

在开展革命宣传的同时，革命组织也逐步建立和发展——这是拓展河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要革命、救亡，必须组织起来；河南革命志士对此是早有认识的。有的资料记载，车钺等20世纪初在开封开设半日学堂为“革命之秘密机关”时，就同时组织有“学会”；在高等学堂活动的王天杰等也曾组建“体育会”，从事革命活动。这是河南志士建立革命团体的尝试和发端。此外，在信阳，高等小学堂学生刘化欧等“暗组学生自治会，以谋革命事业之推进”，入会学生22人，时在1905年左右。未几，被地方官绅指为“逆党大本营”而遭破坏[1]。到1906年，新蔡志士刘纯仁等在开

---

①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31页，中华书局，1963。



封组建河南学会。刘在1903年就以师法卢梭、华盛顿等"西贤"、"使民权伸张、河山新造"为职志,1906年农历二月与同县志士阎子固等一起,至开封各学堂"物色同志,组织学会,谋结团体,为秘密运动",并拟订了《河南学会章程》,经3月11、12日刘与多位在汴志士三次集会,"学会"正式成立,并推定潘大觉等人为省城干事。这样,既有章程,又有职务分工,就成为有异于传统结社的、比较正规的革命小团体。随后,刘纯仁复北上直隶,"到处物色同志",与在保定的刘镇华(巩县人)等"谋秘密运动事"①。强化和扩展革命组织,研商和推进革命运动自然是其中心课题。

就在1906年,在日同盟会河南分会派曾昭文、杜潜回到开封,与刘纯仁等在省志士集商,随后即正式建立省内的同盟会河南支部,刘纯仁被推为支部长。河南学会自然并归其中。省城以外,如在中牟,革命志士宋子殷等,经几年的扩大宣传,在本县和新蔡、固始等近县联络志同道合者,"势力增加,乃结社盟誓,实行革命"。1907年,邀约刘纯仁的知交阎子固来县,规划方略,并由阎将该"社"介绍给继曾昭文为在日同盟会河南分会会长的刘积学,遂全部转为同盟会员。一些由外省返回故乡发展革命力量的同盟会员,如王拱璧,即在邓州、西华等地直接建立起同盟会组织。1908—1909年由开封河南同盟会支部分派会员去各自所在州县发展组织,更均以同盟会分会命名。这样,大河南北的革命志士,除去信阳的刘化欧等归属湖北的日知会——文学社外,都包含在同盟会这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之中。尽管整个同盟会组织本来就比较松懈,河南同盟会支部组织更欠严密,省级支部与各县分会有联络而缺领导,但上述事态的出现毕竟具有重要意义,意味着河南革命志士在1906—1907年以后逐步汇聚到同盟会这一革命政党之中,而且与在日本的同盟会组织、与全国的革命运动联接在一起,从而使河南的

①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31页,中华书局,1963。

革命运动步入新阶段[1]。

刘纯仁等建立同盟会河南支部时，曾与同志商议开展革命的方策。其中的一项就是借办学为名，创办一所中州公学（1907年开学），作为革命的秘密机关；利用刘纯仁和其他学界闻人李时灿等共同主持的河南学务公所名义，创办中州图书仪器公司，“专与学界往来，鼓吹革命学说，同人多假此为机关”[2]。刘纯仁并于1907年暮春亲去上海，与陕西革命党人于右任议商，“拟联合直、鲁、豫、晋、秦、陇，假中州公学为北方运动之枢纽、中外声气之邮航”[3]，且邀于来“公学”任教（未果）。公学所招学生，“皆两河优秀”，拟培育之成为革命种子，然后撒向各县。至1909年，省城志士加盟者二百余人，中州公学学生几乎全部参加。寒假期间，学生们各还本县，又复转相介绍，又在各县发展了一批同盟会员，并建立起同盟会分会。在刘纯仁、刘积学、任芝铭的老家新蔡，加入同盟会的青年有数十人，并在刘积勋的私塾中设立分会机构。洛阳、巩县等地，经当地同盟会员石言、刘镇华等的努力，也发展了较多的会员。“自是，同盟会势力渐蔓延于河南全省”[4]。

同盟会始终认定，要实现革命目标，必须依靠“革命军”。因此，作为河南革命党人开拓革命新局面的第三个重要方面，就是准备革命武装，以便适时起义。其途径有三：联络军队、联络各地民间秘密会社、联系河南特盛的绿林武装。

还在刘积学等在省城武备学堂筹商革命方略时，就曾计划毕业后

① 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和冯自由的《革命逸史》均记称：1909年杜潜等由日本返汴，与刘纯仁等20多人集会于中州公学，随之组建同盟会河南分部，接着发生“阎子固党狱”。但据《刘粹轩年谱》有关部分，却明记此事发生在1906年，次年阎子固党狱起，阎走避日本，在其致刘的函中有“阁下与扶东（杜潜）在汴约办学（党）务”等语，可证杜已去汴组建支部。杜函在报告东京同盟会总部情况时，有黄兴等回国组织西南边境起义事，此事亦在1907年。刘年谱这几年的有关文字，系据刘当年日记编纂而成，自属确切可靠。任芝铭的忆述，亦与刘年谱同。邹、冯所记误。

② 开封《自由报》，1912年12月20日。

③ 《刘粹轩年谱》，丁未年，第11页。

④ 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

加入本省新军,从中进行策反,联合各部队,在时机成熟时发难。但未及他们毕业,即被送往日本,以故计划落空。以后,刘纯仁也曾想方设法"运动军界"。1907 年,刘因官府捕拿而迁避外县,在汴的同盟会员周维屏、刘凤楼、王庚先等继续"筹划革命,进行以(策动)军警为入手办法",1908 年事泄而败[①]。这是当时南北许多省份革命党人共同采用的方策(主要联络新军),而且大都获得显著的成效。如在湖北,果然如革命党人所希望的那样实现了"抬营主义"——将清政府的新军成建制地"抬"到革命一边,从而在 1911 年成功地发动武昌起义。手无寸铁的河南革命党人自然也想走这条捷径。

但是,这一能收效于他省的方策,却难以见效于河南。这是因为,河南新军与南方许多省份的新军不同:(1)南省新军士兵中有相当数量的知识青年(有的甚至考有"功名"),易于通过革命书刊或其他革命宣传接受民主革命思想,河南新军则主要于"民气勇敢"的归德府各县的土著农民中募集而成,要他们接受民主革命的"新知"殊为费力;(2)南省新军官佐多出于日本士官学校或本省武备学堂,受时代新潮影响较多,高、中级军官与袁世凯的北洋系没有多大关系,河南新军则在成军之始,将弁多由北洋操练而成,且交由袁世廉统领(袁兼任河南武备学堂督办,培养下级官弁),许多中下级军官也都出自北洋保定武备学堂,自始至终都受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官僚集团严密控制,革命党人要破此壁垒很不容易;(3)与北方一些省份比较,比如陕西,新军成分虽与河南相似,但哥老会的山堂遍立于各标营,革命党人可以以此为杠杆,同样将大部分新军"抬"到革命一边,而河南新军却无此条件,身在学界的革命党人很难与"行伍"坐到一起。因此像刘纯仁"运动军界",结果却"无效"[②]。此后革命党人虽然没有放弃军队的策反工作,但成效不显。一直到辛亥革命前夕,河南新军中倾向革命的,还只有吴沧洲等为数不多的下级军官。至于巡防旧军,他省策反成功的也为数寥寥,

① 开封《自由报》,1912 年 12 月 20 日。

② 《刘粹轩年谱》,丁未年,第 14 页。

河南巡防营革命党人更难打入。河南巡抚宝棻奏报清廷说，河南新、旧军“尚属可靠”，不是没有根据的。

因为难以把军队争取到革命一边，河南革命党人只好转向另一种现成武装——历来被官府剿办的绿林武装（“刀客”、“土匪”）。因为清末河南农民大批破产，所以啸聚山林的绿林团伙也日益滋盛，尤其是盘踞嵩县杨山的关老九、王天纵等股，力量更大，曾屡败进剿的官军，因此名闻省内外，两湖革命党人对他们也很看重。他们一般都缺乏政治目标，只从事“劫富济贫”等经济性活动，但骁勇善战。所以刘纯仁在运动军队无效后，即与嵩县同盟会员石言、蒋峨等共商，联络杨山绿林诸豪，“勖以民族大义，灌输革命思想，纠合当地豪客，厚聚实力，预备待时而动”[①]。本来“苦满清政府之不良，发愤为雄”的王天纵等对石言等非常敬重，爽快地接受联络，于是“暗通革命党，私购军火，图谋倾倒满清政府”[②]。另如新蔡党人阎子固，在 1907 年前，曾用心联络汝阳绿林冯甲岭、展友亮等股，“为革命运动”[③]；郏县党人王治军，“联络陕（州）、汝（州）间豪杰，待时而举”[④]；洛宁党人杨凤鸣，与盘踞山区的几股绿林武装联络，“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要他们待机协助革命党人起事”[⑤]。虽然，由此积累的力量远在他省“抬”得的新军之下，但毕竟给武力夺取政权做了些准备。

至于民间秘密会社，河南与南方和西北许多省份之盛行哥老会不同，主要盛行由教门演化而来的仁义会（豫东至豫南）、在园会（豫北和豫西、豫南）；另外，在豫西南和豫西一些州县哥老会有相当势力，在豫东销行硝盐地区和私盐、漕粮运输线上，青帮传习颇广。这些会社潜伏时期一般都没有武装，却有家长制的组织，其基本成员是农民和城镇平

①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 371 页，中华书局，1963。
② 上海《民立报》，1912 年 7 月 21—23 日。
③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中华书局，1960。
④ 开封《自由报》，1912 年 7 月 8 日。
⑤ 《河南文史资料》第 7 辑，《杨凤鸣事迹》，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民,颇具群众性,社会矛盾激化时,常拿起原始武器从事抗捐、抗官或反洋教斗争。还在同盟会成立之前,这些会社就引起一些志士的注意。最早有孟津青年举人王北方(后为同盟会员),1898年参与戊戌变法失败后回到开封,曾通过在汴的豫西哥老会首领,"思结交哥老会中人"①。不过这时的王北方追随康、梁,其联络哥老会当是康、梁等策划的自立军起义的组成部分,以无所成就而罢。随后,有革命志士于1903年联络陕州江湖会,"一时成为运动,声势颇大,云即响应革命"②。在日本的车钺参加同盟会后,仍留辫不去,为的就是回国便于联络会党。在邓州一带活动的革命党人王庚先等,在1907—1908年间,与当地江湖会也有联络。这些事例都反映出河南革命志士仿效南北其他省区的革命方策,想通过联络民间秘密会社准备起义武装的努力。

"位卑未敢忘忧国"。因民族危亡而迸发出来的爱国激情,使河南志士在开展上述革命活动时,表现出十分高昂的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热诚。"死不足畏;死于战为人生第一品格"。这是本已考中举人的刘纯仁的真实情怀。因此,他主张必须打破对"父母、妻子、财产、一切钟情之物"的"贪恋","能破除贪恋,即能牺牲身命"。他说:"人,贵义以为则,廉以为德。"③这些话,可以说道出了这一代河南志士的共同心声。这一代民主战士就是基于这样的自觉而走在时代的前列的,因此在精神上是不可战胜的。不管清朝统治者如何严密防范和残酷镇压,像刘纯仁、阎子固等,不仅自身被迫弃家外匿,家室也被官府抄毁,父母、妻、子都被迫外逃避祸,但志士们都抱定"即家务一切亦牺牲之不惜"的决心④,矢志以"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实际行动来"尽国民责任"。"风气迟开"的河南,短短的几年内民主革命风潮之所以迅即涨盛,是与这些仁人志士的忘我拼搏分不开的。革命理论和榜样的

① 《河南文史资料》第23辑,第5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② 《陕县志》卷一,第13、14页。按:年代可能有误。
③ 《刘粹轩年谱》,丙午年,第8页。
④ 《刘粹轩年谱》,丁未年,第14页。

力量，驱动越来越多的黄河儿女“准备金戈铁马，轰轰烈烈战一场”！

第二节　立宪潮流和革命运动

一、君主立宪的幻想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引起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的极大恐惧，也使那些与封建主义和统治集团有较多联系的上层绅商深感忧虑和不安。作为对应，清朝统治者从1905—1906年开始搞起“预备立宪”，说是要“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准备在若干年后“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其目的，是拉拢要求参与政权的上层资产阶级绅商，抵制日趋高涨的反清革命运动，以求“皇位永固”。1907年，复于中枢设立资政院，并命各省筹设谘议局。各省资产阶级上层和一些资产阶级化的地主士绅由此产生了希望，就由多年的舆论鼓吹进向实际行动，彼此串联，吁求清廷从速实行君主立宪，让他们通过召开国会而参与政权，借以内则消弭革命，外则挽救危亡，并组成政治团体，从1908年开始，发动多次向清廷请愿召开国会的活动，形成颇有声势的立宪派和立宪运动。进入20世纪后经济和社会情状发生了前述重大变化的河南也同样卷入其中。

20世纪初叶，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河南的诞生和全国立宪运动的兴起，反映这种新兴力量成长要求的上层绅商也应运而生，成为全国立宪派的组成部分。其核心人物，有汲县进士李时灿、拔贡王锡彤、新乡进士王安澜、辉县进士史绪任、偃师进士杨源懋（又是同盟会员）、巩县举人王敬芳、南阳举人张嘉谋、邓县进士彭运斌、汜水进士魏联奎等，“皆一时人望所归”[①]的著名士绅。他们大都接受过较久、较多的封建教育，且多已获得进士、举人等较高功名，或兼具官和绅的双重身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与封建主义和清王朝有较为密切的

① 《河南文史资料》第5辑，第4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



联系，有的正在积极筹办铁路和厂矿，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他们频繁联络，与外省立宪派互相呼应，“以新学、新政相号召”，只是不主张通过暴力革命，而是通过和平改良途径逐步实现国家的近代化。相比较而言，坚持革命道路的河南革命党人，则无论出身和社会地位都比较低卑，大都受教育于近代学堂，接受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较多，即原为旧式士子且曾考取功名者，也不过是秀才、附生之类（极少数是举人、进士），与封建主义和清王朝较少或没有联系。如新蔡党人刘积学（举人），祖为塾师，父为小商人，其家“无宅无地”；任芝铭家亦贫困，赖姨母支助得入私塾；许昌党人张钟端，出身贫农家庭；新郑党人吴沧洲，“幼时亦贫”；惟一获得进士功名的偃师杨源懋，与立宪派关系密切，也出生于一个乡村塾师家庭。也有出身于官僚富豪家庭的，如尉氏女党人刘（马）青霞，但很少。这两派可以说分别代表河南新型知识分子群体（或成长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右两翼，但彼此多身居学界，其代表人物之间且素有交谊；在政治上虽彼此趋异，但在省内开展活动时，通常多能协作，很少敌对。如中州公学，即为两派共同筹办；在兴学和振兴实业、收回利权等活动中，也都能彼此协力；身为同盟会领袖人物之一的杨源懋且积极参与请愿开国会活动。直到武昌起义爆发，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到来后，各派政治力量争夺政权趋向白热化，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因此，在本阶段，除了在日本的《河南》杂志对立宪谬说严加批斥外，省内立宪派的请愿开国会活动并未受到革命派的梗扰而连续开展起来。

1908 年（光绪三十四年）春，河南立宪派与湖南、江西、浙江等省立宪派联络，准备共同行动，请求清廷速开国会。随后，在汴的立宪派复集会议商，决定公举中州公学监督（校长）李时灿为上书代表，晋京请愿。是年 6 月，江苏立宪团体——预备立宪公会领袖张謇以其团体的名义，函请包括河南在内的南北各省立宪团体或领袖人物，会集北京，共策进行。河南立宪派积极响应，由王安澜起草了请愿书，在其上签名请开国会者据云有 5 000 余人，由胡汝麟、杨源懋为代表，于 7 月初抵京上递。8 月间，河南在京的立宪派代表彭运斌、宫玉柱等，复与张謇

约集的各省代表一道，向都察院呈递上国会请愿书。客居天津的一些豫籍人士，还在报纸上发表《赞成要求国会致同乡书》，吁请“豫省同乡诸公”群起“臂助”。清廷遂于8月底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期，9年后召开国会，推行宪政，还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用“涂饰耳目，敷衍门面”的假立宪来搪塞。各省立宪派对此深感不满，继续组织要求缩短“预备”期限，早日召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的请愿活动。



各省立宪派请愿代表

根据清廷拟订的预备期内“9年筹备事宜清单”，第一年各省应设谘议局。河南当局遂于1908年11月设置谘议局筹办处。次年秋，经过纯由各府县官绅包办的所谓“选举”，全省根据中枢给河南规定的员额，共“选出”谘议局议员97人，各府县立宪派代表人物大体上均网罗在内。10月14日，首届河南谘议局开幕，举杜严为议长。在50天的会期中，共审议本省官府和议员们提出的议案70件。1910年（宣统二年）10—11月，召开第二次会议，审议议案百余件。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谘议局未再召开会议就进了历史的博物馆。

在省谘议局这个所谓“地方议会”筹办和召开的同时，又筹办了各府、厅、州、县的所谓“地方自治”。至1910—1911年大多数府县都设立了“议事会”（议决机关）、“参事会”（执行机关，类似常委会）。开张不久，即遇辛亥革命，遂草草收场。

清廷给这种作为“宪政之基础”的谘议局规定的职权和性质“为各省采取舆论之地，以指陈地方利病、筹计地方治安为宗旨”；河南巡抚吴重熹所要求于谘议局议员的，也不过是“备官府顾问之资”，充其量不过是清朝腐朽统治的“宪政”点缀，与所谓“人民与闻政事”渺不相涉。

但这种地方议会的召开，毕竟给立宪派提供了集结力量、开展活动的方便。经过1909年12月南北“十六省议员”代表在上海集议后，1910年1月，河南谘议局代表与其他省份谘议局代表一道，在北京向都察院递呈要求速开国会请愿书，被清廷拒绝。6月，河南和其他16省谘议局代表再组请愿团，递呈都察院哀恳，结果仍碰壁而归。河南立宪派深感愤懑，10月3日，他们将请愿书上递资政院，使其通过“请开国会案”。为了促成此事，河南立宪派在这一月组建了“河南国会请愿同志会”，并在开封组织了3 000余人的集会。会后，群集抚署门前，请巡抚宝棻代奏速开国会。这在清朝统治河南的200多年中，是从来没有过的，一时“抚署门前为之壅塞，呼吁之声，喧天震地”。经宝棻与杨源懋、王敬芳等“同志会”代表“会话”后，宝棻答应代奏，请愿队伍才转往谘议局继请，还表示如目的不达，“学则停课，商则罢市，工则休作，谘议局如不许开会，群起以死力争之”[①]。宝棻有感于“民气难遏”，也与东三省总督锡良等17个地方疆吏和将军、都统一道，联名奏请清廷从速组织责任内阁。清廷这才允诺缩短“预备期限”，将原定的9年减为5年，决定在1913年召开国会，1911年先成立新内阁。

立宪派这样“跪着造反”的结果，原以为多少有点差强人意的结果。不料，1911年（宣统三年）清廷成立的新的内阁，却是一个实实在

① 上海《民立报》，1910年10月27日。

在的皇族内阁，不仅立宪派未能参加政权，就连原先掌权的汉族官僚也多被排挤在外，致使“举国骚然，朝野上下，不啻加离心力百倍”，正好从反面证明革命派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是挽救危亡、振兴邦国的惟一出路，驱动更多的真诚的爱国人士放弃了对清王朝的最后幻想，像杨源懋那样，全心全意地站到革命一边。

于是，同全国其他省区一样，河南的革命运动在1909—1910年后，更加蓬勃发展，进入了以准备武装起义为中心的新阶段。

二、革命运动的高涨

1909年（宣统元年），东京同盟会总部决定，由留日各省同盟会分会派人归国组建或加强同盟会分部，将革命由“言论（宣传）时期”推向“实行（起义）时期”。于是，杜潜等再次由在日同盟会分会委派，来到开封，与以中州公学为据点的杨源懋、刘积学、任芝铭、王庚先等20多位同盟会会员会商“实行”方略，在中原战略要地做好迎接全国性革命高潮、共同推翻“洋人的朝廷”的准备。为此，他们除了继续开展革命宣传、培育更多的革命志士，在各府县扩建同盟会组织外，复分途并进，大力加强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并进行武装起义的尝试。全省革命运动随之进入新阶段——准备“实行”阶段。

1910年春，因官府缉拿而改换姓名走避豫西的河南同盟会支部长刘纯仁，与杨源懋、张钫等密商于洛阳中学，决定在“传播主义”的同时，加紧联络地方绿林武装和新旧军队，并在伏牛山区建立武装基地。随后，他们所分派的郭芳五等在孟津，石言、蒋峨等在嵩县，张钫等在伊阳，殷松涛、杨仪山等在鲁山、临汝、宝丰一带，加紧联络民间会社或绿林武装。此外，杨源懋、刘纯仁等还择定太行山葫芦谷地方，以倡办农林为名，潜结山寨，一旦时机成熟，即在有地利可凭的豫陕边境发动革命，进而规复河南全省[①]。

革命党人在豫西着重联络的民间秘密会社是在园会（大刀会、小

---

① 《河南文史资料》第6辑，张铭文，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开封《自由报》，1912年9月2日。

刀会)。该会在洛阳西郊,势力颇盛,东关下园四周农民入会者在70%以上。首领南大定接受同盟会员邢沧渔等的联络,决定以“推翻满清”为奋斗目标,将会众组建为“复汉军”,并积极扩展组织。在不长的时间内,除洛阳城乡各行各业均有许多农民、手工工人及一些知识分子入会外,势力扩及孟津和嵩县、汝阳、洛阳三县的边境地带,还打入了驻在洛阳城内的巡防营,准备里应外合,相机攻据这个豫西名城。但事机不密,被官府侦知。1911年春夏,南大定被清军捕杀,许多会众也惨遭屠戮。革命党人和在园会众只好改变计划,等待新的时机。

这个时候,同盟会总部在黄兴、赵声等的主持下,正在积极筹备广州起义,并分遣各省同盟会员回本省组织响应。河南同盟会会员周德培等带着赵声发予的委任书和经费于1910年来到开封。该地同盟会组织自刘纯仁离汴和1908年周维屏等联络军警失败后,“团体星散”,两年多来群龙无首。好在坚持在省城和豫东一些州县活动的同盟会员几年来向本地的民间秘密会社仁义会进行了有效的联络,有一定的工作基础。周德培等遂利用这个力量,于8月在山货店街建立秘密机关,与仁义会首领余化龙等联络,将会众组织为“仁义革命军”(因余等“不肯将仁义二字消去”),做好响应的准备。次年暮春,传来了黄兴等发动第二次广州起义(“黄花岗之役”)失败的消息,河南巡抚宝棻屡接各处警电,告称有革命党人入汴活动,因而加强戒备和侦缉。周德培等并不气馁,加紧组织“仁义革命军”,复邀约山东和省内各地同盟会员数百人来汴共事,计划在农历七月十五日传统旧节起事,以竟黄兴等未成之功。不料叛徒张维翰被敌探利诱,出而告密,并引导清军捕获周等。随后宝棻复“飞电全省,指名捕捉者竟千有余人”①,可见参与此次起义活动者人数之多。一时省城人心震动,“大有第二广州之象”②。

豫西和开封之外,革命党人在其他州县进行起义准备的也不乏其人。

---

① 天津《大公报》,1911年9月7日。

② 上海《民立报》,1911年8月13日。

形势的发展使河南巡抚宝棻感到自己犹如坐在火山口上，因而不敢恋栈，“遣人辇金入都运动内用，倘不能达其目的，即决意乞休”①。“大清”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已被“无父无君之徒”从根本上动摇了。

但另一方面，河南革命党人在武装起义准备时期，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工作上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1)与南北其他好多省份革命党人在清军中不同程度地实现了“抬营主义”不同，河南革命党人的军队策反工作始终成效不大。相形之下，革命党人在绿林武装和民间会社准备的起义力量就显得相当弱小，难以指望在即将到来的大决战中克敌制胜，夺取河南。(2)即便是对绿林武装和民间会社的联络上，河南革命党人也不过说动其首领参与革命，且不说没有也不能将这些现成力量改造成真正由他们领导和指挥的革命军(克服其落后性、散漫性)，就连其原组织、原部伍的名称、建制也不能改变，而只能以类似“军师”的身份，从客位起参谋的作用。这就使得本来有限的力量更加有限。加上与沿海沿江省份不同，河南革命党人绝大部分身居“学界”，而且人数较少，复地处腹里，购运、接济武器弹药又极不容易，更使河南在迎接革命高潮的准备工作上，明显地呈现相对落后的形势。相反，反革命势力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社会上却特别厚集，且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官僚集团严密控制。北洋陆军可以利用京汉铁路朝发夕至。因此，刘纯仁等就曾清醒地估量，像他省那样先夺取省城起义的胜利将是十分困难的，革命党人面临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但河南革命党人并不因此犹豫却步，形势的发展催动他们不管有多大的困难，都要做好大决战的准备。1911 年春，革命党人集会，“决定大举进行”：甲部由杨源懋、刘纯仁等负责，策动新军和巡防营；乙部由王杰、王庚先等负责，发动学界；丙部由岳秀华、李干公等负责，联络仁义会；丁部由石言、刘镇华等负责，聚合绿林武装。同时，集资创办两种日报——设在开封的《国是日报》和设在北京的《国维日报》，以从事

① 上海《民立报》，1911 年 8 月 12 日。

舆论鼓吹。各部分途并进，规复河南全省①。

第三节　群众斗争的新高潮

与革命党人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趋向高涨的同时，河南农民和城镇人民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也风起云涌，加速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在20世纪的前10年，河南城乡人民的反抗斗争也呈现出新的面貌、新的特点。与19世纪末以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为中心的群众斗争，矛头集中指向妄图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不同，本阶段河南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斗争同时开展，斗争口号由"扶清灭洋"到"扫清灭洋"的转变，就集中反映了这一点。投入斗争的除了农民大众外，还有越来越多的城镇人民，包括绅、学、商各界，而且次数多，规模大，涉及地区广，形式和内容多种多样，有群众自发的反侵略斗争、抗捐抗粮、结伙架杆和武装起事，也有上层绅商领导的抵制外货和自保利权运动。这些斗争与民主革命运动汇集在一起，加速了清王朝统治末日的来临。

一、反侵略斗争

因为各地洋教堂在义和团运动后向城乡人民反攻倒算，勒索教案赔款，因而理所当然地激起各阶层人民对洋教的仇恨；又因洋教堂的反扑都是勾结州县官吏——人民斥之为"洋官"——进行的，所以"仇教"就往往与"抗官"结合在一起，有的且发展成为既要"灭洋"又要"扫清"的武装起事，从而将19世纪下半叶的反洋教斗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有：

1901年，上蔡人张妙松等见"各乡多有教堂讹罚钱文，人心怨愤，商议借闹教为名，纠党煽众"。他们以民间秘密会社弥勒会为纽带，在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段剑岷：《辛亥革命逸事》。两文均未载明党人集议地点。从当时开封的情况和刘纯仁、杨源懋等人行踪推断，当在洛阳或豫西其他县内。

豫东、豫东南和山东近豫府县发展徒众，据云男女老幼总数达45万人，并与山东大刀会、八卦会取得联系，计划在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农历四月初二日至初八日间起事攻据开封省城①。

1904年，彰德府属各地群众纷纷参加在园会，“以仇教灭洋为宗旨”，且与直隶、山东近边州县人民联络，准备起事，“攻打城池，杀害洋人”②。

1906年，在西平、遂平、淮宁一带，吴太山、苗金声等借仁义会组织群众，“以扫清灭洋为帜”。苗称“天王”，并设“大都督”多名，在西平八里庄竖旗起事，计划攻取教堂集中的周家口，“毁堂杀教”，参加的群众达十多万人。他们以“醒世子”的名义发布揭帖——反洋教檄文，称：

> 天主教，太霸道，无事生非起波涛。平素本是懦弱子，一入此教便逞豪，占人田来霸人产，欺官欺民心太高；利己害人只管做，乡邻终日受欺磨。官上、私下不胜他，无奈起意灭洋教……③

这些话，道出了城乡人民积久难平的公愤，因而义旗一举，邻近的郾城、舞阳等县群众也都准备响应。河南、湖北两省当局均派军队赶来镇压，才将这股烈火扑灭。

其他如安阳、滑县、唐河、桐柏、郑州、修武、浚县、临颍、许州、阌乡、原武、南阳、鹿邑、开封、温县、孟县、武陟、汤阴、卫辉、内黄、河内等20余个州县，也都先后发生规模不等的“仇教”或其他反侵略斗争。据现存的残缺不全的资料统计，1901—1911年，全省发动不同规模的反侵

① 《锡良遗稿》第1卷，第220—224页，中华书局，1959；天津《大公报》，1902年6月20日。
② 《袁世凯奏议》，第448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清实录》光绪朝，卷五三四，第8页；《大公报》，1904年10月20日。
③ 《教案教务档》第7辑，光绪三十二年二月二日河南巡抚咨外务部文，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981。

略斗争（不包括上层绅商发动的抵制外货和自保利权运动）30余起，其中的20余起均发生在1906年前。这些自发的群众反侵略斗争虽然很快都遭到封建统治者的镇压而暂告平息，但却给反攻倒算的洋教堂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以迎头痛击，遏制了帝国主义宗教侵略势力的扩展。如在临颍县境，据1909年意大利驻京公使报告，“教民之数，先时甚众，至今较前减少实多，守教者心怀畏惧，深恐将来之祸端”[①]，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反暴政斗争

在20世纪的开初两年，抗粮抗捐的火焰就在宜阳、阌乡、卢氏、宝丰等地燃起，参加者多至数万人。到1903年，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抗粮运动首先在豫北怀庆府属掀起。最先发难的是孟县农民，从四乡群集县城，火焚县署。接着，温县、河内、武陟、阳武等县农民也以联庄会的形式，四起“闹粮”，有的包围县城，殴打官吏，有的捣毁县署。风声所播，不仅附近各县，就是大河以南，不仅官府所谓的“奸民”，就是历来安耕的“良民”，无不“蠢蠢欲动”，四起“托减粮以抗官，假联庄以聚众。一邑如是，各邑因而生心；此处甫平，彼处效尤而起”[②]。地域广及十数个州县，参加的群众不下二三十万人，朝野震动，全国注目。

到1910年，群众性的抗粮抗捐斗争再次形成高潮。在这年开春，密县民众传布“三月三大闹密县，扒劣绅房子”的揭帖，相约以鸣锣、放炮为号，联庄行动，抗缴官府的“百样税”。4月11日（农历三月初三），各乡农民一两千人，操起各种农具，拥入县城，砸毁县衙大堂大门和各种盘剥民众的“新政”机构。县令徐文田仓皇逃往开封。抗捐民众数日不散，直到官绅答应减免苛捐，才各自回村。稍后，长葛人民也四处传帖，谴责县令江湘连续加捐，7月21日，四乡男女5 700余人聚集在一起，拥入县城，砸毁县衙。叶县仁义会首领张清望、刘广义等也

① 《教案教务档》第4辑，十一月二十五日意使照会，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981。

② 《谕折汇存》卷五十五，张人骏折；陈夔龙：《庸庵尚书奏议》卷三，第4页。

于12月间聚众一两万人武装抗捐，并与鲁山、宝丰等地的仁义会众联络，“倡言造反”。

在此期间，开封、永宁（洛宁）、彰德、临颍、光山等地的城镇商民，也多次发动抗捐抗税或反暴政斗争，有的举行罢市，有的捣毁税卡或县衙，有的反抗巡警无理欺压。这在以前是比较少见的。

据不完全统计，在20世纪的前10年间，省境发生的抗粮抗捐斗争总数在50起以上，地区广及40多个州县。这些斗争，虽然没有取得多少具体成果（官府即使被迫减免苛捐，也是暂时的），但却使封建统治者狼狈周章，加深了统治危机。

在此期间，还有众多的贫苦民众拿起原始武器，啸聚山林，从事“劫富济贫”活动，或进而起事反清，成为农民起义的前奏。1910年，一个信阳籍的御史奏陈河南情况时就说：河南自庚子年（1900年）后，“富者率入于贫，贫者率流于盗，十百成群，昌言不讳”，尤其是南汝光淅及河陕汝两道（豫南、豫西南和豫西）最为滋盛，有些地方，“几于无人不匪，无日不劫，道路为之梗塞，地方官不敢过问”①。当时任河南巡抚的宝棻，也说他“历官燕、晋，即稔中州盗风之炽，甲于各省”，尤其晚近几年，除了“掳人勒赎”、“派饭敛钱”外，“抑且抗拒官兵，公然对垒”，到1911年，更是股多人众，“啸聚动至千人”②。前面提及的嵩县王天纵股，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伙。其他如永宁的丁同升股、宜阳的王修已股、伊阳的李奎元股、鲁山的郜永成（秦椒红）股、宝丰的杜其宾股、南阳的王八老虎股、虞城的王金韬股，等等，也都引人注目。据报，王天纵雄踞杨山，屡败赶来进剿的清军，所部“号令严明，禁人劫掠；怜悯贫民，不准富户高抬粮价；而且告示理词讼。井井有条，志不在小”③。即豫西其他绿林武装，亦“皆抱均分贫富、以有易无之宗旨”（即劫富济

① 陈善同：《陈侍御奏稿》卷一，第4—9页。

② 《河南官报》宣统二年第30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1辑，第23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③ 上海《民立报》，1911年7月10日。

贫）。在豫东活动的绿林武装，灾年荒月时且“榜示各村，赈济饥民”[1]。这些绿林武装一般均“戒淫戒杀，只与仇人为难……不伤贫人，不害善人”[2]。声势之大，“为数十年所未有”[3]，还有众多的农民以秘密会社的传统组织形式，准备起事反清。如1908年，开封仁义会与豫西绿林武装联络，乘慈禧、光绪身死，“京师多故，人心惶乱”之机，准备起事[4]；豫北三府在园会组织会众万余人，订军册，立营章，并设“洪秀全万万岁”牌位，以完成40多年前太平天国未竟事业……这些秘密会社组织的类似起事计划，虽大都未及发动即被统治当局破坏，但此伏彼起，潜势力继续滋长，进一步加深了清王朝的统治危机。

三、上层绅商领导的爱国运动

在下层群众连续开展上述诸种自发斗争的同时，一批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绅商和一些革命党人在省城开封和其他一些城镇发动抵制外货、自保利权等爱国反帝运动。如1905年暮春，为反击美国排斥、迫害华工，由上海绅商发起的抵制美货运动在南北各省开展时，河南绅商也在开封和南阳等地组织民众，集会响应，发动各阶层人民抵制美货。1906年，因日本侵略我东北，全国掀起反日浪潮，河南绅民又在开封举行华北反日大会等。一个以保路为目标的运动，于是就在全省各主要城镇开展起来。

同时开展的还有自保豫北矿权的保矿运动。对于英国福公司之攫夺豫北煤矿，河南人士是始终不甘心的。有鉴于福公司有增无减的侵略野心，1906年，发动保路运动的杜严等河南绅商又组建起河南矿务研究会，作为“抵制福公司之专设机关”。随后，以豫北绅商为主，筹集资本，组织两个矿务公司——开采修武凤凰山铁矿的宏豫公司和开采修武、河内境内各矿的光豫公司，借以“先发制人”，杜止福公司的侵夺。处在与福公司斗争最前线的怀庆府，亦由学界发起，成立矿务会，

---

① 上海《民立报》，1912年9月22日；陈善同：《陈侍御奏稿》卷三，第14页。

② 张钫：《河南全省清乡总报告·宣传》，第11页。

③ 天津《大公报》，1911年3月16日。

④ 汉口《中西报》，1908年12月19日。

“以组织公司、集议采矿为目的”[①]。远在日本的豫籍留学生，对家乡的利权十分关心。1907年年初，他们在河南留日学生同乡会创办的《豫报》上发表《矿说》一文，提出：“河南之一砂一粒，皆河南人享其利益，河南之一得一失，皆河南人担其责任。”他们又以同乡会名义发表《警告河南同胞速办矿务书》，进而提出全省人民“要拿定主义，咬住牙根，拼出死命”，与福公司和“贼官污吏、汉奸民贼”抗争，“一定要争到废约”（指以前以豫丰公司名义与福公司签订的卖矿合同以及官府给予福公司的各种权益），收回被英国资本窃夺的豫北煤矿，由本省自行集资开办[②]。这种主张，反映了河南各阶层人民的共同意愿，也道出了自保路、矿运动的爱国性质，反映出20世纪初河南人民的民族新觉醒，成为这一时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组成部分。

清廷因河南绅民态度坚决，为了拉拢上层绅商，于是就批准河南自行集股修筑洛（阳）潼（关）、开（封）徐（州）铁路，并拒绝了法、德等国揽筑开封—济南铁路的要求。后经官绅共商，决定先行集股自筑洛潼铁路，同时设局筹筑开徐铁路。在拟订的《商办河南全省铁路有限公司招股章程》中，开宗明义就宣布“本公司专集华股，拒借洋债”，有寄居国外而愿购股者，“须呈缴驻地（中国）公使或领事的保证书”，证明确系华人；为了预防利权外溢，甚至规定股东“原华籍而后归化外国者，其资金没收，股票作废”[③]。1909年，两路均在开封设置总局，次年8月，首先上马的洛潼铁路破土动工。持续多年的自保路权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然而，福公司及其后台英帝国主义——当时世界上头号霸主，不仅无所让步，反而加紧对华侵夺。1909年3月，福公司“重利运动”河南交涉局委员杨敬宸、修武知县严良炳，与其签订卖煤专条，允许福公司在内地设栈售煤。这不仅意味着全省绅民坚持多年的“废约”要求成

① 天津《大公报》，1907年7月4日。
② 上海《时报》，1907年8月10日。
③ 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册，第1131页，中华书局，1963。

为泡影，而且还给该公司凭借机器开采的优势挤垮豫北众多的土煤窑，扼杀民族矿业，进而独占河南煤矿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而理所当然地激起全省绅民的公愤。5月间，省会绅民连续召开数千人参加的大会，表示绝不承认杨、严等私订的卖煤条款，继续坚持废除前订的"正约"，并派代表去巡抚衙门请愿，要求巡抚吴重熹废除杨、严等所订条款，惩办这两个贪官污吏。随后，绅、商、学界组织河南保矿协会，进而在有关府县成立保矿分会，并公举杜严、方贞等为代表，进京向清廷外务部、工商部递呈，力争废约。同时，复以"豫省绅、商、军、学界"或河南保矿协会名义，在上海革命党人创办的《民呼日报》上发表《维持豫省矿产贩卖权通告书》、《河南抵制福公司通告书》、《申讨民贼之檄文》等文告，严厉申讨将豫省人民生存权付予外人的杨、严一伙，实为"卖同胞、残同种之枭獍"，表示"我豫人头可断，踵可决，而此完全之主权绝不可弃"！呼吁全国各省绅民协力相助，以求"四方响应，结众志以成城，一往直前，誓沉舟以破釜"[①]！6月13日，在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各省旅沪同乡会均派出代表，召开数百人的联合会议，组成国民协会，致电清廷外务部，指出"福公司内地售煤，违背通商条约，此端一开，全国内地尽成租界。各省士民忧愤交并，誓死力争"，要求外务部坚决拒绝[②]。各地报刊也竞相报道，支持河南人民的正义斗争，更引起全国的普遍关注。

这是一场与福公司短兵相接的搏斗，投入斗争的民众和学生人数更多，开封的多次集会常逾万人。一些10多岁的学生也在万头攒动的民众大会上慷慨陈词，表示驱逐这伙帝国主义豺狼的决心。当获知交涉局与福公司在该局谈判的消息时，开封数百群众不召自来，在交涉局门口示威，但遭到军警的拦阻。在处于斗争最前线的修武，学生们均走上街头，聚众演说，散发传单，激励大家与福公司斗争。千余农民和土煤窑工人还拿起棍棒，拥入县城，向严良炳问罪，随后又冲

---

① 上海《民呼日报》，1909年3月18日，6月13、23—24日。

② 上海《民呼日报》，1909年6月16日。

入福公司矿厂，将其采煤机具砸毁。一时间，从省城到豫北，“群情汹汹，几欲暴动”①。但是，领导运动的上层绅商却害怕暴力行动，始终把运动限制在所谓“文明抵制”的范围之内。他们一面派代表向清廷吁请支持，并多次与福公司谈判、交涉，一面又派出多人分赴道清铁路沿线福公司售煤处所，联络绅民，共同抵制，复派人到郑州、许昌等车站，劝阻商民购运福公司煤炭。这种貌似“文明”实为软弱的态度，正好给福公司提供了可乘之机。英国驻京公使一再向清廷外务部施加压力，甚至以动用“兵轮”相威吓。外务部也认贼作父，“极助英商”，屡电河南巡抚吴重熹，反诬“河南绅民开会聚众，著说发报，并分申各处，恣意谩骂，凭空诬蔑，一唱百和，簧鼓沸腾，嚣张之气，日益加剧”，要吴“认真弹压”，赶紧与福公司妥协②。清廷复电责吴重熹“不顾大局”，“贻误事机”，并威胁说，“将来如有暴动，惟该抚是问”。在这样的情势下，河南保矿协会的绅商仍胶执“文明抵制”，结果事与愿违，不仅“废约”的目标未曾实现，连福公司就地售煤也未能阻止——不过限定华商购煤每起需在100吨以上，算是给地方小煤窑多少留点生存空隙。

前列河南上层绅商发动和领导的自保路矿权益的运动，由于受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制约，虽未能获致多少具体成果（开徐铁路不久停办，洛潼铁路在民国初年也被收归“国有”），但毕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河南人民的爱国传统和民族新觉醒，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帝国主义对中原地区的侵略；特别是河南人民从斗争实践中亲身体验到清王朝卖国媚外的本质，从而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要爱国救亡，就必须推翻清朝封建统治，驱动他们汇入民主革命的行列。清王朝倒行逆施，在中枢排逐汉族权要而实行皇族实权，致使立宪派也对这个政权感到绝望而另谋出路，本来与革命派联系较多的河南立宪派也不例外。所以，“当

① 《东方杂志》，1909年第6卷第7期《记事》。
② 《东方杂志》，1909年第6卷第9期《记事》。

时在河南,反满复汉的言论,甚至可以公开发表"[1]。清朝统治者陷于空前孤立的境地。

---

①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369页,中华书局,19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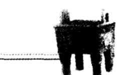
第三十八章
辛亥革命的风雷

第一节 争取河南独立

一、开封举义的落空

1911年10月10日（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辛亥革命在湖北省会武昌爆发，并且迅速取得胜利，成立了湖北军政府。紧接着，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等省在同一月，上海、贵州、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等省在11月，经由革命党人发动的起义，也先后摆脱清朝统治而宣告独立。短短的一个多月中，除了直隶、河南、甘肃和东北三省暂时还没有脱离清朝统治外，由独立省区组成的革命营垒“三分天下有其二”，几年前被孙中山喻为“即将倒塌的房屋”的清王朝，在全国性的革命风暴的冲击下，稀里哗啦地倒塌下来。

在这场埋葬清王朝的革命风暴中，河南革命党人和河南人民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英勇无畏地进行了多次夺取政权的尝试，虽然由于受多方面条件的制约而未能获得独立，但其不甘落后于人、不怕牺牲的革命气概，“失败而志愈坚”的韧性战斗精神，较之南北各独立省区都毫



不逊色，赢得南方舆论的赞誉[①]，也为这场革命壮剧添加了雄浑悲壮的乐章。

河南革命党人在1901—1911年间，已从多方面做了迎接革命高潮的准备。但是与当时包括孙中山、黄兴在内的绝大多数革命党人一样，他们没有预计到革命高潮来得这样迅猛。湖北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的时候，河南同盟会两领导人都不在全省的政治中心开封，省内同盟会支部长刘纯仁因躲避官府的缉捕，1909年后即转往卫辉中学堂当教习；在日本的同盟会分会长刘积学虽已赶回国内，此时却身在北京筹办报纸；省城的革命党人依然是群龙无首，无论在组织上、思想上、起义力量的联络上，都缺乏形势突变的准备。现在形势逼人，他们也毫不犹豫地走上了斗争的第一线。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出，刘纯仁首先赶到开封，与在汴同志一道，急电刘积学迅即返省。10月13日，刘纯仁与学界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20余人，在禹王台法政学堂秘密集会，迅速作出了响应武昌起义、求取河南独立的部署：发动留守开封的部分新军（宪兵，还有骑兵、炮兵各一队）和五个区的巡警，作为武装起义的基干，适时发难；同时联络谘议局议员，共谋河南独立。会议还决定仿效湖北的先例，内定第二十九混成协协统应龙翔为都督，参谋姚任支为副都督，条件是要他们率部起义。会议还推定刘纯仁运动学界，吴沧洲（时为新军第二十九混成协司令部差遣）运动新军，刘炳阁（东区巡警区长）发动巡警。另派数人去豫西发动王天纵等绿林武装、在园会众和民团，攻取洛阳，联络陕西革命党人，以壮大革命声势，分散敌人兵力。傍晚会议结束，各人即分头行动。

因为革命党人事先没有组织和积聚足够的起义力量，而应龙翔协统乃是湖北都督黎元洪的同乡、亲戚，而且传闻曾加入同盟会，并接有黎元洪让他起义的密信，所以革命党人就把起义、独立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协统身上。次日清晨，吴沧洲亲去应的寓所，面陈革命党人推戴之

① 上海《民立报》，1911年12月28日。

意，劝应率部起义。应是个老练、谨慎的官僚，对河南的局势自有估量。他认为，河南比不得湖北，开封比不得武昌，新军第二十九混成协与湖北的第八镇也大不一样。他自己到任未久，所辖两个标的标统都反对他，各标营中下级军官绝大多数都是行伍出身的武夫，很难策动；枪弹不足，无法补充；巡抚宝棻和巡防旧军对他这个协统以及留汴新军都十分猜疑和戒备，致使他不安其位，正在电请军谘府调他回京。他批评革命党人"太幼稚了"，因此拒绝吴沧洲游说。因为他深知，处于四战之地的河南，北洋诸镇陆军可以朝发夕至，而且从12日起就已源源南下，河南已在其重兵控扼之下，光靠第二十九混成协中有限的革命力量是无法使河南独立成功的。他倒不像武昌起义前的黎元洪那样捕杀革命党人以邀功，只是劝勉吴沧洲等："前途远大，遇事小心。"革命党人遂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到"自己想法子干"上①。

他们想出的起事方略是：不是先在省城发难、据以号令全省，而是倒转过来，先分东、西、南、北四路在外府州县发动起义，最后乘当局分兵四出、省城空虚之机，在中路发动起义，占有省城。为此，他们分派刘荣棠、李锐五等赶赴东路，发动豫东考城、太康一带的仁义会和民团起事，随时策应开封；派新近赶回的刘积学、赵伯阶等赶赴南路，发动汝、鲁、郏、宝、襄一带的绿林武装和民团，控制豫西南；派刘纯仁、吴沧洲等赶赴西路，发动王天纵部和豫西在园会，攻取洛阳，西联陕西；北路由暴式彬、韩立纶等负责，联络豫北在园会众，破坏黄河铁桥，截断清军的运输补给线。留居开封的张钟端等革命党人加紧联络各方面的社会力量，在时机成熟时起事独立。与前面那种简单仿效他省成功经验而作出"幼稚"策划不同，这种新方略是比较符合河南的客观实际的，也可说是河南革命党人从本省的实际出发的一个创造，表明他们对河南特殊困难的环境是有所认识、有所准备的。他们之所以要排除万难、图取独立，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河南能否独立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全国反清

①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358—360页，中华书局，1963。



革命的全局。这是因为,河南在历史上战略位置就十分重要,"图天下者必先得中原",特别是清朝建都北京,河南更成了关乎京畿"首脑"安危的"心脏"地区。武昌起义、各省独立后,河南的战略位置越发重要:如果河南摆脱清朝统治,那就可截断湖北和豫陕边境清军的后路,使之陷于腹背受敌、补给无从的绝境,将"不战而降"①,还可给独立各省北伐敞开大门;如果河南仍由清王朝控制,那就会出现相反的形势,北洋军攻据汉口、汉阳就说明了这一点。正因为河南革命党人充分认识到"豫人"对国家和民族的特殊责任,所以不惜冒险犯难,务求在这个"南北关键"省份实现独立。

在清朝反动统治一方,自然也要牢牢控制河南。辛亥革命前夕被清廷调任为河南巡抚的蒙古贵族宝棻,是北洋军阀魁首袁世凯的门徒。10月10日夜,他获知武昌"乱党"起事的消息,迅即派出本省新军步队1营,由第五十八标标统张锡元率领,于11日晨乘火车赴鄂,接着又加派步队1营、马队2队、炮队1队赶赴武胜关为后继。这是入鄂镇压武昌首义的第一支外省军队。在北京,清廷也于12日赶派陆军两镇,组成由荫昌统率的第一军,接着又组成冯国璋统率的第二军,迅速南下镇压湖北和山陕革命。这些北洋军除赶赴湖北前线外,还重点布防于郑州、新乡、新郑、信阳等京汉路沿线城市和汴洛路的洛阳。与此同时,宝棻除赶令河北、南阳、归德诸镇和左路、右路巡防添募16营外,又奏准清廷,派袁克定(袁世凯长子)"添练六支劲旅",与原有新、旧军队一道守护河南这个战略要地。这样一来,河南省内镇压革命的军事力量在短时间内就骤增数倍,相形之下,革命党人联络的起义力量就显得分外弱小,而且处于"四面受敌,举动维艰"的险恶境地,与南北独立各省确实"情形殊异,难易判绝,其艰苦卓绝之状,盖有东南人士所不及料者"②。

---

①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辛亥革命在上海资料选辑》,第105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② 上海《民立报》,1911年12月28日。

二、有利的革命形势

河南革命党人并没有因上述困难而却步，而是对实现河南独立抱有信心。这是因为当时从政治态势上说，对革命比较有利。

（一）全省各阶层人民倾心革命

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河南，青年学生欢呼雀跃，不顾当局的镇压，公开写贴革命标语，振臂高呼："不甘为满奴的人起来！"就是陆军教练所的职员、学生，也不怕旗籍学生告密，"纷纷集会，激昂慷慨赞扬革命"[①]。至于"一般社会"，据在豫的日籍教员和英国记者报告，也均对革命党、革命军"表同情"[②]。大河南北，众多的劳动群众自发地拿起武器，向旧统治秩序发动猛烈的冲击。如在永宁县境，"不逞之徒，千百为群，乘机肆扰"，与豪绅组织的地主武装对战，将一些团练首击毙[③]；河南府（洛阳）属"土匪乘间窃发，迭扰洛、嵩、宜、永、登、伊等处……匪满洛境，防军仅能专顾府城"[④]……据官方报告，称"豫属土匪蜂起"，"几于无县无之"，而且"动至千百"[⑤]，渐成燎原之势。这正如列宁所说"千百万人觉醒起来要过新的生活"的革命征象[⑥]，有力地推动和深化了全省的革命形势，也给革命党人的起义、独立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

（二）立宪派和谘议局附和革命

立宪派在武昌起义前已对清廷绝望，武昌起义后全国响应的革命形势更促使这些上层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转而附和革命，全国各省少有例外。河南立宪派原先就与革命党人联系较多，关系较好，所以这些人也向革命党人靠拢，参与河南独立的策划，"谘议局议员等亦加

---

① 《河南文史资料》第6辑，第43、9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

② 《辛亥革命资料》，《近代史资料》专刊，第595页，中华书局，1961；上海《神州日报》，1911年10月26日。

③ 《洛宁县志》卷八，第28页，民国6年铅印本。

④ 《洛宁县志》卷八，第28页，民国6年铅印本。

⑤ 《河南官报》，宣统三年第25、26期。

⑥ 《列宁全集》第28卷，第108页，人民出版社，1956。



人运动"[①]。11月上旬,河南谘议局还与在沪的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电报联系十余次,以至"有河南谘议局独立之谣"[②]。他们这样做,固然不无投机取巧之心,企求抢得控驭局势的主动权,在独立后组建新政权——权力再分配时为自己争取最大的份额,但毕竟壮大了革命的声势,使以宝棻为代表的清朝统治更加孤立。

(三)以宝棻为首的统治当局的畏葸和敷衍

宝棻虽然对清王朝毫无二心,但却十分老练和圆滑。当时,在汹涌澎湃的全国性的革命浪涛的冲击下,北京统治集团(包括一些满族亲贵)中不少人都已感到,清王朝犹如一只朽败的旧船,随时都有被巨浪击碎的危险,因而都面临着一个是否给这个王朝殉葬的问题。宝棻作为一个敌视革命的旗籍官僚,是不愿像南方一些汉族督抚那样"归顺"革命的,但也不愿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去冒险,以免像一些独立省份的督抚那样受到革命的严惩。因此,他的政治算盘的中心支点,就是在风云难测的危机时刻保住自己,在策略上,就是随机应付,支撑现存局面,尽快请清廷派人接任。为此,他一方面采取了前述诸种抗拒革命的举措,但另一方面又适可而止,不敢用严厉的镇压手段对付革命党人和各种谋求"独立"的活动。新军协统应龙翔是个危险人物,他不过加以软禁,始终不奏请撤换(后齐耀琳接任巡抚,才以标统张锡元代应)。他心知中州公学监督杨源懋是"乱党"的核心人物,正在策划起义独立,但也不加捕拿。"抚台"既如此圆滑,下边的文武官员也落得依样自保。巡警道邹道沂掌管的五区巡警,接受党人的运动,"只要(党人)不在大街上莽说莽讲,他们是不多过问的";连巡防旧军统领柴得贵,对党人的游说也"颇以为善"[③],实是虚与委蛇。因而在袁世凯复出前的开封,"反满复汉的言论,甚至可以公开发表","同盟会员与非同盟会

① 上海《民立报》,1911年11月30日;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第179—1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② 上海《民立报》,1911年11月30日;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第179—1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③ 《河南文史资料》第6辑,第9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

员遂为半公开的大联合"[①]。

三、四路图汴

因为有上述较为有利的政治态势，所以河南革命党人虽在重兵压境的情况下，仍感河南独立有望，积极按计划分路开展革命活动：

在西路，刘纯仁、吴沧洲等于10月21日离汴赴嵩县，很快与王天纵接上了头，同时还联络了洛阳一带的在园会，共同制定了攻取洛阳的计划。11月29日，王天纵率部出山，占领了田湖镇，驻守的巡防一营投诚。当晚又进据鸣皋镇。30日，进克白杨镇。12月1日，全军进抵洛阳城南10余里处，准备与在园会众合攻洛阳城。

在东路，刘荣棠、李锐五等与豫东各地的仁义会首领进行了联系，许多会首均表示愿听革命党人调遣，只是在组织上坚持自己的体系和编制，而且大都没有武器。好在人数众多，总计有1万以上可以利用的队伍。

在南路，刘积学、赵伯阶等先在叶县以办理民团名义，去开封购买了枪械；童笃嵩亦以办乡团为幌子，在唐县（唐河）团聚群众；另由孙豪、赵伯阶等去鲁山、宝丰，联络了那一带的绿林武装，孙被推为统带，赵为参谋。主要目标是攻取南阳城。

在北路，暴式彬、韩立纶等除继续利用滑县守望社组织力量外，还成功地联络了豫北的在园会，准备伺机破坏黄河铁桥。

在中路，省会开封的革命党人先在北土街和合堂、后在优级师范学堂设立机关，继续加紧联络军队（包括抚署卫队）、巡警和附近各县的民间武装，汇集起数千人的起事队伍，伺机行动。他们盘算，"郑、汴等重要城市，反动势力强大，在省城举事虽不易取胜，但各地革命活动活跃，革命力量和声势日益壮大"[②]，因此，只要勇于拼搏，夺取河南独立是有可能的。加以革命党人在外府县四处活动，宝棻不得不抽调军队

---

①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369页，中华书局，1963；邹鲁前揭书。

② 《河南文史资料》第6辑，第4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



赶往镇压,留驻开封的不过2营(每营240人)巡防营和数百新军(已与党人有一定联系)。机会难得,革命党人遂决定在11月11日(农历九月二十一日)起事独立。

身在学界的革命党人缺乏斗争经验,在与"非同盟会员"作"半公开的大联合"的情况下,其起事计划,立宪派和谘议局固然知晓,以宝棻为首的统治当局也很快掌握。宝棻遂与立宪派、谘议局中的一些官绅串通一气,利用革命党人的幼稚,通过陈国祥、贺绍章、张登云、李槃、王敬芳、胡汝麟等与学界关系密切的"宪政党","扬言巡抚宝棻情愿卸任北上,许以独立,不必再用兵力使秩序扰乱。学界信以为实"[①],起事的准备工作遂因此放松和延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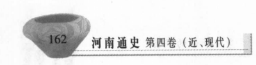
不料,宝棻和"宪政党"许诺的所谓"独立",完全是一场政治骗局。在11月11日这一天,他们联合组织了一个"爱国公会","宣布该会纲领,计分化除种见、统一政治、维持秩序、崇尚武功四条"。虽说"盖(革命)事成则指所爱者为中国,事败则指所爱者为清国"[②],左右逢源,差可搪塞,但首先致力的是在"维持"现有统治秩序、"统一"于现存政权的前提下,用"武功"来消除革命。因此宝棻被推为会长,藩、臬和道、府、县以及其他"高官大绅"为公会主体。轻率上当的革命党人"由此大愤",于是再次做省城起义的准备。

然而,这以后,无论全国和河南,政治形势发生了不利革命的重大变化。其中关键的因素,就是北洋军阀魁首袁世凯执掌清王朝的军政大权。

---

① 上海《民立报》,1912年1月13日;开封《自由报》,1912年12月22日。

② 上海《民立报》,1911年11月3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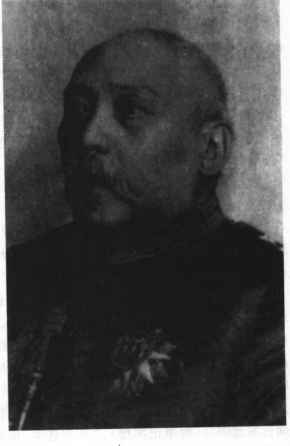
第二节　反袁起义烽火

一、袁世凯的上台

袁世凯是有清一代河南最有权势的官僚。他出身于项城的一个官宦家庭，以“不学有术”著称。中日甲午战争后，清廷命他编练“新建陆军”。以此为发端，逐步扩建成北洋6镇，袁也由道员擢升为巡抚，进而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军机大臣，除了把持北洋6镇的兵权外，还实际主持清廷的外交，成了一个权倾中外的人物，帝国主义对他也十分倚重，以至朝野人士认为他“有不臣之心”。1909年年初，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在慈禧太后死后执掌清廷大政的摄政王载沣将袁赶下了台。袁遂择居于彰德（安阳）洹上村，但其徒党依然操纵着军事、政治、外交、财经的实权，而且依然惟袁的意旨是从。这样，袁表面上是个无职无权的“隐士”，实际上仍是内外反动势力和资产阶级立宪派归心的人物，等时机一到，就出而主宰时局。武昌起义后漫天的革命烽火迫使载沣不得不低声下气地请袁出山，先授予湖广总督，被拒；进而授予钦差大臣，并给予军事全权，袁才于10月30日南下就任，两日后，即督令前线北洋军攻占汉口，使首义之区的武昌处于北洋军的炮火威胁之下。就在这一天，节节退让的清廷宣布解散举世诟骂的皇族内阁，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随后载沣本人也退居府邸。这样，清廷的全部统治权就由满洲亲贵转移到北洋军阀官僚集团的魁首袁世凯手中。影响所及，不仅反革命营垒大为振奋，就是在独立各省和革命党人中，也造成政治震荡和思想混乱，妥协倾向日滋月长。于是，在帝国主义的撮合下，湖北前线停止战斗，“南北和谈”在沪开始。独立各省表示，只要袁世凯同意共和政体，推倒清廷，那就拥戴他为新建民国的首任大总统。从此，全国革命形势渐趋逆转。

河南是袁世凯的故乡。多年以来，基于传统的封建观念，众多的豫籍文武官员都奔竞在袁的门下，袁也多方收罗、拉拢和培植。加上这个

"系天下安危"的汉族大僚多年以来又是"维新领袖",致使一些革命党人对他也心存希冀,上层绅商和立宪派对他尤为归心。在袁世凯尚未被载沣撵逐时,豫籍党人中就有函劝袁利用手中的兵权"复我邦家"者[①];如今袁又独揽大权,在革命党人中引发了更多的幻想和混乱。



袁世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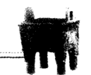
"一是一些人,特别是新军中的一些带兵官,看到袁世凯重掌军政大权,错误地认为汉人也能当道,举义思想因以削弱。同时袁世凯又是河南人,在军政界中不免沾亲带故,封建观念也从中作祟。这种情况,即在同盟会员中亦复存在。辛亥革命前,同盟会在新军中本已建立了一定的联系,惟情况经此变化,倾向革命的带兵官多踌躇不前,以致不得不转而依靠绿林力量和地方武装。但这些人又缺乏革命的思想准备,组织纪律也都不够严密。其次,袁世凯上台前,对部队加强了控制,并将新军外调,造成

① 《满清外史》第八编,第85页,上海新中华图书馆,1915。

革命活动的困难。”[1]难怪袁世凯上台的消息传出，河南革命党人中就有以“总理河南革命事务朱覆胡”的名义，函劝袁世凯说：“今公既总理海陆，全权在握，苟一反手，满贼不难剿灭，拯汉族于水火，垂勋名于千秋，虽昔之华（盛顿）不过是也。同人等不禁为我公前途贺。”希望袁早率北洋军倾覆清廷，则“第一次中华国大统领之得也，易如反掌”[2]。正在统率秦陇豫复汉军从豫西进取河南的张钫，也对袁“抱有幻想”，特函劝袁不要为清廷效力[3]。因为革命党人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以“排满”为中心内容的民族主义，而对“民权”、“民生”两主义则不甚了了，加上他们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所以此种对袁的幻想在南方独立省区的革命党人以至同盟会的一些领导人中也都存在，河南更有过之。在整个革命营垒的妥协潮流日趋滋盛的情势下，河南“学界期望平和了结者甚多，皆不欲轻举”[4]。尽管大多数革命党人并不因此偃旗息鼓，但袁世凯的掌政毕竟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巨大的障碍。

二是对于立宪派特别是河南的立宪派来说，袁世凯的掌政造成的政治影响更为巨大。在河南立宪派的心目中，“袁宫太保者，吾辈平日所认为收拾中国最适宜之人也”[5]，因而群赴彰德趋奉于袁的门下。袁由“隐居”转为内阁总理大臣后，这些一度曾与革命党人作“半公开大联合”的上层人士自然转而替这个新主子效劳，与官界共同拼凑“爱国公会”借以抵制革命党人的独立要求便是一个明证。1911年冬，李时灿曾发起创办《时事记实报》，“逐户送阅，反对共和”。12月9日，立宪派要角胡汝麟写给袁的一封密信，更集中表露了这伙人的政治态度。在这封信中，胡明白提出“豫为明公桑梓之乡，托庇不遭糜烂，事定之后，人民当顶感无暨，甚不愿无事自扰，致酿战祸”，也就是反对革命党

①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369页，中华书局，1963。
② 《满清外史》第八编，第85、86页，上海新中华图书馆，1915。
③ 《河南文史资料》第6辑，第51、5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
④ 上海《民立报》，1912年1月5日。
⑤ 王锡彤：《燕豫萍踪》，民国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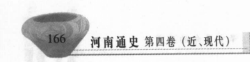


人的起义、独立。信中还特别提到，河南革命党人还在筹划举事，谋求独立，为此他决定即速返汴，"设法挽回，避免一方之糜烂，慰明公保全居里之盛意"[①]。其抵制革命、拥袁窃权的政治态度是十分明白的。经过这伙人与袁世凯的共同策划，精心拟定了一个"请愿共和而不独立"的方案。因为他们盘算，河南如果独立，那就可能导致袁世凯"号令不出都门"，其"威望、声名""将一败涂地"，"故决不敢独立"；但又必须"请愿共和"，倾覆清廷，让袁窃取革命成果，作"共和民国"的大总统[②]。作为一种政治方策，据王锡彤记述，是他在12月末向袁世凯明确提出而被袁认可的[③]，实际上在此前一个来月立宪派和谘议局就依此方策行事，谘议局在12月上旬几次致电清内阁要求"承认共和"和胡汝麟上述密信就表明了这一点。这样，就给革命党人图取河南独立增加了更大的困难。

三是对于河南的统治当局来说，袁世凯的上台更是一帖强力兴奋剂。特别是12月2日宝棻离职后，齐耀琳为河南巡抚。齐与宝棻不同，上任不久，就于12月11日以坚决反对革命的标统张锡元代应龙翔为第二十九混成协协统，对革命党人和起义活动都残酷镇压，就是对各府州县的大小"乱事"，均"一概用剿，玉石俱焚"，致使谘议局也感到不安，请袁内阁令齐不要"妄事杀戮"[④]。一度"有投机革命之意"的巡防营统领柴得贵也"掉头献媚于齐"。这样一来，省境特别是开封的政治态势就大为恶化，以往可以"半公开"活动的革命党人明白地感到"齐比宝棻强悍，恐怕有不利于我们的活动"[⑤]。

这一切，就使得本来已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势下谋求独立的河南革命党人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其环境之险恶，是南北各独立省区所没有的。然而，河南革命党人再接再厉，在张钟端等人的主持下，全力

① 天津《民约报》，1912年5月20日；《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期，第117页。
② 王锡彤：《燕豫萍踪》，民国刊本。
③ 王锡彤：《燕豫萍踪》，民国刊本。
④ 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七)，第37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⑤ 《河南文史资料》第6辑，第41、9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



组织开封起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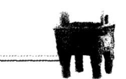
二、开封起义的壮举

张钟端于1911年在日本东京中央大学毕业，于武昌起义前夕回国，先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武昌起义胜利后，他谢绝湖北军政府的挽留，决心力任艰巨，回到河南组织起义，使这个战略要地早日归向革命营垒。他留居省会开封，与刘积学等一道（刘纯仁、杨源懋等已去豫西）居中组织力量。原定11月11日独立的计划流产后，他们继续联络省城和各县的军队、巡警和民间武装，包括豫东的仁义会、民团数千人，豫西和豫东的几支绿林武装亦受约"同时应援"，复在优级师范学堂、公立法政学堂和中州公学设立三处革命机关，便于联络和指挥。考虑到河南的险恶环境和独立过程中的巨大风险，他们还特派刘积学、李载赓等去上海等独立省区求援，包括从上海购运上万枝枪械（因仁义会众和民团大都徒手），以便与分头活动的东西南北四路互相配合，同以齐耀琳为首的反动统治作最后的决战。

可是，因为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东西南北四路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其中力量最强的西路王天纵部虽在12月初进抵洛阳城郊，但受到守城清军和赶调而至的毅军赵倜部的顽抗；洛阳周围的在园会众虽适时起事响应，但因没有枪械，很快被官府扑灭。北洋军周符麟部复沿汴洛铁路迅抵豫西，更使王天纵、刘纯仁等攻占洛阳的计划完全落空。王、刘等遂转而西进潼关，加入陕西军政府派出的、张钫率领的秦陇复汉军（因王部加入，改称秦陇豫复汉军）。

东路革命党人联络的豫东仁义会和绿林武装人数虽多，但前者（号称一万数千人）均系徒手，且与后者积怨难消，势同水火，无法联合行动。革命党人只好在仁义会众中挑选一批精壮，组成敢死队，带着自备的简陋武器，在一天夜里偷袭开封，未成而返。

南路党人借叶县团练名义从开封购运的枪械中途被官府截夺，集中叶县、宝丰、鲁山、郏县一带民团枪械的计划也难以实现，起义攻取南阳的计划只好作罢。随后，由孙豪、赵伯阶等经月余奔走，联络起宝丰、鲁山地区的绿林武装部永成等部，在孙、赵指挥下合攻鲁山城，但遭到



南阳镇总兵谢宝胜部的镇压，孙、赵牺牲，诸"杆"遂重新入山。

北路联合的在园会众，因清军对黄河铁桥防守十分严密，故炸桥的任务始终未能完成。

四路无一成功的事实，再一次表明敌我力量确实十分悬殊，清王朝在河南的统治机器还能有效地运转，革命党人凭着有限的、组织和武器都很差的起义力量，是很难取得胜利的。可是张钟端等革命党人仍不愿畏难退缩，经过集议，他们作出了共同的决定："期以实行发难为宗旨，事之成败非所计也。"[①]实则，据吴沧洲说，他们"事先并不曾作成功的打算"[②]。这种不怕牺牲，敢于为革命、为全局献身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但轻率从事军事冒险的做法却是不足取的。

于是，在举世瞩目的中州大地上，以张钟端为首的一群赤诚的爱国志士，演出了辛亥革命史上悲壮的一幕。

为了实施起义计划，张钟端等召集新军、五区巡警和近汴各县的革命党人和民间武装代表，在开封公立法政学堂聚会。会上，张钟端慷慨陈词："今兹革命成败，即汉人存亡关键，诸君当以决心从事，努力进行，勿贻汉族羞！且人生自古谁无死？惟取义成仁，方能不朽。彼饱食暖衣，醉心利禄，逸居待毙者，与禽兽奚异哉！"这些话，道出了革命党人的共同心志，"于是同人之气愈壮"[③]。遂决定：由王庚先、张照发等加紧联络军队，刘荣棠、李古民等加紧联络学界，刘炳阁等继续发动巡警，再约同谘议局议长方贞、副议长张嘉谋等联络谘议局，乘齐耀琳到任未久、立足未稳之际，于12月22日(农历十一月初三日)在开封举行起义。会议还推定张钟端为革命军总司令，另又推定副司令、参谋长、敢死队长，等等。

会后，各方面的工作均夜以继日地开展，虽然是一种"杀头的事

---

① 开封《自由报》，1912年12月22日。

②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369页，中华书局，1963。

③ 开封《自由报》，1912年12月2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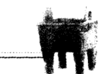

张钟端

业”，但“各界加入者亦极踊跃”①，不少获得讯息的街巷居民也争相报名参加。像李心敬，从熟识的党人处获知准备起义的消息，“惊喜若狂，思愤勇争先，誓与清军战”；开茶馆的回民单鹏彦，经革命党人联络，即带同500名仁义会众听从党人调遣；在汴的巩县人崔得聚、新郑人张树宝，均主动央求熟人、同乡介绍入盟②。商号铺户也用实际行动支援起义，捐出款项20万元充活动经费。革命党人更抱定破釜沉舟的决心，与“虏廷”作最后的拼搏。像巩县王天杰，在西路接到党人促其返汴的急电后，即赶到家中与父母诀别：“儿受父母养育之恩，未能侍奉报答万一。今乃清政不纲，满奴盈廷……幸武汉举义，光复汉业，男儿具昂藏七尺躯，当建一番大事业。儿从此荷戟从军，为犁庭扫穴之举，望父母无挂念焉。”③

12月19日，张钟端等再次在法政学堂集会，商定了22日举义的具体行动方案：

1. 在开封城内组织军、警、学生和民众2 000人，先攻占铁塔旁的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287页，中华书局，1981。
② 开封《自由报》，1912年12月22日。
③ 开封《自由报》，1912年12月22日。



弹药库,配备弹药后,再以其中的 1 500 人,分两路攻占巡抚衙门,余 500 兵警戒,龙亭附近的满营旗兵和拱卫司令部,所有人员均臂缠白布,以资识别。

2. 组织一支 20 人的暗杀队,伺机刺杀齐耀琳、柴得贵,这是"擒贼先擒王"。

3. 赶调豫东和新郑、中牟民军,部分人城参与举事,部分埋伏在城东大堤外和祠西近郊,届时里应外合,攻取省城。

4. 定于 22 日夜 3 时(23 日凌晨 3 时),由敢死队在龙亭、鼓楼点火为号,各路见火即迅速行动。

5. 备好安民告示、檄文、通告书数千份,起义成功后散布各地。

6. 通知京汉路沿线各州县的革命党人和民间武装,届时截断铁路,阻绝南北清军进攻。

会后,各方面人员各司其职,期望一举攻占开封城。

然而,貌似盟友的立宪派不仅没有像革命党人期待的那样策动谘议局襄赞独立,反而将有关情况"秘密告发"于齐耀琳。阴险毒辣的齐耀琳与早先曾假惺惺归附革命的巡防营统领柴得贵密谋,让柴派巡防营总稽查张光顺等假装参加起义,"焚香发誓,且歃血为盟,以明无他意"①,从而探悉了革命党人的行动方案。齐、柴随即做好相应的部署。赤诚报国但缺乏经验的革命党人却被蒙在鼓里。

12 月 22 日白天,各部分起义人员都做好了相应的准备,从外县调来的民间武装也赶至预定地点潜伏。入夜,张钟端等起义领导人聚集在开封东北角的优级师范学堂西一斋,作临战前的集议。夜 11 时,埋伏在学堂附近的巡防营士兵,在柴得贵的督率下,冲进了西一斋宿舍。张钟端等起义领导人猝不及防,当即被敌捕获,只刘荣棠等少数几个越墙逃出。随后,敌人又去法政学堂、高等学堂、中州公学以及全城旅店大肆搜捕,先后被逮者总计四五百人。

张钟端等被敌人押送营务处,齐耀琳委派候补道商作霖、开封知府

---

① 上海《民立报》,1912 年 1 月 14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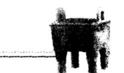
吕耀卿等连夜刑讯。商、吕等“用军棍、皮鞭、火香、夹棍非刑拷逼，(使)身无完肤”，还“用铁锤叩胫敲肘，骨肉破碎，血淋漓下”，硬要张钟端等自认为“土匪”。(因当时南北停战议和，不便残害革命党人)张钟端等横眉冷对，嗤之以鼻，大义凛然地陈述自己的革命情怀和各人承担的职务，针锋相对地表示起义目的是为了“促虏廷之命”、“建立民国”，虽备受酷刑，却“淋漓痛骂，毫无惧色”。他们告诉凶残的敌人说：“汉族健儿岂屑向满奴乞命哉？矧自由幸福靡不由铁血购来，吾人不流血，谁复肯流血者？……指日民军北上，扫虏穴庭，凡属汉奸，难逃斧钺，幸抉吾目悬诸国门，旦暮望之耳！”敌人追问同党，回答是：“满奴汉奸外，皆是同党。”敌人质问：“现在停战期内，汝等何敢暴动?”回答是：“此次停战，确系虏廷狡计，惟民军堕其术中。”



张钟端等烈士就义之地

12 月 25 日清晨，阴云密布，天气阴沉，北风怒号，沙土弥漫，色厉内荏的敌人将张钟端等 11 位志士押赴刑场。临行之时，张钟端与留在狱中的战士握手道别说：“吾等今日系生离死别之时，愿君生一时负一时之责任，刻骨铭心，勿忘今日。倘异日脱离难关，再接再厉，吾等九泉相助，共成大业。为吾等复仇，不啻为同胞复仇也。”

在先后分两批(傍晚又一批)被军警押送刑场的路上，张钟端、张



照发、王天杰、张得成、刘凤楼、徐振泉、李鸿绪、李干公、张树宝、单鹏彦、崔德聚等 11 人一路高呼："革命万岁！""共和万岁！"凶残的敌人故意命刽子手将人缚在桩上，用枪瞄准头部放 10 余发，俟头胪已成碎粉不可辨认，然后击其下部……一回只击一人，令其他目者见。俟一人击碎后再缚一人。然该党人皆从容就义，毫无惧色[①]。噩耗传出，省内外革命志士都悲愤万分。有做诗《哭河南落难同志诸义士》云：

> 月黑天阴鬼哭秋，拼将铁血铸中州。可怜爱国奇男子，多被凶残一网收。
>
> 枪弹轰身骈首亡，从容就义岂寻常。成仁取义今无愧，留得英名照梓桑[②]。

开封起义失败了。河南爱国志士用自己的赤诚和鲜血，为辛亥革命史添写了光辉的一页。

三、外县志士的起事活动

从游说应龙翔反正到分路活动，大体上都是按照河南同盟会组织的统一部署开展的。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同盟会员或青年志士自行于所在州县组织力量，采取多种形式，响应武昌起义，或发动武装起义，以促成河南的独立。

在信阳，一直与湖北革命党人联系的文学社社员刘化欧等行动最早。武昌起义前夕，他们就推定学界代表、工人代表和会党代表分别组织农民、工人和会党。接到武昌起义的喜讯后，10 月 16 日，刘等集合 1 000多名农民、铁路工人和会党群众，加上新军中的革命士兵 46 人，组编为湖北革命军独立第一协，在武胜关起义，将关南北铁路拆毁二三里。因遭到南下的大队北洋军的镇压，刘等率部转往武汉，留下部分人

① 以上俱见上海《民立报》，1912 年 1 月 5、18、19 日；开封《自由报》，1912 年 12 月 22 日。

② 王诗依：《清华集》，湘迎作。

员在原地坚持隐蔽斗争。11 月 7 日、10 日，他们先后炸毁了明港清军粮库和花园弹药库，复在东篁店车站倾覆清军的运兵车，给清军造成重大损失，铁路工人余大猷等也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汝南、新蔡、项城一带，革命青年秦鼎新、戴北春、朱苏亚、单昌等联络各处地方武装，与皖北革命党人组织的淮上军（新蔡阎子固任副司令）取得联系，做好起事迎接淮上军的准备。

在南阳府属和汝州境，革命党人高树敏在各处日夜奔走，联络同志，伺机起义。

在陈州（淮阳），同盟会员严惟恺得到武昌起义消息后，即召集同志议商响应办法，随后散往各街巷，宣传革命和动员民众剪除发辫，获得各阶层的热烈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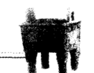
在桐柏，同盟会员韩殿珍等组织了一支 100 多人的革命军，自制刀、矛等武器（仅有一枝快枪），进攻桐柏城。

在永（洛）宁，革命青年许宗衡等组织民众，收集武器，计划于 10 月 21 日分路攻取宜阳、永宁和洛阳城。

在孟津，同盟会员王北方在白云观聚众，组织革命军，自任司令，待机起事……

据 1912 年年初的河南谘议局电报，说全省“起民军者已 30 余处……屡仆屡起”[1]。这只是一个大略的统计，难免有所遗漏。总的情势，正如当时人所概括的：“地方军民，赞成共和、亟思响应者比比皆是。”[2]这些分散的、小规模的响应或起事活动固然无望取得胜利，但同样反映出河南革命党人和各阶层民众高昂的革命热诚，使这次革命成为一次具有全省规模的民主革命运动。

① 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八），第 157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② 黎元洪：《黎副总统政书》卷六，第 1 页，上海古今图书局，1915。



第三节 省外进军和“实现共和”

第二次开封起义失败后，河南革命党人在齐耀琳、柴得贵一伙的残酷镇压下，难以在桑梓立足，被迫“四处星散”，转往上海、陕西、湖北、安徽等独立省区，“留存省垣，寥寥无几”①。这个时候，独立各省正在南方组建中央革命政府。1912年元旦，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和南京临时政府胜利诞生，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这是辛亥革命的重大胜利，给清王朝敲响了丧钟。河南革命党人虽新受大创，但由此受到巨大的鼓舞。他们总结了历次失败的教训，决定改变方略，从外省组织革命军进取河南。

一、秦陇豫复汉军

最先出师进取河南的是陕西军政府。祖籍河南的军政府大统领张凤翙和起义领导人之一的新安人张钫对河南都十分关注，陕西独立后不久，就特命张钫为东路征讨大都督，组建和率领秦陇复汉军东征河南，促成河南早日摆脱清朝统治。11月11日，进占潼关。军中本多河南子弟，豫西灵宝等地的青年学生和革命志士又赶来从军，原带的两标(团)队伍也不断扩充。11月下旬进克阌乡，又进取灵宝，计划由此攻占洛阳。由刘纯仁等策动的豫西绿林武装王天纵部数千人在攻取洛阳失败后，赶至灵宝虢略镇与张部会合，其他多支豫西绿林武装也齐来参加东征军，使始建时不过两标的东征军迅速扩大至36标，遂将全军改称为“秦陇豫复汉军”。但人马虽增，械弹却很缺，攻击能力因此大受限制。在麇集于灵宝、洛阳一带的北洋军和毅军赵倜部的阻击下，经连续苦战，终于进占灵宝、陕州等城。所经各县，“民间欢迎供济，且在山上挽巨石以助战”，甚至“袒臂奋呼，赤手前搏，虽死伤遍野，卒不畏

① 《申报》，1912年3月4日。

却"①，给东征军以极大的支援。袁世凯急调北洋陆军第二、第六等镇增援，豫西清军遂增至2万余人，而且器械精利，粮弹充足。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东征军只能在豫陕边境与清军僵持，"襄助河南父老子弟速谋独立"的战略图谋因而也难以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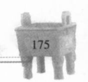
二、威武军和河南北伐军

武昌起义后，在日本士官学校、东斌学校和其他学校学习的一批河南籍同盟会会员，如刘基炎、潘印佛、李愍、张国威等，迅即结伴回国，参加革命。他们从上海踏上国门时，正赶上陈其美等发动上海起义，随即投入攻打制造局的战斗。"是役，各省同志虽多，而以河南人最为勇猛。"②加以刘基炎等在日本大都学习军事，所以上海军政府成立后，都督府所设四科中的军事、军械和军务三科科长，即分别由潘印佛、李愍、刘基炎担任。考虑到河南战略位置特别重要，上海军政府不久就作出决定，委派张国威组建一支规取河南的武装，即取张(字其武)名、字中的最后一字，名此军为"威武军"。张聚集在沪的豫籍志士，在徐家汇设立司令部，迅速在市区和周边各地募集5营(4步兵营、1炮兵营)官兵，共1 500余人。其军官大半为河南籍，士兵中河南人也不在少数。加紧训练，待命北伐。

正当此时，受河南同盟会组织派遣的刘积学等于11月下旬到达上海，进谒都督陈其美和同盟会领导人黄兴，递送河南同盟会的乞援书，并提出了"集合内外豫省同志组织河南北伐队"的计划。陈、黄都积极赞助。随即由旅沪的豫籍同盟会会员贺升平等在六马路祥和里建立河南北伐军支部，在同盟会的《民立报》上刊发布告，号召旅沪同乡速来报名。沪市的豫籍商人和苏州、湖州等地的河南同乡会也捐资数万元以供军用。河南省内数百革命青年和民军在各路起义失败后，在刘积勋、阎子固等带领下也来到上海，遂以他们为基干，组建起2营河南北伐军，由潘印佛、刘基炎等协同训练，"克日分道进征，以图大河南北之

---

① 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七)，第36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②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中华书局，1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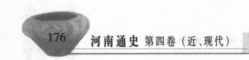
光复”。行前发布北伐军宣言书，宣布北伐目的是“断贼兵之后路，捣满酋之巢窟，联合东南民军，以达我共和政治为目的”。刘基炎被沪军都督府任命为全军司令。

1912年1月，经两个月训练的威武军，首先从上海出师北伐。全军乘舰沿江西上，抵达安徽芜湖。因以副司令盛典型为首的一批皖籍官兵想留在本省，驱逐盘踞在皖北的清军，遂由盛率1营，于芜湖登岸，北上寿州与敌作战，余下的4营仍由张国威统率继续西进，至湖北黄州登岸。南京陆军部因张在芜湖分兵时不听命令，改任张鹗翎为司令，全军因此在黄州延搁了近两个月才继续北进。等他们进至河南边境的柳林、李家寨一带时，“南北统一”，北伐河南的计划因而取消，各营官兵被北洋军李纯部改编。



上海民军北伐队出发

河南北伐军于1912年1月中由刘基炎率领，乘舰由山东烟台登陆北伐。由盛典型统带的皖北威武军1营，先是受命回沪，随后并入北伐军的先锋队，及至刘基炎等率军进取黄县、登州时，也因南北罢兵，停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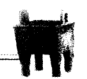
了军事行动。

三、旅鄂奋勇军、湖北北伐军和淮上军

在首义之区湖北，原新军第八镇的官兵中籍隶河南者本来就不少，参加武昌起义的也为数颇多，湖北军政府成立后，他们多在军政府或革命军中任职，对河南的命运自然也异常关心。近鄂的河南各府县革命志士和青年学生，复纷纷向湖北军政府上书，有的且进献山川形势图，呈请湖北派军规取河南，他们将在本地起事响应。一些革命党人，如陕县王治军，就间关入鄂，请都督黎元洪北伐河南。在豫西与清军对峙的张钫，也特电黎元洪，提出同样的建议。南北和议开始后，武汉战事停止，不少北洋军退驻河南。湖北革命军中众多的豫籍官兵更强烈地希望组织队伍，解中原父老于倒悬。他们在武昌中州会馆集会，决议组建河南旅鄂奋勇军，获得湖北军政府的支持。消息传出，在鄂的豫籍官兵和转至湖北的河南党人、学生，争相报名参军，很快就成军3大队，总数2 000余人。新野人马云卿被任命为司令，刘凤桐、李□斋、王治军等豫籍志士在军中分任要职，积极筹办军械粮饷，做好进军南阳的准备。同时，湖北军政府又另派安襄荆郧招讨使季雨霖组建6纵队的北伐军，从鄂北挺进河南，以求早日底定中原。“首义军中干部，原多豫、襄籍，咸乐从之。”全军因此也迅速组建完成，计划分三路进取新野、邓州、唐县。

1912年1月下旬，湖北北伐军和河南奋勇军在襄樊地区集中，随即分道入豫。为了迎接和支援这两支军队入豫，豫西南革命党人和青年学生纷纷赶到襄阳，在那里组建起“河南共和会”，具体工作是筹集粮秣，作两支革命军的得力后勤。所需经费，均由宛属各县人民自动捐献，像邓州丁瑞华一家，即将其存银400两全部捐充军用。两军刚进至新店铺，“人民欢迎，壶浆迎师，相望于道。更有各地志士，如新野鲁礼玉等，荷枪入伍者数十人，军威益振”[①]。2月14日、16日，新野、邓州迅即被革命军所攻占。另支北伐军也由湖北枣阳进克唐县。随后，奋

① 《河南文史资料》第6辑，第20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



勇军向南阳挺进,2 月 17 日(农历除夕),进抵南阳三十里铺。

据守南阳的清军南阳镇总兵谢宝胜深知军民都倾向共和,挽回无术,就与南阳知府、知县一道,弃城逃命。临走之前,谢让所部在农历正月初一(2 月 18 日)这一天,在南阳城任意抢劫,满载赃物逃往方城(不久谢自杀而死)。19 日,在南阳人民的热烈欢迎下,马云卿率奋勇军进入南阳城。2 日后,复召集各界代表会,公举同盟会员杨鹤订为南阳府知府,朱霞为南阳县知县。又打开常平仓,出存粮数千石赈济贫民(取价 1/3),并通令民众一律剪除发辫。接着,镇平、内乡、淅川也摆脱了清朝统治,整个南阳府均为革命军所控制。

马云卿等在宛"思大搜军实,克日北上,廓清二百余年尸居余气之(清)政府"①。恰在此时,原先加入秦陇豫复汉军的王天纵部,根据陕、豫革命党人的共同策划,2 月 18 日于陕边龙驹寨东下,经荆紫关、内乡、镇平等处,于 3 月 4 日入南阳与马云卿部会合,共图河南。然而,湖北都督黎元洪因清帝业已退位,南北已成"一家",遂三番五次电令北伐军和奋勇军停止军事行动,并立即取消"北伐"名义;孙中山也连电黎元洪,以此为嘱。这样,从湖北一路进取河南的计划也半途而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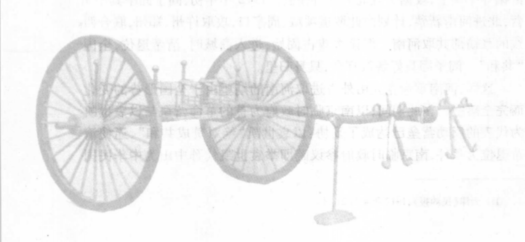
从皖北进取河南的淮上军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淮上军原是辛亥革命期间皖北革命团体"信义会"组织的革命武装,新蔡志士阎子固、刘积勋等均曾参与活动,阎任该军副司令。1911 年秋冬,全军在司令张汇韬等率领下,攻据了皖北大部分州县。1912 年年初,阎子固率其中 1 营,北进河南新蔡,计划由此取道项城、周家口,攻取许州、郑州,联合西线的张钫部共取河南。但该军攻占固始,进入商城时,清帝退位,全国"共和"。阎子固只好解散部众,只身归里。

这样,河南革命党人由外省进取河南的期望由于全国形势的变化而完全落空。在此期间,以南京临时政府为首的革命营垒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反动营垒已达成了妥协:以袁世凯"绝对赞成共和"、逼使清帝退位为条件,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即举袁世凯代孙中山为中华民国

---

① 天津《民约报》,1912 年 4 月 21 日。

临时大总统。于是，袁世凯就加紧“逼宫”。立宪派河南巡抚齐耀琳等本着“请愿共和而不独立”的方策，也多方配合。2月5日，齐致电清内阁，称全省“官民士庶异口同声”要求共和，要求清廷“即时宣布共和”。12日，清帝宣布退位，清王朝覆亡。15日，由包括河南在内的17省代表组成的临时总统选举会，全票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实现了“南北一家”。次日，齐耀琳致电袁世凯表示拥戴，祝贺袁世凯完成了篡夺革命成果的“大勋”。在这样的情势下，河南就未经独立而转入民国。





第三十九章
民国初年的政局和社会

第一节 “共和”幻想的破灭

一、民主波澜荡漾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辛亥革命作为一场比较正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社会历史的推动作用还是不小的，民主影响也是比较深广的，即使在河南也不例外。1912—1913年上半年，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也出现了一些被舆论界视为“破天荒”的新气象：

（一）荡漾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民主波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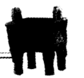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时间虽短，但它所揭橥的民主原则和革命精神，所颁发的除旧布新法令，如荡涤专制遗毒，废除跪拜旧礼，剪除作为清朝臣民征象的发辫，用阳历代替阴历，等等，还有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袁世凯还不敢公然废除，在河南也具有有效性。人们虽然对革命成果旁落深感失望，但“共和民国”的建立毕竟是激动人心的巨变。城乡人民确实都不无理由地相信，今后能有较多的“自由”，能过新的生活。尤其是青年学生和知识界人士，根据南京临时政府宣示的“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官吏乃国民“公仆”的思想理论，起而过问政治，于“平时官吏之不合乎心者，皆毛举细故，列款呈控，要求撤换”。同时又纷起组织各种政治团体或某

府、某州同志（乡）会之类，“监督政府”，“干涉行政”，而且往往径直向都督或民政长表示意见。据张镇芳说，当时“绅权膨胀，士气浮嚣，不论何人、何时，纷纷求见，稍一迟缓，即骂为腐败官僚，甚有挥老拳于文武巡捕者”①。在一些中心城市和县城，热心人士组织起“演说团”、“讲演社”（包括着重鼓吹女权的“妇女演说团”），积极向民众“解释新建国体、政体之意义，并劝导剪发（辫）、放足、破除迷信”②；或创办“公民自治团”、“新新社”、“天足会”之类，致力于移风易俗。世代禁锢于旧礼教中的妇女，也勇敢地提出“男女平权”的主张，或向传统的包办婚姻提出挑战，致书男方解除婚约。有被骗为人做妾者，也提出此种陋习，“有碍女权，违背一夫一妻之制”，理应离异，以“保障女权”③。这些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辛亥革命促进了人们的民主觉醒，也冲击了传统的伦理观念，致使一些封建官绅目击心伤，哀叹“中国沦为夷，无复大道存，纲常扫地尽，诈力相并吞”，“男女溷无别，上下紊不分，名为民为主，仍各私其亲”④。

（二）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兴起了一股组建政治团体的热潮

在清朝统治时期，广大人民自然没有什么政治权利，就是退职官绅，也严禁其“干政”。民国成立后，情况改变了，尤其是在开封、郑州等城市，“集会结社之风大昌，而政党亦随之而起，凡属公民，对于政治上所建议者，无不思置身于政党以为荣……一般人士震于志士伟人之浮言嚣论，好大喜功，平权自由之说，更深中于毫无定识之青年学士，奔走遑遑……嚣嚣然以治国平天下之言自命”⑤。这是1914年复辟逆流涨盛时开封一家报纸对两年前省内政治风尚的追述，虽满含讥刺，但毕竟记录了当时人们参与政治生活的热忱，虽则参与这种活动的多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中不乏政治投机家、野心家。尤其是在

① 张镇芳：《格格言》。
② 《河南新志》卷六；民国《太康县志》卷三，第1页。
③ 开封《自由报》，1912年10月31日。
④ 王廉：《大梁诗钞 · 世变》（新乡市图书馆藏抄本）。
⑤ 开封《时事豫报》，1914年1月24日。



全省的政治中心开封，1912 年 2 到 3 月，就出现了“豫省共和急进会”、“公民进步党”等政团，到 1913 年春，先后成立的政团和各种名目的会、社、团、所，总数达 40 多个。其他城市，如郑州，组建党、会之风也“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到 1912 年秋，各种党、会成员总数已近 2 000 人。这里面，最重要也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新建的同盟会支部，4 月中旬成立。9 月 4 日改组为国民党。接着成立的有统一党支部（4 月下旬）、民社分社（5 月下旬，旋改为共和党河南支部）、国民共进会河南分会（5 月下旬）、社会党支部（5 月下旬）、统一共和党支部（7 月中旬）、工党支部（7 月下旬）、大同民党支部（10 月中旬）、自由党支部。（以上各党、会，在“支部”、“分会”前均加“河南”两字作为该政团正式名称）其中的一部分为革命党人所组建（常有同一同盟会员而发起、参加几个不同政团者），以建成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此类政团的杂然并起，是各种政治力量都想染指政权的反映，虽品类不齐，但对民国初年的民主潮流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冲刷政治积垢，抵制封建弊政

1912 年 4 月 10 日，取代清末“尸位滥竽，向不问事”的谘议局而召开了临时省议会，因为受到民主潮流的推动，通过了一些除旧布新的决议案，诸如裁减官吏、公所，剪除发辫、清理公款、不准官吏兼职、裁撤州县衙门旧吏役等，还为张钟端等辛亥十一烈士平反，由省方分别抚恤其遗属。可是由于张镇芳一伙的顽固抵拒，大都成为空文，只不过多少曲折地表达了一点民意。在县一级，新成立的议事会，议员虽多为举、贡、生、监，而且多为地方封建势力所把持，但仍有少数议事会在民主势力的推动下，反对封建弊政，或通过了一些有积极意义的决议，部分且见诸实行。如永宁议事会议员 18 人，16 人系旧贡、廪、监生，不过其中有 7 人以后又毕业于学堂，共同控告县知事“滥刑苛罚，纵匪殃民”；阌乡县议事会除通过划一钱粮征收办法以减轻以往绅轻民重的积弊外，

“其他对于当时弊政，亦颇有厘正……多经施行”[①]。就县行政来看，少数革命党人或进步人士被任为知事后，对多项弊政也大胆厘革。如同盟会会员暴式彬在孟县裁革旧胥吏，改旧日知县包揽一切为分科治事，裁免药材板厘等杂税，颇有“百废俱举”之象[②]。尽管在河南120多个府、州县官员中，类似的“好官”和“善政”十分罕见，即或有之也很快人逐政亡，但毕竟在污浊黑暗的官场中闪烁出一点民主或革新的火花，成为辛亥革命的又一种回响。

（四）人民的爱国热情高涨

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河南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可以尽其爱国的天职，新建的共和民国将能“龙行虎步，辉耀于亚东大陆”[③]，因此爱国热情大为昂扬。袁世凯政府以出卖国家重大权益为代价，向帝国主义乞求“善后大借款”的消息在报纸披露后，河南人民就群起反对。1912年5月，由同盟会河南支部发起，集合开封各团体，召开旨在救亡的募集国民捐大会。与会者3 000余人，一致赞成自办国民捐以抵制帝国主义攫夺中国财政监督权的野心，以免国人沦为帝国主义的“牛马奴隶”。为此，特组建河南国民捐事务所，著名的女同盟会员刘青霞被举为总理，在全省开展募集国民捐活动；派同盟会员凌钺、上官邦彦等为代表，入京与各省代表一道，共拒善后大借款。随后，各种募集国民捐的团体在许多城镇先后成立，城乡人民特别是下层群众都自动解囊捐献。商丘“家中吃饭尚难”的贫农妇女高爱华，尽交其拾麦变卖所得的800文钱充国民捐；甚至一些乞丐，像在开封行乞的李长兴、信阳行乞的方标米等，也“各罄讨饭囊捐输”[④]。这反映出人民群众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同样，当该年秋冬传来英国侵我西藏、俄国侵入蒙古（外蒙）的消息后，城乡人民无不同仇敌忾，举行“救蒙大会”，抗拒

① 民国《洛宁县志》卷三十一，第32页；民国《阌乡县志·通纪》，第12页；民国《重修信阳县志》卷三十一，第3页；民国《西华县志·大事记》，第15页。

② 民国《滑县志》卷十七，第24页；民国《孟县志》卷三，第16页，第四卷，第76页。

③ 开封《自由报》，1912年7月2日。

④ 开封《大中民报》，1912年5月27日，6月25日；开封《自由报》，1912年8月22日。



帝国主义侵略，一些青年学生还组织爱国反帝团体，自愿请缨杀敌，"以全国土而抗暴俄"、保卫西藏。人们之所以如此关心国事，正如临颍学生所说："中华始成民国，凡在领土内者，人人皆是一分子。"[①]这种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结合在一起的近代爱国主义，也因辛亥革命而在河南各阶层人民中更加昂扬。正是在这种政治氛围中，工商界也涌现出一股倡导国货、自保利权的热潮。在开封、郑州等中心城市，出现了"国货维持会"、"服用救国会"之类组织，由民族资本家刘海楼等发起，以"勉用（本）国（货）物"、"改良国货"、"畅销国货"为宗旨，提倡发展民族工业，"以饷我国民爱国之苦心"[②]。此后数年，河南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有较大的发展，与辛亥革命后人民爱国热情高涨的历史机缘是分不开的。

上述种种，既反映出辛亥革命的积极影响，也显示出河南人民将民主革命深入进行下去的愿望和要求。

二、反动势力的反扑

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河南进入民国后，都督取代清朝的巡抚掌理全省军政。齐耀琳因在辛亥革命期间残酷地屠杀张钟端等革命志士，河南各阶层人民恨之入骨，就是袁世凯对他也难以庇护，因而在顶充一个多月的河南都督后即黯然离职。由谁来承担这个要职——由哪种政治力量据有辛亥革命的主要成果，就成为首先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也是各派政治力量争夺的焦点。为了反映推翻了清朝帝制的辛亥革命真是一场革命，也为了体现整个辛亥革命期间河南革命党人的巨大业绩，汇聚到开封的各府县革命党人和先进人士，都理所当然地认为，首任河南都督应由河南第一个同盟会员、且在南京临时政府担任要职的曾昭文担任（后又另提杨源懋、张钫等人选），并特派代表晋京要求。另外，也有提请任命林绍年（前巡抚，闽人）、江翰（前河道，闽人）为河南都督的——这显然是官僚豪绅的主张。但袁世凯都不允

① 开封《自由报》，1913年1月1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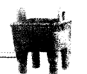
② 开封《自由报》，1912年6月30日。

准,3 月 23 日,硬是命其表弟张镇芳署理河南都督。张原系直隶总督,是个十分守旧、腐败的封建官僚,久为直隶士民所不容,却被袁特意选任为河南都督。因为河南与山东、直隶一样,历来是袁世凯的禁脔,就是非北洋系亲信官僚(如林、江)也不容染指,革命党人自然更不许插足。25 日,张镇芳就抵汴“履新”。因“请愿共和而不独立”而为袁立了功的旧官僚王祖同(旧知府)则接任布政使(旋改称民政长)。省会人士虽十分激愤,各团体于 26 日召开联席会议,发电十余通,拒绝被直隶士民扫出的政治垃圾张镇芳窃取河南政权,临时省议会也集会反对王祖同的任命,但袁世凯根本不予理睬,且将张由署理改为实任。这样,河南的军、民两政长官,均由北洋系旧官僚充任。

张镇芳任职后,“治豫一遵清代成法”①,也就是完全继承封建专制主义的老套“贵贱予夺,任其喜怒,奖励惩戒,随其爱恶。命令一下,无论法律行为或不法行为,莫不风行雷动,罔敢弗从。省以内司道,省以外府厅州县,妾妇从命,奴隶性成,但有一无二”②,下迄地方民团团长、清乡所所长,也径直委派。都督府除挂起一面民国的五色旗外,旧抚署的一切设施,诸如大堂前的旗杆、鼓吹,大堂内清朝帝后“钦赐”的福寿匾以至印架上供奉的“圣旨”都毫不更动,旧有的吏、户、礼、兵、刑、工六房连同大小胥吏也照样保存,所有官员、夫役依然头拖长辫、打恭跪叩,来往公文中写及“国史馆”、“奉旨依议”、“钦命大臣”等字样时,仍一如过去单抬或双抬书写。下至各府州县,衙署内外也一切如旧,所出告示,除了末尾用“中华民国”而不用“宣统”纪年外,其余从格式、规程、口气均与晚清相同,连官衔上的“钦命”、“巴图鲁”等字样亦照写不误。实际情况确如开封一家报纸所说:“精神上之改革无论矣,即形式上之改革而亦无之。”③

这样的“民国都督”,自然不会尊重只会践踏民主共和原则,致力

① 《项城张氏族谱·家传》,第 46 页。
② 开封《自由报》,1913 年 1 月 21 日。
③ 开封《自由报》,1912 年 7 月 6 日。



的是"剥削民权"——窒息种种民主新机，消除辛亥革命的积极影响，明目张胆地对抗《临时约法》，下令"取缔自由结社、集会"，复"玩视立法机关(省议会)，俨然专制帝政"①。这还不够，张复于1912年7月27日指使暴徒闯入省议会议厅，开枪打伤同盟会议员王庚先等11人，为全国反动势力制造了先例。

在这样的都督的倡导和鼓励下，从省、府到州县、基层，"官吏恨革命党如故，官吏仇视学生如故"②。好些革命志士，像唐县的刘峨卿、古建安，固始的张选青、张幼亭等，均因革命期间"宣传共和"、"倡言独立"而被驻军管带加以"革命党"的"罪名"而遭惨杀，学堂毕业而剪除了发辫的青年，也多被迫亡命。一些县知事穿戴前清官服，"翎顶辉煌，时缉无发辫之人"，有学生抗辩不服，官斥之称，"汝学堂人尽是革命党"。相反，残杀张钟端等烈士的凶手商作霖(开封人咒称之为"伤天理")客死天津后，尸体运至开封，竟然"香花满地，鼓乐喧天"，当局派出的军队"亦排队恭迎如仪"③。方方面面，时时处处，实在与革命前毫无不同，其凶残和黑暗且有过之无不及。

三、农民的苦难和抗争

在广大农村，景况也很惨淡。久受封建盘剥之苦的农民，原本期望"共和时代，一切税粮全行蠲免"，至少"丁漕章程将从轻例"④。然而以张镇芳为首的统治当局不仅不缓免农民的钱粮，反而不断加重赋税盘剥。如1912年在中牟县，地丁每两加征200文，契税不论当、卖，全县一年加征1万余串；确山县开征车马捐，每地丁银一两，加征400文，又每亩加征"兵差钱"10文，甚至县知事"以过生日为名"，每保派钱二三百串；固始每两地丁浮收450文，每一讼案须交"呈钱"和"息费"数

---

① 天津《民约报》，1912年5月20日；开封《自由报》，1912年7月11日；汉口《强国公报》，1912年4月11日。

② 开封《自由报》，1912年8月19日。

③ 天津《民约报》，1912年4月29日；《强国公报》，1912年5月1—2日，3月31日，4月2日；《大中民报》，1912年6月25日。

④ 开封《大中民报》，1912年6月5日；《国民新报》，1912年5月3日。

万文。其他各县也大同小异。次年，全省又以“验契”为名，无论当、卖，每契一张，勒交1.1元。其他各种苛捐杂税也有增无减。至于官吏之暴虐、吏治之败坏，农民受祸尤深，就连最起码的期望——“见官不叫跪了”，也完全落空，连清末曾通令停止（不过并未遵行）的刑讯，也照样通行，贪赃枉法，滥用非刑，成了各县的常规。民国初建时少数办实政的知事，很快被排逐一空。全省吏治，如当时开封报纸概括的，“实属暗无天日，笔难尽绝”①。加上民初几年，大部分州县连年大旱，农民的苦难越发深重。在“首善之区”的省会开封，无论大街小巷，“每当黄昏而后，乞丐横陈道左、高卧檐下者，几更仆而难穷”；稍有衣物者，都拥向典铺，致使各典铺门口常日“累迹摩肩，拥挤异常，竟有人入典市终日而终不能递上柜台者”②。这是农村破产、农民难以安耕而拥入城市的结果，也是全省农村和城镇“民生凋敝”的缩影。

结果是引起农民广泛的反抗，许多人入山“拉杆”，武装反抗张镇芳一伙的暴政，致使全省“杆匪”迅即滋盛，以后震动全国的白朗起义由此发端（详后）。除此之外，许多县份的农民还发动抗粮抗税斗争，或反抗官府的其他勒索。如1912年春襄城、长葛、许州等地民众以联庄会形式，相约抗交钱粮，抗击官军；同年秋，滑县、汲县、浚县一带农民抗交秋漕，成群闯入县署，要求官府出示免粮；1912—1913年年初，郏县、宝丰等地大刀会众树旗抗粮，并提出“要土地”要求；稍前，伊阳一些乡村农民趁稻熟之际，分为十余队，“将稻田分亩霸占，驱逐出境”③等。类似事件在一两年内连续发生，反映出广大农民对“共和民国”幻想的破灭和进一步开展反暴政、反封建斗争的合理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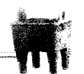
上述这一切，都表明辛亥革命除了推翻了满洲贵族的统治，用“共和民国”的招牌代替“大清王朝”外，并没有解决其他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回顾辛亥革命前，河南革命志士对于按照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

---

① 开封《自由报》，1912年10月31日。

② 开封《大中民报》，1912年6月29日；开封《时事豫报》，1913年4月23日。

③ 《申报》，1912年10月27日。



方案改造邦国是满怀信心的。不料众多的中州英豪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而建立起“共和民国”后，河南人民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冷酷的现实使他们很快从春梦中惊醒，满怀悲愤地呼喊：

> 大局纷纭若逝波，男儿爱国竟如何？
> 同胞颠沛伊谁救，羞向人前说共和。
> 堂堂贵戚莅中州，亡国余威使人愁。
> 大陆依然崇专制，共和若讨水东流！①

第二节　“二次革命”和白朗起义

一、革命党人挽救革命的努力

辛亥革命虽然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反动势力窃取政权而结束，但围绕着政权的争夺并没有终结。河南革命党人开始时固然对形势缺乏清醒的认识，认为“破坏”时期已告终结，今后所应注重的是兴教育、清盗匪、办实业等“促进共和之要政”②，但他们仍然认定，新建的共和民国应由革命党人掌理政权。1912 年 4 月上旬临时省议会讨论参议员候选人条件时，同盟会议员就理直气壮地提出：无数志士流血牺牲“始购得共和之幸福”，因此“反对共和者”、“顽固不化者”以及“在专制时代服从专制，至君主立宪时期改为主持君主立宪，及至共和时代又改为赞成共和”的投机政客，也就是守旧官僚和立宪党人，都不应选任。议员尚且如此，执掌政权的总统和都督更不用说了。因此他们力图维护和发展辛亥革命的成果，由真正的民主主义者执掌政权，防止倒退和复辟。

为此，河南革命党人一方面组织一些半地下的政治小团体，诸如

---

① 开封《大中民报》，1912 年 5 月 10 日。

② 开封《自由报》，1912 年 9 月 18 日。

“铁血监督团”、“中立敢死团”、“监督共和团”等，准备以暴力手段对付“抱野心、弄兵柄、将效拿破仑故事者”（指袁世凯）和本省的“假意共和者”（指张镇芳一伙）①。豫东南地区，且有少数激进的革命党人对辛亥革命的妥协本来就很不满意，“因一时兵力不胜，表面暂为推戴（袁世凯），其实内容，再派人发动二次革命”②。他们利用辛亥革命时期与皖北革命党人共组淮上军的老关系，继续在颍州、寿州一带暗组革命军，准备由光州、固始进规全省，以“改革河南政治”③。另一方面，更多的革命党人则力求凭借同盟会——国民党在人民群众中无与伦比的政治声望，成为省议会的第一大党，按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原则，凭借这个“立法机关”左右“行政机关”（政府）。包括河南同盟会领导人在内的绝大多数革命党人，都把主要希望和精力寄于、用于这一方面。这样，革命党人与“专制帝政”的张镇芳的斗争就不可避免，如同在全国范围内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国民党人与以袁世凯为首的军阀官僚集团的斗争不可避免一样。这是争夺政权的斗争，实际上是辛亥革命的延续。

事实很快证明，革命党人这种盘算只不过是弱者的幻想。尽管经过1912年冬的所谓选举，革命党人在1913年春成立的正式省议会中占有60%的议员席位，但“专制帝政”的张镇芳仍然视其同草芥。随着全国形势的逆转，张镇芳复用官职利禄进行拉拢收买，不少国民党议员变节反水。部分革命党人虽坚持革命立场，但“卒以附袁者众，寡不能敌，在省议会中渐居失败地位”④。议员们围绕着如何制定省议会章程互相辩难，袁世凯、张镇芳却已做好了武力镇压国民党的准备。1913

① 《河南新志》卷十六，曾广为传；汉口《强国公报》，1912年4月11日，4月28日；天津《民约报》，1912年4月25、28日。

② 开封《时事豫报》，1913年10月7日。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军事》（二），第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④ 民国《河南通志稿·中国国民党河南党务记》（未刊稿）。



年2月10日，张通电全国，不指名地斥骂国民党“系天下之罪人”[1]。国民党人委曲求全，力求停止“党争”，与张操纵的统一、共和、民主等党合组“国事维持会”，推张等军政首脑为名誉理事，希望能将现状“维持”下去，结果换来了张镇芳更猖狂的进攻。他借口国民党反对善后大借款，通电全国，声言要“与国民共弃之”[2]。

袁世凯、张镇芳的猖狂进攻，使革命党人从“建设”的幻梦中清醒过来，重新走上“破坏”的道路——武力讨袁，以挽救辛亥革命。1913年春夏，在汴的查光复等20多个革命党人自行在刷绒街多次秘密集议，决定与两湖和皖、赣革命党人联合行动，分派同志，重新联络省内军界、学界和豫西、豫南绿林武装，待南方反袁军占据长沙后，即在河南起事讨袁，共同“推翻（袁）政府，拥戴黄兴”[3]。为了削弱张镇芳的镇压力量，7月1日，他们成功地组织、引爆了开封城西南的火药局。张镇芳以此为由，派军警在全城大搜捕，捕杀了查光复、敖瘦禅等5人。一时全省风声鹤唳，形势紧张。

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起兵反袁，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正式爆发。河南革命党人也义无反顾地投入其中。他们依恃的力量，依然是辛亥革命期间的老盟友——民间绿林武装和仁义会、在园会等秘密会社，加上策动由原秦陇豫复汉军、威武军改编而成的部分军队（这方面，以后几乎一无所成），分路起事，以图夺取河南这一战略要地，配合南方讨袁军，推翻袁世凯统治。

当时，经过辛亥革命，河南的绿林武装和仁义会、在园会等会社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辛亥革命期间革命党人联络、利用的绿林武装主要是豫西王天纵等“兄弟伙”。民国成立后，这支民军被官府改编为河南巡防4营，交刘镇华统带，成为镇嵩军，未被收编的大部分“杆众”只好继续啸聚山林。对于他们，以张镇芳为首的军政当局固然残酷镇压，

---

① 黎元洪：《黎副总统政书》卷十七，第7页，上海古今图书局，1915。
② 开封《时事豫报》，1913年5月17日。
③ 开封《时事豫报》，1913年7月14日。





反对袁世凯反攻倒算的漫画

必“使若辈无遗类”而后已；就是当年竭力联络和依仗他们的革命党人，也因志在“建设”而把往日“指天画地，歃血为盟，阿兄、阿弟之声，几成骨肉手足之组合”的盟友抛于脑后。如成为省议会议长的杨源懋（此时已改入统一党）等人，对这些“破坏”力量也痛心疾首，“泛泛然以



'土匪'二字为一网打尽之计"[①],甚至再三指责张镇芳镇压不力。对待革命期间的另一盟友——仁义会、在园会等民间会社,由官府通令解散。这样,因害怕基层群众扰乱旧的社会秩序、幻想由议会斗争来"建设共和"的革命党人,就越发处于软弱的地位。不过,由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各地的所谓"杆匪"加速发展,仁义会、在园会等会社也潜滋暗长。由于他们与革命党人的嫌怨是可以消泯的,与北洋军阀的统治则是势不两立的。因此,当革命党人重新寻找这种旧盟友时,他们都接受联络,成为革命党人在河南进行二次革命的主要凭借。

当时,被列入革命党人联络名单的,有宝丰、鲁山一带的白朗、宋老年、李鸿宾等,还有南阳的孙玉章、许昌的宋一眼、襄县的丁万松、洛阳的申心宽以及方城、舞阳、嵩县、永宁、渑池、宜阳、内乡等地的"杆首"20多人(股)。其中最为严整、力量也最大的是白朗部,不仅引起省内而且受到省外革命党人的注意。

二、白朗起义

原为宝丰"乡间一庄农"的白朗,是在1911年秋间投身绿林的。初起时,杆伙不过二三十人,随同宝鲁地区各支绿林武装活动,武昌起义后,一起受分工负责南路的革命党人孙豪等联络,出攻鲁山县。民国成立后,这些绿林武装未被收编,仍有"学界数人潜谋其间"。当时所谓的"学界",往往是革命党人的代称(因为河南党人大都厕身学界,包括"学绅"、教习和学生),他们想以此为凭借,"参与河南政权"[②]。张镇芳督豫后,先后派袁世凯之侄袁克成、师长张锡元为司令率军赴宝丰、鲁山地区镇压。这些官军在四乡狂烧狂抢,以至"地尽焦土,墙尽走壁",连即将收割的小麦也被"一炬化为乌有"[③],结果是为渊驱鱼,使这些绿林武装更加壮大,许多乡村农民"视匪如家人,视兵如仇仇……

---

① 上海《民立报》,1912年5月1日。

② 杜春和:《白朗起义》,第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③ 开封《大中民报》,1912年7月2—3日。

兵多则弥山耕夫，兵少则周村皆匪”①，发展成为植根于民众的农民武装。1912年夏，他们在各处张贴告示，宣示起事原因：一是官府、官军“遇贫民则抄杀杖毙，倾荡财产”；二是地主、商人“明削暗扣，使钱币聚于一门而不流，田产归于一家而不通；在此者任意骄奢淫逸，在彼者常年颠连无告，束手待毙”。同时又以“中华民国豫南军政府鲁（山）县代调民军”名义，宣布“筹办军饷款项以及行军纪律”：

一、各里殷商生意归该商管业，此外田产充军政府助饷；

一、富户田地以3顷为度，除2顷归该户管业，外充军政府助饷；花户田地不满2顷，军政府秋毫不犯；

一、军政府自示之后，大小将校如有仍前起票、借钱、架女、扒坟、杀人、纵火者，军政府查出立斩；

……

一、花户因地足满3顷，人口（众多）仅足自顾者，军政府秋毫不犯②。

当时，省内其他绿林武装都在发展，但大都还是低层次的，从事传统的“打富济贫”的经济性活动（如豫东的应得胜、窦玉福、窦金山等股），有政治色彩的也沿袭旧式农民起事故辙，像嵩县的吴永魁股，建都称王。有“学界潜谋”其中且植根于民众之中的宝丰、鲁山地区“杆伙”则超越群伦，不仅打出“中华民国豫南军政府”的旗号，而且制定和颁发一套政策、号令，说明它已演进、提高成为接受“学界”影响的农民起义队伍。1912年夏间在鲁山各乡活动时，总数已达4 000多人，推张金兰为统领，白朗一“杆”70余人亦在其中。因此，在民初众多的绿林武装中，惟独这一支能迅速发展壮大，为省内外各种政治力量所瞩目，不是没有原因的。

---

① 杜春和：《白朗起义》，第20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② 开封《大中民报》，1912年5月30日。



不过,这支“豫南军政府民军”毕竟是“杆伙”的聚合,十多股“杆子”各有相当的独立性,“学界”虽能为之“潜谋”,但并没有也不可能使之成为一支有统一编制和指挥领导的正规革命队伍,一些杆首仍保有浓厚的流氓无产者的习性,包括张金兰在内,时常受官府“招安”。农家出身的白朗,则始终立场坚定,而且“性豪爽,善驭人,疏财仗义,以是能得众”[①],因而很快脱颖而出,成为众“杆”共尊的“大哥”和义军领袖。各处绿林豪杰和编余的散兵,还有不满张镇芳黑暗统治的革命党人和青年学生,都前来投效,声威日盛。1913 年 5 月 31 日,全军在白朗率领下,首次攻克县城——唐县。随后,越方城,西围鲁山,折而西北,于 6 月 15 日袭陷禹县,“出入千里,如入无人之境”[②],缴获了大批火炮、机枪等武器,队伍扩展至六七千人,拥有快枪两三千枝。省内外报刊竞相报道,更引起省内外各种政治力量,尤其是正在发动二次革命的国民党人的注意。

国民党军事行动的组织者、指挥者黄兴权衡形势,对白朗起义军极为关注。通过河南革命党人(包括白朗军中的“学界”人士)的中介,黄兴与白朗军取得了联系。白朗家乡宝丰县的一个科长,记述白 1913 年夏率部回家祭祖时,队伍严整,“一切举动,迥与前殊”,推断军中当有“谋士”为之筹划[③]。破禹县后,白朗军在襄城、南召、桐柏一带活动,“声言受黄兴命令,为北伐队”,打算联合在唐、泌一带活动的高鑫、宋一眼等股绿林武装,“通南方,以图大举”。为此,白朗特派 20 多人“命扮商人,到南方探听军队情形”,复让革命党人熊嗣鬻、贾谊为代表,去武汉,与在那里策动二次革命的革命党人邹永成联络,邹任命白朗为“湘鄂豫三省联军先锋司令”[④]。从白朗在这一阶段所出的告示,如不

① 乔叙五:《记白朗事》,《近代史资料》,1956(3)。

② 《众议院决议案汇编》第 1 册,张嘉谋等质问书。

③ 杜春和:《白朗起义》,第 20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④ 《众议院决议案汇编》第 2 册,丁骞等质问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3 辑,《军事》(二),第 9、11 页,《民众运动》,第 212 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明月份、不知贴处的“中华民国扶汉讨袁司令大都督白”布告、1914 年 3 月破荆紫关时发贴的“中原扶汉军大都督白”布告来看，说明这支义军是以“讨袁”为旗帜，所反对的是“虽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的袁世凯[①]。这与国民党人准备中的二次革命也是完全一致的。这些，都反映出这支由宝、鲁地区的绿林武装发展起来的起义军，确已接受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联络和政治领导，成为国民党二次革命的开场锣鼓或前哨战。不过，全军仍以“中原扶汉军”命名。所谓“扶汉”，在稍后义军发布的一则告示中曾有诠释：“纠合豪杰，为民请命，故号称‘扶汉’。孔子曰：‘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今汉虽复，若一任袁贼自为，而不早为扶持，行将即颠，则又焉用吾民。”[②]可见，“汉”即中国，并非专指汉族，“扶汉”即救国之意；“扶汉军”，亦即讨袁军。但全军建号为“中原扶汉军”，表明这支由起义农民组成的队伍，虽然接受了革命党人的政治领导，被纳入二次革命的部署，因而不同于旧式农民起义武装，但仍保有自己固有的特性和独立性，并不是革命党人直接指挥的讨袁军。

7 月 20 日，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致函白朗，称：“自足下倡义豫鄂之间，所至风靡，豪客景从，志士响应，将来扫清中原，殄灭元凶，足下之丰功伟烈，可以不朽于世。”要求白朗相机进攻，“断彼后路，窥取豫州；若能多毁铁道，使彼进（军江南之）路阻碍，为功实非浅鲜”。最后又特别揭示“此次兴师，专为讨袁，以谋吾民之幸福”[③]。可惜，此函经有关人员带到开封国民党人开的民立报馆，未及访投，就在 7 月 28 日被查抄报馆的军警缴获。但革命党人与白朗军的联络活动仍在继续。在省内各处分头准备武装反袁的国民党、大同民党党员，如鄢陵的姚黄、洛阳的刘果、商城的熊嗣鬻、新蔡的阎子固等，都把联络白朗作为各自反袁计划的重要一环。在上海，河南国民党总代表李亚东与运动员

① 杜春和：《白朗起义》，第 223—224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② 杜春和：《白朗起义》，第 225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③ 开封《时事豫报》，1913 年 8 月 5 日所刊影印黄兴原函。其他文献所刊该函文字稍有不同，当以此影印件为准。



夏述唐也秘密策划“与白匪联合”[1]。居住信阳的川籍人士李绳武,因“受孙、黄委任勾结白狼(朗)扰豫罪”而被密探捕获解汴[2]。白朗军中的革命党人,也继续发挥其参谋、引导作用。特别是南方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无数青年混入贼(白朗军)中,代为筹划”[3]。上列一些资料说明白朗军与以往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同,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二次革命确有较密切的联系,以反抗北洋军阀黑暗统治,反对袁世凯专制、复辟,挽救共和制度为自己的任务。1914 年白朗军在陕西西安附近发贴的布告,先追述了推翻清王朝“异族专制”的“往岁革命”(辛亥革命),继而说道:“方幸君权推倒,民权伸张,神明华胄,自是可以自由于法律范围,而不为专制淫威所荼毒。孰料袁贼世凯狼子野心,以意思为法律,仍欲帝制自为……”[4]就明白地说明了这一点。

三、革命党人的讨袁活动

在河南反动统治一方,二次革命的爆发,更给他们提供等待已久的消灭民主力量的机会。8 月 3 日,张镇芳指斥国民党河南交通部为“叛党机关部”,并宣布全省戒严。开封各街巷,军警荷枪林立,晚 10 时后,居民一律不许外出行动。各县城和交通线上,也分派军警,盘查行旅。23 日,张又发布《取缔国民党告示》,复组建了一个专门侦缉、屠杀革命党人和进步青年的军警联合会,派出大批男女密探,四出侦伺,凡邮电和人民日常交往中稍有可疑之处,甚至“有与南方友人通讯者”,即捕送“阎王审”(因军警联合会头子警察厅长阎济宽、督署参谋长王灿章、审判官沈德本,故当时人们将 3 人之姓联缀一起,用此谐音称呼该机构,以示被捕收审者等于见阎王),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枪毙”。于是开封“无日不杀人,每杀必有数十人押赴刑场”。半年左右的时间

---

① 杜春和:《白朗起义》,第 228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② 民国《信阳大事记采访稿》(稿本)。

③ 杜春和:《白朗起义》,第 35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④ 杜春和:《白朗起义》,第 225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内，所杀达4 000人以上[1]，外府县还未计算在内。到次年2月张镇芳离职时，光关押在开封监狱中的待决之囚，还不下2 000人。其凶残和疯狂，超过了历史上的暴君，充分反映出反动势力对民主势力的仇恨。乡村的地主豪绅也四起呼应，卷起一股"杀秃驴"（剪了辫子的进步人士）恶浪，致使全省城乡，家长都不敢让子弟在学校上学，大批学校因此停闭。

面对着漫天的腥风血雨，不少国民党员宣布脱离该党，或转入拥袁的民主党、进步党，但仍有不少真诚的革命党人勇敢地投入二次革命；一些进步人士，以及接受革命党人联络的个别地方官吏（如新蔡县知事王文同），也激于义愤，与革命党人站在一起，有的且倾其家财，资助党人组织讨袁军。大河南北许多绿林武装和民间会社更不计民国成立后被革命党人抛弃的嫌隙，加入反抗北洋军阀的行列。然而，经过此前一年多的政治风浪，这时的河南国民党人已难形成有力的、统一的领导，只能让各方面、各地区的革命党人自行筹策，自行活动，而没有总体筹划和统一部署。这样，就形不成拳头，在反动势力的严密侦缉下，大都未及发动就被军警各个击破。

河南革命党人在二次革命期间策划、组织的起义活动主要有：

罗飞声等在开封密议，分头运动军队，联络学界和西湖反袁军，计划攻占洛阳，然后在开封组织力量炮轰都督府，争取占领省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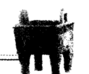
熊嗣鬻等在新郑集议，计划联络白朗起义军和豫中、豫北绿林武装，占据黄河铁桥，同时运动由原奋勇军、秦陇豫复汉军改编而成，此时驻在豫西、豫西南的巡防营（马云卿、刘凤桐等统带）和镇嵩军，先取南阳，再图洛阳。

杨体锐等在南京接受黄兴派遣，被委任为"河南讨袁军豫西民军司令"，回豫联络白朗军和镇嵩军，计划先取洛阳，宣布河南独立。

陈少溪等联络白朗军和襄县绿林武装丁万松股，再设法策动地方

---

① 上海《民立报》，1913年8月31日；长沙《大公报》，1917年10月22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六），许乐山、陈伯昂文，中华书局，1963。



驻军，另有张运正等联络绿林武装宋一眼股，各自计划先占郾城，起事独立，然后北上。

阎子固等与皖北党人张蓉芙等协同计议，联络白朗军和许昌绿林武装宋一眼部，策动曾参加辛亥革命的军队，并争取新蔡知事王文同，先在新蔡起事独立，再攻取潢川、息县等地，与皖北志士在寿州、颍州组织的反袁军联合，共同北伐倒袁。

郝翊臣等在豫北联络志士，组织起义力量，但等南方讨袁军北伐入豫，即起事占新乡，以通北进之路。

王泽普等在扶沟组织县境国民党人，联络绿林武装高二成股，计划夺取守望社枪支，攻占县城。

王桂芳等在信阳，筹购武器，联合附近县份反袁力量，准备适时独立，响应南方二次革命。

郭玉亭等策动开封和豫东、豫北的仁义会，设置忠义堂、会三园两机关，在豫东、豫北发展力量。在滑县的萧顺卿等联络豫北在园会和绿林武装 3 000 余人，设置都督、统领等职，计划先占滑县、浚县，然后进取省城。

高维岳等进入嵩洛山区，联络了洛阳申心宽股绿林武装，明揭二次革命旗帜，祭旗告天，出攻洛阳附近驻军，响应南方讨袁军。

因为军事力量对比悬殊，国民党在南方发动的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就被袁世凯派出的各路北洋军所扑灭。河南以张镇芳为首的军政当局也轻而易举地捕杀了前列在省境响应二次革命的革命党人，显示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较前更为软弱无力。然而，不论袁世凯和张镇芳，对于植根于农民之中的白朗起义军却无法对付。尽管在二次革命被镇压后，除了全部返省的河南军队外，湖北、安徽等省的军队也都被调来"围剿"白朗军，但这支农民武装却越战越强，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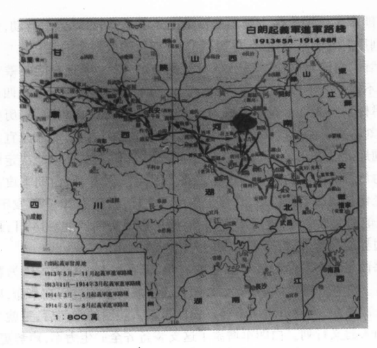
四、白朗起义军的失败

在二次革命失败之际，白朗军已由豫西南、豫南进至鄂北，9 月 25 日攻克了枣阳城。因为二次革命业已失败，鄂豫两省军队 5 000 余人

又赶来堵截，白朗遂于10月上旬北返豫西南。10月中、下旬，连克新野、邓县、唐县、方城，于11月11日又攻克宝丰，随后就重返义军的老家——群众基础特好的宝丰南部、鲁山北部的山区。张镇芳以为有机可乘，就制定了一个四面围剿的计划，又由河南护军使赵倜自率一支骑兵，作为机动之师。湖北陆军一个混成团也在遂平、确山一带布防，防止白朗军东进。

为了摆脱敌人的围剿，白朗军于1913年年底再次以猛虎出山之势，离开宝鲁山区，向京汉路南段转进。1914年1月上旬，连下光山、潢川、商城等城。袁世凯因张镇芳和赵倜防剿不力，下令予以撤职，改派湖北督军段芝贵入豫统筹镇压白朗事宜。同时袁又与副总统黎元洪一起，在北京连续召集军、政要员，筹商弭平"狼祸"的方策。京城内外的文武官员和各方政客，也都竞起为袁出谋划策，上递了数以千计的条陈，备袁采择。袁遂作出决定，让陆军总长段祺瑞亲自出马，兼领河南都督，赶往河南统一指挥豫、鄂、皖三省军队，并加调湖北陆军第二师和北京的拱卫军数营入豫。在这样的形势下，白朗遂于1月下旬率军转往敌人守备力量薄弱的皖北，连克六安、霍山等县，兵锋直达舒城和湖北英山县境。军行神速，致使邻近各省都为之震动，远至浙江，当局也赶忙调兵在浙皖交界处布防；江苏都督冯国璋和长江巡阅使张勋，也赶令水陆各军严防长江各要隘，并进入安徽边境，防备白朗军东进。

号称"北洋三杰"之一的段祺瑞，以陆军总长的威权和三省（后又加上直隶调去的陆军）军队的力量，作出了新的"聚歼"白朗军的部署：南路令鄂军扼守皖鄂交界的松子关，以防白朗军南下；东路令皖军在舒城集结，堵死白朗东进之路；北路以河南军队和增调来的直隶军队为攻击之师，向南逼进；中路以鄂军两混成团为主力，集结在商城、固始一带，协同南进的北路军，在皖北霍山、霍丘、六安之间解决白朗军。还公布赏格：有能擒获或杀害白朗者，重赏2万元（以后又连续加码至5万元、10万元）。为了增加声威，段还首次动用飞艇，雇用一名白俄罗斯飞行员驾驶，飞临战地侦察、投弹。在京的英、俄等国使馆，在与袁世凯商妥后，还特派使馆武官来信阳"观战"——实地验证北洋军阀是帝国



白朗起义行军路线图

主义的得力奴才。白朗军不等敌人布置就绪，就旋即西返，于2月22—24日，经3天激战，在商城东部金刚山突破鄂军王占元部防线，然后选取乡僻小道，日夜兼程，经光山、罗山、信阳县境，于27日突过武胜关，进入湖北境，武汉震动，湖北都督段芝贵急命军队在三镇戒严，并派军舰巡弋江面。北京外交使团对袁世凯亦深感失望和不满，特照会外交部，督促袁政府用“从速剿灭”白朗军的实际行动来“敦睦谊”——获取帝国主义的信任[①]。

白朗军之所以能独抗强敌，是因为这支“中原扶汉军”植根在民众之中，获得各阶层民众的拥护。加上白朗军继承了以往河南农民起义军（如捻军）传统的战略战术——乘虚蹈隙，灵活机动，遇到强敌，一昼夜可疾走一二百里，使敌人求战不得，等敌军赶抵指定的“合围”地点

---

① 天津《大公报》，1914年2月28日。

时，白朗军早已远走高飞于二三百里以外了；遇到敌军分散行动，白朗军就利用有利的险要地形，尽锐袭击，而夺取多次战斗的胜利。

然而，白朗军这种“流寇式”的无后方的作战，毕竟只能收效于一时，而不能长久不敝，经过权衡、集商，白朗军最后选定天府之国四川为进取目标。因为这个西南大省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山川险要，历史上刘邦、刘备都曾由此成其帝业，加以远离北洋军阀老巢，规取尤宜。鉴于两湖地区已被北洋军牢牢控制，由此入川很不容易，所以就决定取道守备力量特别薄弱的陕甘为进军之路。因而，3 月 6 日，白朗军攻占了湖北光化县属的老河口后，在那里停留了 3 日，缴获了 20 多万发子弹、2 门大炮和大批军实，随后取道邓县、淅川边境折向西北。14 日，再克豫陕边界的荆紫关，打开了入陕的大门。

陕西是辛亥革命时较早独立的省份，但在民初，其“兵弱”为各省所公认。驻在凤翔的陕军一个团，团长王生岐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后又响应二次革命，为袁世凯所不容。白朗军踏入陕西的大门后，王就率领全团加入起义行列。白朗军增添了这支装备齐全的生力军，声势更大。白朗以王生岐为前敌总司令，从 18 日起率全军长驱而西，迅速攻克了商南、龙驹寨（今丹凤）、商县、山阳等城。陕督张凤翙率军在商县迎战不胜，仓皇逃回西安布防。4 月 1 日，白朗军冒着雨雪，闯过蓝田西南的汤谷口，入周至、户县境。旋即北渡渭河，一路风驰电掣，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横扫了陕西 13 县。随后取道陇县，进入甘肃。袁世凯虽然赶调各路号称 20 万人的军队，齐来追剿，但仍然不能拖住白朗军的进军步伐。4 月下旬，白朗军经清水、庄浪等县境，5 月上旬，又连克陇西、天水、徽县等地，兵锋直指入川要地汉中。

汉中镇守使张钫是豫籍老同盟会员。白朗让王生岐（系张旧部）去汉中劝说张钫让出入川之路，张不仅不从，反率部拒敌。援陕川军彭光烈师也赶至略阳堵截。此时的白朗军历经长途转战，弹药消耗很大，补充很难，战斗力大为削弱。复加各地官府又迫令民众“坚壁清野”，致使白朗军难以得食，陷入饥疲之中。转至武都后，又受白水江阻隔，无船可以飞渡，只好放弃由汉中入川的计划，转入敌军认为最易合围的



阶州境，由泯县进抵洮州（临潭），想由此相机南下入川。这一带是回、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人民稀少，物产甚鲜"，敌人有意以此为聚歼白朗军的陷阱。当地官绅利用久已存在的民族隔阂，煽动城内外居民死力抗拒，使饥疲的白朗军大受损失，而且陷于"绝食"之境，连饮水都发生困难，只好杀马救急，军心也因之动摇。经千里行军，许多将领和战士都有浓重的思乡心理，至此就爆发出来，不愿入川而要东归故土。白朗难违众志，只好率军东归。

这一着铸成大错。5 月 31 日以后，白朗军跳出敌人的陷阱，经秦安等地东入陕西，在数倍敌人的追堵下，仍如离弦之箭，于 6 月下旬就返抵陕豫边境。但离故乡越近，离队归里者日多，全军只剩下数千人，继续"换易民服，纷纷回巢"（宝、鲁、临一带）。及至月底进入内乡西坪，更"四散归巢"。就这样，这支袁世凯动用一二十万军队都消灭不了的"中原扶汉军"（入陕甘后又打起"公民讨贼军"旗号），竟自动解体，最后留在白朗身边的不过 100 多人。白朗带着他们于 7 月下旬返抵临汝、宝丰交界的虎狼爬岭，却被数千北洋军、镇嵩军团团围困。26 日，白朗在突围中被流弹击中，结束了他年仅 41 岁的生命。

历时 3 年的白朗起义失败了。

这次震动中外的起义是民国前期规模最大、影响最巨的人民起义，为近代河南史册增添了光辉的篇章。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次起义没有也不可能达到"讨袁"、"扶汉"的目标，但毕竟给予北洋军阀以空前沉重的打击，并在河南广大地区播下了许多继起反抗军阀统治的火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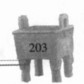
第三节　新旧嬗变的岁月

一、赵倜祸豫

国民党二次革命的失败，意味着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维护和挽救共和制度、完成辛亥革命未竟之业的努力完全落空，使以袁世凯为代表的

复辟势力更大胆放手消灭辛亥革命的剩余成果；白朗起义的失败，使袁世凯摆脱了“讨袁”、“扶汉”的人民起义的直接威胁，稳定了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反动统治。连续的“胜利”更使袁世凯不可一世，于是在1914年年初，下令解散国民党、解散中枢的国会和各省省议会，停办县和基层“地方自治”。这些，在河南都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6月，袁又下令将各省都督改称将军，民政长改称巡按使，向复辟封建帝制的道路上迅跑。为了牢牢地控制河南这个战略要地，9月20日，袁世凯任命在镇压辛亥革命和白朗起义中建立“大功”的毅军翼长、河南护军使赵倜为河南将军。至1922年5月，赵倜兵败，被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免职，他前后把持河南军政大权近8个年头，是北洋军阀中盘踞河南为时最长的一个。

赵倜与前任都督张镇芳一样，原先都是清末旧官僚，一贯仇视民主共和，不同的是，张系进士出身，赵则行伍出身，由旧军官佐逐次升任豫督。所部毅军创建于清同治初镇压捻军的岁月，积弊极深，是当时河南最腐败的军队。这个靠镇压革命和人民起家的河南将军更具有旧军阀的属性，对枪杆子特别看重。为了促成和保护袁世凯力图建立的新王朝，他任职之初，就不顾财政困难和民生凋敝，大力扩充军队，加强镇压力量。所部毅军1911年年初归河南时不过5营，很快就扩大为20营，由其亲信将领宝德全、丁香玲等以镇守使身份分驻豫东、豫北、豫西各要地。1916年开始，又收罗各地匪化武装，组建新的军队——宏威军，以其弟赵杰为司令，陆续扩编至40营。1917年、1918年后，复进而通令各县成立巡缉队，大县设1营（如安阳，全员共500人），中小县份或二三县或三五县合设1营，后陆续扩编，一般一县一营，全省共100余营。在开封设巡缉营督办处、司令部，亦以赵杰为司令控驭全军，以图由此再增加“劲旅数万”。1920年，许多县份的知事和豪绅又应赵杰之命，另组“游击队”，一年之中，总数至四五十营。这些所谓军队，完全由地方兵痞、游棍聚合而成，饷械完全由地方筹措供应。其职责名为“剿匪安民”，实则常日在驻地四乡“捉赌讹人”，护送和买卖烟土，甚至捉人勒赎，公开抢劫，“明目张胆，毫无顾忌”，故被民众称为“官杆”、



“官匪”①。这样，除北京政府直接指挥的数万驻豫陆军外，赵倜兄弟控制的私家武装即近 10 万人，较之晚清时期 2 万余人的军队总数增加了 4 倍以上。由此，不仅大大地增加了河南人民的负担，而且给全省经济和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河南督军赵倜

作为袁世凯的忠实党徒，赵倜和巡按使田文烈一伙死心塌地为其主子复辟封建帝制效劳。他们在全省城乡全力贯彻袁世凯的一切反动政令，继续在全省实行戒严，镇压人民各种形式的反抗和一切反复辟言行，严密查禁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宣传品和书报。1915 年秋，赵特派代表进京参加“筹安会”的复辟活动，并于 9 月间与其他 10 余省将军一道，吁请袁世凯即速称帝，进而又制造了全省“代表”“投票”赞成袁世凯称帝的丑剧。在省内，则征工、征料，将旧县学改建为“万寿宫”，修复旧“钦差行台”，以备接待袁皇帝“钦派大员来豫”。对于袁世凯的自走绝路，北洋军阀集团中稍为明智者，包括其嫡系段祺瑞、冯国璋都表示反对，以蔡锷为首的西南实力派更发动了“护国之役”。赵倜、田文烈却公然通电全国，声言“辛亥之役，骤改共和，拂我数千年之国情，违我四万万（国民）之心意，元首不定于一，国本永

---

① 北京《晨报》，1920 年 1 月 11 日，1921 年 12 月 31 日。

远不宁”，“近者国人觉悟，乃有改变国体之谋……举国一致，中外所知”。肉麻地吹捧“今上（袁世凯）英明神武，超轶汉唐，天下归仁，已非一日，大宝诞膺，勉于民情，名分既正，率土皆臣”，叫嚷“共和流毒甚多，万不宜再存于中国，必宜划除干净，绝此根株”；表示“当率三军，与宇内忠义之士，协力合谋，灭此朝食”①。1915 年 12 月 12 日，袁世凯发布申令，“接受”帝制。次日，袁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赵倜等秉承意旨，下令 22 日至 27 日间，开封全城“悬旗庆贺新帝登位”。接着又通令全省一切公事、文告均用“洪宪”年号，不再称用中华民国。袁世凯论功行赏，封赵倜为一等侯。这样，辛亥革命在河南的有限成果，就被张镇芳、赵倜一伙“划除干净”。

朱启钤等请赵倜拥袁复辟密函

① 《申报》，1916 年 1 月 1、3 日。



作为一个旧官僚、旧军阀，赵倜在省内各县也实行“专制帝政”。在这个督军兼省长(1916年7月，北京政府通令改将军为督军，改巡按使为省长，1917年末，赵兼任省长)的心目中，河南乃是他一家的私产，他就是这块土地上的无冕皇帝。从省府到各县，大小官员都由他派任(卖放)，就连油水有限的文教部门，从教育厅(省)长、局(县)长、科长到省立学校校长，也都用其亲朋故旧，“不问学问，不问品行，但以荐主之势力为衡”①。亦有所谓“民意机构”——按民国规制不得不恢复的省议会，所有议员均由“军、民两长所指定，全出于金钱势力”，还得宣誓：“不附督军(赵)，天诛地灭。”②至于搜括民脂民膏，这个土皇帝也一样彻底。除了按价卖文武官职到学校校长之外，“其他吸收民财的办法不胜枚举”，包括派出所谓“买田使”，“见有地之肥沃者，即插一白旗”，付点象征性的代价，就算是赵家田产③。他督豫8年，光聚敛的金银在1亿元以上，几乎与省府同期财政收入相当④。

“专制帝政”表现在用人上，那就惟旧、惟裙带关系，惟金钱贿买。据当时人概括，赵倜左右亲信及省府“稍重要之位置”，“皆为二十年(清末)旧时之进士、翰林所盘踞”，而且“皆趋利附势之徒，无一真正人才，外此者都能分得一杯羹”⑤。选任各县知事，也同样本此原则，如1922年报纸记述豫北20余县的知事，即“大抵皆前清之守旧官僚”⑥。不过，这些封建遗孽光有旧资格垫底还不行，还必须辅之以“请托”和“金钱”，尤其是后一桩更不可少，“一个人想作知事，非向督军纳三千元不可”⑦。

“专制帝政”表现在吏治上，那就是一切“率由旧章”，而且更加乌

① 北京《晨报》，1920年5月4日。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军事》(三)，第74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③ 北京《晨报》，1920年1月13日。

④ 《河南文史资料》第32辑，第151页。

⑤ 广州《民国日报》，1921年12月10日、1916年6月9日。

⑥ 天津《大公报》，1922年2月12日。

⑦ 广州《民国日报》，1916年8月30日。

烟瘴气。在南北其他省区，民国以来县政至少在形式上都作了些改革，包括废除旧吏役、实行“司法独立”（新设承审、管狱人员，专理民刑案件和监狱，不再由知事包揽一切）、废止跪审，等等。而在赵倜治理下的河南，则一切如旧，县署虽据北京政府规定，设有承审员一人，但不过徒具形式，如正阳、沈丘等县人士所记，“司法独立，县地方终未实行”，知事“仍操纵一切”，“所有诉讼，不分民事、刑事，概用跪审，滥施非刑”[①]。由于县知事们都靠“请托”和“金钱”才得任职，所以无不“视法律为具文，以骫法为政柄，善于剥夺民财，贪赃卖法，假公济私”[②]。

“专制帝政”反映在社会经济上，那就是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的负担大大加重。拿省府的盘剥来说，1915年，河南在全国首创亩捐，土地不论好坏，每亩加征60文，次年增为90文；另又开征烟酒厘金、烟酒专卖（税）、印花税、屠宰税及附加，等等。1918年开始，全省田赋实行“废两改元”，原额地丁银一两，改征现洋2.2元，漕米1石改征现洋5元，几较原额提高一倍。1922年又分别改为2.3元、8.25元。在此期间，省当局复以“借各县商款”为名，强令各县额外筹解款项。从1918年开始，各县都先后明令预征次年钱粮。因为次年均顺此“预征”，所以实为加收一次田赋。除此之外，县和基层的盘剥也大幅度增加。拿汜水这个小县为例，其“公款局”支应地方各费的数额，1912年是610多万文，到1918—1919年增至1 500万—1 600多万文，意味着六七年间民间苛派增加了1.5倍[③]。加上各“自治”局、所有的豪绅普遍“视公款为私财，借公图利，武断乡民”[④]，人民的实际负担加重更多。

前述种种加在一起，必然使广大农民陷入“如水益深，如火益热”的悲惨境地。1918年编纂的一部地方志书记述县境社会情况时说：“一家之内，兄弟四五者，鳏居其大半；一村之中，丁男数百者，鳏居亦

① 民国《正阳县志》卷二，第8页；《沈丘县采访稿》（河南省档案馆藏抄本）。

② 广州《民国日报》，1916年6月9日。

③ 民国《汜水县志》卷四，第16—19页，民国17年上海世界书局铅印本。

④ 广州《民国日报》，1916年6月9日。



其多数"，这是农村"生计艰难"之故[1]。这在全省都具代表性，这就大大加深了社会危机，导致全省日益严重的"匪祸"，其炽烈程度，本省和外省人士均公认"实居全国之首"。豫西、豫西南和豫东的山区和瘠苦县份固然成为所谓"土匪世界"（像内乡县境，据报还在1914年，各乡民众"不与（杆匪）认识往来、沾亲带故者寥寥无几"[2]），即便是平原经济状况和人民生计较好的县份，如安阳，到1918年也有大小"杆子"90余，许昌在1917年夏间，光韩村一保，大小"杆子"即有十六杆。这些杆伙，人数多少不等，大都只十数人、数十人，较大的百余人，但"合杆"活动时，就是成上千或数千的绿林武装。

这是破产农民反抗官府与豪绅的一种初级形态，具有正当性。不过，杆伙中良莠不齐，一些由惯匪、兵痞甚或地主子弟组领的杆子，则不分贫富，恣行掳抢和烧杀；人数较少、无力"劫富"（地主豪绅多拥有武装或据守坚寨）的小杆，就只好常年以一般农户为劫掳对象，甚至"不弃斗粮，并倾瓶粟"[3]。这样，日趋炽烈的"匪祸"就给城乡人民带来深广的祸患，无论农业生产、商品流通、人民生活以至文化教育都受到破坏性的影响，成为民国年间一个无法解决而且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是军阀统治给河南造成的又一恶果。

1920年春，一个外地旅人在开封居留了20多天，记述河南社会情况说："河南人……民国9年（中），没有得过一天安居乐业的幸福，小百姓们所度的生活就是逃死不暇的生活。兵祸、匪祸、重税、苛敛、公债、军饷，纷沓杂来，竭终岁之所入，不足应付官府的需索；尽人生之智识，不能幸免污吏、暴兵、悍匪的诛求，善良之民，十室九空，生命财产，掠夺殆尽。小百姓们伏处在千钧重压之下，一方面怕兵，一方面怕匪，出气的声息略大一点，还怕冲犯了哪位有势力的大人"，随后他描述自己的切身感受说："在这二十七八天，我的精神上、感情上受了无限的

---

① 民国《新野县志·风俗》，未刊稿。
② 天津《大公报》，1914年6月16日。
③ 民国《禹县志·大事记》，下二，民国26年刊本。

痛苦，如同在地狱一般。周围尽是可以战栗、可以恐惧的乱闹死动，如同在深山大泽一样，前后尽是虎豹豺狼，所遇无非可恨可畏、张牙舞爪的东西，可以认为我有生以来一大不幸。”①河南军阀统治的暴虐和贪婪，河南人民受盘剥、受压迫的深重，大大超过外省区。赵倜一伙给河南带来祸患之深重，在全国是罕见的。

二、社会经济的新变化

民国初年，包括河南在内的民族资本主义有较大的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东西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都忙着准备第一次世界大战，长期作为侵华主角、压抑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欧美帝国主义各国一时无暇东顾，无论在对华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上都有所收缩，而购求于中国的货品则较前增加，从而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国内因素，那就是辛亥革命的推动。

辛亥革命推翻了卖国媚外的清王朝，也打击了压抑民族资本主义新经济的地方封建势力。大总统袁世凯清末就热衷于发展北洋集团的各项“实业”，登上民国总统宝座后，也赞成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借以“富”他的“国”，“强”他的“兵”。担任农商总长的著名民族资本家张謇且大力提倡“棉铁主义”，制定和颁行了不少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和棉花等经济作物的政策。各省工商界人士更因清朝的覆亡和民国的建立感到振奋，认为“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②。

在河南，晚清时期禁阻开办面粉厂、自来水厂的统治当局固然随同消失，用“有碍风水”等借口阻碍开办近代采矿业的封建豪绅也受到冲击，减少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阻力，因此对所谓“产业革命”的期望也空前浓烈。诸如“共和之后，宜最重实业”、“振兴实业、开辟利源”等言词，常见于民初省内报刊，有些文章且乐观地推断，今后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当能步武欧美和日本。城乡人民空前高涨的爱国热本是一种精神力量，此时也转化为兴办实业、振兴邦国的物质力量。“洋货充

---

① 北京《晨报》，1920 年 5 月 1、3、26 日。

②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2 辑下册，第 862 页，中华书局，1962。



斥，利被人夺"，"亟宜抵制，借挽利权"，成了包括民族工商业者在内的社会人士的共同要求，许多企业的组建"缘起"和"章程"中都特别强调这一点，不少筹建的企业且以"兴华"、"维华"、"兴豫"、"富豫"之类命名，人们干脆把自织改良土布通称为"爱国布"。凡此种种，都给民国初年河南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为适应这种经济新潮，由河南总商会创办的《河南实业日报》也于 1913 年 2 月应运而生，由开封鸿昌火柴公司经理刘炳章任总经理；随之又成立"河南实业协会"，宗旨为"振兴实业，扩充国计民生，挽回利权"①。这样，资产者求取高额利润的愿望与辛亥革命后的难得际遇结合在一起，于是在河南便掀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实业热"。据云 1912—1913 年间，各界人士组建各种公司报请省府立案者无日不有，从而使河南民族资本主义在这几年间有较大的发展。

（一）工矿企业的发展

1. 纺织（主要是棉，也兼及丝、毛）业。因为民国实行服制改革，无论官府公职人员和社会上学、商、工各界，特别是成倍增加的军队，都要缝制符合新服制和适应时尚的新衣，对纺织品的社会需求很大；纺织业投资小，效益大，省内原料丰富，就近取给便捷；以往"洋货灌输"，外国机制纺织品占其中的最大比例，要挽回利权，自应发展民族纺织业；欧美各国忙于准备世界大战，输入中国的纺织品减少，在日趋扩大的市场中，民族企业有较大的发展空隙。于是，不少投资者就把目光投向这一行业，创办不同规模的纺织厂、纺织公司（大多数实际上还是工场或作坊）。如在开封、商城、商丘、汲县、内黄、洛阳、灵宝、宝丰、沘源（唐河）、泌阳、新野、西平、罗山、潢川等县，均有相当数量的"爱国布"之类纺织品应市。不过，这些工厂所用的所谓"机器"，都是全恃人力、不用动力的铁轮机甚至木机。无论木制拉梭机或脚踏铁轮机都与旧式投梭机（所织为土布）不同，使"织"这道劳动强度大、技术性强的工序从传统的"女织"中独立出来，逐渐专业化，且转为男工承担；特别是铁轮

① 开封《河南实业日报》，1913 年 3 月 19—24 日。

机，虽然仍没有使用蒸汽、电力等动力，但已应用飞轮、齿轮、杠杆等机械原理，将开口、投梭、打纬、送经、卷布等工序联为一个整体，已属于机器生产范畴，所织之布亦为机制布（木制拉梭机织造改良土布）①。

2. 采煤业。因为除道清、京汉铁路外，汴洛—洛潼铁路陆续向东、西延伸，本省和邻近省区各类工厂又开办日多，原先向中国倾销“洋煤”的帝国主义国家因忙于世界大战反而采购华煤。由此造成市场不断扩大，给河南近代采煤业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光安阳一地，据1913 年的报道，“大小公司呈部立案者有十余处”，地方人士且特组“矿务联合会”以“研究种种进行之手续，共谋利益”②。其他储煤各县，如安阳的小寺湾、铜冶村、三泉寺和益安煤矿，汤阴的新记、华昌煤矿，密县的坤安煤矿，荥阳的豫利煤矿，渑池的豫庆煤矿，宜阳的广仁煤矿，陕县的孟村煤矿，禹县的济众煤矿，修武的豫泰、明德、中州（1914 年合为“中原”）煤矿，新安的邱沟煤矿，汲县的陈召煤矿，等等，都先后创办，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修武的中原煤矿（资本 300 万元）、禹县的济众煤矿（资本 60 万元）、新安的邱沟煤矿（资本 25 万元）。从官府征报的矿税收数来看，1915 年，全省总计 2 万多元，到 1918 年，增加 5 倍以上。绝对数值虽很不准确（多收少报和中饱私囊是当时的通病），但增长较快、较大是肯定的。

3. 蛋品厂。轻工业创办较多的首推蛋品厂，这是因为欧洲各国忙于大战，需要向中国采购大量蛋品以充军粮，因而产蛋很多的河南，就有了发展蛋厂的特殊机遇。如开封的元丰蛋厂和大昌蛋厂，新乡的祥盛魁、裕丰、中本、祥太、德昌、三和成、顺化、隆聚、慎康、福义、恒裕成等蛋厂，周家口的祥盛魁蛋厂，获嘉的泰和蛋厂和漯河蛋厂、道口蛋厂都先后创办，大都为土炉生产，成为河南蛋厂开办最多的时期。出产最多的开封，旺月（春季）每月运出蛋粉 66 万斤左右，大都经汉口、上海出口欧洲。次之是商丘，郑州、新乡等地又次之。

① 参看《上海经济研究》，1988（3），徐新吾文。
② 开封《河南实业日报》，1913 年 10 月 4 日。



4. 面粉工业。开"面业改良之先声"的，是开封的"实业家"李某、靳某、柯某，他们均在1912年冬，分别筹款赴沪购办机器，筹办"承丰"、"永丰"等面粉厂。次年，"大企业家"刘伯荪等集股10万元，在新乡筹办恒耀磨面公司。1915年有安阳面粉公司，1916年有郑州德丰面粉公司，1918年有开封天丰面粉公司、新乡通丰面粉公司（有日资在内）、安阳德聚兴和德亨两面粉公司，又接踵而起，其中"天丰"资本20万元、"通丰"资本50万元，为规模较大者。

5. 其他工业。火柴业，1913年刘炳章在开封创办大中火柴厂，资本2万元（后增至12万元），另在光山出现迅烈火柴厂。1914年任秀生在许昌创办富豫火柴公司，资本10万元；1919年魏治鲁等在新乡创办新华火柴公司，资本6万元；商水商会创办同昌火柴公司，资本1万元。造纸业，1913年伍振嵩等在开封、杜光华等在安阳、张某在汲县、胡某在密县分头筹建造纸厂，以适应书报印发日多的社会需要。还有开封的豫记机器厂（1912年开办，制造磨面机、棉油机、轧花机等）、卫国造胰（皂）厂、大生造胰厂、德丰厚皮件厂（1913年），洛阳的照临电灯公司（1919年资本5万元），也在此期间先后创办。

据申报馆《最近之五十年》记，河南至1919年，有注册公司34个，注册工厂14个（面粉厂3个，榨油厂2个，瓷器厂1个，棉纺织染厂2个，电厂1个，火柴厂4个，制蛋厂1个），资本总额为263万余元。这个统计不很完全。参以其他资料，全省在1912—1919年间开办的各种工厂资本总额在500万元上下。加上同一时期创办的煤矿总资本额450万元左右，合计新开的民族工矿业资本总额当近1 000万元，较之清末的二百数十万元，增加4倍左右。尽管这些厂矿规模都不大，机器和动力使用很少（许多实为手工工场），反映出河南民族资本主义新经济的力量仍十分幼小，但其发展态势却是明显可见的。

（二）农业的发展

城镇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内和国际市场对原料需求的增大，加上铁路所带来的交通运输上的便利，促成河南农产品进一步商品化。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就集中反映了这一点。

1. 棉花。早先种植较广的棉花，因国内和海外需要量大为增加，倡导"棉铁主义"的北京政府农商总长张謇特确定河南等省为重点推广植棉省份，规定农家每植棉 1 亩，奖励 0.2 元（中棉）或 0.3 元（美棉）。随后，河南省当局也采取类似的举措，更促进棉花生产的发展。1914—1919年间，全省棉花种植面积达 10 万公顷（约当耕地总面积的 1.5%），年总产四五十万担（皮棉，下同），其中最高的 1916 年，种植 12 万多公顷，总产 83 万多担[①]。安阳、新乡、太康、尉氏、洛阳、偃师、灵宝、巩县、登封、阌乡、临汝、浚县、邓县、新野等 10 余县，棉花种植面积都在 0.7 万公顷以上或 0.7 万公顷上下，逐步向生产专业化和地区分工演进。所产棉花除农家自用部分外，大量进入市场。全省大约有一半县份均有数量不等的棉花销售到境外，其中很大一部分且参与国内、国际棉花市场竞争，而且数量逐步增大，光阌乡一地，"岁百万斤，为倭（日）商所吸收"[②]。已成交通枢纽的郑州，更发展成为全国三个最大的棉花（包括来自晋、陕的棉花）转运市场之一，与武汉、济南齐名。这是与本时期棉花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商品棉的增加分不开的。所以 20 世纪 20 年代河南实业厅长就把棉花视为"全省农工、商贾所与寰球经济界竞争之武器"[③]。

2. 油料作物也有新的发展。据官方报告，大豆在 1914—1915 年间，全省种植近 4 万公顷，总产 60 多万市担[④]。但这两个数字远欠确切。从临颍向南，西至泌阳，东至沙河沿岸的光州、新蔡等地，均种植颇广，陈州、汝宁两府出产尤多，驻马店、漯河、周家口都成为著名的大豆集散地。

花生的种植也增加颇快。开封、商丘等地 1912 年引进了意大利大花生后，单产成倍增加，售价也因市场需求量加大而大幅度上升，每亩收益可达 20 串上下，高过粮食三四倍，所以豫东各县种植者"日益加

① 农商部总务厅统计科：《第四、第五次农商统计》，中华书局，1917。
② 林传甲：《大中华河南地理志》，第 253 页，民国 9 年中华印刷局铅印本。
③ 河南省实业厅：《河南全省棉业调查报告书》刘峰一序，河南官印刷局，1925。
④ 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众”，年产总值1 100万元[①]。1914年开封报纸报道，在豫东花生集散地朱仙镇，除外国商行“放盘采购”外，开封、中牟等地巨商也设庄争购，彼此虽“争加其值”，但由此运销汉口（再运广州出口）仍能“市利甚厚”[②]。开封的花生行也由清末的7家成倍猛增（到1923年达84家），销售总额达200万元[③]。据报，1916年全省种植花生近10万公顷，1918年达57万多公顷。“商人之营运斯业者，赢余甚厚，每致骤富。”[④]

芝麻外销也进一步增加，外国洋行和南洋华侨商人来豫设庄收购者日多。据报，1918年全省种植面积达20多万公顷[⑤]。

3. 烟草，特别是烤烟，在部分县份迅速发展。1913年，英美烟公司所派的2名美国人来到河南著名的烟叶产地邓县，免费向烟农供应烤烟种子，推广烤烟，不少烟农于是放弃传统的、主要供国人消耗的晒烟而改种外国烟草公司收购的烤烟。次年，省民政厅又根据汉口英美烟公司要求，训令邓县知事接待去邓传播良种烤烟的美国技师。随后，该公司又进而去襄城、许昌，免费向烟农供应烤烟种子，介绍种植和烤制技术，进行诱导。1918年后，民族资本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也来这一带推广。始种之时，因为效益特好，所以除上述诸县外，附近十几个县份也迅速推广，“有的将全部土地或大部土地种烟叶”，出现了大批“全家全年都依靠卖烟叶购粮生活”的种烟专业户[⑥]。据报，全省烟草种植面积由1914年的0.8万余公顷、总产量3.8万多担，到1918年增至45

① 开封《河南实业日报》，1913年3月5日。
② 开封《时事豫报》，1914年1月9日。
③ 天津《大公报》，1919年1月6日。
④ 吴必信等：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第1编，第411页，大北印书局，1932；《农商公报》，第65期。
⑤ 实业部中国劳动年鉴编委会：《劳动年鉴》第1编，第411页，正中书局，1934。
⑥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418—419页，中华书局，1983。

万多公顷、1 135 万担[①]。其中的烤烟，据美国农业部农业经济局估计，总产量在 1916 年尚为数不多，1917—1918 年，达 250 万磅，1919 年增加 1 倍，达 500 万磅[②]。其中许昌一地经京汉铁路外运的烤烟，在 1915—1916 年还只 4 000 余吨，以后 7 年增长 6.5 倍，至 3 万吨[③]，可见增长之快。这些烤烟，几乎全部由外地卷烟厂购运出境。

4. 其他作物的种植和农副产品生产。油菜籽和麻的种植面积也较清末有所扩大，甚至原先因外国染料的输入而迅即萎缩的种靛和制靛业，也因欧战期间“洋靛”输入量大减而重新发展。尤其是罂粟的种植，因统治当局和地方军阀的奖励甚至强迫（如规定豫西、豫西南许多府县至少要有 3/10 耕地种植此种毒物），较清末也种植更广。草帽辫、养蚕（柞蚕、家蚕）和丝织业，牛羊皮、羊毛和毛织业，粉丝、粉皮、黄花菜、茶叶、干果等农家商品性的副业生产，在这七八年间也都有较大的增长。河南商货运销主要通道之一的京汉铁路，清末年营业收入 1 100万—1 200 万元，到 1919 年增加一倍以上；汴洛铁路清末月收入不过 5 万元，到 1917 年 4 月增至 16 万元（主要来自货运）。河南商贸出入的绝对值变化数字已无可考，但民初六七年间，其增幅恐怕也在一倍以上。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农副产品商品化的扩大，加速了传统的自然经济解体的进程，城乡经济与国内、国际市场的联系愈益密切。这些，都是河南社会经济逐步近代化的征象，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如果在民初七八年间没有张镇芳、赵倜一伙倒行逆施、横征暴敛，此种近代化的脚步无疑会加快许多。

---

① 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另据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记录，1918 年烟叶种植面积为近 50 万公顷。
② 见陈翰笙：《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第 80 页。
③ 平汉路管理委员会：民国 21 年《平汉年鉴》，第 203 页，和中印刷所，1932。

第四十章
国民革命的开展与北洋军阀统治的覆亡

第一节　五四运动的影响与中共河南地方组织的建立

一、新文化运动的冲击

北洋军阀政权建立后，中国进入更加黑暗的历史时期。具有民族忧患意识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了唤醒民众，挽救民族危亡，发动了新的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宣传新文化的主要刊物是创刊于 1915 年 9 月的《青年杂志》（次年更名《新青年》）。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有三个：一是提倡民主和科学。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 1 卷第 1 号上发文，高声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和人权并重"[①]。二是反对封建礼教，批判孔孟之道。他们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孔道会"、"孔教会"等组织及"尊孔读经"的逆流，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认为"提倡孔教必掊共和"，"信仰共和必排孔教"，表现出对孔子学说毫不妥协的批判精神。三是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除上述三个方面外，新文化运动还对妇女解放运动、家庭问题、婚姻恋爱问题等进

---

① 陈独秀：《敬告青年》，载《青年杂志》第 1 卷第 1 号，第 6 页，1915。

行了热烈的讨论。

河南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尤其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社会上到处都保留着封建意味，毫无一点民国气象”。赵倜督豫时，大事提倡修建庙宇，使民间到处“弥漫着浓厚的迷信烟雾”①。同时他还提倡尊孔，筹备祀孔之典，鼓励成立“孔道昌明会”，以孔孟之道来禁锢人们的思想，致使“一切新思潮、新事业较之沿海各省瞠乎其后”②。当年曾有人深刻地指出：在世界各国向前发展的今天，“而吾河南则何如者？无论欧美之进步，绝尘而驰，为我万万不敢望；即滨海各省之思潮，我亦瞠目无见，充耳无闻”③。

尽管河南如此闭塞、保守，新文化运动的春风，照样吹进了这个坚冰封冻的北方省份，并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各地传播，对人们的思想意识、政治理念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全国享有盛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新青年》杂志，从它创刊之日起，就受到河南广大青年的热爱，销售量逐期增多。《每周评论》、《新潮》、《国民》等刊物在河南各地也大量发行。在这些反对封建主义、宣传民主主义的刊物影响下，河南思想界发生了激烈的变化，他们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新文化运动同全国各地汇合在一起，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这个大潮中，以反对旧文化，宣传新文化为宗旨的河南《心声》杂志破土而出。

1918 年暑假后，河南省第一师范的冯友兰、嵇文甫等 10 余人筹备成立了心声杂志社，并创办了《心声》杂志，由冯友兰任主编。该杂志在发刊词中明确宣布：“本杂志之宗旨在输入外界之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④他们强烈要求打破旧的封建秩序，实行社会变革，一

---

①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 328、364 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② 《新申报》，1920 年 5 月 28 日。
③ 冯友兰：《〈心声〉发刊词》，载《心声》第 1 卷第 1 期，1918。
④ 冯友兰：《〈心声〉发刊词》，载《心声》第 1 卷第 1 期，1918。

切旧的“老套”必须彻底改变，以求祖国的富强。

封建伦理道德的中心是孝。儒家以孝、悌二字为两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庭制度联结之根干。河南青年认识到不解除旧礼教、旧道德对人们的精神束缚，就不可能有平等、民主，因此反对封建主义就必须反对纲常名教。他们要求从封建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反对家长控制子女，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制度。在新思想教育下，河南妇女对那吃人的礼教有所觉悟，喊出了“男女平等”、“妇女禁止缠足”、“婚姻自由”、“反对片面贞操”等口号，许多女子走出家庭，上学，做工，追求真理，探索中国的出路。

文学革命在河南亦有强烈反响。《新中州报》对文学革命开展讨论。有人在报上撰文，讲述文学变迁之历史，指出从前文学所用的材料都是出自特别阶级和空想分子之手，而现在文学所有的作品不能不是民众所要求的文学，其材料自然是取之于民众的生活。文章进一步指出，新文学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人都不能遏止。这说明新文学在河南青年中已有很大市场，并受到青年教师的重视和支持。

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是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开封一师语文教员张某反对白话文，他看到三年级学生徐玉诺用白话文写的诗文，便进行指责。他教学生作文必须用文言，曾出过一个作文题目“近有陈仲甫者，提倡废文言，改革伦常，试评其是非得失”，遭到学生们的反对。嵇文甫也在该校任教员，他“大力提倡白话文，指导学生写白话文，还把用新思想、新文体写作的文章作为课文宣讲”[①]，使学生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感染。当年在省立二中读书的曹靖华，用白话文、新式标点写了一篇作文，激怒了他的语文教员张某，把曹靖华的作业本摔到地上，把白话文冷嘲热讽地骂得一文不值，结果遭到了曹靖华的极力反对，并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质问书，说明社会进化的必然趋势，历史上一切新事物的出现都会遭到顽固派的反对，但无论如何，旧势力总阻止不了历史的前进。

---

① 侯志英：《河南党史人物传》第1卷，第26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总之，五四运动爆发前，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已经冲击着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的河南，解放了青年的思想，为行将到来的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创造了条件。

二、五四运动的反响

从1919年1月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政府代表在国内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向和会提出了关于取消外国在中国的某些特权，废除“二十一条”的正义要求，遭到美、英、日等帝国主义的拒绝，反将日本夺取的战前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写进了和约。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在中国人民首先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激起强烈的愤慨。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专院校的学生3 000多人于天安门前集会，并举行游行示威，遭到北洋政府军警的镇压，30多名示威学生被逮捕。为营救被捕的学生，5月5日，北京学生宣布罢课，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迅速得到包括河南在内的全国各地青年的响应和社会舆论的支持。

5月9日，开封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举行女界国耻大会，学生争先发言。一张姓女青年演讲至激奋之处，当场咬破中指，血书“坚持到底”四字，在场千余名学生一时情绪激昂，声泪俱下，这次会议把省会的爱国运动推向了高潮。

5月13日，由开封法政专门学校等发起，河南第一师范学校、农业专门学校、省立第一中学等15所中等以上学校千余名学生参加的省会各校学生联合大会在法政专门学校召开。第一师范学生代表李宏毅等24人先后发表演说，并通过了三项决议，要求北京政府和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在“存亡所关”的青岛问题上，一定要据理力争，不得在“和约”上屈辱签字；敦促在上海参加南北议和的代表早日结束内争，一致对外。会后，青年学生分赴开封城乡进行宣传鼓动，各界群众纷纷响应。

经省会15校学生的联合筹备与发动，5月18日，开封各界万余人



参加的国民大会在开封师范学校广场召开。会场上旗帜林立，“还我青岛”、“誓死力争”、“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等标语触目皆是。大会由上午8时开到下午2时，学生、工人、教员、省议员等各界代表30多人相继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呼吁各界人民行动起来，保卫国家的主权。会议以河南公民名义，向北京政府电请“即电巴黎专使，如日本不交青岛，即退出和会”①。决议为把河南反帝爱国运动推向深入，迅速成立省会学生联合会，“以为外交后盾”。

省会学生联合会的成立，使河南反帝爱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5月下旬，河南全省学生联合会成立，总会设在开封，开封、洛阳、豫北、豫南各设分会，辉县、荥阳、伊阳、正阳等几十个县也相继成立了学生联合会。

5月19日，北京学生再次宣布总罢课，以反抗军阀政府的卖国政策。为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河南省学生联合会决定，全市中等以上学校于5月30日实行总罢课，并拟定了罢课宣言。罢课之后，学生不得回家，结成团体，“从事三项工作：一、组织演讲团，分途演讲；二、分散传单，激起国人爱国热忱；三、组织调查部，调查日货，务使禁绝，以提倡国货”②。

在北洋政府黑暗腐朽的统治下，学生的爱国行动非但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镇压。在5月13日开封学生大会之后，河南督军兼省长赵倜即指令军警监视学生，于开封文庙街一带加添岗位，严密防范。省会学生将于5月30日罢课的消息传出后，赵倜即训令省立中等以上各学校校长“立即向在校各生恳切劝谕，严加约束。目前除授课外，凡聚众集会，一律设法禁止”③。训令警务厅，对不服制止者“依法逮惩”④。赵倜还以省署名义发布布告，诬蔑、谩骂学生集会演说为“不审事实，轻肆叫嚣……愈演愈烈，竟出无谋下策，而有罢课之议，狂热之烈，不辨是

① 上海《新申报》，1919年5月31日。
② 上海《新申报》，1919年6月7日。
③ 开封《河南公报》，教字第880号。
④ 北京《时报》，1919年6月5日。

非”。接着向学生发出恫吓：“倘有执迷不悟，悍然罢课”者，定将“择尤惩处，固不能稍事姑宽，即改组全班，亦岂能有所顾惜”[1]！并令军警围守各学校校门，不准学生外出，学生举动稍有可疑者，立遭拘捕。一时学校形同牢狱。

开封各校学生冲破军警的围困，终于在31日实现了全市总罢课。随后卫辉等地学生也实行了罢课。学生的罢课斗争，遭到了当局的疯狂镇压。当局在驱赶无效后，强令各校一律提前放暑假，企图以此熄灭学生的爱国运动。学生联合会遂决议利用假期在全省广大地区开展更大规模的爱国宣传活动，并为此赶印了大批宣传材料及传单，由学生带往各地。

6月中旬以后，提前放暑假的开封3 000多学生回到各自的家乡，他们不顾炎热酷暑，奔走呼号，推动爱国运动更加广泛深入地发展。各地学生联合会、国货维持会、各界联合会、救国十人团等各种救国团体纷纷成立，在全省迅速掀起了以抵制日货为中心的爱国热潮。

在开封，五处城门“由学生联合会每门逐日派人检查，终日坐守，风雨无畏”，一经查出日货，即行扣留并予以处罚。赵倜与其弟赵杰所开之德泰军衣铺、济贫工厂，因偷运日本生产的斜文布及洋纱，被学生联合会查获，经国货维持会议决，除罚款500元外，并没收了洋纱，赵倜亦无可奈何。在郑县，组织了“国货筹备会”和“童子爱国团”，进行抵制日货的斗争，“所有各商户挨次调查，凡非国货，俱令献出”[2]。在洛阳，豫西学生联合会召开抵制日货大会，“人民参观者，填街塞巷。所有日货，一齐运积火场，同时举火。一时烈焰冲天，全场鼓掌欢呼，声震街衢”[3]。安阳广益成、永聚成二杂货铺私进日货被学生查获，学生当即将货物扣留，在其店门前贴一对联“甘心要作卖国贼，情愿想当亡国奴”，并轮流在其店门口讲演、站岗，谢绝顾客数日之久。后二商店情

---

① 北京《时报》，1919年6月5日。

② 上海《新申报》，1919年7月28日。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第89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愿认罚 1 200 元[①]。此外，商丘、郾城、浚县、舞阳、辉县、汲县等数十县都有群众性的抵制日货活动。封丘、辉县、遂平、洛宁、浚县等数十县还成立了国货维持会。

8 月，山东济南镇守使马良残酷杀害爱国群众的暴行，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公愤，河南各地学生暑假返校后，纷纷举行集会，声讨马良。8 月 31 日，河南学生联合会致电北京政府，强烈要求“释放请愿诸人，解除山东戒严，严惩马良”[②]。9 月 1 日，又致电各省军政长官及学生联合会等各团体、各报馆，呼吁他们“同心竭力，交电中央，严惩祸首，以救危亡”[③]。学生联合会还派出代表同山东、山西等六省代表一道组成请愿团进京，向北京政府请愿。河南请愿代表 2 人被捕后，又立派 4 人，向北洋政府提出了山东问题未恢复前，不得补签德约及与日本直接交涉以及取消“二十一条”等 5 项要求。

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再次遭到反动当局的镇压。各校门口军警林立，学生外出便会遭到驱赶、毒打。9 月中旬，开封第一中学学生李希舜、赵永生等外出游行时刚出校门，“突有凶徒多人，手持利刃，不由分说，向该生等猛刺”。“巡警见势先逃，佯作不知，以致李、赵等刀贯胸背，立毙于地。其他各生有当场被毙者，有伤重医治无效者。计是役死伤竟有数十人之多”[④]。

反动军警的暴行激起了各界群众的义愤。10 月 1 日，开封各校学生 3 000 余人，冲破军警阻挠，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声飘荡在古城上空。游行队伍受到市民的支持，许多商店自动关门，支援学生的斗争。

河南青年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是全国五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 1919 年下半年开始的抵制日货运动，在河南持续达一年半之久，它沉重地打击了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政策，显示了河南青年“身无

---

① 北京《晨报》，1919 年 8 月 9 日。

② 北京《时报》，1919 年 9 月 9 日。

③ 北京《时报》，1919 年 9 月 9 日。

④ 上海《民国日报》，1919 年 9 月 29 日。

半文，心忧天下”的爱国情怀和斗争精神。在这场运动中，广大青年逐渐认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源是反动军阀的统治，国家命运岌岌可危。他们对腐朽黑暗的社会现状难以忍受，渴望寻求真理，重新探索中国的前途，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河南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共组织的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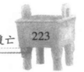
（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五四运动像一声春雷，打破了河南的沉闷局面。对祖国前途、命运具有巨大的忧患意识和强烈责任感的河南青年，“已经感到压迫、痛楚，他们在挣扎，在寻找切实的指示。他们愤世疾俗，满怀愤慨，向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展开了猛烈的冲击。他们举起离经叛道的大旗，反对家长制，反对纲常名教，反对奴隶教育，反对社会上一切不自由、不平等的现象”①。青年间志同道合者组成的社团和传播新思想的刊物在河南也应运而生。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以开封省立第二中学学生曹靖华等为主组成的“青年学会”、省立第一女子师范的“女子同志会”等。

青年学会成立于1919年年末，基本成员是省立第二中学毕业班里的进步学生，此外也有外校和外省的个别青年参加，如安徽省立第五中学的蒋侠生（即蒋光慈）等。学会的成员都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学会成立前主要活动是抵制日货。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认识到仅仅抵制日货不能挽救祖国于危亡，不能消灭旧社会的一切不合理的旧制度，遂由反对帝国主义和卖国贼运动，进而扩大到反对封建势力，反对一切不合理的旧制度、旧习俗，宣传新文化、新思潮，拥护一切新事物的运动。企图在个性解放的前提下，通过学术研究和个人身心的改造，找到一条挽救社会、挽救青年的出路。

1920年1月，青年学会创办的《青年》半月刊面世。它一开始便同其他进步刊物如《女权》（女子师范同志会创办）、《彰德周刊》（安阳学生联合会主办）、《河洛周刊》（洛阳学生联合会主办）等一样，以鲜明的

① 曹靖华：《回忆青年学会》，载《五四时期的社团》（三），第10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河南青年学会创办的《青年》半月刊

立场，犀利的文笔，向社会各个黑暗面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他们对"一切旧的都表示猛烈的反对，对一切新的都表示热情的欢迎"。军阀专制、封建势力和旧社会上的一切不平等、不自由、不合理现象，都在反对之列，而"一切新学说，新言论，大凡有助于他们反对黑暗现实的，他们都一概接受"①。各种各样的新思潮纷至沓来，涌入河南。

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五四时期"社会主义"已经成了十分时髦的名词，也是当时人们公认的新思潮。但是，他们当时连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本质的区别还分不清楚，因此除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外，各种"社会主义"流派都在青年中传播。如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等

① 曹靖华：《回忆青年学会》，载《五四时期的社团》（三），第10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的各种无政府主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欧文等人的合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柯尔等人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斯坦及考茨基的议会主义等。真是百家竞起，异说杂陈。

在这场如何改造社会的探讨中，河南青年表现了极大的热情。比较有代表性的思潮有下列几种：

一是幼稚的激进思潮，主张来一场激烈的变革，一夜之间便把旧制度推翻。《青年》第4期的一篇文章，就表现了一个青年改造社会的激情同幼稚、无知以及对十月革命的误解与中国侠士思想相混合而发出的“胡思乱想”：“我若是一个土匪，我树起一杆‘德谟克拉西’的大旗，号召些绿林健儿，编些 Bol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的教科书，实行 Bolshevism 的教育。叫他们与那些贵族官僚奋斗，破除不平等的阶级！作公产社会先锋！为二十世纪的世界史上开个实行公产的新纪元！”①

二是改造中国应从十月革命中汲取新的力量。曹靖华曾在《青年》上撰文热情地写道：“啊！列宁……我盼望你把你的种子赶快散布到大地球上！去扑灭那横暴的强盗！去发扬那德谟克拉西的真精神，去拥护那无量数的平民的生命！”②

三是主张用温和的手段，通过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等改良的方式来改造社会。以教育救国为例，他们认为只有发展教育事业，才能改变中国的社会状况，并且认为这是最稳妥、最和平的方法。通过教育培养出一批人才，使他们能以适应世界潮流，“同现在社会的黑暗和罪恶奋斗，促进社会，改良社会”③。教育救国的实质是既不满意现实，希望国家能够富强，又不愿进行革命。

除了改造社会的呼声外，对劳动问题的重视，也是五四运动后广大青年的一个共同点。“劳工神圣”是最响亮的口号之一。河南青年对劳动问题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写了许多文章，对“劳心者治人，劳力

① 开封《青年》(4)，1920。
② 开封《青年》(3)，1920。
③ 开封《新中州报》，1920年8月27日。

者治于人”的传统观念进行批判，甚至对当时知识分子的穿着也非常反感。曹靖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平素对于长衫、裙子，讨厌已极！我早就有做‘衣服革命’的决心……我们青年学会去年冬有一次开常会的时候，我提议‘永远废止长服’，此案已通过……平素我最佩服的就是那头脑简单、人格高尚、着短衣的劳动界。”①

尽管青年们崇敬体力劳动，但他们并没有找到解决劳动问题的正确途径，因而对新思潮中的各种学派，都有不同程度的接受。省立第二中学还组织了“工读互助团”，也有人试图将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付诸实践。

正当河南青年迷惘彷徨之际，马克思主义使他们从迷途中清醒过来。传播新思想、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在开封等地一直是青年们最喜欢阅读的刊物。1920 年 5 月创办于开封的“文化书社”，更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河南的传播。不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在这里可以买到，该社还出售《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主义研究》、《资本论小丛书》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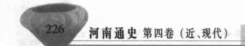
1919 年夏秋之际，李大钊已经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先后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等文章。李大钊的文章对河南青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从他的文章里有生以来第一次地明白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初步地离开了唯心论的迷魂阵，跨上了唯物主义的道路”②。他们第一次略略地知道了马克思、列宁、布尔什维主义、劳农俄国等。一些青年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问题，《青年》、《心声》、《新中州报》等报刊均辟出专栏介绍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的引导下，河南青年有了新的觉醒，并重新

---

① 开封《青年》(5)，1920。

② 《五四时期的社团》(三)，第 109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认识自己的使命。有的还走出河南，到国外去寻求真理。

(二)中共地方组织的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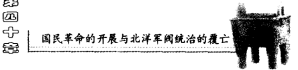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河南同全国一样，民族工商业得到发展。工人阶级队伍有所壮大。

1920年春，京汉铁路郑州职工学校设立，该校为业余教育，每晚授课，故又称“夜校”。3月，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赵子健被派到该校任教。不久，李大钊来到郑州，在赵子健的陪同下，会见了郑州铁路职工学校的学员，并对学员们讲了话。他“勉励大家：‘你们要好好学文化，学技术，你们工人可不矮呀，工人够上天那么高呀！’说着，回身在黑板上写了个‘工’字，又在工字下面写了个‘人’字，两个字一连就是‘天’字……他还说：‘咱们中国四万万同胞，两万万男子，两万万女子，要并肩前进，将来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好的中国’”[①]，李大钊的话给工人以很大鼓舞。赵子健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利用郑州铁路职工学校教员的合法身份，以讲坛为阵地，在向工人传播文化知识的同时，传播进步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向工人开展革命教育，用工人痛苦的遭遇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把郑州铁路职工学校办成了开展党的活动的场所。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首先以主要力量领导工人运动。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随后又在北京、武汉等地设立分部，作为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劳动组合书记部编辑出版了《劳动周刊》，“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②]。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派人到河南开展工作。《劳动周刊》、《工人周刊》(北京共产党组织创办)很快在河南铁路工人中传播。郑州、洛阳等地设有两刊发行站，《工人周刊》在河南有数处通讯关系，聘请有特约通讯员、发行员。开封、洛阳等地派代表到长辛店学习创办

① 《河南日报》，1957年2月6日。
② 《劳动周刊》发刊词，载《共产党》月刊第6号，1921年7月7日。



工人俱乐部的经验。9月,在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的帮助下,郑州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高斌、姜海士、王宗培等为负责人。接着,彰德铁路工人俱乐部、开封陇海铁路工人老君会、洛阳陇海铁路同人俱乐部等相继成立,共产党在河南工人中有了相当基础。

1921年11月,洛阳等地爆发了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罢工取得了胜利。罢工胜利后,党即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罗章龙等介绍游天洋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河南境内的京汉、陇海、道清三铁路工人运动迅猛发展,各地工人俱乐部相继成立,共产党在工人中间积极活动,发展党员。1922年6月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郑州有8名共产党员。12月,彰德铁路工人戴清屏、解长春、姚作堂入党,安阳成立了党小组。不久,信阳铁路工人徐宽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河南的初创时期,主要活动在京汉、陇海两铁路线上的较大城市。

二七惨案后,党通过青年进步团体,进行革命宣传,发展党的组织。先是1923年夏,杞县进步青年张海峰、马沛毅、吴芝圃等成立了杞县风俗改良会,其宗旨是"本科学理想与平民主义的精神,斟酌地方情形,一步步作推翻宗法社会及宗教迷信的旧风俗的运动"①。以后这批青年大部分到外地就学。1924年夏,马沛毅、张海峰、吴芝圃等在杞县风俗改良会的基础上,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总会设在开封省立第二中学。该会以社会科学研究为核心,团结了一大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不久,该会的许多成员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河南早期革命运动的骨干。1924年春,开封省立第一师范学生韩源波、刘英等创办的开封青年学社,团结了一大批青年学生,阅读进步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些青年以反帝国主义、反军阀为口号,在各校中都是积极活跃的分子,成为群众运动的中坚。学社的不少成员以后都成长为革命者。另外,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生组织的豫南书社等,也团结了一大批青年,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河南得到进一步的传播,

① 李青莲:《杞县风俗改良运动(河南)》,载《中国青年》第62期,1925。

党的队伍和组织也日益扩大,为迎接大革命的到来积蓄了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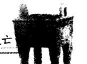
第二节 风云变幻的政局

一、直皖战争的影响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逐渐分化为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和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两大派系。两派在如何对待西南军事割据势力上存在严重分歧,皖系主张武力统一,直系则主张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1919年12月冯国璋死后,曹锟、吴佩孚继起为直系领袖,直皖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扩大。直、苏、鄂、赣和东北三省结成了七省反皖联盟。1920年1月,正在湖南同南方作战的吴佩孚,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北撤。段祺瑞深知吴军撤回保定,将对北京政府构成严重威胁;河南是吴军北撤的必由之路,而赵倜所部宏威军,兵力不厚,不可能接受他的命令阻止吴军通过。1920年2月中旬,段指使河南部分军人反对河南督军赵倜,接着又借口赵倜纵容其弟赵杰卖官鬻爵,引起民愤,压迫内阁总理靳云鹏撤换赵倜,欲以段的妻弟吴光新为河南督军,以安福系众议院议员王印川为河南省省长。

段祺瑞一面催促靳云鹏发表易督命令,一面密令长江上游警备军总司令吴光新率部迅速开往豫南。吴遂以平定河南匪患为名,2月17日,率兵到达信阳,驻扎于信阳车站附近,并与南阳镇守使吴庆桐等河南内部反赵军密谋采取联合行动。段祺瑞还派徐树铮分别到山东济南和安徽蚌埠,同边防军第二师师长马良及皖督倪嗣冲会商,让他们配合吴光新驱逐赵倜。

段祺瑞这一举措自然引起赵倜的极大愤怒,于是他就弃皖投直。在他的指使下,河南法政同学会、河南经济学会等16个团体电京,反对更换赵倜。3月2日,开封各界万余人举行国民大会,会议通过讨伐安福系卖国贼,拒绝吴光新、王印川督长豫政等六项决议案。7日,河南



国民大会致电北京政府，反对任命王印川为省长，[1]并斥王为卖国贼。

为了保住河南这块窃据已久的地盘，赵倜加入了东北三省与直、赣、鄂、苏的奉直反皖战线，使七省同盟扩大为八省同盟；同时调动军队分驻各处要隘，准备抵抗皖军的进攻；并派王杰到广东与西南军阀联系，一致反皖。2月14日，赵倜给广东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发去密电，愿同西南军阀一致反皖。

直督曹锟、苏督李纯、鄂督王占元、赣督陈光远都公开向北京政府表示反对河南易督。2月23日，吴佩孚发表了措辞严厉的反对更动豫督的电报，对段派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吴佩孚还派代表赴豫与赵倜商议共同对付皖系的办法。段祺瑞见八省同盟成立，赵倜已经有恃无恐，不得不作出让步。3月上旬，直皖两派达成妥协：赵倜留任豫督，王印川任河南省长，吴光新入豫部队于最短期内退出豫境，豫军亦撤回原防。河南易督风潮平息。

河南易督风潮虽息，吴佩孚撤军步伐未止。他在同西南军阀达成密约后，5月20日通电由湖南撤兵北返。在鄂督王占元的协助下，6月7日清晨吴佩孚到达郑州，所部集结于京汉路沿线。

直军开到河南，北方风云为之变色，直皖两系剑拔弩张，经过一段互相攻讦后，7月14日夜，直皖战争在直境爆发。23日，以皖系失败而结束。

在这次直皖冲突中，河南虽没有直接沦为战区，但给河南带来的灾祸也是巨大的。

一是变兵的抢掠给城乡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威胁。皖军战败后，原在豫境的皖系军队及曾对赵倜不满的部分豫军，因面临缴械的命运，多数哗变，肆意烧杀抢掠。洛阳原驻有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宋邦翰、张鼎勋两旅，直皖战争爆发时，段祺瑞、徐树铮曾令该部进攻郑州，而西北军在奉军许兰洲和宏威军赵杰两部的监视下不能发动。但西北军已散布于洛阳、偃师、孟津数县，乡里大受蹂躏。“在偃师东庄挨户

---

① 上海《申报》，1920年3月10日。

索饭，又有在孟津槐店地方入村搜索，遇男则杀，遇女则强行奸污，被逼而死者甚多。”[①]7月27日，吴佩孚电令将其两旅缴械解散。30日，该两旅在洛阳哗变，大肆抢掠烧杀，吴佩孚派王承斌带兵前往勒令解散。变兵一部分乘机散而为匪，与洛宁、嵩县等民间武装结合，达数千之众，到处攻城破寨。驻信阳的吴光新部赵云龙旅，4月初因吴督豫已成泡影，且该部处于直、豫军监视之下，遂发生哗变，150余家商店被抢，“邮局、戏院均被焚烧，当时炮声隆隆，弹飞如雨……最后将豫军粮饷局采购白米数千石，全行烧毁，其向东逃散者约二百余人，向西逃者约三百余人，仍结队持械，到处抢掠”[②]。战后赵倜向北京政府发出的求赈通电披露：“去年南阳一带被水成灾，民已不堪其命；今年河北二十余县，赤地千里，荒旱又成。自军兴以来，信阳、洛阳同受上游、西北两军之蹂躏，惨罹兵祸，民不聊生，饿殍载道，嗷鸿遍野，目不忍见，耳不忍闻。”[③]

二是繁重的兵差徭役，压得人民透不过气来。直皖战争爆发后，各地驻军无不向民间摊派钱粮草料，拉丁拉夫。

三是战后吴佩孚以直鲁豫巡阅副使身份驻洛阳，势力迅速膨胀，给河南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二、直系势力的扩张

（一）吴佩孚洛阳练兵

直皖战争结束后，直、奉这两个军事集团在权利分配等问题上发生了新的矛盾，并且日趋激化。张作霖本就瞧不起吴佩孚，当吴佩孚欺世盗名地发出建议召开国民大会的通电后，立即引起张作霖的不满，他公开表示“不与吴佩孚接洽一切，仅与曹锟接洽”。并指出“吴不过一个师长，不应干涉政治”[④]。吴的上司曹锟也不支持吴的行动，奉直两派的分赃会谈也不让他参加。吴佩孚这才明白自己支配北京政府的条件并不成熟，遂一心一意扩充自己的实力，把第三师撤回洛阳训练，以示

---

① 上海《申报》，1920年7月24日。

② 上海《申报》，1920年4月14日。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直皖战争》，第27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④ 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8月4日。

“不问朝政”。

9月2日，吴佩孚被任命为直鲁豫巡阅副使（巡阅使为曹锟）。他在洛阳西工成立了“直鲁豫巡阅副使署”。洛阳西工原有袁世凯在这儿修建的数千间营房，吴佩孚进驻洛阳后，将西工占地由270余公顷扩大到530余公顷，营房由5 000余间扩大到12 000余间。


直鲁豫巡阅副使吴佩孚

巡阅副使署下设八大处，即参谋、军需、执法、军械、政务、教育、交际、副官处。第三师步兵各团的训练为学科、术科两种。学科为《步兵操典》、《射击教范》、《军歌》等；术科为各班、排、连练习打靶，摔跤，学武术等。

直皖战争结束后，直军进行了扩编。除吴佩孚的第三师外，阎相文继范国璋为第二十师师长，直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混成旅分别改编为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二十六师，王承斌、张福来、萧耀南、曹瑛分任师长。原补充旅、卫队旅等改编为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混成旅，分别以王用中、董政国、彭寿莘、孙岳任旅长。直军除上述嫡系外，吴新田第七师、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靳云鹗第八混成

旅等部，也依附直系。总兵力已达10万以上。

直军大肆扩张，军需费用开支甚大。仅吴佩孚的洛阳使署，每月即需经费银2.4万两，其练兵费用则需银78万两。1921年前后，河南全省一年财政收入只有900万元左右。为了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赵倜只好忍痛将京汉铁路南段的客货运费一概拨给吴佩孚。但这只能保证吴佩孚副使署及第三师等部的费用，驻扎豫境的其他直军，经费仍然无着。

（二）成慎驱赵

直皖战争前，赵倜以督军兼省长，俨然是河南的土皇帝。他虽参加了八省反皖同盟，但皖系失败后他非但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迎来了一个太上皇——直鲁豫巡阅副使，河南被纳入了直系势力范围。赵倜对此自然不满。赵倜的兄弟赵杰是河南著名的恶霸，人民对他深怀不满，常有人到洛阳控诉赵杰，赵倜对此惴惴不安。吴佩孚不满意赵倜，想把河南直接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吴、赵之间的权力冲突已不可避免。在这种背景下，爆发了成慎驱逐赵倜的战争。

1921年1月，河南暂编陆军第一师师长成慎被免职，调任北京将军府将军，该师即被裁撤，改编为河南陆军第一旅，以岳宪玉为旅长，驻安阳。成慎与赵倜兄弟本有矛盾，此次被免职，表面上和平交卸，暗中却积极活动，以图驱逐赵倜。他首先联络旧部，准备发难；接着同冯玉祥达成密约，先由成在豫北发难，继由冯在豫南响应，以收夹击赵倜之效。成慎还同曹锟、吴佩孚作了接洽，曹欣然允诺，吴亦表示严守中立，决不干涉成慎驱赵。

4月14日，成慎到达安阳，其旧部第一团团长孙会友派兵占领车站，拆毁电线，断绝交通，推成为豫北军总司令。16日，成慎发出驱赵通电："赵督纵弟赵杰祸豫，众怨沸腾。豫北陆、巡各军，业已声明与该督脱离关系，服从中央命令，并公举慎为豫陆巡各军总司令，以维秩序。"[①]接着挥兵南下，欲进攻开封。18日，冯玉祥在豫南响应成慎，秘

① 长沙《大公报》，1921年4月25日。



密调兵两团,将在驻马店监视冯旅的赵倜部宝德全、阎寿山数营军队包围缴械。赵倜指斥冯玉祥勾结成慎,向驻马店进攻,劫夺宏威军的枪支;冯则指斥是赵倜首先派兵进攻该部确山防地,该部不得不予以还击。

赵倜见南北夹击之势已成,且有强敌侧视,一面调兵南北应战,一面以重金求助奉系张作霖。张作霖不愿看到直系直接占有中原,遂联合鄂督王占元一道向曹锟施加压力,反对更动赵倜,且表示若直军不能制止成慎之变,奉军将代为解决。同时表示愿将陕西地盘让给直系。曹锟、吴佩孚当即转变态度。吴佩孚亲率直军第二十五师一部北上,18日占领安阳。当成慎率部进至新乡潞王坟时,遭到赵杰宏威及直军的包围,大部被缴械,成慎自杀身亡。孙会友率残部逃往安阳、汤阴、武安、林县一带,5月4日被宏威军击溃,孙被俘,后被杀。成慎败后,冯玉祥亦退回信阳。战后赵倜亲往洛阳向吴致谢,并派人到信阳向冯道歉。但是吴、赵之间嫌隙既成,赵倜此举终难弥合裂痕。

(三)赵倜反直

6月,阎相文率直军第二十师、吴新田第七师及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入陕,赶走陈树藩,阎相文任陕西督军,冯部升编为第十一师。8月冯继任陕督,刘镇华任省长,刘部镇嵩军投直,扩编为四个师;陕西靖国军被改编为暂编陕西第一师,胡景翼任师长。陕军成为直系军阀的附庸军。

7月,湖南军阀赵恒惕为夺取湖北,发动了湘鄂之战。鄂督王占元求援于吴佩孚,吴派萧耀南为援鄂军总司令。8月,北京政府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至此,曹锟、吴佩孚直接控制的地区已达直、鲁、豫、陕、鄂诸省,而其中心地区即在吴佩孚盘踞的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吴佩孚成为中外瞩目的实力派魁首。

"一山不容二虎",逼处一省的赵倜同吴佩孚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1922年年初,吴佩孚通电坚决反对受奉系支持的梁士诒组阁,赵倜因处于直系控制之下不能不发电附和,一面却电告张作霖,谓其"实逼处此,不得不敷衍洛阳面子,然真心则愿追随雨帅,倒梁非其本意,尚

乞愿谅"①云云。张作霖大怒，将其电报出示曹锟，并说吴佩孚如此骄横，如果你不能制止，我将代你对付。曹锟将此事转告吴佩孚，吴大为恼火，派人到开封对赵严加申斥。赵慌了手脚，一面向吴悔过输诚，一面却又听从赵杰、宝德全等人之计，将豫军收缩到开封附近，在郑州、中牟、开封设下三道防线，并宣布开封戒严，同时联络鲁、皖两省，成立三省攻守同盟。吴佩孚得知后，决定派王承斌继任河南督军。赵倜十分恐慌，赶忙给吴送去40万元军饷，此事才暂时搁置。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25日，吴佩孚由洛阳北上督师，调冯玉祥率领第十一师及陕军第一师胡景翼、第四混成旅张锡元等部入豫，并留下一纸手令，叫冯玉祥以陕军援直总司令名义留守洛阳，监视赵倜的行动。26日冯到洛阳，后吴佩孚因前线战事吃紧，将第十一师等部调往前线，豫中防务空虚。

战争期间，张作霖的谎报告捷的电报接连不断，5月4日张作霖又发出大获全胜的电报，赵倜派在北京的军事侦探给他又发来了一个吴佩孚已死的错误信息。赵倜在战前即与奉军有秘密联系，欲在直、奉主力交战之机，豫军在后方发难，将直军赶出河南。5月5日，奉军在前线战败已经总撤退，而赵倜却发动了反直之战，当天授意省议会和各团体联名通电，指斥吴佩孚的罪行，抗议冯玉祥入豫，赵倜同时发出了"武装中立"的歌电。所谓"武装中立"乃是遁词，实质是发动反直战争的信号。归德镇守使兼河南暂编第二师师长宝德全等豫军将领联名发表通电响应赵倜，并各自秣马厉兵，准备厮杀。

时直军在豫兵力为洛阳陕军第一师，郑州第二十四师、第十一师一团，第八混成旅一团，而赵倜各部则有3万之众。6日凌晨3时，赵杰率宏威军20营突袭郑州，在中牟西古城同直军王为蔚部接触，直军仅3营，因寡不敌众败退郑州，郑州车站、纱厂所驻直军亦向西逃避。4时，赵军占领黄河铁桥，守桥直军以势孤退往北岸。原驻信阳之靳云鹗第八混成旅奉调北上，拂晓至和尚桥，突遭豫军阻截，该部因未接到进

① 章伯锋:《北洋军阀》(4)，第179页，武汉出版社，1990。



击命令遂退回武胜关，赵军拆断李家集、柳林铁路，以阻鄂军北援。

曹锟闻变，电令冯玉祥率兵兜剿。6日午冯玉祥赶到前线，组织靳部第一团及王为蔚旅并力攻郑，在城外十里铺激战一昼夜，双方死亡3 000余人。赵军不支，向中牟方面退却。7日晨冯玉祥到郑州，决定分兵三路攻取中牟，进围开封。9时，豫军归德镇守使宝德全率巡防营十数营，由黄河南岸绕攻郑州左侧，经靳旅彭团迎击，陕军第一师胡景翼部适时赶到并投入战斗，豫军大败，宝德全逃匿。中午，冯玉祥下总攻击令，各路出击，8日克复中牟，新郑以北赵军均被缴械。吴佩孚又派大批援军入豫，赵军不支，遂行溃散，冯玉祥指挥各部向开封进攻。当赵杰部发动反直战争后，丁香玲、马志敏、常德盛等豫军将领见奉军退出关外，无不见风转舵，按兵不动，仅有宝德全部策应，又全军覆没，剩下军纪败坏，战斗力极差的赵杰部孤军作战，自然不是直军对手，溃败便在意料之中。赵倜见事已不可为，遂发出辞职通电。

吴佩孚并不想让赵倜彻底垮台，现见赵杰部宏威军已经溃散，知道赵倜不难就范，遂将豫乱归咎赵杰一身，电令赵倜免赵杰职，将军队调回原防，其他各事不成问题。赵倜立即答应，发出停战求和通电，当日组成以裴其勋为首的"调人团"，于10日在郑州举行调停会议。冯玉祥并不愿就此而收场，指挥各部继续向开封推进。赵倜见冯军推进不止，和平无望，11日再电北京政府，引咎辞职，并要求大总统制止冯军向开封开进。

就在赵倜真电发出的当天，北京政府已经命令免去其本兼各职，听候查办；特任冯玉祥为督军，宝德全帮办河南军务。12日夜，赵倜匆匆逃离开封。13日，冯军占领开封。至此，统治河南长达八年的赵倜退出了河南政坛。

三、从冯玉祥到张福来

冯玉祥，字焕章，安徽巢县人。15岁即投军当兵，由正兵、正目逐渐提升，1914年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1920年任第十一师师长、陕西督军，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赵倜反直兵败，冯玉祥被任命为河南督军。

5月14日，冯玉祥到达开封。城内的文武官员和社会名流都到车



河南督军冯玉祥

站迎接，宝德全也来到车站。冯一见宝德全，“立刻命令手枪队长李向寅把他逮捕，拉到空地上枪决了”[①]。

冯玉祥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具有忧国忧民意识，想要改变社会现

①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364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状。他在驻防信阳时，就对河南农村经济的破产深感痛心。此次进兵中原，沿途所见，深知人民困苦达到极点，因而决心整理紊乱已久的豫政。经过详审地方实际情形，拟定了十项治豫纲领，作为最低限度的施政标准：

(1)赈恤战区灾民，俾免流离；(2)清理财政各税，期除苛敛；(3)彻办户口登记，以杜盗源；(4)整饬巡缉各队，以维治安；(5)查拿贪官、痞棍，以安善良；(6)筹设实业工厂，以纳游民；(7)普遍浚河筑路，以利交通；(8)推行义务教育，以开民智；(9)严禁烟、赌、娼妓，以淳风俗；(10)厉行剪发、放足，以除陋习①。

冯玉祥自5月中旬到开封履新，10月底调离河南，在豫督任上不足半年，他的治豫大纲有的刚刚开头，有的还没有来得及实施，便被搁浅。虽然如此，他仍然做了不少于河南人民有益的事，值得称道。第一件事是清理赵倜的逆产，将所得款项部分用于开办平民工厂，大部分拨作河南教育经费；清剿土匪，安定社会秩序；惩治贪官污吏，给赵倜三太太送红绣鞋的车云及知事刘名斗、石亮等，皆以侵吞公款被拘禁，全省被罚款及被通缉者，达百余人；清理财政，官钱票划一；推倒庙宇内的神像，破除迷信，让和尚道士还俗，将寺庙改建为学校或公共场所；雷厉风行地禁赌、禁娼。冯玉祥还大力提倡新风，破除陋习。如将督军署三辕门及照壁拆去，辟为坦途，两个旧式旗杆，全都伐倒，以扫除从前官署气象。冯还以开封、商丘、沁阳三县试办模范县，以期带动全省风气的转变。

冯玉祥虽然一心想刷新政治，但因为他和吴佩孚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所以不能久居于位。吴、冯矛盾，肇始于冯任豫督之时。吴佩孚明白冯玉祥是很有个性的人，为了牵制他，遂推荐宝德全帮办河南军务，谁料冯一见面即将宝枪杀，吴佩孚心中不满，但亦无可奈何。紧接着吴佩孚向冯推荐督署参谋长，除秘书长外，其他重要职务均一一指派了人。冯则立即命他在陕西督署的原班人马，接收了河南督署，对吴所

① 上海《申报》，1922年5月31日。

介绍的人，一律予以挡驾。吴对冯越发不满。

第二件事是冯玉祥查抄赵倜的私产之后，胡景翼、靳云鹗等在同赵倜作战中有功部队，均想分得一杯羹，不料冯玉祥全拨作了教育经费。他们以为是冯军独吞了这笔款项，因而俱对冯不满。吴的亲信张福来想做河南省长，吴向冯示意，冯却以不能更动省长张凤台作抵制，吴、张均感不满。

第三件事是吴佩孚对河南政务插不进手。张凤台做省长，一切以冯之马首是瞻，吴佩孚在人事上安排不进，向冯要款，亦被拒绝。先是清理赵倜逆产，冯没给吴送钱，吴已不满，不久便让冯给筹措80万元经费，以后每月经常划拨20万元，遭到冯的坚决拒绝。吴佩孚自然恼火，遂伺机逐冯。

冯玉祥由陕入豫时，兵力只有一个师。逐走赵倜后收缴了大量枪支，改编了不少散兵，同时派第十一师河南籍官兵回家串联亲友出来当兵，很短时间就募足了5个补充团。吴佩孚听说冯擅增兵员，屡电制止，冯却置之不理。但冯想要申请编制和补充军火器械，却也办不到。直皖、直奉战后，吴佩孚声誉日隆，更加骄纵自大，对部属颐指气使，汴、洛两地近在咫尺，却不能过问豫省之事，吴佩孚如何能忍？终于让北京政府于1922年10月31日任命冯玉祥为陆军检阅使，吴佩孚电令冯玉祥，只能把第十一师带走，其余部队一律交由新任督理张福来改编，并派其参谋长李济臣驻郑州，以监视冯军开拔。

冯玉祥接令后，立即准备北上，先将扩招的补充团官兵，一律佩带第十一师的符号，轻装连夜登车，先行开出，待其开拔完毕，然后装运真正的第十一师的官兵和辎重，三天内全军运到北京，结束了他在豫督任上5个半月的生涯。

冯玉祥离豫后，北京政府裁撤河南督军一职，任命张福来为督理河南军务善后事宜。张系吴的心腹，诸事皆秉承吴的旨意办理。吴佩孚又授意北京政府，于1923年12月12日，免去了张凤台的河南省长职务，改任吴的参谋长李济臣为省长。李济臣上任后，将省工署由开封迁至洛阳，事实上成了吴佩孚的一个办事机构，河南军政大权均揽在了吴



佩孚的手中。期间河南军队大幅度增加，到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前，河南驻军近10万人，较1922年以前“骤增至2倍以上”[①]。庞大的军费开支，除部分由中央拨付外，大多转嫁到了河南人民头上，从而更加速了农村经济的破产和社会的动乱。

四、国民二军的兴衰

（一）国民二军入豫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两派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1924年9月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各主力部队都投入了战场。两军正在激战的时候，直军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与直系援军第二路司令胡景翼、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发动北京政变，导致直系失败，贿选总统曹锟退位，内阁垮台。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决定将所部组建为中华民国国民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为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11月初，北京政府免去张福来河南督理和李济臣河南省长职，派胡景翼为“督办河南军务善后事宜”（简称“督办”），孙岳为省长。中旬，国民二军南下，19日前锋抵达直隶顺德。

直军战败后，吴佩孚于11月中旬回到洛阳。陕督刘镇华见吴佩孚已无能为力，即派该部第三十五师师长憨玉琨率部入豫，企图抢占中原。刘镇华部前援直之张治公师数千人，已由山海关败回河南，驻扎临汝一带，为憨部声援。12月1日，憨部突然逼近洛阳，憨玉琨电请吴佩孚于24小时内退出洛阳营房。此时吴军为数不多的部队全在豫北，洛阳只有刚刚招募的部分新兵，不但毫无作战能力，而且在城内鼓噪，引起一片混乱。吴佩孚无奈，于2日黎明狼狈逃往郑州，准备南下武汉，途中收到原来的亲信萧耀南拒其入境的电报，只好在柳林下车，住进了鸡公山。吴佩孚逃走后，憨玉琨乘机占领洛阳，4日进兵郑州，于黄河南岸布防，并拆毁黄河铁桥一段，以阻国民军渡河。5日憨部又进占开

①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167页，太平洋书店，1930。

封。

北京政府不支持憨玉琨，电令其退出开封、郑州。10日，憨玉琨部退出开封，并令扼守郑州黄河桥南岸的李振亚（直系收编之豫西股匪）撤退。憨军退往荥阳、汜水以西。国民二军渡河占领郑、汴，岳维峻沿京汉路南下进抵郾城，11日占领信阳，吴军继续南退。15日，国民二军向吴军发起攻击，李济臣部万余人溃散。陈文钊、王为蔚、马志敏、田维勤等均被国民二军收编。直系在河南的势力已被廓清。

（二）胡憨战争

憨玉琨出兵河南，原是为刘镇华（巩县人）实现督豫的梦想而抢占地盘。国民二军入豫后，憨部仍占领着豫西30多个县。憨玉琨原是豫西绿林出身，此次入豫，大量收编杆子、散兵，所委王振、李有才、张崇勋、孙殿英、马文德、詹老末等旅长达20多个。

胡景翼得到一个残破不全的河南，自然心有不甘；而憨玉琨在刘镇华的支持下，也不愿放弃豫西地盘，双方猜忌日深。1月下旬胡景翼以“剿匪”为名派兵进驻铁炉以东地区，并封锁黄河北岸；憨玉琨遂在荥阳、汜水、巩县设三道防线，并封锁黄河南岸汜水至巩县一线。2月初，憨玉琨自称豫军总司令，调动各部备战。胡景翼遂委岳维峻为河南“剿匪”总司令，田维勤为副司令，布置进攻。2月18日，双方在郏县开始接触。25日，胡景翼下总攻击令，胡憨战争正式爆发。

自2月下旬到3月初，两军激战于巩县、黑石关一带，孝义兵工厂几度易手。憨玉琨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在火线上督战，3月4日重创国民二军，幸亏李鸿翥及时来援，胡才幸免被俘。接着，国民二军加强攻势，到27日占领豫西各县，憨军败逃殆尽，憨玉琨逃往嵩县老家，4月2日服毒自杀。

（三）国民二军的扩张

4月10日，胡景翼病逝，岳维峻取代胡职。国民二军入豫时，人数不足4万。战败吴佩孚、憨玉琨，统一河南后，该部进行大肆扩编，原属河南旧军的郭振才等，原属吴佩孚系的田维勤等，原属镇嵩军的赵树勋等，均归国民二军麾下。1925年夏，该部共编有11个师，18个混成旅，



2 个骑兵旅,另有 12 个补充团、6 个独立步兵团、1 个独立骑兵团、3 个独立炮兵团,"总计师旅名目之繁多,派别之复杂,除川广两省外,无论何省,莫若河南。如照北洋编制计算,则直辖之第二军……应有兵额二十余万人"①。此为国民二军的全盛时期。较之半年前入豫时,扩编达 4 倍以上!

此时国民二军虽然兵力强盛,且统一了河南,而中原则陷入更加混沌的局面。因为:一是河南还有两大友军集团不属于国民二军系统,即米振标(兼河南军务帮办)的毅军和樊钟秀的建国豫军,各万余人,他们并不肯紧跟岳维峻的指挥棒转。二是镇嵩军战败后,数万官兵携械溃散,他们大多为豫西各县土著,不久又集合起来,盘踞于熊耳山、伏牛山一带,不断窜扰豫西各县,岳维峻却毫无办法。三是直军残部靳云鹗、寇英杰等仍盘踞豫南,威胁着中原。四是国民二军内部派系复杂,有些且与二军貌合神离。因此国民二军的鼎盛时期已潜伏着衰败的隐患。

1925 年 10 月奉浙战争爆发后,避居岳州的吴佩孚乘机东山再起,到汉口通电就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职,要求假道河南,北上进攻奉军。岳维峻深知"假道"的背后隐藏着什么,一面宣布"保境安民",一面派蒋世杰师进驻信阳加强豫南的防务。可是岳维峻并没有把吴佩孚看做最危险的敌人,仍然向奉军发动进攻。11 月 7 日,岳维峻令二军分三路出师讨奉:右路田维勤、王为蔚、陈文钊部假道徐州进攻鲁南;左路李云龙等部攻邯郸,中路军为国民二军主力李纪才部,由兰封、归德进攻鲁西。中路军以破竹之势占领临城、曹州、济宁,前锋进至泰安附近。11 月 24 日,靳云鹗在徐州收回了原属直军的田维勤、王为蔚、陈文钊师,宣布就任"讨贼联军豫军总司令",随即按兵不动。李纪才部受到直鲁联军张宗昌的全力压迫而后退。

(四)国吴之战

1926 年 1 月中旬,吴佩孚决定分三路出兵进攻河南,另外联络河

①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 184 页,太平洋书店,1930。

南各地红枪会和民团，以不纳粮为诱饵，并许以编为“豫卫军”，使其扰乱二军后防，以收内外夹击之效。26日，战争正式爆发。因为战争双方一为国民二军，一为吴佩孚部，所以称为“国吴之战”。

岳维峻接到吴佩孚攻豫的情报后，1月26日于郑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蒋世杰坚守信阳，另派田生春、杨瑞轩两旅增援豫南；李纪才回师归德；二军主力集中于开封、郑州、洛阳一线，随时待命。

豫南战场。蒋世杰缩短战线固守信阳。1月26日寇英杰围攻，多次强攻未下。一次曾攻入城内，适被二军田、杨两旅赶到将其驱走。吴佩孚又加派刘玉春旅增援，蒋世杰等仍坚守不降。2月中旬，吴变更战略，一部继续围信阳，一部沿京汉路北进。22日占确山、驻马店，24日占郾城，国民二军北退。27日，寇军分三路向郑州进发，3月2日占领新郑。

豫东战场。靳云鹗紧随由鲁西退回之李纪才部进入豫东。2月17日，驻守归德之郭振才部倒戈迎靳军入城。20日，靳军与田玉洁部激战于柳河，接着占领宁陵、考城，25日占兰封，开封震动。李纪才、田玉洁部溃退。26日，岳维峻将军、民两署由汴移郑，开封防务由米振标负责。米当日便派员东迎靳军。27日靳云鹗进入开封。3月1日，靳军占中牟，当日夜岳维峻率8万人沿陇海路西撤。3月2日，靳军占郑州。靳部王为蔚5日占新乡，7日占汲县、安阳。王维城率两旅沿陇海路西进，4日占领巩县。6日，岳维峻部在洛阳遭到当地红枪会的猛烈袭击，并将其弹药车炸毁，一时秩序大乱，指挥失灵，十万大军蜂拥西奔。此时，刘镇华已率镇嵩军旧部柴云升、王振等进抵函谷关，据险阻住西去各路口。岳维峻虽组织部下向刘军阵地猛冲，无奈将有归心，士无斗志，被迫向镇嵩军缴械，12日岳维峻重走一年前刘镇华的老路，渡过黄河逃往山西运城，被阎锡山扣押。14日，坚守信阳48天之蒋世杰、田生春、杨瑞轩部向吴佩孚军投降。信阳攻守战两军伤亡6 000余人，居民死4 000余人，伤者不可胜计。城内及城关“民家皆户无门，窗



无椽，室无器具，院无牲畜”[①]。在这场战争中，河南人民生命财产遭受的损失实在无法统计。

第三节　风起云涌的工农运动

一、军阀的暴虐统治与红枪会运动

（一）军阀的暴虐统治

河南在张镇芳、赵倜统治期间，如前所述，政治异常黑暗，盘剥异常残酷，城乡人民的苦难异常深重。以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窃据全省军政大权后，无论政治压迫和经济盘剥都愈来愈甚，广大农民正如他们愤怒诉述的“象在十八层地狱下过生活”[②]。

吏治极其腐败。吴佩孚盘踞洛阳，“凡豫省司法、行政，无事不出自干预”。作为河南的太上皇，他“待官吏如奴隶，视人民如牛马”[③]。所派督理张福来，一字不识，“别人教他怎样画行，但他连‘行’字也画不好”。不过他聚敛有术，以其小妾之父（原粪厂老板）为督署财政处长，以其二弟为铜元局总裁，其他如烟酒专卖局、军需课、豫泉官银号等肥缺，均用其私人掌理[④]。先后任省长的张凤台、李济臣均与他同恶相济，“卖官鬻爵，横征暴敛”，各县知事，“半为各县之富户”拿钱贿买；另一半则为吴佩孚各军军官的亲族戚友。因为僧多粥少（全省总共108个知事），所以知事的任免十分频繁，大都数月甚至一两个月即换任一次，使更多的知事在搜刮民脂民膏上大显神通。所以当时省内外人士将县知事与毒品（鸦片、吗啡）和客军一道并列为“河南三害”。

盘剥极其苛重。1925年，全省军队达到25万众，加上各种杂牌军

---

① 民国《重修信阳县志》卷三十一，民国25年汉口洪兴印书馆铅印本。

②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4日。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军事》（三），第73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④ 《河南文史资料》第33辑，第4—8页，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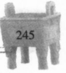
队和地方性武装，总数不下100万人[1]，军费支出自然也十分庞大，还在1923年度就达1 155万多元，居全国各省首位。为了筹措如此巨大的军费，省当局就不断加重对人民的盘剥。全省从1922年开始，地丁每两折征由原来的2.2元增为3.3元，漕粮每石由原先的5.5元增为8.25元。除此之外，还要预征（实是额外加征）以后各年钱粮和勒交以前各年"民欠"。有些县份，1925年时竟预征到1934年的钱粮。至于其他各种杂税，更层出不穷，不过因经征者大都为军阀私属，"财政厅长，省长均不便察纠，任其胡为而已"。如此横征暴敛，却"上不归公，下实扰民，只肥当路之亲属一二私人而已"[2]。

兵祸极其酷烈。军阀统治与不断的混战相伴随，战火所及之地，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极大损失自不消说，就是没有战争的平常岁月，军队在所驻之地"吃地面"，也给各阶层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各军从官到兵，吃的从白馍到盐、菜，用的从桌椅到碗筷，穿的从衣服到鞋袜，以及电线杆、枕木、驮骡、车辆等，事无巨细，几乎无一不取之于民。一到调防或开拔，地方上更是鸡犬不宁，哪怕距离不过百十里，也要索这费那费，沿途复"要车，要粮，要民夫，要牲口，农民、牲口都得自备口粮和草料"，大小军官还要预备公馆，连酱油都得供应[3]。广大农民因此又蒙受许多新的灾难。

匪祸极其深广。因为广大农民在官府和军队的交相盘剥下大批破产失业，所以杆伙迅速滋盛，全省几无一县无匪，有些地方甚至无村无匪。村庄一旦被匪攻入，往往被烧得"寸椽不留"，居民未及逃走者，多被绑作肉票。正如一则报道所说："民愈穷而匪愈多，无穷无富，成为鱼肉。夜则枪声遍野，无人过问，日则携枪游村，出入自若，房舍任其焚烧，牲畜任其宰杀，人民任其毙架，妇女任其奸淫。"[4]长年生活在这般乱世的城乡民众，真是连"太平犬"都不如。

---

① 张钫：《风雨漫漫四十年》，第26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② 天津《大公报》，1923年5月4日。
③ 张钫：《风雨漫漫四十年》，第26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④ 天津《大公报》，1920年3月3日。





军阀屠杀无辜民众

灾害极其严重。同样与军阀统治密切相关的，是自然灾害的频繁和严重。1920年，华北5省大旱，"就中以河南的百姓受苦为尤甚"，大河南北，"真是赤地千里，寸草不生"。尤其是豫北地区，一连两季无收，草根树皮也难以获得，"吃得雀尽鼠空"①。全省重灾者近60县，灾民1 500万人。以后各年，也是水、旱、虫、风、雹等灾无年或断。全省每年差不多均有一半以上土地减收或绝收。其所以至此，是与军阀统治期间水利破坏，森林砍伐，自然环境严重恶化和困乏的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低下分不开的。

前列种种，只是择其主要者而言，已经足以看出军阀统治给河南尤其是给广大农民带来的无穷灾祸，社会危机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以后更愈过益甚，到1926年，诚如外地报刊所形容的，"汴省人民，已似枯

① 北京《晨报》，1920年9月26日。

骨一般”①。

在这种情势下，肇始于20世纪初的农村自卫组织——红枪会，就在大河南北迅速发展，到20年代，交会成震动全国的红枪会运动。

（二）枪会运动概况

河南民间自清中叶以来，就有传习金钟罩、铁布衫一类功夫者，红枪会晚清时已有，但影响不大，不为人们所重视，1917年后，民间多称其为硬肚会。由于其在传习时为使会众求得精神支柱，遂披着迷信的外衣，打仗时喝符念咒，倡言刀枪不入，火器不伤。因其近似义和团，引起当局的恐慌，1919年初冬，赵倜通令各道尹、各县知事“迅速布告解散，设法严拿，务绝流传，以弥隐患”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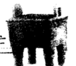
1920年后，硬肚会以其所使用的武器为红缨枪，所以被称为“红枪会”，此名称迅速被人们所接受，红枪会组织遍及全省。某些会首为了个人目的独树一帜，以其枪缨的不同颜色命名枪会，如白枪会、黄枪会等。除了天门会势力达豫北冀南20余县外，其他枪会多偏处一隅，无法与红枪会相比，所以“红枪会”就成了那个时代枪会运动的代表。后因官府查禁甚严，便又改称“红学”。

红枪会不是宗教，所以并没有什么教义，信神画符，只是求得精神支柱，所以枪会拜奉的“神”非常庞杂，“如那学房牌位上的孔子，庙中偶像的关帝、观音，以及道士口中的太上老君、土地庙中的土地爷爷，《三国演义》中的张飞、赵云，《西游记》里的猪八戒、孙悟空，巫医符咒，乩台沙语，阴阳卜筮，八卦五行等都搬出来”③。

红枪会的入会仪式各地不尽相同，一般比较简单，入会者要诚意拜师，拜师前要斋戒沐浴，戒绝女色；拜师时行三跪九叩礼，接着拜神、焚香、饮符（有不饮符者）、宣誓等。

河南各地枪会的组织并不相同，大体上是以村落为单位，一村或数

① 天津《大公报》，1926年11月26日。
② 《河南公报》，1919年10月15日，第1203号。
③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第567页，人民出版社，1959。



村设一香堂，称其为一堂。因为办枪会需要有人出面组织，请教师等，因此会首均为当地有影响的地主、士绅所担任，一堂请一个老师教功法，也有数堂请一个老师教的，但老师只负责教功，指挥权则操在会首（有的称学长或会长）的手中。1926 年后，红枪会逐渐走向联合，有的联数会为一团，与土匪、官军作战时，动辄数千、数万人。

各地枪会都有联合御匪的协约，因此只要听到一村有报警的号炮或铜锣声，附近的会众便会一齐带着枪刀向报警的地方奔去。虽然他们不懂阵势，不会利用地形，但上阵却异常勇敢，因为他们既有枪弹不能入身的自信心，又有上阵后如果后退或者心存恐惧便会被神责罚而为枪弹击毙的戒惧，因此遇着敌人时，不顾一切地向前，其威势不但使"土匪"见而生畏，即使军阀部队也往往溃不成军。

河南各地枪会的性质虽然不尽相同，但在抵抗官府、军队之剥削，防御土匪之蹂躏方面则是一致的，正如通许县绅民质问县知事所说："要叫我们不相信红枪会很容易，只要地方不见土匪，军队不扰乱，官府不派苛捐杂税，完粮纳税收用纸币，便可不奉红枪会。"[①]这番朴实的话道出了全省枪会的宗旨。各地枪会普遍进行过抗兵抗匪、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影响较大的是卢氏人民三次围城驱赶驻军事件。

先是刘镇华（陕西督军）派陕军第一混成旅第一混成团赵树勋部、巡防第二路统领郭金榜部（5 营）驻卢氏。两部的所有费用，全由该县人民负担，"县民缴款稍迟，即拘县押追，狱中关押之户，常有百数十人"[②]。1923 年秋粮歉收，官府和军队仍然逼令农民缴纳钱粮，人民忍无可忍，群起驱赵。8 月，全县保卫团、守望社、红枪会、硬肚会等不期而聚者 10 余万人，各持刀枪将县城包围。经刘镇华等派人调解，议定将郭部他调、赵团月饷减去一半、以后不准军队自由下乡催款拿人三条件，农民始解围。

郭金榜部调走后，因赵团仍然派兵下乡催饷，捕打农民，再次激起

①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第 567 页，人民出版社，1959。

② 仁静：《河南卢氏县人民对军阀之反抗》，载《向导》第 69 期，19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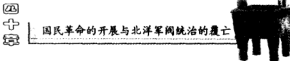
民愤。1924 年 2 月四乡民众二次围城，经调解民众虽然散去，但共同议定从此誓不缴纳兵饷。赵团不敢下乡催饷，遂向城中居民苛求。城内居民密议后，向四乡枪会求援。人民对军阀部队早已痛恨至极，闻讯后纷纷来到城下，“不半日已人山人海，其势汹汹。除卢氏民团、枪会外，洛宁、嵩县、灵宝等地民团也赶来支援。他们打着镶有黄边的大红旗，手持大刀、长矛、土枪，抬着九节雷，将县城团团围困。口号声昼夜不断，吓得军阀部队龟缩城内不敢露头”[①]。此次围城长达一月，炙手可热的军阀吴佩孚以及张福来、李济臣、刘镇华、丁香玲（豫西镇守使）的代表奔走于豫西道上，同围城农民谈判，被迫接受农民提出的赵团移防，一切开拔费用悉由上官拨发的条件。赵树勋十分沮丧地签订了城下之盟。

河南枪会与军阀部队冲突规模最大的一次是 1926 年春国吴之战时，各地枪会蜂起围攻国民二军并导致其失败。如前文所述，国民二军入豫后，由于军队迅速膨胀，军费支出激增，从而同人民的关系日益紧张。吴佩孚、刘镇华派人入豫联络豪绅掌握的枪会，许以官职及免征三年钱粮，让其捣乱二军后方。豫西原散处各县的憨玉琨旧部，纷纷以枪会的名义组织起来。国吴之战爆发后，各地枪会四出扰乱二军的后方。二军西退时，红枪会到处截击，二军被截为数段，首尾不能相顾。岳维峻退至洛阳时，豫西枪会漫山遍野蜂拥而来。二军虽仍有十万人之众，但为红枪会气势所慑，士气涣散，各自逃命，“丢掉的枪炮弹药不计其数。连那些高级军官们乘坐的小卧车也抛弃在路旁，辎重枪械遍地皆是”[②]。曾有人评论吴佩孚战胜国民二军“完全是红枪会的力量”[③]。

吴佩孚重占河南后，立即背弃了许下的诺言，令各地解散红枪会，并照样征收钱粮。此举遭到枪会的反抗后，吴佩孚电令河南督理寇英杰，全省枪会务于一个月内“一律剿除”。寇英杰即责令东路由改编之

---

① 中共三门峡市委党史办公室：《峭山风云录》，第 38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② 《河南文史资料》第 10 辑，第 72 页，1984。
③ 霁帆：《介绍河南的红枪会》，《中国青年》第 6 卷第 1 号，1926 年 10 月。



河南第三旅李鸿翥负责，南路归袁家骥和南阳镇守使办理，西路由镇嵩军张治公负责[①]。各地枪会遭到镇压，最惨的是通许、杞县一带娄百循所领导的红枪会。1926 年 5 月 8 日，李鸿翥指挥两个团，分四路向通许娄拐、向运店及杞县白塔寨、叶庄的红枪会大举进攻，先用大炮轰击，继之焚烧房屋，屠杀民众。娄拐、白塔寨等 30 余处村庄惨遭浩劫，百姓扶老携幼，纷纷潜逃。劫后的白塔寨，一口大井内"填满了一井的死人，至灰烬内及颓垣破砾下，随地皆是断胫残骸"[②]。有人估计死伤达数千人。豫西、豫南各地枪会也遭到了残酷镇压。

二、工人阶级的成长[③]和工人运动的开展

河南近代产业工人产生于清朝末年，民国时期逐渐发展壮大，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承担起中国革命的领导任务后，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给河南社会历史的发展带来十分深广的影响。

民国时期，河南产业工人人数有多少？队伍有多大？据北京政府第五次农商统计资料所载，1916 年全省工人总数只有 1.5 万人。不过，该资料与当时河南的实际情况当有不小的距离。1927 年，据中共组织工运人员估计，全省"工人总数至少在四万"[④]。此外，还有一些调查和统计，但都比较粗疏。根据各方面的材料综合研究分析，省内工人总数在 20 世纪 20 年代，约 5.2 万人；20 世纪 30 年代，约 4.8 万人。由 20 世纪 20 年代推算 10 年代末，则可以 20 年代的 5.2 万人为基数，减去 10 年代尚未正式成立的企业（豫丰纱厂、华新纱厂、巩县兵工厂、诸打包厂、观音堂及其他 3 个煤矿，陇海路未修段）的工人，可得出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后全省工人总数当在 4 万人左右。

---

① 上海《民国日报》，1926 年 5 月 21 日。

② 潇湘：《河南红枪会被吴佩孚军队屠杀之惨状》，载《向导》第 158 期，1926 年 6 月。

③ 近代工人阶级的成长是民国时期河南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了比较集中地说明这个问题，本目将国民党统治时期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有关情况糅合起来加以论述，这样较之分开表述可以更完整地反映这个最先进阶级的基本情况和地区特点。

④ 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3，第 160 页，1984。

需要说明的是，在如许的工人中，有不少是童工和无工资的学徒工。

以上说的是产业工人，除此之外，还有十数倍于此的非产业工人。20世纪10年代，据不完全统计，在各类作坊、工场和土煤窑做工的工人，总数约2万人。30年代中，清丰、濮阳、南乐三县有各类手艺人和“苦力”（旧式运输工人）近6 000人，平均每县近2 000人。据此推测全省当有各类手艺人和搬运工人20余万人。在交通线上的商业城镇，此类工人更多，光开封一城即有两三万人；周口一镇有5 000多人，郑州人力车工人和运货工人5 000—6 000人。根据这些具体事例估测，全省非产业工人三四十万人。他们虽与产业工人有别，但都是工资劳动者，且有各自的行业性组织（如老君会之类）或所谓“工会”（官办），也是以产业工人为骨干的河南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

就数万产业工人来说，从地域上看，主要集中于郑州、开封、安阳、新乡、洛阳、巩县、汲县等地；从行业上看，主要集中于有限企业中，像拥有较多工人的煤矿，75%的工人都集中于500人以上的大矿中；再如“豫丰”、“华新”、“广益”等纱厂和巩县兵工厂，其他地区、行业工人都为数有限。因为比较集中，所以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总数较少的缺陷，在社会政治生活上发挥巨大作用。这是河南工人阶级的一个突出特点。

河南工人阶级的第二个特点，是与农民阶级有特别密切的联系。

拿最大的煤矿焦作煤矿来说，2/3—8/10的工人均来自附近的农村，有些还在家务农，在农闲时才去矿上做工。在其他煤矿中，此类农忙务农，农闲做工的工人尤多，即令上窑挖煤，不少人下班后仍到地里干农活。铁路沿线的路棚工人，也大都来自附近农村，下班后就成了农民。蛋厂、烟厂、打包厂均系季节性生产，大批女工一年数月入厂做工，大部分月份均回农村生活。由于这个缘故，许多工人“表现着散漫与带有浓厚的农民意识”[1]，从而带来思想上和组织上的一些弱点，但也

① 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第406页，1984。

便于工农之间的天然联系，形成这两个最大的被剥削阶级的牢固联盟。

河南工人阶级的第三个特点，是所受的剥削和压迫特别沉重。

各业工人的工资都十分微薄，而且不断降低。20世纪20年代，以最“正规”的郑州豫丰纱厂来说，工人每天早晨5点半上工，下午6点半下工，日工资多数不过0.1—0.28元，“日进数角尚不足以糊口，焉有其余钱养家，故一般女工日食黑馍及野菜叶”，一旦失业，大都只能“沿门求乞”①。其他企业工人“做工一月，不能养其儿女”，成了普遍现象②。30年代，一般工厂和煤矿成年工人的日工资在0.3—0.4元，0.2—0.3元的也不在少数，蛋厂工人日工资多为0.1—0.2元。如果按官方《工厂法》规定的一天8小时劳动制计算，河南工人的工资更低。因为大多数厂矿的劳动时间都是10—12小时，有的且长达14小时，真正实行8小时劳动制的很少。

以上，还只是名义工资，其间还要经过厂矿主、工头、监工和黄色工会的层层扣剥，工人实际所得更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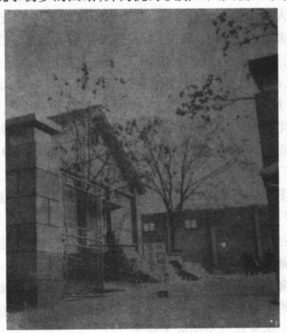
因为河南工人阶级的苦难十分深重，所以一经本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启发教育和组织领导，就自觉地奋起战斗，在20世纪20年代即发动了多次震动全国的大罢工。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集中全力从事工人运动。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在北京等地成立了分部，《劳动周刊》、《工人周刊》等刊物迅速在铁路工人中传播。北方分部派员到河南境内的京汉、陇海、道清三条铁路线各站开展工作，京汉路为吴汝铭等，陇海路为游天洋、王忠秀等，道清路为童昌荣。他们通过赠送《工人周刊》、办工人补习学校和进行巡回演讲等方式，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9月，郑州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高斌、姜海士等负责。10月，彰德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戴清屏、齐富贵等负责。同月，开封陇海铁路工人建立了具有工会性质的老君会，林子荣、张良彦等负责。

①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5日。

② 天津《大公报》，1923年3月8日。

11 月，洛阳陇海铁路同人俱乐部成立，游天洋、王福顺、白眉珊等负责。各地工人实现了初步的团结，并为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准备了条件。



洛阳陇海铁路同人俱乐部旧址

陇海铁路原是清朝末年向比利时、法国借款修建的，一开始路权便落在了两国资本家手中。洋人与官府、军阀相勾结，无情地压榨工人。1921 年春，法国人若里担任陇海铁路总管后，采取种种办法，苛待工人。他到任半年，即开除工人 75 名，克扣 68 人的工资。残酷的欺压激起工人的强烈不满，在工人俱乐部的组织下，工人的反抗情绪日益增长。徐州八号门事件和洛阳西厂挂牌事件，终于引发了陇海铁路工人全线大罢工。

1921 年 11 月 8 日下午，陇海铁路徐州车站修理厂工人下班正要出厂时，工厂的惟一出入口八号门的把门者“奉洋人之命”忽然将门锁闭，长达两个小时，不准工人出入，工人忍无可忍，愤而挤开栅门。“洋

人即串通该厂副厂首高长利，力图破坏该厂所组织的工团”[1]，以“砸门而出”的罪名将工会组织负责人中的柴凤祥、王辅开除。徐州车站工人大为愤慨，暗自商议实行罢工以示反抗，并派人到开封、郑州、洛阳联络，以实现全路罢工。洛阳、开封、徐州等地工人于15日联合呈文给陇海路督办施肇曾，控告若里的罪行，要求予以查办。呈文递上之后，毫无反应。

陇海路洛阳机车修理厂（又称西厂）有工人千余，洋人为西厂工人规定了严格的上下班制度。在工厂门口设有牌箱，上班前吹号三声，其中第二声为到厂门口拿牌进厂，第三声停止拿牌，拿不到牌为赖工，一次要扣一天半工资。11月17日晨，专管工人上下班挂牌的副厂首、比利时人狄孟，在第三声未响之前便锁闭箱牌，不准工人拿牌进厂，工人上前取牌时即动手殴打，并蛮横地宣布开除与其争辩的20余名工人。工人对狄孟的无端挑衅忍无可忍，在俱乐部的领导下，一面印刷传单，并派人东去联络各站工人，商定共同罢工；一面向郑州陇海路局总管理处提出条件，要求撤换狄孟，“并担保以后不准有此举动，限三日内答复，否则将于20日起，全路停驶车辆”[2]。路局并不尊重工人的意见，并出言恫吓。11月20日起，东起徐州，西至洛阳，陇海路机务工人实现全线大罢工。

罢工工人发表了《敬告全国各路同胞同业弟兄们，恳乞救助声援》宣言书，列举了洋总管若里“强横奸险，荼毒苦工”的十大罪状，宣言书庄严宣告：我们陇海铁路工人“不能忍作亡国奴之耻，作无人格之工人”，“本路全体工人等决定准于11月20日全路工人停工”，请“各路同胞、同业弟兄们体恤苦况，怜悯援助”[3]。

罢工实现后，全路工人推选11名代表赴郑州，向路局提出包括政治、经济方面的15条要求。

---

① 《徐州府陇海车站八号门事件》，载北京《劳动周刊》第14号，1921。

② 上海《申报》，1921年11月29日。

③ 北京《晨报》，1921年11月25日。

陇海路局对工人的要求不予理睬。郑州车站还计划借用京汉铁路工人到陇海路开车。京汉路郑州机车厂的工人正在酝酿支援陇海路工人罢工，岂会受资本家利用。路局这才感到问题严重。河南督军、省长也致电交通部，怕事态闹大，促其派员早日解决。交通部令陇海路督办施肇曾赴郑州、洛阳查办。

陇海路罢工实现后，立即引起了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注意。中共北方区委在李大钊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如下决定：

1. 以书记部名义派人前往洛阳与陇海铁路罢工指挥机关联络，对罢工给予全力帮助，并发挥领导作用；

2. 书记部准备力量在时机许可时派一个组前往协助工作；

3. 通知各工会公开捐款援助陇海路罢工，并通电各公众团体支援①。北方分部遂派罗章龙到河南了解情况，予以帮助。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武汉党组织分别派李震瀛、包惠僧等到洛阳、开封，调查研究，指导罢工。李震瀛同罢工工人一道研究斗争策略，并被工人推举为代表同路局谈判。在党的组织下，各地工人对罢工工人予以声援。京汉、津浦路工联合会公议资助罢工工人粮食；京汉路长辛店工会致书陇海路工人，鼓励他们坚持到底，并许以经费上及实力上之援助；京汉铁路郑州站工人发表宣言，称赞陇海路工人罢工"是争我人格，光我国体的，凡我同胞谁不佩服他们呢"，宣言表示"到必要时给他们以相当的援助"②。京奉铁路唐山机务处、杭州劳工等纷纷致电陇海路工会，支援罢工斗争。

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指导和各地工人的声援，更加坚定了罢工工人的信心，他们于一星期后发表了第二次罢工宣言，郑重声明：路局不撤换若里，不答应工人的条件，"誓不上工。此心坚决，有若金石"！路局见工人团结一致，又得到各地大力援助，被迫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条件，26日在双方议定的条款上签字，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

---

① 引自《中共河南党史》（上卷），第2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② 开封《新中州报》，1921年11月27日。



这次罢工的胜利，是与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的。罢工结束后，路局工人在给北方分部工人周刊社的信中说："同人饮水思源，知道此次罢工所以致胜，是由于各地的联络；但是联络的指导，则赖贵社的功劳"，并期望对他们今后的斗争"时常指导"①。这次罢工是中国北方最早的一次铁路工人罢工，说明河南工人阶级的新觉醒并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这次罢工是中国北部"一种惊人的创举"，其影响普遍深入全国工人群众，对第一次全国罢工高潮的到来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在全国工人运动中基础较好，到 1922 年度，全路已有 16 个站正式成立工会，其中河南境内占一半（彰德、新乡、黄河北岸、郑州、许昌、郾城、驻马店、信阳）。不满百人的小站都分别加入了附近大站的工会。通过斗争工人普遍感到需要建立全路工人的统一组织。1922 年，分别在长辛店和郑州召开了两次全路代表大会，成立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1923 年 1 月 5 日，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在郑州召开第三次代表会议，草拟了总工会章程，并决定 2 月 1 日在郑州正式举行京汉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

京汉路局局长赵继贤接到筹委会的呈文后，表面上表示支持，并给予一些优待；暗中却给洛阳吴佩孚拍去密电，要求制止会议的召开。

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吴佩孚抛出了"保护劳工"等四大政治主张，并企图利用共产党铲除交通系的势力，为此一度对劳工表示支持。长辛店工人大罢工后，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每年损失七八十万元，此事使吴佩孚大为恼火。京汉路是南北交通要道，郑州又是联络北京、保定、洛阳、武汉的交通枢纽，对吴佩孚有着极重要的战略意义，京汉路的收入是他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他不能容忍京汉路工人发动政治运动。吴接到赵继贤密电后，当即令驻郑州第十四师师长兼郑州警备司令靳云鹗，对京汉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预为防范，设法制止"②。

---

① 北京《工人周刊》第 21 号，1921。

② 上海《新闻报》，1923 年 2 月 9 日。

1月28日，郑州警察局局长黄殿辰来到总工会筹备处，声称奉吴佩孚命令，禁止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否则必以武力对待”。工人受此意外压迫，异常气愤，当即表示：此次开会，“曾报告路局，路局曾给免票并许挂专车”①。决计不顾军阀干涉，大会仍按原计划进行。30日，忽然接到吴佩孚电报，召工人代表到洛阳商议，筹备会遂派李震瀛、史文彬等5人赴洛阳与吴交涉。因吴并无诚意，商谈毫无结果。

此时共产党人张国焘、陈潭秋、项英、包惠僧、林育南、许白昊、史文彬、李震瀛等都到了郑州，参与大会的领导。赴洛代表们回到郑州向前来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报告了同吴佩孚交涉的经过，一时群情激愤，一致表示同军阀进行斗争，按时召开大会。

2月1日清晨，郑州全城紧急戒严。市内到处“军警林立，荷枪实弹，沿街排列，商店闭门，行人断绝，几若大敌即在目前”②。代表(65人)和来宾(130余人)不为军阀的淫威所屈，齐集五洲大旅馆，整队出发。以军乐队为前导，随着多人抬一上书“劳工神圣”的金面木质匾额，工人抬着各地赠送的贺匾、贺联，代表手持红旗，向会场进发。郑州铁路工人千余人由会所出发迎接。在离普乐园不远处，遭到军警包围，举枪威吓，阻止前进。双方相持约两小时，军警夺去匾额，抛落在地。工人怒极，遂奋不顾身，拼死冲破包围线，蜂拥而至会场。首由主席宣布组织宗旨，及此次被强权无理压迫的经过，末谓现已拼命达到开会目的，乃我劳动阶级在军阀政治下的一大胜利；遂群呼：“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③此时千余名军警已将会场“层层包围，连放枪数声示威。会场上演说如故，全体拍掌欢呼，声震耳鼓”④。黄殿辰赶到会场，声称奉吴佩孚命令不准开会，限令大会于5

① 中华全国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等：《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115页，工人出版社，19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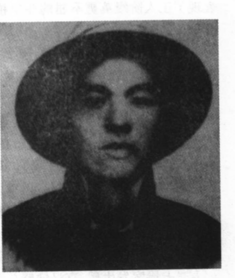
② 北京《晨报》，1923年2月11日；广州《工人之路》，第224期，1926年2月。

③ 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3年2月22日。

④ 上海《商报》，1923年2月9日。

分钟内自行解散，如有反抗者以军法处置。工人们愤怒地斥责道："我们今天拼着枪炮打死，总是要开成立会的。"下午4时宣布散会，代表们结队冲出会场。

当天下午，军警又包围了代表及来宾所住的旅馆，监视代表们的行动，不许他们自由走动和交谈，总工会在万年春酒馆所定的饭菜，亦不准出售。总工会会所被重兵占领，一切什物尽被捣毁，会所亦被封闭。代表及来宾完全失去了自由。当天晚上，总工会召开秘密会议，鉴于郑州处于军阀高压之下，决定将总工会移往汉口江岸办公，4日午时宣布全路总同盟罢工。全路一切进止，于罢工期内，全视总工会命令而定。会议决定成立罢工委员会，统一指导罢工行动，全路罢工委员会由杨德甫为委员长，郑州罢工负责人为高斌、姜海士等。为了保证代表们的安全，决定各地代表尽快离开郑州。


京汉铁路总工会郑州分会委员长高斌

各站分会按照总工会的决议，做好了罢工前的一切准备。按照总工会规定的时间，郑州从2月4日上午9时起，江岸从10时起，长辛店从11时起，先后宣布罢工。正午12时，全路所有客、货车一律停运，京汉路变成了一条僵死的长蛇。总工会发表了罢工宣言，宣言首先揭露了军阀对总工会成立大会的镇压罪行，接着宣布："从本月4日正午起，京汉路全体一律罢工，不达下列条件，决不上工！"

同日，郑州分工会亦发表罢工宣言，宣布罢工期间一切由总工会指挥，"我们只是安安静静的听候

我们总会解决”①。

大罢工实现后，吴佩孚、曹锟等密电频繁，策划镇压罢工运动。2月5日，京汉铁路管理局发布布告，限令工人“于十二小时内，立即照旧上工，恢复交通”②。吴佩孚电告靳云鹗，令其在郑州相机办理，务期早日开车。如工人们不听，即以武力强迫开车。6日，靳云鹗逮捕了郑州分会负责人高斌、姜海士、刘文松、王宗培、钱仁（能）贵5人，威胁利诱不成，继以严刑拷打，逼迫他们命令工人复工。高斌等人一致表示：没有总工会的命令，决不复工！靳云鹗恼羞成怒，立饬军警将高斌等5人锁住，拘于车站票房门外。此时天寒地冻，积雪半尺，高斌等人被剥去上衣，绑在电线杆上，有军警在旁监视，妄图以此强迫高斌、姜海士等人屈服，恫吓周围的工人。但高斌、姜海士等人毫不动摇，并高声责骂，表现了工人阶级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靳云鹗令军兵搜索工人，强迫开车，人皆逃避。

吴佩孚等经过密谋之后，于2月7日向京汉铁路工人开始了血腥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江岸和长辛店最为严重。林祥谦、施洋等数十人惨死在军阀的屠刀下。郑州分会委员长高斌遭酷刑后，不久牺牲。信阳分会委员长胡传道因拒绝下令复工被砍去一臂；郑州工务段领班司文德、钳工汪胜友，在总工会复工后，于1926年被军阀砍杀于长春桥（今郑州二七广场）。郑州万玉林、刘振清，黄河南岸张士汉，淇县赵义培等被关进保定监狱。河南境内300多名工人被开除，工会被封闭，工人经过斗争得到的权利全部被剥夺，在河南从事工运的共产党员李震瀛、赵子健等被迫离去，革命转入低潮。2月9日，京汉铁路总工会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忍痛下令复工。

二七惨案发生后，京汉铁路总工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分别发表宣言、通告，揭露军阀的滔天罪行。中国共产党发表《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号召全国人民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打

---

① 上海《新闻报》，1923年2月9日。

② 北京《益世报》，1923年2月7日。



倒军阀,为自由而奋斗。全国各地工人和各阶层人民,为了援助京汉路工人,迅速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声讨军阀罪行的运动。道清铁路于2月4日举行了同情罢工,直到11日才陆续上工。

京汉铁路大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它在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上,仍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已由经济的总同盟罢工转变到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阶段。它以工人的头颅和鲜血,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使人民更加深刻认识到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军阀是中国各族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要解除人民的痛苦,必须与之斗争到底。京汉铁路大罢工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和威信,罢工斗争的失败,也给党留下了教训和思考。表现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斗争经验的不足,对变化的形势估计不足,对军阀的罪恶阴谋警惕不够。由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单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不行的,必须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组成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来对付强大的敌人。

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后,革命虽转入低潮,但共产党人并没有消沉,一面做罢工后的善后工作,一面从事秘密活动,积蓄力量,迎接新的工运高潮的到来。

三、五卅运动期间的爱国运动及罢工斗争

1925年5月30日,上海学生、市民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枪杀工人顾正红的罪行,举行游行示威,遭到英帝国主义的屠杀,死16人,重伤10余人,这便是举国震惊的五卅惨案。当天深夜,中共中央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号召全上海罢工、罢市、罢课,号召全国人民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五卅运动的狂飙迅速席卷全国。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河南,中原大地上立即再次燃起反帝运动的怒火。6月2日,开封中州大学等校学生提议罢课。20天内,开封先后有数十万人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集会游行示威,罢课、罢工、罢市,进行募捐,抵制英、日货,把全省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推向了高潮。

6月7日,郑州工、学、商、军各界9 000余人举行声讨英、日帝国主义罪行、援助上海工人大会,会议由李立三主持,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

长李震瀛介绍了五卅惨案详情。中共中央特派员、来河南主持全省党的工作的王若飞以全国总工会代表的身份，发表了重要演说。五卅运动的浪潮迅速波及焦作、安阳、汲县、沁阳、修武、洛阳、信阳、西华、许昌、汝南、固始、商城、南阳、桐柏、泌阳、宝丰、洛阳、渑池、陕县、商丘、睢县、杞县、汤阴等40多个县，并深入到偏远农村。运动中成立了援助沪案各界后援会、募捐会，愿每月捐款10万元，沪案“一日得不到正当解决，即一日不止”①。

6月中旬以后，在全省展开了抵制英、日仇货活动。各地商界自觉抵制英、日货，提倡国货。组织检查劣货团，禁止英、日货销售。以英美烟公司生产的哈德门香烟为例，其销售受到严重打击，工人拒绝运输，商家拒绝售卖，各地的广告牌和招牌被毁，仓库被封。在全省城乡的一致抵制下，英烟销售锐减，1924年6月英美烟公司河南区售烟1 922箱，1925年6月份售1 516箱，减少21%，而这1 516箱多是在20日前售出的。7月份“销售大大减少”，英美烟公司河南区经理赖特估计“我们8月份的销售将会更糟，就整个区而言，我们至多只能希望销掉200箱。事实上所有这200箱都将在开州（即濮阳，当时属直隶省——引注者）地区销售，其中相当一部分在直隶省销售”②。从上边所引资料可以看出当年河南抵制英、日货之坚决。

7月起，河南的五卅运动进入新的阶段，工人阶级展开了英勇的罢工斗争，这次罢工开始于英商开办的焦作福公司煤矿。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惨案的消息传到焦作，饱受英国资本家欺凌压榨的焦作人民，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立即投入了五卅运动的洪流中。在共产党员罗思危等领导下，游行、罢课、罢市、抵制英日货的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7月6日，焦作英商家庭雇用的厨师、花工、翻译、女佣等200余人，一律罢工，英人欲以增加三倍工资为诱饵，遭到夫役的拒绝，竟无一

① 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6月29日。

②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4册，第1342页，中华书局，1983。



人留下。8日，福公司焦作煤矿数千工人实现总罢工，焦作煤矿陷于瘫痪。英商多次企图破坏罢工均未得逞，直到1926年2月，福公司总理不得不坐下来同工人谈判，于3月初达成了12项复工条款，首先承认工会的合法地位，其次答应"不得因此次罢工借故开除工人或更换工种"，并答应了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接济因罢工生活困难的工人等条件。坚持240天的焦作煤矿工人大罢工胜利结束。

为声援焦作煤矿工人的罢工斗争，改善经济待遇，焦作中原煤矿公司工人、安阳六河沟煤矿工人都相继开展了罢工斗争，迫使资本家答应了同意工人组建工会、增加工人工资等条件。

1925年8月，郑州豫丰纱厂工人实现大罢工并取得胜利。这些罢工斗争的胜利，说明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已经成熟。

五卅运动中，全省各地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福公司、豫丰纱厂等地工人罢工斗争的展开，要求全省有一个统一的工人组织，联络各地的工人，对罢工斗争互为声援。经张昆弟、李震瀛等筹备，9月18日，河南省总工会在郑州宣告成立。焦作煤矿、豫丰纱厂、华新纱厂等省内30多家较大的工会和京汉铁路总工会及所属江岸、长辛店等分会，陇海铁路总工会及所属分会，道清铁路总工会等代表100余人出席会议，全国铁路总工会王荷波、荥阳农民协会萧人鹄、武汉学生联合会包泽英等到会祝贺。河南省总工会的成立，使各地工运得到相互支援，促进了全省工人阶级的团结，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以新的姿态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四、中共豫陕区委成立，农民运动蓬勃兴起

具有国民革命意识的胡景翼率国民二军入豫后，打破了受吴佩孚统治的弥漫中原的沉闷局面。胡景翼邀请李大钊入豫，就河南及国民二军的一些重要问题交换意见。随后，王若飞、王荷波、杨介人、张昆弟、李震瀛、王克新、戴培元等一批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受党组织的派遣来到河南，一面帮助国民二军创办类似黄埔军校的军官学校，一面积极开展工农运动，组建、发展党的组织。

一大批革命青年在五卅运动中成长起来，党、团组织得到迅速发

展。1925年7月9日，共青团开封、郑州、信阳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马文彦、佘立亚、王克新分别任书记。1925年9月，开封、郑州、信阳分别建立了党、团地方执行委员会，洛阳、卫辉、焦作、安阳都有党、团的基层组织，全省共产党员发展到169人，共青团员达300多人。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当年10月中旬，中共豫陕区执行委员会成立，王若飞任书记，黄平万、李求实、李震瀛、彭泽湘等任委员，豫陕区委领导河南全省及陕西的关中地区（陕北地区于年底划归豫陕区委领导）、江苏的徐州等地党组织，下辖3个地委、7个特支和10多个支部，党员200余人。不久又建立了共青团豫陕区委，李求实任书记。豫陕区委建立后，对各地组织进行了整顿，对党团员进行训练、教育，各地党团组织的工作能力得到提高，队伍迅速壮大，到1926年1月，已建立起郑州、开封、信阳、卫辉、杞县、焦作、西安7个地委和10个特支，党员达700多人。1926年春吴佩孚重占河南后，河南党、团组织遭到严重摧残，国共合作建立的国民党各级党部被取缔，工会、农协被封闭，曾一度支持吴佩孚战败国民二军的红枪会也遭到镇压。

1926年4月，中共豫陕区委进行改组，汪泽楷任书记，组成工运、农运、宣传、青运和国民运动5个委员会，张景曾负责宣传，萧人鹄负责农运。区委按照中央的指示立刻着手恢复党的组织和开展工运、农运。

1925年春，河南革命形势开始好转，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来到中原，为党开展农民运动提供了条件。六七月间，王若飞分别派萧人鹄、戴培元到荥阳，王克新、周兴育到信阳，以两县为试点，开展农运。张海峰等在杞县也开展了农运工作。

8月18日，信阳县柳林镇农民协会成立，嗣后农民看到农会是保护自己的机关，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纷纷加入农会，一个多月会员已扩充至千余人，遂于10月25日成立了柳林农协第一分会。到1926年春吴佩孚重占河南前，省内已建立了荥阳、信阳、杞县、许昌4个县农民协会，以及密县、长葛、睢县、修武、安阳、郑州、汲县、洛阳、郾城、开封等地41个区农民协会，200多个村农民协会，会员达20万人以上。就当时全国农运形势看，河南建立的农协组织和加入农民协会的人数仅次于



广东，占第二位。

然而刚刚兴起的农民运动毕竟经验不足，对遍布河南达数百万之众的枪会运动未能针对其不同性质，采取不同的策略，致使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向农协反扑时，给农民运动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如荥阳县贾峪镇农民协会委员长张虎臣，因组织农民抵制地主豪绅的剥削压迫，让张玉山等劣绅、讼棍游街示众，遭到反动势力的仇视，他们勾结反动红枪会首领王三刚，于 1925 年 10 月 14 日凌晨，将张虎臣一家 11 口全部杀害①。再如国吴之战时，豫省多数枪会受吴佩孚之引诱，处处与国民二军为敌，并导致了二军的失败。吴佩孚重占河南，工农运动急转直下，各地农协被封闭，从事农运的戴培元等被杀害，唐士奎、罗思危等被捕，胡伦等多人被通缉。

国民二军的失败，使党的领导人受到震惊并清醒过来，重新审视河南枪会运动。陈独秀、李大钊、阮啸仙、陈云以及在河南工作的张霁帆等，纷纷撰文论述红枪会，探讨农协与枪会结合的途径。李大钊在著名的《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一文中，在分析了红枪会的起源、派别之后指出：遍布河南的枪会运动，证明中国农民已经觉醒过来，知道靠自己结合的力量来解放自己。李大钊号召“农村中觉悟的青年们，乡下的小学教师们，知识分子们，以及到田间去的农民运动者，你们应该赶快加入红枪会的群众里去”②，对其进行启发、教育，使他们走到农民革命的道路上来。1926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专门作出了《对于红枪会运动议决案》，《议决案》开宗明义指出：“红枪会是军阀政治下的产物，是一般中小农民不堪贪官污吏之搜刮，苛捐杂税之剥削，军阀战争之破坏，土匪溃兵之骚扰，以及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之破产，土豪劣绅之鱼肉，才发生这种农民原始自卫的组织。”这段表述正确地揭示了红枪会的性质，使从事农运的同志对枪会有了正确的认识。关于发展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如何处理同枪会的关系，《议

① 中共河南党史专题资料丛书：《中州春雷》，第 89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② 中共中央书记处：《六大以前》，第 663、666 页，人民出版社，1980。

决案》指出，在枪会势力最发达的河南等省，“须利用红枪会去发展农民协会，待农民协会的发展普遍充实后，当使红枪会成为农民协会之武装力量”①。中央的决议给在河南从事农运工作的同志解除了思想上的疑虑，指明了方向，各地均将农运与枪会运动结合起来进行，虽处于吴佩孚的白色恐怖下，河南农运仍得到迅速恢复，并以更大声势展开。

中共豫陕区委指示从事农运的同志以红枪会为掩护，恢复和发展农民协会。不到1个月的时间，信阳、杞县、许昌、荥阳等10多个原来农运发达的县，农协组织都有不同程度的恢复。此时广州国民政府正计划出师北伐，中共中央决定凡是北伐必经的省份要把开展农民运动作为迎接北伐的政纲。豫陕区委遂于4月1日召集信阳、杞县、许昌三县农协负责人开会，议定由三县农协组织担任筹备建立省农协工作，定于4月18日召开省农协成立大会。

4月18日，河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开封秘密召开。到会的有信阳、杞县、许昌等15县代表53人，国民党开封市党部、河南省总工会代表4人。会议进行了三天，各地代表报告了农协恢复情况，听取了关于农协组织问题、宣传问题及红枪会问题等报告，讨论通过了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组织大纲、农民自卫团组织大纲及省农民协会成立宣言等②。大会选举7人为省农协执行委员，4人为候补委员，萧人鹄任委员长，张海峰任副委员长。大会就今后河南农运的发展作了部署。在困难条件下召开的这次大会，鼓舞了各地农运工作的同志，对全省农运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大会之后，中共豫陕区委通过省农协向原有农运基础的县派出农运特派员，帮助、指导各地恢复、整顿原有的农协，并通过对红枪会的分析，对农民性质的红枪会进行联系以发展农运。到5月底，信阳县原有10区农协已恢复6区，杞县原有12区80余村已恢复7区38村，许昌等地则有发展，开封、郑州、洛阳因反动统治势力强大农协未能恢复，总

---

① 中共中央书记处：《六大以前》，第614、615页，人民出版社，1980。

② 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河南省农民运动报告》，载《中国农民》第8期，1926。



计全省已恢复4个县、32个区、270余个村农民协会,会员人数约27万,大体上达到了国吴之战前的水平。

中共豫陕区委为了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选派吴芝圃、阎曙元、郭绍仪等28名革命青年去广东,参加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河南枪会自受吴佩孚的欺骗、镇压后,对军阀的本质有了更加明白的认识,他们在寻求推翻反动统治的途径。中共中央关于“利用红枪会去发展农民协会”的策略,既使农运形势出现转机,也给枪会群众指明了出路。8月,中共豫陕区委改建为中共豫区、陕区执行委员会。9月18日,中共豫区区委适时召集信阳、郾城、许昌、长葛、杞县、睢县、洛阳、虞城等地农协、枪会代表开会,选举产生了河南全省农民自卫团总部,通过了总部章程及共同政纲,会后各地都建立了联络处。河南枪会运动在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开始走向联合。

1926年7月起,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在湖南、湖北战场上重创吴佩孚军,10月10日占领武昌,革命势力发展到了长江流域。吴佩孚率残部仓皇逃回河南。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后,宣布参加国民革命,接着进军陕甘,逼向河南。此后北方的奉系军阀以大军压境,欲图染指中原。吴佩孚处此四面楚歌之境,其部下急剧分化。“十四省联帅”内外交困,对各地枪会无暇顾及,河南农运得以迅猛发展。

1926年秋,中共中央派26名干部来豫,加强河南农运工作,在广州农讲所学习的吴芝圃等河南籍学员也陆续返回家乡,共同投身到农运当中。此时农运主要是枪会运动,枪会运动又是在“反奉、反吴、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反抗苛捐杂税”等口号下,同枪会首领联络,将枪会改组为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因此呈现出一派轰轰烈烈、迅猛发展的势头。豫东杞县、睢县一带,经张海峰、吴芝圃等联络,大部分枪会能够听从指挥。豫南确山,共产党员张家铎、张耀昶及马尚德(即杨靖宇)等争取到枪会首领张广汉、张立山、徐耀才等的支持,在枪会基础上成立了县农民协会,马尚德任委员长,枪会基本上控制了全县的局势。在豫中,共产党员李杜已将许昌司堂、长村的枪会联络到一

起。在豫西，陈勉之、郭安宇等通过对枪会首领的联络，加强了联合趋势。党为了加强对豫西农民武装的领导，建立了由王克新任书记的豫西军事委员会。在豫西南，曹家政、张克达等经过一段工作，使枪会实现了大联合。

在豫北，除了红枪会、白枪会等多种枪会外，影响最大的枪会组织是几同红枪会声势相埒的天门会。天门会是林县东油村农民郭官林、韩欲明（根仔）于1923年所发起，在"人了天门会，一辈子不受罪"口号的诱惑下，附近农民纷纷入会。到1927年春，其势力已达豫、直、晋三省边境地区的林县、辉县、安阳、浚县、汤阴、淇县等23个县，会众达30多万人[①]。

天门会同松散的红枪会不同，有着严密的组织，各分坛一切行动均受命于总坛。天门会有着极强的战斗精神，多次发生会众拒交钱粮捐税、抗兵抗匪事件。共产党多次派人与天门会联系参加国民革命。1926年冬，共产党员杨介人以国民政府特派员的身份来到林县东油村，联络天门会，并参与指挥了天门会同奉军战斗。1927年2月，党组织又派郑刚、郭祥明等多人到天门会总坛。韩欲明对共产党人已产生信任，郑刚等均参与指挥了天门会同奉军的作战[②]。

总之，这一时期河南农民运动有了很大发展，农协会员已达百万，直接参加国民革命的武装农民约25万。河南农民正以高昂斗志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① 林县志编纂委员会：《林县志》，第8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② 中共林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中共林县党史稿》，第1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第四节 北洋军阀统治的终结

一、吴佩孚败退后的危局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直指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下的湖南、湖北,短短3个月内,就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击败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吴佩孚,10月10日占领武昌,接着挥师北进,直扣河南的南大门,吴佩孚率残部仓皇逃回河南。

吴佩孚败回河南后,表面上看还有十几万人马,但为革命军的声势所慑,已丧失了斗志,加之河南农民运动及枪会运动的高涨,到处发生抗捐风潮,军民冲突不断,使这些饷械奇缺的部队更显军心不稳;因为权势、利益冲突,吴军内部不同派系暗潮滋生,各自为政,几同水火,河南进入了民国以来最为混乱的时期。

1926年9月,冯玉祥五原誓师后,集中国民军旧部,出兵陕甘。11月29日,击败刘镇华镇嵩军,解了西安之围,接着占领潼关,直指豫西。吴佩孚感到事态严重,于12月下旬召集靳云鹗、寇英杰以下师长以上将领在郑州开军事会议,提出首先要反攻潼关。尽管吴佩孚声泪俱下,可是部下众将却像木偶一样相对无言。吴部署讨冯军事,升任田维勤为讨贼联军副司令兼援陕军总司令,指挥本部及王为蔚、王维城师进攻潼关;由靳云鹗指挥所部防务豫南。靳却将上吴的一封密函在报纸上公布出来,函中揭露了饥军不能应战的种种内幕。吴佩孚认为靳这样做"足懈军心,无裨事实"[①],遂于28日下令解除靳的讨贼联军副司令兼前敌总指挥各职,前敌军务交由田维勤、魏益三承商寇英杰办理,改派王维城为援陕总司令。寇、田等奉命监视靳部。

靳云鹗再次被免职后,即通电下野,30日由明港上鸡公山"休养"去了。但是靳被免职,加剧了吴军内部的分化。任应岐、魏益三等加快

---

① 长沙《大公报》,1927年1月9日。

了同南方政府接触的步伐，分别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第三十军军长。驻临颍之第十四师第二十七旅旅长刘培绪（靳云鹗系统），则拆毁铁路，发出讨吴通电，将吴军内部矛盾彻底公开。吴佩孚闻变后，令寇英杰、田维勤等率部兜剿。双方在许昌、临颍、西平、驻马店等地多次激战。18日晚，高汝桐、任应岐、魏益三等部联合向郾城寇英杰部发起攻击。田维勤因实力单薄，不敢同靳、魏等军冲突，遂离开寇英杰率部南下，寇部益形孤立。寇英杰虽是联军副司令，但实力不大，靳被免职后他不但指挥不了靳部，反受靳部攻击，时时感到对自己将有不利之事发生，因而于2月间以送母去天津为借口，离豫赴津，投靠了张作霖，张作霖遂委他一个安国军第十一军团长的空衔，希望他能回豫拉拢吴部。吴佩孚两员大将一叛一走，真可谓众叛亲离，他再也无力指挥其部下“援陕”或“反攻”武汉了。

二、奉军入豫

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12月广州国民政府即迁都于此。此时东路北伐军在江西、福建、浙江战场上基本上消灭了孙传芳的部队。盘踞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见吴、孙两大军阀相继失败，北方再无人能同他分庭抗礼，自是感到欣慰；但他又对南方革命势力的发展深感担忧，遂决定以“援吴”为名派兵南下，先从吴佩孚手中夺过直、豫两省地盘，然后再挥兵过江，把奉系势力向南扩展。当他将“援助”计划通知吴佩孚时，吴佩孚深知这套明援暗抢的把戏，对此婉言谢绝。张作霖怕激出事变，只好采取渐进策略，支持直鲁军张宗昌强行进兵保定、大名。

12月1日，张作霖受孙传芳、张宗昌等推戴，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见吴已失去对部下的控制，遂不顾吴佩孚的反对，决定分两路进兵河南：褚玉璞率直鲁联军由陇海路进攻开封；张学良、韩麟春为“援鄂军”总、副司令，于珍为前敌总指挥，率数万奉军由京汉路南下进攻郑州。

1927年2月8日，张作霖发出数封电报，通告进兵河南。10日，奉军两旅突然开到安阳，吴佩孚之副司令齐燮元的卫队被缴械；当天奉军



进至卫辉、新乡，王为蔚一部亦被缴械。同日夜里，吴佩孚在郑州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奉军入豫之对策。寇英杰部将领陈德麟等，均积极主张联络奉军，对靳云鹗、魏益三彻底解决；而吴之嫡系王为蔚、王维城等持不同意见，迎奉、反奉两派无法妥协，会议无结果而散。靳云鹗忽派高汝桐到郑州，劝吴抵抗奉军。吴佩孚也觉得张作霖欺人太甚，对靳云鹗之议也就默认。

魏益三等因历史原因不愿同奉军合作，田维勤等自知实力有限不敢公开同靳作对，2 月 15 日，靳云鹗、魏益三、田维勤等部联合组成河南保卫军，公推靳云鹗为总司令。19 日，靳云鹗领衔，田维勤、魏益三等 26 人联名通电声讨张作霖。

奉、鲁军并不因吴、靳的反对而中止进兵。12 日晨，鲁军徐源泉、孙殿英两师联合向兰封前进，13 日逼近开封。驻守开封之米振标部毅军与奉、鲁军合作。沿京汉路南下之奉军已占领豫北全境，陈兵黄河北岸。

奉军入豫，引起吴军急剧分化。寇英杰、赵倜（张作霖任命其为河南宣抚使）潜回开封，联络其旧部将领贾万兴等联合奉、鲁军。那些风吹两面倒的军阀纷纷投向奉军。2 月 15 日张作霖任河南军务帮办米振标为奉军第十八军军长，任豫东镇守使兼河南陆军第一师师长郭振才为奉军暂编第一师师长。嗣后于学忠、张治公、田维勤等均投降了奉军。

2 月 24 日，靳云鹗率部北上。26 日，吴佩孚、靳云鹗等在郑州召开军事会议，议定抵抗奉军入豫的军事部署。3 月 1 日，靳云鹗以吴佩孚的名义改编原吴军各部为 16 个军，分派了作战任务。靳云鹗抗奉之战正式展开。

奉军因无法通过黄河铁桥，遂改由长垣、东明渡河，并于中牟、尉氏一线展开。3 月 7 日起，双方在韩庄、中牟间交火，12 日晚奉军占领中牟，接着越过白沙，威胁郑州。靳军以马吉弟、刘培绪等部出尉氏朱仙镇，突然猛攻开封。毅军张继武部前线倒戈，开封奉军因兵力单薄，于 3 月 16 日退到城外，米振标将毅军交给张继武，解职下野。赵倜亦仓

皇渡河，逃至新乡。

靳军于东线夺回开封，西线却丢掉了郑州。奉军于黄河北岸集中炮火向扼守邙山头的王维城部猛轰。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工兵将铁桥修复，第十七军先头部队于3月14日上午强行通过黄河铁桥，双方在桥头展开激烈争夺。靳军不支，全线后撤。奉军第十军4个旅渡过黄河逼近郑州。16日晚，吴佩孚由郑州退至孝义兵工厂，靳云鹗亦于17日早退出郑州。靳军退出郑州后，才得到开封传来的捷报，遂在新郑集中兵力，准备反攻。20日，靳云鹗在郾城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5万兵力反攻郑州。当晚靳军5个师迫近郑州，韩麟春飞调后方4个旅增援。双方激战30个小时，炮火连天，城郊居民生命财产遭受惨重损失。24日，靳军再度反攻郑州，所部健将高汝桐，身先士卒，猛攻至豫丰纱厂外，被奉军炮弹击中其所乘之铁甲车，车毁人亡。高汝桐战死，使靳军士气受挫，再次由郑州撤退。反攻郑州的失败，直接影响到开封，26日早马吉弟自动率部撤出省城。米振标再次出面维持秩序，并电奉军速来。27日奉军一旅到汴，旋即于珍、赵恩臻（奉军第十一军军长）来到开封。

奉军占领郑、汴后，分三路南下，3月31日占领豫中要地许昌。4月3日起，靳云鹗组织各部接连发起了三次反攻，其激烈程度为奉、靳开战以来所未有。奉军曾一度退至和尚桥。15日奉军三路出击，靳部各军全线崩溃。16日奉军占领临颍。接着占领鄢陵、西平、遂平、上蔡，前锋直逼驻马店。

靳云鹗部久战疲敝，许昌之役后，能战之将或阵亡或被擒，再也无力阻止奉军的攻势，靳云鹗抗奉失败。其南阻北伐军、北抗奉军，称雄中原的计划亦随之破灭，只好电请武汉政府出师北伐。

三、北伐战争的凯歌

（一）武汉北伐军入豫

正当张作霖的奉军占领大半个河南，决计进攻武汉，妄图消灭革命势力的时候，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于4月12日叛变革命，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并勾结四川的杨森等反动军

阀,对武汉政府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与包围,武汉政府需要作出新的决策。在讨论到具体行动方向时,产生了两种不同意见,一是东征讨蒋,而后北伐灭奉;二是先行北伐对付张作霖,然后再东征讨蒋。经反复磋商,意见渐趋一致。4月16日,经国共两党联席谈话会商议,武汉政府乃决定北伐。以唐生智为北伐军总指挥,率领第四军张发奎、第十一军陈铭枢、第三十五军何健、第三十六军刘兴、独立第十五师贺龙,及原河南反奉各部,沿京汉线北上迎战奉军,以期与冯玉祥第二集团军会师中原。4月19日,武汉政府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在武汉南湖举行。21日起,北伐大军源源开入河南。

北伐军入豫,总指挥部设于驻马店。5月上旬,各军渐次完成了战略集结任务。其作战部署为:以第四军、第十一军、独立第十五师为右路军,沿上蔡、商水、通许向开封攻击;以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第三十军(军长魏益三)为中路军,沿京汉路的焦庄、西平、郾城、临颍、许昌,向郑州攻击;以原靳云鹗抗奉各部组成左路军,配合中路军由路西北上,向荥阳进军。

时占领陕甘、出师豫西的国民联军冯玉祥部,已于4月底被武汉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任命冯玉祥为总司令。受冯玉祥压迫散处豫西的镇嵩军刘镇华及一些小军阀姜明玉、李万如等,见风转舵,加入第二集团军。5月1日,冯玉祥在西安宣誓就职后,将部队进行改组,以石敬亭为总参谋长,刘伯坚为政治部长。该集团军拟定分兵五路进军河南。

(二)西平、上蔡、临颍战役

5月13日,北伐军总指挥部下达总攻击令,河南大战全面展开。这场战争经历了西平、上蔡、临颍三个战役。

奉军一面陈重兵于西平、上蔡一线,一面勾结豫南反动枪会和土匪,在柳林一带破坏铁路,抢掠北伐军给养,以图阻滞北伐军进展。北伐军迅速平定叛乱,主力集结于前线。5月14日上午9时,北伐军前锋进至焦庄附近,与奉军铁甲车、骑兵相遇。奉军以猛烈炮火伴以骑兵冲锋。北伐军一边正面阻击,一边绕敌侧背,前后夹击,奉军骑兵被歼

过半。15 日上午，双方为争夺西平车站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下午 3 时北伐军攻占了西平车站。奉军退入城内，闭城固守。

16 日，奉军增援部队分向北伐军两翼来犯，城内以猛烈炮火配合，北伐军三面受敌，“各连之死伤，有达四分之三以上者”①。阵地情形，危急万分，第三十六军预备队及时增援，勇猛冲锋，终将敌军击退，保持了原有阵地。17 日凌晨，奉军在西平前线增兵 3 个步兵团，狂风骤雨般向北伐军阵地扑来。北伐军坚守阵地，遏止了奉军的攻势，下午 3 时，左右两翼同时发起攻击，全军将士一鼓作气，连夺奉军阵地。薄暮，奉军全线动摇，继而崩溃，自相践踏，弃戈北逃。北伐军奋起直追，攻克西平。

5 月 13 日，北伐军右路军奉命分左右两翼向上蔡方向前进。14 日下午 2 时，第四军骑兵团在蔡埠口东北与敌第十二旅富双英部遭遇，团长崔华率部直扑过去。敌措手不及，抢占高地，顽强抵抗。北伐军后续部队接连投入战斗，激战数小时，敌渐不支，撤退至上蔡城，当晚北伐军即追至城下。张学良、韩麟春为解上蔡之围，急调第四十六、第六旅分别向东、西洪桥扑来。北伐军以 3 个团监视上蔡城，以 7 个团分置于东、西洪桥。上蔡之敌希图乘机突围，各处战斗均十分激烈，尤其西洪桥方面，枪炮声几似鞭炮店失火，万炮齐燃。由于北伐军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模范作用，指挥员的坚毅沉着，鏖战达旦，东、西洪桥仍为北伐军控制。17 日，北伐军总预备队投入战斗，全线转守为攻，经数次冲锋，奉军不支，败退商水。被困在上蔡城内的富双英旅逃路断绝，被迫乞降。上蔡战役与西平战役同日发起，同日结束。

北伐军中、右两路于西平、上蔡破敌后，乘胜锐进。右路军克商水，破周口，收邓城，直抵沙河南岸，与奉军隔河对阵。奉军因连战败北士气低落，张学良、韩麟春为挽回颓势，即收缩阵线，将其主力布防于临颍、郾城、逍遥镇一带。23 日，临颍战役的前哨战逍遥镇战斗首先打响。

---

① 曾广兴、王全营：《北伐战争在河南》，第 174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逍遥镇在京汉路以东，西华、周口以西的沙河北岸，为郾城、临颍的东部屏藩，奉军驻此4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23日贺龙率领北伐军独立第十五师自逍遥镇东约30公里处邓城渡过沙河，24日上午9时在葫芦湾与敌相遇。奉军防御工事面对着沙河南岸，不意北伐军飞蹑其后，虽疯狂反扑终难挽败局，纷纷向逍遥镇败逃。北伐军第十二师等部亦渡过沙河，两师同时进击，对逍遥镇形成包围。双方激战约2小时，奉军阵势已乱，伤亡惨重，丧失再战能力，奉军旅长刘震东怕蹈富双英覆辙，率残部向临颍溃退，上午6时北伐军占领逍遥镇。26日攻克郾城。

北伐军于逍遥镇、郾城破敌后，各部均奉命向临颍攻击前进，迅速完成了对临颍的包围。张学良、韩麟春急忙将郑州、开封等地奉军主力大部调到临颍一线，计有第十、第十七、第八军及田维勤残部，配有野炮、山炮、坦克、飞机，合计不下十余万众，欲图孤注一掷。

27日傍晚，北伐军第十二师进至临颍东十里头，遭敌阻击，相持竟夜，未能突破敌阵。一纵命令第二十六师于28日凌晨加入十里头战斗，并令第七十七团蒋先云（共产党员）部开赴辛庄抄敌左翼。该团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全团将士上下一心，自出师以来，冲锋陷阵，无不视死如归。蒋团所经之地，奉军炮火异常猛烈，全团官兵伤亡过半。蒋先云两次受伤两次奋起，“仍率队冲锋，再中腹部”[①]，壮烈牺牲。时各处战场战斗均十分激烈。北伐军伤亡过重，全线几呈危局。28日下午，第十师先头部队急速增援进至瓦店，加上二纵队已破敌小商桥防线，大军骤至，北伐军遂转守为攻。奉军阵线崩溃，一窝蜂似的向北败退。北伐军乘胜猛追，29日克许昌，30日占领新郑。右路军直趋开封。奉军在败逃途中，遭到各地农民的奋起截击，敌惊慌失措，不战自乱。韩麟春乘飞机视察前线，见部下均已溃不成军，知事已无可为，即下令总退却。

临颍之战，是广州出师以来最艰苦的战役之一，其“战斗之烈，伤

①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4日。

亡之大"，自北伐以来"实以此役为最"①。而奉军的损失更为惨重，其入豫10万精锐丧失殆尽。

（三）二集团军进入豫西

武汉北伐军与奉军在京汉线上大战的时候，豫西战局也有了很大进展，冯玉祥部出潼关，战灵宝、夺洛宁、下渑池、取新安，于磁涧大破奉军，攻占洛阳，接着破黑石关，收巩县，出汜水，进迫郑州。此时，北伐军一纵队已逼近开封。奉张见势已败，遂令各残部星夜北撤。6月1日，武汉北伐军与冯玉祥第二集团军会师郑、汴，第二次北伐战争在河南胜利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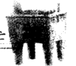
北伐军第七十七团团长蒋先云

蛰居巩县的吴佩孚因其部下早已星散，只好带着娄云鹤卫队旅，随同其参谋长张其锽等高级幕僚，于13日匆匆离开巩县，经登封、临汝、宝丰、鲁山、南召到南阳，准备带于学忠部入川。冯玉祥部已分路追近南阳，6月下旬，吴佩孚离开南阳入川。部众分别被武汉国民军、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奉军等收编，直系彻底灭亡。

（四）河南人民对北伐战争的贡献

1927年年初，在中国共产党正确路线指引下，河南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利用红枪会发展的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纷纷成立。2月奉军南下，各地枪会不断组织抗奉，阻其进军。为了进一步动员河南人民开展反对奉系军阀和直系残余势力的斗争，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央农民部、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和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河南省农民协会于3月中旬在武昌联合召开了河南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杞县、信阳等地45个县的武装农民代表69人出席会议，其中有中共党员饶成名、张奇峰、杨介人、萧人鹄、吴芝圃、孔寅初等。会议期间，毛泽

① 张发奎：《第四军纪实》第4章，第二期北伐，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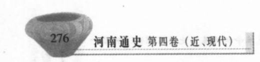


东两次莅会并讲了话，全国总工会代表李立三向会议作了中国职工运动报告，刘少奇代表全国总工会和湖北总工会向大会祝词，号召工人、农民联合起来，打倒共同的敌人厂主和地主。会议通过了《河南全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宣言》、《反对奉鲁军阀议决案》、《发展河南农民协会组织议决案》等。大会选举产生了河南省农民自卫军临时执行委员会，萧人鹄为委员长。这次会议推动了河南武装农民在反奉旗帜下的大联合，为日后配合北伐军入豫作战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针对河南反奉各军就地筹饷不断同农民发生冲突一事，根据河南武装农民代表大会的要求，武汉国民政府组织了"国民政府慰劳河南军民代表团"，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于树德为主席。武汉政府誓师北伐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成立了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组织了以胡伦（中共豫区军事委员会书记）为队长的政治工作队。他们深入到农村，协调枪会和北伐军的关系，动员群众支援北伐战争。

4月初，驻守在确山、信阳、罗山一带的魏益三、庞炳勋等部因为就地筹饷，同农民的关系势若水火。确山数万武装农民和枪会在共产党员张家锋、张耀昶，共青团员马尚德（即杨靖宇）等领导下，围攻县城，用土炮轰塌了城东南角炮楼，城内守军魏益三部千余人乘夜冒雨遁逃，农民军占领县城。在确山农民暴动的同时，信阳、汝南、上蔡等县农民自卫军和枪会亦揭竿而起，与军阀部队周旋并攻占县城，北洋政府的县政权土崩瓦解，县知事或被农民活捉，或乘乱微服潜逃。由于当时魏益三等已与武汉政府接洽并就任国民革命军军职，于树德等到信阳、确山后，对军民双方都做了工作，提高了农民对北伐战争的认识，缓和了同靳、魏等部的关系。在慰问河南军民代表团、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及政治工作队的帮助、指导下，信阳、确山等县均成立了临时治安委员会，接收了县政府。汉口《民国日报》发表文章热情洋溢地赞道："农工组织政府，确山首先实现，在革命史上是很光荣的一件事，在农工运动上也很有价值的呵！"①

①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30日。



武汉国民革命军入豫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河南人民全力支援北伐战争，概括起来有下述几个方面：一是抵抗奉军南下，组织农民暴动扰乱奉军后方，为北伐胜利进军廓清道路。二是为鼓舞北伐军士气，欢迎其入豫，欢送上前线，庆祝前方的胜利，搞军民联欢等。三是给火线送饭送茶水；革命军路过村庄时，农民多备有茶水、稀饭；革命军作战时，农民不避炮火送饭送水到前线。四是慰劳士兵，救护伤员。五是帮助北伐军运输物资、弹药，保证后勤供应。六是侦察敌情，充当向导。七是组织铁道大队，支援北伐军作战。八是维护后方治安，支援前线的战争。


北伐战争中的工农运输队

北伐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巩固和发展了第一次北伐所取得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武汉政府面临的政治、军事压力，消灭了直系残余，打击了奉系的嚣张气焰，并为彻底消灭北洋军阀奠定了基础。第二，宣告了北洋军阀统治河南的结束。此后国民党政权的建立，展现出新的局面。第三，初步结束了河南地方军阀割据一方，为抢夺地盘而互相混战、重重盘剥的局面，对于社会的稳定有着积



极的意义，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匪患。第四，促进了河南农民运动的发展，同时又培养了一批优秀革命骨干，从而为土地革命战争的开展准备了条件。

四、第一次国共合作及大革命的失败

民国元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1913 年河南国民党人发动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遭到河南都督张镇芳的残酷镇压并被取缔，国民党组织在河南迅速瓦解。1914 年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虽有豫籍志士凌钺等参加并成立了河南支部，但该组织在河南没有发展。1919 年 10 月，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1924 年 2 月下旬，改组后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河南省国民党代表赵峻、宋聘三、刘积学等参加了会议。2 月，国民党中央通过《各省党务进行计划案》，赵峻等返豫后亦积极发展组织，只是当时河南正处于吴佩孚的严密统治之下，国民党的活动受到限制，因而党员人数发展缓慢。

1924 年年底，国民二军进入河南，胡景翼任河南督办。胡是老同盟会员，倾向国民革命，工农运动可以公开活动，不仅王若飞、李震瀛等一批共产党员入豫从事革命，一批国民党要人如于右任、张继、李烈钧、柏文蔚、张群等也先后应邀到开封，帮助胡景翼、岳维峻参赞军政要务，郭仲隗、刘积学、刘蓬山等知名的河南籍老同盟会会员也应邀出任省军政职务。政治形势的转变给国民党的活动提供了机遇，组织得到发展，1924 年年底，国民党河南省临时党务处成立。1925 年 1 月省内第一个国民党区分部建立。在河南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冯品毅、马文彦、江梦霞等均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帮助发展国民党员，组建了国民党开封市党部，冯品毅、江梦霞等任执行委员。

1925 年 5 月 27 日至 6 月 2 日，中国国民党河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开封召开，来自 10 余个县的 43 名代表出席会议，柏文蔚、李烈钧作为国民党中央特派员出席会议。苏联顾问柯里莫夫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的代表中右派人数占多数，他们在唤起民众、扶助农工等重大原则问题上违背了会议的宗旨，选举中排斥左派，共产党员唐际盛联合新蔡县代表任芝铭愤然退席。会议选举产生了执行委员会，刘积学、宋垣

忠、郑震宇等7人为委员。国民党县市级党部大多是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组织起来的，如信阳党部由共产党员刘少猷负责筹备并任执行委员；安阳县党部由共产党员杨介人、罗任一等筹备建立，杨任工人部部长；郑州党部是由共产党员唐际盛、张霁帆、黄平万等筹建并领导。这些党部都成了领导当地革命运动的中心。

五卅惨案发生后，开封、郑州、安阳、信阳、焦作、汲县、洛阳等地国民党党部同工、商、学各界一道，召开国民大会，声讨帝国主义暴行，发表通电，声援上海同胞。五卅运动后期，焦作福公司煤矿、郑州豫丰纱厂等工人举行了大罢工，开封、郑州等市党部发表宣言，痛斥资本家的行径，支持工人斗争。通过这些活动，国民党在河南各地有很大发展，党员人数由1924年年底的百余人，发展到1925年年底的3 600余人，并建立了19个县市级党部。许多共产党员都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从事工农运动，从而推动了运动的发展。

1925年11月，国民党中央委员邹鲁、谢持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会全”，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议案，会后进行了一系列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活动。由于这次会议在西山召开，所以人们把这批国民党右派称为“西山会议派”。12月后，河南国民党内出现了西山会议派分子，他们公开开除了河南部分共产党人的国民党籍，擅自下令改组或停止部分县市党部的活动。西山会议派的行径遭到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坚决反对，1926年1月，郑州、信阳、杞县、焦作等县市党部代表召集会议，决定成立党务维持会以主持全省党务，并要求国民党中央取消西山会议派分子把持的省党部。25日，国民党中央决定停止河南省执委的职权，2月8日又决定派员查办。西山会议派分子并未停止活动，他们又组成临时省党部。此时河南政局已再度发生变化，吴佩孚战败国民二军重占河南，河南工农运动转入低潮，国民党的活动也受到限制，党员人数锐减。3月底到4月上旬，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召开所谓“二大”，李敬斋等10人作为河南代表出席，刘积学、李敬斋分别当选为中执委、中监委委员。这次会议再次遭到国民党中央的反对。4月6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派冯品



毅、刘我青、杜潜等为国民党河南省党部筹备员，指挥全省党务。

1926年8月2日，中国国民党河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开封召开，由于当时处于吴佩孚统治之下，且不少地方国民党组织遭到破坏，因而会议既不能公开进行也不能规模过大，仅有8个县的10名代表出席。会议通过了12个议案，选举产生了国民党省党部执委、监委。共产党员嵇文甫、冯品毅、高擎宇等12人，被选为执、监委员和候补执、监委员，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新的领导机构中占了优势。此次会议使河南国民党在形式上得到了统一。

1927年5月，武汉政府出师北伐后，国民党中执委决定派王法勤、于树德、邓演达以中执委名义指导河南党务，并决定省党部暂停活动。郑、汴会师后，武汉国民政府内部危机日益表面化，汪精卫等为了寻求冯玉祥的帮助，反蒋反共，偕同谭延闿、徐谦、顾孟余、孙科等于6月8日到郑州，并派人西行迎冯玉祥。9日，冯玉祥偕同于右任、鹿钟麟等到郑。10日、11日，武汉方面同冯玉祥举行会议，史称郑州会议。

汪精卫等在郑州会议上一面赞扬冯玉祥和国民军的革命历史，一面谴责蒋介石独裁专横，目无国民政府；同时又攻击共产党借口国共合作，搞阶级斗争，弄得人心惶惶，这是破坏国民革命，应予严厉制止。何健更诬蔑湖南农民运动是一团糟。因为冯玉祥对蒋介石并无反感，因而对反蒋问题极为冷淡，当邓演达问他对反蒋的态度时，冯说："我只知打仗，不管其他"[1]，并力劝武汉政府以继续北伐为重，停止宁、汉之争。汪精卫等人窥察到冯的意向后，不得不暂时把拉冯反蒋的打算收起来。汪精卫等人为了急于回两湖镇压工农运动，唐生智率革命军全部回师武汉，将北伐军血战得来的河南拱手让于冯玉祥，由冯玉祥等人组成河南省政府。设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封分会，以冯玉祥为主席，指导豫、陕、甘等省党务。6月12日，开封政治分会成立，冯玉祥、于右任等11人为委员，冯玉祥为主席。14日，开封政治分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取消国民党河南特派员，成立国民党河南省党部筹备委员

---

① 曾广兴、王全营：《北伐战争在河南》，第46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会，指定徐谦、顾孟余等为正式委员，徐谦为主席。

郑州会议之后，蒋介石得知了冯玉祥的思想动向及其他有关情况后，便利用“继续北伐”来迎合冯的心理，邀请他到徐州会谈。6月19日，冯玉祥到徐州。蒋介石亲自带人远迎于黄口车站，相见之下对冯备极推崇，并立即馈赠50万元硬币犒军，使冯一见面对蒋便产生好感。20日、21日两次会谈中，双方进一步就“分共”与宁汉合作等问题进行会商，并对继续北伐、武汉政府问题、对于共产党之办法等作出决议，蒋介石让南京国民政府将冯部改称为西北国民革命军。

6月21日，冯玉祥致电汪精卫、谭延闿等，告知已将他们在郑州会议时攻击两湖工农运动的话全部转述给蒋介石等宁方要人，蒋等无不“一致欢迎”。他认为：宁汉“现在双方处境之苦，业已完全了解……既异地而同心，应通力而合作”，他敦促汪精卫等“速决大计，早日实行”[①]。在冯玉祥催促下，7月2日汪精卫开始在武汉解散共产党机关。

郑州会议后，冯玉祥即命令该集团军政治部：所有政治工作人员必须绝对服从命令，在“革命”辖区内不准秘密开会，反“三民主义”宣传者按反革命论处。7月7日，冯玉祥公开宣布与中国共产党决裂。8日下令“清党”，将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200多人和地方党员干部调到郑州，对他们说：“你们到我这里帮了忙，你们要反蒋，我是不能干的……你们要反蒋，愿意到哪里就去哪里吧！”[②]给这200多人送了路费，用一个闷子车皮拉到武胜关，“礼送出境”。

国民党河南省筹委也开始“清党”，共产党人张景曾、王克新、萧人鹄、范易、江梦霞、杨介人等被通缉。各地“清党”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各地工会、农协甚至红枪会等民众团体被解散，许多共产党员被通缉，数百人被捕入狱，各地共产党组织遭到破坏。

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执会通过《取消共产党案》，发动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国共两党合作

---

① 曾广兴、王全营：《北伐战争在河南》，第417、41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② 曾广兴、王全营：《北伐战争在河南》，第46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第五节 在困境中演变的社会经济

一、农村和农业

(一)人口、土地和地权分配

民国初年,据官方估报,河南全省有人口3 000万左右。南京国民政府取代北洋军阀统治后,内政部陆续公布的户口数字,所列河南1928—1929年人口总数3 056万人,据同一时期基督教会的调查(也只能是估算),河南全省人口为3 254万人,较前一数字多出200万人。在无法找到其他较有根据的数字的情况下,我们只好采用3 200多万人的数字。按农业人口占这个内陆省份总人口的95%计算,全省农业人口当在3 040万上下。

同样,全省耕地面积从清末至民国前期,官方也都留有一系列统计数字,但与实际情况也大相径庭。如北京政府农商部估测20世纪20年代初河南全省农田总面积为2 666万公顷,稍前财政部估测且多达4 788万公顷[①],较之晚清时期的667万公顷上下增加了3—6倍。另据被认为比较可靠的河南省政府估算的全省土地面积,为760万公顷,此前十来年当也不相上下。按此估算,民国前期河南人均耕地面积当有3.5亩左右。这760万公顷左右的土地分属于不同阶级——地主、富农、中农和贫雇农。其中地主阶级占地最多,如1922年河南省长李济臣所概括的:"各县巨绅,无一非有数十顷之地亩。"[②]但是,由于官府征收的赋税及各种各样的附加在这一时期急剧迭增的、数倍甚至十数倍于晚清时期的土地负担,像赵倜这类军阀官僚所差"买田使者"强"买"的土地,一般多为地主富农的肥地,加上快速、普遍发展起来的杆伙也

---

① 凌道扬:《中国农业之经济观》,第7页;天津《大公报》,1916年10月4日。

② 天津《大公报》,1922年4月7日;

以这些“老财”为“劫富”的主要对象，在这样的形势下，不少无权势可凭的普通地主就不能不日趋衰落。加上传统的多代同居的家族制度日趋崩溃，诸子均分田产的制度进一步发挥其分解地主地产的作用，原先较大的地主几经分家析产，就会转换成多家中小地主甚至自耕农民（中小地主几经析产后，更多地转为农民）。这些因素交互影响，遂使民国前期众多的普通地主走向没落，给不断变动的自耕农民队伍补充许多新成员。因此，就全省而言，“除了几个军阀的家乡，土地是没有大量的集中，地主以 500 亩以下者最为普遍”；除“三数县有大地主”外，大多数县份占最大多数的农户都是占地一两公顷到五六公顷的“小自耕农”，“全然是一种小农生产的社会”①。

综合起来考虑，全省掌握在地主阶级手里的土地，估计不会超过 40%。惟其如此，稍后（20 世纪 30 年代中），有学者在调查了河南农村经济后，便作出这样的结论，“小农土地所有制”乃是这个北方省份农村的“主要成分”②。

（二）租佃、雇佣和高利贷

掌握在地主、富农手里的土地大部分出租给农民耕种，小部分雇工（长工、季工、月工、日工）自营。据粗略统计，1917 年、1920 年，全省租种的土地，分别占总面积的 29.7% 和 32.7%，其中水田出租者较旱地为多③。

地租的榨取方式与晚清时期大体相同，分为定额租制和分成租制两大类。定额租制绝大多数是实物地租——谷租，缴小麦（单季）或兼交小麦、秋粮（双季），俗称“课种”、“课地”等；少数为货币地租——钱租，交纳额定数量的现金，或将实物折算成现金，俗称“钱课”、“银课”等。其中部分地区、部分土地还有收取预租者，有交全额的，有交半数的，以后每年佃农均须于种麦前先按成交租，俗称“支租”、“顶课”，等

① 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5，第 458 页，1984。
② 张锡昌：《河南农村经济调查》，《中国农村》，第 1 卷第 2 期，1934. 11。
③ 史建云：《近代华北平原自耕农初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1)。



等。20世纪20年代中的报道说"河南凡城镇附近之园地，均预收钱租，每亩自3元到12元"[1]。即便不邻近城镇的一般肥地，如安阳的许多水田，亦须在每年农历腊八前预交次年地租。另外，还有部分土地除每年索取定额租外，佃农在承佃之时须向业主交付一定数量的现金，欠租时即以此抵扣额租，俗称"顶首"、"借头"、"礼钱"、"押租"，等等。这在豫南稻作区和豫西南农民争佃较为激烈地区较为盛行。分成租制，则视田主、佃农所分别负担的耕畜、农具、种子、肥料、人工多少，而有对半分成、四六分成、三七分成（均为田主得大头）之分，俗称"分种"、"停种"、"平种"、"代种"、"大种"或"借地"，等等。这是一种较为原始的租佃形式，在河南却仍然十分盛行。这是河南农业经济相对滞后的一种反映。

占总面积2/3左右的"自种"土地，包括农民和富农以及经营地主所有的土地。后两者所有的土地（大约占其中30%上下），主要靠雇佣长、短工耕种，还有相当一部分则以"帮工分益制"进行经营。较大地主的雇工有"大把"、"领庄稼"、"二把"、"三把"、"小把"之分，干活支领工钱。全省长工年平均工钱在20世纪10年代末，男的最高为24.5元，最低只有9.25元；女的最高为15元，最低的只5.5元[2]。20年代，亦大体与此相当。一般地说，在经济作物区（如许昌烟区），对农活在技术上要求较高，长工工钱也相对多些，一年有二三十元，其他县份，一年多不过10多元或不足10元，该工在主家全年的饭食消耗相当（约750斤）。也就是说，只能供应自家一个壮劳力，同全国长工平均工钱比较，河南长工工钱低1/3左右[3]。

以"帮工分益制"为田主耕作的农民则按成分取当年所耕田地上的收获，多则20%，少则10%或不到10%。如遇歉年，所得很少，甚至

---

①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10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② 《中国劳动年鉴》第一回，第一编，第33页。

③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28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可能颗粒皆无。他们与前一种支取工钱的长工一样，每天还都要用其有限的空隙（包括晚上）为田主家干各种杂活和巡夜，近似田主的“家丁”。

广大农民还要蒙受苛刻的高利贷盘剥。与前代有所不同的是：高利贷花样更加繁多，有“日期”、“月期”、“年期”、“（100）天期”、“集市账”等10余种，信用借贷已相当罕见，保证借贷也渐减，抵押借贷（须有田产等作抵押）则日益流行；债息更重，剥削率日高，而且无本借贷（贫农、佃农交不出预租或押金，或因受灾歉收等原因欠租，地主富人就将缺交或短交之数转为高利贷）日见其增。在民国初年，每月取息2—3分者还不乏其例，到后来，在通常的借贷特别是农民最多采择的小额、短期借贷中，月利在3分左右者就十分罕见。如在许昌，晚清时农村借贷利率最高不过3分，进入民国后，“普通放债，类皆5分”①。这种陈旧的、残酷的盘剥方式给农民生计以至整个农业经济带来的祸害是十分深广的，诚如马克思指出的：“高利贷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像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高利贷吮吸着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②

（三）农业经济的演变

民国前期河南农产品的商品化又有新的进展。尤为突出的是棉花生产。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市场对中国棉花需求量迅速增大，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的外国洋行（尤其是日本洋行）不断派人入豫大量购运棉花；中国国内陆续增扩的棉纺织工厂（包括河南的“广益”、“成兴”、“豫丰”等纱厂），此时也继续扩展，来豫采棉的人络绎不绝。随着市场需求量的增加，河南各级市场的棉花价格也不断攀升，农民种植一亩棉花较之种植一亩的粮食，收益高出七八倍。加上交通运输条件的改进，更给河南棉花的外运外销提供了空前的便利条件。北京政府和

① 《许昌县志》卷十六，《民生状况》，民国12年宝兰斋石印本。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74—675页，人民出版社，1974。



河南省当局适应这种经济和社会的新需求，陆续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包括采购美国棉种，分送河南等省，并派农商部佥事钱瑞生等来河南安阳等地，推广优质高产的美棉种植。河南省实业厅也步此后尘，1919 年除从农商部领来 750 公斤美国棉种分发省境 83 县培种外，并从该年开始，“每年春季不取种价，散发（美）棉种，农民请领者为数甚巨。其成绩之优，以河洛道为最，如孟津、渑池、陕县、阌乡等县，所有棉田概行改种，本地土棉几无形消灭”[①]。1923 年，河南省实业厅调查全省已报县份有 98 县都种植有较多的棉花，只有陈留、鄢陵、密县、南召四县无之。

据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调查估算，河南各年度棉花种植面积（千亩）和总产量（千担）如下[②]：

年份	总面积	总产量
1918—1919		268
1919—1920	1 418	428
1921—1922	856	219
1922—1923	3 047	555
1923—1924	2 653	668
1924—1925	2 677	572
1925—1926	2 986	545
1926—1927	2 881	557

20 世纪 20 年代前较之 10 年代增长数倍，在全国各省中，无论面积和产量，均居第五位。棉花商品化的程度也日益提高，省实业厅在所调查的 98 个产棉县中，有 37 个县棉花自给有余并有输出，销往外县、外省的合计近 2 500 万公斤，占 1923 年 98 县棉花总产量的 60% 强，其中一部分经汉口、天津、镇江等地销往国外。不少城镇都出现了专事棉花贸易的花行，尤其是处于铁路交叉点的郑州，更成为华北著名的棉花市场，1923 年、1924 年，交易量分别高达 30 万包、50 万包（每包 90 公斤或 110 公斤）。留供本省纱厂和棉纺织工场、作坊以及由豫东直运

① 河南省实业厅：《河南全省棉业调查报告书》，第 1 页，河南官印刷局，1925。

② 见实业部中国年鉴编委会：民国 23 年《中国经济年鉴》，商务印书馆，1934。

皖北或由襄河直运湖北的棉花更多。

棉花之外，其他经济作物无论种植面积和年产量也有新的增长，其大体态势可于下表见之[①]：

年份	大豆		花生		芝麻		烤烟产量（千磅）
	面积（千亩）	产量（千担）	面积（千亩）	产量（千担）	面积（千亩）	产量（千担）	
1914	5 950	6 156	270	255			
1915	5 952	6 185	364	356			
1916	38 650（?）	5 333	1 390	1 357			极少
1917							2 500
1918	77 176（?）	110 465（?）	7 923（?）	6 875（?）	2 845	3 112	2 500
1919							10 000
1920							16 000
1921							9 000
1922							6 500
1923							11 000
1924							32 000
1925							11 000
1926							4 500
1924—1929平均	13 233	17 595	2 119	5 192			
1927							5 000

大豆以豫南和豫中出产最多，其他地区也无不种植，每年均大量外销。花生以豫东为集中产区，豫北沙区也续有扩展，陈留、通许一带，据云40%—50%的土地均种植此种作物，产品40%—80%都输出外省。芝麻的集中产区主要在豫南、豫东，每年均有不少外销。烟叶则以许昌、襄城、禹县、安阳、博爱、邓县、上蔡、临汝、宝丰、郏县、长葛等县出产最多，使河南逐渐成为全国主要的烟叶产区之一。

① 大豆、花生、芝麻，据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第1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烤烟据陈翰笙：《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系美国农业部农业经济局编列的数字）。

其他一些商品性的农、副业产品因市场扩大，也有较大的发展。如柞蚕丝，鲁山、南召、方城等地都续有增产，舞阳、商城、伊阳、临汝、汝南、确山、林县、辉县、嵩县等地，也随之推广放养山蚕，缫丝出售。全省蚕丝产量在1925年达到596万公斤，较之民国初增长十倍①。次年，产蚕茧10万担，在全国各省中居第八位。兴盛于清末的草帽辫，在南乐、清丰、荥阳、鹿邑等10多个县份，均有新的增长。南乐一县，在1924年每月平均产值在1万元左右，荥阳、荥泽两处年产近万公斤，鹿邑年产三四万公斤，大都"输出国外"②。

就是出产最多的粮食，也日益商品化。信阳一带的大米，安阳、商丘一带的小麦，开封一带的高粱，每年都有大宗输出。全省每个城镇，粮行不仅遍设不缺(一城多的达几十家)，而且资本也较雄厚。所收小麦和其他粮食汇集于铁路沿线城镇，以故"沿途车站恒见麻袋堆积，大抵预备装载火车以运输他方者"，光许昌一带，每年外运大小麦近千吨，高粱400多吨③。

但是，民国前期的河南毕竟处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和封建生产关系的严重束缚下，因此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河南农村和农业依然呈现一片苍凉的衰退图景。

由于军阀政府不管至关重要的水利，包括黄、淮两河在内的治河机构和治河经费，水利机构和水利经费长期有名无实，各地除内乡、卢氏等县一些人迹罕至的山区及大别山区还留有树木外，"余皆牛山濯濯"④，生态环境愈益恶化，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愈加恶劣。每年因水、旱而减收的土地"至少亦占其半"⑤。灾情较重的年份，如1920年十余月无透雨，全省赤地千里，辉县一带，即青草亦不能多见。次年又连绵

① 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华民国统计提要》，第511页，商务印书馆，1936。

② 刘景向:《河南新志》上册，第197页，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整理重排本，1988。

③ 刘景向:《河南新志》上册，第180、181页，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整理重排本，1988。

④ 白眉初:《河南省志》卷七，第3、4页(抄本)。

⑤ 《河南建设月刊》，创刊号《丛录》，第2页。

大雨，尤其是豫东，“各属平地，水深数丈，舟楫四达，浩如湖海……除高地秋粮尚可收十分之一外，余皆颗粒毫无”①，灾区广达70多个县。接下来的1922年，除豫北雨水较多外，90余县旱情严重，“大都十室九空，或哀鸿遍野，或竟渺无人烟”②，其给农业经济带来的破坏是十分深广的。

连年的破坏和灾荒，使许多乡村出现了“农夫缺少”③现象，牲口普遍严重不足。报刊记者在安阳见“沿途农工，用牲口的很少，大半是老幼妇女，耕种几亩田”，“访问原因，老人说是壮丁逃走太多，实在是无人、无力、无钱耕种”④。据本省官方人士综述，20世纪20年代沿黄各县一般亩产小麦30多公斤，谷子45公斤上下，高粱30多公斤⑤，按两年三熟计算，年平均单产不过50多公斤。以这样的水平与清乾隆初豫北的年均单产75公斤左右比较，可以说是有退无进。由此可见民国前期，从总体上看全省农业趋向衰颓。

二、资本主义工矿业

民国前期河南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业有较大的发展——尽管体貌羸弱，步履蹒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首当其冲的是沿海沿江省区，深处北方内陆的河南所受的压力相对小一些，因此引起图谋发展的南方一些民族工商业家的注意。上海工商界人士就不止一次地来豫考察，了解投资环境，发现这个北方大省经济作物和煤产量丰富，取给方便，即使像郑州这样条件优越、潜力很大的城市，原料价、工价和地价都很低，加上广泛存在的农民家庭手织业对粗纱的需求量很大，交通运输也很便捷。凡此种种，都激发外省投资者来豫兴办企业。同样，在河南省内，不少积有资财的官僚、商人也看到国内、国际市场扩大和商

① 天津《大公报》，1922年3月23日。
② 天津《大公报》，1923年1月20日。
③ 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下），第689页，黎明书局，1935。
④ 北平《晨报》，1920年9月30日。
⑤ 曹瑞芝：《河南省水利规划初步计划书》，民国刊本，第19页。



品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顺应近代化的历史潮流，投资厂矿，从而使得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业在欧战结束后的八九年间又有较大的发展。

（一）工业

就工业来说，最有建树的还是棉纺织业。

上海资本家穆藕初筹资 200 万元，1919 年在郑州兴办豫丰纱厂，有纱锭 3 万枚，以留美学生顾维精为总工程师（后为厂长）。1920 年开工投产，主要生产适合河南人民生活需要的 12 支、16 支、20 支粗纱，日产 20 余包。开办数月，“盈利已属不赀”①，遂陆续增资至 300 万元、420 万元，纱锭亦增加至 5.6 万枚，布机 234 台，线机 5 600 台，均进口于美国。规模宏大，超过早先被称为“河南第一实业”的安阳广益纱厂，成为省内首屈一指的近代工厂，在全国同行中也名列前茅。

依附北洋军阀的天津资本家周学熙等，1920 年在河南卫辉（汲县）创办华新纺织厂。该厂有资本 210 万元，大部出自徐世昌（曾任大总统）、龚心湛（曾任内阁总理）、陈光远（曾任江西督军）等，并有官股 30 万元。机器设备也大都购自美国，于 1922 年建成投产，有纱锭 2.5 万枚，织布机 100 台（部分脚踏机），是省内仅次于“豫丰”的纺织企业。产品颇有竞争力，不久就与“豫丰”一道将沪、汉棉纱挤出河南市场，并沿着京汉铁路，销售直隶（河北）部分地区。

本省资产者开办的，主要是武陟的成兴纱厂。厂主鲁连城筹资 10 万元，由上海购来旧纱锭 4 000 枚，1919 年开办，专门生产豫北农家需用的粗纱。鲁自任厂长，妻、子分任庶务和工务，招族人为工人。规模较小，经营灵活，有花则开工，无花即停工。1919—1928 年，盈利 10 余万元。

至于清末即已开办的河南首家近代棉纺厂——广益纱厂，因经营不善、资金不继和负债较多，复又遭受火灾，进入民国后即每况愈下，所发 200 万元股票跌至票面额的 1%。1917—1918 年虽稍有起色，但终因积重难返，无甚生气。

① 天津《大公报》，1920 年 10 月 24 日。

就全省来说，据统计，1918 年共有纱锭 3. 2 万枚，占全国纱锭总数的 2. 76%；1924 年增至 8. 5 万多枚，占全国纱锭总数的 3. 19%；1927 年，再增至 11 万多枚，占全国纱锭总数的 3%[①]。这期间，棉纺织业是全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中发展最快的部门，河南大体上还能赶上全国同业的脚步。

次于棉纺织的加工业是面粉业。在 1919—1927 年兴建的较大面粉厂，首推 1919 年创办于新乡的通丰面粉厂，资本 50 万元，1920 年投产后，增资至 100 万元，系皖籍沪商孙多森、河南官商袁绍明和日本商人合办，使用美造磨粉机、加拿大造蒸汽机、锅炉和其他机器，日产面粉 5 000多袋，是当时河南面粉业之翘楚。还有安阳大和恒面粉厂，原系直隶资本家齐竺山等创办，不久停产，1919 年复由北京资本家韩华卿等重新开办，陆续增资至 40 万元。在省会开封 1914 年创办的永丰面粉厂、1918 年创办的天丰面粉厂也有所扩大，日产分别至 500 袋、2000 袋。1924 年，"永丰"改组为"益丰"，增资至 10 万—15 万元，日产提高至 900 袋。1925 年，又有马宣臣等筹资 5 万元（后增至 15 万元），新办德丰面粉厂。其外，在郑州、许昌和博爱等地，也出现一些较小的面粉公司、面粉厂。

规模不大但为数最多的乃是蛋品加工业，成为那几年省内投资的一个热点，在诸多城镇创办起一批大小不等的蛋厂，同一城市有同时设厂六七个者。大部分蛋厂一遇农忙和冬季因工人（多女工）多回家务农而停工，采用机器焙制者不多（1919 年确知采用机器者不过开封 2 家，郑州、漯河、许昌各 1 家），但总算极一时之盛，成为河南蛋品加工业最为兴旺的时期。

其他诸如火柴、制皂、水电、制革、机械修理等业，也都兴办了多则五六所，少则一两所的工厂。

据有关资料综合估算，1912—1918 年的 7 年间，共开设工厂 29

① 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第 15 页，商务印书馆，1934；《中国经济年鉴》K，第 189 页，商务印书馆，1934。



个，剔除不生产商品的孝义兵工厂，资本总额为220万元左右，年平均31.4万元左右，每厂平均不过9万余元；1919—1927年的9年中，开设工厂62个，剔除赊旗、汲县两兵工厂，资本总额1 055万元上下，年平均120万元左右，每厂平均17万元左右。前后比较，可以看出在后一时期各类工厂投资总额增长了3.8倍，每厂平均资本额（涉及规模、设备）也增长了89%，表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有了长足进展。

（二）矿业

矿业，主要是煤矿，也有新的发展。

1919—1927年，出现了一股新的开矿热潮。民国《禹县志》记述称，"自昔业此（煤）业者，率贫贱无赖，近则富贵学人亦涎其利，虽重折阅而不恤也"①，就是这种前所罕见的新态势的反映。早先的老矿，此时也多有进一步的发展。规模最大的福中公司在1915年年产量近65万吨，以后增加了设备，扩大了生产，到1924年增加到162万多吨，其中产出于中原公司者近95万吨，比1915年两公司的总产量还多出50%。全公司年获利七八十万元，股东红利分配达20%。原先陷于困境的六河沟煤矿，此时也有起色，1919年，从比利时财团手中夺回矿权，并扩大矿区至9平方公里，增加生产，"年有盈余"②。1920年，观台和台子寨两处矿工达到了3万人。到1925年，资本增加至300万元，年产煤炭由1918年的13万多吨增至1924年的近60万吨。可惜的是，随后三年，因受严重战乱的影响，两矿运销困难，又呈衰降之势，1927年年产量不足15万吨。至于新开煤矿，在这几年间也屡见不鲜，主要有安阳的益安煤矿（资本10万元）和大昌煤矿（资本5万元），汤阴的固成煤矿（资本9万元），陕县的民生煤矿（资本100万元），禹县的济众煤矿（资本100万元），等等，均于1920—1926年间先后开办，各有锅炉、高车三五部或水泵、绞车若干，其年产量大都在10万吨以上。

同工厂比较，1919—1927年间河南新开的近代新式矿业企业为数

① 《禹县志》卷七，第24页，民国26年刊本。

② 胡荣诠：《中国煤矿》，第329页，商务印书馆，1935。

有限。之所以如此，一是由于开办近代机器矿业需要至少几十万元的投资，不像诸多加工工业那样筹资一两万元即可开张；二是由于近代矿业技术设备要求较高，深处内陆的河南购用和掌握更加不易，尤其是煤矿以外的其他各矿（铁、银、金等），创办更加费力；三是由于许多产煤县份土煤窑星罗棋布，一般地说其吨成本明显低于近代煤矿，致使后者在本地市场竞争上反处劣势，投资的利润率反不如管理简单的土煤窑；四是由于存在着英国福公司这样的“霸主”，力量有限的民族煤矿无论在开采上、运销上都很难与之竞争。

综合起来看，1919—1927年间，河南新开的民族资本主义厂矿总共不少于70家，资本总额在1 300万元左右。这些厂矿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其涌现和发展，表明民国前期河南社会经济进一步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化。

（三）手工业

在上述资本主义厂矿陆续开办的同时，历史悠久的河南手工加工业和采矿（煤）业在1919—1927年间也有新的发展，并呈现出资本主义化的态势，构成本阶段河南社会经济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化的又一侧面，也是民国时期河南资本主义新经济的另一来源。

长久以来，河南手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又因为煤储甚丰，开采较易，手工采矿业也比较发达。但进入近代，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各种“洋货”（包括本国的机制品）的灌输和社会习尚的改变，传统的旧式手工业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依循“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规律而呈现出不同的走向，其中有一部分诸如土纱布、蓝靛、红花等就不可避免地趋向衰落甚至消亡。但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与国内、国际市场联系的增强，一些手工业部门适时进行调整，增加了适应市场需要（包括外贸）的内涵，而逐渐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些仿效“洋货”的加工业或供应出口的新行业。总态势是长久作为农家副业存在的、自给性的家庭手工业日渐萎缩，作为主业（专业）从事的商品性手工业则逐渐发展，无论农民和手工业者都更多地卷入市场。这是近代河南社会经济趋向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化的又一种征象。



就后一类——专业性的、商品性的手工业生产而言，较为普遍的就是"所谓洋布"或改良土布的兴起，同时兴起的还有手工针织业（洋袜、毛巾等）。因为几十年来虽有越来越多的洋布输入河南，但直到20世纪一二十年代，购用这种细薄棉织品者还只是部分城镇居民，城乡大多数劳动者即或舍弃了传统土布，亦喜用洋纱（粗纱）作经线、仍用土纱作纬线织成的改良土布，或纯用粗洋纱织成的仿制洋布（其中颇多贩自河北高阳、山东潍县）。因此类棉布售价不高却厚实耐穿，对机制洋布有很大的抵制力和竞争力。因此，各种名号的所谓"织布厂"（工场、作坊）就应运而生。这些织布厂一般资本均只数千元，织工一二十人，其中除沿用少量旧式投梭机用土纱织布外，大都购用木制手拉机或铁轮机，用安阳、汲县、郑州等地纱厂生产的粗纱织造棉布，有些还兼备手摇机造袜子、毛巾等之类。另有一些工场，则专织袜子。开封一城到1927年，此类袜厂发展至8家，年产袜2.5万打。

这些新兴的棉业加工工场或作坊，尽管还没有使用蒸汽或电力而全靠人工劳作，但从生产技术上说，仍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与传统的投梭机不同，使用新的拉梭木机的织工，只须一手拉梭，另一手打纬，工效即可提高一倍，织出的改良土布幅宽至1.8尺，与机织洋布近似。铁轮机更进一步，织工用两脚踩动，速度又比拉梭机提高两倍，布幅亦加宽至2.2尺，与洋布相同。这种铁轮机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工具机，它将开口、投梭、打纬、卷布、送经等工序连接成一个整体，已进入了机器生产的范畴。各地平民工厂和民营织布厂采用手拉机、铁轮机和洋纱织布，意味着历史悠久的河南棉纺织业已部分地从传统的经济结构中分离出来，走上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初始阶段。从事于此的织工最终从类似副业的家庭手工纺织业中分离出来，成为棉织工场或作坊的专业工人，而且大都为男性，如果环境适宜，由此可以从小到大，进一步发展成近代棉纺织厂。

丝织业虽有变化，但深广度都不大。在盛产柞蚕丝和柞丝绸的豫西南，因蚕种不良、丝质不佳，加上偷工减料和捐税繁重，特别是日本、印度等国丝织品和欧美人造丝织品的竞争，较之清朝光绪末年日见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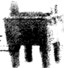
色。各地均由零散的家庭手工作坊织造，所用的仍是旧式木质织绸机。南阳丝商虽“亦有联合大资本家改良机械之动机”①，但心志不齐，国内又无类似织绸手拉木机和铁轮机可以购用，所以迄未成为现实，以致国内、国际市场多被他国丝（包括人造丝）所侵夺，“绸商相率歇业”②。在中心产区之一的鲁山，1912—1922年，丝绸收入较之晚清年间缩小40%，1922—1929年，又缩小70%—80%，织机由光绪末年的3万架减至数百架③。倒是后起的许昌，因有京汉铁路带来的运输便利，吸引鲁山、镇平等地的丝绸商来此经营。他们仿效棉织业发纱收布的办法，向织户（须有商铺作担保）发放原料和织机，交织户“包织”成鲁山绸后，再由这些丝绸商回收，运销省外和国外。此类织户，业已具有资本主义家庭劳动性质——“厂外工人”，因而可以将这种经营形式视为手工织绸业中资本主义形式的一个初级阶段。

卷烟业、制蛋业、造胰（皂）业等有新的发展。许多商人集资开办手工卷烟工场或作坊，以其低廉的价格与机制卷烟争夺市场。如许昌商人王节亭就看出了英美烟公司所出卷烟价高的弱点，在1923年首办王记烟厂，因价格低廉，很受民众的欢迎。到1927年该地手工卷烟厂发展到360家。类似的手工卷烟厂在其他一些城镇也涌现颇多。郑州虽非烤烟产地，1927年手工烟厂总数也达80家。安阳县境，几乎各集均开设有此种烟厂，总数不下百余家。邻近许昌的十数县，也各有烟厂数十家。可见这一新兴行业发展之快。这中间固然不少是家庭作坊，但发展态势比较强劲。许昌随之出现了多家机器卷烟厂，并出现了更多的“商人雇主”——商人向烟工供应烟丝、用纸，规定卷烟样式、牌号、质量、生产数量、交货日期，在回收成品时支付烟工工资，就昭示出其资本主义化的前景。

在本阶段，人力采掘的土煤窑也历有增加，但因其产品只满足近地

---

① 天津《大公报》，1919年8月30日。
② 天津《大公报》，1919年9月27日。
③ 姚光虞：《县政视察记》，民国刊本，第26页。



民众生活的有限需要,加上科技水平很低,风险很大,"十家兴窑九家赔,一家不赔发大财"的俗语,就道出了此中的艰辛。所以,与上述诸种手工加工业不同,除少数资本较多、经营有方,确已多少采用机器、用"新法"生产者外,其余绝大多数基本上是传统体制、技术的延续。本阶段建成者有二三十家,以1923年在渑池开办的民生煤矿规模最大,资本100万元。从各矿的组建方式看,大体上有如下三种:(1)矿商出资,以支付工资的方式雇工开采;(2)矿主不付工资,采用奴隶式的劳动开采;(3)矿主出矿场,农民协采,以人力作股,采煤售卖,"一日之钱,一日分之"。第一种占绝大多数,第二种只残存在巩县、宝丰等少数地区,第三种规模很小,近似农家副业。三种土煤窑共同的难处是僻处山区,交通运输条件很差,所出煤炭难以远销;共同的好处是吨煤成本很低,在近地市场很有竞争力;共同的特点是设备、技术很差,包括组织管理在内,基本上都沿袭清朝以来的传统。

全省煤矿,从总体上说,"由民国4年至民国10年(1915—1921年)始渐发展,由民国10年至民国14年(1921—1925年),已有兴旺可观;但自民国15年以后,迄于民国20年(1926—1931年)初,屡因战事影响,省内各煤矿事业咸遭巨创",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有所恢复[①]。本阶段煤矿呈现"兴旺",这是与整个社会经济近代化同步的。

无论是新式厂矿、手工加工业和采矿业,此时还都处于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因而也伴随着各种形式的掠夺,充满血腥味,尤其在河南这样的北方内陆省份,经营者更多地凭恃封建特权,或兼营封建剥削。拿民国前期河南近代煤矿的硕果——中原公司来说,主办人胡汝麟、王敬芳就是勾结省、县地方当局,倚仗权势,将原先土法开采的中州公司、豫泰公司和明德合并(共作股100万元,胡、王"盗去"62万元),加入洛潼铁路拨还之年盐斤加价款100万元,"挪作私人资本",以及徒有其名的胡、王"商股"100万元,以此办法吞噬三公司组建而成的。为了自己的私利,他们又与英国福公司串通一气,在合组而成的福中公司中,

① 王景尊:《河南矿业报告》,第79—80页,开封新时代印刷局,1934。

甘愿牺牲民族权益和豫北土煤窑工人福利，“不惟不能挽回丧失利权于万一，反变本加厉，较前更烈，名为争权以攘外，实则结外以自私，改订原有之合同，而取消其对国家之报效，混乱红、黄之界域，而多划与5英方里之矿区，并展限60年为70年”①，垄断了怀庆各县矿权，禁绝他人染指。临汝豪绅阎日礼办惠民煤矿，附近各村谁家树木成长，可以用作坑木，阎家即用刀砍上记号，树木的主家就必须自动砍下送往矿上，拉点煤算作代价。阎还用私制的“转窑票”发工资，工人持票只能在阎所开的食堂、商店、赌场上使用，在矿区以外，等于废纸。至于使用“死驳子”采煤的矿井，矿主对工人的盘剥和压迫更到了惨无人道的地步。为了扩大资本，不少矿主还用传统的高利贷或开典当铺等办法聚敛金钱；或则兼并土地，向农民榨取地租。这种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虽然渗透着劳动者的血泪，但却是历史的必然。由此，河南的民族资本主义新经济在民国前期有了较大、较快的发展。

三、商业、金融和交通运输业

（一）商业

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河南商业也逐步摆脱中世纪状态，以较大的步伐走上近代化的道路。

与传统商业不同，本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些商人和商业资本是与外国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外国资本主义工业和商业资本的附庸和补充而活动和成长的，具有不同程度的依赖性、买办性；在经营方式上也仿照资本主义方式扩大业务和积累资本。就这些商人和商业资本的源起而言，大体上可归纳为以下两种：

一种是由旧式商人演变而来——由经营“土货”进而经营“洋货”，由国内营销转向出口营销。偃师商人梁鸿涛，早先经营“碎货”“套筒帽”之类，发家后开设百货店，从上海进货，批零兼售，发展成为名闻远近的“梁财神”。许昌商人白锡和，“往来平津，曾与德商接洽，收买内

①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192页，三联书店，1961。



地头发,转而售于德商,渐致销路扩大,屯积丰盈"[①]。类似转销洋货或经营出口商货的商人,在棉花、油料作物、烟草、丝绸、草帽辫的集散地,所见尤多。

另一种则由外国洋行物色、培养、派遣而来。如南阳,1918—1926年间,美孚、德士古、亚细亚等石油公司均在城区设置经销点。1923—1924年间,天津法国"利源"、英国"怡和"、日本"清喜"等洋行,连续派遣"华伙"来新乡、郾城、许昌、浚县等诸多县乡,购运花生、蛋黄、畜骨、桐木以及粮、油、棉、丝等商货,或设立分公司销售白糖、煤油、蜡烛等洋货。在盛产烟叶的邓州,每至收割季节,日本之"中东"和英、美洋行均派人前来"争购"。其中有部分是河南本地商人,如孟县丁长英等,就持洋商联单在黄河以北地区"包揽客货"[②]。势力最大的是英美烟公司,为收购许昌、襄城一带的烟叶和推销其卷烟,一方面派来专职买办(如沪籍的任伯言、鲁籍的宋礼斋)替他们收购烟叶;另一方面又在郑州、新乡、安阳等地设"段"(有正副主任),"段"下设为数不等的大小经销点于附近各县,各点配备经理、检查员、推销员等,组成了一张繁密的营销网络,将河南众多的烟叶收购商和小商小贩变为他们伸展经济势力的触须。因而在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商业城镇,主要为不断扩大的国内和国际资本主义市场需要服务的一系列棉花商、烟商、蛋商、丝绸商、草辫商,包括收购商、零售商、集散商、中间商、转运商等,就日见增多和活跃。因为与正常、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商业所获得的是当时社会的平均利润不同,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外国列强总是通过不等价交换进行掠夺性的经营,各种投机和欺诈行为也特别活跃,所以商业的利润也特别丰厚。拿花生来说,20世纪20年代开封、陈留、通许、濮阳等地,如以农民所得为100,当地商人所得则为120—164,外地商人所得且有近200者。因而按不同渠道"与西商交易"的商人和商业资本发展较快,使传统商业面貌大为改观,从而在铁路沿

---

① 《许昌县志》,第364页,民国12年宝兰斋石印本。

② 天津《大公报》,1920年5月31日;《河南财政月刊》,1924年第27期,第28页。

线，成长起一批商业城镇。像郑州，清末只在西街、南街开设有少数商店，到1916年城区人口还不过3 300人。1917年后，随着棉花等商货贸易的发展和多家工厂的兴建，山西、陕西、河北等省和沪、汉、津、青等埠商人的源源涌入，“商业日臻发达，货物运输，络绎不绝”①，迅速成为一个八方商贾会集的中心城市，人口亦在10余年间扩充近10倍。驻马店民初居民不过三五千人，到20世纪30年代初，增至4万人，大小商户800余（多为天津、汉口之商户所分设），光粮行、粮食转运商百余户，商民占居民中的70%，每年出口粮食、芝麻等农产品近10万吨，进口盐、卷烟、煤油、染料、百货530多万元。其他除省城开封外，洛阳、安阳、新乡、许昌、南阳、商丘、巩县、禹县、淅川等城区以及由卫河联通天津的道口镇，容纳山西泽、潞商货的清化镇，靠淮河、颍河、沙河联通江苏、豫西以至京津的周家口镇，销纳湖北、豫西商货的赊旗镇，交流陕、豫、鄂农副产品的荆紫关，载输豫鄂商货的漯河湾等，稍次者如项城的槐店，扶沟的吕家潭，长葛的和尚桥，内黄的楚旺，沁阳的清化，灵宝的虢略，卢氏的苑里，信阳的明港，镇平的石佛寺，沘源（唐河）的源潭，内乡的西峡口，均成为重要的商业城镇。商业资本也有新的发展，如温县、孟县、济源、武陟、沁阳一带经营中药材的怀商，汜水之麻商，南阳、镇平一带的绸商，或称雄于省内，或远出南北各省以至国外如俄国。

但是，地处北方内陆的河南毕竟与兼有江海之便的南方省份不同，历史上延积已久的滞后状态仍未改变。就是省会开封，“极大商店，亦不过一二万元本金”②。所以1923年1月27日天津《大公报》一篇通讯称：河南“商业近数年来表面观察颇有一日千里之势，揆其实在，不过较从前略为进步，若与长江流域各商埠相比，其商务之不振，仍不可以道里计也”。除了全省依然没有像南省那样“起家百万比比”（包括官僚商业资本和买办商业资本），依然没有类似沪、汉、津、穗那样的商业中心城市之外，还反映在以下诸方面：

① 《河南财政月刊》，第6号，《公牍》，第4页。
② 天津《大公报》，1927年4月18日。



1. 一般县乡商业很不发达，基本上还是鸦片战争前传统商业的格局。如陈留，"无大商巨贾"，惟南关粮市颇盛，输入商品主要是盐糖杂货；洛宁，"城市中所列，大抵乡民以农产品入市，易日用品而归"；新安，"平时集市除米麦外余无大宗，市面萧条"；嵩县，"市中土产惟有粮米花布，无过千元资本家"；郏县，"商业萧条"①。可见从县城到四乡，交换都很不发达，范围也很窄小，基本上还是小生产者之间以有易无。

2. 较大的商业资本和商人大都来自外省，本省土著明显地居于劣势。如在棉花交易最为繁盛的郑州，20 世纪 30 年代初总共近 300 家的花商（"花客"）中，陕西、山西籍的近 170 家，河南（主要是郑州、洛阳）籍的不到 100 家；全城各类商铺"经商（者）多汉口、天津人，本省人不多见"，惟麻铺不少为汜水商人所开②。即在本省商人"独大且多"的开封，"获利独厚"的却是经营洋货的天津商人，本省商人主要经营土布、药材等传统土货，"谨慎保守……毫无商业知识，死守家法而已"，即使金饰、杂货、杂粮、油房等业，依然"几皆为山西人所主持"③。其他还有不少县份，情况亦类此。看来，土著人民由于长期以来"俗尚醇朴，不善经商"，积聚有相当财富的官僚、地主又"惟知拓田为业"，所以一般县份的商业多由外地商人所占有，由此获致的特高的商业利润，也多源源流向外省，加剧了河南的贫困和落后。

3. 险阻重重，步履艰难。新兴的商人和商业资本是适应外国资本主义的需要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就决定了他们不能不俯仰随人，由"西商"主宰。从事出口商货贸易的商人，一定时期虽能获得较高的"盈余"，但情势一变，"赔累亦甚巨"。"盖西商均托拉斯，其买货也，日行增价，必使四方货物各集于此，然后（买价）陡然落下，我国商人为其颠倒，而莫能望其项背。"④加上国际市场波动不定，如 20 年代世界银价大跌，形成 1921—1922 年、1925—1927 年世界

---

① 林传甲：《大中华河南地理志》第三篇，民国 9 年中华印刷局铅印本。

② 《中行月刊》，1931 年 4 月号，第 15 页；《河南通志稿》第 123 册。

③ 北京《晨报》，1923 年 3 月 16 日；白眉初：《河南省志》卷二（抄本）。

④ 民国《河南通志稿·礼俗》（未刊稿）。

性的市场萧条，致使从事外贸的商客也大遭其殃。至于传统的旧式商业，则如一部地方志书所说，“各商因洋货侵入，利权外输，浸益不竞”①。越到后来，这种态势越严重。再则，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形成的自然经济仍相当强固，直至民国前期仍大体保持。如在灵宝，较为富有的人家，每人全年生活消费也不过10元左右，“中人以下之家，燃料则取之于山，菜蔬则取之于野，油醋则制之于家，其所求于商者，每人盐十余斤而已”②。时至经济有所发展的30年代，内黄、陕县、通许全年销售额分别为50万元、15万元、60万元，人均分别为3元、1元、5元左右。就全省而言，“除了几个近铁路的大城市外，乡村、城市的经济活动，都是限于本地，与外地的交流商品，绝少往来，他们看见的，只限于制钱和铜元”③。一些山僻县份，县城内商铺也主要靠“粟易”——以原粮换取食盐等必需品，或至夏、秋时补交，近于一种变相的高利贷。所以成书于1930年的《河南新志》记省境“风俗概况”时就说：“居民十九业农……大半居茅茨，食杂粟，衣土布，用土器，勤苦耐劳，然草昧遗风，鄙塞殊甚。”在这种“草昧遗风”的笼罩下，省境商业的发展天地自然十分窄小。加上军阀统治带来的无尽战乱和重税，更给城乡商业带来深重的祸害。1924年，豫东商民发布传单控诉：“我们货物上车，已出过火车的货捐，落地出过落地税，（至）当地又有公益捐，斗有斗捐、行有行捐，花生亦有花生特别税，我们已捐不胜捐了，如今又要逼勒再出百货捐。一车粮食，税以数十元计；一车棉花或牛皮，税皆以百数十元计。”④连续“雪上加霜”的结果，使得本来就显得滞后的河南商业更加步履艰难。1925、1926年，许多商户“弄得过年都过不来”，早几年八九十家粮行只剩下七八家“硬撑”，10余家转运公司只留下三家勉强营业，其业务总量抵不上往日一家⑤。所以外省报纸1921—1923年报道

---

① 《封丘县续志》卷五，第28页，民国26年开封新豫印刷所铅印本。

② 《灵宝县志》卷二，第7页，民国24年铅印本。

③ 曾广兴、王全营：《北伐战争在河南》，第33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④ 天津《大公报》，1924年5月12日。

⑤ 《中央日报副刊》，第68号。



称，"豫省商务之凋敝，亦可谓达于极点。（开封）满城萧索，殊无生气"①；"统计全省商业，几无一家不受亏者"，据省商会估计，开封和其他城镇合计亏累在1 000万元以上②。在这样的情势下，河南商业愈趋滞后，实为势所必然。

（二）金融

河南的旧式金融机构此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并出现了作为近代金融资本的银行。大体情况，列述如下。

1. 典当（当铺）在晚清时期几乎"无县无之"，一县有多至数家者。民初以来时局动乱，民生困穷，"死当"日积日多，当铺变卖不易；军阀官府连续滥发纸币和大钱，不久都大贬其值，当铺在赎当时回收本金，往往赔累；所以到民国前期，各地当铺大都趋向衰落。即使少有继起开张者，也多资金有限，无甚生气，并不能扭转其在本时期走向衰败的历史命运。

2. 票号在清末省境尚有14家，其中13家均在开封。最大的一家是"日升昌"。后因官办的豫泉官银钱局开设，钱庄、银号、银行也开设日多，邮局复开展汇款业务，票号遂日见劣势。辛亥革命后，更江河日下。至20世纪20年代前期，票号在河南金融史上宣告终结。

3. 钱庄和银号在晚清时期也无县不备，只是多少、大小有所不同（穷僻县份只有钱铺、钱票而无钱庄、银号）。清末开封有钱庄五六十家，到20世纪20年代，发展到100多家。1917—1918年全省实行"丁漕改元"（由交银改为交银元），此种银号失去了熔铸银锭的业务，官款也改由官办金融机构和银行承办，遂纷纷倒闭。但随后不久，又有"信昌"、"同和裕"等新银号代之而兴，而且后来居上。信昌银号（总部在开封）所设之办事处则几遍全省，总号在新乡的同和裕银号也在新乡、开封、焦作、安阳等省内近20个城镇开设分号。再者，还在包括京、津、沪、汉等省外各大埠广设分号，活动范围广及南北各省，在全国特别是

① 北京《晨报》，1921年2月22日。

② 天津《大公报》，1923年3月8日。

北方金融界著有声誉，在河南省内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些钱庄、银号均以款项兑汇、存放为主要业务，主要是不同庄、号之间异地同业汇划。钱庄的庄票，有即期和远（定）期两种。前者可作为现金代用券供官民行用，后者主要供异地办货者交易使用，实同汇票。由此，使这些传统金融机构具有了资本主义金融机构性质，成了通商口岸洋行与河南商人的桥梁，逐步被纳入外国资本主义控驭的资本主义商业运行轨道；它们给新兴工商业者提供存、放款的方便，有些且自身也大力经营资本主义工商业，更使这些传统金融机构突破了往昔封建经济的藩篱而融入民族资本主义新经济之中。

4. 官银钱局最早出现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 年），由藩库筹银 10 万两，于开封设立，其业务只按官定比价兑换钱、银。次年即撤销。真正适应本省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官办金融机构，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奏准在开封设立的豫泉官钱局，发行银票、制钱票。三十年（1904 年）在局内增设官银号，开办汇兑和存放款业务。宣统三年（1911 年）两者合称豫泉官银钱局，代理省金库，收发官款，并于京、津、沪、汉等地及省内 8 个重要商业城镇设立分局，增发银元票，民国后又发行钞票。因经营不善，1923 年，被改组为河南省银行。

1923 年 7 月 17 日，河南省银行正式揭幕，资本 150 万元。随后复在北京、上海、郑州等二三十个城镇设置分行或兑换所，开展业务活动，主要是：收发官款，买卖金银，存、放款项，兑换货币，代理买卖有价证券，汇兑款项等，仍然代理省金库，并发行 1 元、5 元、10 元及当 10、20、50、100 枚铜元票。省当局以此为钱袋，月月垫支巨款，至 1925 年 2 月，已累计垫支 195.8 万元；把持该行的“天津帮”又以此为利薮，“惟恐天下不乱，愈乱则愈有机会可图”，利用兑换之权，时而将纸币兑价压低，时而予以抬高，然后相机大收大吐，从中大发不义之财[1]，遂至信誉扫地，纸币几等废纸，很快就步豫泉官银钱局后尘，于 1926 年 9 月被省议会决议撤销。

---

① 《银行周报》，第 463 号。



省外银行在豫分支行乃是正规的近代金融机构，只是在河南出现较晚，1908 年，官办的大清银行始来河南省会开封设置分行，资本银 20 多万两，次年春开张。民国初，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以后，“中国农工”、“盐业”、“大陆”、“金城”、“中南”等国人自办的官办或私营银行也有来豫设立分支机构者。到 1927 年前，主要有：(1) 中国银行。在开封设分号后，复于信阳、彰德、漯河、周家口、禹县、许昌、洛阳等地设置分号，于郑州设办事处，于道口设兑换所。从 1915 年起，代理省、国库。1924 年后，因战乱屡起，军队随处勒逼现款，除省城分行外，其余各分支机构均关停歇业。1927 年春，奉军入豫，开封支行亦停。(2) 交通银行。1909 年于开封设立分行，民国初进而于郑州、漯河、信阳、焦作、道口、彰德、新乡、商丘、南阳、禹县、郾城、浚县设兑汇所。但因业务不佳，不久后各所大都停闭，1927 年开封分行亦停。(3) 其他还有金城、浙江兴业、盐业三银行，亦于 20 年代前期先后在郑州设分理处或支行。另外，邮政总局开办的邮政储金汇业局和冯玉祥开办的西北银行（总行在张家口），亦于此期间在开封设管理局（分局、办事处）或分行。到 1927 年上半年，全省共有各银行支行 72 所（全国 1 627 所）。这些银行都是按近代银行模式组建和活动的，主要业务有汇兑、存放公私款项、买卖金银、兑换货币，进行短期拆借，各种期票贴现或卖出，代收公司、银行、商家所发票据，发行各种票据和兑换券等，较之旧票号和钱庄、银号，业务大有扩展。因其资本较为雄厚，组织管理又近代化，存、放款利率和汇兑贴水也较低，所以逐步从旧票号和钱庄、银号那里夺过许多业务，对河南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自然更给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深入河南城乡提供了新的方便。

同一时期，河南城乡流通的货币也有不小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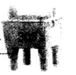
1. 晚清时期河南城乡通行的货币，以硬通货——银两和铜钱为主，纸币——清政府发行的钞票和私家发行的土票（小票）为辅，沿海沿江各省流行的银元很少。

2. 到民国前期，银两、制钱逐渐分别被银元和铜元所取代，近代金融机构发行的钞票也不断增多，日渐成为一种主要通货。尤其是民国

7年(1918年),河南开始实行“废两改元”,规定田赋一律改以银元而不再以银两计量交纳,所以到民国7、8年间,在开封等主要城市,银两基本上均被银元所取代,主要有英国出的“站人”洋,湖北、江苏、四川、广东、直隶等省铸造的“龙洋”及民国3年(1914年)北京政府铸造的“袁头”洋。但江苏、四川、广东等省铸造者信誉不佳,民间不甚通用,“贴水”甚多。此外,尚有5角、2角、1角的银铸小辅币。铜元,本省在1904年后开始在河南机器局内添设铜元局,专铸铜元。辛亥革命期间停造,民国3年(1914年)1月复重新开局鼓铸。因为制钱几已绝迹,所以铜元流通更遍及河南城乡,而且呈现“供不应需之象”[1]。本省和外省当20文、50文、100文的铜元越铸越多,尤其是外省铜元继续大量输入。像豫西南各县,到20年代末,市面通行的主要是湖北、四川、湖南等省的铜元,尤其是四川铜元,几乎占市面流通铜元的70%—80%,其中以当50文、100文、200文的大铜元为最多。全省除在部分农村还有少量制钱残存流通外,铜元尤其是高面值的当50文、100文、200文铜元,已取代旧制钱而成为主要辅币,贬值也愈甚。每块银元在1912年合当10铜元120—130枚,1923年折兑当50铜元60—80枚,即合制钱3 000—4 000文,是清末的三四倍。后当100文、200文铜元继出,每块银元折兑二百三四十枚,合制钱6 000—8 000文,是清末的七八倍。因为城乡人民平时入市购销农副产品,历来均以制钱的“文”作为计价单位,银价的大幅度上涨也意味着物价之同步提高。如信阳,“大铜元充斥市面,零售物价几无百文以下者,银币乃由一串飞涨至八串文。而其实,农村并银币亦不多见,不独无小铜币也”[2]。农村农民因此受害最为深重。同样,当时工矿工人、城市苦力的实际工资也因此大幅度降低。本来已很孱弱的河南城乡购买力因此更每况愈下,“金融停滞,百业凋零”[3],成了全省的普遍现象。

---

① 天津《大公报》,1919年9月21日。
② 《重修信阳县志》卷十一,民国25年汉口洪兴印书馆铅印本。
③ 《重修信阳县志》卷十一,民国25年汉口洪兴印书馆铅印本。



3. 河南正规地发行纸币，是清末设置的豫泉官银钱局开始的。民国3年（1914年），北京政府财政部在开封设立“平市官钱局”分局，开始发行铜元票，面值有10文、20文、40文、50文、100文五种。次年，豫泉官银钱局继续印发，有50文、100文、200文三种，后又加发10文、20文两种。据报，到1914年，银两票共发行145.7万多两，银元票188.7万多元，制钱票20万余串，铜元票14.3万余串。民国6年（1917年），又发行银两票近23.8万两，银元票50余万元，制钱票93万余串。除此之外，还有湖北官钱局发行之“台票”，清末即通行于豫南各县；大清银行、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也各自发行纸币，光中央、交通两行至1921年即发行钞票50万元。民国12年（1923年）后，河南省银行陆续发行银元票2 000万元[①]。另又印发了铜元钞（有当10文、20文、50文、100文四种）。到民国15年（1926年）春夏，该行在本省所发银元票总计1 200余万元，铜元钞180余万串[②]。

豫泉官银钱局和河南省银行所发的钞票，均印有“完粮纳税，一律通用”，但是人民完粮纳税，官府均勒交现金，致使这些钞票一开始就失去信用。加以年复一年地滥发高面值的铜元和钞票，大大地超过社会的实际需要，结果就严重贬值，进一步加剧了金融的紊乱和物价上涨。到民国15年（1926年）夏秋间，“钞洋大跌，每元仅合二角一二”；铜元票亦然，“一吊只值铜元七百二三十文，且稍有破烂，即当废纸”[③]。“贫民生计，大受打击，几至终日劳动，不得一饱”[④]。就是一般商铺，也因官府强令接受钞票，拒者甚至以“枪毙”相胁，由此受亏倒闭者各地都日有所闻。及至1927年北伐军从武汉推进河南，河南省银行随着吴佩孚的垮台而停歇，所发钞票完全成了废纸，人民遭受了巨大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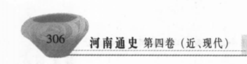
---

① 《河南文史资料》总46辑，第98页。按：此2 000万元主要在1925年发行；所发1 000万元钞票系向财政部印刷局订印。

② 另据《银行周报》1926年4月12日报道，发银元票1 300万元，铜元钞1 600万串。

③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59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④ 北京《晨报》，1926年9月20日。



（三）交通

在20世纪开头的20多年，河南交通运输业进展较快，出现了铁路和火车、公路和汽车，加快了近代化的步伐。

1. 铁路。京（芦）汉铁路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4月1日）全线通车，在河南境内者，共长551.9公里。汴洛铁路于光绪三十四年通车。接着又续办洛潼铁路，后决定东西展筑，称陇秦豫海铁路，简称陇海路。到1927年11月，西至灵宝段通车。1932年12月在河南境内的陇海路完全通车，共长594.4公里。还有全线在豫北的道清铁路，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3月）已全线通车，全长152.4公里（含后筑的新乡接站支线）。

2. 公路。公路（当时叫汽车路）的修筑始于1919—1920年。但在此之前，省内已有汽车行驶。据云，1912年，安阳街头已见有小汽车①，当是省内最早的一辆汽车。在省会开封，1915年，街头首见载客汽车，两年后开始有载货汽车。1919年，北京政府内务部召集的河务会议决定将黄河干支流重要堤埝划归国道和省道，由中枢和地方协同修治汽车路。1920年5月，省当局制定计划，利用原有堤埝，修筑汽车路国道，于沿河地方筹办汽车运输。这是河南官方筹办公路交通运输之肇始。同年秋，中国华洋义赈会和美国红十字会等国际慈善机构，用以工代赈方式，在沁阳城关修筑马路，另又利用旧驿道修筑焦作经沁阳至济源的65公里的石子路面道路。这是河南最早的汽车路。本省又利用济源沿沁河、黄河至兰封河口的河堤，改筑成公路，于1921年首次行驶商办长途汽车，开始在河南交通史上书写公路和汽车运输的新篇章。为此，1923年，省实业厅设置汽车路督办筹备处，规划和组建省境各地汽车路的修筑。至1927年，全省通行的汽车线路主要有：商丘至亳县、漯河至亳县、开封至周口、驻马店至南阳、信阳至固始、陕县至潼关、清化至济源、济源至黄河铁桥及安阳至楚旺等路，总长1 300余公里，绝大多数是原有大路平整展拓而成，铺筑低级路面的只有商亳和清济两

① 安阳市交通志编委会：《安阳市交通志》，第6页，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



路。

3. 运输。汽车运输(客运、货运)也缓慢地有所进展。1921 年,本省绅商胡汝麟、袁世斌等开办开(封)周(口)、漯(河)周(口)汽车公司,载客营运。次年,又有郭平、郑敏斋等集资 15 万元,创办清济黄校长途汽车公司,有汽车 8 辆,客货各半,在清化——沁阳、济源——黄河铁桥、校尉营——清化间营运。1924 年,归德商家将各家汽车 43 辆,联建为归亳汽车公司,行驶归德——亳州一线。1925 年,南阳商会集资创办利康汽车公司,有福特牌汽车 7 辆,每辆载重 750 公斤,座位 8 个,经营南阳——许昌、南阳——老河口客运、货运,但次年 5 月即告倒闭。另外,还有兰(封)济(源)汽车公司、太(康)禹(县)汽车公司、宏丰汽车公司(行驶开封——杞县)、长(水)洛(阳)汽车公司,均先后于 1924 年前开办。由于各公司的营运线路都很短,运量、载客也很少,运费又高,所以汽车运输在整个交通运输业中还只是一个小配角;但从诸多汽车公司的创办来看,已开始形成一股潮流,全省公路、汽车也从无到有,对促进交通近代化不无小补。

随着各条铁路的先后通车,大宗商货多改由火车运输。因此,如京汉路,1911 年营业收入 1 100 多万元,到 1925 年增加到 3 600 多万元。这样,就使得传统的商路发生很大的改变,导致一些旧商业集镇的衰落和新商业集镇的兴起。如旧时全国四大镇之一的朱仙镇,既因贾鲁河淤塞货运大受影响,更因"铁路建设,此镇失其效用,日就衰微","街市今已为一片瓦砾,满目荒凉"[①],较之往昔不啻天壤。豫西南的赊旗镇,以往汇集南船北马,"繁盛殷富,甲于各地","今则为京汉铁路所夺,商业衰微"[②]。豫东南的周家口,自铁路大通,商货多改由蚌埠、郑州、归德、许州、郾城、驻马店等处上落,致使该镇"连年生意冷落异常"[③]。其他不临铁路的城镇,情况也相类似。与这些城镇相反,诸多铁路行经的

---

① 白眉初:《河南省志》卷二、卷七(抄本)。

② 白眉初:《河南省志》卷四(抄本)。

③ 《商水县志》卷十二,第 15 页,民国 7 年刊本。

城镇，则成为各种商货的集散地，获得较快的发展。最突出的是京汉线上的驻马店。火车未通前，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村集，火车通后，“遂变荒墟为繁市”，与郾城、信阳一起成了豫南三个主要商业城镇；漯河“昔以通周家口已号殷盛，自京汉铁路通行，舟车之所辐辏，商贾于此萃焉，视昔且倍蓰过之，固为一都会矣”[1]；许昌京汉路所经，“促商业之猛进，局面日益开展，实力日益雄厚”[2]；盛产煤炭的巩县，过去只能行销汴、洛等地，铁路既通，“东抵山东，南至湖北，北达直隶，巩民之沾其润者不其多欤”[3]；渑池“城内商业，较未通铁路前发达一倍”[4]……其他铁路所经各城镇少有例外。

这样，随着铁路和公路的修筑和通车，旧式的车船骡马就逐渐被火车、汽车等近代交通工具所替代，往昔以“官道”和主要河流为网络的交通旧格局也被以铁路为骨架的新格局所取代。这是一种历史性的变化，不仅有力地促进了省内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诸方面都带来十分深广的影响。

① 《郾城县记》卷四，第18页，民国23年刊本。
② 《许昌县志》，第365页，民国12年宝兰斋石印本。
③ 《巩县志》卷七，第12页，民国26年开封泾川图书馆刊本。
④ 林传甲：《大中华河南地理志》，第248页，民国9年中华印刷局铅印本。



第四十一章

十年内战时期

第一节　国民党统治的建立

一、省政府及国民党河南省党部的建立

(一)省政府的建立

1927 年 6 月 10 日,郑州会议议决建立河南省政府,隶属武汉国民政府。6 月 13 日,河南省政府正式成立,冯玉祥、孙岳等 11 人为委员,冯玉祥兼主席。创办了《河南民报》,为省政府机关报。1927 年 9 月,宁、汉合流后,河南省政府归属南京国民政府。1928 年 1 月 17 日,南京国民政府议决改组河南省政府,以冯玉祥等 9 人为委员,仍以冯玉祥为主席。按规定,省政府实行合议制,称省政府委员会。省政府的成立,宣告民国以来沿袭 10 余年的督军时代的结束,以委员制代替独裁统治,这是一个进步。

冯玉祥宣誓就任河南省政府主席职后,6 月 18 日宣布了治豫方针 6 条:统一军政、刷新吏治、整理财政、党化教育、抚恤灾民、肃清盗匪。

自省政府成立到第一次蒋冯战争结束(1929 年 5 月)的近两年内,冯玉祥曾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稳定其在河南的统治。

整顿吏治,严惩贪污。包括扫除暮气,勤奋工作;提倡节约,反对浪费;严惩贪污等。官场积久相沿的腐朽习气大为整肃。惩治贪污方面,

执行得比较严格。省政府一度设过视察专员，不定期地分赴各县视察政务、民情，制定严厉的惩治贪污规定。盘踞各县县衙的八班六房旧吏役，民初省议会曾决议清除，但迄未实现。冯玉祥通令各县一律取缔，代以相应的由新人员组成的科、局、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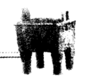
设置行政人员培训班，举贤任能。冯玉祥对县长人选非常重视。省政府一成立，即在民政厅内附设了河南省地方行政人员训练班，后改为河南训政学院，抽调现任县长等入院训练，1928 年年初，由开封政治分会接办，改为开封训政学院，以调训培养鲁、豫、陕、甘、宁、青六省的地方行政干部。经过一番振作，基层政治比北洋政府时代进步多了。

整理财政，清理逆产。省政府成立初期，金融紊乱，财政紧张。省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整顿金融。一是缩减行政费用支出，提倡节俭；二是调剂现金，维持市面流通；三是清理田赋，划一税则。一年之后，财政状况有了根本转变，纸币信用增强，商品得到流通，行政人员的工资待遇也有很大改善。与此同时，又对袁世凯、袁乃宽等在河南的财产进行清理、没收，为此成立了逆产清理处。共清出二袁逆产房屋 800 余间、土地 1 730 余公顷及大量资产。

改良风俗，破除陋习。冯玉祥对社会上的陋习如吸毒、嫖娼、赌博、男子留长发、女子缠足等早已深恶痛绝，采取严厉措施予以革除。他在主豫之初即发出了号召："烟酒必戒，嫖娼必戒，戒除奢侈，戒除懒惰，必勤必俭，以诚以忠"[①]，并作为标语广为粘贴。剪发放足，更是雷厉风行地实行。省政府设立放足处，各县设立分处，组织人员进行检查，限期放足，并责成教职员工带头，保证家中妇女先放足，逾期不放者予以处罚。据天津《大公报》报道，仅开封一年内放足的女子就有38 417人。

打毁神像，破除迷信。1928 年夏，冯玉祥把开封全市算卦、看相、看风水、男女巫共七八百人集中起来，进行取缔。冯玉祥还责成各县县长打毁神像，遣散寺僧，把庙产充公，将庙宇改建为学校或工艺厂。将开封"救苦庙"拆除，其材料用来改建人民会场。1927 年在开封相国寺

① 《河南文史资料》第 8 辑，第 73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



内筹办中山市场,次年3月完成。将龙亭内的道士逐走、神像推倒之后,加以修葺,改作中山公园,让游人们游览、参观。省政府还下令各县一律将城隍庙改建为中山公园。这些会场、公园的修建,体现了冯玉祥"化腐朽为新鲜,变废物为有用"的思想。

发展实业。省政府拨公款在开封创办了省立惠民工厂、省立妇女工厂、开封平民工厂、第一工厂等。各地陆续办起了一批平民工厂。冯玉祥认为,河南人民贫穷的原因在于水、旱之灾。为此,省政府令各县大力凿井,兴修水利。全长20余公里的洛(阳)宜(阳)灌渠即动工于1928年。省政府还要求各县建立农业试验场,并鼓励农民植树、养牛、养羊、养鸡、养蚕等。

虽然冯玉祥力图除旧布新,可是效果并不明显。重要原因之一是除了冯主豫时间不长外,还因为所任命的县长不少人经验不足,办事操之过急,引起农民反感。如新安县县长因在大街上迫令一个新娘子当众解除脚上的缠布,群众愤慨难抑,群起用砖块瓦片把他痛打一顿。加上各县县长频繁更换,使前后政令不连贯。据不完全统计,1928年一年内安阳换了7任县长,开封、南乐、内黄换了6任,商丘、洛阳、许昌换了5任,尉氏、夏邑等17县换了4任[①],及至1929年5月冯玉祥反蒋失败退出河南,冯玉祥的施政方针也半途而废。尽管如此,冯主豫期间的一些带有民主性的举措,在一定时期内确使人耳目一新,也在一定程度上荡涤了政府机构和城乡社会的一些封建积垢,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由于当时全国政治和军事形势还很不稳定,一场权力和地盘的争夺方兴未艾。为了因应这种严峻的局势,冯玉祥就极力扩充其实力,从而使河南人民得不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反而添加了许多新的灾难。

冯玉祥规定,民户有2个以上儿子者,须出1人入伍当兵,人称"门户兵",并硬性规定指标,一般每县每次征兵2 500人,多的达3 000—5 000人。像渑池这样的三等小县,"人口总共不过12万,除掉老弱、妇

① 据牛中家等:《民国时期河南省县长名录》(内部资料,1991)一书统计。

女、残废外,所有壮丁不过二三万人,耕田尚不敷用,但冯玉祥征2 500名为兵"①。此种"门头兵",前后强派6次,使冯部在一年内扩充了好几倍,给广大农民带来很大的灾难。

大事扩军,必然伴之以大事搜刮。诸如重征民国17年(1928年)钱粮,以后又连续预征,"往往一年之中征二年或三年之粮,(农民)终岁所入,不足供官家之诛求"②;又加派地亩捐,分派军事捐、开拔费、北伐捐、粮秣捐、特别捐、省公债、民团捐等;加征斗捐、食户捐、牙帖税、车马捐、烟捐等。据约计,每户农民一年劳动所得,至少一半都被强征了去。民间传播民谣有"要吃白面馍,杀死勒云鹗;要吃老绵羊,杀死冯玉祥","青天白日(国民党党旗——引者)不论理,四面八方把人欺"③。怨毒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二)国民党河南省党部的建立及派系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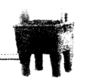
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一成立,就因权力角逐而陷于复杂的派系斗争,且愈演愈烈,直到冯玉祥第一次反蒋失败,改组派随着失势,纷争才暂告平息。

国民党要员丁惟汾于1925年在北京组织三民主义大同盟,成为国民党内部的政治小团体。随同冯玉祥进入河南的郭春涛、邓飞黄等人都是大同盟分子。他们在主持全省党务和筹建省、市党部过程中,竭力排斥和打击其他派系。

1927年11月3日至13日,国民党河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开封召开。在这届省党部中,大同盟分子及其同盟者占了优势。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根本计划案》等议案,决定各地党部一律停止活动,中央派遣党务指导委员代行执委会职权,对党员进行考察、训练及重新登记。5月,国民党河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在开封成立,成员9人全由国民党中央指派,他们是邓哲熙、

① 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55页,郑州,1984。
② 《中行月刊》民国20年3月份,第48页。
③ 段继武:《温县志稿》,民国22年稿本。



黄少谷、邓飞黄等。下设宣传委员、民众训练委员及省农协、省学联、省总工会整理委员等。但河南的国民党党员属不同派别，明争暗斗，仍未停止。

10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因郑州市党员大会曾于8月间发表过声讨阎锡山的通电，郑州市党部最近又通电欢迎汪精卫（汪因1927年11月在广州发生驱赶桂系的事变而被南京通缉，于12月17日秘密出国），特令河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先将郑州市指委停职查办，对“捣乱”党员分别予以严惩。国民党各县市党部对该地党员进行了登记。到11月底，据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登记公布：河南全省请求登记的党员共有7 944人，经复审合格发给党证的6 243人，县、市已成立党部20多个。

11月28日，汪派陈公博、王法勤等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各省市及海外党务改组同志会”，简称改组派，推汪精卫为领袖，以同蒋介石争夺权力。郭春涛、邓飞黄因丁惟芬在中央失势，大同盟派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受到影响，遂参与了改组派的筹建活动，并在河南成立了改组派支部。省党务训练所李定和小学教员派王天晓，为同邓飞黄等人相抗衡亦在开封成立改组派支部，两派为争正统经常发生矛盾。1929年春，双方在改组派总部的干预下，形式上进行了合并。

蒋介石为了剪除异己，取得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决定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代表由中央指派和圈定。1929年3月4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河南代表为李敬斋、韩复榘等7人。因代表全为指派而遭到国民党河南省指委的抗议。3月11日，国民党中执委指责河南省指委会意存捣乱，阻挠大会，议决将河南省指委成员一律撤职，交监察委员会查办。

3月15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开幕，冯玉祥称病缺席。5月6日，国民党中常会议决：河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反对三全大会精神，该省非法组织之78县市联席会议又发诋毁三全大会通电，故即予解散。河南省党务工作在新指委未就职前由省政府执行。5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训令河南省政府查封反对三全大会之许昌县党部

所办之《许昌周刊》，并严饬该省各级报馆、通讯社，不得登载该联席会议一切“反动新闻”。

5月中旬，冯玉祥发动了第一次反蒋战争，因韩复榘、石友三叛冯投蒋，冯军失败后退出河南。韩复榘下令通缉省内的改组派骨干分子，改组派分子有的出逃，有的被捕，余者宣布退出，组织归于瓦解。6月27日，国民党中常会议决委陈泮岭等8人为河南省党务指导委员。7月25日，该指委会在开封正式成立。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后，省指委曾一度迁至驻马店、信阳，当年10月大战结束后迁回开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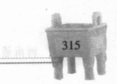
二、冯玉祥统一和巩固河南的战争

（一）冯军对直鲁联军之战

1927年5月31日，冯玉祥、唐生智两军郑汴会师后，黄河以南已无奉军、直鲁军。冯玉祥为巩固河南，于7月3日起，派孙良诚、石友三等军由孟津、巩县、广武（今属荥阳）渡河，对惊魂未定的奉军猛袭穷追，一路势如破竹，先后占领新乡、沁阳、孟县、温县、武陟、安阳等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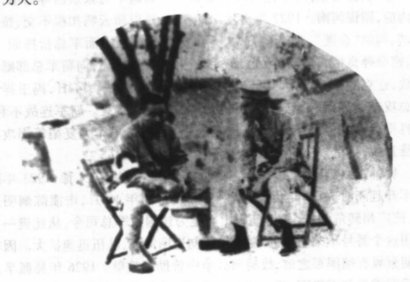
1927年9月宁、汉合流后不久，双方因权力之争又发生了新的对立，并演变为军事冲突。接着，蒋介石又挑起了粤桂战争。乘南方国民党内一片混乱之际，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直鲁军张宗昌，发动了对阎锡山、冯玉祥的军事进攻。冯玉祥遂同善于投机的阎锡山合作，由晋军攻击直隶的奉军，冯军攻击直鲁军。10月初，冯玉祥区分所部为三路，分别由鹿钟麟、刘镇华、孙连仲指挥，向徐州、鲁西南和德州攻击前进。另以孙良诚等部为总预备队，集结于开封、郑州地区。此时，直鲁联军亦分路进击。褚玉璞率领徐源泉、方永昌、王栋等精锐主力10万人为中路，沿陇海路正面西进；刘志陆、潘鸿钧等部4万人为左路，沿陇海路南侧进攻太康、陈留；孙殿英所部3万余人为右路，出冀南进攻豫北。10月、11月，冯、鲁两军经两次兰封会战，鲁军战败，陇海路战场移出豫境。

冯玉祥廓清豫东之敌后，1928年1月2日，移大军于豫北战场，在汤阴、安阳连日与直鲁军血战，17日晨攻克安阳，2月2日攻克卫辉城。



(二)冯、奉漳河大战

2月15日,蒋介石在徐州开军事会议,宣布继续北伐。28日,南京国民政府议决改西北国民革命军为第二集团军,北方国民革命军为第三集团军,后又将两湖各军改为第四集团军,分别以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为总司令,准备共同北伐。冯玉祥遂将该部整编为9个方面军计31万人。



蒋介石、冯玉祥在野鸡岗商议继续北伐

张作霖得悉南方军事部署后,命张学良、杨宇霆第三、四方面军团对冯玉祥、阎锡山采取攻势。张学良遂将该方面军团大部调往邯郸以南对付冯军。4月4日拂晓,奉军向丰乐镇冯军阵地进攻。17日,逼近安阳城北、城东。冯玉祥急调驻漯河之韩复榘部星夜赴援。双方激战数日,奉军陷观城。23日,奉军攻势始被遏止。29日,冯玉祥令豫北各军全线反击。旋因东线蒋、冯部队在津浦线上战败孙传芳、张宗昌军,迫使张作霖收缩战线,张学良遂令奉军破坏漳河铁桥及铁道电线,全军退出河南。30日,冯军向南乐、楚旺进攻。5月1日,直鲁联军全线溃退,逃离豫北。

(三)冯军对靳、樊和天门会的军事行动

冯玉祥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后,省内驻军名义上统归其指挥,事实上一些原来的军事集团仍然希图保持山头,暗中与其对立,如原河南保卫军靳云鹗部,建国豫军樊钟秀部,原属国民二军的岳维峻部等。彼此的矛盾仍在潜滋暗长。郑州会议后,靳云鹗部被冯玉祥改编为该部第二方面军,靳任总指挥,并任省政府委员。但靳暗中与张宗昌等勾结,欲为内应,图谋河南。1927年9月4日,冯玉祥以靳云鹗扣税不交、按兵不动、勾结"会匪"、捏造谣言等,下令免去其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职。5日,密令孙良诚、孙连仲为北、南两路指挥,集结兵力,向靳军总部郾城进攻,连克郾城、漯河、西平,迫使靳军走上蔡、项城。14日,冯玉祥下达总攻击令,两军在新郑、郾城、临颍、许昌全线接火。靳军连战不利,被打得溃不成军,靳率少数随从东入皖。28日,冯军韩复榘等部攻破禹县县城,靳军李振亚部逃散,冯靳战争结束。

樊钟秀出身绿林,1918年投陕西靖国军,1920年入豫,1923年随毅军开赴江西,1923年由赣入粤投孙中山,同年10月,击溃陈炯明主力,使广州转危为安,战后孙中山委樊为建国豫军总司令,从此樊一直沿用这个番号不改。所部1925年年初返回河南,队伍迅速扩大。因樊与胡景翼有靖国军之谊,故胡憨战争中曾助胡攻憨。1926年吴佩孚入豫后派重兵剿灭樊军,樊部遂化整为零,潜伏于豫西南山区。1927年春,樊受武汉政府之命集合旧部策应北伐,曾与冯军合作对吴佩孚和奉军作战。战后仍打建国豫军旗号,不肯受武汉政府和冯玉祥的番号,蒋介石曾派人收编,亦被樊拒绝。因此樊部是一支孤立无援的部队,得不到任何方面的军饷和支援。4月中旬,豫北战事激烈,冯军大都调往前线,豫中防务空虚。樊钟秀遂趁机联合豫中民团,袭击冯军后方。冯玉祥急调宋哲元由陕西开赴洛阳。28日,宋部大破侵犯龙门之樊军,5月1日克偃师。在鲁西南同鲁军作战之石友三部,亦奉命回援孝义,宋、石两军会合后,分路追击樊军。5月4日,石友三以少林寺的和尚支持了樊钟秀为由,纵火焚寺,千年古刹惨遭浩劫,大雄宝殿、钟鼓楼等被化为灰烬。



樊钟秀部败退后，冯玉祥令宋哲元仍率所部回陕，令鹿钟麟剿樊。8月26日，鹿钟麟部克南阳。10月2日，樊钟秀率残部退往皖西，分驻阜阳、蒙县。至此，省内驻军除刘镇华部外，均属冯玉祥嫡系。

在此期间，冯玉祥又出兵镇压了豫北天门会。1927年夏，是豫北天门会势力的鼎盛时期，会众有30余万人。当年7月进占林县城，并向林县、辉县、涉县(今属河北)委派知事。冯玉祥部进驻豫北后，与天门会发生冲突，200多名政治工作人员和官兵被杀。8月，省政府通令各地枪会、天门会一律改编为民团，天门会抗不遵命。是年冬，冯玉祥派参谋刘文彦到林县强行收编天门会武装，被韩欲明所杀。冯玉祥因同奉军大战在即，必须稳定后方，遂决计剿灭天门会。1928年3月，派第二十军庞炳勋部及第六十八、第六十九两师，分途会剿。13日，冯军开始进攻。天门会首领韩欲明调集会众拒敌失败。

冯、奉安阳大战爆发后，庞炳勋等部开上前线，仅留少数人守林县城。5月，韩欲明乘虚攻打林县城，未克。庞部回师焚掠东油村，烧天门会总坛及民房1 000余间，天门会36名骨干被抄家，30余人被杀。12月22日，庞炳勋部再次攻打菩萨岩，并与晋军相约，上下夹击天门会。1929年1月21日夜，韩欲明率众从黄华口突围，后潜往东北投奔了张学良，余众分散于林县、安阳、涉县农村[①]。至此，盛极一时的天门会暂告沉寂。冯玉祥实现了对河南军、政的统一。

三、冯玉祥"清党"反共和工农运动受挫

大革命失败后，冯玉祥在二集团军和豫、陕、甘三省继续"清党"反共，而且步步升级。当年7月25日，冯在洛阳宣布：在各级党部或军中任职之共产党员须声明脱离共产党党籍，否则一律停止其职务。28日，冯又电告豫、陕、甘三省政府和将领：(一)不准跨党；(二)共产党跨党领袖，一律解除武装，必要时得加以严重监视；(三)不准以共产党名义活动，亦不准假国民党名义作共产党工作，违反者以反革命条例治

---

① 中共安阳市委党史办公室：《中共安阳党史专题资料选编》(一)，第49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

罪。并限令在河南的共产党员三日内离豫。他开始时对共产党员采取“礼送出境”的办法，每人都送了路费。随着冯玉祥同南京政府关系的接近，反共逐渐升级，8月份开始逮捕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9月、10月份进入高潮，在开封、郑州等地多次破坏共产党、共青团的机关，仅开封一市就有密探300余人，发现可疑人员，即行跟踪。9月27日晚，团省委机关被破坏，林壮志、李明、陈善等30余人被捕，抄去重要文件4箱，省委及各地负责人名字全部被破获[①]。各县按照名单捉拿，许多共产党员被通缉，数百人被投进监狱。

进入1928年，冯玉祥反共进一步升级，多次训令各军收用官兵时要防止共产党渗入，严格清查共产党的活动，“如果查获该项党徒，证明有据者押送前来，实行枪决”，“倘有知情隐匿不报者，查明一律同罪”[②]。随之逮捕了该部军官何其亨、军校学生高煦宇及孔善庆等共产党员，取缔郑州总工会，逮捕工会成员，冯部工人事业管理处处长浦化人等闻讯逃避，冯下令通缉。共产党组织多次被破坏，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周以栗、省委秘书长张海峰、省军委书记萧人鹄等400余人被关进监狱，无数革命者被通缉，著名共产党人杨靖宇就是在这场白色恐怖中被迫离开家乡的。

“清党”反共的同时，冯玉祥又大肆镇压工农运动。省政府成立后，即下令停止一切民众团体活动。1927年11月，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成立，内设农民、商民、青年、工人、妇女等部，以便将工农运动完全纳入国民党的轨道。1928年国民党省指委成立后，特设民众训练委员会、省农协整理委员、省学联会整理委员及省总工会整理委员，各民众团体均已变色，工农领袖多被指为共产党而遭逮捕、驱逐，工贼占据了工会机关，工人、农民稍有反抗便遭屠杀。

冯玉祥为了巩固其在河南的统治，对遍布全省的枪会除部分改编为民团军外，一律勒令解散。11月，河南省民团军总司令部成立。因

① 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237页，郑州，1984。
② 天津《大公报》，1928年2月21日。



当时省内分4个行政区，遂按区编为4个民团军，每军辖3师，每师辖3旅，每旅辖数团。旅长、团长甚至师长多由地方豪绅担任。1928年12月，民团军改组为"人民自卫团"，军、师、旅建制一律取消，悉改称队，因全省划分为14个区，所以编14个区队，各区称区长。1929年5月冯玉祥退出河南后，韩复榘撤销人民自卫团总部及总团长，设河南民团训练处。因14个行政区已经撤销，各区长也相应裁撤，各县民团直属民团训练处。枪会初改为民团军时，部分团、营还保留有枪会的痕迹；再改为人民自卫团，则成了地方治安部队，枪会属性已荡然无存，延续中原地区数年的枪会运动也基本上冰消瓦解。

第二节　新军阀在中原的混战

宁汉合流后，国民党各派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倾轧角逐，形成了以蒋介石（控制中央）、冯玉祥（控制陕甘宁豫鲁）、阎锡山（控制晋冀绥察平津）和李宗仁（控制湘鄂桂）为首并分任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的四派，最后兵戎相见，四战之地的河南成为这些新军阀的主要战场，给河南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祸害。

一、蒋冯和蒋唐战争

（一）蒋冯之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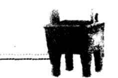
冯玉祥的部队起自西北，陕、甘、宁、青、豫都是贫瘠地区。他同蒋、阎、桂联合伐奉，本希望战后能分一杯羹，待奉军退往关外后，眼看北平、天津将入阎锡山的势力范围，冯心中自然不快。1928年7月蒋介石先后拿出了《军事善后案》和《军事整理案》，主张取消各集团军，划全国为12个军区。时冯部二集团军尚有28万人，分组9个方面军。蒋的提案遭到了冯玉祥等地方实力派的反对。在蒋提出《军事善后案》的当天，冯玉祥即发表《时局通电》，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治理国家的6条意见。8月8日至15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的议案达到了蒋介石整理军事和实施训政的预期目的。会议结束

后，冯玉祥立即返回河南，裁第二集团军之方面军、军及独立师番号，将军整编为师，借以对蒋敷衍。次年1月，全国编遣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成立了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的编遣委员会，规定全国步兵不得超过65个师，步、骑、炮、工兵总额约80万人。3月15日，国民党三全大会开幕，冯玉祥按照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的议案，宣布撤销开封政治分会及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设立第二编遣区。2月，蒋、桂之间为争夺湖南地盘，展开了激烈的争斗。3月26日，蒋介石下达讨伐桂系令，命冯部大将韩复榘，为讨逆军第三路总指挥，率部由南阳、信阳南袭武汉。4月5日，韩复榘部进入湖北。蒋以重金收买韩复榘和进驻襄阳、樊城的石友三，为韩、石埋下了日后叛冯的伏线。

蒋冯之间的矛盾又因山东问题而加深。先是，1928年5月日军制造济南惨案后，蒋介石为拉拢冯玉祥而任命冯部将领孙良诚为山东省政府主席。1929年3月28日，中日签订了解决济案的协定，4月初，冯即遣军队入鲁，准备协助孙良诚接收胶济路。蒋介石不愿这块临海地盘落入冯的势力范围，主张由南京政府统一筹办接防，并派陈调元入驻胶东。5月1日，南京政府以陈调元为山东省主席，吴思豫负责办理济南事宜。蒋冯矛盾更趋激化。

冯玉祥明白与蒋介石的冲突已不可避免，遂令韩复榘部于4月14日北撤时炸毁了武胜关等处的隧道、桥梁。24日，冯玉祥在开封召开高级军事会议，作反蒋军事部署。26日，孙良诚通电辞去山东省政府主席职，率部队退入河南。冯玉祥避居陕西华阴，作幕后指挥。5月15日，冯部将领刘郁芬、孙良诚、韩复榘等推冯玉祥为“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通电反对南京政府。16日，刘郁芬等28名将领发出反蒋铣电，请蒋下野。各军并在平汉、陇海线上连续炸桥毁路。

蒋一面调大军讨冯，一面策动韩复榘、石友三破坏冯的西进计划，复以巨款收买冯部将领叛冯。5月25日，韩复榘、石友三在洛阳发出反冯拥蒋通电，刘镇华、杨虎城、马鸿逵亦通电叛冯。蒋即委韩复榘仍以河南省政府主席兼西北军总指挥，统率驻陕、甘部队；石友三为讨逆军第十三路总指挥，刘镇华为讨逆军第十一路总指挥，马鸿逵为第十五



路总指挥，杨虎城为新编第十四师师长，使冯部不战而损失十万大军。5月23日，国民党中央议决革除冯玉祥中执委、中政委职，永远开除党籍；刘郁芬等冯部将领，免职查办，由国民政府下对冯军的讨伐令。

山西的阎锡山在蒋的诱惑下，于5月23日电冯，约其共同解除兵权，同适异国。冯决定以退为进，发出下野通电。6月25日，冯玉祥到太原，被阎软禁于五台县建安村。7月5日，南京政府取消了对冯的通缉令，第一次蒋冯战争结束。

不久，形势又起了变化。

1929年8月，蒋介石召开编遣实施会议，强行削减各地方实力派的兵力，引起了阎锡山的不安。其时冯玉祥正改变策略，让西北军将领与蒋方接近，蒋亦将薛笃弼、熊斌等请回南京并委以职务。阎锡山急忙改变对冯的态度，在中秋之夜（9月17日）亲到建安村向冯道歉，表示愿和冯共同反蒋。双方商定由西北军率先发动，然后晋军继起。10月9日，宋哲元等西北军将领致电阎、冯，列数蒋介石的罪状，声言反抗。10日，西北军将领宋哲元、刘郁芬、孙良诚等27人又联名发表拥戴阎、冯讨伐蒋介石的通电，列举蒋六大罪状，随即兵分三路进入河南。12日，西北军石敬亭等部抵达洛阳，孙连仲部进抵南阳，内乡、镇平、南阳、邓县均被西北军攻占。

10月11日，蒋介石下讨伐令，称西北军为逆军，决计将其一举荡平。南京国民政府亦下令对宋哲元、石敬亭、鹿钟麟等免职缉拿惩办。16日，蒋介石总司令部发布其任命讨伐西北军的五路总指挥。

10月15日，孙良诚军由洛阳过巩县进抵汜水，唐生智第五路军大部退集郑州。孙良诚部数次向郑州进袭，不克。23日，宋哲元部猛攻郾城、许昌，亦遭南京军顽强抵抗。30日，南京军先后占领临汝、登封、黑石关，逼近洛阳，蒋介石还亲至新郑督师。善于见风使舵的阎锡山，11月5日在太原开讨逆大会，宣誓就任南京所委之陆海空军副司令职，并令赵承绶等军出动逼西北军退却。

10日、15日，南京军对西北军连续发动两次总攻击，空军亦参加作战。西北军纷纷退却，12月初，主力退回陕西。第二次蒋冯战争结束。

（二）蒋唐战争

唐生智在第二次蒋冯战争中与蒋合作，只是相互利用，暗中却组织反蒋力量。此时国民党内的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等亦在计划军事倒蒋，组成“护党救国军”，分别任张发奎、李宗仁为第三、第八路总司令。叛冯投蒋的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等，都有寄人篱下之感，有反蒋心理，尤其石友三因蒋没有满足其欲望，便转而投向汪精卫。孙殿英、徐源泉等直鲁军旧部对蒋亦有不满情绪。唐生智见时机成熟，遂联合石友三共同反蒋，二人分别被改组派委任为“护党救国军”第四、第五路总司令。12月2日，唐生智、徐源泉等75人联名在郑州发表冬电，指责蒋介石制造内战，主张立息内争，一致对外，否则即视为全国公敌。5日，唐通电就任护党救国军第四路总司令职，迁总部于漯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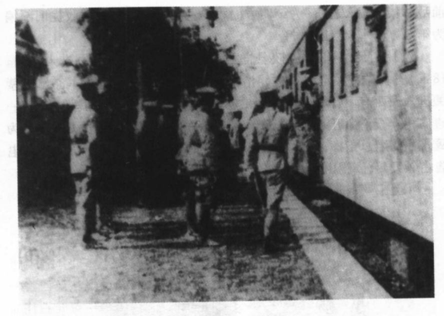
12月7日，南京政府下令撤销唐生智本兼各职，并对拥汪各部进行策反。8日，原受唐生智拉拢的杨杰、王金钰、徐源泉等驻豫西将领13人，转而通电讨唐，并集中于洛阳，向唐部进攻。11日，蒋介石任命杨杰为总指挥，令其率豫西各军进攻唐生智。韩复榘、马鸿逵等，亦转而拥蒋讨唐。

15日，刘峙之第二路军已集中信阳，向许昌推进。同日，洛阳方面讨唐各师从黑石关攻郑州。20日，阎锡山、张学良等通电拥护国民党中央，晋军出动参加讨唐。22日，刘峙下总攻击令，1930年1月3日，刘峙部在豫中大败唐军，唐军纷纷向汝南、上蔡、遂平溃退。6日，唐生智表示愿将所部军队暂交刘兴带领，本人遵劝出洋。13日，刘兴、龚浩率唐军残部万余人，在漯河、西平间之姚庄、万庄被缴械。

二、蒋、阎、冯中原大战

南方两次蒋桂之战及中原地区的两次蒋冯之战和蒋唐战争，战胜者虽然都是蒋介石，但他不仅未能解决新军阀之间的矛盾，相反却伏下了更大的危机，最后导致了一场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中原大战。

在历次新军阀混战中始终没有受到损失的阎锡山，深知蒋介石在消灭其他派系之后，会把矛头指向自己，因此决定主动反蒋。1930年1



蒋介石讨唐部队开赴前线

月，他提出“整个的党，统一的国”的主张，攻击蒋的施政方针，2 月又致电蒋介石，要他“礼让为国”，并表示愿与蒋同时下野。20 日，阎又进一步提出每个实力派都必须把武力一齐“交还于党，再行编遣”，否则编遣问题将“窒碍难行”。于是，一些反蒋派别纷纷同他联络，通过各种方式，表示赞同阎的主张。蒋介石对阎锡山的行为极为震怒，一面通电警告，一面调兵遣将，以武力震慑。3 月初，驻豫各部向郑州晋军逼近，晋军孙楚部退出豫北，收缩至邯郸。

3 月 14 日，冯玉祥召集西北军高级将领会议，宣布联阎反蒋。15 日，鹿钟麟、商震、黄绍竑等西北军、晋军、桂军高级将领 57 人联名通电，拥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为副总司令。石友三、万选才、孙殿英、刘春荣等都发出通电，声明服从冯玉祥的指挥。各方共同组成反蒋联军（称“中华民国军”），桂张联军为第一方面军，李宗仁兼总司令；西北军为第二方面军，冯玉祥兼总司令，鹿钟麟为前敌总指挥；晋军为第三方面军，阎锡山兼总司令，徐永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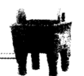
前敌总指挥；石友三部为第四方面军，石为总司令；樊钟秀收拢旧部编为第八方面军，樊任总司令。

3月17日，冯玉祥在陕县向西北军下达动员令，各军进入河南。18日，孙良诚部兵不血刃占领洛阳，再向郑州推进。南路军亦出荆紫关进入豫西南。晋军也按计划出动。主豫的韩复榘一边率部东退，一边向蒋介石请命开赴山东抵御津浦路晋军。南京政府遂特派韩复榘为冀鲁豫剿匪总指挥，韩即率部由豫东开赴鲁西。3月30日，万选才电告占领开封，阎锡山任万为河南省政府主席。



冯玉祥部炮兵开赴河南讨蒋前线

4月1日，阎锡山通电就"中华民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职，李宗仁、冯玉祥就副总司令职。4月23日，冯玉祥在洛阳以中华民国军副总司令名义，向反蒋各军颁发作战命令。西北军、晋军分数路投入河南战场。接着，蒋介石正式编组讨逆军：以韩复榘为第一军团总指挥，率部阻止晋军沿津浦路南下；以刘峙为第二军团总指挥，指挥蒋军嫡系在陇海线（豫东）作战；第三军团总指挥何成浚，该部大多为湖北、河南的



杂牌部队组成，主要担任平汉线作战。以陈调元为预备军团总指挥。参战军合计约50万人。5月11日，中央军第二军团总指挥刘峙，集中数万人马，向豫东联军阵线发起全线攻击，蒋介石亲赴商丘督战，中央军进占商丘，战线西移至宁陵、兰封一线。接着，处于联军右翼的刘茂恩倒戈，在宁陵劫持了晋军第六路军总指挥万选才，原属刘部防守的宁陵、睢县一线亦入中央军之手。双方军队多日激战于兰封、考城(即今兰考县)、民权、睢县一线。冯玉祥把集结于郑州、开封一带的预备队提前投入了战场，阎锡山亦把在石家庄之杨耀芳等部调到了陇海线。26日，西北军发起全线反击，此后两军相持于睢县、太康、杞县间，阵地几度易手。

8月上旬，陇海线西北军为策应山东战场上的晋军，牵制蒋介石对津浦路的进攻，在虞城、夏邑、归德、宁陵向中央军发起“八月攻势”。由于此时在山东战场上中央军攻下济南，津浦路上的阎锡山军受挫，蒋介石得以抽调兵力投入陇海路战场，联军“八月攻势”因此受阻。18日，蒋介石下令对陇海、平汉两线联军发起全线进攻。形势急转直下，阎锡山、冯玉祥均开始收缩战线。

在平汉战场，联军的主力是第八方面军樊钟秀部和由荆紫关入豫的西北军张维玺部。5月16日，中央军第三军团总指挥何成浚下达总攻击令，命各部沿平汉路向北进攻，随之占领小商桥、临颍。6月4日，联军第八方面军总司令樊钟秀在许昌南门被中央军飞机投弹炸死，建国豫军作为一个独立的军事集团不再存在。冯玉祥为了稳住平汉战场，亲赴许昌前线视察，并派孙连仲率部驰赴许昌增援，阎锡山亦派骑兵司令赵承绶率部进攻周口。10日，西北军向中央军发起全线进攻，激战两昼夜，中央军纷纷向漯河以南溃退。冯玉祥随即将孙连仲、张自忠等部东调，令张维玺所率各部暂停追击，两军相持于漯河一线。阎、冯联军“八月攻势”失败后，再也难以组织有效的反攻。由津浦路转到陇海路战场的中央军集中主力于淮阳、周口展开攻击，并同平汉路第三军团取得联络。9月8日，豫东中央军主力绕过柘城，转向平汉线作战。陇海路由顾祝同任总指挥，率9个师，分左、右两路西进，以开封、

郑州为目标。平汉路中央军亦分左、右两路推进，以洛阳、开封、郑州为目标。在山东作战的石友三，见联军不利，全军退往豫北，并向蒋介石输诚，致使冯军侧后受到中央军的威胁。9 月 17 日，杨虎城部攻占龙门，直接进逼洛阳，切断了西北军的退路，同时，右翼军在重炮、飞机、铁甲车的掩护配合下，向临颍、许昌发起了猛烈攻势，双方展开了前所未有之激战。西北军阵地终被摧毁，放弃临颍后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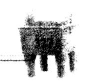
手握重兵对战局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东北军首领张学良，静观时变数十天，经蒋介石派人与其幕后交易，逐渐倒向南京一边。18 日，张学良发出拥蒋通电，随即挥师入关。局势对联军更为不利。阎锡山为保存实力，遂密令在德州之张荫梧、在兰封的孙楚等部，迅速撤退至大名、石家庄、新乡一带，致使西北军来不及部署，几百里战线暴露在中央军面前。

蒋介石乘势对西北军将领进行收买、分化。27 日，西北军骁将吉鸿昌在张钫的策动下率三师之众倒戈投蒋。接着，骑兵师师长张占魁投蒋。10 月 1 日，焦文典、宋天才两部投蒋，并软禁了联军第八方面军总司令邓宝珊，使联军张维玺、冯治安、田金凯、任应岐等部旋即在新郑一带陷于中央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中央军遂长驱北进，4 日，平汉、陇海前线的西北军都纷纷败回郑州。保护洛阳至潼关段交通安全的宋哲元部两个师退往山西运城。西北军西撤退路已断，冯玉祥、鹿钟麟只好指挥各部退往黄河北岸。11 日，西北军张维玺部 7 个师 6 万余人在新郑被围缴械。

冯玉祥、阎锡山无力再战，遂于 10 月 5 日致电张学良，表示愿意和平解决争端。8 日，阎、冯在太原决定下野。随后，西北军将领鹿钟麟、刘郁芬、宋哲元等随冯玉祥下野，该部或溃散，或被蒋介石、张学良改编，冯玉祥惨淡经营了 20 余年的西北军遂告完全瓦解。

三、新军阀混战给中原人民造成的灾难

发生在 1929 年、1930 年的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不但耗资巨大，而且给经济、社会造成了严重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极大损失。中原大战中河南人民“因战事死亡人口达 12 万余口，受伤人口 19 500 余



口，逃亡在外者达1 185 000余口，被军队拉夫达1 297 700余口，其中因以致死3万余口，而士兵之死亡尚不在内"①。另外，据蒋介石说，中原大战双方兵员伤亡在30万人左右。其中多数是河南壮丁。1929年省境45县沦为战区，"各县所受的兵灾损失平均占农产常年产值20.4%"②。中原大战更给河南人民造成空前灾难，据商丘、郏县、柘城三县统计，7个月中，共出兵差456万元，相当于该三县全年田赋总额的40倍。全省有兰封、考城、临颍、许昌等27县沦为战区，58县遭受兵灾，军队在各县派征款项4 041.5万余元，征发粮草合洋4 850.5万元，征发车辆、牲畜合洋4 484.4万元，财产损失估洋48 533万元，破坏房屋损失值洋52万余元，被焚房屋估计3 185万余元，以上共合65 146万余元，间接和无形的损失尚不在内。就是不属战区，不临陇海、平汉线的县份，如修武，自战事发生之后，迭经大兵过境，派款、征兵、拉夫、派车、派麦等项合计近70万元，地丁、附加军事捐70余万元；还有富户捐、商家捐等，计40余万；联军败后，晋军过境，又沿途强索牲畜，抢掠财物，以致人民逃亡，村落一空。继则西北军残兵败卒退往豫北，自县城到焦作，沿道清路左右村庄，几乎无村无兵，"虽一斤二斤秕糠，亦采供军用"，留给人民的只有饥饿和死亡。新军阀混战给河南人民带来的灾难，无一县能够幸免！战争使无数农民破产，社会更加动乱，各地绿林武装蜂起。如新安，1929年5月第一次蒋冯战争之后，四境土匪蜂起，时称"新安土匪48杆"，全县几无净土！渑池、宜阳、洛宁等县的杆伙也联翩进入新安，或攻掠村寨，或逼攻县城，有的盘踞数十个村庄，人民深受其害。9月初，豫西绿林武装联络30余杆，约4 000人，自新安狂口渡过黄河，进入济源西乡，南至长水，北达王屋、邵原，长约25公里，宽20余公里，所有村庄，尽遭烧掠，邵原镇民房3 000余间，全被焚毁。统计被掠牛马3 400余头，猪羊6 700余头，死伤民众5 860余人，财产损失百万元以上。杆子盘踞13日，始徐行南去，带去肉票3 400

① 河南省赈务会：《豫灾纪实》叙言，民国刊本1931。

② 《新创造》第2卷，第1、2期合刊，第237页，1932。

余口。其他县份，匪祸也重新炽烈。人民流离失所，农业生产遭到破坏。战争使大片良田荒芜。尤其是豫东扶沟、太康等县，“战沟纵横，农田悉被掘坏……过其地，但见瓦砾堆积，墙壁残留，不见炊烟，徒闻腥血”①。战区被掘坏的农田20万—30万公顷，麦、秋被毁60多万公顷。战争结束之后，各地十室九空，众多农民连家都安不下来，更谈不到生产；再者战区遍地壕沟，回填需用大量人力，否则田地无法耕种。还有畜力和工具奇缺，稍有存者，“所有车辆非缺一轮，即缺一轴，不能行驶”②，也给恢复生产带来极大困难。“灵宝灾劫重，人民死的凶。有房无人住，有路无人行。美女无人要，良田无人耕。可怜繁华地，变成万人坑！”③这首传唱在灵宝的顺口溜，形象地道出了新军阀混战给河南人民带来的劫难。

第三节 鄂豫皖苏区的革命斗争

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一）中共领导的各地武装暴动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9月初，八七会议精神传达到河南，河南省委完全接受中央精神，决定以此发展工农运动。9月下旬制定了《河南目前政治与暴动工作大纲决议案》和《各县暴动工作计划》，要求各地在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做暴动的准备，并将全省划为4个暴动区域，除豫东区归省委直接领导外，成立了中共豫南、豫北、豫西3个特别委员会，指导本区的暴动工作。各地党组织按照省委的决定，积极进行暴动前的准备工作，自1927年秋到1928年夏，先后组织

① 上海《申报》，1930年11月19日。
② 《时报》，1930年11月19日。
③ 天津《大公报》，1930年3月3日。



了数十次武装起义。

1. 确山刘店起义。确山是大革命时期中共组织比较健全、农民运动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党的领导人李鸣岐、马尚德（杨靖宇）、张家铎等仍然活动在刘店地区。省委在制定暴动计划时，决定豫南区以确山为中心，并派省委军委书记胡健到该地指导暴动。中共豫南特委在驻马店设办事处，决定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县东刘店举行暴动。11 月 1 日凌晨，李鸣岐、马尚德等带领 60 余名暴动队员包围了劣绅李光化驻扎刘店的一个班，缴获长短枪 10 余枝。11 月 3 日，中共驻马店办事处在刘店召开确山农民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确山县革命委员会。起义队伍编为农民革命军，马尚德任总指挥，李鸣岐任党代表，张耀昶任大队长。农民革命军在刘店一带发动群众，镇压土豪劣绅，开仓分粮。

刘店起义的消息震惊了当局。确山县长高子元联合当地驻军及民团、反动枪会等武装，先后两次对农民革命军进行镇压。11 月 29 日王楼战斗中，由于众寡悬殊，农民革命军在毙伤敌 20 余人后，撤出战斗，向小乐山转移。中共豫南特委书记王克新负伤后牺牲，马尚德、张家铎因伤离队。确山农民革命军在党代表李鸣岐带领下，12 月中旬南下信阳，与四望山农民军会师。

2. 信阳四望山农民暴动。四望山位于信阳西南约 45 公里处。冯家庄劣绅张显卿凭借掌握的 20 多人枪，占据祖师顶山寨，任意宰割周围百姓，激起民愤。1927 年 7 月，黄修允等枪会群众数十人，智取山寨，杀死张显卿等，收缴了寨上两班团丁的枪械。张的妻弟陈少谟纠集反动枪会到四望山肆行烧杀，数百户难民无家可归。中共豫南特委派中共党员王伯鲁等上山，改造和掌握这支农民武装。11 月下旬，百余名农军在王伯鲁、张志刚等带领下，一举攻下了反动豪绅的堡垒杨家寨，没收豪绅的财产分给穷人。与此同时，中共长台关区委集合 10 余人袭击彭家湾车站民团，夺取长枪 10 余枝，组成一支农军，由范易等率领占据祖师顶西北婆婆寨，与祖师顶、杨家寨互为犄角，展开了四望山红色游击战争。

12月中旬，确山农民革命军与四望山农军会师。两支农军编为两个中队，计200余人。在中共豫南特委的领导下，奇袭彭家湾，强攻信阳北关，伏击冯家庄，连战皆捷，声威大振。1928年1月15日，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周以栗在冯家庄召开信、确等县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决定建立临时革命政权——豫南革命委员会，将信、确农军合并为“豫南工农革命军”。在革命斗争声势的影响下，信阳游河、长台关、平昌关等地农民纷纷暴动，夺取民团枪支，镇压土豪劣绅，开仓分粮。豫南工农革命军在各地农民的配合下，横扫王岗、杨柳河、骆驼店等10余个村镇的反对势力，四望山游击区扩展到纵横百余里。

2月3日，豫南民团军旅长熊绘幽率信阳、罗山民团1 800余人，在国民党军方振武部1个团配合下，分三路向四望山进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豫南工农革命军经数日英勇阻击，2月7日四望山失守，革命军分路突围，部分被建国豫军收编，多数走散。

3. 中共河南各地组织还在许昌司堂、潢川大荒坡、息县周荒坡、汝南高平寺、汝南白塔寺、汝南水屯等地组织过20多次农民暴动和兵变。这些暴动虽然大多失败，但它锻炼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认识到农村蕴藏着革命的潜力，从而投身到农民当中。同时这些起义在农民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并为后来鄂豫皖、鄂豫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初步基础。

（二）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1927年11月，湖北黄安、麻城[①]的革命群众在中共鄂东特委的领导下，按照党的八七会议决议举行起义并攻下黄安县城，后起义武装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该军在鄂豫边境的游击战争中，曾多次在柴山保留住。柴山保位于光山南部山区，距县城50多公里，国民党的统治比较薄弱；南边与黄安革命老区七里坪和紫云区相连，相对弱小的革命武装在这里比较适宜生存与发展。

1928年6月2日，第七军领导人和地方党的领导人吴光浩、曹学

① 黄、麻北部的箭厂河、田铺等区今属河南省新县。



楷等在清水塘(属柴山保)举行会议,决定在恢复老区工作的同时,开辟柴山保地区的工作,以便创造一个比较稳定的立足点,作为对敌斗争的依托。会后,第七军即进驻柴山保。6月5日,国民党第十八军驻黄安长冲的一个连,向第七军驻地柴山保河南湾进袭。第七军仅有30多人,向敌反击,敌军仓皇溃逃。这次战斗打响了开辟柴山保根据地的第一枪。7月14日,敌第十八军驻黄安来家河的一个连73人携枪哗变投诚,工农革命军对他们热烈欢迎,争取了30多人参加革命军。

7月下旬,第七军在柴山保的尹家嘴召开会议,根据上级指示,宣布改编第七军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吴光浩任军长兼师长,戴克敏任党代表,曹学楷任参谋长。全师约120人,分编为4个大队。会议决定组建群众武装,成立赤卫军、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发展游击战争。同时决定在光山南部设弦东[①](新集、代嘴一带)、弦西(卡房一带)、弦南(郭家河、柴山保一带)3个区委,并准备成立县委;在边缘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领导群众抗捐、抗税、抗租、抗课、抗债斗争。这次会议对于加强部队建设,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鄂豫边革命根据地起了重大作用。

1929年5月初,红十一军军长兼第三十一师师长吴光浩,带10余人枪到商城帮助发动起义,途经罗田滕家保时,遭到民团袭击,吴光浩不幸牺牲。中央为了加强对鄂豫边红军的领导,派徐向前来红三十一师担任领导工作。在徐向前的具体指挥下,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会剿"。

1929年5月第一次蒋冯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当局即组织对鄂豫边区的红军进行第一次"会剿"。这次"会剿"的主力是国民党军驻黄安独立第四旅罗霖部两个团,和驻潢川、光山暂编第二旅李克邦部1个营等,故称"罗李会剿"。6月26日,南北之敌同时出动,罗霖部凭借优势,很快侵入了七里、紫云等区,北路之敌也侵入柴山保。敌军所过之

---

① 光山为古弦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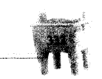
处“尽量烧毁房屋，捆载食粮”[①]，十余万农民扶老携幼避入山林。边区军民在徐向前指挥下，采取避实击虚的方针，集中主力对战斗力较弱的李克邦部进行反击。根据地群众手持刀矛、土枪参加作战者达三四千人，红军与群众同敌连续五战，打死敌营长以下百余人，缴枪40余枝，北部进犯之敌溃退，南路之敌在群众袭扰下也疲困不堪，不两日即黯然退走，“罗李会剿”被粉碎。

8月中旬，国民党军第一师师长刘峙组织鄂、豫两省部分驻军对鄂豫边、豫东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会剿”，故称“鄂豫会剿”。8月10日，国民党军第十三师夏斗寅等部在民团的配合下，向豫东南根据地进攻。红三十二师抗击后，转入外线作战。南线敌军亦进至箭厂河、郭家河、白沙关（今均属新县）等地。25日，红三十一师配合赤卫队在白沙关等处歼敌后，转入外线作战，在光山八字门楼与红三十二师会师。侵入根据地的敌军在群众袭扰下处处受困，一筹莫展，不得不在9月下旬各自收缩退回原驻地，“会剿”又告破产。

10月初，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边区发动了第三次“会剿”，参加的国民党军队为驻信阳之第四十八师徐源泉部和驻鄂北之第十三师夏斗寅部，故称“徐夏会剿”。10月7日，徐、夏两部均已出动，红三十一师也做好了迎战准备。正在这时，第二次蒋冯战争爆发，蒋介石不得不将徐源泉部调回信阳，夏斗寅部调往平汉线，“会剿”自动破产。红三十一师经过三次反“会剿”，壮大了自己，部队发展到700多人，600多条枪。

1929年9月24日，中共中央为统一鄂豫边、豫东南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决定将商城、光山、罗山、黄安、麻城、黄陂、罗田、黄冈八县，划为鄂豫边特区，改组鄂东北特委为鄂豫边特委。11月20日至12月2日，中共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光山南部胡子石召开，大会选举徐朋人等9人为正式委员，徐朋人为书记。大会通过了政治任务、组织问题、苏维埃问题等决议案。12月27日至29日，鄂豫边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柴山保细吴家召开，大会讨论了各种决议案、草案等，通过

① 中央档案馆等：《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87页，1985。



了《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政纲》及《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政纲实施细则》，选举产生了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曹学楷、徐向前、吴焕先等15人当选为正式执委，曹学楷任主席。这样，根据地党、红军和政权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标志着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三）豫东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商城起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商城的农民运动就比较活跃，大革命失败后，这里的共产党员仍然坚持着斗争。1927年11月，中共商城县委成立，1928年2月，县委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指示，成立了中共商城南邑区委（亦称商南区委），准备组织起义。5月，南邑区委在太平山召开会议，决定在发动农民开展抗租、抗债、抗捐、抗税斗争的同时，派共产党员周维炯、廖业琪等打人民团内部，以团结、教育贫苦团丁，秘密发展党的组织，瓦解反动武装，壮大革命力量。随后，周维炯、漆德玮等均打人民团并发展党员，到1929年2月，商城县共有中共党员373人，农民协会会员400余人。

正当各项工作准备就绪，起义待举之际，中共豫东南特委和商城县委先后遭到破坏。3月13日，豫东南特委和鄂东北特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商南党组织暂归鄂东北特委领导。会后，鄂东北特委遂把商城南部、罗田北部、麻城东部划为特别区，并成立中共商罗麻特别区委，派徐子清任书记，加紧了商南起义的准备工作。5月2日，中共商罗麻特别区委在太平山穿石庙召开会议，决定于5月6日（立夏节）举行起义，由徐子清、肖方负责总的指挥，周维炯、徐其虚负责军事，廖炳国负责联络。6日，杨晋阶民团驻丁家埠的一个中队，正轮到周维炯任值日班长，他利用晚上民团过立夏节举行会餐之机，让分散在各桌的共产党员将队副张瑞生和一些不可靠的团丁灌得烂醉如泥。周维炯见时机已到，一声令下，党员和兄弟会成员一齐动手收缴了全部枪支。周维炯集合全体团丁讲话，宣布起义，号召团丁跟着闹革命。大多数团丁自愿留了下来。周维炯派一部分起义队伍当夜赶往汤家汇乾塘坳杨晋阶的家里，取出10多枝长枪，处决了当地的清乡委员。

5月6日晚，商南各地的农民起义都取得了胜利。肖方等在李家

集消灭民团一个班，缴枪6枝；徐其虚、郑延青消灭了郑其玉部驻福禄庵民团，得枪10多枝；廖业琪等包围了柯寿恒部驻吴家店竹叶庵的民团，17名团丁起义，缴获枪17枝；南溪（今属金寨）、包畈、西河桥、牛食畈等地也举行了农民起义。

5月9日，各地起义队伍集中到斑竹园，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周维炯任师长，徐其虚任党代表，漆海峰任参谋长。下设第九十七、第九十八两个团，肖方、郑延青分任团长。全师共100余人。中共商罗麻特别区委决定在南溪黄鹤湾成立办事处，行使政府职能，徐其虚为办事处主任。此后在南溪林氏祠堂成立了学兵团，还建立了军需处、红军医院、兵工厂等，开始了创建豫东南根据地的斗争。

红三十二师建立后，即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下旬东进皖西，有力地支援了皖西金家寨、七邻湾地区的武装起义。


红三十二师师长周维炯

经过两个多月的斗争，在豫东南初步形成了以南溪、吴家店为中心，纵横30余公里的革命根据地，红三十二师也不断壮大，8月间已达300余人，赤卫队发展到四五千人。

10月初，商城县工农革命委员会在南溪林氏祠堂成立，主席廖炳国。以后又在吴家店、麻河、余子店、苏仙石成立了4个区苏维埃政府和数十个乡苏维埃政府，并开始分配土地。豫东南已开始形成了一块纵横50多公里的红色区域。11月，红三十二师东进皖西，配合当地农民举行了六（安）霍（山）起义，起义胜利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师，开创了皖西革命根据地。此后鄂豫皖边区三支红军和三块根据地互相配合，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斗争。

12月，中共中央任命刘英为红三十二师师长、李荣桂为政治部主



任，原师长周维炯改为第一〇一团团长。24日夜，红三十二师各团由余子店出发奇袭商城，25日拂晓突入城内，经过激烈战斗，守城的红枪会土崩瓦解，守卫县政府的民团被迫缴械投降。蚁集在城内的豪绅地主200余人也被一网打尽。红军进城便宣布宗旨，布告安民，城内秩序安定，群众燃放鞭炮，敲锣打鼓欢迎红军。27日，商城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全城张灯结彩，大街小巷贴满了标语，四乡农民抬着慰问品，聚集到大操场，载歌载舞，庆祝胜利。

（四）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1929年，国民党新军阀连续发生了几次混战，给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良机。鄂豫皖边界地区的红三十一师、三十二师、三十三师得以建立和发展，三块根据地迅猛扩大。1930年春，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革命根据地的总面积已达1.5万余平方公里，人口逾百万，三支红军的军政素质都有提高，边界地区的革命斗争日益高涨。193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致信中共湖北省委、河南省委和安徽六安中心县委，决定将湖北省的黄安、麻城、黄陂、黄冈、孝感、罗田，河南省的商城、光山、固始、潢川，安徽省的六安、霍山、英山、霍丘、颍水、寿县、合肥等县划为鄂豫皖边特别区，成立中共鄂豫皖边特别区委员会，由湖北省委领导。3月17日，中共中央致信湖北省委，指定郭树勋（述申）、何玉林等为常委，郭树勋为书记。3月22日，中共中央指示鄂豫皖边特委，决定特区增加罗山、应山、安陆等县，特委在湖北省委指挥下与河南省委发生横的关系。

3月上旬，郭树勋、许继慎、曹大骏、熊受暄等相继到达鄂豫皖边区。20日，中共鄂豫皖边区代表大会在箭厂河（今属新县）召开。会上依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正式组成了中共鄂豫皖边特别区委员会，郭树勋任书记，鄂豫皖边界实现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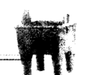
193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在决定建立中共鄂豫皖边特委的同时，决定统一对边界三支红军的指挥。决定将三个师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中共鄂豫皖边特委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通过了红军改编的决议，成立了红一军前敌委员会和军部：红一军军长许继慎、政治

委员曹大骏、副军长徐向前、政治部主任熊受暄。前敌委员会由曹大骏任书记。红军三个师进行了改编，红三十一师、三十二师、三十三师分别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师，另成立了1个独立旅，全军共2 100多人。鄂豫皖边区红军的整编标志着鄂豫皖边界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红一军整编完成时，正值蒋、阎、冯新军阀混战开始。红一军领导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指挥全军主动向外出击。7月初，军部率第二、第三两师由皖西南下作战，取得英山、霍山两次作战的胜利，缴获大量枪支，部队得到了锻炼和发展，红二师扩大到1 200余人枪，红三师达400余人枪。红一师在副军长兼师长徐向前的指挥下，向平汉线南段连续出击作战，歼敌数千，攻克了云梦、花园等重要城镇，部队三次扩编，全师编成两个步兵团，1个机炮混成团，共约3 000人。全军出击作战，不但部队战斗力显著提高，人数增加，根据地也进一步扩大。

1930年夏，随着全国红军的胜利和革命力量的增长，党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中央，认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面前，各地要组织政治罢工，扩大到总同盟罢工，准备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根据中央的计划，给予鄂豫皖边区党和红军的任务是，发动起义来配合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发展方向是切断平汉路以进迫武汉。9月中旬，红一军集中主力出击平汉线，强攻广水未克。22日夜，向信阳发起进攻，攻占了信阳火车站后山及火车站，歼灭守敌一个多营。23日拂晓，国民党军援兵由南、北两面赶来，以猛烈炮火向红军袭击。红军撤出战斗，向东转移。两次战斗给红军造成了不小伤亡。此时在皖西的地方武装也遭到很大损失，皖西根据地大部分丧失。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批评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鄂豫皖边特委发出了《党务、政治、军事的综合指示》，指示鄂豫皖边的任务是加强红军，巩固红军，巩固根据地的发展，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搞好各级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央还决定把蕲春、黄



梅、广济划入鄂豫皖边区，并将该区“划为全国六大根据地之一”，置于“苏区中央局指挥系统下”①，派曾中生到鄂豫皖苏区任特委书记。11月底，曾中生到达鄂豫皖后，传达了中央的上述指示，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得到纠正，鄂豫皖党、团、工会恢复了正常生活。

红一军攻打信阳不利，遂北上作战，在当地党组织的配合下，袭占正阳陡沟镇，陡沟暴动队员400多人编入红军。10月初，红军由陡沟东进经息县南渡淮河，兵分两路，左路由副军长徐向前率第一师，在潢川北门外歼敌1个营，尔后西进与第二、第三师会合。军长许继慎率第二、第三师于10月4日渡过淮河后，攻克光山，6日，红军召开各界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光山县革命委员会，黄介人任主席；县工会和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也相继成立。

10月中旬，红一军在光山县城召开了全军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就加强党的领导和思想、组织建设，反对不良倾向，整顿纪律等问题作出了有关决议。会议决定将部队统一整编，各级干部也进行了调整，整编后全军3个师，连同在正阳成立的随营干部学校共计6 000余人。部队装备除步枪已配齐全外，并有迫击炮13门、机枪10余挺、冲锋枪60余枝。光山会议还改选了红一军前敌委员会。这一次党代会和红军整编，加强了党对鄂豫皖边区红军的绝对领导，基本上统一了编制和制度，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批判了不良倾向，增强了红军内部的团结。

16日，红一军离开光山，在罗山城内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一举攻破该县城。17日，罗山县革命委员会成立。

1930年4月到10月，鄂豫皖红军利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时机，出击作战，红军和根据地都有很大发展，为以后更大规模的斗争创造了条件。

二、苏区各项建设全面开展

(一)共产党组织建设及鄂豫皖分局成立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等人实际

① 中共中央给鄂豫皖边特委《党务、政治、军事的综合指示》，1930年10月1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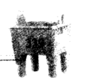
上掌握了党中央的领导权。15 日，中共中央成立苏区中央局，并决定在各较大苏区设立中央分局。3 月 10 日，中共中央通过了成立鄂豫皖分局的决议案，决定由中央分局直接领导鄂豫皖地区的土地革命，"在这一苏区未与江西苏区打通以前，直隶于中央政治局，其职权代表中央而高于省委"。"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后，原鄂豫皖边特委应即取消。鄂豫皖中央分局应经过党团领导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工作，在政府下组织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直接交中央分局指导。"①王明以中央名义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贯彻其"左"倾冒险主义，对当地党的组织进行所谓"改造"。3 月下旬和 4 月中旬，沈泽民、张国焘、陈昌浩等受中共中央派遣，先后到达鄂豫皖苏区。5 月 12 日，张国焘在新集召开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宣布撤销中共鄂豫皖特委，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和新的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旷继勋任军委副主席，徐向前等任军委委员。

6 月 28 日至 30 日，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新集召开，会议通过了《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政治决议案》等文件，决定由张国焘等 7 人组成分局常委会，同时成立了党的监察委员会。会议在张国焘的主持下，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夸大李立三错误对苏区的危害，对鄂豫皖特委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所取得的成绩一概予以否定，对曾中生等到达鄂豫皖后的工作，认为只是"局部上有些转变"，但"整个路线上的转变依然不能看见，反而掩盖了立三路线的实质"②。会议的这些估计和决议，标志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鄂豫皖苏区全面推行的开始。

1931 年 5 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省委，强调省委必须是召开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同时指定沈泽民任省委书记。1932 年 1 月

①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辑，第 186、187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② 中央档案馆等:《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1，第 89—90 页，1985。



10至20日，中共鄂豫皖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新集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鄂豫皖省委和省监察委员会，省委由沈泽民、周纯全、高敬亭等7人组成常委，沈泽民任书记。省委下设豫东南等3个特委，豫东南特委辖光山、罗山、赤城、赤南、固始、息县6个县委、59个区委。

（二）政权建设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在各地建立的革命根据地称苏维埃区域，根据地内成立的革命政权称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是俄文音译，意为会议或代表会议。各级苏维埃政权都是由同级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代表大会分特区、县、区、乡四级，各级代表大会是本级的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大会选举执行委员会，为大会休会期间的最高权力机关。由执委选举主席团即苏维埃政府成员，为执委休会期间的最高权力机关。还在1929年12月27日，鄂豫边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就曾在柴山保地区的细吴家（今属新县）召开，选举成立了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曹学楷任主席；通过了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政纲。1930年6月下旬，鄂豫皖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光山南部王湾（今属新县）召开，选举成立了鄂豫皖边工农民主政府，主席甘元景。1931年7月，鄂豫皖区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新集召开，讨论了强化苏维埃各级组织、重新分配土地、解决粮食困难等问题，大会通过了《苏维埃临时组织大纲》等决议案，大会选举成立了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高敬亭任主席。特区苏维埃政府下设人民委员会，为执行日常工作的政权机关，王平章任委员长。人民委员会之下设外交、军事、交通、财政经济等11个工作委员会，分管各项工作。

豫东南地区苏维埃政权建立较早的是光山南部地区，1929年8月先后在胡子石等处建立了9个乡苏及弦南区苏，8月下旬，光山县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到1932年6月，该县先后建立了弦南、殷家棚、白雀、新集等18个区苏、4个市苏，共辖乡苏197个。县、区、乡苏维埃政府不设人民委员会，由本级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并经上级政府批准之苏维埃政府负责处理日常工作。

为了同苏维埃政府机关中的官僚化倾向作斗争，并监督苏维埃的

工作，特区设有各级检查、监督和建议机关——工农监察委员会。该委员会同苏维埃政府一样由工农兵代表选举产生，各级监委会与同级苏维埃是平行机关，有自己独立的组织系统。

鄂豫皖区在政权建设方面实行的代表大会、苏维埃政府和监察委员会三权分立制，勾勒出了一套新型的国家机器框架，是建设新中国的一种尝试，对苏区各项建设的全面开展，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三）土地革命

1927 年党的八七会议制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1928 年夏，工农革命军开辟柴山保时，即作出了普遍实行没收地主、反动派的土地财产规定。1929 年 5 月底，鄂东北特委与红三十一师师委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了《临时土地政纲》，就没收土地的范围和分配办法作出了规定，在这个政纲的指引下，苏区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分配土地高潮。当年年底，鄂豫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总结了土地革命的经验之后，制定了《土地政纲实施细则》。《细则》规定了土地的没收范围、分配范围和分配标准，同时还规定在没收和分配土地时不得侵犯自耕农的利益、分得土地的农民要发给土地使用证等。

豫东南地区当年分配土地较早的是光山柴山保，开始于 1929 年夏，大部分地区是在 1930 年春、夏展开。其中新县有 10 个区 64 个乡 19.77 万人参加分配土地，共分田 13 514.7 公顷；商城有 103 个乡 121 622人参加分田，共分田 15 302 公顷。土地革命的开展，改变了这一地区数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第一次获得了土地，成了土地的主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同时也激发了革命热情，自动掀起了拥军、参军、参政的热潮。

（四）群团建设

共青团组织建设。1929 年年底，鄂豫边第一次团代表大会在黄谷畈（今属新县）举行，会议选举成立了少共[①]鄂豫边特委。到 1930 年

---

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共青团是第三国际领导的“少年共产国际”的成员，因而共青团简称为“少共”。



夏，商城、潢川、固始等团县委先后成立，各区、乡、村建立了支部和小组。1931 年 5 月，鄂豫皖团中央分局成立，下辖皖西北、商光边两个特委及两个中心县委，团员人数达 15 427 人。1932 年 3 月，鄂豫皖第一次团代会召开，成立了少共鄂豫皖省委。团的任务一是动员和组织青年参军参战，二是站岗放哨，参加各项建设，在地方武装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等方面都有青年积极参与，从而为苏区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少年先锋队和儿童团。少年先锋队是苏区党、团领导下的群众性青年武装组织，1929 年已经成立。1931 年 8 月，特区少先队代表大会在新集召开，选举成立了特区少先队总指挥部，各县设有大队部，区有中队部，乡有小队部。少先队平时除了参加生产外，军事训练是一项重要任务，有时还需要配合红军与赤卫队作战。童子团是一种少年儿童组织，8 至 15 岁之间的雇农、贫农、中农的子弟均可参加。1931 年 9 月特区童子团总指挥部成立，以后各县、区、乡分设了总队、联队和分队，分队下为排。童子团的任务为学习文化、戒严放哨、检查路条、为红军侦察消息等。

各级工会的建立。鄂豫皖苏区处于大别山腹地，没有产业工人，却有大量的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工和手工业工人。他们同农民休戚相关，与农村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1931 年 4 月上旬，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在新集召开，选举成立了特区总工会。此后，光山、罗山、商光边、潢川、新集等县市总工会相继成立，到 12 月初，全区工会会员已达 19 954 人。苏区还建立有贫农委员会和雇农工会。各业工会和雇农工会、贫农委员会紧密合作，巩固了苏维埃政权，保证了土地革命的胜利。

妇女会工作。由于边区经济文化落后，封建势力十分顽固，妇女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当年豫东南便流传过这样的歌谣："数千年到如今，妇女们不当人，实在不平等。任人骑任人打，任人卖成几多银，妇女苦处似海深……"[①]旧的封建礼教吞噬了无数妇女的性命。为了发动

① 河南人民出版社编辑：《河南红色歌谣》，第 220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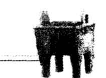
妇女参加革命，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各县委均设有妇女部，群众组织方面设有改善妇女生活委员会。妇女部的工作有：向广大妇女宣传苏维埃颁布的婚姻条例，反对封建婚姻制度；动员妇女参加革命工作、拥护红军、参加生产、反对迷信等。有的青年妇女直接参加部队作护理、宣传等工作。一些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妇女代表，还参加了县、区、乡的党、政领导工作，为巩固苏区政权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四）经济、文化建设全面展开

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鄂豫皖边区是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农业区域，由于交通闭塞，农业经济十分落后。土地革命战争爆发后，这里更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烧杀破坏与封锁，给苏区经济带来了严重困难。苏区党和政府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大种瓜菜及经济作物，调剂人力、畜力、种子，开展生产互助，兴修水利，修复农田，调剂农业税收等，由于这些措施切合实际，苏区农业生产得到逐步恢复。

发展小型工业，是打破国民党经济封锁，支持长期战争的重要措施之一。边区先后开办有兵工厂、缝纫厂等，为红军生产枪支和军装。苏区在发展军用工业的同时，还因陋就简，大力发展民用工业，在新集、商城等处开办了铁工厂、木器加工厂、造纸厂、小煤矿等。军需、民用工业和手工业的兴办与发展，既初步解决了战争与生活中的急需，也扩大了土特产的销售市场，搞活了农村经济。

商业贸易。苏区的商业活动有国营、集体、私营三种经济成分。“经济公社”是区、县以上苏维埃政府创设的国营商业，新集设有经济公社总社，受特区财政经济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双重领导。经济公社的资金由同级政府筹集，特区和县社以经营军需物资为主，区社完全经营民用商品。经济公社还协助工农银行兑换货币，发放借贷，协助政府实行粮食平粜等。合作社是集体性质的商店，资金大多由群众集股或向银行借贷，年底有盈余时入股群众可分得红利。合作社从农民手中收购山货土产交给经济公社，再从经济公社批发来生活用品，以低廉的价格卖给群众。苏区为了补充国营、集体商业的不足，还允许私人商业



经营的存在，一批中小商人往来于苏区和白区之间，利用各种关系，把国民党政府禁运的商品偷偷输入苏区。苏区党和政府对私营商业活动采取保护、鼓励政策，并明确规定要从税收等方面保护中小商人的利益。三种商业经济共同发展，使苏区的内外贸易日益扩大，经济由萧条冷落变得繁荣起来。

财政金融事业。鄂豫皖苏区的财政金融，包括税收、银行、信贷、财务制度等，都是在砸碎了国民党的官僚机器之后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税收是从1930年9月征收农业累进税开始的，商业累进税开征于1931年10月。苏区还办有工农银行，计有：鄂豫皖区苏维埃银行、皖西北苏维埃银行、鄂豫皖省苏维埃银行、鄂豫皖省苏维埃工农银行等，发行有银、铜、布、纸四种货币。苏区银行在群众中信用很高，群众争着使用自己的货币。苏区银行的建立和货币的发行，对于稳定苏区金融，稳定市场，都起了重要作用。

文化事业。苏区党和政府对文化宣传事业历来十分重视，中央分局及县委、区委设有宣传部，政府设有文化教育委员会。创办报刊对红军战士和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是苏区文化事业的重要内容之一，各级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都亲自过问报刊的编辑发行工作。当年鄂豫皖苏区党、政府、红军创办的主要报刊有《红旗》、《我们的路线》、《列宁报》、《党内生活》、《工农兵》（后改为《特苏维埃》）等。这些报刊标题醒目，文字通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深受群众的欢迎。在宣传工作中与报刊互相补充的是活跃在各地的文艺宣传队和新剧团。他们把宣传内容如拥军、土地革命等编成山歌、民歌、新剧，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教育事业也得到发展。大体情况见本书末章。

三、四次反"围剿"斗争与红军主力撤离

（一）三次反"围剿"斗争

1930年10月，蒋、阎、冯新军阀混战刚刚结束，蒋介石便开始统一部署对全国各根据地的"围剿"。这次"围剿"以江西中央苏区为重点，蒋介石亲往部署；大别山由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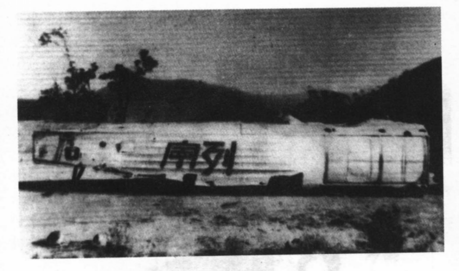
成浚指挥，又专设豫鄂皖三省边区绥靖督办公署，以原西北军将领李鸣钟为督办，具体组织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11月5日，李鸣钟令各部分别进入防地，准备对苏区“围剿”。11月中下旬，红一军尚未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企图，乃南下出击作战，先后在鄂北黄陂之姚家集、黄安、谢店、新洲打了四仗，打乱了敌人的“围剿”部署，为鄂豫皖军民的反“围剿”准备了时间。敌企图南北夹击红军，红一军迅即东进皖西寻找战机。

11月28日，中共中央派来担任鄂豫皖特委书记的曾中生到达边区。面对这样的形势，他一面派人通知红一军尽快返回，一面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了中共鄂豫皖临时特委和鄂豫皖边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委以黄安、光山、罗山等6个教导队和红色补充军为基础，组织了三路指挥部，统一指挥该处地方武装和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12月上旬，国民党军开始了对鄂豫皖苏区的大规模“围剿”。因主力红军在皖西作战，根据地军民利用高山密林，时隐时现，打击小股敌军和民团，进犯之敌提心吊胆，进展异常迟缓。红军在皖西作战亦连续取得胜利，进行了整编。1931年1月3日，红一军留第三师第七团在皖西活动，军部率第一、第二师回师豫东南，14日进至商城二道河之四顾墩地区，全歼国民党军第三十师吉鸿昌部1个团，缴获山炮两门，长短枪400余枝。随后，红一军继续向商南进击。此时，曾中生派旷继勋、蔡申熙等率红十五军进至商南，两军会师于长竹园。两军随即开往麻城福田河，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全军约12 500人。

鄂豫皖军民经过一个多月的英勇斗争，共计毙、伤、俘敌5 000余人，缴枪近3 000枝，使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遭到彻底失败。

红四军整编后，用围城打援的战术，在麻城磨角楼歼敌千余，战后迅速北上，2月2日向新集（现为新县县城）发起了进攻。第十师第三十团在团长王树声率领下，冒着漫天风雪进行强攻，并用坑道作业进行爆破。10日下午，高大坚固的寨墙被炸开一个丈余的缺口，守敌大部被歼。新集的解放，使鄂豫边和豫东南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此后这



鄂豫皖根据地的"列宁"号飞机

里便成了鄂豫皖苏区的首府。

1931年年初,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即拟定了豫鄂皖边区"围剿"红军计划。3月下旬,豫鄂皖边区"绥靖"督办公署召开三省边区"剿匪"实施会议,决定将部队划为"追剿"与驻守两种,李鸣钟通令豫鄂皖边所属各部队,要切实联络,严加防范。敌人虽有部署,但新的"围剿"并没发动。

2月中旬,红四军鉴于敌人采取守势,决定向平汉线出击。3月2日,在信阳南李家寨车站袭击一列军车,敌军还没来得及组织抵抗即被全歼,其新编第十二师第一旅旅长侯镇华被击毙。蒋介石闻报,电令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转令信阳、广水部队迅速"进剿"平汉线之红军。何成浚令第三十四师岳维峻等部南北对进夹击红军。3月8日,国民党军第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率张万信、王俊杰两旅长及3个团,进至武胜关东南之双桥镇,遭红军伏击,经7小时激战,岳维峻以下5 000余人被俘。

5月9日,红四军主力在新集北之浒湾,截住了企图进驻新集的敌军第五十三师4个团,经一昼夜激战,毙伤俘敌近千人,敌狼狈而逃,困



红军俘获岳维峻漫画

守泼陂河。5 月 28 日，红四军又在黄安南桃花店歼敌近 4 个营。至此，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又告失败。

鄂豫皖红军在取得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后，根据特区军委的通令，进行了整顿和扩编，全军共有 4 个师，每师均辖 3 个团。当年 10 月，于麻埠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王平章。原红四军第十二师师部改编为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师部，刘英任师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下辖 3 个团。

11 月 7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黄安七里坪成立。下辖第四军、第二十五军。方面军总部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政治部主任刘士奇。第四军军长、政委、政治部主任分别由徐、陈、刘兼任；第二十五军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王平章。总兵力近 3 万人。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标志着鄂豫皖苏区红军进一步发展和壮大，红军的指挥系统更加统一，为部队进行更大规模的运动战创造了条件。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

蒋介石在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围剿"失败后,8 月间便向边区集结兵力,并将其嫡系部队调至边区,1931 年 11 月已是重兵云集,但因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反蒋浪潮迅速高涨,国民党内矛盾加剧,因而"围剿"迟迟未能开始。红四方面军抓住时机主动出击,先后发起 4 次战役:

1. 黄安战役。11 月 10 日发起,12 月 22 日结束,此役共歼敌 1.5 万余人,其中生俘敌师长赵冠英以下近万人,缴枪 7 000 余枝。为纪念这一战役的胜利,黄安县改为红安县。

2. 商潢战役。1932 年 1 月 13 日,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师由黄安地区北进,同时调在皖西的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西进,以歼灭豫东南之敌。在潢川北亚港等地连续克敌,北亚港、杜甫店、江家集、双椿树等据点之敌逃回潢川,河凤桥之敌也逃入商城,商城陷于孤立状态。红四方面军总部遂令第七十三师和第十师第三十团于 26 日围困商城。商城守敌第五十八师频频告急。2 月 7 日,国民党军 19 个团,分两路向商城推进。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于杜甫店设伏待敌。2 月 8 日晨,敌右路军进至杜甫店,遭到红军第十二师的顽强阻击,下午,红军左翼部队迂回成功,右路敌军顿时大乱,纷纷后撤,左路敌亦形动摇,红军乘势向敌猛攻。数万敌军立时崩溃,争先恐后奔逃。10 日,商城守敌第五十八师

得知援军溃败更加恐慌，弃城退往湖北，红军不战而克商城。此役红军毙伤俘敌4 000余人，缴枪2 000余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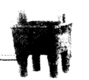
3. 苏家埠战役。红四方面军在取得商潢战役的胜利后，稍事休整，便挥师东进皖西，于3月22日发起苏家埠战役，5月8日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

4. 潢光战役。6月初，方面军总部率第十、第十一、第七十三师和少共国际团回师商城，与红十二师会合。12日晚，红军第十二、第七十三师分别包围了双柳树、仁和集之敌，13日拂晓发起猛攻。双柳树敌第二二八旅旅长范龙章连电向张钫呼救，张钫急忙抽调两个团，由第七十五师参谋长李亚光、第二二三旅旅长韩文英率领，增援双柳树。李亚光刚刚进至卜塔集，便遭到红十一师的包围，两个团大部被歼。范龙章得知援军失利，即率所部突围，该旅亦大部被歼，范带伤逃回潢川。困守仁和集之第二二七旅李万林部，在卜塔集、双柳树之敌被歼后，军心动摇，16日拂晓，突围时再蹈覆辙，大部被歼，李万林被俘。红军仅用5天时间便胜利结束了潢光战役，计歼灭国民党正规军8个团及反动民团一部，毙伤俘敌近万人，缴枪7 000余枝。加上前三次战役，共计消灭国民党军约6万人，成建制歼敌正规部队近40个团，使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因内部危机及不断遭到打击而破产。

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使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苏区得到发展壮大，主力红军发展到4.5万余人，地方武装达20万人以上；根据地总面积达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350万，拥有商城、黄安等6座县城，建立了罗山、光山、潢川、赤城（商城及其北区）、赤南（商城南区）、固始、信阳、红安、麻城、六安、霍山等26个县级革命政权，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造了一个极盛局面。

（二）白雀园肃反

根据地正在壮大之际，发生了白雀园肃反，造成令人痛惜的损失。1931年5月，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后，张国焘主张红四军集中主力解决商城南部亲区的顾敬之民团。红四军执行这一任务时，由于民团裹胁农民坚壁清野，单纯军事打击难以奏效，为此，红四军建议以两团兵



力留在亲区(商城南部的一个区),主力南下向外发展,以配合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7月上旬,鄂豫皖军委在商城西南的余家集召开会议,决定留6个多团巩固边区,5个多团向外发展。关于出击方向,张国焘提出攻英山、出潜山、太湖,进逼安庆,威胁南京的计划,并不顾多数人的反对强令红四军执行。此时徐向前已调任红四军军长,原军长旷继勋调任第十三师师长。7月中旬红四军由亲区向东南进发,8月1日到9月初,连克英山、蕲水、罗田、广济四城,歼敌7个多团,生俘敌7 000余人,缴获长短枪4 000余枝,迫击炮26门,银元7万余元,黄金10余公斤,白银800多公斤和南下部队的全部军衣,解决了部队的经济困难,大大减轻了老区人民的负担。

张国焘对红四军改变出击方向极为不满,3次给红四军写信批评并催促返回根据地。8月20日,曾中生、徐向前向中央报告了南下的理由,并对张国焘的错误军事方针提出了批评。27日,中央分局、军委会致信曾中生、徐向前,指责他们未出潜太而南下蕲黄广是"抗拒分局指示"①,强令红四军立即回师。9月1日,红四军接到此信后,只得北返。4日,红四军在英山西南鸡鸣河召开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中央分局、军委会的来信。大多数人认为部队应就地展开不应北上。会议通过申明书,再次说明东进之不利及南下的正确性,但部队仍继续北返。

此时,鄂豫皖区内发生了两个事件,一是8月初被关押在箭厂河红军总医院的几个被俘国民党军官在食物中投毒被发觉,经审讯,他们供称毒药是药房司药、红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的妻子所提供。张国焘把此事扩大为"AB团反革命案件",并认定鄂豫皖地区"必然有一反革命的极大组织"②。另一事件是国民党特务搞的离间案件。红四军南下攻占英山后,国民党特务钟梅桥、任廉洁携带曾扩情写给许继慎的反间

---

① 中央档案馆等:《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224页,1985。

② 盛仁学:《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第32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信件潜往英山，信中诡称许同敌勾结待机投敌。许继慎当即将来人及信件交给了红四军军部，曾中生、徐向前明白这是敌人的阴谋，认为许继慎不会有问题，遂将特务及信件一并送交分局处理。张国焘便把这两件事同红四军改变出击路线一事联系在了一起，硬说在鄂豫皖苏区有大批的改组派、AB团、第三党，他们企图炸坏医院药房，抢岳维峻出去，准备9月15日暴动投国民党。

9月13日，红四军到达麻埠，陈昌浩衔张国焘之命来到军部，宣布分局决定，撤销曾中生的职务，由他接任军政治委员。陈昌浩按照张国焘的指示，立即开始在红四军中逮捕所谓"反革命"，在麻埠逮捕了红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副团长丁超等20余名干部；在商南斑竹园逮捕了三十团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三十五团团长王明、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在商城余子店逮捕了第十二师师长许继慎、政委庞永俊、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等。9月下旬，红四军全军移驻光山白雀园及其附近的砖桥、余集一带，开始了大规模的肃反。

10月初，张国焘来到白雀园主持肃反。他把全军原有建制打乱重新编制，在红军中成立"政治保卫队"和"红四军临时革命法庭"，并组织巡视团，到各师去帮助肃反。从9月13日到11月中旬，鄂豫皖区军政高级干部因肃反而遭杀害的除前面提到的潘皈佛等人外，还有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第十二师师长肖方及1个师政治部主任、2个团长、6个团政委、12个团政治处主任。军委参谋主任、原红四军党委书记李荣桂，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前皖西军分会主席和第十二师政委姜镜堂、原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琪等多名高级军事干部亦在白雀园被张国焘假肃反之名而杀害。根据陈昌浩在一次报告中承认，这次肃反共杀害红军干部、战士2 500余人[1]。

红四军中肃反大体告一段落后，分局向各县发出指示信，指令各县立即开展肃反。分局监察委员会亦要各级监委把红四军白雀园"肃

① 鄂豫皖《红旗周报》第28期，1932年1月18日出版。



反"的经验运用到地方,"继续并扩大肃反的胜利"[①]。在这一肃反方针之下,许多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做出过重要贡献,在党和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的领导干部,被加以"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罪名而杀害。其中有徐朋人、王秀松、曹学楷、戴克敏、舒传贤、陈奇、陈定侯、王宏学、郑新民、方英、廖炳国等。肃反给豫东南各县党组织造成重大损失,当年光山县白雀园周围19个行政村被错杀的干部近千人,商城仅区、乡干部被杀害的即达409人,固始被杀害千余人。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块,使大批为鄂豫皖苏区的创建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优秀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为痛心的损失,极大地损害了党的威信和挫伤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也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埋下了伏笔。

(三)第四次反"围剿"斗争

1932年5月23日,国民党中政会推举蒋介石为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李济深为副司令。蒋介石宣布第四次"围剿"红军的方略是"标本兼治","以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兼施并行,同时建立保甲自卫组织",具体措施是"扩张人民自卫团,筹组铲赤义勇军,统一民众武力,清理收复区内土地"[②]。并确定首先集中兵力消灭豫鄂皖、湘鄂赣两区红军,然后全力进攻江西苏区。下旬,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以下简称"三省总部")于武汉成立。29日,蒋介石抵汉口,开始对鄂豫皖苏区部署第四次军事"围剿",组左、中、右三路军,以左路军(司令官何成浚)进攻湘鄂西苏区,以中、右两路军25个师及6个旅约30万人,全力围攻鄂豫皖苏区。中路军司令部设于信阳(后移广水),蒋介石兼司令官,刘峙为副司令官,辖6个纵队、1个预备队计17个师、3个骑兵旅、1个特务旅,在鄂北、豫南作战。右路军司令部设在皖西六安,李济深兼司令官,第三军军长王均为副司令官。辖3个纵队计8个师及两个独立旅,在皖西作战。

---

① 中央档案馆等:《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497页,1985。

② 上海《申报》,1932年6月20日。

红四方面军在取得黄安等四次战役胜利后，红军和根据地都得到较大发展，张国焘便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竟认为“国民党动员任何多少部队，都不堪红军的一击”①。鄂豫皖省委则认为此后将由帝国主义直接进攻红军，而国民党政府“只担任编师的职务”②。分局对迫在眉睫的敌第四次“围剿”未做动员与准备，仍然要红军出击作战。6月25日，红四方面军由潢川经罗山向信阳、广水间平汉线出击，26日晨攻下鸡公山，歼灭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马腾蛟部1个团后，南下围攻麻城，虽然取得了歼敌1旅1团，击溃敌2旅的胜利，但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部署，反而使红军受其牵制，陷于被动。在东线，红二十五军军长旷继勋率1个团固守霍山，与优势敌军血战5昼夜，守城部队大部损失，旷继勋被撤职，蔡申熙继任军长。

8月初，国民党军进占宣化店。东线、南线、北线之敌亦迫近苏区的中心区域。蒋介石改变了原定的步步为营的战术，于8月7日下达总攻击令，要各路迅速向根据地腹地进攻。张国焘这才决定撤麻城之围，命令十分疲惫的红军仓促赶往红安以西迎敌，仍然希图一举粉碎“围剿”。由于红军已陷入被动局面，经英勇奋战虽给敌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也受到不小伤亡，红安、七里坪相继失守。8月底，红四方面军主力进抵光山南部之浒湾（今属新县）西北至西南的扶山寨、四面山、金兰山一线。9月初，敌第二纵队在飞机掩护下向红军阵地展开全线猛攻，红军利用地形予敌以重大杀伤，敌遗尸累累，被迫据地固守。此时，北南两面敌7个师正向红军侧后进逼，与第二纵队对红四方面军构成了三面合围之势。张国焘见状急令红军撤出扶山寨。8日，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中共鄂豫皖省委、鄂豫皖特区政府等机关撤出新集，经白雀园、余家集、汤家汇向皖西转移。9日，国民党军第二纵队占领新集。20日，敌第六纵队卫立煌部侵入金家集。至此，鄂豫皖中心区域全部被敌占领。

---

① 王全营：《中共河南党史资料》第3辑，第28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
② 中央档案馆等：《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258页，1985。



在根据地大部丧失，敌大兵压境的严重情况下，张国焘由盲目轻敌一变而为惊慌失措，说什么“今天打出一个厉害的敌人来了”，“红军只可打一仗，就没有打第二仗的力气了”[①]。红军在皖西未能获得有利战机，10月上旬重返红安地区。途中张国焘致信郭述申，让他与东路游击队司令员刘士奇、红二十七师副师长徐海东等组成鄂皖工委，留皖西坚持斗争。

9月下旬，蒋介石见红军主力西返，遂重新进行了部署，急调3个师向红安、麻城地区堵截，同时令中路军第二、第六纵队向西尾追。10月8日，红军刚刚抵达红安河口镇，便与敌遭遇，红军勇猛攻击，激战数小时，歼敌2 000余人。时国民党军4个师到达河口，另有两个师正向红安集结。9日，两军在河口地区展开激战。红军战士用刺刀、手榴弹打退了敌人的七八次冲锋，毙伤敌近千人，红军也受到重大损失，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第十一师政治委员甘济时牺牲。数路敌军向红军压来。

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在河口北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留下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第七十五师和各独立师、独立团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由沈泽民负责；方面军总部率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七十三师和少共国际团到平汉路以西活动，把敌人引出苏区，再伺机打回根据地。11日晚，鄂豫皖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率13个团及总部直属各单位共2万余人，于红安四姑墩地区分两个纵队出发，12日夜越过平汉铁路，离开了鄂豫皖苏区。

鄂豫皖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张国焘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在反“围剿”开始前，他盲目轻敌，对形势作出错误估计，认为国民党军队已成“偏师”，因而在人力、物力上不做反“围剿”的战争准备，坚持不停顿地进攻，使红军失去主动；反“围剿”作战开始后，不是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而是轻率应战，同强敌死打硬拼，致使红军遭到重大伤亡，陷于更加被动的局面。加之张

---

① 中央档案馆等：《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298页，1985。

国焘到鄂豫皖后，推行许多错误的“左”倾政策，如肃反扩大化等，破坏了根据地的坚实基础和抗敌能力，导致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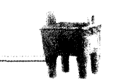
第四节　国民党统治的强化

一、巩固独裁统治的举措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河南省政府虽然归属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1月17日也对河南省政府实行了改组，但直到中原大战爆发前，河南军政大权实际上仍掌握在地方实力派冯玉祥等的手中，且不断以反蒋名义同南京政府闹对立。中原大战爆发后，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东退，阎锡山任命的万选才旋即被扣处死，蒋介石任命的主席张钫只是挂个办事处的招牌而帮蒋介石瓦解反蒋联军，所以这期间河南省政府只是空有其名。10月6日蒋介石任命其亲信刘峙为河南省政府主席，张钫等为委员，20日，刘峙等在开封宣誓就职，从此，河南真正纳入了南京政府的管辖。


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

南京国民政府是国民党窃取了国民革命成果的产物。1927年6月，这个政府宣示要结束军政，开始训政。同年10月，国民党中常会通过《训政纲领》，规定在为期6年（以后实际实行了20年）的训政期间，由国民党独掌全国政权，以党代政，凡属国民，必须服从、拥护国民党，实行业经蒋介石篡改的三民主义。为了确保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长治久安，蒋介石就把中国共产党视为最大的敌人，必须彻底消灭之而后快。身为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刘峙，虽然在就任时宣布其“施政方针”有四——救济灾民、消灭“匪共”、建设廉能政府、保障革命民权，但其核心却是消灭“匪共”。就是在日本侵略中国，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的1934



年，他还顽固地宣称，“攘外必先安内，所以‘剿赤’的胜利就是抗日的成功”，“剿灭‘赤匪’为中国目前唯一之要求”①。反共“剿赤”——这就是刘峙主豫期间的一切工作的轴心。围绕这个轴心，他在党、政、军及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诸如：

（一）强化国民党组织

省政府成立后，刘峙依照有关规定，对省党部进行了改组，对全省的国民党组织进行了整顿和清理，并进行重新登记。然后根据各县党员人数等情况，县级分别设立执行委员会、指导委员会和整理委员会，经过一段过渡，组建为正式党部。到1937年2月，全省共有国民党员27 233人，成立县、市党部93个，区党部204个，区分部20个，县长、区长基本上由国民党员担任。国民党的统治深入到了基层政权，成为维护国民党政府的重要力量。

（二）推行地方自治、保甲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从1929年起，制定县自治法、区和乡、镇自治施行法，于全国推行地方自治，作为“训政”期间的一项重要举措。刘峙主豫后，由民政厅划定县份等级，编划自治区域，开办区长训练班，等等。到1931年年底，初步划定751区、492镇、16 466乡，复次第成立了区、乡、镇公所，确定以契税附捐和随粮附征0.25元作为区公所经费。还在1931年5月，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和省政府就依据国民党中央的有关规定，决定在全省整理和完善旧有的保甲体系，先后在开封召开了多次保甲运动会议。1932年8月22日，豫鄂皖“三省总部”颁发《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后，就在全省范围内推行。保甲的编组方法，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10户为甲，设甲长1名；10甲为保，设保长1名。第一步是清查户口，登记以后按户、甲、保造册，并制成门牌以备保甲长和军警检查。其目的在于使基层组织层层节制，发生纵横的密切连带关系，通过强制民众制订保甲规约，从纵的方面把民众“连锁”起来，在横的方面则实行“联保切结”，规定各户户长除一律加盟保甲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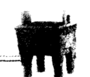
① 《河南政治月刊》，第4卷第17期。

约外,“应联合保内他户户长至少5人,共具联保连坐切结声明,结内各户互相劝勉监视,绝无通匪或纵匪事情。如有违反者,他户应即密报惩办,倘瞻徇隐匿,各户愿负连坐之责”①。保甲长形式上由所属各户公推,事实上多为比较富裕的居民担任,不少是地主豪绅。因为同时编组的地方武装(壮丁队)也以保甲长为头目,所以就等于武装地主豪绅,他们借清查户口、训练壮丁、摊派捐税之机,向农民大肆勒索,甚至包揽词讼,欺压民众,垄断地方经济,成为无法无天的土皇帝。

(三)编组地方武装

1928年,南京政府即决定各省政府内增设保安处,组织统率地方武装,继而复要求湘鄂豫赣等省大办民团。自1931年4月起,省政府即督饬各县,依照国民党中央颁布之县保卫团条例,制定保卫团章程,复于次年8月间公布保卫团法施行细则,将各县民团一律编组为保卫团,团丁年龄为18—45岁,每5人出1人,各县人数不等。县设总团和训练处,县长兼团总;区设区团,区长兼区团长。1931年8月初,全省已组织起地方保卫团近70万人,统归省保安处管辖。此种保卫团为“无给(饷)职”,参加者均为不脱产的农民。除此之外,还编组脱产发饷的保安队,直属省保安队总司令部指挥。1932年各专员公署成立后,复于各专署设区保安司令部,以专员兼任司令,指挥所属各县保安队。列县分作甲、乙、丙、丁四等,分别有兵员160名、120名、80名、40名,全省合计2.5万人。这些保安队人枪齐全,装备、编制和通讯设备都仿照正规军队。1932年冬,省当局据“三省总部”《保安队组织条例》,制定《河南各县民团实施细则》,取消保卫团,改组为壮丁队(后备队、守备队)。1934年又加扩充,各县按等级分建1—10个中队。次年再加改编,废原有番号,各专区依正规陆军编制,编成1—2个团,由专区保安副司令兼任团长。同年秋,复将各专区保安团调至开封,合编成步兵15个团又2个独立大队,变成了省属军队。无论保卫团、壮丁队、

① (台)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32年7—9月卷,第348—349页,(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出版,1982。



保安队,主要职责均为“剿匪清乡”,以对付“赤匪”。在国民党军队“围剿”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的过程中,许多县的保安队随同国民党正规军来往作战。又因组建和豢养这些保安队的经费由田赋附加和抽收商捐来解决,年搜刮量与田赋不相上下,这就大大加重了城乡各阶层人民的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

(四)大力发展特务组织,疯狂破坏共产党组织

1931 年前后,国民党两大特务组织中统和军统的前身 CC 系及复兴社,均在河南发展组织,并成立相应机构。还在 1931 年,特务头子戴笠就派刘艺舟来郑州侦取情报。1933 年在开封成立复兴社河南分社,各县设分会,乡设支会,基层设小组。1934 年 8 月,原设郑州的军统豫站迁汴与复兴社一道办公,并于郑州、许昌、漯河、信阳、道口、商丘、渑池、潢川、新乡、安阳、内黄、洛阳、林县设立小组或通讯员,他们在城乡各部门、各行业大力发展组织。据约计,刘峙主豫期间,“在河南创立了相当强大的复兴社,其社员估计当在十万以上。所有联保主任,学校中的青年学生,大都被迫或自愿地加入了复兴社”。各县县长、区长也多数受过复兴社的特务培训①。除估计总数在 10 万以上的复兴社社员外,CC 自称也有 7 万成员。他们的触角遍及政府、党务、文教、机关团体和社会其他部门,秘密监视、侦察每一个可疑的人。尤其是设在开封东华门的复兴社分社,利用忠义救国会等组织,收罗大批地痞流氓为鹰犬,在全省各地大肆缉捕共产党人和爱国青年,无数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惨死在他们之手。为了向被捕的政治犯强制灌输反动理论,又于 1931 年在开封成立了反省院,内设总务、训育、管理 3 科。反省院一开始便被 CC 系所控制,向被关押人员讲授三民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等。河南先后有数百名革命者被关在此。

(五)加强教育文化领域的统制

省政府、省党部极力在全省各类学校中开展“党化教育”,禁止学

① 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第 22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第 448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生干预校政、参加社会活动、组织各种团体，特别是传播共产主义学说，通令各县教育局在聘任小学校长时先任用国民党员。1932 年起还对高中以上学生集中实施军事训练，1935 年起又对初中以下学生实施童子军训练。与此同时，又强令各地学校把“党义”教育置于压倒一切的地位，强使学生服膺“一个党”（国民党）、“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严厉禁止学校师生接触革命或其他“左倾”书刊，就是郭沫若、鲁迅、茅盾等人的著作也一律在禁止阅读之列。省教育厅还特发通令，称从 1931 年 4 月 1 日以后，学校如发现有“反动”书籍者惟校长是问。有些学生只因阅读郭沫若的《创造十年》、《女神》，即被校方目为“反动”而开除。有些学校更变本加厉，连报纸都不让学生阅读。思想统制之严，实为其他省份所罕见。

省政府和国民党省党部还从反共和建立独裁统治的需要出发，对省内新闻通讯部门实行统治。1931 年 2 月 5 日，省政府通令各县，在清共“剿匪”期间，发表一切言论都要接受检查。同年底，在开封设立了新闻检查所，对报社、通讯社发的所有稿件实行发布前的检查，国民党各级党部则对当地报纸实行出版后的审查。1934 年新乡《豫北日报》转载何香凝批评国民党当局的文章，编辑即遭申斥，报纸停刊 3 天。

（六）推行新生活运动

1934 年 2 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起了一个以恢复“中国固有道德”，以求“民族复兴”的所谓“新生活运动”，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自任会长。河南省政府立即仿照实行，3 月 22 日，省政府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在开封成立，建设厅厅长张静愚任理事长，刘峙任监事长。随后，新生活运动由省会向各县推行。不久，获嘉、新郑、鲁山、项城、内黄、密县、洧川、孟津、卢氏等县相继成立了分会。到 1936 年 3 月，全省有 88 个县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①]。新生活运动的本质是利用封建的伦理道德，来蛊惑民众，维系国民党统治和传统的社会秩序。由于各级党

① 南京《中央日报》，1936 年 3 月 11 日。



政人员多因循敷衍，所以，省政府和省党部虽然对新生活运动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发动，但实际收效甚微。抗日战争爆发后，河南同全国一样，新生活运动也不了了之。

二、行政机构的调整和官僚的腐败

南京国民政府在地方行政体制方面本为省县两级，废除了北京政府在省、县之间设置的道级机构。河南省在冯玉祥执政时曾在省、县之间设过行政长公署，1928 年 7 月即予撤销。后来，各地在实际工作中觉得由省直接统辖数十县至百余属县，对政令的推行殊多不便，于是有些省份就相机分区实行首席县长制，或行政区督察制。1932 年，行政院为划一各省设在省、县之间的机关组织，制定《各省行政督察专员暂行条例》，于 8 月 6 日由国民政府公布。同日，豫、鄂、皖"三省总部"颁布了《剿匪区内各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条例》，规定酌划一省为若干区，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总理区内各县、市行政及"剿匪"、"清乡"事宜。专员兼任驻在地之县长并兼该区之保安司令；行政督察专员拥有固定组织及极大职权，可以说集文事武备察吏安民于一身，进一步强化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职能，事实上成为省县两级政府之间增设的一级层次。以后，此制普遍推行于全国各省。

河南同湖北、安徽一样是最早设置行政督察专员的省份之一。1932 年 9 月，全省初划为 14 个行政区，11 月即进行了调整，设 11 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分辖 112 县。

同样为了强化政府的统治职能，南京国民政府对县级和其下的基层行政机构也进行了调整。民国初年，省议会曾通过决议，废除清朝统治时期旧县衙的捕、快、壮、皂等八班衙役，代之以政务警察，裁撤吏、户、礼、兵、工、刑等六房书吏，代之以新建的 2—4 科，但各县并未遵行（仅个别县份短期改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制定和颁布了《县组织法》，规定县行政机关为县政府，长官为县长，由省政府任用，以综理县政与监督所属职员为其职责。（1936 年 3 月以后县长还兼军法官，对于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人可任意审理、判刑）县政府根据政务繁简，分为一、二、三等，分设 4 科或 3 科、2 科。下设公安、财政、建设、教育 4

局，分管各项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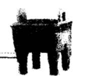
遵此，河南省政府也将省境各县县公署一律改称县政府、县知事改称县长。这对于剔除封建积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政治近代化，不无积极意义。

1932年，刘峙因为河南是个“剿匪（共）”省份，有必要加强县长的职权，因而在设置行政督察专署和加强保安队的同时，又呈准豫鄂皖“三省总部”，调整县政府组织机构，裁去兼受省府相应各厅直线领导的公安、财政、建设等局，改设三科，分掌民政、财政、建设，由县长统一指挥，并由县长兼统保安队。1934年12月，蒋介石南昌行营公布“剿匪”省份各县政府裁局改科办法大纲，正式规定将各局政务移归各科，而由县长总其成。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旧县令或县知事的职权，实际上是一种倒退，但因其有利于“剿匪”，所以仍在河南各县普遍实行。

县以下的基层组织，河南各地很不统一，为划一行政，国民政府公布之《县组织法》规定：每县分若干区，区的行政机构称区公所（1934年12月后改称区署），每区由20个以上村、里组成（百户以上之乡村为村，百户以上之市镇称里），村下为闾（25户），闾下为邻（5户）。1929年国民政府又改村为乡、改里为镇。组成区——乡、镇——闾——邻系统。

以刘峙为首的国民党统治建立之初，以“建设廉能政府”、“保障革命民权”相标榜，并制定一系列防贪杜弊的规章制度，好像这个挂着“青天白日”牌号的政府与此前的封建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大有不同。那么在其对政权机构作了上述调整之后，实际政治状况又如何呢？

一位在河南任职多年，1932—1938年，足迹几遍全省1/3县、乡的人士，将其“亲身见到的事实，不折不扣而毫不加渲染”地作了概括：“河南的吏治也就是在上下交征利的场合中进行着，任何事业都被这种交征利的忙迫所掩。就省方说，高级大员则卖官受贿，每天口里喊着‘礼义廉耻，仁民爱物，一个人最要紧的是心地健全，能力还在其次’。他们所谓‘心地健全’就是对上官要有物质上或精神上的孝敬，最低的



要求，长官弄了钱你不要说话，否则就是‘思想不正确’。中级职员则串通舞弊……各区、各县的地方官吏，因为有许多是费本钱买来的，故除了捞本以外，又要积蓄几个以作下台的受用”。如安阳县长周某因贪婪过甚，被地方人士联名上告，南京政府各部接到的告状纸也多达百余件。省高等法院在拘审周某时，周当堂“从容回答”说：“我的县长是费本买来的，你去问问主席（刘峙），应不应该捞本?”结果由刘峙下令保释了事①。

三、苛重的经济搜刮

上述这般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必然孪生相应的财经政策，那就是民众所说的“刮（国）民党万税”。

（一）田赋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和冯玉祥第二次主豫期间，田赋连年预征，不少县份已经征至1936年。以刘峙为首的省政府成立之初，曾决定每年减征原额的30%，以逐次退还，并承诺“以后无论如何不再预征”。但随后又宣称，过去预征之田赋，“本（南京国民政府）中央不能负责”，强令农民从头纳起，“欠赋”未清的，也须全数补纳，并分派委员去各县守候严催。省政府又以“平均负担”为名，从1935年10月开始，在全省各县分阶段办理土地陈报。从原则上说，查实各县、各户实有土地，把过去隐匿不报（因而也不纳田赋）的土地清查出来，改变越来越严重的“有地无粮（田赋）”、“地多粮少”（主要是地主）和“地少粮多”（农民）的积弊，是一件负责任的政府该做的好事。然而，国民党政府搞土地陈报的主要目的并不在此，而是为了增大田赋征量。各县县长深知此中奥秘，因此都“贪多邀功”——不切实际地浮报耕地面积以求奖叙。拿首先开办土地陈报的陕县来说，荒山、荒坡和废弃的砂砾地都被列为在耕熟地，甚至“1亩或加0为10，10亩或加0为100，颠倒错乱，离奇已

---

① 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第54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极"[1]。经这么一"陈报"，全县在耕土地由原先不到1.47万公顷猛增到6万多公顷，即以此为准征取总量数倍于往昔的田赋（后因地方人士反应强烈，才稍加核减）。省方按增溢后的耕地总面积让各县征解田赋，使农民负担大为加重。

（二）田赋附加

国民党政府虽用上述办法加征田赋，但远不足以满足其财政特别是各级官吏和基层机构的无厌需求，因此又另征各种名目的"捐"、"税"、"费"，绝大多数均随粮征取，故统名之曰"田赋附加"。尽管国民党政府宣称要"废除苛捐杂税"，并于1931年通令各省田赋附加最多不能超过正额田赋，即定额银1两，附加不能超过2.20元。河南省政府省务会议也于1931年1月7日通过决议，通令各县照中央规定执行，省当局先后下令取消一些无关紧要的苛杂，其实完全是欺人之谈。1934年有关地方情况的报告就说道，"表面上废除许多苛捐杂税，而实际上把这些捐税完全并入田粮里面，甚至较原来的捐税总数更多"，在豫南地区额赋银1两（2.2元）"竟有交至三四十元者"[2]。河南省财政厅在1930—1932年，每年增收的田赋附加即相当于正额田赋的2倍以上，人民负担之重可以想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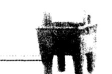
（三）基层杂派。国民党政府规定县以下搞"自治财政"，由区、乡、保用所谓"造产主义"等途径来解决，也就是让各级基层机构自行筹措。全省据1934年的估算，各县由区长征收的光招待费、伙食不敷费、灯油费、开会费等9种，总共约3 800万元；由联保主任征收的，光支应费、夫役费、制服费等7种，总共约3 000万元；由壮丁队征收的，光军装费、弹子费、队丁费等6种，总共约4 000万元；三方合计，总共10 800万元，超过田赋的10倍[3]。其他名目繁多的苛杂还未计算在内。基层杂派之繁多和苛重，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

---

① 《河南省临时参议会第三届第四次大会汇编》，民国刊本，170页。

② 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第466页，郑州，1984。

③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82、8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四)城镇杂税

国民党政府对城镇居民和工商业者也毫不宽仁。如1933年记述豫南情况者就说道,“在每一个最小市镇,都可以看到最少一个的收税机关,大的市镇三五个不等。落地捐、营业税、小车捐、电线捐、筑路捐、民团捐、团丁捐、冬衣捐、徽章捐、旗子钱、办公费、禾税、壮丁捐、城防捐、户口捐、枪捐、仓谷费、保甲捐……说不了的名目都加到群众身上,整个群众每日都在捐税里过生活”①。名目也十分繁多,除上面所举者外,还有牙税、老税、活税、盈余税、斗捐、城捐、布捐、桐油捐、牲口捐、戏捐、花生捐、车捐、瓜子捐、枣捐、猪捐、羊捐、漕串捐、丁串捐、米捐、煤车捐、煤油捐、火柴捐、丝锅捐、棉花捐、渡口捐、剿匪捐、豆腐挑捐、卫生捐、警捐,等等②,总数和税率到底有多少,就是当时人也很难调查清楚。

四、宛西自治

20世纪30年代,在南阳(古称宛)西部的镇平、内乡(含西峡)、淅川、邓县等县,出现了半独立的地方自治。

宛西地处偏远,交通阻塞,经济滞后,绅权比较发达,众多无地少地的农民为生活所迫,入山“拉杆”,因此民初以来,匪患日甚一日。1927年秋,在冯玉祥部任职的彭禹廷因母死回镇平奔丧,时县境匪患炽烈,彭被地方绅民推举为南区(侯集)区长,开始组织民团,先后击溃、歼灭王长安等杆伙,历经年余,境内粗安。1929年秋,彭禹廷去辉县百泉,创办河南村治学院,探索通过“乡村建设”改造中国的道路。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后,豫西南又杆子蜂起,彭禹廷受镇平绅民之请重返故乡,推行他的乡村建设纲领——“三自主义”:“自卫主义”,就是严密社会组织,仿效瑞士义务民兵制编组民团,对付土匪、匪式军队和贪官污吏;“自治主义”,就是“伸民权”,推倒传统的“官治”,除去土豪劣绅的护符,由民选的社会团体管理社会;“自富主义”,就是开源节流,做到生

① 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第398页,郑州,19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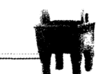
② 《中华农学会报》,第154期,第77页。

产有办法，分配有办法，实行累进税，使人民“家家有余”。这是一种有理论、有纲领的正当方案，不仅为河南其他地区所未有，而且较之同时期外省的种种“乡建”和“村治”方案，也具有较为鲜明的民主主义和爱国性质。

在此前后，邓县宁洗古（中共党员，黄埔四期学生）、淅川陈重华、内乡别廷芳等，也各自在县境组织民团，清剿杆子，办理自治，举措上与镇平自治颇多相似之处，宛西成为河南一块独特的“绅治”地区。中原大战期间，匪患更炽，各县民团窘于应付。彭禹廷、别廷芳、宁洗古、雷云亭（邓县）、陈重华等为商酌联合剿匪并办理地方自治事宜，于1930年9月27日，在内乡县杨集召开四县联防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宛西地方自治委员会（推举彭禹廷为主任）和四县联防办事处（推举别廷芳为主任），统编四县民团为4个支队，别廷芳、宁洗古、陈重华、彭禹廷分任（兼）支队长。会议复拟定10条自治公约和5条办法，决定于内乡马山口合办宛西乡村师范学校，培养自治干部。随后，各县都成立了自治机构，拟订出“自治大纲及实施办法”。宛西乡村师范从四县县立师范、职业学校学生中选择了一批学生适时开学，该校除培养了一批乡村小学的校长、教师外，还培养了不少保长及民团头目，这些人都成为宛西地方自治的重要力量。

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封建经济和封建势力比较强固的宛西地区，像彭禹廷那一套带有民主主义性质的改革，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受到官府支持的地方恶势力因自身利益受到损害，就于1933年3月将彭杀害。在此之前，邓县宁洗古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后起的南召以李益闻为首的自治办事处始则被刘峙勒令解散，继而李也遭到通缉。淅川的陈重华自始至终比较保守，与官府和豪绅矛盾较小，地位尚能维持。惟有获得豪绅支持的别廷芳独具较为深广的社会基础，势力日益膨胀，彭禹廷死后，更领袖群伦，统揽军政大权。在他的主宰下，宛西自治全面展开。

别廷芳是内乡办民团起家的土霸，地方封建势力的核心人物。在他主持下的“三自主义”，核心和基础是“自卫”，那就是大力组建民团，



清剿杆子武装，稳定旧有的社会秩序。四县共有民团25个，约4.1万人枪，各排配有轻机枪，各连有重机枪，各营有迫击炮。枪械来源除收缴溃兵、土匪之武器及向民众派款购置外，各县民团司令部都办兵工厂，自行生产。各县还搞了一些配套的军事设施，如修公路、装电话等。内乡县在抗战爆发前共修道路57条近1 200公里，淅川、邓县、镇平各修路数百公里。这些近代设施，只供军用，与民生无涉。所修的公路也禁止民间牛马车、人力车通行，而沿线农民却须常年无偿地承担修整、垫沙、扫雪等工役。依靠这些民团武装和军事设施，连年清剿杆子，使传统的社会秩序得到相对稳定，经济也有所恢复。

别廷芳主持下的所谓“自治”，主要内容如下：

1. 推行保甲连坐。1932年国民党“三省总部”编查户口保甲条例颁布之后，宛西各县统一了保甲编制办法，严厉执行，借此对人民厉行“杀戮政策”，凡查出一家有匪，全家皆杀，好打官司者杀，替人写状子者杀，不务正业、不听民团指挥者杀，有因摘个南瓜、掰穗玉米，亦被别廷芳处死者。就是地主豪绅中有不满别廷芳的暴虐统治者也难逃一死，共产党员更是杀无赦。在这种制度下，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毫无保障，相反，民团的团、营、连长和地方的区、保、甲长，对人民则有无上的权威，有些团长且可以父死子继，有如封建采邑的领主。他们互相勾结，盘踞乡里，敲诈百姓，无恶不作。因此，内乡城乡每年年节宴请亲朋，保甲长必要请其高坐首席，保甲长应接不暇时，便由其家人或长工代替，即此也分配不到，“便把保甲长的烟袋或衣服拿去放在首席上，然后他人方敢入座”[①]。豪绅权威如此之大，人民地位如此之低，这在省内其他地区是没有的。

2. 厉行“五证”制度。包括出门证，出门所持证件，无者扣押；通行证，外县人入境过境须持通行证，无者扣押；乞丐证，小贩营业证，无者不准行乞和做买卖；迁移证，人民迁出、迁入本县，均须办理此证，否则不准迁移，给民间社会交往和商业活动带来极大的妨碍。

①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第182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

3. 清丈地亩，行课石制，增强盘剥。除去壮丁款等附加外，光田赋正项每年就征现金300万元，又粮食187万斤。课石以外的其他捐税多达50余种，并规定各项捐税人民必须在期限内清缴，过期一天加罚一倍，团霸、豪绅则倚仗特权，不仅不交赋税，而且还大肆兼并土地。别家仅在西峡口一带就有地160公顷左右。团阀刘顾三数年间占有的土地达400多公顷。各区区长、民团团长占地都在千亩以上，营、连长和保、甲长也都成为大小不等的地主。这样就使得地主阶级土地占有制恶性发展，与官僚地主较为集中的豫南一样，成为河南地权最为集中的地区。

4. 调解民事诉讼。成立诉讼委员会，区、乡（镇）设诉讼分会，让民事纠纷就地解决，民众因此可以少受县府官吏鱼肉之苦。但因各乡镇分会都掌握在土豪绅富之手，所以仍然“村村有讼”，弊端迭出。

5. 兴办学校教育。各区、镇公所通过将寺庙田产移充办学需用等办法，发展小学教育，举办教师培训班。尤其内乡天宁寺的宛西乡村师范，为地方培养了不少人才。不过，各级学校与省内外一般中小学校大有不同，都“以整个地方建设的知识为其（教学）内容”，“基本原则是：从思想上培养地方割据和拥护地方领袖的信念。因此，他（别）严禁青年人到外地去上学，学校内要挂别廷芳像，要讲地方自治和‘四书五经’，不准挂孙中山像，不准讲三民主义”[①]，总之是培养忠于别廷芳的党徒和他那一套地方自治的骨干。

在“自富”、“自养”方面，内容主要有：

1. 建立农民借贷所和发行纸币。农民借贷所或信用社从各方筹措资金，对农民和商号发放贷款。以不同形式发行纸币或流通券，强行在市面流通。这些自行印制的纸币由于没有可资兑付的储备金或相应商品，虽在初期对搞活市场起了一定作用，但紧随着便是市面流通资金与商品的比例失调，导致通货膨胀，使商人、农民受到重大损失。

2. 实行五禁。即禁鸦片、禁赌博、禁洋货、禁洋靛、禁纸烟。“洋

①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第182—183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



货”的范围很广，凡非本地生产的布匹、百货等(包括手工业产品)，几乎都被视为“洋货”而被禁止。以此强制民众将消费压至最低水平，如上述连非本地制造的手工制品都禁止购用，惟独对为害至烈的鸦片名禁实纵，对种烟(罂粟)农户每亩勒征20元(后改收烟土10两)，由此熬制和搜刮而得的大量烟土，由民团护送销卖境内外。于是鸦片交易十分畅旺，各集镇都有购销此种毒品的行栈，致使宛西成为河南著名的鸦片产销区。

3. 植树造林。内乡到1933年，“全县共播种橡子2 794.5石，植柳70万株，植油桐、漆树和榆树等353万株”①。淅川县、镇平县都大力提倡植树，镇平还建立了两个模范林场、两个育苗场，制定了造林简章、护林规则。大量植树造林不但保护了环境，有利于生态平衡，而且还带来了经济效益，桐油、生漆、药材、核桃仁等林产品给农民增加了不少收入，河沿植树还起到了防洪固堤的作用，减少了水旱灾害。

4. 治理河道、改造良田。内乡县在老鹳河中修了一道拦河堤，名石龙堰，将水位提高。然后开渠引水，可灌溉稻田460多公顷、旱田400多公顷。自1931年至1936年，全县治河后淤出可耕地118.6公顷，改良其他地1 200公顷。这些举措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且有利于后世。但就当时而言，由此带来的好处主要归民团司令部和豪绅占有，一般农民不仅难得实惠，而且还得承担十分繁重的劳役。改出之地名义上业归原主，实际上则被民团挂上“西峡口司令部作民团费用”的牌子占为己有。随着石龙堰更名为“别公堰”，“周围的水地也就改‘别公地’了”②。

宛西自治的推行，改变了往昔盗匪横行的局面，使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对农村经济的恢复和文教的发展客观上起了一些积极作用。尤其是彭禹廷主持下的镇平自治，这种积极作用更为明显。但在别廷芳主持宛西四县后，情况起了变化，其所采取的有关举措就主导方面而言，

---

① 南阳地区地方志编委会:《南阳地区志》，第87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②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47辑，第51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

并没有促进宛西经济和社会的近代化，也没有给人民带来福祉，而且在政治上也属开倒车之例。就是这样的自治运动，在国民党独裁统治之下，也不允许其存在，宁洗古、彭禹廷等遇害后，别廷芳也因妨碍当局的政令统一几遭讨伐。别死后，宛西自治运动逐渐废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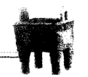
第五节　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和革命斗争的持续

一、抗日运动的兴起和国民政府迁洛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向沈阳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侵略战争。东北军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的指导下不战而退，东三省沦入敌手。

事变发生后，开封各大中小学校的学生立即行动起来，集会演讲，游行示威，查禁日货。9月23日，各界群众10万人举行反日大会，抗日气氛异常浓厚。27日，开封34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集会，议决正式成立开封各校反日救国联合会。各校以“准备对日作战，执戈御侮”为宗旨，纷纷成立义勇队、救护队，河大学生还创办了宣传抗日救亡的刊物。10月1日，开封各校学生8 000多人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组成学生请愿团，向国民党省党部请愿，要求其转呈国民党中央，迅速出兵收复东北，并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对日绝交。河南商界代表会通令各县商人誓死抵制日货。郑州、洛阳、信阳、安阳等地学生也纷纷罢课，举行反日集会和游行，掀起了自五卅运动后又一次抵制日货运动。12月中旬，“河南省抗日救国学生联合会”在开封成立，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河南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发展。年初在郑州设立的日本领事馆，见河南反日活动日渐高涨，极度害怕，遂于11月20日闭馆，日领事避往上海。

然而，以刘峙为首的河南军政当局于事变发生后，仍坚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顽固推行国民党一党专政，镇压群众运动，组织部队继续进攻红军，对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忧心忡忡，伺机镇



压。12 月 18 日，开封军警借口学生有“越轨”行动，逮捕了从事抗日宣传的 4 名高中师生，并以取消学籍来威胁从事爱国运动的学生。省内各阶层爱国人士对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莫不义愤填膺，纷纷谴责，对学生表示全力声援。开封各校学生数千人齐集省政府门前请愿，要求全国一致抗日，释放被捕人员。省当局迫于社会各界的压力，不得不释放全部被捕人员。20 日，刘峙指令省教育厅，要求学校自即日起一律提前放寒假，以免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扩大。

1932 年 1 月 28 日，集结在上海的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驻守在上海的中国守军第十九路军自动奋起抵抗，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但是，南京政府却畏敌如虎，于 1 月 30 日，仓皇宣布将政府机关迁洛办公（外交部、军政部仍留南京）。2 月 2 日，林森、蒋介石等到洛阳。到 22 日，南京国民政府各院、部迁洛阳者有：行政院、考试院、监察院、司法院、立法院、教育部、内政部、实业部、铁道部、交通部、司法行政部、最高法院、军事参谋院等。洛阳一时成为全国政治中心，报刊、通讯社、电台等新闻机构纷纷成立。

国民政府迁洛期间的主要活动，就是 4 月份召开的“国难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共同御侮案》及救灾、绥靖（即“剿共”）等案，对于举国企盼的取消一党专政、停止内战、共赴国难、抗御外侮、救亡图存等当务之急却不予理睬，因而遭到许多有识之士的猛烈抨击。不久，因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国民政府各院部陆续迁回南京。11 月 29 日，国民政府发布迁回南京令，12 月 1 日，国民政府正式迁回南京。

二、鄂豫皖红军的反“清剿”斗争和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一）国民党的反动措施

1932 年 10 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前后，国民党当局采取一系列反动措施，加强对苏区的统治，妄图从根本上消灭共产党和红军。

1. 设立豫南特区抚绥委员会，从政治军事上加强镇压。1932 年 1 月上旬，潢川、光山、固始、息县、商城五县豪绅以旅汴同乡会名义数次函呈国民党河南省党部、省政府联席会议，因豫南红军势力强大，要求



洛阳国民政府考试院旧址

划潢川、光山、固始、息县、商城、罗山、信阳、桐柏（后删去）、正阳等9县为特别区。25日，国民政府驻豫特派绥靖主任公署正式批准设立豫南特区抚绥委员会，张钫任委员长，下设秘书处及党务、政务、军务、总务四科。2月3日，豫南特区抚绥委员会在信阳成立。抚委会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统治，制定了县政府暂行组织条例，将县属各局裁撤，归并于县政府办理。同时撤换了特区内的所有县长，委任了一批劣绅、恶霸及反动官僚为县长、区长，依靠这些县长、区长团聚各县地主豪绅对革命群众反攻倒算。

1932年年底第七十六师调离豫东南，张钫返回开封，抚委会随之结束。

2. 对苏区民众进行屠杀、迁移。从1932年6月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到该年年底，国民党军队即在其占领区对原苏区群众进行残酷屠杀，制造了许多“万人坑”、“死人沟”、“无人区”。新县箭河地区（当年属黄安）原有17 172人，减少了12 663人，

占原人口总数的73.7%;8 427间房屋被烧掉6 884间,占原有房屋的81.7%;184个村庄中有53个被夷为平地①。卡房一带2 100多户人家中,有689户被杀绝。商城南部松子关、挥旗山、狗迹岭一带近百里成了无人区。1932年11月,豫鄂皖"三省总部"颁布《移民办法》,规定将收复区内之"附匪"人民无论男女老幼概行移出。1933年10月,划定经扶县②郭家河为移民试验区,此后,卡房、郭家河、箭河、泗店、陈店一带的群众,被强行迁到百里以外的周河、泼陂河甚至商城等地,又把那里的群众移到郭家河。当局设立的移民收容所,成了他们变相杀人的屠场。商城县4个收容所,用石灰水煮稀饭让被"收容"的苏区群众吃,先后有4 000多人因肠胃溃烂而死亡。



国民党军烧毁民房后的废墟

① 新县文管会、河南大学编写组:《新县革命史》,第13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② 1932年10月,"三省总部"划河南光山南部、湖北黄安、麻城北部为经扶县,1947年改为新县。

3. 恢复旧的土地关系和实行屯田。国民党军占领苏区后，立即夺去红军时期农民分得的土地，全面恢复了旧的生产关系。"三省总部"还公布了《剿匪区内屯田条例》，规定居民被移出后在人口稀少的地区实行屯田，屯田县农村之组织十户为一甲，以排长充甲长；十甲为一保，以连营长充保长；十保为一区，以团营长为区长，统隶属于屯田县长，"各以军法递相部署"[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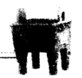
4. 实施反共文化教育。南京政府教育部认为原苏区及苏区附近儿童受共产党的教育影响太深，至今仍遗留于儿童脑海中，为此需要特别编写适用"匪化区域"之小学教科书，以便改造儿童心理，使之趋于三民主义[②]。1934 年 9 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赣闽皖鄂豫五省特种教育委员会"，颁布 5 省特种教育计划，对原苏区实行教、养、卫兼施之特种教育。1934 年 12 月，省当局公布了《河南省"收复区"中山民众学校章程》47 条，该章程就学校名称、教师聘任、课程设置、教学时间作了具体规定。1935 年 3 月，又制定了《河南省特种教育实施方案》，利用中山小学校和中山民众学校对原苏区民众强迫进行反共教育。

（二）红军反"围剿"斗争

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根据地中共组织依然领导军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当时，留在边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被敌分割在鄂东北、皖西等地区。郭述申等按照分局撤离前的指示组成中共鄂皖工作委员会，将分散在皖西的武装力量统一起来组建了红二十七军，军长刘士奇，政委郭述申，下辖第七十九师、第八十一师，共 4 700 余人。在中共鄂皖工委的领导下，由内线转向外线作战，多次打垮国民党军的追堵，于 11 月 24 日到达黄安七里坪附近，同鄂东北红军会师。29 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将根据地各红军主力团统一组织起来，重新组建红二十五军，坚持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30 日，重建的红二十五军正式组成：军长

① （台）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32 年卷，（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出版，1982。

② 中国第 2 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 1125 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吴焕先，政治委员王平章。全军5个团1个特务营，共约7 000人。

蒋介石在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后，仍用15个师又3个旅约20万人的兵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清剿”，限令1933年1月底前，将鄂豫皖边区红军“完全肃清”。

中共鄂豫皖省委在获悉国民党军新的“清剿”计划，同时又得悉红四方面军已进入陕南不可能返回鄂豫皖的消息后，遂于12月30日在经扶县大畈召开紧急会议，进一步明确了独立坚持鄂豫皖斗争的思想。会议为打破“围剿”作了部署，为恢复皖西根据地，决定组建红二十八军。1933年1月上旬，红二十八军在经扶大畈组成，军长廖荣坤，政治委员王平章，下辖2个团1个特务营，共3 000余人。13日，红二十八军在潢川四道河与国民党军第七十五师宋天才部韩文英旅激战，毙伤敌数百人，俘敌第四四六团团长焦克功。3月6日，红二十五军在经扶西南郭家河，全歼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2个团，中旬又在黄安九龙长岭和麻城杨泗寨两次给国民党军歼灭性打击。活动在皖西地区的红二十八军，下旬在商城门坎山与敌第七十五师激战，毙伤敌数百人，军政委王平章不幸牺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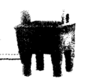
4月上旬，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八军在经扶南部大畈地区会合，中共鄂豫皖省委为加强红二十五军，决定将红二十八军编为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全军共1.2万余人。同时决定再度组建红二十八军（第八十二师）。4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先后在潘家河、杨泗寨地区，给敌以沉重打击。被国民党军分割的鄂东北根据地已经连成一片，皖西以汤家汇、南溪为中心的根据地也得到相对稳定和部分恢复。根据地内政权建设、党的队伍建设、地方武装等都得到加强。可惜中共鄂豫皖省委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影响下，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不顾敌强我弱的事实，要求红二十五军实施反攻，夺回被敌人占领的中心城市。5月2日夜，红军开始了对七里坪的围攻。该地区驻有国民党军第十三师6个团，修有坚固的防御工事，红军久攻不克，加上断粮、疾病、战斗减员及“肃反”造成的损失，部队减员近半，全军剩下6 000多人。6月13日，省委不得不放弃对七里坪的围攻，转移到皖西根据地

休整。严酷的形势，使中共鄂豫皖省委不得不重新考虑斗争方针问题。10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就一年来反“围剿”斗争进行了全面检查，检讨了导致失败的原因，并重新制定了斗争计划，决定“采取游击方式来牵制敌人、消灭敌人，以恢复和巩固苏区”①。按照省委新的斗争方针，红二十五军在根据地内开展游击战争，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胜利地坚持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鄂东北根据地得到部分恢复，部队装备也有所补充。在皖西地区坚持斗争的红二十八军，在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郭述申领导下，在商城、固始等地多次破敌，缴获大批军用物资，部队装备有所改善，3月上旬转进至商城南部葛藤山地区，击溃由南溪进犯之敌第五十四师一六一旅2个团，使皖西根据地得到恢复，红军也逐步摆脱了被动局面。

1934年2月初，蒋介石改组“三省总部”，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此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王以哲、第五十七军何柱国等部调到鄂豫皖地区，对红军发起新的“围剿”，并在军事进攻的同时，采取经济封锁，以求困死红军。还在苏区周围和苏区内大修碉堡，形成网线，实行军事封锁。这些碉堡纵横交错，密如蛛网，根据地被分割成许多小块。

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趁东北军布防尚未就绪之机，与红二十八军会合，开展反“围剿”斗争。4月16日，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八军在商城豹子岩会师，省委将红二十八军重新编入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吴焕先，下辖两个师共3 000余人。红二十五军离开商南西返鄂豫边，国民党军驻沙窝之一〇九师派出两个营尾追。红军设伏诱敌深入，一战毙伤敌100余名，俘敌52人。这是鄂豫皖红军对东北军的首次打击。6月，省委领导红二十五军在罗山朱堂店南北地区进行恢复和开辟根据地的工作，扫清民团，镇压反动分子，建立政权和地方武装。12日，国民党军两个多师向朱堂店进犯，红军向东南方转移。17日行至罗山长岭岗，发现一部敌军疏于戒备，红军立即向敌突袭，敌

① 中央档案馆等：《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418页，1985。



夺路回窜，冲动其一一五师师部，敌师长率残部逃往倒座营。长岭岗大捷后，红二十五军东进皖西地区。

（三）红二十五军长征

11月4日，中共鄂豫皖省委收到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的来信，得知中央建议省委率红二十五军速到鄂东北，研究今后行动计划。省委遂率红二十五军于11月6日由商南葛藤山西进，先后强行通过四道封锁线，一昼夜急行军100多公里，8日上午到达光山斛山寨。敌军10个团跟踪而至，从两面向红军发动突然袭击。红军仓促应战，形势十分不利。军首长果断决定以一部扼守制高点，钳制敌人，另以两个团迂回到敌军侧后实施突袭。红军战士发扬英勇顽强的作风，变被动为主动，将敌军击溃，毙伤敌4 000余人，缴获武器弹药甚多。

10日傍晚，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光山花山寨收到中共中央《关于组织抗日先遣队的通知》和《致鄂豫皖省委训令》等文件。11日，省委在花山寨召开常委会议，中央派来的程子华传达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鉴于鄂豫皖地区敌人力量过于强大，红军和根据地难以存在，中央决定红军主力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会议经过讨论一致同意中央的指示，"决定集中大部分地方武装和一部分干部随同省委、红二十五军暂离开原有苏区，过平汉路西，为创造新苏区根据地而斗争。留红二十八军及一部分地方武装和一部分干部在老苏区进行游击战争和秘密工作"①。省委常委高敬亭受任留在鄂豫皖根据地领导红二十八军坚持斗争。花山寨会议后，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到达罗山何家冲。为实施战略转移，将部队进行整编，撤销师一级建制，军直辖4个团，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全军2 980人。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省委的率领下，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由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西挺进，开始了长征。

17日，红军在朱堂店以南之罗古寨击退了敌军的进攻，当晚于东

---

① 中央档案馆等：《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569页，19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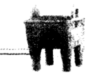
双河至柳林间越过平汉铁路。25日跳出了敌军的追堵合围，进至泌阳象河关。26日，红军与敌激战后，绕道叶县保安寨以北，穿过了许（昌）南（阳）公路，沿着叶县、方城边界西进。12月1日进入嵩县，3日进抵卢氏栾川镇。4日红二十五军发现由开封调来的国民党军第六十师已在五里川、朱阳关、黄沙镇布防，敌“追剿”第二支队也已进至庙子、栾川一带，遂决定择小路进入陕南。12月5日，红军派出少数部队从卢氏到朱阳关以东迷惑敌人，主力则由朱阳关东北35里处转向西北，当日晚兵临卢氏城下，由卢氏城南与洛河之间的隘路神速西进，敌第六十师筹谋多日的堵击防线成为画饼。8日，红二十五军经豫陕交界的铁锁关，胜利进入陕南，开始了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方城独树镇寨门

（四）鄂豫皖区的三年游击战争

红二十五军长征走后，鄂豫皖边区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根据地大部分丧失，留下的红军和游击队不足2 000人，且处于敌人的分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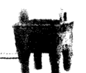
包围之下，而国民党军留在大别山区继续"清剿"的还有10余万人的正规军，外加12个保安团和地方民团，将边区划分为4个"驻剿区"，继续大修碉堡网，广设封锁线，以追、堵、围、截等手段，对几块苏区进行梳篦式的"清剿"，辅之以厉行保甲连坐和移民并村，人为地制造了许多百里无人区。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红军战士和伤病员，不但要对付敌人的"清剿"，而且连粮食、药品都发生了严重困难。1935年1月底，少共鄂东北道委书记方永乐和鄂东北独立团政委徐诚基与高敬亭率领的红二一八团在立煌县（今安徽金寨）抱儿山会合，方永乐转交了省委给高敬亭的指示信，高敬亭这才知道省委已率领红二十五军离开了鄂豫皖。2月3日，高敬亭在太湖县凉亭坳召开干部会议，按照省委指示，将红二一八团和鄂东北独立团合编，重建红二十八军，高敬亭任政委（无军长），实行党政军统一领导。红二十八军下辖第八十二师、军直手枪团。这是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标志着边区革命斗争危急关头又有了一支主力武装，重新形成了统一的领导和指挥，从而为坚持边区的革命斗争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红二十八军重建后，立刻遭到敌人的追击与合围。红军突破敌人的数次堵截，2月14日转战至霍山。15日，红军乔装进入安徽省财政厅长余谊密在潜山王庄老家宅院，全歼王庄之敌，擒余谊密父子，缴获200多枝步枪、2挺机枪、1万多发子弹，这是红二十八军重建后给敌人的第一个打击。鉴于国民党军已开始部署对边区新的"清剿"，形势十分严峻，高敬亭等集议决定主力部队离开鄂豫皖边区，越过平汉路，西进桐柏山区，待机北上陕南与红二十五军会合；红二四六团留在当地坚持斗争。随后红二十八军离开皖西进入豫东南。22日，越过平汉铁路，28日到达泌阳县王道岭地区。此时要去陕南，必须通过南阳平原，那儿有庞炳勋第四十军及骑兵师的堵截，背后追兵已近，与红二十五军会合的计划无法实现，因而决定重返鄂豫皖。6月1日，红二十八军在桐柏西部程湾棺材沟设下埋伏，重创敌六一四团。6月9日，越过平汉铁路，东返鄂豫皖边区，前后历时月余，行程千余里，打乱了敌人的"清剿"部署，红军也得到了锻炼，改善了装备，提高了战斗力。

红二十八军重返鄂豫皖边区后，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总结出了“四打四不打”的游击战术，即敌情明、地形好、缴获大、伤亡小就打，否则就不打。鉴于国民党军以“驻剿”、“追剿”、碉堡网、封锁线相结合，红军行动更加困难，红二十八军遂决定以营为单位分兵游击作战，使国民党军以旅为单位的军事优势难以施展。敌东扑西撞，捕捉不到战机，弄不清主攻方向，虽有数十万之众，对红军则是堵截不遇，追击无着，依然陷于被动地位。红二十八军则在外线分散游击、寻机歼敌，活动范围遍及鄂豫皖边区40余个县。

国民党军以大部队反复“清剿”失败后，1935年夏秋之际又利用“碉堡、地捕哨、倒林”“三位一体”的“清剿”手段，妄图消灭边区红军。红军作了相应的反“清剿”部署：敌修碉堡，党组织群众白天尽量怠工拖延时间，夜晚由便衣队予以破坏。对“地捕哨”，尽量争取倾向于红军的基本群众放哨；对于“倒林”，秘密发动被迫参加的群众消极怠工，或只砍树干、树枝，或故意把树干留得很高，经过一段时间又成了葱郁的山林。在对敌斗争中，还创造了便衣队这一新的组织形式。这是一种由地方基层干部和群众组织起来的军政结合的小型队伍，他们身穿便衣，携带武器，一个小队三五人、十数人不等，白天分散于群众之中，夜间捕杀反动分子，为游击队提供情报与生活物资。由于他们熟悉本地情况，便于隐蔽，行动灵活，敌人很难对付，在边区获得广泛发展，高潮时边区便衣队有80多个，在豫东南地区有40个。便衣队在粉碎国民党军“三位一体清剿”等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6年1月，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豫鄂皖边区“清剿”总指挥。卫立煌鉴于前几次“清剿”失败的教训，制定了“五个月清剿”计划，增修封锁线，划定“绥靖”区实行分片“清剿”，搜山、烧山，移民并村、厉行保甲连坐等同时进行。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根据这一情况作出了反“清剿”部署：红军跳到敌人包围圈以外，以营为单位分散游击，利用伪装战术，巧妙地打击敌人。各地方武装也积极配合红二十八军进行反“清剿”。敌人的封锁线、碉堡网失去了作用，其喧嚣一时的“五个月清剿”被粉碎。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虽已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但在南方，却趁各地红军游击队尚未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之际继续疯狂“清剿”。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豫鄂皖边区督办，集中8个师又20多个保安团，自5月起，对边区实行“三个月秘密清剿”。红二十八军未能及时转入外线作战，多次陷入敌人重围。但是鄂豫皖军民有着极顽强的战斗精神，分散突围出来的人员很快又集中起来，与转移在外线的部队互相配合，袭击敌人碉堡，歼灭反动民团，保留下革命火种。国民党妄图在三个月内消灭大别山区革命力量的计划又告破产。

(五)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鄂豫边区是指豫西南南阳、邓县、新野、镇平、内乡、泌阳、桐柏、唐河及湖北枣阳、宜城、襄阳等县市。大革命期间，这里就建有共产党组织，并开展了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在这儿组织了多次起义，虽然未能成功，但使革命者受到了锻炼，积聚了力量。1930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豫西南和鄂北两地党组织合并，以便扩大鄂豫边区的武装斗争，进而创建鄂豫边区革命根据地。10月初，中共鄂北特委和南阳中心县委在邓县白落堰召开联席会议，遵照中央指示，组建了中共鄂豫边区特别委员会，郝久亭任书记，特委机关设在南阳城内，下设襄阳、老河口、南阳3个中心县委，领导豫西南的南阳、镇平等8县和鄂北的襄阳、枣阳等14县。10月17日，特委在枣阳县蔡阳铺召开万人大会，宣布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及鄂豫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均由程克绳任主席。从此边区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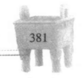
中共鄂豫边特委建立后，在巩固襄枣宜苏区的同时，决定调当年5月诞生的红二十六师北上，开辟唐河、桐柏、泌阳苏区，扩大鄂豫边革命根据地。11月下旬，红二十六师主力和襄、枣、宜等县赤卫队共千余人，北上豫西南，30日黎明攻入唐河县城，次日成立唐河县苏维埃政府，宣布豁免一切苛捐杂税，当众焚烧了田赋人丁账册。后因遭当地反动民团袭击，红军被迫撤离唐河县返回鄂北。

1931年1月，国民党军对襄枣宜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4月下旬，红二十六师被敌军包围、冲散，师部遂决定分散活动，开展游击战

争。五六月间，贺龙率红三军主力由湘鄂西转战至鄂西北，红二十六师分散隐蔽的战士乘机迅速集结并恢复了建制。红三军还抽出200余名干部充实红二十六师。11月，中共中央决定将鄂豫边区划归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改组了特委，沈宗源任书记。1932年2月初，中共鄂豫边特委改组为鄂豫边临时省委，沈宗源任书记；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改组为边区临时省苏维埃政府，王明鹤任主席。沈宗源在这次反"围剿"开始时盲目轻敌，后又悲观失望，2月17日私自逃离苏区（后被中央开除党籍），3月底，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派尉士筠来到鄂豫边区，改组了临时省委。但改组后的临时省委继续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反"围剿"斗争中采取错误的军事方针，命令红军死守苏区，使红军在强敌进攻之下连遭失败，5月下旬在襄东马鞍山一战，1 300余人的红军仅有170余人突出重围，转入外线作战。临时省委强令突围部队返回苏区。6月15日，吴寿青率部返回途中陷入敌人重围，吴寿青等200余人英勇牺牲。边区党组织也多次遭到破坏，失去了统一领导和同上级的联系，革命斗争陷入严重危机。

在此危急关头，原临时省委委员张星江及仝中玉、张旺午等分头联络泌阳、唐河等县党组织，于7月初在新野召开了各县党代表会议，决定建立中共鄂豫边区临时工作委员会，继承鄂豫边临时省委的职责。会议推举张星江为书记。会后，临时工委根据反"围剿"斗争以来的经验教训，就如何整顿组织、加强秘密工作及组织发展等问题作出决议，制定了新的斗争策略和方针。此后，豫西南各县党的组织得到逐渐恢复，边区临时工委并通过河南省工委与上海中央局取得了联系。

1934年1月，张星江作为鄂豫边区党组织的代表，在江西瑞金参加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列席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会议期间，红军总司令朱德亲切接见了当选为"二苏"主席团成员的张星江和王国华（河南省工委代表），向他询问了鄂豫边区的情况，指示他们要在敌人三不管的地方，开展游击战争。张星江返回边区后，立即召开临时工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有关指示精神，正式建立了鄂豫边工委，会议着重讨论了武装斗争和开辟游击根据地的问题。



1935年春，河南省级党、团组织因遭严重破坏而不存在，由中央苏区返回河南的王国华，在豫南联络同志，使汝南、确山等县党组织得到恢复。7月下旬，王国华同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星江通过商谈，决定将豫南、豫西南两地党组织合并，成立新的领导机构。8月，中区鄂豫边省委在唐河毕店镇宣告成立，张星江任书记，从此鄂豫边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9月，鄂豫边省委派原河南省委军委书记周骏鸣去信阳吴家尖山一带开辟新区工作，并迅速打开了局面。1936年1月4日晚，张星江在信阳吴家尖山小石岭村宣布：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成立，周骏鸣任队长，王国平任副队长，张星江兼任指导员。全队共7人，两枝半枪。随后，游击队进入桐柏东部的铁幕山，在群众的配合下，先后镇压了一批反动保长，极大地震慑了反动豪绅，游击队也发展到30多人，初步形成了以桐柏山支脉铁幕山为中心的游击区。



鄂豫边红军游击队诞生地

3月27日晨，张星江、周骏鸣等带着手枪队员，化装进入桐柏县平

氏镇庙会，在群众配合下，从豪绅、民团手中夺获长枪5枝、手枪4枝。撤出时遭敌袭击，省委书记兼游击队指导员张星江中弹牺牲。事后，王国华、仝中玉、周骏鸣等共同研讨了新的斗争方针，并对省委进行了改组，仝中玉任书记，由邓一飞任游击队长。5月，国民党军开始对鄂豫边区进行大规模的“清剿”，游击队分为3队跳出敌人的“清剿”圈子，在唐河、新野、确山等县打击土豪劣绅，既发动了群众，游击队也逐渐壮大，并于8月中旬，重新会合。10月，省委与中共中央北方局取得联系，边区革命斗争开始步入新的历史时期。西安事变后，国民党仍调集部队对鄂豫边区进行“清剿”，边区再次面临严峻的形势。为了全面了解全国形势，得到中央指示，鄂豫边省委派组织部长周骏鸣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情况。朱德总司令指示周骏鸣：“你们要猛烈扩大，扩大到他们消灭不了你们的时候，他们就会来同你们谈判。”[①]边区省委遵照朱总司令的指示，游击队得到迅猛发展，在日后抗日战争中成为一支驰骋疆场的劲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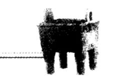
三、共产党在白区的革命斗争

1932年间，国民党进一步加强了在河南的独裁统治，中共河南省委迭遭破坏，许多革命者被捕甚至牺牲。但各地基层组织与党员并没有被严重的白色恐怖吓倒，即便与上级失去联系，仍随处开展革命活动，震撼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一）沙区盐民暴动

豫北南乐、清丰、濮阳、长垣（当时均属河北省，加上今属山东的东明县，时称直南五县）、内黄、滑县等，同处黄河故道，有一条沙丘地带。这里地下水位高，土地大面积碱化，许多农民靠制硝（小）盐餬口。官方坚持食盐专卖，严禁硝盐，因此，盐巡与盐民常常发生冲突。1932年春，中共直南特委军委书记高克林、濮阳中心县委书记王从吾，为组织盐民同盐巡斗争，在濮阳成立了“民生盐会”，很快发展到周围十余县。为领导盐民开展更大规模的斗争，高克林、王从吾等成立了“盐民斗争

① 周为松：《中原烽火》，第20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总指挥部”。5 月 15 日，濮阳盐民 3 000 余人，捣毁了盐巡驻地，并进行游行示威，濮阳县长带领保安队前来镇压，反而被盐民包围，被迫答应了盐民提出的驱逐盐巡出境和准许盐民制、卖硝盐等条件。南乐、清丰、滑县等县盐民群起响应，向盐巡展开斗争。各县盐民协会纷纷成立，会员达 8 万多人。7 月，清丰、南乐、濮阳等 10 县盐民代表在清丰裴营召开会议，成立了“两河（指河南、河北两省）盐夫联合会”，推选王从吾为总会主席，通过了《两河盐夫联合会总章》（草案）。沙区盐民的这场斗争，使广大群众受到了教育，党的组织得到发展，为日后的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沁济暴动

1932 年 3 月，中共济源县委遵照省委有关指示，作出了发动农民起义、开展游击战争的计划，并进行了各项准备。当时河南白色恐怖十分严重，7 月底，中共河南省委遭到严重破坏，国民党省当局急令各地搜捕共产党人。济源、沁阳党的领导人党继新、郭大佛在群众掩护下脱险，找不到上级组织，遂决定按原计划发动起义。9 月 6 日夜，党继新、郭大佛等集合暴动队员在沁阳县紫陵镇义庄收缴了民团的枪支，宣布起义，成立晋豫边红军游击队。在逯寨村打开地主的粮仓，将粮食、财物分给贫苦农民，然后北进太行。党继新等又转往济源新庄发动起义。9 月 9 日，党继新等率领暴动队员直入武山镇区公所，毙敌 7 人，缴枪 10 余枝，将地主家 100 多石存粮分给了农民。随后，党继新分别将沁阳、济源起义队伍改编为晋豫边红军游击队第四、第七大队。

沁济暴动的消息震惊了国民党当局，两县出动大批保安团和民团，向红军游击队进攻。刚刚诞生的四大队和七大队均被敌打散。数日后，郭大佛等又联络了十余名被打散的游击队员，进入四周环山的原大寨，以此为根据地，开始了晋豫边游击战争。到 11 月队伍发展到 100 多人，遂扩编为晋豫边红军第一大队，下设 3 个中队。11 月 19 日，当局集中千余人的反动武装，分两路向原大寨进攻。游击队凭险据守 4 日，给敌以杀伤。23 日，敌军占领了原大寨制高点，居高临下，猛烈射击，党继新等壮烈牺牲。游击队无法抵抗，只好分散突围，晋豫边游击

战争结束。

（三）工人斗争

在此期间，焦作煤矿、豫丰纱厂、汲县华新纱厂、安阳六河沟煤矿等厂矿先后发生过工人罢工等反抗资本家和当局的斗争。这些斗争都给国民党以不同程度的打击，对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也是一种间接支援。

但是从总体上说，河南的政治环境十分险恶，1934 年 10 月，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部长张国诚和团省工委书记李毓华被捕叛变，新任省委书记许包野被捕牺牲，省委工作人员多数被捕，河南各地组织被摧毁殆尽。1935 年 2 月，豫丰纱厂党员徐凤山在上海被捕后叛变并组成假省委，以和各地组织联系为名，将上年 10 月省委遭破坏后硕果仅存的郑州、荥阳、伊川、漯河党组织彻底破坏，许多党团干部被捕，河南白区党组织损失几乎达百分之百。一年多中，河南没有省委组织，在各地继续秘密活动的党员多与组织失去联系。

1936 年 1 月，沈东平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派遣到河南恢复党的组织，他在许昌与郭晓棠等取得了联系。7 月，中共河南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在许昌成立，沈东平为负责人。省临时工委首先抓了各地组织的恢复与重建，吴芝圃、曲乃生等一批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先后恢复了党籍。中共郑属工委会、中共豫西临时工委会、中共豫东特委等以及一批县委、党支部次第成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各地党组织利用日趋高涨的抗日浪潮，团结各界爱国人士，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省境革命斗争重新出现了蓬勃生机。

四、走向全民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并炮制出伪满洲国，把中国东北变成了任其宰割的殖民地之后，又侵犯热河和长城各口及其以南地区，1935 年夏，迫使南京政府与其签订了《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中国的主权大量丧失。11 月，汉奸殷汝耕在日本的扶植下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冀东 22 个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统治。屈辱卖国的国民党政府，为满足日本侵略者"华北特殊化"的要求，在北平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华北即将变为第二个伪满洲国。中国人民痛感



华北的沦亡已迫在眉睫，长期被压抑的爱国情绪猛烈地爆发出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1935 年 12 月 9 日，北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消息传到河南后，开封各校学生立即行动起来，河南大学、河南水利专科学校、开封北仓女中、省立开封高中等校纷纷发表通电，集会游行，声援北平受难学生，反对华北自治，吁请政府维护国家统一。开封各校校长决定由校方出面组织开封中等以上学校反对华北自治示威游行大会。21 日上午，开封公、私立中等以上 40 余校 12 000 余名师生，齐集河南体育场，举行反对华北自治大会，会后进行了游行。随后，各校学生又进而决心打破官方的控制，自己行动。23 日晨，开封高中学生首先冲出校门，继之省立初中、省立女中、水利专科学校、河南大学等 30 余校 13 000 多名学生汇入了游行队伍。他们齐集省政府门前请愿，向当局提出 5 条意见：要求国民党中央电慰北平同学、公开外交内幕、严厉制裁宋哲元、提倡学生爱国运动、取消华北伪组织。省政府主席刘峙见群情激愤，只好转电国民党中央。当日下午，开封市学生代表大会在开封高中召开，宣布成立开封各校学生救国联合会。大会还决定 24 日起罢课 3 天，等候当局对上午所提 5 条的答复，如果南京政府不作答复或虽答复但不能令人满意时，即一面派代表南下请愿，一面作第二次游行。24 日，开封全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实现罢课，分别组织宣传队，向市民宣传抗日救亡。

26 日，开封 38 校万余学生再次齐集省政府门口，要求对 23 日所提 5 条作出答复。当局派人推诿，引起学生义愤，有人高喊：到南京去！到车站去！一呼百应，学生蜂拥奔向南关火车站。恰有一列西来快车停在车站，部分学生迅速登车，列车停发，陇海路交通中断。28 日晨，天气突变，大雪飘飘，万余学生仍然立冰卧雪，坚持斗争。学生的爱国行动感动了社会各界，开封邮务工会、铁路工人及教育、卫生、医疗、文化、工业等单位和团体及个人，纷纷购买食品、携带医疗器械及药品等到车站慰问学生，学生趁此机会向各界群众痛陈国难，抨击国民党当局的妥协政策。慰问变成了群众爱国行动，并形成波及全省的抗日救亡浪潮。29 日晚，南京政府派教育部秘书主任周淦、督学谢树英等到开

封，答复了学生的请愿条件，“劝慰”学生返校。30日，开封市学生联合救国会认为卧轨斗争目的已经达到，决定全体学生撤离火车站。

与开封学生卧轨斗争的同时，焦作工学院学生于晋京请愿途中在徐州南三铺车站卧轨，津浦路交通中断。郑州、洛阳、信阳、商丘等地的爱国学生，不顾当局的禁令，不怕军警的威吓，冲破阻挠进入车站，卧轨索车，在全省掀起了一二·九运动的高潮。

在一二·九运动影响下，河南各界人士纷纷行动起来，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抗议政府的妥协政策，要求对日宣战，很快形成抗日救亡运动高潮。适应抗日救亡的需要，各种救亡刊物纷纷创办，发表大量抗日救亡的文章，有力地推动了河南的抗日救亡活动。河大著名教授嵇文甫在《救国先锋》报上撰文，批驳了当局对学生运动的诬蔑中伤，热情地赞扬道：目前学生运动为的是民族、国家和4万万人的身家性命与人格。这样壮烈的斗争，“把全国麻木的心灵震动了，五四运动复活了”[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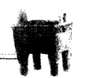
然而，河南当局却秉承国民党中央的旨意，对救亡运动百般破坏、镇压。1936年4月20日，开封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向全省各中等学校学联发出通知，邀请派代表赴开封共同成立省学联。省当局得知后，立即饬令省会公安局“严加取缔”，通令各校遇有此项通知“立即焚毁，并阻止学生来省集会”[②]。开封学生对当局的做法极为愤慨，22日市学联召集各校代表开会，议定为抗议当局的无理行径组织全市学生游行。公安局出动军警包围了会场，当场捕去24名代表。各校学生闻讯无不愤慨异常，23日晨，河南大学、开封高中、北仓女中、开封女中等校学生全体出动，齐集省政府门前示威，抗议当局的暴行，要求释放全体被捕学生。24日，省政府迫于社会各界的压力，只得释放被捕学生，“谕令各校长带回负责管束”[③]，之后即强行将学生救国联合会取缔。

---

① 开封《救国先锋》，1936年1月1日。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四），第54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四），第54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到10月,河南抗日救亡运动又有新的发展。先是1936年2月1日,经过一二·九运动的洗礼成长起来的先进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北平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8月,北平民先队总部派魏伯回河南建立组织。魏伯与先期返乡的河南籍民先队员刘清原先后联系了河南大学、开封高中、开封女师、开封女高等校的进步学生,并与民先队建立了联系。此后,民先队总部多次派人来开封指导工作。10月,河南民先队在开封成立,邓子健(邓拓)为队长。至次年初,杞县、漯河、洛阳、新乡、许昌、商丘、长葛等地均建立了民先队组织。民先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大进步青年,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在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灭亡中国的严酷现实,国民党政府在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方针的同时,也不得不对抗战做些准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拟将全国划为三道防卫区域,河南区为第二线。1936年又将全国划为抗战区、警备区、绥靖区、预备区,河南与冀、察等10省列入抗战区。河南区预定战场的阵地设置为豫北阵地、归兰阵地、汴郑阵地、巩洛阵地。省当局遂于1936年起组织人力物力,在上述预定阵地修筑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防御工事,主要为碉堡、掩体,1937年上半年基本完成。当局还多次组织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开封设立了防空情报所,各县、市成立了防空协会,并进行防空演习。1936年11月,傅作义指挥所部在绥远突袭日伪军,并多次给敌以沉重打击,先后收复了百灵庙、大庙。消息传到河南,全省人心振奋,万众欢腾。省当局适时组织全省各界掀起援助傅作义绥远抗战的热潮。开封、郑州、洛阳等地组织了援绥会、慰绥会,进行广泛的宣传和募捐运动。尽管从总体上说,省政府的抗战举措带有很大的片面性,有些则停留在计划及口头上,但通过上述这些举措,毕竟进一步激发了人民的抗战意识,有利于全民抗战局面的形成。

第四十二章
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

第一节 全民抗战局面的形成

一、日军犯境和中国军队的顽强抗击

1937 年 7 月 7 日夜，驻北平郊区丰台的日军炮轰宛平县城，向中国驻军发起进攻，驻守卢沟桥附近的中国守军奋起反击，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正式爆发。

七七事变在全国引起极为强烈的反响。7 月 8 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人民奋起抗战。蒋介石在试图让英、美等国调解中日冲突的希望破灭后，17 日在庐山发表第二次谈话，表示了中国抗战的立场。

日军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后，接着向平、津发起进攻，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8 月 13 日，日军入侵上海。8 月 12 日，国民党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决定以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20 日，将全国划为 5 个战区，其中平汉、津浦路方面为第一战区，蒋介石兼司令长官。为加强主战场防御，国民政府决定在平汉、津浦路沿线设立三道防线，其中安阳至济南为第二道防线，洛阳至开封至徐州至淮阴为第三道防线。

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战火很快便烧到了河南。8 月 1 日，日



军飞机袭扰郑州，9月16日轰炸洛阳，10月23日轰炸安阳。其陆军在进攻山西的同时，以第十四师团全部及第六、第十六师团各一部，沿平汉线向豫北进犯。10月18日抵漳河北岸，19日分三路向漳河南岸攻击，其第十四师团偷渡漳河，与第五十二军激战两昼夜，战况至为惨烈，第五十二军伤亡团长曾谦以下官兵3 600余名。日军亦伤亡惨重，被迫退回漳河北岸，两军遂于丰乐镇、安阳间形成对峙状态。10月底，晋东娘子关告急，中国军事当局调第二十军团赴山西增援，以商震部第三十二军守备安阳。11月4日，日军渡过漳河猛攻安阳，安阳防御工事大部被摧毁，中国守军伤亡甚重。以后3个月，日军与中国守军第五十三军万福麟部及第三十二军商震部，相持于安阳南宝莲寺一带。

1938年2月7日，日军发动豫北作战。一路馆支队自大名南犯，因南乐、内黄、清丰、濮阳一线无正规防守而相继失陷，13日长垣、滑县失守。自安阳沿平汉路南犯之日军第十四师团土肥原部，向宝莲寺中国守军阵地进犯。我新编第九师高树勋部与敌血战四昼夜，因工事被毁，伤亡过大，撤出阵地。左翼南下之敌15日向西转进，图与第十四师团会合攻击新乡一带之第一集团军宋哲元部。宋军未能组织有效抵抗，先后放弃新乡、获嘉、修武、焦作，向沁阳、济源以西转进。19日，中国军队将平汉铁路黄河大桥彻底炸毁。2月底，豫北各县均告失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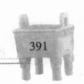
在东线，1938年4月，中国军队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于台儿庄歼灭日军1万多人，取得了重大胜利。随后，中日双方各以精锐部队展开徐州会战。5月15日，南北之敌对徐州形成合围。中国最高军事当局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决定放弃徐州。19日，五战区部队向西南转进，日本大本营下令各部追击作战。22日，日军第十师团矶谷廉介部西进，相继攻陷亳县、柘城。日军第十六师团中岛今朝吾部攻占砀山、马牧集，到达商丘。5月17日，日军第十四师团土肥原贤二部经菏泽直犯陇海路，主力进至内黄集，准备攻占兰封，切断中国军队西撤退路。为掩护第五战区部队突围，并消灭孤军深入之敌第十四师团，中国军事当局以10万大军组成豫东兵团，由薛岳指挥向被围困在兰封城、罗王车站及罗王寨的日军第十四师团发起总攻击，28日敌被



在黄河南岸阻击日军渡河南犯的中国军队

困至三义寨、曲兴集一隅，作困兽斗。但驻守商丘之第八军黄杰部与敌激战两日后撤离，日军遂多路进犯太康、杞县、宁陵、睢县、民权等地。中国军事当局为避免与敌在豫东平原决战，乃令各军向平汉路西转移。日本华北方面军令各部沿陇海路西进，图取郑州，然后沿平汉线南下进攻武汉。6月3日，日军攻占尉氏、通许等地，4日夹击开封。中国守军第一四一师及警备旅面对日军第十四师团和第十六师团一部的联合攻击作了顽强抵抗，6日开封陷落。7日日军进陷中牟，复分三路西进，一路已攻占新郑，郑州告急。

为了遏止日军深入，还在兰封战役结束前，即有人建议在考城以西决黄河堤阻敌西犯。豫东各军决定西撤后，6月1日蒋介石在汉口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秘密决定决黄河以阻敌前进。先由一战区决定在中牟赵口决堤，限于4日夜12时放水，并由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负责实施。商震令第五十三、第三十九军各1个团先后在赵口决堤两处均未成功，新八师师长蒋在珍主动请缨，改在郑州花园口扒堤。他先将



周围9公里内的老百姓强行隔离，然后选用800名身强体壮的士兵，于6日晚开始作业，9日上午用炸药将堤内石基炸坏，开始过水。约1小时后，决口扩大，黄河主流南移。第二天，因上游连日大雨，水量猛增，滔滔黄水顺决口涌出，沿贾鲁河向中牟、尉氏、扶沟、西华流去，黄河改道。西进日军第十四、第十六师团遭受洪水的威胁，向东撤退，被隔阻在河西的数百名日军被歼，暂时阻挡了日军的继续西进。但花园口决堤造成黄河改道，使豫皖苏3省40多个县市的广大地区成为泽国，80余万人死于洪水，上千万人流离失所，并形成连年灾荒的黄泛区，给泛区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



花园口决堤后，数百万灾民扶老携幼逃走他乡

花园口决堤后，日军改变由平汉线南下会攻武汉的部署，以主力沿长江、一部沿大别山北麓西进。8月20日，日军第二集团军下达作战命令，决定分南北两路作战。8月末，北、南两路日军攻陷六安、霍山，分别向固始、商城推进。9月2日，南、北两路日军第十三、第十师团协力攻击叶家集和富金山。守备商城东侧到固始富金山一线的中国军队第七十一军宋希濂部，严阵以待，顽强阻击，守军绕出敌后上下夹击，痛

歼顽敌。日军在富金山遗尸千余具，每个中队（连）减员到40人，旅团长亦受重伤。日军第二集团军将第十六师团调到叶家集，迂回第七十一军左翼，向商城突进，以切断七十一军退路。敌军以飞机、大炮轮番向富金山轰炸，接着又施放毒气，守军阵地成为一片焦土。11日，第七十一军被迫后撤，富金山失守。16日，日军第十六师团攻占商城。双方激战1个多月，日军以伤亡4 000多人的代价，突破中国军队在大别山地区的防线，10月25日占领麻城，南犯武汉。

北路日军第十师团9月6日攻占固始，12日逼近潢川，中国守军第五十九军张自忠部官兵协力奋勇杀敌，敌遗尸累累，潢水为赤，第五十九军亦受重大伤亡。18日潢川失陷。日军接着攻占光山、罗山，逼近信阳。10月12日，日军在强大火力配合及坦克掩护下，从北、东、南三面向信阳猛攻。中国守军进行了十分顽强的抵抗，歼灭日军2 600余人后，向西撤离。10月16日，日军第十师团沿平汉线西侧向武汉推进，中国军队依托桐柏山区对日军进行顽强抗击，阻滞了日军第三、第十师团的行程，待26日该路日军通过桐柏山区向孝感、应城推进时，武汉会战已经结束。

总的来看，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在豫北、豫东、大别山北麓等战场都进行了顽强作战，与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一样，都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打破了日本妄图以"速战速决"的战略迅速占领整个中国的计划。

二、中共河南省委的重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适应抗日救亡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河南省委，并指定朱理治负责筹备。7月中旬，朱理治、刘子久等在陕西三原县云阳镇调集部分河南干部，办了两期训练班，为中共河南省委的重建做了必要的准备。9月中旬，中共河南省委在开封正式成立，朱理治任书记。开封沦陷前，省委迁至确山县竹沟镇。

中共河南省委遵照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示各地要努力克服关门主义倾向，"大胆向工农阶级及劳苦大众开门，大量发展工



农党员"，"大批提拔工人干部及农民干部，扩大党在农村中的基础"[①]。各地认真执行中央和省委的决议，利用多种形式，扩大党的组织。当年9月，全省党员已由省委重建时的150余人发展到8 000多人，建立了8个特委，特委之下设有中心县委，绝大多数县份建立有党的组织。党员队伍的扩大和各级组织的建立，为组织和领导各地的抗日斗争奠定了基础。

为了提高党员的素质，加强党的建设，省委先后在机关驻地竹沟，开办了6期党训班，培训了1 000多名县、区级干部。这些新干部通过培训，提高了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增强了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理解，并迅速打开了各地的工作局面。

中共河南省委在大力加强党的建设的同时，又根据中央精神，使国共两党达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原迅速落实。坚持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的红二十八军和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反复"清剿"，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当局虽然停止了军事"围剿"，但企图通过"谈判"改编来取消红军游击队，以达到其军事"围剿"未能实现的目的。红二十八军和鄂豫边游击队仍然面临严峻考验。1937年夏，党中央指示红二十八军：国共两党正在谈判合作抗日，红二十八军要尽量设法同国民党谈判，"在谈判中，首先要停战，把部队散在外围，不要集中起来，防止敌人歼灭我们。谈判时，我们的部队不能接受国民党的任何名义和任务；谈判后部队集合的地点，一定要找群众基础好和交通方便的地方。一切有关的重大问题，由中央最后决定"[②]。7月14日，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致信国民党豫鄂皖边区督办公署督办卫立煌，提出实行停火，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谈判。卫立煌表示接受。22日起，双方代表在岳西县青天畈上青小学正式举行谈判。经过反复协商，谈判达成停战协议，并于28日签字。

---

① 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第9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② 何耀榜：《大别山上红旗飘》，第341—34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

10月12日，国共两党中央达成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1938年2月上旬，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和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辖第七、八、九团和手枪团，共3 100余人，东进皖中敌后。2月中旬，第七团、九团、手枪团，由红二十八军改编而成，奉命从七里坪出发，东进开赴抗日前线。

坚持在桐柏山区的中共鄂豫边省委和红军游击队，也在主动地进行由内战向抗日战争的转变。1937年7月中旬，周骏鸣偕同中央代表胡龙奎回到鄂豫边区。省委按照中央关于猛烈扩大游击武装以争取谈判等指示，调整了省委领导机构。游击队深入到确山、泌阳、桐柏、信阳等县农村，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做开明士绅的统战工作。后在红二十八军一部配合下，两次拔掉了信阳、泌阳交界处的反共顽固据点，使邓庄铺一带成为游击根据地，游击队也发展到了400多人。中共鄂豫边省委为了壮大抗日武装力量，促使当局早日同我谈判，10月中旬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公开活动。边区省委进驻泌阳邓庄铺，同附近开明士绅建立起统战关系，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都有很大发展。11月，鄂豫边省委在识破了河南第九区行政公署专员武旭如妄图假谈判之名，将独立团予以消灭的阴谋后，派统战部长刘子厚等赴开封与河南军政当局直接谈判，同一战区抗日预备军总司令张钫达成了改编协议，张钫拨给独立团1 000套军装、3 000块现洋及其他物资，派人点验了队伍。

1938年1月初，独立团一营政委张明河受鄂豫边省委的派遣，到第十八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了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周恩来等对豫西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革命斗争的精神大为赞扬，同时说明国共两党中央已达成协议，将南方各省游击队统一改编为新四军。事后，周恩来致电张钫，说明豫南人民抗日独立团根据两党协议已改编为新四军，不能再接受其他番号，与张钫达成了谅解。

1月中旬，独立团进驻确山县竹沟镇。2月中旬，中共河南省委军

事部长彭雪枫来到竹沟，协助王国华、周骏鸣将独立团整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团长周骏鸣，政委胡龙奎（3月15日后为林凯）。新四军军部派来的一批干部充实到了八团队。八团队又收编了桐柏山区两支绿林武装，队伍扩大到1 300多人。3月29日，八团队在信阳邢集召开东进誓师大会，在当地群众的欢送声中，八团队东进皖中，奔赴抗日前线，但仍在竹沟设立八团队留守处，王国华任主任。开封沦陷前，中共河南省委迁至竹沟。1938年1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建立后亦设于此。党的领导人刘少奇、李先念、彭雪枫、张震、朱理治、徐海东、张爱萍等先后在这里工作过。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指导下，以竹沟为中心，积极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力量，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原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阵地和战略支撑点。



鄂豫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后，开赴抗日前线

其他方面，统战工作也顺利开展。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通过中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政训处处长李世璋的统战关系，到该处任上校主任秘书。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退到新乡后，朱瑞与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协商，在新乡建立了第十八集团军驻一战区司

令长官部联络处，朱瑞任主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先后派朱则民、唐天际到联络处工作。联络处与一战区高级将领宋哲元、万福麟等建立了联系，同豫北师管区司令张轸合办师管区军政干部训练班，培训了一批抗战急需的军政人才，促进了豫北地区救亡和统战工作的开展。

濮阳一带于1938年2月沦陷之后，国民党地方官员逃避一空，一些兵痞、政客乘机而起，杆子、民团、会门武装遍地，社会极度混乱。河北省濮阳专员丁树本率保安队2 000余人退到濮阳东靠近黄河的小濮州一带，驻足观望。经中共直南特委先后派唐哲明、朱则民与丁谈判，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3月9日、11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同丁树本部协同作战，在小濮州、常庄两次大败日军，增强了丁树本抗战信心。丁树本被共产党人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所折服，采纳共产党的建议，在其部队设立政治部，政工人员多由共产党员担任。

6月，省委统战委员会成立，彭雪枫兼任主任，进一步在党、政、军、文化各界全面开展统战工作。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撤到郑州后，省委特于郑州设一上层工作委员会，主要推动同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政训处的统战工作，然后通过政训处影响程潜。在政训处长李世璋的帮助下，由一战区组织一批爱国青年经训练后分配到各县任民运指导员（大多是共产党员），宣传抗日救亡，组织救亡团体，做出很大成绩。政训处还建立了妇女工作委员会，其成员基本是共产党员，她们以合法的身份组织、推动了河南妇女参加救亡运动，许多女青年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省委还同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书记长以及省教育厅厅长等建立了统战关系。各地共产党组织也向当地驻军总司令、军长、师长及政府官员专员、县长等开展统战工作，合作抗日，并取得了友军的支持。

1937年年底，豫东已成为抗日前线。为组织民众抗日，一战区在商丘设豫东民运办事处，任命原西北军将领宋克宾为民运指导专员，同时派出40多名民运指导员分赴各县进行抗日宣传。民众的抗日热情迅速高涨。豫东沦陷后，宋任河南第二行政区专员，与共产党的统战关系进一步加强。时任扶沟县县长的魏凤楼因致力抗日活动受到当局压



制,省委经过统战关系与宋克宾协商,将魏由第七行政区(淮阳)调至第二行政区任鹿邑县县长,保留了一批抗日武装。中共豫东特委(西华)与河南第七行政区专员刘莪青、西华县县长楚博等建立统战关系后,在西华、淮阳、周口等地联合举办了多期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西华、淮阳部队同游击三支队联合作战,开辟了睢杞太抗日根据地,豫东抗日斗争呈现出一派大好局面。8月,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兼统战委员会主任彭雪枫赴豫东视察工作,先后会见了楚博、魏凤楼、刘莪青等,进一步推动了豫东的统战工作,为竹沟新四军东进敌后抗日做了必要的准备。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河南的建立,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开辟了河南革命斗争的新局面,对革命力量的壮大和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具有重大意义。

三、席卷全省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救亡运动兴起

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河南同全国一样立即掀起了空前的抗日救亡运动。豫北沦陷后,运动又有新的发展,从都市到乡村,无不激荡着救亡运动的滚滚洪流。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工人、农民,也无论是十几岁的孩子,还是五六十岁的老太太,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救亡运动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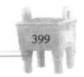
1937年7月13日,开封工、农、商、学、妇女等各团体致电前线全体抗日将士,盛赞其抗日行动,表示河南人民誓作后援,揭开了河南救亡运动的序幕。20日,由政府出面召集开封各界代表200余人开会,筹组河南各界抗日后援会。22日,该会致电蒋介石,要求下令实行全国总动员,抗击日军,收复失地。27日,开封文化界举行抗日救亡座谈会,对持久战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讨论。

中共河南省委对于这类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十分重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省工委书记刘子久即向全省作了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部署。当时河南中等学校校长、教职员暑期讲习会正在开封举办,中共河南省工委委员吴芝圃和豫西临时工委书记郭晓棠等,对与会者进行

了大量的抗日宣传教育，2 000 名与会人员随后分返全省各地，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在全省全面展开。

7 月下旬后，平津一带流亡学生大批来到开封，留日学生也返回河南，知识分子中的救亡力量迅速增长。8 月下旬，在省工委负责文化界统战工作的王阑西，同范文澜、嵇文甫、冯新宇、方天逸、姚雪垠等文化教育界著名人士举行了一次抗日救亡座谈会，决定创办一个宣传抗日救亡的刊物——《风雨》周刊（不久成为中共河南省委机关刊物），由嵇文甫、王阑西等任主编。9 月 12 日，《风雨》创刊，创刊号印刷数千份，迅即在学校、街头被抢购一空，销量超过了开封过去及现在一切刊物的最高点。《风雨》扛起了宣传救亡的大旗，中共河南省委及省委领导人朱理治、刘子久、危拱之等连续在该刊发表了多篇指导抗日救亡的文章。

开封是全省的政治中心，在中共河南省委的领导下，救亡运动在这里开展得尤为有声有色。平津流亡同学会、留日同学救亡团、河南大学大众剧团、开封市救亡话剧联合会等救亡团体纷纷成立，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这是河南省委以进步教授范文澜、嵇文甫的名义组办的救亡团体，旨在培训抗日的骨干力量。1937 年 11 月，训练班开课，开封北仓女中、开封女师及平津流亡学生等踊跃报名，招收学员近 200 人。原计划办 3 个月，到 12 月下旬因日机轰炸开封，形势顿时紧张，省委决定训练班提前结束，一部分学员北上送往延安，另组成 70 多人的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农村服务团，嵇文甫为团长，留汴继续做统战工作，范文澜为副团长，随团南下，将抗日救亡运动推向全省。1938 年 1 月，服务团在许昌办了第二期抗训班。下旬到舞阳，分成小分队活动于城镇乡村，搞宣传，办夜校，协同舞阳青年救国会开展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因受国民党当局胁迫，服务团改名为“河南省战时教育工作促进团”（简称战教团）。战教团在遂平又办过一期抗训班。在信阳，战教团亦以小分队形式，深入东双河、谭家河、李家寨等地，配合地方党组织组建救亡团体和抗日武装，并在信阳举办了游击战术训练班，为豫东南培训了一批开展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




風雨
五日刊
主編人
發行所
社論
加強河南的防衛
中共河南省委保衛河南宣言
保衛河南工作計劃

《风雨》周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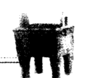
以文艺队宣传的形式唤醒国人，是河南救亡运动的第一个特点。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开封一些学生救亡团体中即有救亡话剧演出，有的团体设立了演出科、歌咏队，收到了极好的宣传效果，开封救亡话剧联合会应运而生。上海沦陷后，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救亡演剧第一、第二、第三、第五队陆续来河南作救亡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给河南青年带来新鲜有益的启示。他们的足迹遍及中原，有力地推动了河南救亡剧团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初期河南500多个救亡团体中，以话剧团、歌咏队、演出队命名的即达50多个。由几位共产党员发起，挂名在河南省文化运动委员会的光明话剧团，在豫东、豫西先后

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张家店》、《九一八以来》等10多个剧目，每个演员都非常投入，悲痛时泣不成声，呼喊时发自肺腑。话剧与群众完全连在了一起，台上台下心息相通，收到了极好的鼓动效果。

广大妇女积极投身于民族解放战争，是河南救亡运动的第二个特点。中共河南省委成立了专门指导全省妇女救亡运动的机构——妇女部，省委秘书长危拱之撰写了《动员河南的妇女保卫家乡》、《保卫大河南中的妇女运动》等文章，号召“全省的女同胞，以中华民族优秀女儿的气质，拿出与家乡共存亡的决心，抱着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精神，挺身向前，参加抗战”①。省委妇女部长吴平（时任开封扶轮小学校长）联合豫皖绥署主任刘峙的干女儿石青，发起组织了妇女战地服务团，10天之内有700多人报名，办了两期团员训练班，训练一个月后，大多分派到晋南、豫北、豫东战区作战地服务工作。这些妇女干部到前线之后，不仅做救护、慰劳和政治文化工作，同时还到街道、农村进行宣传，“以战地的妇女组织洗衣队、缝衣队、烧饭烧茶队、救护队等等，帮助作战部队，达到最有效的抗战”②。

1938年年初，省委利用同一战区政训处处长、国民党左派李世璋的统战关系，建立了一战区政训处妇女工作委员会，党派扶轮小学教员、共产党员郭霁云任中校主任。一战区迁到洛阳后，妇女工作委员会除作上层统战工作、搞救亡活动外，把宣传、组织工作推向了农村，在郊区办了两期家庭妇女训练班，成立家庭妇女工作团，妇女主动为士兵做布鞋，为伤兵缝补衣服。在郭霁云等的大力支持下，中共偃师县高龙镇区委妇女委员赵慧敏等组建了高龙镇老婆剧团。4月11日，高龙大会，老婆剧团第一次公演了《放粮》、《张老三投军》等剧，她们用土语表演，真挚感人，引起轰动，彭店、焦村、缑氏等地邀请她们去公演。后她们又参加了保卫大河南宣传周，老婆剧团的名声，“震荡着偃师县的每

① 《风雨》周刊第20期，1938年2月26日出版。
② 《风雨》周刊第20期，1938年2月26日出版。



个村镇”，蜚声中原，成为“全国创举”①。

声势浩大，遍及全省，是河南救亡运动的第三个特点。河南救亡运动开始于开封、郑州、洛阳、新乡等中心城市，迅即波及到各县城，待各地学生组成乡村服务团，走向广大农村后，抗日救亡运动更席卷全省，直至穷乡僻壤，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个党派的人们都行动起来，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地处大别山区的商城县汤泉池，虽是个落后、闭塞的山区小村，民族的命运照样牵动着每个人的心，“汤泉池民众救亡室”是山民们接受抗战教育的场所，门两边贴着大对联：“在此抗战期间，各人站在各人的岗位，扭紧头毛，切实奋斗”；“赶走鬼子以后，大家看着大家的功绩，敞开襟怀，鼓舞欢腾”②。光着膀子的农民、小脚妇女和蹦蹦跳跳的少年自动到这里来听宣传、学唱救亡歌曲。

抗日战争初期河南蓬勃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扩大了全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唤醒了民众，实现了全民抗战，也发展、壮大了共产党的组织，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干部，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同时这种全民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还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动国民党军队和统治当局也改变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的反共方针，同共产党合作，组织民众，对日作战。

（二）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豫北沦陷后，第一战区就派出数批正规部队转入敌后抗战。1938年4月1日，第九十一军军长郜子举奉命率第一六六师北渡黄河，指挥该师及先期渡河之第九十五师罗奇部，攻占济源、博爱等地，就地开展游击战争。4月10日，第一六六师第四九六、第四九八旅分别向济源、孟县发起强攻。第四九六旅九九一团由100名精壮士兵组成的奋勇队，冒着日军密集的炮火首先攻入济源城内，1小时后，攻入城内的兵力已有5个连。后续部队遭到日军猛烈炮火的阻击，冲入城内的部队与强敌展开激烈的巷战，伤亡严重，部分官兵被迫退出城外，剩下的

① 《新华日报》，1938年7月26日。
② 《新华日报》，1938年8月11日。

400多名官兵仍与敌顽强拼杀，九九一团营长朱金山白刃战中砍死日军营长以下13人，九九二团士兵张鸿岐砍死日军官兵7人，最后被包围在鸿福寺，全部壮烈殉国。日军感其忠勇，将他们的尸体和武器埋葬后，树起两块木牌，正面上写"故中国军队无名英雄之墓"，背面记述着他们的战迹，誉之为"军神"并享受"慰灵祭"①。此后，中国军队在济源、沁阳、孟县、温县、博爱一带继续截击日军运输弹药、给养的车队，并向济源袭扰。

（三）组织工厂、学校内迁

抗日战争爆发后，战火迅速蔓延到冀豫、鲁豫苏皖边，豫北、豫东及豫中的工矿、学校受到威胁。为了保存国家经济实力和学校免遭破坏，省当局组织工厂、学校内迁。实业家、教育界都深明大义，克服重重困难，历尽千辛万苦，积极将厂矿、学校搬迁。

工矿搬迁较早的是巩县兵工厂。先后辗转迁往长沙及湘西安化、沅陵等地，并迅速投入生产，对于保障战时军队作战需要，发挥了重要作用。1937年9月，焦作煤矿工人怀着"誓不以厂资敌"的爱国激情，将李沟煤矿大部分机器设备及焦作、王封矿的部分设备、器材拆卸，中福公司总经理孙越崎率矿长汤子珍、张莘夫及300余名职员、700余名工人将4 000多吨器材南迁，将一部分机器材料运至湖南湘潭，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合办湘潭煤矿；武汉会战前又迁至四川，与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等机关先后合作开办天府、嘉阳、威远、石燕等煤矿，对抗战燃料供应作出了积极贡献。到1938年春、夏，郑州豫丰纱厂、郑州光华机器厂、郑州豫中打包厂、郑州金盛隆弹花厂、漯河大新面粉厂、许昌和合面粉厂等数十家企业，有的迁往四川，有的迁往陕西，继续从事军需民用生产，支持长期抗战。

抗战初期省内学校迁移先后有三次。第一次为平津失守后，教育部电令凡已受袭击或易受袭击区域之学校一律向安全地带转迁。8月，焦作工学院全体师生及教学设备、图书、实习工厂等迁于西安。

① 刘琦等：《中原抗战》，第58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



搬迁到重庆的豫丰纱厂

1938 年因日军轰炸西安,学院西迁甘肃天水,1939 年与北平大学工学院、北洋工学院等合并,成立西北工学院,迁至陕西固城复课。1937 年 10 月,省教育厅先后制定中等学校紧急处理办法及迁移办法,并将安阳高中、百泉乡师、安阳初中、汲县师范等豫北 9 校分别迁至舞阳、汝南、郏县、登封、禹县、襄城。第二次为 1938 年年初。因豫北沦陷,汴、郑吃紧,特命商丘、开封、郑州各校于寒假期间举行迁移。此次迁移各校有河南大学迁移鸡公山(旋因豫南吃紧复迁镇平),开封高中、开封女师、开封师范、济汴中学、黎明中学、商丘中学等 22 校分别迁往豫西南、豫西等地。第三次为武汉会战后。豫东南大部分地区沦陷,1938 年 11 月 1 日,省当局电令伏牛山以南、南阳以东省立各校 3 日内向内乡、淅川西部迁移;伏牛山以北各校应先在卢氏、洛宁等地觅址即迁。此次计有洛阳师范、临汝初中等 7 校分别迁往洛宁、嵩县,原迁舞阳之安阳高中、鲁山之淮阳师范、禹县之汲县师范、南阳之北仓女中等校分别迁至内乡、淅川、嵩县、卢氏、洛宁等地。在整个迁移过程中,广大师生虽然备尝艰辛,但爱国热情丝毫未动摇,各校大多在极简陋的条件下

坚持上课,不但培养了一批批战时所需的人才,同时促进了豫西南教育事业的发展,并保留了一批教育界的基本力量。

四、建立抗日武装与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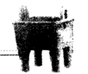
(一)各地抗日武装的建立

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中共中央确定了党的基本行动路线和工作方针: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1938 年 1 月,中共中央长江局针对河南已经成为抗战前线的形势,规定中共河南省委总的政治任务是"武装保卫河南","在加紧开展党与群众工作的基础上来准备与发动河南游击战争"①。省委根据中央和长江局的指示,认真研究、制定了开展游击战争的计划。

1. 豫东地区。1938 年春,中共豫东特委在西华先后办过 6 期抗敌训练班,将儿童团、少先队等统统组织起来。中共特别党员、西华县县长楚博以政府名义号召和动员开明士绅支援抗日。他把不积极抗日的 4 个区长全部撤职,分别任命中共特别党员魏凤楼、胡晓初等为区长,放手组建抗日武装。县政府和各区公署都成立了政治处,专作宣传、组织民众的工作。5 月下旬,中国军队在豫东阻敌失败西撤,西华、太康等地"国民党人逃的精光,汉奸们还不敢明目张胆来号召,进行抗日工作的阻碍烟消云散"②。各种各样的武装趁机纷纷建立,西华人民抗敌自卫团也随之成立,楚博任总司令,豫东特委书记沈东平任参谋长,王其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 4 个团。7 月上旬,魏凤楼率第一区团到扶沟县并任县长,余下 3 个团进行整编,改番号为西华县人民抗日自卫军,楚博任司令,胡晓初等分任支队长。中旬,根据中共河南省委的指示,沈东平、胡晓初等率领 1 500 多人东渡黄泛区,到太康、睢县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在睢县马路口同日军战斗中,沈东平壮烈牺牲。下旬,屈申

① 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第 67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② 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第 261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亭又率千余人东渡黄河，与吴芝圃率领的豫东游击队第三支队在睢（县）杞（县）太（康）地区协同作战。留在西华的部队，协同友军坚守新黄河，击毁日军橡皮舟数艘，抵御了日军的西进。西华部队东征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显示了中原儿女不畏强敌的英雄气概，提高了这支刚刚组建的抗日武装的军政素质，同时也增强和激励了豫东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

中共河南省委在豫东地区组建的另一支较大的抗日武装，是豫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徐州失守后，省委派吴芝圃到豫东领导和组建抗日武装。不久，中共杞县、睢县党组织分别组建了一支抗日武装。6月10日，两支抗日武装整编，成立睢杞大队，共200余人，省委代表吴芝圃任党代表，王海山任大队长。6月下旬，睢杞大队在杞县花和寨袭击日军抢粮队，接着又拔掉了睢县亲日仇共的土顽头子张心贞盘踞的长岗集，军威大振，睢杞一带进步青年和贫苦农民纷纷要求入伍，队伍发展到七八百人。吴芝圃为了加强对各地游击队的统一编制和领导，在睢杞大队的基础上成立了第一战区豫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简称"三支队"），吴芝圃任司令，王海山、孟海若任副司令。三支队在西华部队配合下，打击伪军、汉奸，孤立地方顽固派，初步开辟了睢杞太抗日游击区。

省委为扩大豫东敌后游击战争，派肖望东率先遣大队（又称肖大队）70余人从竹沟出发，8月初到达杞县傅集，与三支队和西华第二次东进部队会合，三支部队协同作战，8月19日，消灭杞县南部辛庄寨李继书部300余人。三支队和肖大队都有很大发展。

2. 豫南地区。1938年初夏，中共河南省委意识到豫东南有迅速沦为战区的可能，因此号召全体党员加紧准备工作，以便发动和开展豫东南的游击战争，豫南很快组建起多支抗日武装。信阳沦陷后，各地党组织又以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为核心组建多支游击小队。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日军进攻时，配合中国军队同日军作战，表现得十分英勇。日军侵占信阳后，30多名骑兵向谭家河窜犯，谭家河自卫队凭借有利地形予敌突然打击，日军仓皇退回据点。

豫南还有多支在共产党统一战线影响下建立起来的民众抗日武装,有的还直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桐柏山七七工作团”和信阳县政府的常备队。前者是在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军副军长、爱国将领何基沣的同意和支持下,由共产党员朱大鹏主持创办的,全团250余人,政治素质好,武器装备强。后者是信阳县县长李德纯所组织。信阳沦陷后,国民党官员仓皇撤退,李德纯坚持留在当地,将县政府常备队扩充到200余人,并希望共产党派人帮助他打游击,省委派豫南特委群工部部长文敏生到李部任职。11月,刘子厚、危拱之、王海山等率领八团队留守处一个分队,从确山竹沟出发南下,在信阳北王岗与李德纯部汇合,两支武装统一整编为信阳挺进队,李德纯任司令,王海山任副司令。整编后挺进队开赴四望山,开始了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3. 豫北地区。河北民军四支队。1937年10月,中共直南临时特委在南乐县留固店组建了一支五六十人的游击队,经与驻清丰县之河北省游击总指挥高树勋联系,取得河北省民军第二路第四支队番号,共产党员唐哲明(11月后为肖汉卿)、刘大风任正、副支队长,四支队很快发展到200余人。南乐、清丰一带沦陷后,四支队多次向日伪军发动袭击。共产党员王从吾等在濮阳的井店一带,也组织有百余人的抗日武装,中共直南特委利用同濮阳(时属河北)专员丁树本的统战关系,该部以濮阳专区保安司令部第八大队的名义在濮阳、内黄、滑县边区活动。1938年2月14日,四支队与八大队在井店汇合,直南特委将八大队主力编入四支队。四支队扩编后达400余人。四支队在濮阳小濮州、常庄及清丰等地多次给日伪军以打击,部队扩大到1 000多人,6月四支队奉命开赴冀南肥乡,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东进纵队第七支队。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四支队。1937年11月,中共冀南特委委员纪德贵,募集六河沟、峰峰煤矿四五十名工人,建立了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四支队,纪德贵任队长(故又称纪支队)。12月,纪支队开赴林县、安阳一带活动,吸收了数十名青年入伍,收编了部分小股地方武装,队



伍得到扩大。1938 年 6 月,陈赓率八路军第三八六旅主力南下豫北,纪支队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支队也发展到 4 个营约 2 000 人。此外还有平汉抗日游击队、濮县(今属范县)抗日游击队、马牙山抗日游击队、道清抗日游击队等,活跃在豫北敌后,后这些地方抗日武装不少编人八路军,为八路军开辟豫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在建立上述抗日武装的同时,共产党又领导军民开辟了多块敌后抗日根据地。

(二)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开辟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豫北地区北依太行山,南临黄河,平汉、道清两铁路纵横该境。如果控制豫北,就可直接威胁敌人之主要交通线,向东可取冀鲁豫平原,是坚持华北抗战的要地之一。1937 年 10 月中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主力开进正太路以南地区。太原失陷后,在华北正规战争结束,游击战争占主要地位。11 月 13 日,第一二九师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创建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布置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的任务。会后部队即分散展开,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政权。第三八六旅分遣到晋东南和豫北接壤地带,包括平顺、陵川、高平及林县、安阳、辉县、淇县、获嘉、武陟、修武、汲县一带,建立起八路军太南独立游击支队,赵基梅为司令员,涂锡道为政治委员,因此又称"赵涂支队"。在此前后,第一二九师还先后以教导团两个连组成先遣支队,由张贤约、张南生率领在漳河以北的冀豫地区活动。派王卓如、桂承志率领道清游击支队,在太行山南部地区活动。1938 年 2 月初,又分遣第三八六旅新建补充团韩东山部南下,进至修武、武陟、获嘉等地活动,协同赵涂支队开辟太行山南部地区及道清沿线工作。接着,晋冀豫军区于 4 月下旬成立,第一二九师参谋长倪志亮兼任司令员,黄镇任政治委员,下辖 5 个军分区,其中第 3 分区为冀豫边区,第 5 分区为太南分区即赵涂支队。

6 月上旬,陈赓率第三八六旅主力南下,进至漳河以南、道清路以北地区,并统一指挥先期到达这里的赵涂支队和补充团等部,先后成功地突袭安阳水冶、观台,进而于 7 月 21 日夜攻打辉县、百泉、樊寨等处

伪军，伪区署、伪商会全被捣毁，毙敌伪200余人，俘30余人。8月6日夜，第三八六旅集中兵力攻击平汉线上之潞王坟车站，炸坏铁桥两座，破坏铁路100多米，平汉路交通中断。此后复两次破袭道清铁路约2公里，炸毁铁桥一座，道清路陷于瘫痪。豫北伪军在八路军连续大胜的震慑和共产党人的策反下，纷纷起义，投奔八路军。影响最大的是伪皇协军第一军副军长徐靖远、第三师师长黄宇宙、第二师师长吴朝瀚等8月7日在安阳曲沟、水冶率部起义，伪军长李福和及日军少将长川、大佐植田、少佐前田、尉官16员、士兵20余名均被击毙[1]，号称万人的伪军李福和部土崩瓦解。

（三）晋豫游击支队开创晋豫边

晋豫边指豫北西部济源、沁阳、孟县及晋西南阳城、晋城、垣曲等县。这一地区依山傍河，为太岳区南部、太行区西部的屏障，又是八路军总部经由阳城、垣曲南渡黄河，通往陕甘宁边区的通道。豫北失陷后，1938年3月6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电示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等："晋豫边甚重要，望有计划地部署沁水、冀城、曲沃、垣曲、济源、博爱、晋城地区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在西、北两面之行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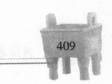
为尽快开辟晋豫边抗日根据地，中共晋豫特委以阳城等县地方武装为骨干，在阳城横河镇下寺坪组建了八路军晋豫边游击队（直属八路军总部领导），唐天际为司令员，方升普为参谋长。4月28日，晋豫边游击队（后改为游击支队）在黄楝树村（属济源邵原镇）召开抗日誓师大会，宣告晋豫边游击队正式成立。中共济源县委书记杨伯笙带领"杜八联"[3]200多人、沁阳县委派马精华等带200多人参加了支队。晋豫边游击支队在斗争中迅速壮大，半年后由3个大队扩充为7个大队近2 000人。晋豫边游击支队一成立便投入对日军的作战。5月，在邵原镇配合国民党军第三十八军赵寿山部打退了日军的进攻。7月初，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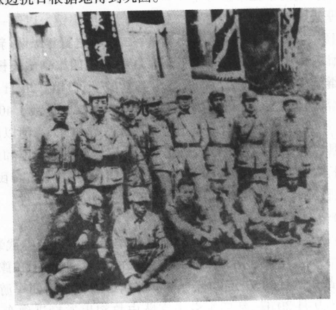
① 汉口《大公报》，1938年9月4日。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8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③ 济源南部留庄、连地等8个保为1个联保，这里清代属"杜里"管辖，所以称为"杜八联"。



两次配合八路军第三四四旅袭击日军。八九月份，游击支队在邵原西之蒲掌、南羊圈痛击西犯之敌，连连获胜。以济源北部、阳城南部为中心的晋豫边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



晋豫边游击支队及部分大队主要领导人员

（四）八路军进军漳南，初创冀鲁豫

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等向八路军发出了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指出：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发展和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是可能的，党和八路军部队在冀鲁豫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普遍发展游击战争。22日，八路军总部令第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率两个团、1个支队挺进冀南，令先期进抵冀南的东进纵队陈再道部仍然发展冀南，并组建1个支队挺进冀鲁边。5月初徐向前与陈再道部会合，为配合友军在徐州地区作战，连续向日伪军发动进攻，歼灭伪军近2 000人，到6月底，八路军挺进冀南地区的部队全面展开。

8月下旬，第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司令员陈再道、第三八六旅政治委

员王新亭，统一指挥进入冀南各部，在漳河以南的临漳、安阳和内黄一带发起漳南战役。至9月10日，先后歼灭伪军苏明启、郭青等部6 000余人，争取收编伪军程希孟等部1 300余人，攻占了临漳回隆，安阳吕村集、大寒集、崔家桥及内黄楚旺、豆公集等重要集镇。以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之六八八团、六八九团及第一二九师之青年纵队、新一团组成漳南兵团，由第三八六旅政委王新亭和第三四四旅副旅长杨得志统一指挥，继续南进作战。25日，收复滑县县城、道口镇。26日，八路军在淇县北部形盆、土门一带设伏，大败伪军扈全禄部，俘敌1 400余人。经过近1个月的漳南作战，基本上肃清了平汉路以东、漳河以南、卫河以西、滑县以北东西约50公里、南北100公里区域内的土匪和伪军，开辟了安阳、内黄、汤阴、浚县、滑县，建立了安阳、汤阴两县抗日民主政权和部分抗日武装，为尔后建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五）新四军游击支队东进豫皖苏

1938年夏，豫、皖、苏边大部分地区沦陷后，土匪、豪绅武装遍布，社会极度混乱。中共河南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制定了在豫东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计划，决定以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挺进豫东。9月30日，新四军游击支队由竹沟出发挺进豫东。10月11日，游击支队与吴芝圃率领的豫东游击第三支队及肖望东率领的先遣大队在西华杜岗胜利会师，三部合编，下辖3个大队和1个警卫队，共1 000余人，仍称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震任参谋长。为统一领导豫东工作，成立了党政军委员会，彭雪枫为主席。决定游击支队目前的方针与任务是：继续东进，打击日伪，消灭土匪武装，发展与扩大力量，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①。

10月24日，游击支队由西华聂堆东渡新黄河，先后在淮阳窦楼等地予敌以打击，11月下旬进入睢（县）杞（县）地区。该部取得的一系列胜利，给当地人民以极大鼓舞，为尔后豫皖苏区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

① 冯文纲：《彭雪枫年谱》，第10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第二节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艰苦斗争

一、各地反摩擦斗争

(一)国民党制造摩擦

1938年10月,日军相继占领武汉、广州,战线进一步延长,兵力进一步分散,加之战争实力大量消耗,致使人力感到不足,财政经济陷入困境,不得不停止战略进攻;中国方面一时还没有实行战略反攻的力量,因此战争转入战略相持局面。因应这一形势,日本改变其侵华的方针和策略,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逐渐转移其主要兵力打击占领区内的八路军、新四军。

由于日本的诱降,国民党出现分化,汪精卫等公开降日,蒋介石等对抗战表现出很大的动摇,国民政府对内、对外的军事、政治策略作了调整,一方面培植力量继续持久抗战,并派遣大批部队进入敌后;一方面限制、打击共产党。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计划,嗣后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发了一系列反共文件,其派赴敌后的部队和游击队,因此也逐渐成为与中共抗日武装摩擦的主力。中国抗战出现了极端复杂的局面。

河南战场也不例外。豫北、豫东沦陷后,国民党在中原的统治区域仅剩下豫西、豫西南半壁江山。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迁洛阳,国民党军重兵驻扎豫西,洛阳自然成了河南统治中心,顽固派亦麇集于此。因此,反共逆流首先从豫西开始。支持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政训处处长李世璋被撤职,代之以复兴社头目袁守谦,并将政训处改为政治部。袁上任后,对政训处的共产党员进行清洗,登封、卢氏、洛阳、密县等县县长因支持抗日救亡运动均被免职,由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担任的区长、联保主任、县政府职员等亦被解职。接着顽固派把毒手伸向教育阵地,首先免去了洛阳中学校长周筱沛的职务,在洛中任教的共产党员均被解聘,洛宁县中、现代中学、宜阳县师、陕县原上学校等校

进步教师和共产党员也全部被赶走。群众抗日团体被相继取缔,继续从事抗日活动者便被加上"共产党嫌疑"或扣上"汉奸"帽子加以逮捕。为此,国民党特务机关特在洛阳沙沟设立了特种管训处,在洛阳火柴公司设立劳动集中营,抓捕各县进步青年到那里受训。

豫西反共逆流迅速扩展于各地。在豫东,第七专区(淮阳)专员刘莪青因主张国共合作抗日被免职;西华县县长、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司令楚博被顽固派逮捕后秘密杀害。在豫南,上层的各种统战关系先后断绝,信阳县县长李德纯等在机关、学校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或被调离或"被迫离开"①。1939 年 5 月,第五战区豫鄂皖游击司令黄瑞华在罗山县长梅治潮的带领下,袭击驻罗山杨店的新四军第六游击大队通讯处,中共罗南工委书记、新四军第六游击大队第四中队队长杨厚益等 5 名干部和 11 名战士被捕,6 月中旬杨等 5 人被活埋。1940 年 12 月,中共罗山县委书记张霁辰被捕,翌年初被暗杀。

中共中央和中共河南省委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应付复杂的局面。在豫北、豫东,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武装,打击敌伪势力,建立抗日政府,巩固、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加强对中原抗战的领导,1938 年 11 月,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将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迅速调往其他地方工作,能隐蔽的仍继续留下坚持工作,暂时停止组织发展,党内加强教育,巩固党组织,隐蔽精干,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各级组织坚持中共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同顽固势力作斗争。反摩擦斗争做好了充分准备。国民党顽固派仍然坚持反共立场,变本加厉地制造了反共摩擦。

确山惨案。新四军第八团队竹沟留守处建立不久,就遭到地方顽固势力的敌视,蓄意制造事端。1939 年 11 月 11 日,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耿明轩,秉承该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之命,

① 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第 424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纠集确山、泌阳、信阳3县自卫团16个中队约1 800人，向竹沟发动突然袭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刘子久和八团队留守处主任王国华等，临危不乱迅速组织留守处的干部奋起反击，打退土顽的多次进攻。12日夜，省委组织留守处全体人员在中共地下党员的配合下突出重围，13日上午陆续到达桐柏县龙窝，与先期突围的中原局印刷厂的同志会合。土顽进入竹沟后，进行了血腥屠杀和抢掠，新四军伤病员、抗日军人家属和革命群众200多人惨遭杀害，留守处机关财物被抢劫一空。

确山惨案发生后，中共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立即进行了揭露和反击。12月25日，第十八集团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通电全国，要求国民党执行国家法纪，惩办肇事祸首，取缔反共邪说。中共河南省委刘子久等转移至洛阳坚持工作，其余干部随王国华等到四望山继续坚持武装斗争。

（二）各地反顽斗争

1. 晋冀豫地区反顽斗争。1939年11月下旬到翌年2月，冀察战区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及第三十九集团军石友三等部先后向冀南地区八路军挑衅，遭受重创后退到豫北地区。鉴于石友三、朱怀冰两部仍以八路军为敌，八路军第一二九师3月4日起，集中17个团的兵力，发起卫（河）东战役，先后在观城、濮县和清丰县东南之卫城、六塔、双庙一带向石部顽军进行反击，歼其一部，接着在濮阳以东又击溃其两个团，石部顽军逃往民权县以东地区。此时已经走上反共道路的濮阳专员丁树本也被逐出濮阳。4月初石友三、丁树本两部重占东明城，企图重返直南豫北。4月6日至8日，八路军对盘踞濮阳西南的丁树本部和东明、菏泽北部的石友三部发起反击，迫使石友三部退往曹县、定陶一带。丁树本率残部逃往豫西。至此，八路军全部恢复了卫河以东地区，控制了清丰、南乐等10余个县城。对于退到武安、涉县地区后仍不断抢占要地，破坏抗日政权的朱怀冰部，八路军集中13个团，发起磁武涉林反顽战役。经3天激战，朱部主力第九十四师遭歼灭性打击，残部溃逃修武。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国民党继续抗战，3月中旬，八路军主动北撤至平顺、漳河之线，随后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

煌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议定以临（汾）屯（留）公路及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以南为国民党军防区，以北为八路军防区。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彻底打退。

2. 豫皖苏边区反顽斗争。1940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强令黄河以南新四军八路军统统撤到黄河以北，企图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挤出华中地区，皖东津浦路东西的新四军受到顽军的攻击。针对顽固派的企图，中共中央除彻底揭露其阴谋外，令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南下，协同新四军发展与巩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6月20日，第二纵队政治委员黄克诚率部1.2万人抵达永涡边，与彭雪枫部会合，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两部于6月底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7月初，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也南越陇海路抵达豫皖苏区。

8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苏皖边斗争的形势，以新二旅、第六八七团、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和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共2万人，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执行向东发展任务。随后五纵队即东渡运河，粉碎日军两次“扫荡”，初步开辟了淮海抗日根据地。彭雪枫率第四纵队约1.7万人，留在豫皖苏根据地执行向西防御任务。

9月，国民党军向皖西集结兵力，摩擦有一触即发之势。八路军第四纵队一面在国民党军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对顽方亦作了某些让步，同时也做好了自卫还击的准备，使局势暂时得到缓和。11月中旬，日军集中3 000余人，附坦克20余辆，向蒙城、涡阳进犯。八路军第四纵队第五旅和特务团与敌激战3昼夜，毙伤日伪军千余人，将敌击退。正当八路军同日伪军浴血奋战之际，国民党顽军却在我根据地内组织反动武装、破坏抗日政权、暗杀抗日工作人员，并在豫皖苏边策动了耿、吴、刘叛变。

1940年12月12日，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耿蕴斋、第六旅副旅长兼第十八团团长吴信容、第十七团团长兼夏邑县县长刘子仁，发动叛变。12日凌晨，刘子仁在永城东北王楼抓捕团政委蔡永及排以上干部



六七十人;吴信容在萧县西南张三座楼逮捕一营教导员张漫平等干部10余名;刘子仁还阴谋杀害找耿、吴做说服工作的豫皖苏区党委书记吴芝圃。13日凌晨,被刘子仁关押的干部在蔡永指挥下奋起突围,副团长周大灿等牺牲,多数冲出了关押地。

事变发生后,彭雪枫连续向中央电告了事变经过及应急措施,并令第十三、十四团迅速开至萧、永边,对叛军形成威慑。14日刘子仁被迫释放了未突围出去的干部,吴信容也将拘押人员全部释放。因耿、吴、刘所部均系当地人,与区、乡政权有各种联系,这次叛变使八路军第四纵队损失近2 000人,永城、夏邑、萧县一带部分区、乡抗日政权变色,豫皖苏根据地面积缩小,边区形势恶化。

3. 豫鄂边军民反顽斗争。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确山惨案后,在豫鄂边区反共活动不断升级,企图将新四军挤出武汉外围地区。1939年12月,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游击总指挥鲍刚及第一游击纵队司令曹文彬等部,以进攻日军为名,渗入到信阳四望山附近,在其支持下,信阳、应山等地顽固派频繁制造流血惨案,中共信应地委派往信阳婆婆寨的工作组成员黄润青等被杀。为了维护统一战线,中共信应地委对顽固派的罪行进行了揭露和抗议,同时遵照上级指示将部队撤离四望山。与此同时,湖北省鄂东行署主任兼第五战区鄂东游击总指挥程汝怀,疯狂进行反共活动,进攻抗日武装,摧残抗日政权,屠杀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针对顽固派的反共暴行,1940年1月12日,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电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对进攻我军之顽军予以坚决反击。1月中旬到4月中旬,李先念等率部三进小悟山,程汝怀部遭到沉重打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控制了大小悟山地区。豫鄂边军民反顽斗争的胜利,扩大和巩固了边区抗日根据地,国民党顽固派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挤出武汉外围地区的企图彻底失败。

二、在反“扫荡”中发展和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

(一)晋冀豫(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巩固

1939年7月,日军开始对晋冀豫根据地进行大“扫荡”。驻博爱、武安(时属河南)等地日军与北线日军先后出动,向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扑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反“扫荡”作战中，对占领交通线之敌进行袭击、围困，到8月底共作战70余次，歼敌2 000余人，迫敌收缩兵力，结束这次“扫荡”。

日军为保住占领区，加紧对平汉铁路、邯（郸）长（治）公路等交通线的控制。12月上旬起，第一二九师在广大民兵和群众配合下，对敌人占领之据点及交通线进行不间断的袭扰破坏，12月下旬收复涉县县城等据点，晋冀豫抗日根据地重新连成一片。1940年年初，日军依托平汉铁路进行扩张，修筑公路，企图将各抗日根据地分割成小块，进而分区“扫荡”。八路军再次开展对敌交通线的破击战。8月20日起，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大战期间，第一二九师各部共作战529次，毙伤日伪军7 507人，俘获日伪军482人，并缴获大量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通过大战，破坏了敌人的交通线，拔除了敌人深入我根据地的部分据点，既巩固了根据地，也推动了政权建设。1938年年底八路军收复涉县后，即成立了县抗日民主政府。1940年3月，林北县（林县北部）行政办事处成立，5月改名为林北县政府。

1940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黎城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提出了建党、建政、建军3大任务。为了统一全区党政军民的领导，正式成立了以邓小平为书记的太行军政委员会。8月1日，成立了冀南、太行、太岳联合办事处，杨秀峰任主任，下辖太行、太岳、冀南3个行政区。同年五六月间，第一二九师在政治整军的基础上进行了整编，整编后辖9个旅（27个团）及太行、太岳、冀南3个军区（13个军分区）。

（二）晋豫边（太岳）根据地的巩固

1939年1月，中共晋豫特委决定当前的任务是：深入巩固晋南，加强开拓晋西南与豫北，把晋豫边造成为粉碎敌人进攻、争取相持阶段到来的主要战略支点。为此特委要求各县扩大基干武装，建立县干队和区自卫队。为适应斗争的需要，1940年2月，晋豫游击支队与八路军第六八八团合编为新编第一旅，旅长韦杰，政委唐天际，列入八路军正规军序列，离开晋豫边区。5月，太岳军区成立，由八路军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兼军区司令员，下辖3个军分区。



(三)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建立

漳南战役后,八路军先后派出多支部队进入鲁西南,与地方武装配合,坚持该地的斗争。1939年2月16日,八路军第三四四旅代旅长杨得志等率旅直一部到达直南、豫北地区,3月9日,在濮阳井店同先期到达这里的八路军各部会合,整编为冀鲁豫支队,杨得志任司令员,崔田民任行动委员会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大队,共2 000余人。以后又相继成立了第四大队(由考城县大队和东明王屯抗日自卫队合编)、第五大队(由冀鲁豫第五支队和曹县、清丰、南乐、民权等县抗日武装合编)及独立大队、豫北大队,年底发展到1万余人。冀鲁豫支队的成立,统一了直南、豫北、鲁西南地区中共抗日武装的领导,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7月到11月,日军多次向鲁西南和濮阳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冀鲁豫支队突出包围后,各大队分别转向敌侧后袭击敌人,使日军的"扫荡"均遭失败。

1940年4月30日,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到达冀鲁豫区,冀鲁豫支队作了新的调整,同时成立了冀鲁豫军区,下辖3个军分区,第二军分区为豫北地区。豫北地方武装升编为主力后,濮阳、南乐又组建了独立团,清丰、滑县、内黄等县均又组织起一二百人的武装。6月,在濮阳井店组建卫河大队。

6—11月,日军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连续进行了4次"扫荡",使根据地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遭到严重损失,截止到11月底,区以上干部牺牲43人,地方武装减少半数以上。

冀鲁豫根据地在开展对敌斗争的同时,也进行了政权建设。1940年春,豫北区已先后建立起清丰、南乐、长垣、滑县、濮阳、考城、内黄等抗日民主政府。4月17日,南乐、清丰、濮阳、长垣等6县军政代表大会在清丰县安庄召开,成立了冀南6县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内黄、滑县也归该专署领导),选举安法乾为专员。同时,专署在濮阳、滑县、东明、长垣4县边区设立办事处,统一了豫北地区抗日政权的领导。专署成立后,根据地各项建设随之展开。专署于5月颁布《本区财政统筹

统支办法》等,合理负担和财政制度逐步统一完善。农业、工业、商业等赋税开始征收,合理的税赋既保护了生产和贸易,也使军政费用有了一定的来源。

(四)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新四军游击支队于1938年11月下旬进入睢、杞、太地区,连续取得对日伪作战的胜利,初步打开了豫东局面。游击支队在斗争中迅速壮大,到1939年3月已组建3个团。6月,彭雪枫留第一团坚持豫东,率第二、第三团进军淮上(指淮河以北、津浦路以西、浍河以南、宿县蒙城公路以东)地区。

新四军游击支队主力进军淮上后,7月,张爱萍奉命率部分干部进抵皖东北地区,建立了皖东北工作委员会。8月下旬,鲁雨亭率领永城县抗日武装毅然参加新四军,该部改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一总队,总队长鲁雨亭。12月,中共豫东特委领导的第一战区西华抗日自卫军第七路即西华抗日武装,改编为游击支队第二总队,胡晓初任总队长。同月,萧县游击队与宿县大队合编为游击支队第三总队,耿蕴斋任总队长。月底,皖东北的新四军及地方武装合编为第四总队,张爱萍任总队长。1940年2月初,游击支队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下辖3个主力团,4个总队(各辖2个团),共1.7万余人。

1940年3月16日,日伪军2 000余人分5路"扫荡"永城、萧县地区,第一总队鲁雨亭部于3月25日到27日,3次袭击王白楼敌军3次获胜,到月底,日伪军的"扫荡"遭到失败。4月1日,日伪军又集中3 000余人,对永城东北山城集地区进行报复性"扫荡"。第一总队在山城集四周与敌激战后,分散突围,鲁雨亭率一部抢占了山城集西南李黑楼,日伪军以分进合击之势将李黑楼层层包围,第三总队赶来增援,未能阻止强敌的攻势。鲁雨亭指挥战士沉着应战,血战竟日,于黄昏突围。此役计毙伤日伪军300余人,挫败了敌人围歼第一总队的阴谋,但第一总队也付出了重大代价,总队长鲁雨亭以下200余人牺牲。

1939年2月,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进驻永城西南书案街,根



据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指示，撤销中共豫皖边区工委，成立中共豫皖苏省委，9月，中共豫皖苏省委改称豫皖苏区党委，下辖5个地委。以永城、涡阳为中心的豫皖苏区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11月，豫皖苏边区各界代表会议召开，成立了边区政权的最高领导机关——豫皖苏区联防委员会，不久又建立了豫皖苏边区参议会，边区政权建设日臻完善。到1940年夏，根据地已发展到东过津浦路到皖东北，西抵新黄河以东的睢、杞、太，南至淮上，北临陇海路的广大地区，建立了10个县级政权(包括办事处)，活动范围达50多个县，成为豫皖苏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五)豫鄂边抗日根据地的建立

1938年10月前后，武汉及其周围城镇相继被日军占领，国民党军第五战区、第九战区数十万部队分别撤往鄂东北、鄂西北等山区，后来虽有部队返回敌后，却是打着抗日的旗号限制共产党的发展。中共领导的豫鄂边区抗日游击战争，就是在这种与其他战略区域相隔绝、没有主力部队作骨干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豫鄂边抗日根据地建立前，这里已活跃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1939年1月起，中共中央中原局先后组织力量向豫鄂边区敌后挺进。1月17日，李先念率领由新四军第八团队留守处1个连的武装和60余名干部组成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从竹沟南下，下旬到达四望山，与信阳挺进队会合，以四望山为立足点，活动于信阳、罗山地区。2月下旬，李先念率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和信阳挺进队1个中队离开四望山，向平汉路东信罗边挺进。3月在信阳南灵山冲大寺口与中共鄂东特委领导的新四军第六游击大队会合，开展信罗边区群众工作，发展抗日武装。在独立游击大队的协助下，信阳挺进队迅速壮大，当年5月发展到3个大队，共1 200余人。

4月30日，陈少敏率竹沟留守处1个中队和50多名干部到达四望山，6月初又率信阳挺进队两个中队继续南下，6月6日，在安陆赵家棚与李先念等部会合。李先念、陈少敏部与湖北部分地方武装会合，改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任政治委员，

下辖5个团队。支队积极活动于平汉路两则，在黄陂、孝感、安陆等地，多次给敌伪以打击。8月14日，日军第三师团一部400余人，“扫荡”罗山朱堂店，遭到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的打击，是役计毙伤日军80余人，敌施放毒气掩护撤退。

11月16日至19日，朱理治、陈少敏、李先念、任质斌等在四望山召开豫南、鄂东、鄂中党和军队负责人会议，讨论边区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与指挥问题。会议根据中原局的指示，决定建立中共豫鄂边区党委，郑位三任书记（因病未到职，由副书记陈少敏代理书记）；边区各地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1940年1月，支队改称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共9 000余人。

2月中旬，李先念率3个团队南渡襄河，进逼汉阳，在侏儒山、天门等地袭击日伪军，展开创建根据地的斗争。8月，挺进纵队主力部队的团队改称为团，大队、中队、分队分别改称营、连、排，纵队下辖2个支队计11个团、2个独立团、1个随营学校，共1.5万余人。两年来对日伪军作战280余次，毙伤日军2 490人，俘日军13人，毙伤伪军8 114人，俘伪军1 258人，争取伪军反正2 650人[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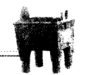
豫鄂边抗日根据地创建后，即展开了各项建设工作。对基层政权进行改造和重建，由人民选举行政人员。1940年9月成立了豫鄂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作为边区最高的政权机关。到1940年年底，平汉路以西各县基本上经过民选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

三、敌后军民艰苦抗战

进入1941年、1942年，中国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进入极端艰苦、困难的时期。

1939年9月，德军进攻波兰，欧洲大战爆发，随之欧洲战场不断扩大，1940年德军横扫北欧、西欧，1941年6月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

①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第47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4。



德军在欧洲战场掠夺大量财富，极大地刺激了日本扩大侵略的胃口，决定乘机向南扩张，夺取英、美、法等国在东方的殖民权益。12 月日军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了放手南进，急谋稳定中国的战局，对侵华政策作了调整，对国民党继续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而将主要兵力用以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华北实行"治安强化运动"，在华中实行"清乡"。在国民党方面，蒋介石集团看到日本对正面战场不会进行大规模的攻势，而将其反击的重点放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方面，因而继续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于 1941 年 1 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还指示其军队不断对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剿和经济封锁，甚至与日伪军相配合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样，冀鲁豫、豫皖苏、豫鄂边等区就处于日军、伪军、国民党军三方夹击之中，处境愈加困难。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即将出现的严重局面早有预见，及时提醒各根据地军民做好应付困难局面的各项准备。冀鲁豫、豫皖苏等抗日根据地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根据地的建设，对敌伪的"扫荡"、"清乡"进行了坚决斗争，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以想像的困难，坚持敌后抗战。

1941 年 1—4 月，伪军万余人先后向以范县、观城为中心的鲁西根据地和内黄、滑县、濮阳等冀鲁豫边区中心区进行反复"扫荡"，其在寻找八路军主力扑空后，即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仅内黄、高陵（濮阳西北部、滑县东北部）、顿丘（清丰西南部、濮阳西北部）、卫河（南乐、清丰西部和内黄东北部）4 县被害村庄即达 141 个，全沙区被惨杀 4 000 余人，失踪 263 人，伤 186 人，53 户被杀绝。敌人把桑村、城堡等地群众都集中在内黄县杨堌村，"除一部分拉到村东道沟活埋外，大部分给填进了杨堌的 7 口水井"①。农民的粮食、种子、

① 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 4 辑（中），第 662 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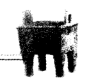
耕牛、农具大部被抢走、焚烧，房屋被烧毁。内黄县被烧房屋2.1万余间，仅千口村即被烧房屋135间，烧毁粮食296担，损失牲口42头。沙区群众经济支柱之一的枣树被砍5万余株。

为打破日军的封锁和“蚕食”，中央军委指示各地对凡有害根据地的道路进行破袭。3月间，冀鲁豫军区部队即对南乐、清丰、内黄、濮阳、滑县之间的许多公路进行破袭。7月中旬到8月下旬，冀中军区南进支队在2 500余名民兵、群众配合下，对濮阳及南乐至清丰间公路、封锁沟进行连续破袭。8月初，拔除了考城东部杜楼伪军据点，使根据地向西扩大到白茅、大寨、张君墓一带。但因日军又调遣重兵继续封锁和“蚕食”，根据地局势随之又趋恶化。

9月底，顽军孙良诚部侵入鲁西，被八路军逐走。日伪军乘八路军反击孙部之机积极向冀鲁豫区“扫荡”、“蚕食”，顽军高树勋部于11月7日进占濮阳东北庄，企图继续北进；驻清丰县夏村的顽军亦与其配合，向北推进并占据清丰东南之瓦屋头。八路军第二纵队以一部围攻东北庄，一部于瓦岗到邢庄一线阻援，共计毙伤顽军600余人，生俘220余人，迫敌放弃东北庄退回原驻地。

1942年上半年，日军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继续进行“铁壁合围”式的“扫荡”，南乐、清丰、范县等处被敌“蚕食”，日伪军在其占领区内挖掘了南(乐)清(丰)、南(乐)韩(张)、清(丰)濮(阳)等封锁沟，安设数十处据点，根据地被敌分解成格子网。为了粉碎敌人的“蚕食”，八路军第二纵队和冀鲁豫军区转变斗争方式，组建游击支队，整训地方武装，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相配合，展开反封锁斗争。当年7月，冀鲁豫军区各部开展夏秋攻势，在清丰境共拔除日伪据点近50处，歼灭日伪军千余人，开辟了长垣、考城等地区，濮阳等地的工作有所恢复。

9月下旬，日伪军组织万余人，秘密集结于范县、观城中心区周围，于27日拂晓，发动“铁壁合围”式的“扫荡”。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等指挥军区党、政、军机关跳出了合围圈，但军区后方机关、南进支队一部及教导第三旅3个连等被日伪军压缩到范县甘草堌堆一带。教导队第三旅政委曾思玉指挥被围各部英勇迎击，数千人突出了重围。这



次“扫荡”历时18天，在反“扫荡”中，八路军共毙伤俘日伪军300余人，冀鲁豫军区后方机关和地方武装也遭受不小损失。

太行、太岳军民的反“扫荡”斗争也开展得有声有色。

1941年5月中条山会战后，日军在继续“扫荡”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又于9月、10月先后集中2万、3万人，对太行南部、太岳北部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11月又数次奔袭八路军总部部分后方机关及兵工厂等所在地。由于太行军民早有准备，日军处处扑空，并不断遭到打击。1942年春、夏，日军继续对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数次“扫荡”，沿平汉铁路等处，针对太行根据地构筑了3道封锁线。太行、太岳军区八路军主力及时跳出敌人包围圈，在敌人后方破袭敌之交通线，攻击伪军据点。仅夏季反“扫荡”作战，两根据地军民即歼敌3 000余人。

在豫皖苏区，抗日军民也胜利地经受了反“扫荡”及反顽斗争的严峻考验。1941年年初，国民党顽固派为了将华中八路军、新四军赶往黄河以北，特设苏鲁豫皖边区委员会，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为主任，指挥各部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闹摩擦。1月初，汤恩伯指挥9个师26个团，准备向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部进攻。正在此时，日军发动了豫南会战，豫皖边顽军闻讯赶忙西退。新四军第四师（八路军第四纵队改编）尾敌西进，收复失地。2月7日，豫南会战结束，顽军立即反扑回来，从新四军手中夺取地盘。地方顽固势力亦乘机蠢动，大闹摩擦，永城、夏邑顽固县长各有武装400余人，不打日伪而“专驻边境上向根据地人民派粮派款，摧毁抗日民主政权，暗杀我公务人员”①。顽军凭借10倍于新四军的优势兵力，实行车轮战法，使新四军第四师处在全面战斗之中，消耗无法补充。3个月中，豫皖苏边区党政各机关及部队共伤亡、失踪4 000余人。5月，彭雪枫奉命率四师主力万余人及大批党政机关干部先后撤离豫皖苏根据地，转移至津浦路东

---

① 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豫皖苏抗日根据地》(一)，第3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皖东北地区。豫皖苏边区除睢杞太及萧县的部分地区尚有党的组织和部分武装公开活动，永城等县党的组织转入地下外，其余全部丧失。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睢杞太地区党组织决定独立坚持敌后斗争，并将地方武装统一组建为水东独立团。7月，独立团奇袭睢县西陵寺伪据点，全歼伪军40余人。10月后，建立起以太康西北聚台岗为中心的水上根据地，并建立了具有政权性质的“水东联防委员会办事处”。睢杞太军民在敌伪顽夹击下顽强地坚持斗争。

在豫鄂边，军民也粉碎了敌伪顽的夹击。

豫鄂边区的新四军是一个孤悬敌后的独立作战的战略单位，得不到其他根据地的支援，完全靠自身力量在严重困难的形势下坚持敌后抗战。1941年1月，日军发动豫南会战，鄂北、豫南国民党军队纷纷撤退。新四军豫鄂边挺进纵队为策应国民党军作战，进入鄂北应山、随县及豫南桐柏、信阳、唐河、泌阳、确山、罗山、息县、正阳等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2月上旬豫南会战结束后，退走的国民党军立即反戈向新四军攻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击退顽军多次进犯，恢复了大小悟山抗日根据地，使罗（山）礼（山）边和信（阳）应（山）边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4月5日，新四军豫鄂边挺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5月到11月，日军对鄂中、豫鄂边连续进行“扫荡”，并修筑据点、公路，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割、“蚕食”。新四军第五师广泛开展游击战，伏击、袭扰敌军。信阳日伪军百余人向信南芦家冲等地进犯，途经郭家寨，遭到信南抗日自卫队总队的伏击，日军指挥官被当场击毙。第五师还在罗山县朱堂店、涩港，信阳县梅黄店、冯家庄等地自卫作战中，击退顽军10多次进攻。

总起来看，1941年和1942年，是敌后抗战最艰难困苦的阶段。由于日军频繁“扫荡”、“清乡”，抗日根据地的面积和人口迅速缩小，抗日武装力量锐减，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根据地财政经济十分困难。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正确领导下，豫边各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民同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斗争，同时又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打退了



顽军的进攻，根据地更加巩固，军民更加团结，为转入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四、加强根据地建设

在敌后抗战的严重困难时期，豫边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极大的努力克服困难，坚持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

（一）巩固各级“三三制”民主政权

豫边各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即致力于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贯彻执行中共中央规定的“三三制”原则，借以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胜困难，巩固和发展各抗日根据地。“三三制”即在政权的组织结构中，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分子各占1/3。1940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各根据地政权建设问题的指示提出了“三三制”的政策，各区根据中央的指示，均在以往政权民主建设的基础上，将建立和健全“三三制”政权作为1941年的中心工作。在太行区，中共林北县委专门成立中心工作委员会具体指导这一工作，并举办了3期选举村干部训练班。为了通过选举既扩大统一战线，又能保持抗日政权的性质，县中心工作委员会提出了选举“好代表”、“好村长”的条件：好代表应是“公道正派，坚决抗日”；好村长应是“坚持抗日，能打游击，吃苦耐劳，办事公道”。经过广泛宣传、公民编组、选举代表、推举候选人、民主选举等程序，72个行政村成立了“三三制”政权。群众对选举的热情很高，林北县付家沟、小王庄等村参加选举的人数都占应参加选举人数的75%以上。通过选举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加强了村民的团结，增强了抗日力量，民兵及农救会等群众组织有了很大发展。1941年上半年，边区各县按照“三三制”原则，选举出临时参议会议员。7月7日，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开幕，由于鲁西观城、范县、濮县、朝城等33县划入，临参会遂改名为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八路军参议员申伯纯当选为议长，国民党参议员宋维周、邢肇棠为副议长。会议选举成立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杨秀峰为主席。边区政府委员共15人，其中共产党员占1/3强。临时参议会通过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15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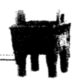
豫鄂边区，1940 年 9 月召开了边区第一次军政代表大会，会议按照“三三制”原则选举成立了“豫鄂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许子威、文敏生分任正、副主任。办事处成立后，各地各级政权开始改选、恢复与建立，但因处于敌伪顽对我夹击的非常时期，“三三制”原则在一些地方政权中未能得到充分体现。为了推动民主政权的建立，1941 年 4 月，豫鄂边区召开了第二次军政代表大会，大会选举成立了边区行政公署，许子威为主席，民主进步人士杨经曲、涂云安为副主席。大会通过了《鄂豫边区选举条例》、《鄂豫边区各级代表大会组织条例》、《鄂豫边区行政公署组织条例》及边区县各级政府组织条例等民主建政议案。6 月起，各地陆续召开了乡代表大会和保民大会，按照“三三制”原则再一次实行民选，彻底改造乡、保政权。县和行署政权也进行了改建。1942 年 3 月，豫鄂边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到会正式代表 126 人中，共产党员 47 人，占 37. 3% 。大会按照“三三制”原则选举共产党员陈少敏等 3 人，国民党员潘怡如、大学教授柳野青及实业家陈仇九等 6 人为驻会代表团；选举许子威等 25 人为边区行署委员，其中共产党员 8 人。

“三三制”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方针在政权问题上的具体体现，它的贯彻执行团结了根据地各抗日阶级和阶层，扩大了政权的基础，对于调动边区人民的抗日积极性，渡过艰难困苦的阶段，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实行“精兵简政”

1941 年后，由于日军频繁“扫荡”和封锁，各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物资严重不足。为节省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减轻人民的负担，各根据地都实行了“精兵简政”的政策。“精兵简政”原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中共中央接受了这个倡议，1941 年 12 月 17 日给各根据地发出“精兵简政”的具体指示。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按照中央指示进行了调整编制，缩减机关，抽调一批干部加强地方武装。经过精简，包括师直、第三八五旅、新一旅及各军分区在内的太行八路军，共裁减 151 个单位，约 6 650 人。冀鲁豫



军区先后进行了3次精简，其中第3次精简，军区直属机关、区党委、行署共缩减220人；边区领导机关直属队总人数由3 200余人减为700余人。太行区的精兵简政一直落实到村一级，简政前，村设村委员会，一个行政村有25个以上干部。林县实行精简后，取消了副村长，村政委员会只设民教、财粮、抗勤3个委员会，村干部大为减少。

通过“精兵简政”，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成功地解决了机构庞大和社会经济缺乏足够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也提高了工作效率，进一步密切了党同群众的联系。

(三)实行合理负担与减租减息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就提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有枪出枪”的口号，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随着抗日武装力量和党政群组织的发展壮大，所需经费增多，由于没有统一和合适的征收制度，农村各阶级各阶层之间出现了负担不合理的现象。为调动广大贫苦农民抗战的积极性，各根据地按照中央精神及时提出了合理负担，基本精神是富者多负担，贫者少负担，极贫苦的不负担。中共晋冀豫区党委本着扶助贫农、中农，奖励富农，削弱与联合地主的方针，并照顾到再生产和生活消费，提出地主负担应占其收入40%左右，富农25%，中农14%，贫农5%，负担面应到80%。各根据地制定了统一累进税条例，负担逐步完善、合理。

减租减息是中共中央于抗战时期解决农村问题的基本政策。敌后抗日斗争出现严峻形势后，中共中央指示各根据地，必须立即实行减租减息。1940年下半年，冀太联两次颁布减租减息条例。1941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后，在其施政纲领中即规定“切实实行减租减息，减租一般以二五为原则，减息减至一分半为标准”①。

但是，在实行的过程中，一些地区出现了“左”的倾向，违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了广泛团结一切抗日阶层去战胜困难，1942年1月

① 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档案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1)，第118页，档案出版社，19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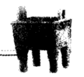
2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主要内容是：承认农民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中央强调：一方面地主必须减租减息，另一方面农民在减租减息之后要依法交租交息；一方面要保障地主的地权，另一方面要保障农民的佃权。各根据地按照中央的精神，修正了减租减息条例，明确规定减租减息之后必须交租交息。冀鲁豫区将中心区濮县（1956年并入范县）、范县作为试点，抽调500余名干部组成减租减息工作团，到两县开展以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等为中心内容的群众斗争。因濮、范两县地处黄河滩区，地主、富农往往大量占有黄河淤地而不呈报，有的地主乘农民之危买地时不把应缴公粮过户，形成有地不纳粮、纳粮没有地的现象。工作团发动群众反黑地，查清了土地数目，范县杨庄一户地主就瞒地近90公顷。土地澄清与地粮落实，为实行合理负担奠定了基础。在减轻农民负担基础上，逐步开展减租、减息、增佃。经过宣传发动，将租额减去25%，对小种制则按佃户分得数增加25%（即增佃）；利息按一分半计算，付息已超过本钱一倍，可停息还本；已超过2倍者，不再支付本利。

减租减息政策的执行，削弱了封建剥削，改善了广大农民的生活，同时兼顾农民和地主两方面的利益，团结了各个阶层，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敌后抗战渡过难关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四）开展生产救灾

1941年后，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敌伪顽夹击下，工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加上1941年、1942年连年灾荒，农村出现大批外逃或饿死人的现象。豫北沙区内黄县井店镇475户，外出逃荒的占70%；高内县（高陵、内黄合并而成）饿死2.4万人，出外逃荒15万人；南乐、清丰饿死人数均达数万①。整个沙区饿殍横野，一片荒凉。针对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再次强调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各根据地响应党的号召，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生产自救运动。

① 《中共安阳党史专题资料选编》（一），第210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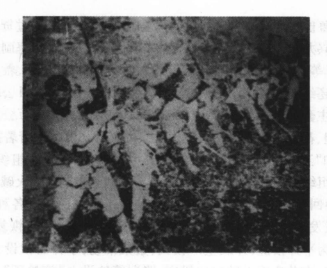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组织和帮助群众制定生产计划，通过贷粮贷款，扶助群众兴办水利事业，各县政府组织群众大搞纺织等家庭副业，发展织布、造纸等手工业；开垦荒地等发展农业，开展粮食互济，救济灾民。冀鲁豫区还组织武工队，到敌占区打击汉奸恶霸，征集抗日公粮；在灾区内向地主豪绅借粮，仅高内县第三区即借出粮食10多万公斤、红枣3 000余担、花生800多担[①]，缓解了群众的灾难。冀鲁豫行署提出“生产自救”和“互助渡荒”口号，在灾区开展生产救灾运动，组织妇女纺棉、织布，组织男子搞运输，把灾区的土特产如土布、皮硝、火碱、小盐等运出去，换回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同时，组织农民成立各种互助组织，给农民发放贷款，让农民购买生产工具、种子、牲口等，恢复农业生产。行署为平抑粮价、开展生产救灾、繁荣市场，于井店镇设立了“德兴隆”商店，在井店附近的村庄梁庄、路洲等地设立“济粮所”，在搞活经济、平抑粮价、开展生产救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豫鄂边区为解决面临的严重财政困难，区党委号召各级领导机关用发展经济的办法克服面临的困难。边区各县响应区党委的号召，组织干部和地方武装上山开荒，种菜种粮。中共信应地委和信南、信罗边县委抽调100多名干部组成开荒队，到土城、辛店、上天梯等地开荒1 000多亩。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中共豫鄂边区党委代理书记陈少敏等，也与群众一道修塘筑堤，施粪除草，并亲自开垦菜园，种菜种粮。当地农民夸赞说：“李师长种南瓜，种的南瓜人人夸；陈大姐种白菜，种的白菜人人爱。”[②]

各根据地开展的以生产自救为中心的救灾和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稳定了抗日根据地的秩序，密切了党政军同群众的关系，为支持敌后长期斗争，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① 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工作组：《冀鲁豫边区革命史》，第350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
② 樊有山：《豫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第18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新四军第五师指战员开展大生产运动

第三节　日伪在河南的统治

一、各级伪政权及伪军的建立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变中国为其殖民地，采取了"以华治华"的方针，扶植傀儡政权。1937 年 12 月 14 日，在日本卵翼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北平成立；次年 3 月 28 日，日本人又在南京炮制出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各地伪政府分别归其管辖。在河南，1937 年 11 月初日军占领安阳后，就积极网罗民族败类，筹建傀儡政权。当月 27 日，伪河南省自治政府于安阳成立，肖瑞臣为主席。1938 年 5 月，伪河南省政府归属北平伪临时政府管辖，改称河南省公署，肖瑞臣任省长。6 月初，日军占领开封，先笼络几个汉奸分子，15 日成立了以王旭初为会长的开封维持会。8 月，伪开封市公署成立，汉奸姜炳昭任市长。1939 年 3 月，伪省公署迁至开封。

1940 年 3 月 30 日，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汪精卫任



主席(1944 年 11 月汪病死,陈公博代),伪国民政府名义上是全国政权,原北、南伪政府同时取消,华北伪临时政府改设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名为汪伪政府的地方机构,实行自治,河南仍归该会管辖(伪军归汪伪政府管辖)。1943 年 11 月 15 日,根据南京汪伪政府指令,省公署改称省政府。

伪省政府实行省、县二级制。1938 年 8 月,安阳伪政府为控制豫东沦陷区,在开封设豫东行政委员会,管辖开封、商丘等县。伪省公署迁汴后,该委员会撤销。1939 年 4 月,伪省公署分别在商丘、安阳(后迁新乡)设派出机关豫东和豫北道尹公署。

沦陷区各县伪政府建立的情况不尽相同,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日伪统治比较稳固的地区,如商丘县等,日军占领后先设立维持会,短期内便过渡为县公署。二类是日伪统治比较薄弱,八路军、新四军比较活跃的地区,则先设立维持会,作为过渡,秩序稍加"稳定",撤销维持会,成立县政筹备处,经过一段筹备,改组为县公署。三类是日军一度占领的地区,只成立了维持会,而未成立伪政府。维持会设会长 1 人,副会长 1 人。县政筹备处设行政主任 1 人。县公署设知事 1 人。1943 年 12 月,根据汪伪政府指令,县公署改称县政府,县知事改称县长。到 1941 年 6 月,日伪统治的 43 县中,41 县设立了县公署,伪县政府控制区完成保甲的村庄占 72%。

日本政府为加强对傀儡政府的统治,1939 年设立"兴亚院",处理在中国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兴亚院在各占领区设立联络部,掌管占领区的军政事务,联络部须听命当地日军高级指挥官。日本华北方面军向各伪省政府派出顾问,伪省政府各厅、处及各道(市)县伪政府也设有日本顾问,这些顾问直接操纵着各级伪政权,成为伪政府的太上皇。

在建立伪政权的同时,日本侵略者又依据其"以华制华"方针,大量组建和收编伪军。此类伪军大体上分为正规军、游杂武装和地方武装三种。正规伪军主要由国民党部队降敌后收编,另外又网罗游杂及散兵,拼凑而成,主要有:

1. 李福和部。李福和原为河北独立第三游击支队司令。1938 年 2 月,李率部 3 000 余人主动投降日军,4 月,该部被改编为“皇协军”第一军,李任军长。李福和收编部分游杂武装,遂将该部扩充为 3 个师,号称万人,驻扎在安阳西部水冶、曲沟一带。同年 8 月,在共产党策动下,该军副军长徐靖远及师长黄宇宙、吴朝翰等击毙李福和及日军顾问,率部反正,该军瓦解。

2. 张岚峰部。张系柘城人,在冯玉祥部西北军多年,1938 年春回到柘城,6 月初豫东沦陷,张扯起“抗日”的旗帜,大量收容国民党军散兵、地方游杂及地主武装,数日间便集中起千余人,旋受日军驻柘城第十师团长矶谷廉介招降,1939 年年初集结近 2 万人,编为“豫东剿共军”。汪伪政府成立后,张部被改编为“和平救国军”第一军,1943 年 10 月扩编为伪第二集团军。1944 年春为张部鼎盛时期,号称 10 万人马(实 8 万余人),驻扎豫皖边 9 县,成为河南最大的伪军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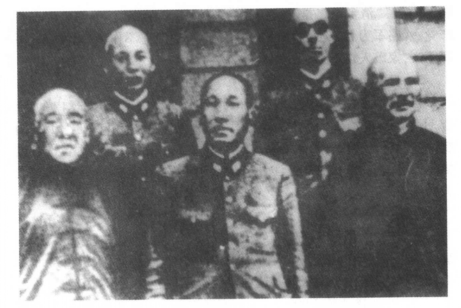
3. 孙良诚部。孙原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1942 年 4 月日军“扫荡”时,在鲁西率部 2.5 万余人投敌,被改编为伪军第二方面军,孙任总司令,辖 2 军 1 独立师,驻濮阳、考城地区。该部装备、战斗力均较强,常向八路军进攻。

4. 孙殿英部。孙原任国民党军新编第五军军长,1943 年 4 月,在林县降敌,被改编为“豫北剿共军”,仍驻扎豫北。1944 年 10 月改编为伪第六方面军。

5. 庞炳勋部。庞原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1943 年 5 月初被俘,在蒋介石“委曲求全”电示下公开降敌,日伪仍保留其部队番号及所有军职,仅在“第二十四集团军”前边加“和平军”字样,辖新编第五军及第四十军,部署于安阳至新乡间平汉路各要点及两侧地区,后移驻开封。1944 年 10 月,庞部被改编为伪军第五方面军,原第二十四集团军番号取消。

除前所述外,豫北地区还有伪兴亚巡抚军、伪东亚同盟自治军等,但其兵员与战斗力均无法同上述伪军相比。

至于非正规的游杂武装,情况更为复杂,性质亦不尽相同。有的是



庞炳勋(左一)、孙殿英(右一)投敌后与日军将领合影

土匪或民团、会门武装依附日军,有的是国民党军游击部队暗投日军。他们集土匪、伪军、顽军于一身,到处烧杀抢掠,破坏抗日政权,对抗日根据地的危害程度并不低于正规伪军。有的人数众多,独霸一方,如豫北扈全禄、李英、李步月等,均有众数千人。

地方伪军主要有:县警备队,受县维持会(县公署、县政府)指挥,一般千人左右,日本人"期望它组成维持县内治安的主要力量"①。警察所,有武装警察百人左右。以上为常备武装。还有将各区民团、会门武装改编的自卫团(保安团、联防队等),视各县情况而异,人数不等。

在正规伪军中,初期均设有日本顾问,到汪伪政府时期,伪军在形式上有一套相对独立的指挥系统,但却须听命于所在区日军指挥官的指挥,是地道的附庸军。伪军的任务,一是配合日军对根据地的"扫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2卷第2分册,第156页,中华书局,1980。

荡”“蚕食”“清乡”；二是支持伪政府维护地方“治安”。他们以清查共产党、八路军为名，任意捕人、杀人，敲诈勒索，无恶不作，使无数百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二、日本侵略军的暴行

自1937年11月日军侵占安阳，到1945年3月攻陷镇平、内乡，全省111个县市，有102个遭日军铁蹄践踏，其中43县市长期沦于日伪统治。侵略军在攻占一地之初或嗣后，在其占领区域之内，都曾进行过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奸淫，所犯罪行实在罄竹难书，举不胜举。最为常见的是：

（一）野蛮烧杀

日军攻占第一个河南城市安阳时，从小西门入城，一路见人就杀，继而挨户搜查，驱迫三条街道的居民集中于西营街，用重机枪全部射杀；另一部分居民集中于北马道北段，让日军展开杀人竞赛，连婴儿也难幸免。全城惨死约2 000人，不少家庭被杀绝。像裴家巷，除去战前已逃避农村的3家外，其余住户无一家能幸免于难，全家被杀绝者占2/5。同时又纵火焚烧，各街巷大火3日未熄。浚县于1938年3月28日失守，次日，日军即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屠杀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步枪击杀、机枪扫射、刺刀捅扎、军刀乱劈、狼犬撕咬、毒气、熏灌、成批活埋，甚至“点天灯”（浇上煤油烧死）、剥人皮，花样百出，充分表现其兽性。

伴随着屠杀的便是烧光、抢光。如1943年7月，日伪军300多人“扫荡”永城山城集，因镇内居民早已逃避，日军遂在镇南点燃房子，一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数千居民的山城集成了一片火海，大火自上午10时一直延烧到下午4时，6 340间房屋连同粮食、家具、衣物，都化为灰烬。

据战后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公署粗略统计，抗战期间全省人口减少620余万人，房屋损失约156万间，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被日本侵略军屠杀或焚烧的。



（二）疯狂洗劫和破坏

日军每到一处，伴随着大火与屠杀，便是疯狂的洗劫和破坏。举凡金银、首饰、古玩、字画、粮食、家禽、家畜等，只要能带走的，便抢掠一空，不能带走的便恣意糟踏。1938 年 5 月 16 日河南《民国日报》综述称敌“所到之处，翻箱倒柜，剖墙掘地，桌椅板凳概付之一炬，屋里、院里、街上均是灰烬堆，食缸摔为粉碎，锅碗尽破，骡子牵走，牛、驴（肉）置之火上，连生带熟剥而食之。粮食无论多少，尽倾倒以喂马，钞洋不必说了，其他细软搜刮一空。大便恒泻在大柜台上、桌子上、锅盆里，小便溺在面缸、米缸、菜罐里”。除这些直接抢劫之外，日军往来于河南各地时，成千上万的步兵、马队、汽车、炮车、坦克，往往横列几十米，在庄稼地里轮番进退；停驻一地时，在庄稼地里任意放纵骡马，又借口战事需要，到处掘挖战壕、封锁沟，修建操场、机场等，给各地的农业生产带来严重的破坏。在 8 年抗战期间，全省人民辛勤创造的物质财富到底损失多少，那是谁也无法计算清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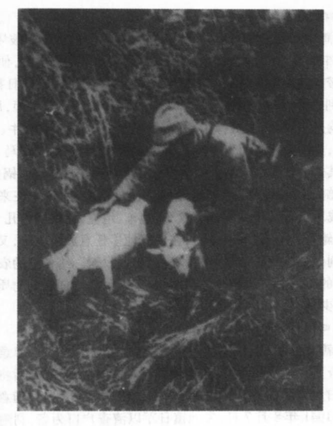
（三）四处奸污妇女

日军就像毫无人性的畜生一般，所到之处，不分场合，肆意奸淫妇女，有当着其父轮奸其女的，有当着其夫轮奸其妻的，有奸后将人杀死的，有将妇女集中在一个大院剥光衣服，守住大门，让兽兵随意进去行奸的。如 1941 年 8 月 7 日，朱仙镇日军以清查户口为名，到附近各村强将 30 多名幼女少妇拉至军营，轮奸两昼夜后，用汽车把她们送到开封“芙蓉院”，编为“营妓”。不仅如此，日军在河南也像在其他省份一样，抢劫大批妇女为慰安妇。今已考知的，如安阳、新乡、洛阳、开封、夏邑、邓县、考城、鲁山、虞城、信阳、永城等地，日军均设置有“慰安所”、“慰安营”、“花乃家”之类，迫胁许多当地妇女入内供日军发泄兽欲。

以上种种，仅是日本侵略军直接给河南人民带来的灾祸，虽然挂一漏万，也足以告诉人们，日军的太阳旗打到哪里，死亡、毁灭和污辱也就席卷到哪里。

三、日军的占领和“治安强化运动”

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扶植建立起伪政权后，采取多种措施，施行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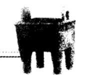


日军在抢掠农民的小羊

虐的殖民统治。

（一）成立“新民会”等奴化团体，从精神上奴化中国人民

1937年12月，由日本人操纵在北平创办了新民会，其宗旨是宣扬“中日亲善”和所谓“东亚新秩序”，以奴化中国人民，为其侵略服务。在华北沦陷区，新民会及傀儡政府是由日本人实行殖民统治的两个重要机构，凡有伪政府的县区均有新民会组织。1938年6月，日军侵占开封，不久便成立了开封市新民会。1938年秋，河南省新民会在开封成立，豫北、豫东沦陷区各县随着维持会（县公署）的成立，亦相应设立了新民会，省、道、县各级新民会会长由同级傀儡政府头目（省长、道



尹、县知事)担任,但主要职员全是日本人,受当地日军特务机关的直接领导。河南省新民会设总务、教化、组织 3 科和训练所,科下设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各级新民会中的少壮日本军人大多抽调战场,新民会中高级职员遂由汉奸充任。1942 年秋,河南省新民会改名为新民会河南总会,会长仍由伪省长担任,新民会内设事务部长 1 人,主持日常工作,同时,总务、组织、宣传、训练科均升为处,道、县新民会分设对口科、股。

河南新民会从成立到瓦解(日本投降后解体)所从事的罪恶活动主要有:发展组织,训练骨干,向沦陷区民众灌输奴化思想。新民会内的日本人及一些受奴化毒害较深的青年为日军收集各种情报,组织合作社,兼办医疗、救济等。新民会完全是帮助日本实行殖民统治的工具,为实现殖民地化,什么样的手段都用了出来,当年曾目睹新民会种种卑劣行径的英国教授班威廉揭露道:新民会在日本顾问指导下精神上奴化中国人民所用方法的卑劣几乎令人难以置信,"造谣和欺骗,敲诈和勒索,腐败和争夺,酷刑和恐怖,毒化,娼妓,邪行,凡是世界上种种最下流的行为都在这种机构里培养出来"[①],以此从思想上麻醉人民俯首贴耳做亡国奴。

侵略者所到之处,我国文化教育事业便受到极大摧残。开封、新乡、商丘等地大、中学校流亡豫西南,原校舍有的成为兵营,大多遭到破坏。浚县 1936 年共办小学 212 处,在校学生 8 589 人。1938 年日军侵入该县后,学校大部分停办,校舍被占,图书、仪器散失严重。1941 年,全县仅恢复公私立小学 47 所,在校学生不足 2 000 人。1944 年日军发动河南战役,避处豫西山区嵩县的河南大学,再次遭受惨重损失,设在潭头的理学院被焚毁,许多图书及仪器毁于一炬;医学院院长张静吾两度被日军俘虏,农学院院长王直青等 20 余名师生被日军抓获罚作苦工,稍有迟慢,便遭毒打。王直青奋而跳崖,摔成重伤;女同学李先知、李先觉姊妹等 10 余人死难,多人下落不明。社会文化教育设施也难逃

① 〔英〕班威廉等:《新西行漫记》中译本,第 8 页,新华出版社,1998 年。

浩劫，如河南省图书馆（开封）和河朔图书馆（新乡）珍藏的图书等都毁散殆尽，馆址亦为日军所盘踞。与此同时，对占领区人民实施殖民文化与思想奴役，以瓦解人民的抗日意志，达到其长期奴役中国之目的。日伪在沦陷区各级教育机关和各类学校，均设有顾问，掌握实权，将各级学校纳入殖民地式的教育轨道。

新闻宣传方面，日伪在开封、新乡等地办了多家报社，胁迫编辑、记者为其侵略服务。日军侵入开封的当月，《新河南日报》即开始出版，以后一直处于日军特务机关控制之下，出版的头10多天，都是经日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的秘书武田秀三审阅后才付印的。伪政府办的报纸一是为日军侵略辩解，粉饰日伪统治，宣传日军的“胜利”，描绘沦陷区的“安定”、“繁荣”；二是污蔑攻击抗日根据地，挑拨沦陷区民众同八路军、新四军的关系；三是捏造一些龌龊、下流的“新闻”，麻痹青年人的意志等。

厉行保甲连坐。1938年，伪省政府即拟定了编制保甲的各项法令章则，责成各县施行。由于日伪军统治尚不稳固，编制保甲收效不大。相持阶段到来后，伪政府配合日军“治安强化运动”，令各县认真清查户口，编制保甲，由民政厅、警务厅负责实施。编制保甲第一步是清查户口，伪人员逐户清查核实，造册登记。每5户为一互助小组，由户长负责，一户为“匪”通“匪”，同组其他户不及时报告者同罪。一般10户为一甲，10甲为一保，合数保为一联保。各地根据清查户口、编制保甲的情况，严格实行“良民证”（即身份证），无证或借用他人证件会被视为八路军立即处死。同时厉行连坐。保甲的编制加强了日伪对基层的统治，此后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时，便是依据保甲编查情况将沦陷区划为治安区、准治安区和未治安区的。

（二）经济掠夺与破坏

日军为实现其“以战养战”的方针，在占领区实行全面的殖民经济掠夺，用中国人民的血汗支持其侵略战争。

1. 对金融的垄断。日军每侵占一地，首先抢劫公私银行，同时操纵傀儡政府成立的银行。1938年3月，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在北平



设立,发行没有准备金的伪钞“联银券”。1938年伪“联银”在开封设立河南省分行,豫东、豫北道及开封市设支行,各县设营业所,并大量发行联银券。汪伪政府“中国储备银行”在商丘设有分行,开封设办事处。1940年8月,伪“河南实业银行”成立,发行1元以下小额辅币。它同伪“河南省农民银行”一样虽为独立银行,实际受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直接领导。在河南开展业务的伪银行还有代表日本正金银行的朝鲜银行等。日军依靠刺刀维持伪钞的“信用”,对国民党法币限制流通,1938年8月在开封法币以9折行使,半年后仅按6折流通,日军用掠夺来的法币到国统区套购物资,中国人民的血汗和财富被日军榨取而去。伪钞的大量发行和日军的肆意掠夺,引起沦陷区物价的上涨。1942年后,由于日军挑起了太平洋战争,军需浩繁,对占领区的物资掠夺日益增加,伪钞发行量大增,各种物资供不应求,物价飞速上涨,人民最低生活亦难维持。开封市抗战前后几种生活必需品价格变动如下表所示①:

价格(元) 商品 年份	小麦(斗)	大米(斤)	面粉(斤)	猪肉(斤)	牛肉(斤)	鸡蛋(个)	食盐(斤)	白细布(尺)
1937年上半年	0.972	0.077	0.098	0.20	0.155	0.015	0.131	0.096
1940年	3.72	0.50	0.177	0.78	0.60	0.06	0.18	0.40
1945年10月	290.00	60.00	42.00	140.00	80.00	20.00	50.00	230.00

开封物价变化是河南沦陷区物价的一个缩影,其他各地物价上涨情况也大致相仿。

2. 对农村经济的破坏和掠夺。除了前已述及的烧杀抢掠等直接的、大面积的破坏外,日军任意侵占农民的土地,修建试验区、兵营、飞机场、仓库、公路、封锁沟、封锁墙、碉堡等,致使占领区耕地面积大幅度下降,农作物产量急速下滑。

在沦陷区,农民的田赋负担虽然名义上仍照旧额征取,事实上往往

① 据马庆海:《开封物价志》有关章节编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一年多次开征，另外还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拿最先沦陷的安阳为例，1939 年全县因灾每亩土地秋收产值不过 3 元左右，而所负各种捐税在七八元以上，另外还有牲畜捐、屠宰捐、粮捐、斗捐、棉捐、煤捐、苦力捐、津汁（粪尿）捐，等等。以后又不断增抽新捐，如婚姻税（娶方 3 元，嫁方 2 元）、生子税、死人税（均每人 3 元）、砖瓦税、雇工税、鸡捐、房捐……还有随时摊交的各种杂派。盘剥之狠，史所罕有。

除此之外，日军还在各沦陷区强令实行“统制”和“征购”。殖民当局通过各级伪组织，强迫每户缴纳“股金”，组建乡村、县、省各级所谓“合作社”，对沦陷区的粮食、棉花以及其他主要农副产品实行统制，禁止民间储存和自由买卖。仅 1939 年，日本从河南占领区掠夺的棉花就近 1 500 万公斤。



日军在河南抓捕大批劳工运往东北

3. 抓丁拉夫，掠夺劳工。日伪军为补充兵员，强征占领区青壮年农民当兵。日军为修公路、碉堡、炮楼、机场、封锁沟等，更是常常大批征派民工。如日军占领济源期间，县内民众被派各种差役达 290 余万



个,等于1 000多人风雨无阻地劳作8年!日军还常在各地掠夺劳工,送往东北、朝鲜、日本做苦力。1944年10月,日军对滑县桑村一带“扫荡”时,掳掠青壮年农民300人,经济南转运到日本北海道川口西鲁别村煤矿,每天劳动12小时,给0.5公斤面的馍,有病也得做活,还常常遭到毒打,多数劳工累病致死,得以艰难存活的只有120人。

4. 垄断商业。在日本殖民当局的支持和保护下,日本大仓、三井、三菱、住友等财团和其他中小商业资本在开封、商丘、新乡、安阳等城市遍设会社、洋行、公司,在各城镇分设行店,配合各级合作社进行商业垄断。如在商丘县城和朱集,1941年间营业的日本洋行就有40多家,另有各种店、馆160多家。这些洋行、公司、会社凭借特权,欺行霸市,从粮食、棉花、布匹、油脂到药材、茶叶、皮革、猪鬃直到柴炭、饮食,均被把持。他们一方面以极低的价格强收农副产品,另一方面又以极高的价值售卖各种工业品,致使食盐、煤油、煤炭、火柴、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市价均较战前提高数倍至数十倍。如1942年浚县县城0.5公斤食盐与3.5公斤小米等值,30公斤小麦才能换购0.5公斤红糖。所以在各沦陷区,普遍是物资奇缺,市场萧条,生产停滞。

5. 掠夺工矿业。1938年日本成立一个“国策”会社——华北开发会社,下辖18个子公司,分别统制包括河南在内的华北各地的煤炭、电力、交通等行业,还统制前述各种农副产品,沦陷区的全部铁路、公路、电厂和邮电被劫夺,其他工矿企业也被日本以各种名异实同的方式——“军管理”、“委托经营”、“租赁”、“收买”等,夺归日本会社、公司掌管。如在煤矿发达的豫北,就以军管名义接管了焦作中原公司和福公司、安阳六河沟煤矿公司、武安大成煤矿公司等10家煤矿,仅焦作一地,掠夺的存煤即达30万吨。随后又以“兴中公司”等名义进行掠夺性开采,焦作煤矿在沦陷期间就采煤477万吨,既用以支持侵略战争,也严重地破坏了我省煤炭资源。其他如安阳广益纱厂、豫安纱厂、卫辉华新纱厂、武陟成兴纱厂等,因未来得及搬迁,也悉数落入日军手中。

(三)推行“治安强化运动”

1941年、1942年两年,日军在占领区连续进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

动”，以期摧毁抗日根据地和根据地军民的斗志，建立稳固的殖民统治秩序。伪河南省公署除积极配合日军厉行“治安强化运动”外，并制定了十分具体的实施办法，要求各地增强对封锁沟和炮楼的修筑，厉行保甲，约束民众，使共产党“无活动之余地”；对各抗日根据地实施“绝对封锁”，吸收根据地“一切物资”，破坏根据地之“资源开发，经济建设”①等。像伪商丘县政府，为了配合“治安强化运动”，就集中警察、警备队、自卫团、伪职员等540余人，编成治安强化讨伐大队，到各区保进行示威及宣传，抓捕嫌疑人员，同时成立物资禁止输出督察专员分会，于各要路口及集市严行检查，没有日军或宪兵队发给的证明书者即予以查扣。对粮食、棉花等也严加控制，以防流入根据地，给敌后抗日根据地造成极大困难。

第四节 相持阶段的国民党统治区

一、敌后和正面战场的作战

（一）敌后游击战的部署及衰败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日军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战局出现稳定局面；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则深入敌后，建立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形成敌占点线我占面的军事格局。面对这种形势，国民党利用时机，对政治、军事进行整顿，确定其军队作战指导方针是：增强敌后力量，“积极开展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主力配置浙赣、湘赣及平汉、陇海、豫西、鄂西各要线，“极力保持现在态势”②。为此，决定抽调1/3的部队配置敌后，开展游击。同时重新划分战区，调整部署。河南（不含豫南）及安徽一部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设洛阳；皖西、鄂北、豫南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设老河口。在敌后新设立

① 陈传海等：《日军祸豫资料选编》，第33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3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了鲁苏、冀察两个战区。本着这一作战方针，除未及撤退的部队外，国民党军大批开入敌后，以求从日本占领军手中收回失地，也与八路军、新四军争夺地盘，因而逐渐形成为与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摩擦的主力，最终在日军进攻下陷于失败。

国民党在中条山、王屋山一带配置的部队有十几个军，在豫东设立了以汤恩伯为总司令的苏鲁豫皖边区总司令部，辖4个集团军。除上述国民党正规军外，一战区、五战区、冀察战区和苏鲁豫皖边区总司令部还大量收编地方游杂部队，委以各种名义，活动在敌后。

上述正规部队和游击队初期曾向日伪军发动多次进攻并给以杀伤。随着国民党不断掀起反共高潮，部署在敌后的国民党军队逐渐转向制造摩擦，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敌后国民党部队既不善于进行游击战争，又不会做群众工作，其军需复依赖兵站供给，在敌后生存能力本来极差，其反共本质暴露后，更失去了广大群众的支援，当日军向其进攻时，这些部队几乎没有抵抗能力。1941年5月，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国民党军遭到惨重失败，中条山全部丢失。1942年夏，日军“扫荡”濮阳、濮县、东明等地，国民党军伤亡重大，退出濮阳地区，避处鲁西南的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孙良诚公然投敌。1943年4月，日军大举进攻林县、陵川地区的国民党军，4月24日，冀察战区新编第五军孙殿英率部投敌，5月上旬，战区副总司令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被俘投敌，一战区冀豫边区游击总指挥杜淑亦在这一时期投敌。至此，国民党军在豫北地区的游击战争烟消云散。

（二）正面战场的作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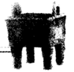
1. 日军侵犯桐柏、唐河。日军占领武汉后，为了打击国民党的抗战力量，消除鄂北、豫南方面中国第五战区军队对武汉的威胁，1939年5月初，日军发动襄东作战（随枣会战）。敌第三师团向随县地区发动进攻，遭到第五战区左集团军的顽强抵抗。继而日军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及骑兵第四旅团向第五战区右集团军发起进攻，攻陷枣阳，切断了第五战区左集团军与后方的联络。信阳日军一部为策应其主力作战，6日起沿信阳、桐柏公路西进，10日陷新野，进围桐柏，次日据城。15日，

第五战区第一一九师向日军发起全面攻击，16 日克复桐柏。在信阳日军西犯时，枣阳日军亦向唐河方向急进，5 月 12 日晨，占领唐河县城。第五战区第二集团军主力向唐河一带反攻，襄河两岸部队亦袭击日军第十三、第十六师团侧背，于 14 日克复县城，日军向安陆方向转进。桐柏、唐河战斗结束，恢复战前态势。

2. 日军再犯豫西南。1940 年 5 月，华中日军第十一集团军向中国第五战区防地枣阳、宜昌大举进攻，发起枣宜会战。5 月 1 日，驻扎信阳及其以北地区的日军分 3 路向泌阳、枣阳方向进攻。3 日在毛集遭第五战区部队痛击，死 1 500 余人。6 日，日军陷泌阳，7 日陷唐河、新野。第五战区左集团军同日军展开激战，泌、桐地区日军遗尸逾千。同时，第五战区又向江北日军展开反攻，第七军及鄂东游击队攻占了平汉线上的武胜关、柳林镇等重要据点，第九十二、第六十六军等部先后克复唐河、泌阳、新野、桐柏、明港。在南线与敌作战的第五战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5 月 16 日于枣阳壮烈殉国。

3. 豫南会战。日军为解除中国军队对武汉地区的威胁，集中步、骑、炮 10 余万人，区分为左、中、右 3 路，另有豫东、皖北日军配合，于 1941 年 1 月 25 日起，发起豫南会战。日军左兵团第三师团向信阳北中国军队阵地奔袭，其中央兵团和右兵团，由信阳、罗山，进至泌阳、高邑（泌阳东）、刑店（确山西）、确山一线，另一部陷正阳。第五战区仅配置一师于西平附近节节抵抗，正面阻敌，主力则伏于预期敌人进犯路线之两侧，伺机攻敌。当敌进至驻马店一线时，第五战区 5 个多军由三面压来，日军多次受创。日军 10 余万人进至舞阳、上蔡之线后，不但与第五战区主力决战的计划落空，且补给线受到袭扰，态势渐形不利，遂于 2 月 2 日夜开始撤退。其右翼兵团亦经汝南撤回信阳。豫南战场恢复原态势，日军共伤亡 9 000 余人。

4. 中条山会战。1941 年 5 月 7 日，华北日军以 6 个师团、2 个独立混成旅团，由东、北、西三个方面向驻守于中条山地区的中国军队发动全面进攻，以图全歼。中条山地区有第一战区部队近 18 万人，由于执行“反共”“限共”政策，对日军疏于防范，在日军突然进攻面前连连失



利。于济源、孟县出犯之日军第二十一师团以及第三十五师团，与第一战区第九军激战数日，突破防线，12 日进至济源西部原镇，与由垣曲东进之第四十一师团一部会合，控制了黄河北岸各渡口，对中国军队实施围歼。第一战区部队损失惨重，第三军军长唐淮源及第八十军新编第二十七师师长王竣等殉国，全军伤亡 4.2 万人，被俘 3.5 万人，残部化整为零，分别突围，向黄河南岸、太岳山区及吕梁山转移。国民党军在中条山区的根据地全部丢失。

5. 郑州战役。1941 年 9 月，华中日军发起第 2 次长沙会战，华北日军为配合会战及牵制豫中中国军队，遂抽调第一一〇、第三十六师团各一部，会同豫东第三十五师团及独立第四旅团一部，共约 5 万兵力，由北、东两面向郑州发起进攻。10 月 2 日凌晨，豫东日军分由中牟东南界马、郑州东北琵琶陈强渡黄河，突破守军第二十二师第一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失守。第八十一师奉命沿贾鲁河新堤阻敌，战斗极为激烈，驻守郑州东北大花庄桥头的一营长指挥所部毙敌逾百人，附近民众自动赶来相助，用大刀、铁叉、斧头与敌相搏。终因敌火力过强，守军分别退至郑州南十八里河、西南黄岗寺一带。4 日郑州失陷。黄河北岸日军则由广武渡河，抢占了黄河铁桥南端及任家岭、祖师庙等制高点。第十七师第五十一旅与敌反复搏杀，日军施放催泪弹及毒气，第五十一旅伤亡近半。日军相继占古荥、广武及汉霸二王城等。中旬，第一战区各部不断向郑州反攻，31 日夜收复郑州、古荥、广武等地，日军在邙山头霸王城筑起据点，凭精良火力和险峻地势固守，第十七师等部多次强攻，战果不著，只好改变策略，围绕霸王城修筑防御工事，监视日军。此次战役毙伤日军 3 000 余人。但因中牟县城及邙山头未能收回，致使其成为 1944 年日军进扰中原的前进据点之一。

二、日趋腐朽和法西斯化的国民党统治

（一）行政督察区制度的强化与省临时参议会

1938 年 6 月豫东沦陷后，省政府离开了省会开封，播迁至豫西南镇平。1939 年 9 月，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10 月省政府迁至洛阳。1942 年年初司令长官不再兼任省主席，4 月省



被日军炸伤的老百姓抱头痛哭

政府迁至鲁山。1944 年 5 月日军进攻豫西，省政府迁内乡县丹水镇（今属西峡）。1945 年 4 月日军进攻豫西南，省政府再迁卢氏县朱阳关。不过，省政府虽历经播迁，始终行使着职能，并增添部分机构，分管各该项工作。

1944 年夏，日军发动河南战役，第一战区数十万军队狼狈溃退，豫



中、豫西大片国土沦陷。偏处豫西南的省政府,同七(淮阳)、八(汝南)、九(潢川)三个专区所辖20余县失去联系。为领导这些县的工作,省政府依据行政院《战区各省省政府设置行署通则》之规定,12月设置新蔡行署,秉承省政府之命,在所辖区域内代行省政府职权。行署主任由第五战区豫鄂皖边区副总司令、豫南挺进军总指挥张轸兼任。行署设秘书、政务、警保3处,1946年2月行署奉命撤销。

始设于1932年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抗战期间有所调整。豫北、豫东沦陷后,省政府为加强对沦陷区的管理,对区划进行第二次调整,由一专区划出开封(1939年9月仍归一专区)、通许,二专区划出陈留、兰封、考城、民权、睢县、杞县,增设第十二专区,专员公署设兰封;由第三专区、第四专区划出8县,增设第十三专区,1942年6月第十三专区撤销,所辖县仍分归第三、第四专区。直到抗日战争结束,省内12专区没有变化。

依照国民党政府的有关规定,各战区之行政督察专员得兼区保安司令及军法执行总监部督察官,对辖区内政治、军事、民事等均有权处理、指挥。尤其在沦陷和一度沦陷区,专员甚至有权撤任和委任县长。国民党掀起反共逆流后,有的专员便乘机改编抗日武装,有的则强行撤换抗日县长。敌占区各专员兼保安司令均将本区地方武装整编为游击队,有的有上万人、枪。1940年夏,一战区直辖27个游击纵队,其中有7个游击纵队的司令为现任专员兼保安司令担任,专员的权势进一步增大。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强化,有利于组织本地区民众及地方武装对日作战,但也加强了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专署与地方顽固势力相结合,破坏共产党组织与民众抗日运动,给抗日斗争造成危害。

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及许多爱国人士一致要求国民党建立民意机关,推行民主政治,增加抗战救国效能,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成立,议定各省临时参议会于1939年1月1日成立,确定河南参议员名额为50人。按规定参议员的60%在各县市住民中遴选产生,40%在各重要文化团体和各经济团体中产生。由于全省40余县沦陷,联络、交通不便,各地候选人推举工作一再延缓,1939年4月初,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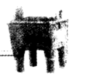
临时参议会议员名单才推定。5月1日，河南省临时参议会成立大会在镇平召开，刘积学、嵇文甫、朱光华等36名参议员出席大会。1940年10月、1943年11月，分别召开了第二届、第三届省临时参议会大会，每届参议会期间均召开过数次会议。1944年年底取消“临时”二字。

省临时参议会仅是国民党标榜民主政治的饰物。省内100余县，产生的参议员仅有30名，全由省党政联席会议提出后“遴选”产生，尔后由行政院初审、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因此既缺乏广泛性又缺少民主性，加上提案时的种种限制，注定参议会不可能代表民意，也无权立法，只不过是一个咨询性机构，主要作用是掩饰国民党独裁，搪塞各阶层民众的民主要求。

（二）发展特务组织，加强特务统治

1938年，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成立的特务组织“中央俱乐部”（简称CC）和“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改组而成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正式形成，并都在河南建立组织，发展成员，为国民党一党专制服务。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长官汤恩伯，在军统头子戴笠协助下，开办了多期训练特务的训练班，分别组建有豫晋冀鲁边区党政工作总队及苏鲁豫皖边区党政工作总队，从事反共反人民的活动。由军统和美国海军参谋部情报署合组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全国开办了10个“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其中第三班1939年10月成立于临汝风穴寺，主任由戴笠兼。

1942年8月，一战区长官部、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河南省政府，抽调中统、军统分子，组成“河南省党政军伏牛山区工作团”（简称“伏工团”），进入南召、镇平、淅川等县，勾结、利用当地反动分子，搜集有关共产党组织及活动的情报，以求彻底破坏伏牛山区的共产党组织。汤恩伯为同“伏工团”争功，令该部第一一〇师由方城进驻南召，10月上旬依照第三十一集团军政治部特务掌握的线索，逮捕共产党员234人、革命青年及进步人士138人，其中20余人惨遭杀害。中统河南省调查



统计室镇平分区亦随之行动，对镇平、内乡、淅川 3 县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到 1943 年 2 月初，先后有 180 人被捕；“伏工团”进而将其活动范围扩大到内乡、南阳、方城、邓县、唐河、泌阳、确山等地，对共产党组织进行肆意摧残，对革命群众、进步人士滥捕乱抓，大造白色恐怖，又有 400 多人遭到酷刑折磨。特务的横行，使豫西南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

（三）防范、打击共产党

自 1939 年 1 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作出对共产党防范、限制、打击的方针后，共产党组织在国统区不能公开活动。1939 年 11 月 15 日，国民党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党部在立煌县集会，制定《豫鄂皖三省党部防遏共党活动办法》。1940 年秋，河南当局先后进行两次大逮捕，百余名共产党员被关进监狱。1942 年春第十八集团军驻洛办事处撤销时，办事处处长袁晓轩在国民党特务威逼下叛变革命，一战区据袁提供的材料，又逮捕了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80 余人，各地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随时有被逮捕和杀头的危险。为保存力量，减小损失，中共中央除决定豫西地区停止发展党的组织外，从 1941 年 2 月起紧急撤退河南国统区党员干部，中共河南地下党区级以上干部 100 多人分批撤往延安。

（四）实行新县制

1939 年 4 月，国民政府公布《县各级组织纲要》，具体规定了县、乡（镇）政府机关、办事机构、民意机关、自治财政来源及保甲编制等，1940 年起在全国推行。“新县制”是国民党加强一党专制的产物。《县各级组织纲要》要求国民党各县党部要牢牢地把握住县政府，各区分部要与区、乡（镇）政府相配合，党员小组与保甲相结合，县、乡（镇）、保、甲长，均应由国民党员担任，其有未加入国民党者，要设法介绍其加入。在乡（镇）实行管、教、养、卫结合，政、军、警、学、经一体化，即乡（镇）长兼任国民兵队队长和中心学校校长，民政、经济、文化三股主任由正副乡（镇）长和中心学校教员兼任，警卫股主任由乡（镇）国民兵队副兼任。与此紧相配合，又在农村大力发展国民党、三青团组织，吸纳

大批地主士绅及其子弟，倚以宰制广大农民。新县制的推行，原在县、乡机关任职的非国民党人士及国民党内具有正义感者均被撤换，国民党一党专制进一步加强。

（五）加强保甲制度

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先后制定了《运用保甲组织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警察保甲及国民兵联系办法》、《各县保甲整编办法》等，从不同角度强化保甲制度。河南当局对整编保甲十分重视，1939 年 4 月，省政府制定保甲人员训练纲要及各县保甲人员训练组织通则，通令各县在 6 月底以前，将所有保甲长训练一遍，以使其充分发挥“作用”。全省在 1939 年、1940 年间共训练了保长 17 512 人。抗战时期的保甲制度同前比有几点不同：一是加强了对保甲长的控制，保甲长均由国民党员担任。二是强化了保办公处。三是保甲组织的警察化、特务化。四是保长、保国民学校校长、保壮丁队长由同一人兼任，三位一体。五是强化联保连坐。保甲内实行“人必归户，户必归甲，甲必归保”的制度，甲内实行联保连坐制，即 1 家有“罪”，另 9 家“举发”，若不“举发”者则连带“坐罪”。六是保甲兼管“管、教、养、卫”。“管”就是加强国民党的统治，强迫民众执行国民党的各项“法规”；“教”是培养能维护国民党统治的行政人员，并向民众宣传和灌输封建思想，实行愚民政策；“养”是发展农村经济；“卫”是发展地主武装，以加强对地方的统治。这样就大大强化了国民党对地方基层的控制。保长集保内大权于一身，成了合法的土皇帝，既积极反共，也鱼肉乡民。

三、“水、旱、蝗、汤”巨大灾难

河南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如前所述，国民党政府对城乡人民的盘剥已十分苛重。抗日战争爆发后，数十万军队云集河南，军费、粮秣供应和其他各种财政支出和物资消耗都大幅度增加，所有这些都转化成各种捐税和摊派转嫁在人民头上。如 1938 年，经南京国民政府批准，每田赋银 1 元，就带征“抗战附加”1 元，也就是加倍征赋，“以充抗战经费之需”。各军所需巨额粮食、草料，均以不到市场价 1/2 的低价（即此亦大都被乡保人员中饱，很少落到农民手中），分摊各乡代购，光此一



项，每县每年就亏赔十数万元。农民不仅要出粮，还要提供人力、车辆，常年长途运送，运途的消耗往往超过麦价两三倍。如济源县在1940年，光给晋东南军队运送给养，经常每日出夫1万名上下，大车400余辆，农民"出去一次一二个月不等，牲口和人的花销约在四五十元，弄得不好，牛也拉死，车也丢了"①。据财政厅厅长曹仲植估算，从抗战开始到1939年不到3年的时间内，全省未曾沦陷的60余县，包括军麦在内的非法摊派总共达2亿元②，平均每县每年近120万元。

到1941年下半年，情况又有所变化——土地的赋税负担不是稍有减轻，反而进一步加重。1941年6月，国民政府召开的财政会议决定变更财政体制，将以田赋为主要来源的省财政并入中央财政系统，由中央统一管理。在此之前，国民政府已作出决定，将各省田赋由征收现金改为征收实物（原粮）。1941年3月，行政院通过《田赋改征实办法暂行通则》，规定从该年9月开始实行。河南也遵此执行。具体办法是：将1940年田赋正额和大约2倍于正额的附加合在一起作为基数，每元改征稻谷2斗或小麦1.5斗（他省多为1.4斗）、谷子3斗、玉米2.5斗，各地依据农田生产情况任择。这样就把过去归属县财政的各种田赋附加，都变成正额田赋而一并收归中央，等于将田赋正额提高了3倍。征实之外，还有额外新加的征购、征借，数额大体上与征实不相上下。因为征实、征借所得粮食均归中央财政和各支军队食用，本省各级公教人员战时每月需要发放的粮食（职员米5斗，一般公教人员2.5斗），另按征实量的35%带征，名为"省级公粮"、"省级征实粮"。征实、征借、带征合在一起，相当于此前正额田赋的6.3倍，均要农民用原粮交纳。以1943年为例，省内计粮食征实151.3万石，征购149.9万石，又带征省级公粮60万石。国民政府因河南大灾之年仍能达到配征数额的90%以上，特予省田粮管理处处长记"大功"一次，副处长记

① 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第31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② 河南省档案馆存档，财政厅档5:7: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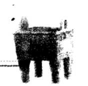
“功”两次。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在河南创造征粮居全国第二的“奇迹”的同时,还创造了另一个“奇迹”,那就是征兵的数量居全国第一,征工数量亦名列全国前茅。

1936 年国民政府实行征兵制后,军政部确定河南征兵额为每月 2 万名,而河南军管区每月实征都大大超额。据国民政府兵役局册报,1937 年河南全省征兵 12.6 万余人,1938 年增为 32.4 万余人,以后几年都在二三十万之间滚动,最多的 1940 年为 38.4 万余人,最少的 1945 年近 2.5 万人[①]。除此之外,各支国民党军队又另行在河南各地直接招兵。至于征工,数量也越来越大。据省内 35 份报告统计,如以 1938 年征工数为 100,1939 年为 194.3(全国 104.9),1940 年为 229.5(全国 111.2),1941 年为 241.1(全国 140.1),1942 年为 153.8(全国 105.9)[②]。约计在抗战 8 年中,全省被征民工累计在 400 万人以上[③]。与征粮一样,仅剩半壁河山而且连年大灾的河南,在征兵、征工上又名列前茅,因此外省报纸论称河南在抗战期间“出兵最多”,博得“产兵区美名”[④]。这种“奇迹”和“美名”固然从一个方面说明河南人民对抗日战争的巨大贡献,也反映出河南人民的巨大牺牲。其中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农村劳动力的急剧减少。据省内 34 县报告约计,在有子弟被抽当兵的“抗属”中,大约 27.6% 的家庭已无壮劳动力;被征工后,出工户 20.8% 家中已无壮劳动力。因而许多农民只好缩小耕种的土地面积,甚或抛荒停耕。这就加剧了抗战期间天灾的肆虐程度,也妨碍了农业生产的恢复。

抗日战争期间河南有一种特殊灾难——“水、旱、蝗、汤”中的“汤”灾。抗战期间,人们用催人泪下的四个字——“水、旱、蝗、汤”概括河南人民在国民党统治下遭受的巨灾大难。“汤”,就是指时任国民党第

① 邵文杰总纂:《河南省志·军事志》,第 390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② 武汉日报社:《武汉日报年鉴》,1947 年,经,第 39 页。
③ 天津《大公报》,1947 年 3 月 16 日。
④ 天津《大公报》,1946 年 11 月 20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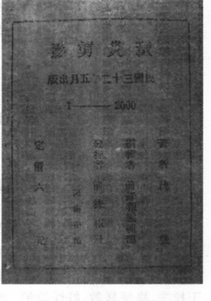
一战区副长官兼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的汤恩伯。他设大本营于叶县，人称“中原王”，始终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却借抗战为名，对城乡人民大肆搜刮。在叶县大兴土木，向邻近十余县征工、征料，并要农民扔下农活，自备车、牛，从几十里、几百里以外将木料等赶运到工地；又以阻挡日军战车为由，在北起郑州、东到开封、南迄周口的广大地域挖掘深沟两道（复线），总长千余里，不仅破坏大片农田，还要沿线百里内的农民，自带口粮、工具前往挑挖，各县、乡还要提供大量石灰、木料。复以治理黄河为由，另行征派大批工、料，光 1943 年 5 月，所征民工就达 56 万人。其他如修城、建寨、建营房、修公路、筑碉堡、运粮秣、应军差等，连年不断。干活时，饥饿的民工稍有懈怠，就要挨揍或跪在碎石子上，因此许多人被折磨致死。各军军官则不顾人民死活大发国难财，如 1942 年汤恩伯部军长陈大庆交卸时，就将叶县兵站仓库积存的公粮 35 万多公斤变卖肥己。汤的嫡系部队第十三军驻扎登封一带，自行“抽丁拉夫，横征暴敛，奸淫抢掠，光是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就有 38 种之多！除了捐税，还有粮食、马草、木料、鞋袜、烧柴等物资”，以致当地顺口溜称：“宁让日本人烧杀，不让十三军驻扎”（因日军“扫荡”的时日毕竟有限，民众还可躲藏）①。其他各支国民党军队也大同小异，或有过之无不及。类似流传于省内的民谣，悲愤地诉述了“汤”灾给城乡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至于水、旱、蝗等天灾，如前所述，抗战前就连年不断，抗战后更加严重，1941 年，旱灾兼雹灾、霜灾、水灾，上半年灾区即广达 100 多县，几乎无县无灾。入秋后，全省连月无雨，旱象已显，延续至 1942 年，遂形成举世震惊的大旱灾、大蝗灾。

1942 年初夏，中牟等数十个县连续七八个月滴雨未落，豫中一带夏收只 1—3 成，汜水、巩县、新安等县颗粒无收。中原沃野变成赤地千里，井枯河干，大批灾民往外地逃亡，形成历史上少见的大旱灾。6 月落了一场雨，晚秋得以种上，看着绿油油的禾苗，人心才得稍安。谁知

---

① 郭林祥：《劲旅一支出太行》，第 29 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



记述1942年大灾的《豫灾剪影》版权页

祸不单行，旱后又生蝗灾，飞蝗（俗称蚂蚱）由黄泛区东掠河而西，遍及50余县，大群大群的蝗虫遮天蔽日，嗡嗡有声，落地觅食，能盖严地皮，压断树枝，四五亩地的玉米、谷苗，不消几分钟就被吃成光杆，满山遍野的青草亦被吃光。又随地产卵，数日之后，即成蝗蝻（幼虫），四处聚集，继续危害庄稼。过一段时间蝗蝻蜕皮，又成飞蝗。除豫南稍好外，全省大部分县份数季无收，政府仍然征实、征购巨额粮食，遂使各地十室九空。以郑县为例，该县1941年小麦收获总量“仅够全县人口1个月的生活”，秋季则颗粒无收，1942年春，全县人口由20万减少到15万，15万人中粮食充足者15户，自足者27户，不足者3 893户，“非赈不活之灾黎四万九千余人”[①]。全省粮食产量仅及常年1—2成，灾民达1 000万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1/3）。据中央赈委会所派赴豫调查人员报告，到1943年秋，光第一、第二、第六、第七、第十等5个行政区，就死亡148.5万人，许昌一县即死亡18.3万余人。“但是，就是这样，政府继续从他们身上尽可能地榨取最后一点税收……各县政府要求农民交纳的粮食比农民田里实际生产的粮食还要多，而且毫无宽容可言。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农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种子交给税收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动路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交纳军马饲料，这些饲料比起塞进自己肚子里的东西，其营养价值要高得多”[②]。当时巡察河南灾区的一个美国人写下来的这段话，如

① 《河南文史资料》第13辑，第27页，1985。
② 西奥多·怀特：《风暴遍中国》中译本，第18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5。



实地反映出国民党政府制造的人祸是如何加剧灾荒的。据估计，全省在1943年饿死和外逃的均在300万人左右。

河南的奇灾惊动全国，尤其是本省各界人士对此更倍加关注。1942年8月，省灾情调查委员会推出专人赶赴重庆，向国民政府陈报灾情。9月，河南旅渝同乡救灾委员会成立，商讨家乡救灾办法，省民政厅也连电中央请筹拨专款，以赈豫灾。全国许多省市的报刊，也连续发表通讯，报道河南灾区的各种惨象，呼吁政府速加恤济。国民政府总算拨款500万元，发河南赈灾，按当时灾区粮价，只能买粮8.5万公斤上下，即使全部发到灾民手中，每人也只能摊得几两，"实际上没有分到农民手里……大部分赈款都是他们（发放赈款人员）所得"①。以后虽续拨稍多，到1943年有800万元，但"政府官员把这笔钱存入银行，让它生利息"②。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照样征实、征购，逼勒农民交出救命的粮食。国民党中央社从鲁山（当时河南省政府迁驻处）发出电讯称"豫省三十一年度（1942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还援引省田粮管理处处长的谈话，说"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③。难怪重庆《大公报》在配发的《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中说："这'罄其所有'四字，实出诸血泪之笔。"为此触怒国民党当局，被罚停刊3天。这一切，都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大大地加剧了灾害的肆虐程度。如果说抗战8年中，河南人民身受的苦难最重，损失最大，那大概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

① 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中译本，第16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② 西奥多·怀特：《风暴遍中国》中译本，第18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5。

③ 天津《大公报》，1943年2月2日。

第五节　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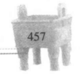
一、豫中、豫西南会战

（一）豫中会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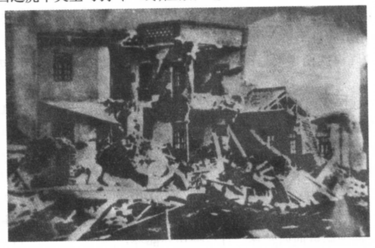
1943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连连惨败，其侵入南洋和东南亚的日军陷入失去海上与本土联系的困境。为挽救危局，1944年年初日军决定在中国战场上打通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连接从朝鲜釜山到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定名为“一号作战”即豫湘桂作战。因战役的第一阶段在郑州至信阳间展开，所以称为“豫中会战”。

1944年春，日军将平汉铁路新乡小冀至黄河北岸段修复，抢修了黄河铁桥，重建、加强了1941年郑州战役时占据的邙山头据点，并开始向豫北集结兵力。到4月中旬，日军已在黄河北岸博爱至新乡地区，新黄河以东开封附近及晋南垣曲地区，集结兵力约14.8万人（进攻洛阳时加入的第六十三师团及由东北调往华中途中参加豫中作战的第二十七师团两部兵力未计在内）。日华北方面军拟由豫北、豫东之敌发动进攻后，垣曲之敌相机出兵豫西，切断中国军队西退之路，以围歼一战区主力。

当时驻守河南的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直辖4个集团军计9个军，副长官汤恩伯辖4个集团军计9个军，另有挺进军、骑兵师等，总兵力约50万人。一战区在新、老黄河防线、平汉路沿线及登封、临汝等纵深地区均配置有强大兵力，修有千里深沟等防御工事。为因应日军的大规模进攻，计划以广武、汜水以东河防守备部队，先阻止日军渡河，若不成，则凭借荥阳、郑州、新郑、洧川（今属尉氏）、长葛、许昌一带据点工事，消耗疲惫日军，同时于登封、密县以北山地，构成自密县至汜水之间守势地带；另于临汝、密县、禹县、叶县等纵深地区，构成攻势地带，并以两个军固守许昌、郾城、遂平、舞阳，以3个军秘密集结于攻势地区，统归副长官汤恩伯指挥与日军决战。



4月18日凌晨3时，豫东日军第三十七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七旅团由中牟南北地区分3路强渡新黄河，突破守军阵地。与此相呼应，4月19日晨，豫北日军第六十二、第一一〇师团及独立步兵第九旅团在飞机的掩护下，也向黄河南岸中国守军发起攻击。当晚通过黄河铁桥，与中牟西犯之敌对郑州形成包围。守军奉命撤退，20日郑州陷落。到24日，新郑、荥阳、密县等县相继失陷。一战区以第四集团军扼守荥阳、密县以西之虎牢关至马驹岭一线，阻敌西进。



郑州遭受日军飞机轰炸后之惨状

汤恩伯为扭转战局，以第三十一集团军主力3个军及第二十八集团军之第八十五军，26日起自荥阳至密县一线实施反攻，曾逼近密县城郊，迫敌改取守势。激战至30日，由东北调往华中之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及坦克第三师团、骑兵第四旅团等，已由郑州、密县向禹县、许昌等地猛攻，汤恩伯惧敌西逃，各部联络中断，遂使反攻失败。日军步兵、骑兵、坦克、飞机协同猛攻许昌。一战区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率部救援许昌失败，许昌遂于5月1日失陷。时华中集结信阳之敌为策应豫中作战分路北犯，4日晨侵入确山县城。南犯之敌连陷临颍、郾城、西平、遂平，9日，确山、遂平之敌南北对进，傍晚会合于驻马店，平汉线被打通。

日军占领郑州后，另调大军西进，占领许昌之敌也集中主力向洛阳进攻。数路日军击破守军，向洛阳实施包围，先头部队于5月5日窜至洛阳南龙门街。一战区急令刘勘兵团进至龙门，构筑阵地；令汤集团第十三军、第八十五军任南翼攻势兵团，由临汝尾追夹击；令第四集团军附暂编第九军任北翼攻势兵团，期于龙门附近歼灭日军。旋因南翼兵团5月8日在临汝陷入日军包围遭受重大损失而全线崩溃；北翼攻势兵团亦因在偃师被日军击溃而无法向龙门集中；刘勘兵团虽屡挫敌锋，给敌以严重杀伤，但在日军强大攻势下，龙门防线终被突破。5月9日，晋南垣曲日军第六十九师团等又强渡黄河，攻陷渑池，切断了中国军队由陇海线西撤的退路，与偃师、龙门日军对洛阳形成三面包围之势。

一战区遂调整部署，除仍令第十五军及第三十六集团军之九十四师固守洛阳外，令第四集团军和刘勘兵团分别撤至韩城（属宜阳）、宜阳地区，准备侧击由渑池分向洛宁、洛阳进攻之日军。13日，偃师、龙门各路日军会合于磁涧（新安县东）地区，向集结于洛阳外围的中国部队攻击。两日内双方搏战17次，守军伤亡惨重，敌亦付出3 000余人及40余辆坦克的代价。在不利的形势下，一战区第三十六集团军等部先后经渑池附近向西转移。日军分兵一部，沿陇海路及洛（阳）卢（氏）大道尾追。一战区40万大军狼狈狂奔，辎重全抛，弹药遗弃遍地，只要有人喊一声“缴枪”，便会有整连整营的溃兵跪下缴械。汤恩伯在溃逃时“与部队完全失却联络”①，其嫡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直属队溃逃途中被地方团队包围缴械。整个西撤成为无序溃逃，未能组织一次有效的抵抗。21日，一战区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陕县秦家坡与敌作战时牺牲。

一战区主力西退，固守洛阳的部队陷入苦战之中。23日，城郊阵地工事全部毁于炮火，防军转守城垣。24日，日军在劝降遭到拒绝后，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11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以27架飞机、百余门大炮的火力,同时向城内轰击,继以坦克、步兵向城内猛攻。洛阳环城工事在敌军炮火下被摧毁无遗,兵员、武器亦大部同归于尽。傍晚敌军冲人城内,双方展开巷战,守军弹尽援绝,伤亡万余人,军部遂令各部分路突围,25日洛阳陷落,豫中会战结束。

豫中会战是日军侵华期间在河南发动的规模最大的战役。会战中,中国守军毙伤敌数千人,以轻装步兵武器击毁日军坦克10余辆;中美空军击落和炸毁日军飞机160余架,击毁日军汽车、坦克约70辆;亦付出战死3.75万人,被俘1.5万人的惨重代价,但也未能破坏日军的战略目标,38天时间连失郑州、许昌、洛阳等37座城镇,损失88家工厂,5万平方公里土地、1 000多万人口沦入日军铁蹄之下。

豫中会战中国军队大溃退的经验教训发人深思。

中国军事当局对日军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对其不利的形势下仍作孤注一掷的冒险进攻估计不足,作战准备欠周,友邻战区部队策应不够;尤其一战区高级将领与日伪勾结投机走私,"大小军官腰缠累累"[①],战前毫无思想准备,数十万官兵少有斗志,这是造成中原溃败的根本原因。积极反共,制造摩擦,削弱了部队的抗敌意志,是导致大溃败的重要原因。汤恩伯自驻防中原后,一面限制人民武装的发展,一面极力扩大自己的军事集团,并与戴笠相勾结,发展特务组织,收编地方游杂部队,用以颠覆抗日政权。汤恩伯在战败后对胡宗南表白说:"我在四省边区苦心经营,主要目的是对付共产党,可惜日寇打碎我的计划。"[②]作为数十万军队的统帅,所想的不是率部共御外侮,而是同室操戈,全力反共,自然无望指挥部队挫败日军的进攻。加以多年对民众敲骨吸髓的剥削压榨,激化了汤恩伯集团同河南人民的矛盾,失去了人民对部队的支援,在日军进攻时变成了聋子、瞎子,战败时到处受到地方团队的截击,加速了全军的崩溃。战略战术上,判断、指挥失误,兵力部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11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②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212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

署失当，是造成豫中会战大溃败的直接原因。蒋鼎文、汤恩伯战前对日军的进攻疏于防范，战争爆发后对敌之作战目的判断失误，未能利用有利地形及天然障碍并构筑人工障碍，以顽强之抗击有效阻滞日军坦克部队的突进，同时以强大兵力攻击日军侧后，切断其交通补给，以钳制其进攻行动，而是让各军一窝蜂似的西进，导致会战失败。

（二）豫西南、鄂北会战

1945 年年初，中美空军联队第三大队的飞机以豫西南鄂西北交界处的老河口机场为基地，不断对平汉线等日军控制的重要交通线及其军事设施进行轰炸，使之遭受重大损失，大大影响了日军的后勤供应与后方的安全。桐柏山、伏牛山区集结的中国第五、第一战区的部队，对日军占领区也有所威胁。已处穷途末路的日军为了消除这些威胁，决定由华北方面军第十二集团军进行豫西南、鄂北会战。3 月 21 日，日军第一一〇、第一一五师团，坦克第三师团、骑兵第四旅团等部，分别由鲁山、叶县等地，向南阳方向攻击前进。24 日，守军放弃李青店至象河关之线，退守南阳。25 日，日军以一部进攻南阳，主力继续西犯。27 日，日军骑兵第四旅团占领老河口机场，30 日第一一五师团主力到达老河口，两部向守军轮番强攻，以伤亡 2 000 余人的代价，4 月 8 日占领老河口。

日军占领南召、镇平、淅川、南阳等地后，继续西犯，西峡口中国守军在重阳店（今属西峡）占据有利地势并设下埋伏。迂回进攻重阳店之日军第一一〇师团 5 000 余人，进至重阳店以西隘道，遭到第三十一集团军新编第四十三师顽强阻击，日军损失严重，攻势受挫。4 月下旬，中国军队先后收复重阳店至西峡口之间多处重要据点，对西峡口、奎文关之敌形成包围之势。日军急忙抽调兵力，援救被围之敌，但在鹰爪山、铁池墁、丁河店等地遭到中国守军的猛烈阻击，日军损失严重，无法前进，多处陷入被包围的局面，只好先后突围、收缩，5 月 20 日后转入防御状态。

在豫西方面，日军第一一〇师团攻占南召后，以 400 余人向西北突进，攻占洛宁长水镇。守军奋勇迎击，战至 4 月 9 日，终将日军击退，收



复长水镇，与敌对峙于附近地区。驻陕县之敌企图与长水镇之敌协同西进，将一战区部队压缩到陕西境内，乃抽调 5 000 人，从 5 月 16 日起，分别对灵宝、卢氏交界处的寺河街、官道口一带发起攻击。守军在中美空军协助下合力夹击，双方伤亡均极严重。在石大山战斗中，中国军队仅第一七七师即伤亡官兵千余人，被困日军亦伤亡 2 000 余人，联队长佐藤负伤，两个大队长阵亡。各路日军拼死突围撤退，至 29 日恢复原态势。

此次会战，日军虽达成进占豫西南宛属各县并控制老河口空军基地之目标，但也遭到相当的打击，共计伤亡 1.5 万余人。

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一）局部反攻

日军发动"一号作战"虽取得不小成果，但实际上不过是困兽之斗，因为 1943 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苏德战场上德军已失去优势并呈必败的趋势；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攻势作战，使日军伤亡惨重，失去主动地位；美、英联军在北非大败德、意侵略军，并夺取了地中海的制海权；意大利向英、美投降，德、意、日法西斯联盟瓦解；就是在中国战场上，日军发动的"治安强化运动"以及"扫荡"、"清乡"也均遭到彻底失败。在这样的形势下，1943 年夏秋八路军主动发动的卫南、林南战役和八公桥战役，意味着中共领导的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开始摆脱严重的困难局面，进入恢复和再度发展阶段。

卫南、林南战役。1943 年 7 月 10 日，原部署于新乡至安阳间平汉铁路两侧的伪第二十四集团军庞炳勋部 2 万余人，在日军配合下，向平汉路西伸展，占据了林县县城及其周围地区；同时伪军一部 8 000 人，向平汉路东伸展，有继续东犯之势。为粉碎日伪军的扩张企图，在八路军总部统一作战意图下，冀鲁豫军区于 7 月 30 日发起卫（河）南战役。首先在官桥营一带歼灭伪暂编第六军杜淑部 1 000 余人，进而夜袭驻焦虎集（属滑县）之伪暂编第六军第八师师部，将其全歼。8 月 2 日，乘胜又突袭瓦岗集（属滑县），全歼伪独立第一旅 1 600 余人。19 日，八路军奔袭驻袁庄和大范庄之伪军，均获大胜，残敌狼狈逃回卫河以西。

此役共歼灭伪军5 600余人，收复和开辟了卫河以南地区。

8月18日开始，由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发起林（县）南战役，首战克林县，进而又克马圈、西坛、南北陵阳和辉县西平罗，进击临淇镇。27日战役结束，共歼灭日伪军7 000余人，收复据点80余处，解放了林县以南、辉县以北拥有40余万人口的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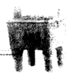
八公桥战役。伪第二方面军孙良诚部在日军秋季大“扫荡”末期，侵入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进占濮阳，控制东明、长垣一线，孙良诚及其总部驻濮阳东南八公桥。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决定集中兵力，采用“牛刀子钻心”战术，奇袭八公桥，使伪军受到震慑而撤出我中心区。日伪军结束秋季大“扫荡”的次日，即11月14日，八路军围攻位于八公桥西南之两门镇。16日夜，担任主攻的八路军3个主力团奔袭八公桥，战至17日上午，伪军全部就歼。随后，八路军迅速转移兵力向外扩张战果，拔除伪据点17个。此次战役全歼伪第二方面军总部直属队，毙伤俘伪军官兵3 200余人。冀鲁豫军区各部队及地方武装乘势展开反“蚕食”作战，拔除日伪军大小据点百余个，歼敌数千人。

进入1944年，太行区、太岳区和冀鲁豫区的局部反攻进一步开展。

太行区。1944年年初，八路军太行军区部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向林县日伪军发起进攻，先后攻克潘庄、南阳、甘庄等据点，逼走了临淇镇等据点日伪军。4月初，收复林县县城，攻克横水、马店等据点8处，碉堡30余座，俘敌200余人。

太岳区。1944年6月至8月，八路军太岳军区部队在豫北济源和山西垣曲地区发动了济垣战役，先后攻克济源县属之大社、克井等日伪据点28处，争取马明山等部1 300多名伪军反正，完全控制了济（源）垣（曲）公路两则及黄河北岸地区。

冀鲁豫区。南乐、清丰等县地方武装1944年年初即不断向日伪军出击。3月30日，八路军攻克滑县沙店，伪军1个团大部被歼，伪保安团1个大队反正。5月6日，八路军一举收复内黄县城，内黄、南乐、清丰等地日伪据点大部分被摧毁，毙伤伪军千余人。10日，清丰伪军自卫团弃城逃遁，八路军随即收复该城。5月23日，伪冀南道尹薛兴甫



率13个伪县长，2 000多名伪警备队，在日军1个中队掩护下再占清丰。29日晚，八路军1个团在清丰、南乐等县大队和民兵配合下，奔袭清丰县城，一举将敌打垮，俘薛兴甫及伪县长、伪警察所长40余人，日军联络员7人及伪军1 300余人，缴枪1 500余枝，再次解放清丰县城，从而使沙区和濮县、范县中心区连成一片。

林南、卫南、八公桥战役，都是八路军主动发起的较大规模的进攻作战，战役进行中八路军始终占据主动，打击了日伪军的"蚕食"企图，实现了战役的预定目的。这些战役同1944年各抗日根据地的攻势作战，显示出敌后的形势已出现转机，日伪军走向颓势，抗日军民力量发展壮大，解放区战场正逐渐由战略相持阶段向战略反攻阶段过渡。

（二）发展河南，绾毂中原

在各解放区战场逐渐转向战略反攻的形势下，密切注意河南局势的中共中央适时作出发展河南的战略决策。1944年4月22日，即豫中会战刚刚爆发之时，毛泽东就指示滕代远、邓小平等，要切实侦察水东形势，并乘敌军南犯后方空虚之机开展豫北地方工作，作为将来开辟豫西工作的基地。5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向北方局、华中局、冀鲁豫分局及太行、太岳、淮北、豫鄂边区党委发出指示，指出敌人已大举向河南进攻，河南大部地区已成敌后，地方党员在目前情况下应该起来领导河南人民抗战，组织抗日游击队及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保卫家乡。指示要求各地派出干部深入敌后，组织与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7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向河南敌后进军的部署和政策指示，决定以太行、太岳八路军开辟豫西；以冀鲁豫水东八路军加强睢杞太区以作策应，以新四军第五师抽调7个连沿平汉路北上向豫中发展；以新四军第四师抽调5个团恢复豫皖苏，相机控制新黄河以东地区。随后，八路军、新四军抽调精干武装，从北、东、南三面进入河南，在敌伪顽联合向我进攻的错综复杂的环境里，高揭抗日救国的大旗，迅速开拓出根据地大发展的新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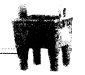
1. 开辟豫西。1944年7月，太行军区遵照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决定，抽调两个团组成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即第一支队），共1 700余

人，支队司令员和政委分别由皮定均、徐子荣担任，9 月 21 日飞渡黄河，进入豫西地区。先后在登封、巩县等地连战获胜，后即分兵 4 路，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支队与豫西人民订立《约法五章》：扫除敌伪，收复国土；取缔一切汉奸特务组织；团结一切抗日友军，组织人民武装；彻底实行民主；废除一切苛政，减租减息，发展生产[①]。先遣支队得到豫西人民的真诚拥护，迅速打开了嵩山、箕山地区的抗日局面。日军多次出动日伪军进行“扫荡”，均被先遣支队粉碎。到 1945 年年初，先遣支队与日伪军作战 130 多次，毙伤俘日伪军 1 500 多人，解放国土 5 000 多平方公里，建立了嵩山、箕山两个专署和偃师、伊川、巩县、登封等 8 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和两个县级办事处。为了加强豫西八路军的力量，太岳军区又抽调两个团组成豫西抗日游击第二支队，在刘聚奎率领下，11 月 14 日由济源邵原镇南下渡过黄河，到年底，在新安、渑池、洛宁一带开辟了 1 000 多平方公里的抗日根据地。1945 年 1 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第二支队与由延安来的一支部队合编，韩钧任第二支队司令员，刘聚奎任政委。

1944 年 10 月，中共中央为统一对河南新区各项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河南区党委、河南军区和河南人民抗日军，戴季英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抗日军政委，王树声任军区兼抗日军司令员。中共中央还决定以驻陕甘宁边区的两个团组成豫西抗日游击第三、第四支队，陈先瑞、张才千分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11 月，王树声、戴季英率领第三、第四支队由陕北南下，挺进豫西，1945 年 1 月踏冰过了黄河，先后与二支队、先遣支队会师。2 月底，河南军区正式成立，辖 4 个支队、4 个军分区（3 月，又组建两个支队、军分区）。

八路军进入豫西后，十分重视“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建设。到 1945 年 8 月，全区建立 6 个专署、28 个县级政府，各专署、县政府设立有公安局、司法科等办事机构。“三三制”政权合理地调节了各抗日阶级内部的关系，得到了人民的普遍拥护，同时又积极发展人民武装，加强部

① 延安《解放日报》，1944 年 12 月 25 日。



队建设。对豫中会战后四处蜂起但又良莠不齐的地方武装，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团结、争取与我合作的抗日武装，孤立、打击反动武装，扩大正规部队，建立由各军分区领导的县大队、独立团等地方武装。经过一年努力，各支队及地方武装发展到2万余人，民兵万余人，其中第一支队（先遣支队改编）由千余人发展为一支7 000余人的雄师劲旅。

在经济上，实行抗战经济政策，顾全农民和各阶层人民利益。各级政府按照中共中央有关抗战时期的经济政策，结合豫西情况，实行合理负担，按地亩以累进方式征收救国公粮和税款，开展减租减息，大力恢复农业生产。抗日政府还根据民众要求，适时提出了“倒地运动”。因为1941年至1943年大灾中许多贫苦农民将土地以极低廉的价格出卖或抵押给地主、富农，农民强烈要求收回自己的土地。根据群众要求，民主政府明确作出了“穷要倒富，富不倒穷，穷富相等，协商处理”的基本原则，并颁布了《土地转移办法》13条，支持农民倒地，让农民用原价从地主手中要回土地。由于法币大幅度贬值，许多农民只需用一只老母鸡的代价就能倒回一亩地。这一切获得了豫西广大群众的拥护，团结了各阶层人民，支持了敌后抗战。

到1945年8月，豫西八路军从敌伪手中解放国土2万多平方公里、300多万人口，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胜利地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的开辟豫西的任务。

2. 扩大水东，开辟水西。1944年6月，中共冀鲁豫分局和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遵照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关于加强水东、开辟水西[1]，扩大豫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抽调300余人，组成南下大队，进军水东。7月1日从兰封、内黄车站之间越过陇海铁路，4日与水东独立团会师，不久合编为新的独立团，余克勤任团长，袁振任政委，共2 200多人。独立团转战于睢杞太、淮太西（华），进出宁（陵）柘（城）商（丘），拔除伪军据点，打击地方反动势力。1945年3月，冀鲁豫军区决定在水东建第

① 水东指新黄河以东睢县、杞县、太康、淮阳等县为中心的地区；水西指新黄河以西郾城、上蔡、西华等县为中心的地区。

十二军分区，水东独立团改为军区第三十团。水东地委、专署分别改称冀鲁豫第十二地委、专署。专署下辖芝圃县等7个县级民主政府。

1945年1月，冀鲁豫军区又调第八团开赴水东，协同水东部队向水西发展。5月12日夜，全团渡过新黄河，神速插入西华、上蔡、商水地区，于商水县贾寨、上蔡县五沟营等地连歼伪顽，又经逍遥镇等地大小40余次战斗，彻底粉碎了日伪顽军的夹攻，部队发展到4个营，初步打开了水西地区的局面。

6月20日，冀鲁豫军区成立豫东指挥部，王秉璋任司令员，段君毅任政委。调军区两个团分别加强水东、水西。到7月底，收复国土3 000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00多万。不久，中共水西地委、水西军分区建立，下辖扶沟、郾（城）上（蔡）西（华）等抗日民主县政府。新黄河以西尉氏、鄢陵、西华、商水、临颍、郾城、上蔡等地均为水西部队所控制。



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



3. 恢复豫皖苏。1944 年 8 月 5 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以新四军第四师 5 个团执行西进任务，恢复四师原开辟和创建的豫皖苏区；以第二、第七师策应第四师主力西进。8 月 15 日，第四师师长彭雪枫率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二十五团和师属骑兵团及萧（县）铜（山）独立团一个营，从泗洪县东南之半城集出发西进。国民党顽军极力阻止新四军西进，第四师于萧县小朱庄毙伤俘苏北顽军 1 500 余人，接着又粉碎了日伪军 2 000 余人的“扫荡”，并对日伪军展开攻势，连克据点多处，迅速恢复了萧县、永城、宿县之间地区。国民党顽军 3 个军和苏北挺进军在涡河南北阻止新四军第四师西进。新四军军部调第七、第九旅主力及第一师一部，配合第四师西进部队，开展反顽斗争。9 月 11 日，第四师西进部队围攻夏邑城东八里庄顽军李光明部，该部营长黄遵德率 4 个连 500 余人投诚，余部溃散突围，被毙伤 100 余人，顽军支队司令李光明以下 570 余人被俘。但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在指挥作战时不幸中弹牺牲。13 日，中央军委任命张爱萍为第四师师长，韦国清为副师长。

10 月中旬，顽军又集中 3 个师、6 个挺进纵队，向萧、永地区进攻。南线顽军主力由涡阳、蒙城北犯，西线顽军乘机由永城东犯，袭击新四军西进部队侧后。第四师西进部队在第三师第七旅及八路军冀鲁豫军区 3 个团的协助下，21 日进行全线反击，将进犯顽军赶回涡阳县城。至 25 日反顽战役结束，共歼灭顽军 3 600 余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顽军把新四军第四师西进部队赶回津浦路东的企图。11 月，西进部队又开辟了商（丘）永（城）亳（县）地区，基本上恢复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11 月 12 日，中共淮北第二地委、淮北区第二专署和第二军分区成立，专署下辖永城、夏邑等 8 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了 8 个县总队和 3 个独立团，抗日武装发展到 1 万多人。

4. 发展豫南。1944 年 7 月，中共鄂豫边区党委和新四军第五师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发展河南的指示，抽调 1 200 余人，组成豫南游击兵团，以第十三旅副旅长黄林为兵团指挥部指挥长，向河南敌后进军。同时成立中共豫南工作委员会，开展淮北地区地方党的工作。

8月29日夜，黄林率豫南游击兵团主力北渡淮河，奔袭正阳县胡冲店，全歼正围攻兵团先遣队的该县保安团（5个中队），俘团长以下600余人。参与围攻的国民党豫南挺进军等部只好向后退避，正阳县常备队等地方武装千余人则投奔了新四军，接受改编。

9月23日，黄林率兵团主力越过平汉路进至确山西北之沙河店、大乐山、板桥一带活动。10月下旬，游击兵团消灭、收编了确山等地部分土顽及游杂武装，初步开辟了以确山孤山冲为中心的路西抗日根据地。11月上旬黄林率游击兵团一部向豫中挺进，中旬进至鲁山、叶县交界处的罗冲，同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会合，展开创建根据地的斗争。

11月，中共鄂豫边党委决定将豫南工委扩大为河南工委，豫南游击兵团改称为河南挺进兵团，黄林任兵团司令员，任质斌任工委书记兼兵团政委。工委和兵团指挥部不断向日伪军发动进攻，1945年2月8日，攻克遂平西北母猪峡，继之又粉碎了驻漯河、驻马店、舞阳等据点2 000多名日伪军的合围，毙伤日伪军数百人。3月，第五师为进一步发展河南，决定以挺进豫中的部队和地方武装组成豫中游击兵团，黄林任司令员。到4月中旬，豫中游击兵团先后攻克了确山任店、西平合水镇等日伪据点，开辟了以嵖岈山为中心的豫中抗日根据地。7月底，黄林率领的豫中兵团与陈先瑞率领的河南军区第三支队在嵖岈山会师。8月上旬，两支部队合编成立河南军区豫中（即第三）军分区和专署，专署下辖遂平、西平、舞阳等6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

发展河南，是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进行的。八路军、新四军相互策应，密切配合，胜利地开辟了豫西，扩大了豫东，恢复了豫皖苏，发展了豫南，扩大了华中与华北的联系，基本上达到了“绾毂中原”的战略目的。

三、敌后战场的大反攻和日军投降

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了题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重要演说，提出全国惟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明确指出解放区军民的首要任务是“消灭敌伪，扩大



解放区，缩小沦陷区"[1]。太行、太岳、冀鲁豫等解放区据此制定了1945年扩大解放区的具体方针和计划，对日伪军发起大规模的攻势作战。

中共太行区党委和太行军区，遵照毛泽东关于1945年的任务的指示，确定本区年度作战重点为豫北及平汉路沿线，变敌占区为游击根据地或根据地；沿平汉线则不断组织出击，迫敌收缩到距平汉线10公里左右的狭窄地区内。

按照这一作战计划，1945年1月，太行军区先后抽调6个团又3个独立营的兵力，发起道清战役，向道清路以南、平汉路以西、沁阳以东日伪军展开攻击，连克武阁寨等日伪据点16处，并于樊庄设伏，全歼了由焦作南犯的日军1个中队。2月下旬至3月上旬，八路军又连续出击，先后攻克陆村、百泉等据点，并一度攻入辉县城关，歼灭日伪军千余人。3月22日夜，第七军分区主力东越平汉路挺进原武、阳武，10天内两度袭入原武县城，歼灭日伪军600余人。第八军分区主力则同时向温县、孟县地区进军，并一度攻入温县县城。至4月1日，战役结束，共歼灭日伪军2 500余人，收复国土2 000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75万。

道清战役结束后，八路军太行军区下达夏季攻势作战方案，决定发起安阳战役，以求消灭安阳及周围地区的日伪军（约7 000人），摧毁其对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封锁线。为此，军区集中9个团，组成3个支队，在3万多民兵、自卫队的配合下，6月30日发起安阳战役，先后在曲沟、水冶、北流寺、鹤壁集等处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拔除一批日伪据点。7月9日，安阳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毙伤日伪军3 300余人，收复国土1 500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5万。

太岳军区为控制黄河北岸，打通与豫西解放区的联系，于4月份发起了第二次豫北战役，济源、沁阳、孟县、温县一批日伪据点被拔除。4月30日战役结束，共计收复国土近2 000平方公里，解放人口80万，村庄1 500余处，建立了沁阳、济源、孟县抗日民主政府。

---

①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41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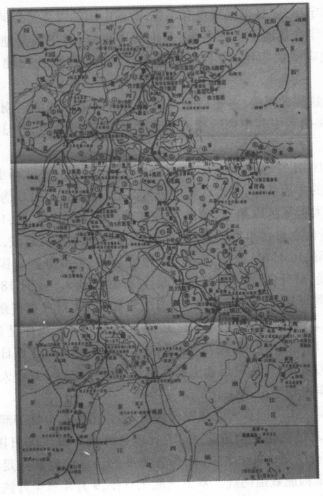
在冀鲁豫区，冀鲁豫八路军为消灭突出于根据地之内的南乐县城及其周围据点之日伪军，以巩固卫河以东地区，开辟卫河以西地区，4月24日至27日，军区统一指挥第八、第九、第七、第三军分区各一部，发起南乐战役。南乐县城及其周围据点五花营、元村镇、南京店、海子等被全部拔除，安阳、大名出援之敌亦被击退。此役共消灭日伪军3 400余人，解放了卫河以东广大地区。

在豫西南，日军发动豫西南、鄂西北会战后，南阳所属各县相继沦陷。中共鄂豫边区党委决定进军桐柏山区，相机控制豫西南、鄂西北地区。4月初，新四军第五师一部在新四军信桐支队、桐柏总队配合下，向盘踞在信阳西北申阳台的信阳县顽军猛攻，俘顽县长以下500余人，接着乘胜南下四望山，四望山顽军望风而逃。到5月中旬，信阳、桐柏、应山、随县抗日根据地联成了一片，策应了豫中兵团的斗争。

豫北、豫南八路军、新四军1945年春、夏发动的攻势作战，歼灭日伪军2万余人，解放国土近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近300万，人民武装力量进一步壮大，敌人则被压缩到大中城市周围和主要交通线，其占领区更加缩小，对敌占点、线的包围越来越紧，为迎接全国大规模的反攻创造了条件。

这一全国规模的大反攻于8月间迅速到来。1945年5月，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苏、美、英盟军在欧洲取得彻底胜利。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政府立即无条件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颗原子弹。8月9日，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遭到沉重打击。

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于8月9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10日、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7道命令，令各解放区部队向本区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城镇展开进攻，迫使日伪军无条件投降。12日，中共中央指示各中央局、分局及区党委，确定力争攻占道清路、郑州以北之平汉路和以东之陇海路等铁路和沿线大小城市；对郑州以西之陇海路、以南之平汉路等，不作占领计划，而置重点于占领广大乡村。



八路军、新四军全面反攻时形势图

但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却在8月10日、11日发布3道命令，令第十八集团军所属部队原地驻防待命，不许擅自移动；令各地伪军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令各战区以主力挺进勿稍松懈。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蒋介石即电告日本中国派遣军总

司令冈村宁次，要日军保持现有态势，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冈村宁次遂通令所属各部，只向蒋军投降，对中国其他方面的要求，“不仅应坚决拒绝，而且应根据情况，毫不踌躇地行使自己的武力”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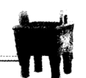
面对这样的形势，多年以来一直处于抗日最前线的河南各解放区军民，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毛泽东、朱德的命令，向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

8月10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区划了各军区的作战任务，各军区随即进行部署，集中兵力向日伪军发起猛烈进攻。太行军区以第七、第八军分区部队组成道清支队，14日起向新乡、博爱间之日伪军发动进攻，分别包围了博爱、温县县城，城内日伪军拒不投降，16日夜，道清支队攻入博爱县城，将敌分割包围，展开巷战，18日晨，全歼守敌。31日收复温县，歼敌千余人。8月18日，道清支队一部向辉县之敌发起进攻，19日收复辉县，24日攻克获嘉，切断了道清铁路，29日收复武陟，焦作之敌陷入包围之中。焦作是日军重点防守城镇，以炮楼、电网、壕沟、城墙构成4道防线。9月8日，道清支队集中主力猛攻，日伪军迅速土崩瓦解。此役歼敌近3 000人，生俘伪兴亚巡抚军司令以下700余人。

太岳军区主力向晋南之敌发动进攻，另以第四军分区等部向济源、沁阳、孟县之敌伪据点推进，8月27日攻克济源县城。28日围攻孟县县城，该城有伪军4 000余人，配备有优良的轻重武器和充足的弹药，40多座碉堡构成数道防线。双方激战7昼夜，9月4日全歼该敌，解放了孟县县城。10月8日夜，太行、太岳两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包围了新乡以西最后1个伪军据点——沁阳。沁阳、济源、孟县、温县等地残余伪军3 000余人，麇集在此，凭借外围据点、工事、护城河及城墙顽抗。八路军围城1个月，11月8日发起总攻，经一天激战，全歼该敌，收复沁阳县城。

---

① 《冈村宁次回忆录》中文本，第15页，中华书局，1981年。



冀鲁豫军区按照中共中央大反攻的指示精神，组成南、北、中三路反攻大军，向盘踞在边区的日伪军发动全面进攻。由13个团组成的中路军，在军区司令员宋任穷亲自指挥下，横扫延津、阳武、封丘之敌，到21日，已歼灭日伪军近5 000人。9月又相继攻克长垣、道口、浚县、滑县等城镇，歼敌近万人。南路军先后攻克通许、杞县、民权、太康，使水东根据地连成了一片。以冀南军区主力及地方武装组成的北路军，向平汉铁路安阳至邯郸段以东之敌进攻，收复冀鲁边十数个县城，并逼近平汉铁路。

豫皖苏区部队按照中央指示，对淮北日伪军发起反攻，相继拔除了一批据点。8月25日，新四军第四师第十一旅及萧县独立旅等，向永城县城伪军发起进攻，于29日收复县城。大反攻中，该区部队共计作战68次，攻克大小据点28座，毙伤日伪军2 134名，生俘伪军3 247名。

新四军第五师第四军分区配合确山支队，攻克确山竹沟、杨楼等据点，第六军分区部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收复信（阳）应（山）公路沿线杨柳河等据点。豫中军分区部队与地方武装，向舞阳、西平、遂平、郾城等地日伪据点发动全面进攻，也取得不小战果。

河南军区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相机占领平汉、陇海铁路，迅速与鄂豫边区及水东区打通联系的指示，抽调主力组成陇海、平汉支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分别向铁路沿线之日伪军进攻。8月18日，攻占密县县城，22日夺取登封县城，尔后，又攻克巩县回郭镇、登封大金店、密县大隗镇等数十个据点，并一度攻入汜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和日本帝国大本营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侵华日军128万人向中国投降。至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但是，蒋介石与美国勾结在一起，抢夺胜利果实，就在日本宣布投降之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通令，指定惟有蒋介石政府才享有中国受降权。同日，蒋介石电令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中国战区所属日军应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不得向

任何非暂定受降部队投降缴械、交出地区及物资；绝对不能将行政机关移交非指定之行政或代表等。何应钦下令在中国战区之日军立即就现在驻地及指定地点，静待命令，凡非蒋介石或其本人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军不得向其投降缴械，不得向其接洽交出地区和交出任何物资。这就剥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接受日军投降的权利而独自垄断受降权。

9月9日，蒋介石把中国战区划分为16个受降区，并任命了受降长官。其中第一战区受降主官为胡宗南，日军投降部队及集中地点为：第一一〇师团集中洛阳，第六独立警备队及第二十二师团大部集结新乡，第十二军第十独立警备队集中郑州，日军投降代表为第十二集团军司令官鹰森孝，办理投降地点在洛阳。第五战区受降主官为刘峙，日军投降部队及集中地点为：第一一五师团、第十四独立警备队集中郾城，独立混成第九十二旅团、第十三独立警备队集中许昌，第四独立警备队集中商丘，日军投降代表为鹰森孝，办理投降地点在郾城。大批国民党军由陕西等大后方源源开进河南，抢占洛阳、许昌、郑州、开封、新乡、安阳等大中城市，接受日军投降。9月19日，第六战区第五十九军刘振三部在信阳接收日军武装。20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等在漯河接受日军投降。22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等，在郑州接受日军投降。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斗争中规模空前并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河南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作出了重大贡献，光为八路军、新四军输送子弟兵就达10余万人，其中2万余人为国捐躯。还与邻省抗日军民一道建立了太行、太岳、冀鲁豫、豫皖苏、豫鄂边、河南（豫西）等抗日根据地，抗击入侵中原地区日军的大部和伪军的全部，对日伪军作战1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及争取伪军反正10余万人，攻克县城40余座，收复国土10多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2 000余万，建立了18个专署、90余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其业绩将永垂史册。

第四十三章
解放战争与国民党政权的覆亡

第一节 解放区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一、国民党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挑动内战

1945年9月22日,第一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郑州长春路(今二七路)圣公会楼上举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及范汉杰、高树勋等代表中国政府受降。河南省政府、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三青团河南支团等机关派代表出席仪式。第一战区日本投降代表、第十二集团军司令官鹰森孝由宪兵引导正步走人会场,面向受降官胡宗南脱帽鞠躬,呈上降表后,又双手奉献军刀一柄,表示缴械投降,然后再次鞠躬,向后转身,正步走出会场[1]。受降仪式结束。

(一)国民党的"接收"

日本宣布投降时,国民党军队远处大后方,河南也仅在豫陕边区灵宝、卢氏一带有少量军队,豫中、豫东、豫北广大地区并无一兵一卒。蒋介石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除电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待命外,命令国民党各战区主力向指定目标迅速开进,垄断受降权,从八路军、新四军手中抢夺地盘,河南是重要目标之一。为此,8月13日,国民政府军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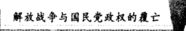
① 《团结报》,1985年9月7日。

委员会就作出军事部署：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率领一部由西安向洛阳推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率部由南阳向郑州、开封、新乡推进；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率部由西安经豫北向保定、石家庄、北平推进，其副司令长官李延年率部经豫东向青岛、济南、德州推进。国民党为统一指挥进入河南的部队，12 月 20 日，郑州绥靖公署设立，刘峙为主任，胡宗南、刘汝明（1946 年 4 月任）为副主任，辖第一战区及第四（驻许昌）、第五（驻马店，后移开封）绥靖区。

随着国民党的军事推进，避处卢氏朱阳关之省政府及各厅处，8 月 25 日起分途返回开封。军队、政府、国民党争着“接收”逆产，近似抢夺，接收大员无不趁机中饱私囊。原武陟县民族资本成兴纱厂，抗战期间被日军霸占并迁往新乡。战后原厂主到新乡接收，受到多方刁难，几经交涉，被迫向郑州第一兵站总监部报效了 4 亿元（法币，下同），直到 1947 年才将厂子要回。更多的被日伪夺去的民房、资产，接收后大多没有发还原主，而被官府或官员霸占。如省政府主席刘茂恩的妹夫、省合作管理处处长田梦嘉，就利用接收开封日本领事馆、伪市政府、伪省府宣传处之机，私吞汽车、照相机、电影放映机等，价值数十亿元。河南绝大多数县份又重归国民党政府控制。

在抢占胜利果实的同时，国民党又招降纳叛，宽待汉奸，收编伪军。当时，河南和全国各省一样，各阶层民众踊跃检举抗战期间众多认贼作父的汉奸，要求政府予以严惩。开始时，国民党军政当局也曾装模作样，分别查缉军事、政治、司法、经济、文教等部门的汉奸，居然“细大不捐”，好像真要清算他们的卖国罪行的样子，实际上却“全为钱财起见”，为的是借此逼勒巨款（贿赂），汉奸们“财产荡尽，自可无事”，即使罪大恶极者也一样“逍遥法外”[①]。特别是对于枪杆子——抗战期间肆意省境的十几万伪军，国民党更加珍视，积极收编，借以为反共和进攻解放区增添大注赌本。于是，伪第五方面军庞炳勋部、第二方面军孙良诚部、第四方面军张岚峰部、第六方面军孙殿英部，就分别改编为新编

① 井俊起：《雪苑戆叟忆往》，第 207 页，1990。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路军，庞等分任各路军司令，利用其深处解放区腹地和周边的便利条件，成了进攻解放区的先锋。

(二)国民党军向各区进攻

迫于国际和国内要求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的强大压力，蒋介石一面加紧准备内战，一面连电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赴重庆举行和平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亦称《双十协定》)。谈判中，中共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前提下，作出了一些让步，包括撤出分布在广东、浙江、河南(豫北不在内)等8个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军队。然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和平并无诚意，重庆谈判期间，即调动军队向解放区大举进攻。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原人民还没有获得喘息之机，就又被推进遍地硝烟之中。

1. 豫西地区。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以6个师沿陇海线分别进入渑池、新安、洛阳、偃师、巩县、荥阳地区，以3个师进入伊川、登封、嵩县、郏县地区，国民党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之外，还滥杀八路军伤病员、地方干部、抗日军人家属及进步人士，许多无辜群众也被逮捕杀害，豫西人民重陷苦难之中。

2. 豫南地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9月中旬即以7个师和豫鄂边区挺进军4个纵队，分别集结于桐柏、泌阳、舞阳、遂平、西平一线，在第六战区3个军及信阳等县国民党保安团配合下，对中原解放军形成包围并不断进犯，所到之处“极力摧残我解放区的各种民主建设，烧杀抢掠，惨不忍闻”①。

3. 豫东地区。水东地区是共产党领导的晋冀鲁豫解放区和中原野放区联系的惟一通道，国民党对此意在必得。为此，第五战区派5个师，由豫西南进至许昌、新郑地区，3个师由湖北随县、枣阳地区，分道向豫东出击，于10月上旬先后攻占太康、扶沟、通许、杞县。另外，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率领9个师集结于商丘、兰封、项城等地，企图在占领陇海路徐州至开封段后，进而沿津浦路向青岛、济南推进。

---

① 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12月7日。

4. 豫北地区。这里是八路军创建的主要抗日根据地之一，也是国民党军进军平津，控制华北的要道，因此更是大力争夺。8 月中下旬，第一战区以 7 个师北渡黄河，进入晋南，占领运城、安邑，并沿同蒲路北上，经正太路东进，欲占石家庄。另以 5 个师分别进入辉县、安阳等地区"清剿"。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率 4 个师，由豫西向郑州集中后，北渡黄河进占新乡、汲县，企图与胡宗南部会合于石家庄，而后北进平津。

（三）人民军队应付内战的准备

面对着战后中国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及时制定了新的斗争方针，基本精神是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坚决保卫人民的胜利成果，巩固已有的阵地，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在不放松武装自卫的条件下，力争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为了应付国民党军的进攻，中共中央及时作出了实行党的军事战略转变的决策，调整军事体制和编制，组建野战兵团，形成有利于应付全面内战的战略布局。

1. 晋冀鲁豫地区。1945 年 8 月 20 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北方局，成立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以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等 8 人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薄一波为副书记。同时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下辖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 4 个军区，全区军队近 30 万人，民兵约 40 万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赋予该军区的任务是：坚决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阻止或迟滞其沿同蒲路、平汉路北上的行动，协同友邻部队打破国民党军迅速进占平津的企图。

8 月 23 日，国民党第二战区阎锡山部侵入上党地区，企图伺机侵占整个晋东南解放区。北上向华北解放区进攻的第一、第十一战区 6 个军大部也进入黄河以北。为打破国民党军的进攻，晋冀鲁豫军区调集太行、太岳、冀南 3 个军区主力及地方兵团一部，共 3.1 万余人，9 月 10 日至 10 月 12 日，发起了上党战役。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 3.5 万余人，生俘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以下 3.1 万余人。上党战役的胜利使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后方得到进一步巩固，也使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的装备



与兵员得到补充，提高了部队的作战能力。与此同时，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组建野战兵团的决定，将冀鲁豫军区部队改编为第一纵队（后奉调改属晋察冀军区）；冀南纵队、太行纵队、太岳纵队分别改编为第二、第三、第四纵队；11 月 10 日，由太行军区部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分别改编为第六、第七纵队。每纵队辖 3 个旅计 9 个团。晋冀鲁豫军区下属 4 个军区，属于晋冀鲁豫军区建制的还有民主建国军[①]，下辖 2 个军；军区直属第十七师。全军区共有野战军 8 万余人，地方部队 23 万余人。

2. 中原地区。1945 年秋，坚持在嵩山地区的河南军区主力部队 1.6 万余人，受到国民党军 9 个师的围攻，局势日趋严重，在原地难以立足。9 月 10 日、11 日，中共中央两次指示中共河南区党委、河南军区："在情况严重时，第一步向南转移与五师靠拢，以后再相机发展"；"必须放弃北渡意图……团结在坚持中原斗争的任务之下，以克服目前各种困难"[②]。9 月中旬，中共中央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撤出河南（豫北不在内）解放区。遵此，9 月下旬，河南军区部队除一部转入黄河以北外，第一、第四、第五、第六支队 1.2 万余人在军区司令员王树声、政治委员戴季英率领下，撤离豫西，向桐柏地区转移，向新四军第五师靠拢。10 月 13 日，在泌阳东部打垮国民党军的截击后，先头部队进至桐柏山区。同时向第五师靠拢的还有由湘粤边北返的八路军南下支队，原在水西地区活动的冀鲁豫军区第八团。长期坚持在鄂豫边抗日根据地的第五师，因遭到国民党军第五、第六战区部队 20 多个师的包围，处境困难，已根据中共中央转往桐柏山、大别山扩展根据地的指示，师部由平汉路东的大悟山转移至路西的桐柏山地区。10 月 24 日，上述各部队在唐河、桐柏、随县、枣阳 4 县交界处的桐柏山区胜利会师。10 月 30 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共中央中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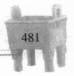
① 1945 年 11 月由邯郸战役起义之国民党新编第八军等部改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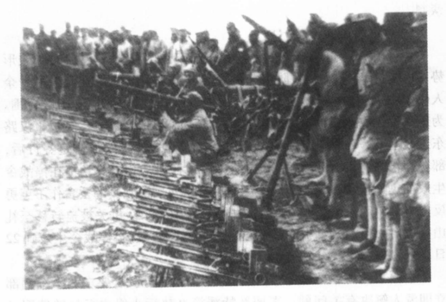
②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5 册，第 269、271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局、中原军区、中原行署在桐柏城郊正式成立，郑位三代理中原局书记，李先念任军区司令员，郑位三任政委。11月，军区对所属部队进行整编，河南军区部队改编为第一纵队，下辖3个旅计9个团；新四军第五师主力与八路军南下支队改编为第二纵队，下辖4个旅计12个团。中原军区下设江汉、鄂东、河南3个军区。全区野战部队与地方武装各近3万人。

解放区实行战略转变，组建野战部队，提高了部队运动作战的能力。撤出孤悬于国民党统治区腹心的豫西等解放区，不仅使河南军区部队避免了被各个击破的危险，而且加强了中原解放区的力量，吸引和牵制了国民党军6个军的兵力，对晋冀鲁豫部队在平汉路北段的作战进行了有效的战略配合。

1945年9月，国民党军事当局为助孙连仲部进占平津，命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率第三十、第四十军、新八军及河北民军等部8万人集结于豫北，准备北犯。10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晋冀鲁豫军区集中主力坚决阻击沿平汉路向华北进犯的国民党军。晋冀鲁豫军区遵照中央指示，集中3个纵队及部分地方部队共6万人，动员10余万人的民兵、自卫队配合作战，发起邯郸战役（亦称平汉战役），在预设地点歼敌。10月14日，国民党军3个军及河北民军分左右两翼兵团，由新乡、汲县向北进犯，沿途不断遭到晋冀鲁豫军区独立支队及地方武装、民兵的打击和袭扰，行动甚为迟缓，于18日到达安阳。24日，该敌全部渡过漳河，采取交相掩护的方法前进，迅即陷入晋冀鲁豫部队的包围之中。26日，马法五急电各方求援。由新乡小冀镇北援之国民党军第三十二军第一四一师和由石家庄南援之国民党军第十六军，分别在漳河以南和邢台以北高邑受阻。30日，国民党军新编第八军和河北民军约万人，在高树勋率领下起义。11月2日战役结束。是役共毙伤国民党军3 000余人，俘其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以下1.7万余人。邯郸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沿平汉路北进的计划，掩护了人民军队在东北的战略展开，同时对保卫豫北解放区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邯郸战役中缴获的国民党军的各种美式武器

二、艰难的谈判与国民党的破坏

国民党军在各地进攻连遭惨败，美国政府也改变对华政策，企图通过“和平”的手段实现国民党领导下的中国“统一”，遂派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赴华“调处”。蒋介石因为需要时间重新部署内战的兵力，于是同意重开谈判。1946 年 1 月 5 日，国共双方就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达成协议，随后各自下达了“停战令”，规定从 13 日午夜起停止各地一切军事冲突。根据协议，由国民政府代表张群、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组成军事三人小组，在北平设立了由三方代表郑介民、叶剑英、罗伯逊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以下简称“军调部”)，以监督停战，调处冲突。军调部先后派出 29 个执行小组、7 个交通小组，其中第九(执行)小组设在汉口，中共代表薛子正；第十(执行)小组设在新乡，中共代表黄镇；第十九(交通)小组设在安阳，中共代表雷任民；第三十二(执行)小组设在光山，中共代表任士舜。由于停战协定签订不久，国民党统治集团就到处挑起冲突，因此引发了一系列艰难的

谈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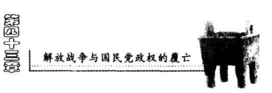
（一）中原谈判

1945年10月成立的中原军区为打破被国民党军包围的严峻形势，11月上旬，派第二纵队第三五九旅进军枣阳，歼灭国民党军千余人。12月，国民党军集中10多万兵力，从南北两面向桐柏山区合围。为避敌锋芒，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率主力部队离开桐柏山区，越过平汉路东进，1946年1月8日，抵达光山、经扶西部地区。停战协定签订后，部队即恪守协定，停止了军事行动。蒋介石却密令国民党军在停战令生效前迅速抢占战略要点。中原军区部队对国民党军的蚕食作了英勇反击，但由于兵力悬殊，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被迫转移至礼山县（今湖北大悟）宣化店。但国民党军继续进攻，自停战令生效到22日，先后进攻77次，侵占较大村镇46处。

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北平军调部立即派人解决有关问题。军调部特派第九执行小组由汉口转信阳，1月22日，在罗山会晤了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国民党军第四十七军军长陈鼎勋、第六十六军军长宋瑞珂。经过谈判，23日签订了《罗山停战协定》5条，规定"国共双方军队停留于现在各自所在地面"，"不得向对方前进"[1]。但国民党军队又出尔反尔，继续向中原解放区进犯，特别是对中原军区留在平汉路西桐柏山区的地方武装进攻更为激烈。在中原军区的呼吁下，1月29日，军调部第九执行小组与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在礼山县禹王城又一次达成《中原临时停战协议》，以后又签订了《宣化店会谈公报》（2月23日）、《应山协议》（3月28日）等。可是，国民党军仍然拒不执行协定，各地冲突不断升级。4月，国民党军郑州绥靖公署调集11个整编师20余万兵力，将中原解放区部队重重包围，在解放区周围构筑碉堡6 000座以上，并于花园、潢川、商城等地设立指挥所，其第一线部队均已做好了全面战斗准备。

为揭露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在中共的建议与督促下，5月8日，军

① 《新华日报》，1946年1月28日。



事三人小组(周恩来、白鲁德和徐永昌)的代表王天鸣等到达中原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宣化店进行调处,并分别向国共双方部队下达停战命令。10日,军事三人小组在汉口就停止中原军事冲突问题签订《汉口协议》,北平军调部还派出第三十二执行小组,进驻宣化店(后设光山)地区,负责监督执行《汉口协议》。然而《协议》墨迹未干,16日上午,国民党桐柏县地方部队王星武等部200余人,即由黄岗(桐柏东北)向光武城以西之大黄岭、桐柏庄、大高庄一带中原军区地方部队进攻。6月1日,国民党正规军出动3个多团,分三路向信、确、桐边区中原军区部队围攻,先后侵占了白庙、孤山冲等村镇。

上述情况表明,国民党军对军事三人小组和军调部执行小组先后达成的多次停战协定均毫无诚意,坚持其围歼中原军区部队的计划。据统计,自1946年1月10日停战令公布到6月25日,国民党军对中原解放区的进攻达1 280余次,侵占城市及村镇达1 120余处,中原军区部队伤亡、失踪达4 000余人,解放区月月缩小,日日被占,而监督执行《汉口协议》的军调部第三十二执行小组的国民党代表拒绝参加调处,中原谈判并无实际结果。不过,通过多次谈判,延缓了国民党军的进攻,为中原部队突围赢得了准备时间,也使部队更加精炼。另外还拖住了国民党军20多万人马,配合了人民军队在东北、华北等战场的战略展开。

(二)豫北调处

1946年1月10日停战令公布后,国民党军在豫北仍不断对解放区进行"蚕食"。晋冀鲁豫部队采取积极的防御,寸步不让,坚持保卫解放区,给进攻者以打击。豫北境内公路交通、安阳以北平汉铁路等,亦因战争受到破坏。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为调处豫北军事冲突及恢复平汉路等交通,先后派出第十军事调部执行小组(设在新乡)和第十九小组(交通小组,设在安阳)到豫北调处。

1. 孟县问题。1945年9月4日,八路军太岳军区部队从日伪手中收复孟县,此后一直驻守在这里。停战令生效后4小时,即1月14日凌晨4时,国民党军第九十军3 000余人,由孟津县铁谢镇渡过黄河,



三人小组赴新乡进行调处

侵占了孟县冶戌、白坡等村镇，15 日强占孟县城。晋冀鲁豫部队实施反击，重创其 1 个团，国民党军被迫撤退，但仍占据黄河沿岸村镇，并修筑碉堡。在中共代表强烈要求下，2 月 7、8 两日，第十执行小组在新乡进行调处。中共要求国民党军第九十军退回到黄河以南，豫北国民党军队停止军事调动，平毁碉堡。军调部执行小组中国民党代表拒绝中共的要求，调处无结果。2 月 14 日，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令收编的伪军李英部 2 000 余人为进攻的先锋，以各种方式潜入解放区边缘地带，进行袭扰破坏，以国民党军继后，从而达到分割和缩小晋冀鲁豫解放区的目的，仅 2 月份李英等部向解放区进攻就达 10 余次。4 月 4 日，国民党军 3 300 余人分路合击孟县西北乌寨的驻军，使豫北解放区军民遭受严重损失。孟县问题终未解决。

2. 新乡、焦作间交通问题。国民党军蓄意破坏新乡至焦作间交通，使焦作煤炭无法外运。1 月 31 日，军调部第十执行小组到焦作实



地调查国共军事冲突和修武至焦作交通中断的情况。2月1日，第十执行小组在焦作举行会谈，并达成协议：国共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与武装冲突，双方释放战俘，各自在辖区内修复铁路、公路，准许百姓运煤及其他物资。中共方面恪守协议，很快将己方负责之焦作到卧龙岗间公路修复。可是国民党方面负责的卧龙岗到修武县城段公路却迟迟不肯动工，其军事进攻也未停止，因而在焦作达成的协议成为一纸空文。

3. 烈杠营事件。1946年2月2日拂晓，国民党获嘉县保安团和修武县政府政警队各一部计200余人，向修武城北烈杠营晋冀鲁豫部队突然袭击，抓走当地驻军战士，夺去枪支弹药。2月3日，第十执行小组到修武进行调处，国民党方面被迫送还抓去的战士和枪弹，答应后撤。待执行小组走后，国民党军不但不肯撤出烈杠营，反而大修碉堡，并向钓台营等解放区村镇进攻。

军调部第十九（交通）小组于1946年2月9日抵安阳，就恢复平汉路交通等问题进行调处。第十九小组视察了安阳至邯郸段平汉路破坏情况，然后进行会谈，达成了恢复交通的协议。中共领导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为执行协议，成立了“平汉路石（石家庄）安（安阳）段铁路管理局”，组织解放区群众着手修复辖区段的铁路。国民党方面则强调恢复交通是指解放区境内，拆除碉堡也是指中共控制区，而国民党军区域的碉堡是国防工事，不能拆除，表现出对谈判毫无诚意。交通小组制止不了军事冲突，就连执行小组对国民党军的进攻也无可奈何，因而调处没有效果。

（三）豫东冲突

水东地区与国民党在河南的统治中心开封近在咫尺，国民党一心要控制这一地区，否认水东有八路军存在。停战令公布后，国民党军的进攻规模日益扩大，到3月底，大小进攻达77次。在中共代表的强烈要求下，军调部令第十执行小组前往调处。此时国民党军正加紧部署，5月10日晚，新乡小组决定由三方代表组成小组，于11日起程赴豫东进行调处。此时国民党军向豫东解放区大规模进犯已经开始，且自认操必胜之券，因而千方百计阻挠调处，致使三人小组自11日到18日，

往返于郑州、开封间，无奈于19日返回新乡。

5月11日起，在河南省政府主持下，调动国民党军2万余人，向以睢县、杞县、太康为中心的豫东解放区发动进攻。1个月内先后侵占重要村镇32处，修筑据点31处。解放区部队在要求军调部新乡执行小组调处无望后，冀鲁豫军区水东军分区指挥第三十团、警卫营及睢县、杞县等县大队，灵活机动地与强敌周旋。先后在杞县南部竹林、太康西北清集等地多次歼敌。到6月10日，水东军分区部队作战11次，歼敌2 000余人，收复圉镇、四所楼、底阁等村镇。国民党军不甘失败，郑州绥靖公署部署第二期"清剿"，共计组织35个团，配备坦克10辆、汽车40辆，组成快速部队，于6月11日起再次向豫东解放区进攻，企图在向中原解放区全面进攻前彻底占领豫东。国民党军为防止水东军分区部队利用青纱帐进行自卫反击，强令睢县、杞县、通许、太康等地农民拔掉近900公顷高粱苗；同时强征数万民工，于陇海路南边开封至兰封段赶修封锁沟。

中共中央军委和晋冀鲁豫军区指示冀鲁豫军区，水东地区计划作为内战爆发后中原部队突围的通道，必须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坚决予以控制。冀鲁豫军区决定派参谋长潘焱率军区独立旅驰援水东。6月中旬到7月上旬，水东部队多次予敌以打击。7月10日黄昏后，水东各部队统一行动，远距离奔袭张岚峰的老巢柘城，12日拂晓发起总攻，经半天激战，消灭张岚峰保安第四纵队总部八大处及警卫营，毙伤俘敌530余人，缴获大批轻重武器，给敌以沉重打击。国民党军对水东地区的"清剿"又以失败告终。

（四）黄河归故

1938年6月，蒋介石下令扒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后，黄河主流改道，到1945年年底，故道河堤损毁1/3以上，部分河床被垦作农田，还新建村庄1 700多个，约有40多万农民生活在这里。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建立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中心区长垣、濮阳、濮县（今并入范县）、范县、今台前县及东明、鄄城等，都在黄河故道两岸。1945年冬，国民党当局在积极准备发动内战的同时，决定堵塞花园口决堤口

门，引黄河水回归故道。1946 年 2 月，国民政府在黄委会（设在开封）下设立“黄河堵口复堤工程局”，黄委会委员长赵守钰兼任局长，宣布黄河改道工程能于两月内完成。3 月 1 日，于花园口动工堵口。

黄河归故是国民党当局企图再次以水代兵，将地处黄河中下游的冀鲁豫解放区一分为二，割断华北解放区与华东、中原解放区的联系，以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中共中央虽洞悉国民党之阴谋，但考虑到黄泛区人民的利益和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同意黄河归故。一方面向群众宣布黄河归故的消息，做好各种准备；一方面成立了以王化云为主任的冀鲁豫区黄河水利委员会，筹划修复堤防等工作，并申明先复堤后堵口的主张。国民党当局未复堤先堵口的行动，遭到黄河故道下游人民的强烈反对。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的压力，3 月 3 日，令赵守钰等前往新乡，会晤正在豫北巡视的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三人小组，商谈黄河堵口复堤问题，决定各方面派出代表谈判，以求合理解决。此后，中共代表同国民党当局及联总的代表展开了一系列谈判和斗争。

4 月 7 日，由冀鲁豫解放区派出的中共代表，同国民政府黄委会代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代表、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代表，在开封黄委会礼堂就黄河归故问题进行首次谈判，并通过 5 项议案（称《开封协议》），议定：“堵口、复堤同时进行，但花园口合龙日期须俟会勘下游河道堤防淤垫、破坏情形及估修堤工程大小而定。”[①]《开封协议》还对河床内村庄居民的迁移救济等问题达成初步协议。4 月 15 日，冀鲁豫行署、渤海解放区政府和国民政府黄委会三方代表于菏泽举行第二次会谈，就复堤浚河堵口、河床居民救济、施工机构及交通问题达成协议，即《菏泽协议》。

《开封协议》、《菏泽协议》未及执行，便被国民党当局否定，单方面拟定两个月完成堵口合龙计划，宣布“倘秋汛期前不克完成堵复全部工程，政府方面实不能负其全责”[②]。当局征调 1.7 万名民工，组织大

---

① 王传忠等：《黄河归故斗争资料选》，第 46 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

② 南京《中央日报》，1946 年 4 月 20 日。

批机械，开始了花园口堵口工程，国民党当局为配合其在6月底发动全面内战，5月8日，电令工程局务必在7月1日前完工。

此时解放区复堤工程尚未进行，一旦黄河水归入故道，必将造成巨大灾难。中共中央发言人对国民党政府背信弃义破坏《菏泽协议》的行径提出强烈抗议，冀鲁豫区沿黄百万群众为此举行示威。冀鲁豫行署通电全国，呼吁各民主政党、法团及各界正义人士，在故道浚河复堤与居民迁徙救济工作完竣以前，制止花园口堵口工程，同时采取紧急对抗措施，制定在考城和东明之间拦河堵坝的计划，以粉碎国民党水淹解放区的阴谋。中共的主张得到国际国内舆论的同情，国民党当局被迫重新回到谈判桌前。自5月18日到次年1月17日，先后在南京、上海、张秋、邯郸等地进行了多次会谈，达成相应协议。



1946年7月，周恩来在谈判席上

冀鲁豫解放区在派代表同国民党谈判的同时，1946年5月26日，动员长垣、濮阳等沿河各县出动23万民工，开始进行复堤工程。当时正值麦收大忙季节，国民党当局又迟迟不肯拨放工程粮款及救济款，边区政府和人民群众克服重重困难，抢修河堤，疏浚河道。7月上旬，解放区第一期复堤工程大部完成，残破不全的旧堤基本修复。



国民党当局对历次谈判达成的协议根本没有打算履行，为配合内战，堵口工程日夜施工，仍计划汛期前合龙，蒋介石还多次亲自下令催促。后因河水上涨，汛前堵口计划被迫中止。随后，国民党军向冀鲁豫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对解放区治河物资器材进行抢掠、破坏，对历次协议条款中规定的复堤工款及河床居民迁移救济费等则以种种借口拖延拨付，迫使解放区复堤工程于8月15日停顿，而花园口堵口工程却于10月5日复工，黄河水利委员会限期50日内完成堵口。

此举再次遭到解放区人民的严正抗议。11月2日，周恩来就此问题致函联总中国分署署长艾克顿和行总署长霍宝树，指出：由于国民党当局未遵守协议，致使解放区整理险工等工程无法进行，“于下游工程未竣，救济河床居民款项毫未拨给之际，而花园口堵口工程则在积极进行，且闻国方又有限期50日完成堵口之命令，是直欲下游千百万及河床数十万居民为鱼鳖，危险莫大于此”！要求国民党当局遵照历次协议，在下游复堤工程未完成和河床内居民未迁移前“立即停止堵口工程，否则若此行引起之后果当由政府负责”[①]。联总、行总仅承诺拨付救济费，对堵口一事却不置可否。11月29日，蒋介石密电黄河水利委员会“督饬所属昼夜赶工”。堵口工程加快了进度，3月8日开始向故道放水，15日晨大坝合龙，黄河水全部归入故道。正在全力进行内战的国民党以此为由，结束了黄河归故的谈判。

中国共产党通过黄河归故的谈判，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阴谋，为复堤争取了时间，保卫了沿黄数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当花园口大堤合龙时，冀鲁豫解放区尚有37处险工未完成，60余公里堤工未修复。黄河归故，仅濮阳、范县等10县滩区，被淹村庄即达237个，淹没耕地18 000余公顷。解放区沿河各县群众纷纷奔上大堤，冀南解放区组织3万民工南下支援。30万复堤大军冒着国民党军飞机、大炮的轰炸赶修大堤。到7月23日，冀鲁豫西起长垣县大车集，东至山东齐河县水牛赵庄，全长300余公里的北岸大堤普遍加高2米，培厚3米。南

---

① 王传忠等:《黄河归故斗争资料选》,第108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

岸组织的10万军民也在日夜抢修大堤。到7月25日，150余公里复堤及险工均告完竣，7月底黄河洪水平安通过冀鲁豫区。

三、解放区应付全面内战的准备

面对着蒋介石集团百万大军对解放区的蚕食与进攻，中共中央及时向全党发出指示，提醒全党：国民党当局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各解放区要密切注意蒋方动态，并在军事上做必要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各解放区按照中央的部署，从各方面做好应付全面内战的准备。

（一）全面加强军队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

部队建设首先从精简整编入手，原则是：裁减老弱及无武器、无职务人员，合并机关，减少单位编制，充实部队，减少财政支出，以利于长期打算。晋冀鲁豫军区制定了具体的精简整编计划，减去骈枝、冗员，紧缩领导机关，充实定额的战斗部队，复员、转业了一批老弱伤残人员，同时动员一部分青年农民参军入伍。到1946年6月，晋冀鲁豫军区经过精简整编，下辖2个纵队（各辖3个旅）和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4个二级军区及民主建国军、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等。当年6月，晋冀鲁豫野战军成立，刘伯承兼司令员，邓小平兼政治委员，下辖3个纵队共9个旅。军区和野战部队共27万余人，比整编前的31万人减少4万人（其中第一纵队和25个团的架子调往东北）。中原军区1946年6月精简整编后，辖2个纵队及江汉、鄂东、河南3个二级军区，军区和野战部队共5万余人，比精简整编前减少1万人。

各军区在进行精简整编的同时，又普遍展开了大练兵运动，以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通过练兵，部队的军事技术与战术水平得到提高。

（二）开展减租减息与大生产运动

解放区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生存、发展和作战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①]。要使解放区得到巩固，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支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09页，人民出版社，1966。



持;如果不能给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便不可能打下可靠的群众基础。因此,中共中央在加强人民军队建设的同时,又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大力巩固解放区。

1. 反奸反霸与减租减息。晋冀鲁豫解放区所辖的豫北地区,大部分是新解放区,这些地区在八路军从日伪手中收复后,只进行了一些反汉奸斗争,减租减息运动基本上没有进行。在老解放区,由于战争等因素的影响,也有不少地区减租减息不彻底。1945 年 11 月 7 日,中共中央发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指示,要求各地不失时机地开展减租和生产两件工作。太行、太岳、冀鲁豫区遵照中央的指示,迅速作出部署。安阳县于 1946 年 1 月 8 日在水冶镇召开有 2 万多人参加的反奸反霸、诉苦说理斗争大会,镇压了曾煽动红枪会暴乱的恶霸地主张景耀,把全县反奸清算运动推向了高潮。其他如博爱、武陟、沁阳、修武、温县等新区县,都有成千上万的群众参加了反奸诉苦清算运动,一些罪大恶极的汉奸、伪军头子,经过群众的公审,依法进行了惩办。贫雇农收回了被汉奸、地主霸占的土地、房产,清理了旧债。反奸清算告一段落后,各地及时转入减租减息运动,对地主实行"二五减租"或"工半减租",三七或四六(地主占 3 成或 4 成)分成,取消一切额外剥削和负担,增加雇工工资。放债利率不得超过 3 分,有的地方规定不得超过 1 分 5。在新解放区开展反奸清算的同时,老解放区的复查减租减息工作也在深入进行。通过普遍的减租减息和查减运动,有力地削弱了农村封建势力,广大农民获得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各地都改造了乡村基层政权,解放区进一步得到巩固。

2. 大生产运动。1946 年,各解放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部署,在减租减息和查减运动的基础上,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筹措 14.1 亿元农贷资金,帮助农民解决缺乏农具、种子、牲畜等困难。冀鲁豫行署要求各级政府把农贷资金及时发放到需款的农民手中。政府组织群众在春耕前填平了抗日战争时期挖掘的壕沟,扩大耕地。农副业生产方面,大力组织各地恢复各种传统特产,如清丰、南乐、范县一带,约有 20 万妇女从事草帽辫编织,远销平、津、关东及国外,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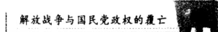
增加了农民收入，也换取了外汇，换回更多的工业品。

3. 解放区的工商业经济也得到恢复。焦作煤矿、安阳六河沟煤矿、鹤壁煤矿等工矿业得到政府的支持，很快便恢复了生产，产量逐月递增。农机厂、棉花加工厂等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工厂遍布各地。政府在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还注意扶植私人经济，安阳县水冶镇原有各种杂货行、作坊等469家，到1945年年底，私人商业、工业发展到1 904家。冀鲁豫区颁布《内地贸易自由的通令》，撤销内地缉私组和“内地购物证”制度，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大生产运动的深入开展，使解放区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为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打下了物质基础。

（三）开展以“高树勋运动”为中心的敌军工作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内战政策遭到各界人士的坚决反对，反内战运动在全国展开。国民党军队中广大士兵和一些中下级军官对内战政策不满，即使一些高级将领也不赞成内战。国民党军队派系复杂，蒋介石利用战争吞并杂牌部队的做法，更引起非嫡系部队广大官兵的强烈不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各解放区在反击国民党军进攻的同时，更重视加强对国民党军队的政治争取工作。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在邯郸战役中率部起义后，毛泽东向各解放区发出了开展“高树勋运动”的号召，号召各地党组织对参与内战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瓦解工作，“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要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①。晋冀鲁豫解放区各军区、军分区都调整和加强了敌工机构，大力开展对敌军的策反工作。一些国民党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纷纷举起义旗，退出内战。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张岚峰部第三路军第十八师永城起义。1945年9月20日，第十八师师长杜新民率部5 000余人在永城宣布起义。张岚峰部第三路军第五十五师夏邑起义。1946年1月6日，第五十五师副师长王继贤，率部4 000余人，于夏邑县城宣布起义，后与魏凤楼部合编为第一纵队，王任纵队副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71页，人民出版社，1966。



司令员。第三十八军巩县起义。1946 年 5 月 15 日，第三十八军副军长孔从周(从洲)，率第五十五师在巩县毅然起义，辗转开赴晋冀鲁豫解放区。9 月 13 日，与 1945 年 7 月 17 日在洛宁起义的原国民党军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等部改编为晋冀鲁豫军区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孔从周任军长。

上述起义对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是一个沉重打击，无论是对中原战场还是对全国战场，都产生了不小影响，"高树勋运动"对解放战争中、后期瓦解国民党军官兵和推动国民党军起义都起了推动作用。

第二节　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与解放区的巩固和发展

一、内战爆发与中原军区部队胜利突围

国民党军由于接受了大量的美式装备和百万侵华日军的全部装备，其部队的现代化装备已有很大增强，兵力亦有扩大，总兵力达 430 万人。蒋介石依仗兵力的优势，不顾国内外舆论的反对，调动 10 个整编师(25 个旅)约 30 万人，于 1946 年 6 月 26 日悍然进攻中原解放区。以此为起点，全面内战爆发。

中共中央和中原局对国民党军的围歼计划洞若观火，并积极做了相应的准备。早在 4 月 30 日，中共中央即致电中原局、中原军区，令其早日择定并电告突围时的前进方向。后又提出向西突围的建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领导经过反复研究，于 6 月 20 日向中央报告突围计划：主力向西突围，留下万余人在当地打游击。21 日，中原局、中原军区又向中央提出在国民党军发动进攻前主动突围的建议。23 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①]中原局、中原军区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各部队在防区内秘密集结，29 日通过平汉路，向西转移。命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3 卷，第 288 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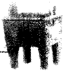
令第一纵队第一旅伪装主力，向东突围；鄂东军区、河南军区部队在掩护主力突围后，留原地坚持斗争；主力分左右两路于26日开始向西突围。

6月26日拂晓，国民党军分四面向中原军区部队发起了进攻，当日晚，中原军区右路突围部队1.5万人，由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位三率领，离开宣化店北上，在罗山西南部涩港、九里关地区秘密集结。29日晚，在信阳南柳林附近和李家寨附近越过平汉路，7月1日进至应山北部泉口店、吴家店、浆溪店地区。刘峙急调整编第四十一师（欠第一二四旅）、第三师第三旅、第十五师等部，在飞机配合下，企图于随县北部天河口和唐河县西南苍台地区夹击中原军区部队，而突围部队以日行90公里的急行军越过苍台、唐河。蒋介石再次合击中原军区部队的计划又成泡影。

国民党军调整部署，将4个整编师分别部署于南阳、镇平、内乡以及淅川、邓县地区，尾追部队则继续前进，并令2个整编旅星夜兼程赶至淅川荆紫关，控制入陕咽喉，以求将中原军区部队围歼于丹江以东地区。中原军区右路突围部队鉴于国民党军追堵日急，7月11日进至内乡南部师岗地区后，决定分兵前进。一路由中原局、中原军区率第十三旅、第十五旅第四十五团等部7 000余人，组成左纵队，经淅川向鄂西北南化塘前进；一路由王震率第三五九旅、干部旅共8 000余人，组成右纵队，先期占领淅川城、荆紫关，掩护左纵队通过后，转向陕南之山阳、柞水地区前进。两纵队在淅川、丹江等地同国民党军多次血战，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7月29日，左纵队进入陕南商南县境，与当地游击队会合，8月3日，成立鄂豫陕军区。8月底王震率右纵队进入陕甘宁边区。

黄林率领的河南军区部队，在掩护右路突围部队越过平汉线后，奉命留下1 000人在桐柏山区坚持游击战争，2 000余人随主力西进，8月初进至卢氏、灵宝、洛宁地区，开展游击战，后组建了鄂豫陕军区第四军分区。

中原军区左路突围部队第一纵队1万余人，在军区副司令员王树



声率领下，6月26日晚由光山县南部之泼陂河出发，向西南移动，30日晚抵达平汉路广水与花园之间的王家冲，遭到国民党军3个整编旅的堵击，经一夜激战，终于在7月1日拂晓越过平汉铁路，26日进入武当山地区。8月上旬与罗厚福、文敏生率领的江汉军区部队约6 000人会合，27日成立鄂西北军区。

担任迷惑与牵制敌人任务的第一纵队第一旅7 000余人，在旅长皮定均、政治委员徐子荣率领下，28日从光山刘家冲出发，以急行军插到敌后，显示主力向南突围的态势，然后以90度大转弯折向东急进，突破小界岭封锁线后，于7月1日翻过东进的必经之道商城松子关，继而又克服了暴雨、崇山峻岭等重重困难险阻，冲破敌人多次拦截，于7月20日进入苏皖解放区，改归华中野战军建制。

由张体学率领的鄂东军区和独立第二旅共6 000余人，完成了掩护主力突围的任务后，在鄂皖边区分散开展游击战争。

这样，中原军区各部不仅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而且在陕南、鄂西创建了两块新的根据地，并留置部分兵力坚持大别山区的游击斗争，极大地援助了其他解放区的作战。1947年5月28日，中共中央给中原军区的慰问电指出：中原各部“在极端困难条件之下，执行中央战略意图，坚持游击战争，曾经钳制了蒋介石正规军30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中主力渡过蒋介石进攻的最困难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①。

二、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巩固和发展

（一）迎击国民党军的进攻

国民党军在围攻中原解放区的同时，对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兵力亦作了部署：以郑州绥署整编旅的兵力，担任陇海路开封至商丘间的守备，阻止晋冀鲁豫野战军南下支援中原部队的作战；以第十一战区12个整编旅的兵力，部署于安阳、汤阴、新乡及道清路，企图在郑州绥署主力歼灭中原军区部队后，配合进攻豫北解放区，打通平汉路。

为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和晋冀鲁豫军区对

---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8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

组织机构进行了必要的调整，8 月起展开一系列作战，大量歼灭了国民党军。

1. 陇海战役。8 月 9 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出击豫东，占领陇海路汴（开封）徐（州）段及路南 10 余县，吸引围追中原部队之敌军增援陇海路，使突围部队能在陕南、豫西、鄂西等处站住脚跟。据此，8 月 10 日夜，晋冀鲁豫野战军 4 万多人在 150 公里宽的正面，突然向陇海路兰封、黄口（皖北）段线上之国民党军发起攻击。到 12 日，先后攻克兰封、砀山两座县城及陇海线上的刘堤圈、柳河集、



李坝、野鸡岗、兰封、罗王诸车站，歼灭国民党军5 000余人，控制与破坏铁路150余公里。15日，进克杞县。通许、虞城国民党军蒋嘉宾部4 000余人起义。郑州绥署被迫从围追中原突围部队的军队中抽调3个整编师东援，徐州绥署亦组织第五军及2个整编师西进。21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全歼国民党军1个旅又1个团，赶在国民党军东、西两路援军到来之前，转移到陇海路以北地区休整。是役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2个旅，连同地方团队共1.6万余人。在此期间，冀鲁豫区共组织15.6万民工携带大车2万辆、担架2万副支前，保障了战役的胜利。

2. 定陶战役。陇海战役后，晋冀鲁豫野战军又在定陶战役中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取得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4个旅1.7万人(其中俘1.2万人)的伟大胜利。郑州绥署主任刘峙因“作战无力”被撤职，遗职由国民政府国防部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兼任。

3. 滑县战役。国民党军在4个月作战中虽连遭打击，但仍继续保持全面进攻的态势。顾祝同企图在第十一战区的配合下，调集10多个整编师，继续打通平汉线，并寻机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歼灭于黄河以北。为了粉碎敌人的图谋，晋冀鲁豫野战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首先各个击破敌薄弱集团的指示精神，决定发起滑县战役。11月18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秘密透过国民党军整编第四十一师、第四十七师等部的接合部，楔入纵深40余公里，将敌分割，直扑各部敌军的指挥部，19日凌晨，分别向滑县南部上官村、邵耳寨、朱楼发起攻击，首先消灭了敌第一〇四旅等部的指挥部，俘第一〇四旅旅长，进而全歼上述各据点及留固集、黄庄等地敌军。22日，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军分别从西、东两面来援，晋冀鲁豫野战军遂结束战役。是役共消灭国民党军第一〇四旅全部、第一二五旅大部及河北保安第十二纵队全部等共1.2万人，达到了抑留郑州绥署精锐主力整编第二十七军、粉碎国民党军打通平汉路计划之预定目的。

4. 出击豫皖边战役。滑县战役后，国民党军郑州绥署仍坚持其打通平汉路的计划，集中9个整编旅，自11月28日起由滑县地区向北推进。为配合其军事进攻，国民党当局加快了花园口堵口和黄河归故工

程。晋冀鲁豫野战军在豫北与敌周旋未能捕捉到战机，遂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再次南下鲁西南，12 月 30 日至 1947 年 1 月 16 日，发起巨（野）金（乡）鱼（台）战役，歼灭国民党正规军 3 个半旅，连同非正规军及地方团队共约 1.6 万人，河南暂编第四纵队司令张岗峰被活捉，收复临漳、范县、濮阳等 9 座县城，迫使已占领大名的敌军抽兵回援。国民党军打通平汉路的计划再次流产，但其主力仍滞留豫北。敌陇海路中段南北地区兵力单薄，晋冀鲁豫野战军遂发起出击豫皖边战役，将主力分为路北、路南两个作战集团，分别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1 月 24 日发起作战，到 2 月 4 日，路南集团连克柘城、太康、鹿邑、杞县诸城，路北集团攻克定陶等县城，并破坏和控制陇海路民权、商丘段约 35 公里。2 月 4 日，蒋介石亲赴郑州，决定集中徐州、郑州绥署所辖之兵力，在兰封以东陇海线地区，歼灭晋冀鲁豫主力，然后全力东进参加鲁南会战，消灭华东野战军。两绥署按照蒋介石的指令，调 1 个整编军、2 个师，先后开赴陇海路兰封至商丘段。11 日夜，晋冀鲁豫野战军集中路南、路北两集团，向民权以西整编第八十五师发起攻击，予敌以极大震撼，有效地牵制第二十七军等部滞留豫东，保障了华东野战军胜利进行莱芜战役。2 月底野战军返回黄河以北休整。出击豫皖边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 1.6 万人，收复了陇海路中段南北广大地区。

冀鲁豫军区地方部队乘野战军主力出击豫东，豫北国民党军主力被吸引东调之机，也发起攻势，先后收复南乐、清丰、大名、内黄、濮阳等县城。太行军区集中 10 个团的兵力，2 月 6 日至 13 日发起汤阴战役，向汤阴西部鹤壁地区国民党军展开进攻，摧毁鹤壁周围之 36 处敌据点，歼敌 2 500 余人。在巨金鱼战役和出击豫皖边战役中，冀鲁豫解放区出色的战勤服务，为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在长达 50 天的连续作战中，共有 7.5 万民工、2.78 万副担架，随军转战 1 000 余公里。12 月 27 日，国民党当局实施"黄河战略"，引部分黄河水入故，以图截断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方通道。战勤总指挥部于 1947 年 1 月 18 日指示沿河各县紧急动员，3 天内在黄河上架起了 3 座浮桥，保证了野战军主



力于战役结束后顺利北返①。

（二）晋冀鲁豫野战军发动豫北攻势

各解放区经过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共8个月作战，国民党正规军被歼灭66个旅（师），连同非正规军共损失71万人，130多名中高级将领被俘或被击毙，其指挥官的指挥作战能力和部队战斗力都大为减弱。人民解放军则在作战中不断壮大，部队的武器装备得到较大改善。自3月份起，国民党军事当局被迫放弃全面进攻，而采取重点进攻的方针，集中兵力进攻陕北、山东，对晋冀鲁豫等区转取守势，同时加紧黄河归故，以构成所谓"黄河防线"，阻止晋冀鲁豫野战军支援山东战场。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军委确定全军继续执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同时要求豫北等战场的部队依据本地具体情况，举行战略性反攻，以配合陕北、山东战场作战。

晋冀鲁豫军区决定发动豫北攻势，切断国民党军陕北、华东两战场的联系。为此，集中野战军及地方武装共60个团约10万人，编组为4个野战集团，在10万民兵配合下作战。计划先以主力插入敌纵深新乡至黄河北岸地区，破坏平汉、道清铁路，调动并力争在运动中歼灭可能由新乡等地增援之敌，相机夺取敌守备薄弱的城镇据点。

当时，豫北地区有国民党军约10万人，依托交通要道及城镇据点，修筑了大量的坚固工事，实施重点防御。各部由陆军总司令部郑州指挥部（3月4日郑州绥靖公署撤销，改设此机构，由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兼主任）指挥。该部据所获情报，判断出刘邓野战军的战略意图，要求豫北驻军除固守重要据点外，抽调有力部队机动作战，寻机歼灭晋冀鲁豫部队主力。

晋冀鲁豫野战军豫北攻势作战于3月23日发起，到4月2日，先后解放了濮阳、封丘、延津、原武、阳武5座县城及牛市屯（滑县西南）等据点多处，两次袭击黄河铁桥，一次围攻汲县县城，共歼敌5 000余人，摧毁并控制平汉、道清路50余公里，迫使国民党军统帅部将原拟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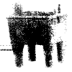
① 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工作组：《冀鲁豫边区革命史》，第549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

往山东战场的整编第六十六、第九师北调郑州，转而投入豫北战场。整编第二十六军军长王仲廉收缩兵力，在新乡集结了5个整编师计10个旅。

刘伯承、邓小平为避敌优势，4月3日夜挥师北上，开始第2期作战。到10日，先后攻克淇县、汤阴、安阳、内黄等县之庞村、鹤壁、鹿楼、水冶、楚旺等据点数十处，歼灭国民党军共9 000人，破坏了安阳、汲县段铁路，解放了卫河以北、以西及平汉路两侧广大地区，主力逼近安阳，围攻汤阴。4月12日，国民党军分两个梯队沿平汉路东侧北援，被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割裂，并将第一梯队包围。激战至18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全歼第二快速纵队及整编第六十六、第四十七师各一部，共1.2万余人，乘胜收复淇县、滑县、浚县县城。王仲廉部主力缩回新乡。晋冀鲁豫野战军进而于4月下旬，廓清了汤阴周围敌据点，5月1日向汤阴守敌国民党军暂编第三纵队孙殿英部发起进攻，全歼守军近万人，其中生俘孙殿英以下7 000余人。6日，晋冀鲁豫部队攻克安阳东部重要据点崔桥，歼灭河南保安司令部自卫军第三总队王自全部3 000余人。9日起，对安阳外围据点发起攻击，至25日，攻克清流、豆腐营等据点多处，歼灭国民党军6 000余人。因安阳城工事坚固，短时间难以攻克，晋冀鲁豫野战军首长遂改以太行、冀南军区独立旅围困安阳，野战军转入休整。豫北攻势结束。

豫北攻势历时两个月，共歼灭国民党军4.5万余人，解放了南自原武、封丘，北至安阳、内黄长150余公里，东自濮阳西至淇县，宽100余公里的地区，控制平汉铁路150公里，迫使国民党军退缩于安阳、新乡、汲县等少数据点，破坏了国民党军在豫北的防御体系，有力地配合了陕北、山东战场解放军的作战。

豫北攻势得到晋冀鲁豫解放区民众的大力支援。太行行署为部队运输粮草烧柴动用民兵折工达265.6万个。冀鲁豫区出动10万民兵和20万民工参战，其中6 000副担架随军转战千里，救护运送伤员。安阳县动员2万民工赶修3条公路，给前方运输粮食；全县组织4 000名民工、700副担架，每区组织1 300名民兵参战。解放区各县结合土



地改革掀起参军扩军热潮。解放区人民的大力支援，有效地保障了豫北攻势的顺利进行。

(三)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在连续取得军事斗争胜利的同时，晋冀鲁豫解放区又在各地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接到中央1946年5月4日《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后，即于1946年6月10日在邯郸召开土地会议，确定全区除少数边沿接敌区外，立即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共冀鲁豫、太行、太岳区党委和行署，都对此作了相应部署，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在清丰、滑县等地开展了试点工作。7、8月份，晋冀鲁豫边区形势陡然紧张，各级党委、政府为保证前线作战的胜利，全力进行战勤、扩兵等工作，土地改革运动一度中止。结果发现，由于战勤、扩兵"没有贯彻土地改革，没有放手领导群众的翻身斗争，给群众的少，向群众要的多"，致使"在紧张的爱国自卫战争中，站岗放哨封锁敌人，实行戒严，都弄不起来。而特务活动，人心动荡，担架逃亡，群众情绪低落，是比较普遍的现象"[①]。这就使得解放区各级政府认识到只有认真执行土地改革的政策，使广大农民获得利益，农民群众才会真正站到共产党方面，全力支援革命斗争，因而在开展各项工作时都与土地改革运动紧密结合进行，以土地改革激发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9月，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向各区发出《为贯彻"五四指示"彻底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指示》，对土改的方式作了明确规定。1946年冬到1947年春，土地改革运动在豫北新解放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为扩大声势给农民撑腰，各地一般都采取联村斗争的方式，集中数千甚至数万人，斗争民愤大、罪恶覆盖面广的汉奸、地主，使群众增强信心，得到鼓舞。在老区对个别干部、积极分子、民兵包庇、隐藏地主及地主财产的现象进行揭露，追出所隐瞒的财产；对部分干部、积极分子占取土地改革成果过多的部分，采取各种方法令其退出，分给贫苦农

① 谢忠厚:《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下)，第709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民。对政府、军队、机关和团体占用的公地、房产等要求全部退回。各地农民以村为单位组织了“翻身委员会”、“评议委员会”、“调查委员会”，采取中间不动两头动，即中农不动，将从汉奸、地主手中清算出来的土地、财产，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补足，实行平均分配。

经过轰轰烈烈的土地还家、翻身大检查和填平补齐，除少数游击区外，解放区已摧毁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基本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以林县为例，1946年年底，急风暴雨式的土改运动告一段落，没收土地2万公顷、房屋1万多间、牲口18 100头、农具10万件，还挖出一部分金银钱币和枪支。该县土地改革前地主、富农共有55 780人，占地18 770.49公顷，人均0.336 5公顷（5.05亩），贫农、中农总人口334 211人，占地35 121.42公顷，人均0.105公顷（1.58亩）。土地改革后，地主、富农人口下降为51 549人，土地减少13 431.51公顷，占地5 338.98公顷，人均0.103 4公顷（1.55亩）；贫农、中农人口上升为347 462人，占有土地增加18 634.2公顷，达到53 755.63公顷，人均0.154 6公顷（2.32亩）[①]。

获得土地的农民，政治觉悟空前提高。在保家、保田、保命的口号下，解放区组织的参军、支前运动都能超额完成任务。在轰轰烈烈的参军运动中，广大翻身农民都把参军当做自己的神圣职责、光荣义务，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村干党员带头的事迹大量涌现。1946年10月，安阳县、博爱县一次报名参军均达1 500人，1947年林县有6 513人参军，有的母亲把两个儿子送往部队，被誉为“子弟兵的母亲”。

解放区依靠农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与敌斗争，改变了敌强我弱的形势，成为夺取斗争胜利的保障。土地改革运动也促进了解放区的政权建设、民兵建设，使人民军队有了可靠的、巩固的后方；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农业产量提高，农民收入增加，使人民革命战争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援，从而为夺取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① 以上数字参见：《林县志》，第12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三、豫皖苏解放区的重建和豫鄂陕游击根据地的开辟

(一)重建豫皖苏

中共中央为加强对豫皖苏边区革命斗争的领导,以充分发挥这一战略区的重大作用,1946年10月19日,决定以中共冀鲁豫区第六地委和华中地区第八地委所辖地区为基础,重建豫皖苏解放区,归属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领导。11月8日,中共豫皖苏区党委和豫皖苏军区成立,吴芝圃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张国华任军区司令员。下旬,张国华等率豫东纵队及特务团共1 000余人,南越陇海路,进入豫东。12月12日,在睢县平岗集与水东解放区部队会师,并整编了部队,下辖3个军分区、1个军区独立旅。随后,军区主力及各军分区武装主动出击,巩固并扩大原有的游击根据地。到1947年1月初,先后恢复了商丘、亳县、柘城、夏邑地区,建立了5个县级政权。晋冀鲁豫野战军出击豫皖边,军区部队配合主力作战,向国民党军地方团队展开进攻,收复大片村庄。豫皖苏解放区得到巩固、扩大,建立了18个县级政权,3个军分区连成一片。

晋冀鲁豫野战军出击豫皖边战役结束后,撤回陇海路北休整,国民党军抽调7个整编旅、1个交警总队,在十几个县保安团配合下,对豫皖苏解放区立即组织反扑。到2月20日,国民党军先后重占亳县、鹿邑、柘城、太康、睢县、宁陵等城。

豫皖苏区部队采取"敌进我退、避强击弱"的游击战方针,以县、区地方武装对侵入解放区的国民党军进行袭扰,以各军分区基干武装袭击、破坏敌人交通线,以军区独立旅及特务团寻机歼敌。2月25日到4月3日,先后攻克太康、柘城、睢县、宁陵。

国民党军事当局对其在豫东的连续失利极为震惊,遂改变战术,以正规军组成3个机动兵团,实行分区"清剿";以保安队分守城镇要点,逐步向解放区蚕食。豫皖苏军区根据敌情变化,决定各军分区武装在内线作战,阻滞、分散敌之兵力,军区主力分为两个集团到外线作战,扩大解放区。至5月中旬,先后攻克尉氏、扶沟、西华、沈丘及界首、临泉等豫皖边9座县城,毙伤俘敌近2 000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坚持内

线的军分区武装，开辟、扩大了贾鲁河以西和沙河以南地区，解放区面积扩大近1倍，军区武装力量扩大了3倍，经常牵制着国民党军4个正规旅和许多保安团队，成为深入国民党军中原战略后方的一个“锲子”，为晋冀鲁豫野战军转入战略进攻建立了前进基地。

（二）开辟豫鄂陕

在重建豫皖苏解放区的同时，中原军区部队还胜利地开辟了豫鄂陕游击根据地。

1946年7月，中原军区部队胜利突围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多次向中原局发出指示，要突围部队在豫鄂川陕境内进行机动灵活之作战，摧毁国民党统治机构，牵制国民党大批军队，配合华北、华中主力作战。7月24日，李先念等率领的中原军区突围部队到达陕西省商南县龙驹寨，与中共领导的陕南游击队巩德芳部会合，决定在陕南豫西一带创建新的根据地。8月3日，豫鄂陕军区成立。9月1日，中原局决定豫鄂陕军区下设4个军分区，其中豫陕省界以东、陇海路以南、丹江以北即豫西地区为第四军分区，闵学胜任司令员。后又成立第四地委，黄林任书记。

第四军分区成立后，分区武装积极向卢氏、灵宝、洛宁一带推进，以建立和扩大根据地。国民党军在内乡、嵩县、卢氏等县保安团配合下，企图在第四军分区部队未站稳脚跟之前予以消灭。第四军分区部队主力避开国民党正规军，选择突出之地方团队予以打击，连续击溃卢氏、内乡等县保安团。各县保安团残部纷纷逃避，卢氏县大部成为根据地。到11月底，豫鄂陕根据地共建立4个专署、14个县级政府、200多个乡政权，地方武装发展到4 000余人。第四军分区扩大到卢氏、灵宝、阌乡（今并入灵宝）、洛宁、嵩县等地。

11月下旬，国民党军集中10个师和17个保安团对豫鄂陕根据地开始第二次“清剿”，同时实行移民并村，建立据点，封锁物资，边区形势十分严峻。为打破“清剿”，军区决定集中主力，组成野战纵队，转入外线作战，吸引国民党军他顾，减轻根据地压力。1947年1月8日，野战纵队正式成立，司令员黄林，政治委员由军区副政治委员方正平兼（又称黄方纵队），全纵队5 000余人。1月16日，黄方纵队首战内乡

桑坪(今属西峡),全歼内乡保安团1个团又3个营,进而又连克栾川、庙子两镇和嵩县大章街等地,给卢氏、嵩县等地保安团以沉重打击。但国民党军正规军和地方团队仍处处围追堵截,并进入伏牛山,对黄方纵队形成合围之势。敌强我弱,形势十分严峻。

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原局决定豫鄂陕军区除留一部分武装坚持原地斗争外,主力过黄河转至太岳区休整。主力北渡后,留在内线的部队约2 000余人,再次组建为豫鄂陕军区野战纵队,军区副司令员陈先瑞兼司令员,韩东山任政治委员(称陈韩纵队),先后转战于卢氏、灵宝、洛宁、嵩县等县,因活动困难,亦奉命北渡,进入太岳解放区。

豫鄂陕军区主力转移后,国民党军对留在根据地的少数武装进行残酷的"清剿",摧毁革命政权,恢复保甲。但是,散落在豫西山区(崤山、熊耳山、伏牛山)的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仍在坚持斗争。原第四军分区侦察参谋熊松柏和卢氏朱阳关区长祝铭等,在灵宝黑山成立了中共卢(氏)灵(宝)洛(宁)工委。设在卢氏双槐树的豫鄂陕军区后方医院以警卫排为主,吸收部分轻伤员,组成了一支游击队,转战在卢氏山区,与卢灵洛工委成员祝铭带领的人员会合,自动组建了中共豫陕工委和游击队,一直坚持在卢氏西南淇河、毛河一带深山密林里,领导群众进行斗争,直到陈(赓)谢(富治)集团挺进豫西,才与主力会合。

第三节　解放军战略反攻的辉煌胜利

一、国民党统治危机的加深

(一)国民党统治危机的加深

国民党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后,为了解决急剧增加的军费开支和各种物资消耗,于是就加紧对本已山穷水尽的人民进行经济搜刮。为进行内战的需要,国民党军队云集战略要地河南,到1946年春,光正规军就达七八十万人,加上地方团队,总数不下100万人,常年所需的军粮、麸料和柴草,多由疮痍满目的河南筹措。由于各军将领都贪污自肥,所

以多以“超过所需量二倍以上”向地方征索。据估计，在1945年8月20日—1946年1月20日的5个月内，豫北三、四两区光为国民党正规军“代购”的军粮即达6 530万公斤，麸料66.5万公斤，柴草2 154万公斤，另外，地方团队和游杂部队又征索无代价军粮1 656万公斤，麸料105万公斤，柴草1 259万公斤，以致安阳、新乡等6县除将所产全部小麦交出外，还得再买178万公斤才能补足。

就这样，国民党政府还觉得搜刮不够。1946年6月，国民政府粮食部宣布，从7月1日起，全国恢复田赋征实，而且提高征额：田赋银1元征稻谷4斗，又征借2斗，再代征公粮30%，共9.2斗，较战前实际提高了4倍多。确定1946年度河南征实、征借额为420万石，省县公粮尚不在内。当时报纸评论称：“这样大的数目，千疮百痍的河南，即使人民不吃不喝的种地，也难凑足。”[①]除此之外，代购征购照样进行，还有“暂借”、“筹购”、“抢购”等名目。

农民的负担并不到此为止，还有：(1)军队额外勒派。如军鞋、军袜、电线杆、服装费、建碉堡、炮楼、兵房、挖壕沟(包括灰石、木料和出工)等，不一而足。(2)国民党、三青团机构以及乡镇公所、保办公所也都可以随便以各种名义向人民派粮派款，如自治捐、教育捐、救济捐、警伙公费、兵差费、车价费、修路费、剿匪费、区乡建设费、保甲长办公费、仓谷费、制服费、优待壮丁费、招待费、乡保人员训练费、国民党及三青团会议费等。

在经济上极尽搜刮之能事的同时，国民党政府还继续大抽壮丁——尽管当时全省劳动力已普遍严重缺乏。在抗战刚刚胜利的1945年秋，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为了准备发动内战，就在河南征兵10万人。1946年，国民党政府决定在全国抓补壮丁(18—35岁)50万人，河南一省分配征兵额10.2万(一说11.4万)人，接近全国总额的1/4，加上各支国民党军又随处额外加抽，所以各县实际抽丁量都很大。即使在民户不多的黄泛区，如扶沟县，当时只有遗民5万余，且多老弱

① 上海《大公报》，1947年3月1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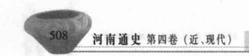
妇女，其中处于国民党统治区的不过 2 万余人，而分配的兵额却多达 220 名。许多农民因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大片土地因无人耕种而连年荒废。

国民党为巩固其统治，在全省大力组建地方武装，先将抗战时期各地游杂武装收编，大者收编于保安团、保安旅，小者留于地方，以之为基干组建县乡团队。1946 年 8 月，省府行政会议又决定，在全省各县组建“人民自卫团”，各县保安团一律改为自卫总队，县长兼任总队长。此种自卫团分基干（脱产）和后备（不脱产）两部分。前者由各乡强派壮丁和枪支拼组而成，如淮阳在 1947 年解放前，各保前后两次被勒派壮丁 20 名，商水每保派出壮丁 30 名，每名壮丁各带枪 1 枝、子弹 100 发，外带小麦 1 石，参加地方团队。国民党政府上述征粮、抓兵、组建地方武装、动员地方恶势力等举措，都是在河南连年遭灾的情况下开展的，结果就将 3 000 多万河南人民推到死亡线上。“娶个老婆保长的，打的粮食乡长的，生个孩子老蒋的，当官都是狗养的”——这些流传于民间的民谣，就充分反映出河南人民的悲惨处境和对国民党政权的刻骨仇恨。还在 1947 年，豫北中共地方组织在社会调查中就发现，过去对共产党、八路军抱着敌视态度的一般地主，居然提出：“宁愿让八路军斗光，不让中央（国民党）军住一天。”[①]连地主都说出这样的话，一般民众对国民党统治何等深恶痛绝，那就可想而知了。人们把坏事做绝的国民党统治形象地称做“琉璃（冰）江山”，这既是理所当然的诅咒，也是十分准确的预言，深刻地表明悖逆历史潮流和全国人民意愿而悍然发动内战的国民党政权业已陷入异常深重而且无法解脱的统治危机之中，尽管表面上还颇为“强大”，实际上已成为坐在火山口上的孤家寡人，苟延残喘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二）各地反暴政斗争

作为国民党统治危机的一种外部表征，是城乡人民蓬勃开展的爱

① 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 3 辑，文献部分（上），第 391 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



国民主运动和此伏彼起的反暴政斗争。

1946 年 12 月 24 日，北平发生了驻华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学生事件。事件发生后，由于国民党当局企图歪曲事件的真相，从而引发了北平爱国学生的抗暴示威。12 月 30 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5 000余名学生，高举“抗议美军暴行大游行”的横幅走上街头，在驻有美军的“军事调处执行部”门前，不断用英语高呼“滚蛋，美国军队！我们憎恨你们”等口号。

“12 · 30”北平学生抗暴示威的消息传出，河南学生群起响应。在中共开封地下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古都掀起了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潮。1947 年 1 月 4 日上午，在河南大学、水利专科学校两校学生自治会的领导下，万余人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走上街头，“驱逐美军出境”、“不准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口号响彻天空。游行队伍所经之处，集聚着大量市民，无不以热烈的掌声来回答学生的口号声。河南学生抗暴示威与全国各大城市学生的抗暴示威汇聚一起形成的抗暴运动，给美国政府和国民党当局以相当深重的打击。1 月 29 日，美国国务院宣布，结束美国与三人小组的关系，自军事调处执行总部撤退美方人员，同时撤退在华北的全部海军陆战队。这样就消除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进程中的一个潜在的障碍，蒋介石感到极为懊丧又无可奈何。

国民党政府连年搜刮巨额粮食，造成省内粮食奇缺，粮价狂涨。1946 年省内麦价麦收后较之麦收前不仅没有像通常年份那样相应下跌，每 100 公斤小麦市价反而从 3 800 元升至 6 000 元。许多靠工资收入生活的工人和公教人员生计难以维持，罢工、罢教不断发生，城镇出现抢米风潮。农村则民变屡起。为了加强对国统区工作的领导，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华中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等均向开封派出干部，建立中共地下组织，利用合法的方式，揭露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国统区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随之进一步高涨，并于 1947 年 5 月间爆发了又一次学生运动，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先是，河大教授会以物价飞涨，生活难以维持，于 4 月 26 日致电教育部，要求增加工资，南京政府置之不理。5 月 3 日，河大教授会再次

致电教育部:近旬以来,本市物价继续狂涨,教授们的月薪"尚不足维持个人生活,驯致各家山穷水尽,濒于断炊","爰经本会紧急大会一致决议,由即日起全体停教待命"①。教授的行动得到了学生的同情和支持。18日,河大学生自治会决定全校罢课、游行,声援教师,同时组织代表晋京请愿。当时,在北平、上海、南京等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城市,一场以学生为主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正在开展。国民党政府为镇压日益高涨的人民运动,5月18日发布《维护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10人以上的请愿、罢课和游行示威,教育部还电令各地严厉禁止学生运动,并要"查明滋事分子,分别从严惩处,为首的一律开除学籍"②。河大学生自治会虽与校方多次交涉,学校当局仍不允许游行示威,遂改用欢送晋京代表团的形式举行示威游行。

5月22日,由1 200多名河大校本部学生组成的欢送队伍,经寺后街、中山路,直奔车站。游行队伍的前边有一个大灯笼,以示国民党统治的黑暗;灯笼后边医学院的学生将两个教学用的骷髅挑在竹竿上,写着"成排的骨头,是谁赋予的!"游行队伍中,许多学生敲着饭碗,高喊"要饭吃,饿肚子!"沿途贴满了标语:"朱门酒肉臭,学生饿得瘦!""权门豪贵一席饭,穷苦学生半年粮!"③学生们还刷写了许多反内战标语,有的直指国民党最高当局。在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大门口写上"反对内战、反对饥饿、反对迫害"的大标语;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开封分社门口写上"放屁社""造谣社";将大南门东边墙上原有的"朱毛不死,大盗不止"的反动标语涂改成"蒋陈不死,大盗不止"④。有些标语还直截了当地提出"打倒蒋宋孔陈"。游行学生到车站之后,适值一列绿钢皮快车驶抵开封,学生立即用各种颜色的油漆毛笔在车厢内外刷写标语,"绿钢皮顿而成为花钢皮"⑤。学生的行动受到广大市民的支持,工人、

---

① 开封《中国时报、前锋报》联合版,1947年5月4日。
② 北平《益世报》,1947年5月20日。
③ 开封《民权新闻》,1947年5月23日。
④ 《河南文史资料》第3辑,第1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⑤ 开封《民权新闻》,1947年5月23日。



河南大学学生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游行

市民、小学生、店员，无不对他们报以掌声。一些商店玻璃上也写上“反对苛捐杂税！”

伴随着国统区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抗捐、抗税、抗粮斗争也此伏彼起。1946 年 7 月，新乡 800 名估衣商人联合抗交营业税和地皮捐；1947 年年初，开封 700 多名制馍工人，在中共开封地下党的领导下成立工会，向当局展开斗争，收回了被当局强占的工厂和欠款。1947 年 3 月，开封、郑州两地电讯局职员为要求提高待遇而罢工。洛阳县凹村农民群起驱赶地主，将其粮仓存米哄抢一空。类似事件在

各地不断出现，进一步加剧了国民党的统治危机。

二、中央突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对于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来说，不仅政治上完全陷于孤立，更要命的是军事上也接连失败，呈现江河日下的态势。国共双方军队经过一年的激烈较量，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基本变化。解放军的总兵力由战争初期的127万人增加到195.4万余人，其中晋冀鲁豫野战军28万人，晋冀鲁豫军区所属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豫皖苏5军区非正规军14万人，总兵力42万人，比战争开始时的27万人增加15万人。部队的火炮、机枪等武器装备大为改善，士气旺盛，军事素养提高，战斗力增强。而在国民党军方面，一年来被歼正规军78万人，非正规军约34万人。其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至370万人。作战中200多名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被击毙或俘虏，部队指挥能力下降。士兵厌战，失败情绪增长。1946年5月20日，豫北内战前线的国民党军低级军官写信给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说：我们这一群低级军官、吃不饱的丘八，对内战"愈想愈伤心"，总是期待着民主日子的到来。"政府的措置，我们只有愤恨，惋惜，我们更将以行动来抗议政府的口头命令……看吧，不久的报端，就有我们投降的消息。让我们的大刀来杀掉了孔、宋大财阀的头颅，来把国都迁到北平去，开始我们最民主最自由的前途。"①这封信表达了国民党军广大下级军官和士兵反对内战、渴望和平和民主、反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心声。国民党军虽貌似"强大"，但就河南来看，对国民党军不利的军事态势亦显现出来。虽然中原军区部队撤离了黄河以南地区，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收缩到了黄河以北地区，但由于国民党军在对陕北、山东两个战场继续实施战略进攻，并被拖在那里进退两难，其在东西两战场之间的鲁西南、豫皖苏、大别山区，直至豫西地区，兵力十分虚弱，形成两头粗、中间细的哑铃战略态势。

中共中央根据整个战局的发展情况，决定在战争的第二年，解放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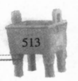
① 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没有枪声的战斗》，第11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①为此，还在1947年1月，中央军委就致电晋冀鲁豫军区领导人刘伯承、邓小平等，立即在精神上、物质上做好准备，以便在当年6月或更迟一点进行战略出击。此后，中共中央为了实现夺取中原的战略计划，作出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周密部署。三军配合是：由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中央突破，然后跃进大别山；由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自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由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率华野主力挺进豫皖苏地区，配合作战。两翼牵制是：以陕北解放军出击榆林，调动进攻陕北的国民党军北上；以山东解放军在胶东展开攻势，继续把进攻山东的国民党军引向海边，便利前述三军的行动。中共中央为挺进中原之后的需要，5月16日批准晋冀鲁豫中央局的建议，以邓小平、刘伯承、李先念等组成中共中央中原局，邓小平为书记。

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立即着手出发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一切准备就绪，6月20日、26日，刘伯承、邓小平发布《晋冀鲁豫野战军鲁西南战役基本命令》和《作战命令》，决心以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从东起张秋集（寿张县东）西至临濮集（濮县南）150公里宽的地段上强渡黄河，实施鲁西南作战。6月30日，各纵队均到达指定地点。当日晚，第一梯队8个旅，在强大炮火的支援和南岸部队的接应下，从今属台前、范县的林楼、孙口、李桥、于庄等8个渡口同时强渡黄河，仅用3个小时，便一举突破国民党号称能抵40万大军的黄河防线，蒋介石精心策划的"黄河战略"随之冰消瓦解。

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为使部队适应外线出击与内线作战的要求，7月2日决定，以太岳、太行、冀南、冀鲁豫军区部队主力及在黄河北岸休整的原中原军区部队，依次编成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29—1230页，人民出版社，1966。





刘邓大军夜渡黄河

十二纵队，分别陆续随主力南下或坚持内线作战。刘邓大军7月初发起鲁西南战役，至28日，共歼灭国民党军4个整编师师部及9.5个旅，共约5.6万人，收复了黄河南岸大片地区，解放了数百万群众。鲁西南战役的胜利，打乱了国民党军的战略部署，配合了陕北、山东两战场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作战，揭开了全国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

鲁西南战役结束前，7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为确保与扩大开始取得的战略主动权，决定改变原定的让刘邓大军依托冀鲁豫边区和豫皖苏根据地，逐渐向中原地区推进的部署，作出了不要后方，实行跃进式进军，先敌直出大别山，建立根据地，实施战略展开的决策。这是因为，大别山雄峙于民国首都南京与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国民党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是老革命根据地，有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广大群众和游击武装。人民解放军占据大别山，既容易立足生根，还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迫使蒋介石调动

其进攻山东、陕北的部队回援，实现刘邓大军进军中原的预期战略目的。8月7日夜，刘邓大军兵分3路南下，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11日夜到12日，大军从马牧集到民权间越过陇海铁路，13日进入豫皖苏解放区。接着又连克柘城、亳县、太康、淮阳。在鹿邑县西北玄武镇，转移至豫皖苏军区的中原独立旅，奉命加入南征军序列，走平汉路西，执行战略牵制任务。14日，刘邓命令大军向黄泛区开进。



步兵通过黄泛区

宽达20公里的黄泛区，遍地淤泥，积水浅者没膝，深处及脐，没有道路，没有人烟，行军十分困难。由于车辆在淤泥中难以挪动，一些炮只好拆散用人扛、抬、推、拉，部分过于沉重的榴弹炮和卡车被迫就地掩埋或炸毁，指战员克服重重困难，18日夜全部通过黄泛区，紧接着顺利渡过沙河。休整一天后，为先敌进入大别山，部队再次轻装，在"到达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口号鼓舞下，加速奔向汝河。

国民党军统帅部原先错误地判断，刘邓大军是想越过平汉线"西窜"，得知刘邓大军渡过沙河后，才如梦方醒，急忙改变部署，令罗广文兵团、张淦纵队、王敬久兵团加速追击，并将整编第八十五师运往汝河南岸，将整编第六十五师运至长台关，进行堵截。当刘邓率中原局、野

战军指挥部和第六纵队抵达新蔡西南汝河北岸时，敌整编第八十五师等部已在对岸之油房店、汝南埠（均属正阳）一带完成部署，罗广文兵团也已进抵新蔡县城北孙召乡，距汝河北岸仅30余公里。在前有阻师，后有追兵，中有大河横陈的紧急情况下，刘、邓亲到前线查看渡口，指示部队要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精神强渡汝河！24日凌晨，第十八旅（前卫旅）第五十二团在炮火掩护下勇猛强渡汝河，占据了南岸大、小雷岗；工兵连搭起了浮桥。到25日天亮，终于在河南岸打开了一条血路，当天下午，刘邓大军中路军4万人马全部渡过汝河。25日夜，第六纵队全部进达息县淮河北岸。时因河水陡涨，无法徒涉，国民党军追兵先头部队已到离渡口不足20公里的彭店（息县西北部），情况再度紧急。刘伯承亲乘小船手拄竹竿查看水情。发现上游有人牵马徒涉，即令部队马上从上游徒涉。27日，全军徒涉过淮河，胜利进入大别山，完成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任务。当国民党军追兵随之抵达北岸时，河水突然暴涨，深达丈余，洪峰奔腾咆哮，追兵无船可渡，只有望河兴叹。



刘邓大军徒涉淮河

对于占据大别山的重要战略意义，邓小平曾有精辟的论述，他指出："中原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正当敌人的大门，其中大别山是大门边……中原形势决定于两个山，一个是大别山，一个是伏牛山，敌人最关切的还是大别山，它比伏牛山更重要，中原要大定就要把大别山控制起来。大别山是一个战略上很好的前进的基地。它靠近长江，东面一直顶到南京上海，西南直迫武汉，是打过长江的重要跳板……大别山，敌人必争，我也必争。"①因此在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的当天，邓小平即起草了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以中原局的名义下发各纵队，并于30日上报中央军委。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时，国民党军主力尚被隔阻在淮河以北，大别山区敌军兵力极为空虚。为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刘邓将大别山区周围各县划为4个区，组成党的工作委员会，每区各有一个纵队负责。随后，第一纵队迅速在豫东南展开，主力挺进到罗山以南，光山、经扶以西；受第一纵队指挥之中原独立旅在完成西线牵制任务后，奉命东返，8月29日越过平汉路，兵临信阳；第二纵队进军鄂皖时攻占了潢川，推进到固始、商城一带；第六纵队进军鄂东时攻占了经扶。中原军区部队突围后，留在大别山坚持斗争的中共罗礼经光中心县委书记刘名榜得知消息，急忙带领游击队下山，几经周折，终于与主力部队取得了联系。由于经扶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局面很快打开，相继建立了一批区乡政权，扩充了游击队。经过艰苦战斗，刘邓大军到9月底共解放县城23座，歼灭国民党正规军6 200余人，建立了商城、光山、罗山、经扶（年底更名为新县）、潢川等17个县民主政权，初步打开了大别山地区的局面。

9月初，尾追刘邓的国民党军23个旅陆续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区，将多数兵力摆在平汉线及其东侧，阻止刘邓向桐柏山、大洪山地区发展；以一部兵力实行分散"清剿"，摧毁中共地方政权，使解放军失去立足之地。为打破国民党军的合围，10月初，刘邓遵照中央军委的有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99页，人民出版社，1994。

关指示并结合实际情况，决定以两个纵队留在商城、光山地区，伪装主力，迷惑敌人并开展地方工作；主力南下，寻机歼敌。8 日至 10 日，在黄陂东部和六安张家店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十八师第六十二旅等部，随后向黄冈至庐江间长江北岸沿江地带挺进，连克团风、浠水、广济、英山、武穴等长江北岸诸城镇。10 月下旬，在浠（水）广（济）公路上高山铺地区设伏，一举歼灭国民党军 1.26 万人，其中俘虏 9 500 余人。连续的胜利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斗争情绪，提高了部队进行无后方作战的信心，为进一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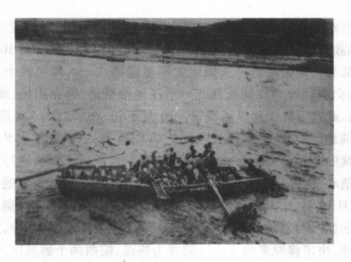
10 月 12 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发出《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解放区的指示》，号召部队和地方干部积极宣传《中国土地法大纲》，发动群众分田地，决定将原来的 4 个区归并为鄂豫、皖西两个解放区，建立两个区党委、行署和军区，废除保甲制度，普遍建立县、区、村三级民主政府。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每个旅抽出 1 个团，共 13 个团为两军区及军分区的基干武装，每个纵队抽调 1 000 至 2 000 名干部和老战士参加地方工作。到 10 月下旬，刘邓大军基本上完成了战略展开，创建了北起淮河，南到长江，东到无为、肥东，西迄平汉铁路，方圆数百里，人口 1 200万的大别山根据地。

三、两翼牵制——陈谢集团挺进豫西和陈粟大军挺进豫皖苏

按照中共中央为战略大反攻制定的“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精当部署，在刘邓大军实施中央突破、跃进大别山的同时，陈谢兵团也在晋冀鲁豫解放区人民的全力支持下，迅速完成了各项准备工作，向敌人守备力量薄弱的豫西进军。

陈谢兵团是由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第九纵队、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及第八纵队第二十二旅，共 29 个团、8 万余人组建而成，陈赓任前线委员会书记，谢富治任副书记，故亦称陈谢集团。8 月 22 日夜，陈谢集团在西起茅津渡东到下关阳长 150 公里的地段上发起渡河作战，24 日全部渡过黄河。国民党军自认为“万无一失”的河防顷刻瓦解。

陈谢集团渡河后，以一部兵力包围孟津横水，以一个旅袭扰洛阳，两个旅向洛阳以西进攻，以右路纵队奔袭张茅镇、观音堂车站。一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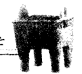


陈谢集团强渡黄河

内，连克新安、渑池、宜阳、洛宁等4座县城和观音堂车站及铁门（属新安）、石陵（属宜阳）、王范（属洛宁）等镇，共歼灭国民党军4 800余人，腰斩陇海铁路，在洛阳至陕县间展开，为开辟豫陕鄂解放区创造了条件。

陈谢集团南渡作战，完全出乎国民党军统帅部的意料。蒋介石急令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于8月27日开始将进攻陕北的主力整编第一、第二十九军自米脂、绥德南撤，拱卫西安，增援豫西；另以尾追刘邓大军的4个旅回援，连同原在洛阳的4个旅，组成第五兵团，李铁军任兵团司令官；以4个半旅组成陕东兵团，由谢甫三指挥，企图东西两面夹击陈谢集团。

8月30日和9月2日，中央军委根据敌情的变化，两次致电陈、谢，规定其作战范围，包括黄河、渭水以南，汉水以北，平汉路以西，西安、汉中线以东广大地区；作战原则是：对敌守备薄弱之据点及城市则坚决攻取之，对敌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又环境许可之据点及城市则相机攻取之，对敌守备强固之据点及城市则避开之，着重点放在调动敌人打运动战及占领广大乡村，消灭反动武装，发动群众，必须准备经过一个困难时期，逐步建立根据地。根据这些指示，9月2日起，陈谢集团



放弃对横水的围攻，以第九纵队在孟津、洛阳、新安一带阻敌西援，并巩固黄河渡口，以保障同后方的联系；陈谢率集团主力第四纵队、第三十八军和第二十二旅西进，发起灵（宝）陕（县）战役。

这时，为阻止解放军西进的国民党军陕东兵团一部已进至灵宝、陕县地区。陈谢根据灵宝、陕县的地势和敌军的防守态势，区分了各部的作战任务。9日、10日，第二十二旅击溃国民党军新编第一旅，攻占虢略镇并进至阌乡以南。10日，第十二旅等部攻占卢氏。11日，第四纵队主力围攻灵宝，守敌离城出击，第十一旅等部乘机发动反击，出城之敌遭全歼，13日夺取灵宝。此役生俘国民党军新编第一旅旅长黄永赞以下5 600余人，阌乡亦被解放军攻占，并向西逼近潼关。第四纵队主力回师并一举夺取陕县。在此期间，进至洛阳附近的第九纵队以第二十六旅留滞陇海路北，监视洛阳之敌并保护渡口，主力南进直插伏牛山腹地，先后攻克嵩县、伊阳等城镇，共歼灭国民党军7 000余人，牵制了国民党军第五兵团的西援，保障了主力在灵宝、陕县间的作战。

陈谢集团在灵陕战役后，以第九纵队在洛阳及其以南地区作战，主力西进，威逼西安。国民党军西安绥署主任胡宗南急忙于19日从陕北赶回西安，蒋介石也于20日飞抵西安，将刚调往大别山的整编第六十五师和晋南运城的整编第十师等空运至西安，以10个半旅在西安、潼关间布防，阻止陈谢集团西进；洛阳东部的第五兵团李铁军部则向新安、洛宁进犯。蒋介石为恢复郑州、西安之间的交通，10月中旬又从山东战场抽调整编第二十师到洛阳，连同原在该地的第五兵团等部共10个旅；在潼关地区集结8个旅，蒋介石以谢甫三指挥不力改由西安绥署副主任裴昌会任陕东指挥官，再次东西对进，夹击陈谢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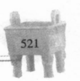
由于国民党军主力集中于潼洛之间，因而在陇海路以南、南阳以北、伏牛山以东、平汉路以西，其兵力就比较空虚。陈谢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发起伏牛山东麓战役，10月下旬，以一部进军陕南，主力分别向临汝、郏县、登封及鲁山、南召、方城出击。11月1日，克临汝，4日克郏县，守敌3 000余人被全歼，整编第十五师师长武庭麟以下2 000余人被俘。到5日，陈谢集团连克临汝、鲁山、宝丰、登封、叶县、南召、

郏县、方城等8座县城，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及保安团5 700余人。不过敌人不甘心失败，李铁军所部7个旅推进至宝丰、鲁山、郏县一带，裴昌会兵团8个旅也已进至卢氏、陕县以东地区，企图东西夹击，在宝、鲁、郏地区与陈谢集团主力决战。

11月8日，中共陈谢集团前委在南召县南召店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暂时避免与尾追之敌决战，以两个旅伪装主力，采取“牵牛战术”，向内乡、西峡口前进，吸引李铁军主力西援；主力则分别向舞阳和泌阳、临汝和登封等地区展开。于是，9日夜第二十五、第十三旅南下镇平。为诱骗敌军，他们虚张声势，布置疑兵，并于17日攻克镇平和镇平西北石佛寺。李铁军确认陈谢集团主力在南阳以西，于是令重建的整编第三师和第四十七师第一二五旅加速西追。第十三、第二十五旅由镇平西进，19日夜包围内乡县城，拉开了攻城的架式。待整编第三师等部风风火火扑向内乡时，两旅已主动撤围转进赤眉镇，把敌人引到夏馆镇、二郎坪（今属西峡）、西峡口，使其在伏牛山转悠了半个多月。

与此同时，陈谢集团主力以旅为单位在伏牛山东麓展开，先后攻克与再克临汝、鲁山、泌阳、唐河、桐柏等城镇。陈谢集团一面战斗，一面积极展开根据地建设，成立了中共豫陕鄂后方工作委员会、豫陕鄂边区行政公署及豫陕鄂军区，行署和军区驻鲁山，负责领导行署和地方部队的工作。自9月起，先后建立了8个地委、专署和军分区。根据地北枕黄河，南临汉水，东抵平汉路，西达秦岭东部商洛山，活动范围近10万平方公里。截至11月底，陈谢集团共歼灭国民党军5万余人，解放和一度解放了10余座县城，胜利地完成了战略展开，并有力地配合了刘邓野战军和西北野战军的作战。

与陈谢兵团同为“两翼”的另一翼——陈粟大军，9月下旬分别在内黄集、柳河、砀山、柳堤圈、马牧集越过陇海铁路，随后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以纵队、旅为单位迅速展开。到10月底，陈粟大军在豫皖苏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配合下，共歼灭国民党保安团及土杂武装1万余人，攻克和一度攻克尉氏、扶沟、鄢陵、西华等县城24座，基本上摧毁了国民党在这一地区的基层政权，在沙河以南又建立了3个地委、专署、军分



区，建立了一批县级政权，豫皖苏军区地方武装由2.5万余人发展到6万人。陈粟大军在陇海路以南、淮河以北、平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广大区域实施战略展开的任务圆满完成，中央军委三路大军挺进中原的战略格局牢固地形成。

陈粟大军挺进豫皖苏，对开封、郑州、徐州都构成了威胁。国民党军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集中6个整编师，分别组成机动兵团，采取"以攻为守"手段，依托平汉、陇海、津浦3条铁路机动转运兵力，尾陈粟大军纠缠。陈、粟为剥夺国民党依托铁路机动的有利条件，迫使其分兵守护交通线，削弱其黄河防御，以利于前后方联系，决定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集中7个纵队，编成3个集团对陇海路、津浦路实施大破击。



豫东人民大破陇海路

11月8日，陇海路破击战开始，在6个纵队及豫皖苏军区独立旅的掩护下，豫皖苏及冀鲁豫解放区许多村庄的农民，自带镢头铁锹，像潮水似的向铁路线拥去，参加破路。到17日，商丘东西150余公里的陇海铁路遭到彻底破坏，歼灭国民党军1万余人，攻克柳河等车站17个，攻克砀山等县城9座，威逼徐州，迫使国民党军匆忙调动15个旅增援，其中包括准备用于大别山区的8个旅，从而打乱了国民党军的部

署，推迟了其对大别山区的围攻时间。

四、国民党军在中原地区进攻的失败和中原防御体系的崩溃

国民党军统帅部把刘邓大军视为插入其腹心的尖刀，必欲拔除而后快，因而于1947年11月27日至12月28日，集中33个旅计80个团的优势兵力，对大别山区进行第一次"围攻"。为了便于统一指挥，特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所，国防部长白崇禧任指挥。他们采纳了前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设计的"三网"和"三光"政策，即谍报网、公路网、碉堡网，杀光、抢光、烧光，恢复和加强保甲制，企图以这种"总体战"的手段，使刘邓大军失去生存的空间。

为粉碎国民党军的围攻，中央军委命陈粟、陈谢两军在外线积极作战，迫使国民党军从大别山抽兵回援，直至粉碎敌人对大别山的进攻；敦促晋冀鲁豫军区尽可能地给刘邓大军以兵员、装备方面的补充。晋冀鲁豫军区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令第十、第十二纵队迅速南下大别山；令第十一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护送一批新兵和伤病痊愈归队的指战员及大批弹药、药品、银元到大别山。刘伯承、邓小平亦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大别山的形势，采取因应措施：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率野战军前方指挥所（简称前指）及第二、第三、第六纵队，配合军区武装，在内线坚持；刘伯承、张际春率中共中央中原局、野战军后方指挥所（简称后指）及第一纵队，向淮河以北展开；第十纵队向桐柏区、第十二纵队向江汉区展开。

在内线，第二纵队由文殊寺（光山西南）向东北转进，8日围攻固始，调动敌两个师北上救援后，即撤围向固始东南转移；于中旬在商城、固始间跳出国民党军3个整编师的合围圈，北渡淮河。当国民党军被吸引渡淮北进后，该纵队主力于1948年年初又南渡淮河，攻克光山，一直活动于淮河以南。第三、第六纵队在皖西、鄂东北以旅为单位，灵活机动地同国民党军周旋，使敌处处扑空，各纵队则寻机歼灭了一批国民党军和地方武装。鄂豫、皖西两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也配合主力进行了艰苦的反"清剿"斗争。到1948年1月，内线部队和地方武装共歼灭国民党军1.5万余人，收复太湖、广济等12座县城。



转入外线作战的部队，乘桐柏、江汉、淮西敌力量薄弱之机展开。12 月 5 日晚，第十纵主力在柳林强行通过平汉铁路，血战突破敌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张轸部谭家河（信阳西南）设下的重围，进入桐柏山区，但损失兵力 1 500 余人。12 月 13 日，根据中原局的指示，中共桐柏区党委、桐柏军区、桐柏行署在湖北应山县成立，十纵奉命改为桐柏军区部队。下辖 3 个地委、专署、军分区。经过一个多月的作战，先后解放桐柏、泌阳、唐河、新野、邓县等 6 座县城，建立了 18 个县级政权、102 个区级政权。与此同时，在湖北江汉地区，成立了中共江汉区委、军区和行署，第十二纵队改为江汉军区部队。到 1948 年 1 月，先后解放京山、天门等 5 座县城，建立了 3 个地委、军区、行署，开辟了以大洪山为中心，纵横 300 余公里的解放区。

随同中原局、野战军后方指挥部北上的第一纵队，12 月中旬渡过淮河，24 日攻克汝南后，入息县、汝南、正阳、确山等县活动，与进入上蔡、新蔡等县活动的豫皖苏军区独立旅等部互相呼应，第一纵队和豫皖苏军区还抽调、组织 400 多名干部深入各县，组织贫农团，开展土改斗争。淮西区的开辟，使豫皖苏解放区同鄂豫、皖西两区连成了一片。

此时，陈粟、陈谢两军为了配合大别山的反围攻斗争，在 12 月 13 日至 22 日继续对国民党军赖以快速运输部队的陇海路郑州至民权段、平汉路郑州至驻马店段，长达 420 余公里的铁路进行了大破击，攻克两路沿线的中牟、兰封、许昌、临颍、确山等城镇、车站 23 座，共歼敌 2 万余人。

国民党陆军总部郑州指挥部于是电令 4 个整编师沿平汉路南北对进，以图夹击解放军，重新控制平汉路。陈粟、陈谢两集团军协同作战，24 日，将进至西平南部金刚寺、祝王寨一带的国民党军第五兵团司令官李铁军率领的整编第三师分割、包围，到 26 日 19 时，除李铁军率少数人员逃跑外，余众全部被歼。两军乘胜南下包围确山。蒋介石怕退据该城的整编第二十师重蹈第三师覆辙，急调参与围攻大别山的 3 个整编师回援。粟裕等见目的已达到，撤出战斗。

这样，人民解放军三路大军内线外线密切配合，如所预期地迫使国

民党军先后从大别山调出 13 个旅来巩固中原地区的铁路线和大中城市，粉碎了其对大别山的围攻，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在中原已站稳脚跟，中央军委挺进中原的战略目标已胜利达成。

国民党军连遭失败，次年春被迫将其在中原的全面防御转为分区防御，将中原战区划分为 8 个绥靖区；另以主力组成 6 个机动兵团，总共 37 个整编师，连同非正规军共 86 个旅，66 万余人，其作战要旨是：保有津浦路，以平汉、陇海路作为分割中原人民解放军的"十字架"和伺机进攻中原解放军的依托，仍置作战重点于大别山区，使解放军不能在此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以巩固其长江防线，确保江南基本统治区的安全。

中央军委为了使中原解放区迅速获得巩固——这是整个南线胜利的重要环节，提出刘邓、陈粟、陈谢三军应协力打歼灭战，大量歼灭国民党军，粉碎其中原防御体系。随后又决定由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率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组成粟裕兵团，跃进江南，留在中原的第三、第八、第十纵队，由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指挥（称陈唐兵团或华野第三兵团），与陈谢集团统归刘邓指挥。三军协同在江淮河汉之间机动作战，彻底粉碎国民党军在中原的防御体系。

洛阳为陇海路中段重镇，地扼秦晋豫三省要冲，国民党军在城周构筑了许多永久性和半永久性的工事。守军为青年军第二〇六师，外加地方保安旅、团，总兵力 2 万余人，统由第二〇六师师长邱行湘指挥。

此时，由于西北野战军在宜川地区取得歼敌 2.9 万余人的重大胜利，胡宗南为确保西安，急令裴昌会兵团全部缩回陕西，这样，郑州至潼关间 400 公里地带国民党军兵力空虚，洛阳成了一座孤城。中央军委致电陈唐、陈谢，应夺取洛阳并准备歼灭可能救援之孙元良兵团。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心以速战速决的方式，在孙元良等援军到达前攻克洛阳，然后再伺机歼击援敌。先于 3 月 8 日，命第八纵队、第九纵队攻克偃师、新安、渑池、宜阳，控制了阻援阵地。9 日晚，担任攻城任务的第三、第四纵队向洛阳逼进，完成分割包围，并突入四关。11 日从四面对洛阳城发起攻击。激战到 12 日黄昏，除邱行湘指挥残部 5 000 余人退守西北运动场核心阵地固守待援外，



全城已为人民解放军控制。受蒋介石之命援洛的胡琏兵团自漯河、许昌赶来,13 日起逐次向洛阳推进。解放军在国民党援军到达前,即于 14 日集中各种火炮猛轰邱行湘据守的核心阵地,当夜即结束战斗,邱行湘被俘,共歼灭国民党军 2 万余人。等到胡琏兵团与孙元良兵团主力至 17 日逼近洛阳时,人民解放军才主动撤离。但过后不久,陈谢集团又于 4 月 5 日再克洛阳,偃师、巩县、汜水、荥阳也相继获得解放。许昌(4 月 7 日)、新郑(4 月 9 日)亦被陈唐兵团收复。洛阳战役的胜利,斩断了郑州与西安之敌的联系,增加了对该两城的威胁,扩大与巩固了豫陕鄂解放区,掩护了刘邓野战军主力休整,配合了西北野战军的作战。

人民解放军再克洛阳、许昌后,敌主力胡琏、张轸、孙元良三兵团集结于郑州至信阳平汉线及以西地区,豫西南只有第十三绥区所辖整编第九师及地方团队。4 月 16 日,中央军委电示刘、邓等,你们“新行动方向是豫西南、鄂西、鄂西北以及整个汉水流域”,陈唐、陈谢两兵团“首先夺取宛西四县,然后出汉水”①,调动平汉线以东之敌西进,以利粟兵团南下。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刘伯承、邓小平于 4 月 20 日下达《关于宛西战役的部署》,决定由陈赓统一指挥第二、第四纵队及华野第十纵队、桐柏军区部队,进行宛西作战。

宛西四县指邓县、镇平、内乡、淅川,位于豫陕鄂三省交界处。自别廷芳等实行地方自治以来,封建势力甚为固结,拥有保安团 28 个,统受第十三绥靖区司令官指挥。5 月初,人民解放军参战各部采取远距离奔袭手段,迅速包围并解放了邓县、内乡、镇平、淅川等城。15 日至 17 日,攻克湖北光化、老河口。与此同时,担任牵制任务的陈唐兵团再次收复许昌,第九纵队等部收复荥阳、密县,歼灭孙元良兵团第一二七旅大部。18 日战役结束。共歼敌 1.2 万余人,解放了南阳以西广大地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豫陕鄂解放区。

至此,解放军在中原地区打大规模歼灭战的条件已基本具备。中

---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4 卷,第 452 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共中央经过与陈毅、粟裕及中原局、华东局审慎研究后，决定粟兵团暂不渡江南进，由粟裕指挥华野7个纵队，在陇海路汴、徐段及其南北地区，以寻歼邱清泉兵团为主要目标，完成渡江准备，同时抽出10个营，附以地方干部，陆续先遣渡江，分布广大地区，发展游击战争。为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于5月12日到达濮阳，进行战前动员，并与陈毅、粟裕等研究了南下作战方案。5月24日，先由陈唐兵团由许昌向淮阳方向进军，迫引驻在鲁西南的邱清泉兵团向太康、淮阳方向前进，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乘机于5月30日、31日南渡黄河，加入了逐鹿中原的战场。

为了统一三军的作战指挥和适应建设中原解放区的需要，5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决定：除华中解放区现辖境地外，凡陇海以南长江以北直至川陕边均属中原解放区。中原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在中原局下成立豫皖苏分局，以宋任穷为分局书记。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陈毅为军区及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李先念为军区及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陈毅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宋任穷为副政委。中原军区下辖鄂豫、皖西、豫皖苏、豫西、桐柏、江汉、陕南7个军区。中原野战军由刘邓大军和陈谢集团编成，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九、第十一纵队。华野陈唐兵团（第三、第八纵队）归中野指挥，中野第十一纵队归粟裕指挥。这样，就形成了中原地区的指挥中心，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在中原地区的战略反攻进入了新的阶段。

5月24日，中原野战军为配合粟兵团南渡黄河寻歼邱清泉兵团，决定发起宛东战役，以3个纵队组成东兵团，陈锡联指挥，佯攻确山，吸引位于临颍一带的胡琏兵团南下，并准备迎歼可能由南阳地区东援的张轸兵团；以3个纵队和桐柏军区主力及豫西第7军分区部队组成西兵团，陈赓指挥，准备由西向东配合东兵团夹击由南阳东援之张轸兵团。于是，东兵团进汝南，占驻马店，27日以浩大的声势包围确山。国民党军统帅部为确保平汉路南段安全，急令整编第二十八师主力于正

阳就近向确山增援，令胡琏兵团迅速南下，张轸兵团星夜由南阳东援。张轸所率3个整编师于28日晚进至社旗镇南埠口一带，即被第四纵队扭住。刘、邓复令东、西两集团主力全力对进，围歼该敌。张轸害怕被歼，决心西退南阳，却向东佯攻，以制造假象，于31日拂晓向西逃走，中午退至社旗西桥头一带。西集团当即追击，于刘马营、连庄地区歼敌6 000余人，但张兵团主力大部漏网。宛东战役历时10天，共歼灭国民党军1.2万余人，完成了策应粟兵团渡河南进的任务。

粟兵团渡过黄河进入鲁西南后，国民党军统帅部急令邱清泉兵团等部进入鲁西南。粟裕等鉴于敌在鲁西南的兵力已达9至11个整编师，且队形密集，不易分割，6月15日决定发动豫东战役，"首先以主力一部从敌侧后开刀，夺取敌守备兵力比较薄弱而又处于敌人防御要害部位的开封，待围歼开封守敌后，再集中兵力于运动中寻歼来援之敌的一路"①。

开封是河南省会，守军为整编第六十六师第十三旅及2个省保安旅等部，另有3个保安团，共3万余人，并在城内外修有大量防御工事。陈唐兵团于17日晨逼近开封，经过激烈战斗，18日晚，即由宋门、小南门突入城内，随后又突破大南门和西门，攻占了省政府，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用鸭血涂抹全身，装成一个受伤的老"教授"，由他卫士的老婆扮作女儿，爬上一辆独轮车，混在疏散群众之中溜出了开封。到20日23时，除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辛率残部近万人退守核心阵地龙亭和华北运动场外，其余阵地全部被解放军攻占。6月21日，蒋介石飞抵郑州，亲自指挥部队增援开封，并出动各型飞机473架次对开封城内外不分昼夜狂轰滥炸，许多市民被炸死，仅开封女师就有400多人死于炸弹之下。激战至22日晨，解放军全歼守敌。开封解放。

此役连同阻援在内，共计毙伤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辛以下1.6万余人，生俘第六十六师参谋长游凌云以下2.3万余人，缴获各种

---

① 粟裕等:《陈粟大军战中原》，第1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

火炮197门①。



人民解放军占领河南保安司令部

攻克开封，是人民解放军在关内第一次攻克的国民党军据守的省会，国民党统治集团大为震惊。南京、上海等地舆论大哗。蒋介石为稳定人心，严令邱清泉兵团和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加速向开封前进；另以进至柳河地区的整编第七十二、第七十五师（附新编第二十一旅）组成一个兵团，由第六绥靖区副司令官区寿年指挥，由民权向南经睢县、杞县迂回开封，以求重占该城，并迫使华东野战军决战。

粟裕、陈士榘等分析敌情后，提出放弃开封、在运动中寻机歼灭区兵团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26日晨，华野撤出开封，向通许方向转移，邱清泉、刘汝明部遂于当日重占开封。邱随即以主力直趋通许方向，实施尾击，与行至睢县西北的铁佛寺、龙王店、榆厢铺地区的区寿年兵团之间出现40公里的间隙。27日，粟裕下达了围歼区集团的命令，以4个纵队立即对区兵团实施合围，并予以分割。担负阻援任务的4个纵队，在杞县及其以西齐寨、高阳集一线构成阻援阵地，隔绝了邱、区两兵团之间的联系。战至7月2日凌晨，区兵团部和整编第七十

① 开封市博物馆：《开封战役资料选编》，第116、11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



五师师部被全歼，区寿年和第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年被生俘。后因敌黄百韬、邱清泉兵团纷纷突进，到达民权西部和宁陵以西地区，南线胡琏兵团、吴绍周兵团也已过商水正向太康急进，而华野经连续作战，部队减员较大，需要休整、补充，因而7月6日粟裕等下令撤出战斗。

豫东战役国民党军投入总兵力约25万人，另有3个兵团由南增援。人民解放军投入约20万人，另有中野4个纵队阻援。这是战略反攻以来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在中原战场上进行的一次大规模会战，连同阻援在内共歼灭国民党军9.4万余人。连续的胜利，改变了中原和华东战场的战略态势，从此，在中原战场，国民党军完全失去了对人民解放军发起战役性进攻的能力。

接着，中原野战军又发起襄樊战役，敌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著名特务头子康泽及中将副司令官郭勋祺等被活捉，共歼灭国民党军2.1万余人。

这样，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经过一年的艰苦作战，在中原地区共歼灭国民党军30万余人，摧毁10个行政专署、100多个县政府和大批乡政权，建立了北起陇海路、南至长江、东达徐州至巢湖一线、西迄沙市至安康一线的中原解放区，面积达23.74万平方公里，人口3 000万，有城市72座。攻克了坚固设防的洛阳、开封、襄阳等重要城市。国民党军用以分割中原人民解放军的“十字架”被完全破坏，其苦心经营的中原防御体系也彻底崩溃，只能孤立地守备着安阳、新乡、开封、郑州、商丘、信阳、南阳等城市，绝大多数县都已解放，未获解放的城镇也处于人民解放军及地方武装的包围、监视之中，常常一夕数惊。留在这一地区的虽然还有孙元良、黄维、宋希濂、张淦等4个机动兵团，但他们既要阻挡人民解放军南下，又要随时准备东调徐州参战，已是捉襟见肘，左支右绌。各据点的守备兵力，更是十分薄弱，如郑州仅1.1万余人，安阳1.4万人，新乡近2万人，即便是省会开封，除第四绥靖区刘汝明一部外，便是由地方团队拼凑起来的5个省保安旅。各绥靖区兵力更弱。而中原解放区则日趋扩大和巩固，使这一地区由国民党进攻晋冀鲁豫等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

基地。国民党政府的垮台已为时不远了。

五、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

1947 年夏，中共中央《五四指示》发布一年后，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要求解放区更加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制度的改革，以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支援解放战争。为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1947 年 7 月 9 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 月 10 日颁布实施。《大纲》明确宣布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是中共中央自 1938 年以来第一次重新宣布废除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推动了各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发展。晋冀鲁豫、中原解放区都认真贯彻执行，土地改革运动在中原大地广泛开展起来。

豫北各县为贯彻土地法，都抽出一批区、村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乡村进行土地改革。土改工作队严格执行党的有关政策，纠正了各地曾一度出现的"左"的倾向，对中农进行补偿，对地主、富农给以安置，最后颁发土地证，确定地权。经过土地改革，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政策觉悟空前提高，"翻身农民踊跃地参军，作为部队的战士，对部队起团结与提高士气的作用"①。农民对政府更加关心和信赖，基层民主政权得到巩固，农村经济也进一步得到恢复、发展，人民解放战争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援。

中原解放区除豫皖苏部分区域为老区外，豫鄂、桐柏、豫陕鄂（豫西）等区大部分属于新区。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经过近一年作战，1948 年 6 月，在中原地区开辟了近 2 000 万人口的控制区和 1 000 万人口的游击区。由于这些地区存在着严重的封建剥削，广大农民在饥寒交迫中挣扎，而国民党在乡村的统治日趋严密，"保甲、党员、特

---

① 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 3 辑，文献部分（上），第 507 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



务、军事、文化结合一体"[1]，对抗革命。加上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中原区基本上是无后方作战，而且大部分地区处于拉锯状态，军需供应和后续力量往往跟不上，因此不少干部希望尽快完成土地改革，好以此把群众发动起来，建立牢固的根据地，使革命战争有可作依托的后方。在这种情况下，中原局发出《关于进入大别山后地方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各部队把土地改革当做必须迅速实现的基本任务，立即放手发动群众，普遍地分浮财，"当天到，当天分"。因此，各地普遍出现急性病，部队每到一个地方，就把地主富农的粮食、财物、土地等，全都分给群众。有时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不敢接受，干部就亲自挨家挨户送到家去，可是部队一走，又被地主夺回。在"一手拿枪，一手分田，打到哪里，分到哪里"的口号下，有些地方搞"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在桐柏区有的干部觉得提"半年赤化桐柏"是右倾，提出三个月、甚至一个月达到"赤化"（即完成土改）。群众将这种急风暴雨式的土改运动称为"急性土改"。通过土改，豫皖苏区有421万农民、豫陕鄂区有170万农民分得了土地，桐柏区也有100万人口的地区进行了土改。但因政权尚未巩固，群众怕变天，出现了分给土地不敢要，要了土地不敢耕种的现象。因此，这种土改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

中共中央中原局对土改中的"左"倾错误有所察觉并进行了纠正。中原局书记邓小平1948年年初向党中央的几次报告中，均报告了新区土改中急性病的危害，提出应区分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政策进行土地改革的意见。中共中央对土改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也非常重视，并及时进行了纠正，同时规定了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中原局立即贯彻中央指示，于6月6日发布了《中原局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土改和整党工作指示的指示》，《指示》从12个方面深刻地总结了过去土改工作中所犯急性病的教训后，明确提出"全区应即停止分土地，停止打土豪分浮财，停止乱没收，禁止一切破坏，禁止乱打人、乱捉人、

① 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中原解放区》，第3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乱杀人等等现象”①。就是已经分过土地的地方，也应根据中央的方针，分别地实行调整。《指示》将中原解放区划分为控制区、游击区、崭新区三种类型，提出了调整各方面工作的具体意见。



解放区人民热烈拥护《土地法大纲》

中原各解放区对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都认真地进行贯彻，纠正了土改中的“左”倾错误。中共桐柏区党委召开各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结合本区的实际，总结急性土改中的表现以吸取教训。桐柏行署发布布告，规定在未进行土改的地区进行调整土地，以达安居乐业。财政政策方面，政府与军队停止对地主、富农直接没收和捉人罚款的办法，改为粮款征发。1948 年夏开始按累进税率征收农业税和工商税。新政策执行后，不但增强了民众对共产党的信任，而且也使解放区的财政得到好转。以桐柏区为例，1948 年夏季前实行筹粮，全区完成 524

①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第 118 页，人民出版社，1994。

万公斤;6 月开始征收公粮,夏季完成 3 500 多万公斤,秋季近 3 500 万公斤,农民缴实物可以折抵公粮,计征布 15 万匹,棉花 5 万公斤,鞋 17 万双;工商业税收完成 1 亿多元(中州币),全区军、政人员的吃饭、穿衣问题基本上做到了就地自给。

第四节　国民党在河南统治的终结与人民政权的建立

一、中原解放区的发展壮大与国民党政权的覆亡

1948 年夏成立的中原军区暨中原野战军,到当年 8、9 月间,野战军已发展到 7 个步兵纵队共 30 个旅约 15 万人,军区部队发展到 21 万人。各军分区、县都建立有基干团,区有区干队。各级党、政、军机关都十分重视发展地方武装,豫皖苏中央分局指示各地地委在组建地方武装时,必须以觉悟的工农劳苦大众为基础,并吸收一部分革命的知识分子参加,以保证其阶级性,并确实为共产党所领导掌握,可以有"三三制"政权,"但绝不容许有'三三制'的武装"[①]。

解放区政权建设亦有很大进展。刘邓大军南下时,就有一批干部随军南下,从事地方工作。1948 年 6、7 月间,刘杰、金明又先后率领 5 000余人的干部大队到达中原解放区。这些干部的到来对解放区的政权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各级政权本着精兵简政的原则,行署一般设 2 处 7 科,干部、杂务人员百人以内;专署设 6 科,职员 40 余人;地委机关 50 人。县以下政权机关人员编制,各区不尽相同。桐柏区规定县政府设正副县长各 1 人,下设秘书室、总务股、民政科、司法科、财粮科、银行公商办事处、公安局,配备干部 46 人,勤杂 15 人;区(镇)公所编制 10 人,乡政府编制 5 人。各解放区还就民主政权的选举、监督等作出

① 河南省档案馆、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豫皖苏边区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 183 页,1984(内部资料)。

规定,以充分体现人民的权利。到1948年12月,中原解放区共建立7个行署、34个专署,建立10个市、208个县级、1 263个区级政权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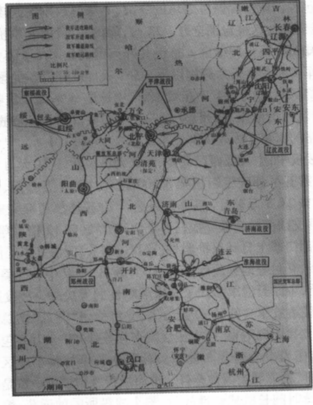
解放区为迅速恢复工商业经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保护民族工商业不得侵犯,实行营业自由与公平交易,统一税种、税率,发放生产贷款,扶植、恢复手工业作坊,组织山货运销等,使社会迅速稳定,人心安定,生产发展,经济繁荣。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经过两年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264.14万人,到1948年6月,国民党军总兵力下降为365万人,其中正规军约198万人,而能部署在第一线的仅有249个旅(师)共174万人,且大多是被人民解放军全歼后重建或重创后补充起来的,兵员素质低下,战斗力不强。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则进一步壮大,总兵力发展到近280万人,其中野战军149万人;装备也有很大改善,部队的军事技能和战略战术水平不断提高,具有了进行更大规模歼灭战的能力。从河南来看,国民党中原防御体系崩溃以后,不仅在军事上完全处于劣势,而且在政治上也陷入深重危机。8月16日,蒋介石在各实力派的争夺下,任命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兼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张轸为河南省政府主席,而让张将原来指挥的部队全部交出,分别编入黄维、宋希濂兵团。9月张轸到开封上任,供他指挥的仅有5个保安旅,于是就在10月初将省政府迁至信阳。

为发展全国的革命形势,中央军委决定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仗,并电示华东野战军准备攻克济南。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部署,华东野战军于9月16日发起了济南战役。为了确保战役的胜利,豫皖苏军区部队对陇海路中段柳河至兰封间进行破击,并攻占了民权县城和内黄集、野鸡岗车站;中原野战军在南阳、确山间,许昌、漯河以西地区及大洪山、桐柏山广泛出击,10天收复卢氏、泌阳等6城,牵制了华中国民党军,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华东野战军攻济打援作战。24日,济南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军被消灭10万余人。

济南战役后,国民党军统帅部为加强徐州地区的防御,决定缩短防

① 申志诚:《中原解放区》,第22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战略决战示意图

线，遂于10月6日将第十六兵团孙元良部由郑州地区全部东调，其防区则由第十二绥靖区部队接替。第十二绥靖区司令部遂由新乡南移郑州，守军仅有1.1万余人。据此，正在精心组织淮海战役的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中原野战军首长，即速部署攻击郑徐线，牵制东进的孙元良兵团，以配合华野进行淮海战役。中原野战军前委遂决定，由刘伯承、李达指挥2个纵队，继续在豫西牵制黄维、张淦兵团，由陈赓、陈锡联统一指挥4个纵队及豫西、豫皖苏区武装，在华北野战军第十四纵队配合下发起郑州战役。

10月19日，中原野战军攻郑部队开始行动，22日拂晓完成了对郑

州的四面包围。业已成惊弓之鸟的守敌，不等解放军发起攻击便弃城北逃，至老鸦陈地区被包围全歼。23日，邙山头、黄河北岸桥头守敌亦被消灭。郑州战役胜利结束。是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1万余人，生俘第九十九军少将参谋长余辉庭以下9 562人。驻守开封的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部队闻讯，于24日弃城东窜，中原野战军第二次收复开封。至此，河南境内的洛阳、郑州、开封三大中心城市均获得解放，平汉、陇海两大铁路的枢纽亦为人民解放军掌握。

郑州战役中，中共豫西区党委、军区动员民兵、民工大力支前，军区分配第四、第五军分区组织担架3 300副、白面19万公斤、小米11.5万公斤、硬柴23.5万公斤、谷草5万公斤①，各县都超额完成了任务。如荥汜广县支前面粉超额完成任务7倍，柴草超额12倍。郑州市的铁路、邮电等部门职工自动保护器材，郑州一解放，便恢复了工作。

在郑州、开封等地解放后不久，11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部署的淮海战役开始，中原野战军参加了这次战略性的大决战。战役进行到12月6日，人民解放军共歼敌30余万人，并将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集团（第二兵团邱清泉、第十三兵团李弥等部）20余万人包围在永城东北以陈官庄为中心南北5公里、东西10公里的狭小地区内。1949年1月10日，杜聿明集团被全歼。淮海战役胜利结束。这是一次参战人员多、持续时间长的战略性战役，整个战役所需的弹药、粮食、副食、木柴、草料等数量极大，这些物资都需要征集并转运前线，前线的伤病员又需要抢运至后方救治，而当时除有少量的汽车运输外，主要依靠人力来完成。为了夺取这次战役的胜利，1948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发出《关于全力支援淮海战役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党全军及所有机关、学校、医院、企业等全体人员集中一切人物、物力、财力，高度发挥各人的积极性与智慧，争取此次决战之完全胜利；责成各级党委加强支前机构与支前工作，授权支前机关全权征调粮草与民夫担架，保证一

---

① 郑州军分区《郑州军事志》编辑室：《郑州战役资料选》，第2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切作战需要[1]。根据中原局的指示,离战区最近的豫皖苏分局成立了后勤司令部,桐柏、豫西等区及各专区、县普遍设立了支前组织,组织解放区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线,形成了一个气壮山河的支前运动。

一是抢修公路、铁路,保证行军及运输的需要。郑州解放后第三天,便有2万多名铁路员工和民工开始抢修平汉、陇海两路桥梁,到12月初,修复铁路88公里、大小桥梁42座,陇海路洛阳至开封段通车。为保证公路运输,中原解放区开设了两条公路运输线,河南境内每天都有几十万民工抢修公路。二是运输作战物资,转运伤病员。在商丘的总兵站,华东、华北、中原各解放区运来的物资都集中在这里,炮弹、炸药、粮食、服装堆积如山。这些物资基本上要靠原始运输工具拖车、手推车甚至肩扛运往前线。据不完全统计,雪(永城)商亳县出动担架7 030副,出动大小车及手推车7 100多辆,牲口2.04万头,支前及运输民工66 219人,修路民工18 850人,扛面民工8 577人。共转运伤员8 790人,运送粮面252万公斤,修路145公里,设转运站8个,接待伤员2 064名。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曾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三是支援粮食等物资。为供应前方需要,各县、区、乡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动员,组织农民磨面、碾米、做军鞋。据不完全统计,豫西区共支援粮食1 370万公斤,柴、草600万公斤,军鞋79万双;桐柏区支援棉布15万匹,棉花5万公斤,军鞋17万双。四是担任战勤服务。靠近战区的雪枫(即永城)、夏邑、商丘等县的群众在战役的第三阶段,为帮助解放军修工事围困杜聿明集团,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摘门板、扒屋子、砍树木,仅雪枫县陈集区送到前沿阵地的檩梁就有3 000根,门板3 000副。豫皖苏、冀鲁豫两区许多民兵随军作战,担负警卫物资、看押俘虏等任务。

淮海战役的胜利,为解放大军渡江作战创造了条件,也加速了全省解放的步伐。

1948年11月初,被中原野战军牵制在豫西南山区的国民党军黄

---

① 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中原解放区》,第28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中原人民为淮海前线运送物资、弹药

维兵团，东调徐蚌地区，参加淮海作战，南阳各地都暴露在人民解放军攻击之下。11月4日，国民党军第十三绥靖区（南阳）司令王凌云率部弃城逃离，南阳遂宣告解放，桐柏解放区和豫西、陕南连成了一片。在人民解放军强大兵力的震慑和打击下，到1949年年初，除豫北安阳、新乡，豫西灵宝，豫南确山、信阳等几个孤立的城市外，全省已基本获得解放。

淮海、平津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第四野战军南下途中附带扫清安阳、新乡及豫南信阳之敌。1949年3月下旬，参加渡江作战的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进抵豫南。此时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为确保武汉，早将豫南正规军撤离，人民解放军以破竹之势，围歼豫南国民党军残余部队，先后解放了光山、息县、罗山、驻马店、确山、正阳等，军锋直逼国民党军在豫南最后据点信阳。信阳原是河南省政府和第五绥靖区署所在地，省政府主席兼绥靖区司令官张轸，将10个保安旅扩编为两个军，此时，大部随张轸南撤，守军仅有第一九七师及地方保安团。4月1日，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军分3路向信阳城发起攻击，迅速解放该城。

豫北地区，尚有国民党军两个孤立据点安阳、新乡。4月17日，第

四野战军第四十二军4个师以奔袭动作完成了对安阳守军的包围，到27日，肃清全部外围据点，逼近护城河。5月6日黎明，各部冲入城内，全歼守敌。新乡国民党守军第四十军副军长李宸熙在安阳被围后，派人向华北军区第七十军表示愿经过谈判接受改编。为了迫敌接受改编，四野第四十七军3个师受命合围新乡。在人民解放军军事压力与政治争取下，5月5日，新乡守军在和平改编协议上签字，6日出城接受改编。至此，豫北全境获得解放，打通了平汉路，华北、中原地区连成了一片。

至此，河南国民党军的据点仅剩豫西灵宝一处孤城。据守该城的豫西行署主任兼国防部第三纵队司令刘希程，见自己已处于解放军包围之中，遂决定起义。5月20日至24日，西安至潼关相继被人民解放军占领，刘希程决定6月10日起义，因所部态度互异，发生争战，起义部队撤出灵宝。随后，河南军区陕州军分区部队一举夺回县城。至此，河南全省均告解放。

在河南各市县陆续解放时，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率由保安旅改编的两个军避处信阳。他既想支持桂系"划江而治"，又想同共产党谈判组织起义。但因所部几位高级将领坚持反共立场，致使起义一再延误。1949年春节前夕，省政府曾一度南迁武汉，后见人民解放军并没南下，又迁回信阳。3月下旬，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进抵豫南，省政府迁逃武昌，成为真正的流亡政府。4月下旬由省政府秘书长罗震率领全体职员流迁至湖南衡阳。

5月15日，张轸到金口的第一二八军军部，率该部2万余人起义（后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一军）。6月24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第五绥靖区副司令官兼第一二七军军长赵子立代河南省政府主席。赵设流亡政府于衡阳，5月下旬又流亡至广西桂林，租居民房，苟延残喘；9月初迁逃至重庆，人员已所剩无几。11月24日，赵子立在川东宣布起义，河南省流亡政府也寿终正寝。

二、中原临时人民政府的成立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解放区面积成倍地扩大，原来分散

的根据地，逐步连成大片，形成了西北、华北、东北、中原等大解放区。除华北外，其他各解放区都先后成立了大区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各该地区的政务工作。

在中原解放区，如前所述，1948 年间政权和其他各项建设已全面开展，并取得很大的成绩，开始走上了大规模进行建设与社会改革的新时期。为了领导全区人民有组织地支援解放战争，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完成大规模的民主改革与社会改造的重大任务，客观上迫切需要建立一个能统一各地方政权，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并具有高度效能的全区性最高人民政府。于是，中共中央中原局于 11 月 20 日向中原各界人民发出关于召开中原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建立中原临时人民政府的建议书，并推举中原局第三书记兼中原军区第一副政委邓子恢等 5 人组成“中原区临时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建议发出后，立即得到全区人民的拥护。1949 年 1 月 1 日，筹备委员会宣告成立，邓子恢被推举为筹委会主任。

1949 年 1 月 2 日，筹委会制定并公布了《中原临时人民代表会议代表选举办法》，确定了代表名额及选举方法。选举办法明确地把“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卖国独裁，拥护民主，赞成民族独立和土地改革政策”[①]，列为代表的首要条件。这是对解放战争初期所沿袭的抗日战争时期确立的民主选举的各项原则和制度（如在选举中贯彻“三三制”等）的重大改变。

3 月 3 日至 6 日，中原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在开封召开，出席代表 81 人。中原局代表李雪峰就中原全区今后由全力支援南下战争逐步走向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转变阶段中之施政方针提出建议。代表们就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剿匪等工作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通过了《中原临时人民政府组织大纲》，确定“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以支援前线、发展生产、整顿财政为今后三大中心工作”[②]。大会选举刘伯承、邓子恢、李先念等 21

① 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中原解放区》，第 341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② 开封《中原日报》，1949 年 3 月 10 日。



人为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委员。7日，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举行第一次委员会议，选举邓子恢为政府主席，吴芝圃、李一清为副主席。根据《中原临时人民政府组织大纲》的规定，政府下设民政、教育、财政经济、农业、交通、公安、司法7部及中原人民法院、中州人民银行、秘书厅等部门，并由第一次委员会分别任命了各部部长、法院院长、银行总经理及秘书长。会议重新划分了中原行政区划，原豫皖苏、豫西、桐柏三行署撤销，皖、苏部分划归华东区，中原区辖鄂豫（潢川、光山、新县、商城、固始、息县、罗山属）、江汉、陕南3行署，陕州、洛阳、郑州、许昌、南阳、汝南、商丘、淮阳、陈留等9个直辖专署，开封、郑州两个直属市。战争年代设置的边区县撤销，恢复原区划建制。9个专署共辖78县（汜水、广武合并为成皋，增设栾川）。这些决定标志着分裂割据的战争状态已经结束，政权建设走上统一。《中原日报》发表社论，盛赞中原临时人民政府的诞生"是中原全区自国民党反动统治下解放出来政治上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是即将正式诞生的全国新民主主义政权的一个组成部分"。社论号召全区人民"在'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口号下，进行一个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与社会改革工作，有效地支援前线，有效地将中原全区建设成为一个繁荣而巩固的革命战争后方"[①]。

1949年春，中原学生联合会、中原妇女联合会筹委会、中原青年联合会筹备会、中原教育联合会筹备会、中原教师联合会等人民团体相继成立。这些团体都自觉接受中共的领导，"为驱逐美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消灭封建势力而斗争"，领导、组织各界群众支援战争，"拥护将革命进行到底"，同时积极"参加人民民主政府的各项建设事业，建设新中原"[②]。

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成立时，各路野战军即将渡江作战，第四野战军大部由河南经过，临时政府狠抓了支前工作，县以上设支前司令部，区村设支前指挥部，动员全区人力、物力、财力，全心全意、全力全面支援

---

① 开封《中原日报》，1949年3月10日。

② 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中原解放区》，第35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郑州人民冒雨欢送人民解放军过郑南下

南下大军。据不完全统计，河南人民在支援渡江作战中共供给解放军粮食7 000多万公斤，柴草5 000多万公斤，动员民工218.5万余人，出动各种车辆近15万辆，船1 500余艘。

5月8日，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召开第二次政府委员会议，会议总结了临时政府成立两个月来的工作，并决定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成立河南、湖北两个省政府。

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以破竹之势，迅速摧毁了江南国民党残余部队和政权。原中共中央中原局主要领导大多随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第四野战军则进入华中。5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各中央局、大军区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5月12日，中央决定建立华中局（12月改称中南局），6月3日决定成立华中军区（12月改称中南军区），中原局、中原军区同时撤销。林彪、邓子恢、叶剑英分任华中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林彪任华中军区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议决建立中

南军政委员会，统辖河南、湖北等6省人民政府，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撤销。1952年11月，根据中央决定，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一律改称行政委员会，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在各地区领导与监督地方人民政府。1954年各大区行政委员会奉命撤销。

中原临时人民政府的成立，在较大范围内统一行政权力，克服原来小块根据地各自为政的分散状态，政令的统一和集中，为支援革命战争，解放全中国创造了条件。临时政府制定了许多新的政策、法令，对于中原地区的政权、经济、文化教育、财政、交通等事业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三、中共河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的成立

中共河南省委1938年11月撤销后，因河南分属豫北、豫东、豫西等几块根据地，各地党组织均分属各根据地(解放区)党委领导，没有全省统一的组织。1949年年初，全省除信阳、灵宝及豫北安阳、新乡等几座孤城外，大部分地区已获解放，各级人民民主政权普遍建立，全省即将由战争转向新民主主义建设。为适应形势和革命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原局的领导下(后归华中局领导)，建立中共河南省委，在行政区划调整后，原中共豫皖苏分局和豫西、桐柏区党委撤销。

1949年3月1日，中共河南省委在开封正式成立，李雪峰兼书记(后为张玺)。省委下辖郑州、许昌等10个地委及郑州、开封两市委。4月22日至23日，中共河南省第一次代表会议在开封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听取并通过了省委副书记张玺代表省委所作的《河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会议认为河南除少数国民党军残余盘踞的据点外已全部解放，党的工作将由开辟解放区阶段转入建设时期，今后一年的基本任务就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剿匪反霸，整顿财政，加强党的建设，大量吸收新干部等。这次会议是在河南基本结束战争状态转向生产建设时期召开的首次全省党代表会议，从此开始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会后各地传达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省党代会精神，落实党代会决议，各项工作全面展开并取得显著成绩。

6月16日至26日，中共河南省第二次代表会议在开封召开。省

委书记张玺、省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分别向会议作了剿匪报告和剿匪军事报告，会议主要讨论了彻底肃清河南境内土匪的问题，通过了省委、省军区关于剿匪工作报告的决议。

3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发布命令，由豫西军区及桐柏、鄂豫、豫皖苏军区的河南部分合并成立河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李雪峰（后为张玺），下辖南阳、确山（后为信阳）等10个军分区，郑州、开封2个警备司令部，警备第二旅及第一七三、第一七四师。

5月8日，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召开第二次委员会议，会议总结了临时政府成立以来的工作，并对剿匪、生产等进行了安排。临时政府主席邓子恢在报告中指出：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以来，军行所至，势如破竹，湖北、湖南、江西，不久即可解放；河南全境即可全部收复，目前急需大力进行建设巩固工作，因此，有建立河南、湖北两个政府，加强对两省地方政权领导的必要。经邓子恢提议，委员会议决成立河南省政府，任命吴芝圃、陈再道、张玺等20人为委员（后又增加2人），任命吴芝圃兼河南省政府主席，同时任命了各厅厅长。河南全省共辖10个专署及开封、郑州两个直辖市，除永城县（1952年1月划归河南）外，黄河南岸原河南省境内各县都隶入河南省内[①]。全省共计2个省辖市、8个地辖市、86个县，人口3 017万。

5月10日，河南省政府正式宣告成立。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暂行组织规程》，省人民政府设秘书长及民政、教育、财政、工商、农业、交通、公安、司法8个厅及河南省人民法院，省政府秘书长领导之下设秘书处、行政处、政策研究室。“各厅、院得视工作之繁简设置局、室、处、科、股，分工办事，并视工作需要经河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或政务会议通过，设置各种专门委员会与直属的专管机关，主管一定事项。”[②]据此，省政府各厅之下先后设置了河南省税务局、卫生局、公路局、劳动

① 《开封日报》，1949年5月10日。
② 韩延龙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2卷，第47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局、电信指挥局、合作总社等机构，专署、县（市）亦成立了相应机构，分管各该项工作。

省人民政府成立后，一边开展剿匪斗争，以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一边整顿财政，恢复生产，开展救灾和支前工作。先后召开了农业、工业、商业等会议，确定了各业工作方针，并就农业负担、金银管理、地方财政等作出法规性的规定，同时采取措施调控市场，稳定价格等，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在新民主主义大道上高歌猛进。

这时的河南省，辖境限于黄河以南各市县。黄河以北的20余县，抗日战争时期分隶冀鲁豫、太行、太岳解放区领导，后归新组建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领导。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两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两边区政府暂时合并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太行、太岳、冀鲁豫区属其领导。10月，华北人民政府进行区划调整，全区划分为北岳、冀中、冀南、晋中、冀鲁豫、太行、太岳7个行政公署和石家庄、阳泉两个直辖市。1949年春华北全境解放，8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发出通令，对区划又进行一次大的调整，将原有的7个行署撤销，以旧省界为基础，除保留察哈尔（1952年分别并入河北、山西两省）、绥远（1954年并入内蒙古自治区）两省外，恢复河北、山西两省，并在豫北、冀南、鲁西南接壤地带设立平原省，省会设在新乡。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和华北军区，分别任命了平原省党政军领导机构组成人员。

8月12日至15日，中共平原省委在新乡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和华北局决定，宣布中共平原省委成立，潘复生任书记。20日，奉华北人民政府命令，平原省人民政府在新乡正式成立，晁哲甫、贾心斋、潘复生等21人为委员，晁哲甫为主席。省政府设秘书长及民政、财政、教育、农业、商业、工业、交通、公安等8厅及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平原省分行、合作委员会、劳动局、卫生局、粮食局、税务局、水利局、河务局等。同日，奉华北军区的命令，平原省军区成立，刘致远为司令员，潘复生为政治委员。省委、军区下辖6个地委（专署、军分区）及

新乡、安阳2个省辖市，共56个县（原属河南的武安、涉县、临漳划归河北），483个区，总人口1 500余万。

中共平原省委、省人民政府对本省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分析，决定今后的任务是：恢复与发展生产，重点是抓好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工业生产创造条件，注意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在未完成土改的地区要彻底完成土地改革，消灭剥削制度；加强社会治安，肃清匪特，巩固革命秩序，保卫生产建设；治理黄河，确保汛期安全；加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城乡人民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进行了艰苦的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到8月份，即对广济河进行了疏通，使济源、沁阳、温县数万公顷田地得到灌溉；对汲县、浚县、淇县、辉县、安阳、汤阴等地的虫害，积极捕打，减轻了灾害损失；对道清铁路西段、平汉铁路新乡至黄河北岸段及卫河航运均予以修复及疏通，新乡至安阳、新乡至辉县、新乡至焦作、新乡至道口、新乡至武陟等公路也已通车。面粉厂、电灯公司、纱厂、榨油厂、打蛋厂、卷烟厂、造纸厂及化工厂等均相继投产。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调整省、区建制的决议》，决定撤销平原省建制，将原属河南省的林县等22县，新乡、安阳两市及焦作矿区划归河南省，原属河北省的清丰、南乐、濮阳、长垣、东明（1963年划归山东）5县，为治黄之便也划归河南省。30日，平原省建制撤销。

中共河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成立之初，万机待理，各项工作全面铺开，作为1949年下半年的一项中心工作，就是剿匪。

河南从民国以来就是多匪之区，外地报刊多称“豫省土匪为全国之冠”。到了解放战争后期，这种现象更为严重，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书记陈毅在给毛泽东的一份报告中说：“我党足迹遍全中国，土匪恶霸猖獗恐无逾河南者。”[①]尤其一些政治土匪，专与人民为敌，其残酷性和破坏程度令人发指，给新生的人民政权造成威胁。

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历史原因，更有现实原因。国民党政府垮台

① 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河南的剿匪斗争》，第1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前，训练了大批特务，勾结恶霸地主和反动会道门，对抗革命。国民党政府垮台后，他们更多地网罗反动军官，纠集保安团队、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和惯匪，组织政治性匪股——当时称之为“土蒋”，具体说有下列数种：一是被打散的国民党军流而为匪，继续与人民为敌。如原国民党军第十九绥靖区豫西分区第一团团长李子奎，被解放军打败后，率数千人为匪，自称新一师师长，到处烧杀抢掠。二是地方豪绅掌握的地方自卫团队暴乱。三是恶霸、土劣、退伍军官拉起的杆子，到处裹胁民众，打家劫舍。四是某些反动会道门如豫东南的“无极圣门”、豫南的“红枪会”、豫西的“庙道会”等，受国民党特务的煽惑而发动暴乱。除以上诸种外，还有因经济破产无以为生的农民，在惯匪的带领下以窃掠为生。1949 年春，因解放军南下作战，他们就四处作乱，以游动作战的方式与新生的人民政府相对抗，武装奔袭后方，或暗杀村干部与积极分子，所到之处，恣意烧杀抢掠，极尽破坏之能事，无论财产、牲口、衣物均被洗劫一空，连一般的农耕活动也无法进行，致使一些地区（尤其是豫西、豫南）成万公顷农田荒芜废耕，几十公里地面人烟断绝，给城乡人民带来异常深重的灾难。据大略统计，全省股匪、散匪总数不下 10 万人，成为一个硕大的社会毒瘤。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各地匪情十分重视，适时作出了剿灭土匪的决策，以此作为肃清反动残余力量的一个重要部分，又是保障实施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建设的先决条件。1949 年 5 月下旬，中共华中局就河南土匪问题与省委共同进行了研究，认为土匪问题是河南地区许多问题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剿匪要作为一项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来全力加以解决，并决定今后半年河南以剿匪为中心，限令年内彻底肃清河南全境土匪。在随后召开的中共河南省委第二次党代会上，与会代表也集中讨论了如何彻底肃清河南土匪的问题，认为肃清土匪这一不可跳越的历史任务在河南尚未完成，这个问题如不彻底解决，一切工作将不能大踏步前进，甚至因受它的阻碍而反复地走回头路。会议决议半年之内彻底肃清土匪，这就要“主动的有计划的进攻到底，彻底解决问题，不是打垮打散打退敌人，而是消灭股

匪，肃清散匪，收尽匪枪，捕净匪首，瓦解会众匪股，破获特务指挥机关，打倒通匪窝匪济匪庇匪的恶霸，建立人民的革命统治"①。总的口号是：肃清土匪、打倒恶霸、发动群众，三位一体，不可分割，互相渗透。会议确定陕州、洛阳，南阳、许昌，潢川、确山为3个剿匪重点区，并作了相应的部署。

中共河南省委继全省第二次党代会通过《关于剿匪工作的报告》之后，先后发布了有关文件，根据中共中央"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奖"的原则，规定了一系列政策，使剿匪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各地党、政、军机关及群众团体普遍开展了大张旗鼓的剿匪反霸宣传，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形成强大的政治攻势。一场声势浩大的剿匪斗争在全省范围内展开。



五十八军在伏牛山剿匪

各地剿匪斗争一般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围剿股匪。以军

① 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河南的剿匪斗争》，第27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事围剿为主,结合政治攻势,集中力量歼灭敌人最大、最强、最坏的武装核心集团,力求全歼。第二阶段,清剿散匪。以政治攻势为主,结合军事清剿与群众助协,宽面展开,大网拉鱼,村村有兵,到处工作,恩威兼施,造成散匪投降热潮,达到继续消灭顽抗之股匪,肃清散匪之目的。第三阶段,清匪反霸。以群众斗争为主,结合深入政治攻势与军事捕捉撑腰的方法,变群众为人网,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清匪反霸运动。部队、政府组织工作队、战斗队、生产队,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反霸清算,群众控诉,政府判决,镇压首恶,宽大胁从;捕捉隐匿匪首,废除保甲,剔抉潜匪隐枪,检举反动会门、特务,彻底肃清残匪,打垮地主阶级当权派,建立乡、村政权。

陕州、洛阳是匪患最重的地区之一,经过军、政部门的宣传发动,很快形成了全区性的群众剿匪高潮。部队不怕吃苦,连续作战,穷追股匪散匪;群众自愿参加,协助搜山,使股匪、散匪无处藏身。如宜阳、伊川、嵩县交界处的莫重山,土匪出没数十年,当地群众深受其害。群众自动组织起 9 000 余人的队伍,协助部队搜山,两天内便肃清了大匪霸潘东楼、任风礼等部,并在一个红薯窖里搜出了杀过 18 条人命的孔永健。宜阳 2 000 余名正在田间劳动的农民听到匪首王钧漏网的消息,纷纷拿起锄头到处截击,终于在洛河河水中活捉了该匪。7 月底,陕洛剿匪区灵宝地区将匪新一师李子奎部黄河、绥远等支队全歼。南阳剿匪区以重拳出击匪新二师任泰升部,俘其副师长胡俊平等,任泰升被迫投降。大别山北麓股匪经潢川剿匪区部队一周清剿,大股土匪均告肃清。

为配合各县剿匪斗争,开封、郑州两市均成立了剿匪指挥部。7 月中旬到 12 月上旬,开封市破获土匪、特务、会门暴乱案件 40 余起,协助外县捕获土匪、特务、恶霸 230 余人;郑州市公安局于 10 月 1 日夜,一举破获"性真理道"和"金丹道"两大特务会门案件,匪首田泽普等 25 人全部落网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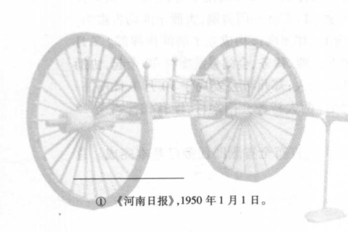
12 月底,河南军区发布公告,宣布全省剿匪任务已基本完成。总

① 《河南日报》,1949 年 12 月 18 日、10 月 9 日。

计全省共毙伤匪豫西暂编第四师师长刘茂亭及其以下5 781名，俘匪豫西新一师师长李子奎、新二师副师长胡俊平、新三师师长谢泽民及其以下52 629名，迫降匪豫西新二师师长任泰升及副师长王紫仙及其以下12 190名，登记悔过匪豫西新三师团长王云亭等以下61 685名，共计132 285名。缴获各种火炮216门，轻、重机枪934挺，长短枪157 709支，各种子弹203.6万余发，炮弹1.1万发，手榴弹3.4万枚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①。同样，在平原省，剿匪斗争也取得丰硕的成果。据9月10日平原省军区公布，原冀鲁豫军区部队和民兵半年来共歼匪3 532人，缴获各种枪2 800余枝（其中轻机枪120余挺）、炮5门。

到1949年年底，全省股匪已全部消灭，散匪大部肃清，社会治安日趋巩固，乡村人民政权已普遍建立。剿匪作为一个历史任务已基本得到解决。剿匪斗争的伟大胜利，安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为嗣后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久，苦尽甘来的河南人民迎来了划时代的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光辉日子。为这一日子的到来而前赴后继、奋斗不息的河南人民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忘我的劳动和无穷的智慧谱写历史的全新篇章。



① 《河南日报》，1950年1月1日。



第四十四章
1928—1949 年的社会经济

第一节　农　　业

一、人口与耕地

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 20 多年中，有关河南人口的统计数字不少，但绝大部分出自官方。据报，全省在 1929 年总人口为 3 147 万人，以后几年略增，到 1937 年为 3 429.3 万人。经过 40 年代初大灾及战乱，1942 年和 1944 年，分别减至 2 297.9 万人、2 471 万人，1947 年恢复至 2 921.8 万人。因为户口关系到人民负担（包括抽壮丁），所以隐匿仍然不少。如抗日战争前泌阳上报人口 29 万余人，但 1938 年县政府调查有 40 余万人；商城 1946 年报省里 20.9 万人，而 1948 年县里统计有 35.8 万人[①]。由此等事例估测，全省实有人口当较官方统计公布的数字多出 1/3 左右。综合各种公私记载，20 世纪 30 年代，农村各阶级人口比例可粗略推断如下：地主约占 5%，富农约占 7%，中农约占

① 《河南文史资料》第 28 辑，第 167 页；谢肖良：《督政三年来的总检讨及今后的展望》，第 138、141 页。

40%，贫农约占35%，雇农和其他无地农民约占13%[①]。比较而言，所谓自耕农或中农所占比例一直较大。如豫北济源、博爱、孟县一带“无大地主，最多不过百亩……多系自耕农”；豫西“多半是中农、贫农，三亩、二亩地的最多”；豫南“自耕农占70%以上，大地主不多”；豫中“80%农民都有一小块土地（与南方不同——原注）”[②]。因此，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地方党组织一份报告就说：河南除“三数县有大地主”外，其余各县大都是二三十亩到七八十亩的小自耕农，“全然是一种小农生产的社会”[③]。这是河南省异于他省的一个地区特点。

同一时期，河南的耕地面积各种记载也颇多差歧，选择较有参考价值者编列如下：1928年为421万公顷，1930年为695万公顷，1935年为760万公顷，1936年为656万公顷，1946年为660万公顷，1949年为733万公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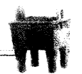
这些耕地就所有权而言，还有“公”、“私”之分；就耕作条件而言，则有水、旱之别。所谓“公产”，除为数寥寥的官产（产权归政府）外，主要是学田（产权归学校）、族田（产权归宗族）之类。由于历史的原因，河南此类公产远少于南方诸多省份。据20世纪30年代学者在不同地区抽样调查，公产占耕地总面积比例大体是：豫北新乡等6县为0.89%，豫中许昌等6县为0.65%，豫西南镇平等3县为0.33%，豫南较多，信阳一县占4.36%。庙产数量比公产更少，上述诸县只占0.31%，且大都拨归学校，成为校产（公产）。“族有土地在河南各县更不占重要性”，上述诸县约占总面积不过0.15%[④]。这些所谓公产，大

① 1931年有关统计资料载省境占地50—100亩（每1公顷为15亩）以上者占农户总数6.6%，10—50亩者占38.4%，10亩以下者占55%，亦可参考。见民国25年《申报年鉴》，第864页，上海，1936。

② 《河南财政季刊》创刊号，第48页；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第292页，1984；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0日。

③ 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458页，1984。

④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河南省农村调查》，第158页，商务印书馆，1934；张锡昌：《河南农村经济调查》，载《中国农村》第1卷，第2期。



都由“地方强霸”包租，尔后分租给农民，由此“不劳而获”[1]，实际上也等于地主阶级所占有。

另据民国24年(1935年)统计，在所报的103县中合计，水田只占8.4%，园圃占2.8%，其余88.8%均为旱地[2]。在比例特大的旱地(包括园圃)中，有河渠可以灌溉的不过33.3万公顷，主要集中在武陟、郑县、沁阳、修武、灵宝、宜阳、辉县、安阳、洛阳等十来县，其余95%以上的旱地均为“旱涝悉听于天”的“靠天田”(内盐碱地16.7万公顷)。

这些土地的地权分配情况大体如下：

豫东。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太康“富者往往连田数百顷，贫者毫无恒产”；考城“土地都集中在二十余家大地主手里，贫富阶级悬殊”；虞城“贫富悬殊特甚，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者，在该县中尤为习见之现象”；项城土地据云半数以上均为袁世凯遗族所占有[3]。但另一些县份，地权较为分散。如杞县境内，地方人士记称富户稀少，占地10顷(每顷为100亩，折合6.67公顷)左右者不过两三户，5顷左右者不过十数户[4]。从商丘、陈留、西华、开封、淮阳11个村的调查数字来看，地主占地高的达50%，低的不过10%上下，平均在27%左右[5]。再加上大约10%左右的富农占有的土地，还有60%以上的土地在中、贫农手中。因此1940年彭雪枫记述豫皖苏抗日根据地情况时，就有这样的比较：地权苏北最集中，皖北次之，“豫东土地分散不集中，小农自耕农占主要地位”[6]。

豫南。商城、罗山、光山、固始、息县等地，“土地多集中在大地主

---

① 《河南省临时参议会第一届第二次大会会议汇编》，第297页，民国刊本。

② 河南省统计学会等：《民国时期河南省统计资料》上册，第141页，1987；《统计月报》，1932(1、2)。

③ 白眉初：《河南省志》卷四，(抄本)；《河南政治月刊》第3卷，第2期；河南《民国日报》，1932年1月16日；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174页，1984。

④ 民国《杞县采访稿》(稿本)。

⑤ 系据各种零星调查记述，为免烦琐，不一一列注。下三段所述零星乡、村统计亦同。

⑥ 晓音：《彭雪枫论抗日游击战争》，第12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

手内”,80亩左右的地主富农也不少,不过自耕农(中、贫农)也特别多①。信阳“大地主特多”,整个豫南和豫西一样,是省内大地主最多之地②。遗憾的是,有关本地区地权分配的具体记述不多,从新中国成立初省农业厅所选定的汝南、光山、信阳7个村的调查材料看,地主在1937年平均占地份额为27%左右,富农在24%左右③,还有一半以上的土地在中、贫农手中。

豫西。嵩县富户所占山地往往绵延数十、数百里,居住其中的农户多为佃农。卢氏土地大量集中在“一龙”、“一凤”、“四亭”诸大户中,各有数千、数万亩。洛宁乔、马、商、雷、张诸家各占地数十或数百顷,10顷左右的地主“更星罗棋布于县境各地”。不过,此类情况主要存在于山区,“平原(地权)较分散”④。在豫西南南阳、唐河一带“土地非常集中,300顷的地主有好几个,百十顷的地主就太多了”;桐柏也相类似⑤。从本地区2个乡、38个村的片段记述看,地主占地份额高的达70%—80%,多半在40%以上,少数不到10%,平均在43%左右。综合估测,中、贫农占有的土地只怕不到40%。

豫北。除辉县、修武、安阳地权较集中外,“一般来说土地不集中”,尤其是沿黄河各县,30公顷以上的地主很少,大都是占地一公顷的自耕农或十几公顷的中小地主和富农。即使地权较集中的安阳,1937年地主阶级占地也不过26%左右。博爱、济源、孟县、汤阴、封丘、长垣、濮阳等地大地主很少,占地20公顷的就算富户,40—50公顷的

① 中央档案馆等:《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136页,1985。
② 张锡昌:《河南农村经济调查》,载《中国农村》第1卷,第2期。
③ 郭予庆等:《河南经济发展史》,第25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④ 狄超白等:《中国经济年鉴》,《地方经济》,第137页,香港印刷工业会社,1947;《河南文史资料》第14辑,第50页;河南省档案馆存档,豫西区党委24:2。
⑤ 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193、211页,1984;河南省档案馆存档,桐柏区党委:50。



更是少有的"大财主"[①]。40年代中，中共太行区党委调查全区地主、富农占地份额分别为22.76%—30.4%和17.16%—23.6%，其中地主占地较多的滑县达35.7%，边境各县地主占地不多。从本地区2个县、7个区、2个镇和200多个村的调查数字看，平均地主占地近24%，富农占地近18%。综合估算，地主富农和中、贫农占地分别在40%、60%左右。

豫中。20世纪20年代中，李大钊统计荥阳、密县7个村共有耕地530余公顷，占地在70公顷以上的"上富"，总共不过十多户。稍晚，中共地方党组织的一份文件中特别提到许昌周围诸县"与南方不同"，80%的农民都有一小块土地，只巩县地主占地较多。从本地区15个村的统计数字来看，平均地主占地21%，富农占地14%，当还有2/3的土地在中、贫农手中。

综合上列五地区平均计算，地主、富农、中贫农在地权分配中所占的份额分别为30%、17%、53%左右。参以新中国成立初黄河以南87县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共没收、征收土地290万公顷，约占耕地总数的30%，是则中贫农占有的土地当不下60%，高于全国平均数(当时就全国而言，中、贫农占地约在40%—50%)。与清王朝统治时期比较，地主阶级占地的份额有所降低。其所以致此，前面已略作分析，本阶段且有所深化。尤其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加深，城乡地主的消费(包括各种奢侈品和鸦片)也不断增大。地主大都"单靠土地生产产品的收入供给生活，很少其他的收入"[②]。而这些收入又因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扩大而相对趋减，30年代前期农产品尤其"价格惨跌"，使不少旧式地主想要维持家业更为不易。如30年代中期报道安阳社会情况者就说，从前那里地主有占地十五六顷者，后来随着平汉路的修通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联系日紧，"恐慌的浪潮很快滚进了安阳的农村，于是除很

① 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第451、490、491页;甲9，第165页，1984;北京《晨报》，1920年10月2日;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豫北战斗》，第29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② 中央档案馆等:《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编》甲2，第137页，1985。

少数的富农地主能保持现状外，大多数沦为五六顷的富户，最普遍的还是二三顷的土地”①。另一方面，传统的诸子均分田产的制度进一步发挥其分解地主田产的作用。如40年代记载林县任村者，称那里原有土地四五百亩的大地主十余户，“后以人口繁殖甚速，此等大户多出无赖子弟，加(以)受近代资本主义之侵袭，乃逐渐破产没落”②。这些社会历史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就使一批批一般地主、中小地主不断分解和沦入所谓“自耕农”的队伍，其原先占有的土地亦随之转为农民占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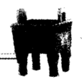
二、农业经营

国民政府时期地主阶级占有的耕地，小部分自家雇工经营，大部分依然租给农民佃种，租佃的形式从总体上看一仍旧贯：“主要是‘定额谷租’和‘分租’两种，钱租尚少存在。在豫北一带，定额谷租和分租的成分不相上下，豫中可说定额谷租较为盛行，(豫西南)镇平一带恰恰相反，分租占绝对的优势，(豫南)信阳附近，又通行着谷租。”定额谷租每亩所纳租额，相当于产额的40%以至75%。惟信阳与北部不同，押租较为盛行。全省最盛行的还是分租制。“在河南各县最通行的分租办法是地主和佃户平分产物，种子肥料(购买的)各半负担，牲口由佃户出。有些地方，田赋也各半负担，甚至完全由佃户负担，不过佃户可以多得一些柴草而已。除掉平分之外，还有四六分、三七分、二八分几种办法。”③

据30年代中的粗略调查，全省分租、定租、钱租所占的比率分别为41%、39.5%、16.5%。而同一时期在东南省区相应比率分别为6%、67%、27%，全国分别为28%、51.6%、20.4%④。河南分租制确实比较兴盛，包括山东(39.1%)、直隶(26.1%)、山西(26.7%)、陕西(25.9%)在内的北方省份都在河南之下，显现出河南仍然特别落后。

但本时期，货币地租(包括折租)所占比重有所上升，地主出租土

①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689页，三联书店，1957。
② 河南省档案馆存档，太行公署47:1。
③ 张锡昌：《河南农村经济调查》，载《中国农村经济》第1卷，第2期。
④ 《农报》第2卷，第21期，第160页。



地也有所增加。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消费品市场的扩大,像鄢陵、西华等县,有相当一部分原先分租的土地就改收货币地租,每亩(0.067公顷)七八元、五六元、三四元不等。豫北位于平汉铁路、道清铁路沿线的县乡,商品经济发展较快,相当一部分兼营工商业的地主"为了自己周转方便,往往要求佃户将实物按高价折现款交纳"①。各地日渐增多的烟田、棉田、瓜田、菜园,交钱租(包括折租)的更为普遍。据河南24县所作的粗略统计,1924—1935年间,货币地租所占百分比由23%增加至25%②,实物地租则由77%减为75%。与此同时,一些靠近城镇的农民,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也将其自耕土地出租,以便改营小贩或其他副业。如方城独树镇南村67户,中农占地50.5公顷,其中有47户总共出租35.3公顷土地,自己则做小生意维持生计;43户少有土地的贫农,也有20户因没有牲口改而做小生意或当长工而将其土地出租,出租部分占他们耕地总数的55.3%③。类似情况,在其他一些乡村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本时期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态势,就是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有增无已。不仅实行分租制的地方,田赋之半或全部归佃农负担,就是在实行定租制者,地主转嫁赋税者也不乏其例,进入40年代尤为常见。如在汲县、辉县,地主要佃农负担一半田赋和苛捐杂税;安阳实行分租制的佃农按成分摊赋税,每亩交定租6斗的佃农则要承担全部赋税。不仅如此,有些地主还直接增加租额或多分其他收获物。如30年代初在豫南一些县乡,谷租"每斗田(约0.6亩)由八斗加到一石二三斗,地与杂粮等向来没课的,现在普遍要课";押租也大为增加,"几乎与购买之地价相等,且须于押金之外,纳缴随礼一份……稻课之外,复有所谓麦课、鱼课、鸭课、油课、棉课、柴课、草课等。总之,凡田中所产,家中所

① 《太行抗日根据地》编写组:《太行抗日根据地》(二),第35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② 薛暮桥:《旧中国的农村经济》,第30页。另有统计称河南在30年代中钱租占16.5%(全国为20.4%),可能更接近实际(见《农报》,第2卷,第21期,第160页)。

③ 河南省档案馆存档,豫西区党委100:3。

畜饲，无一不按五五均分"[①]。从地租率来说，据30年代初统计，河南中等水田为48.9%，全国平均为46.2%；中等旱地为45.1%，全国平均为44.6%[②]（均指定额租）。折租据各县农情报告员报告，河南平均每亩4.40元，高于皖、苏、直、晋、陕、鄂等省，也高于全国平均数（4.2元）[③]。尤其是经济作物区，如许昌烟区，每亩年产值在7.55元左右，而交租却要5.6元。至于各类分成租，河南地主所分不超过40%者特少，只占总数的4.9%，低于全国平均数之14.2%，而地主所得在40%—60%之间者，占总数之79.3%，高于全国平均数（72.4%）[④]。特别是河南保存特多的劳役地租残余，更为南北各省区所罕见。30年代中的记载称，此种超经济强制在全国各省"正在消灭进程中"。

与租佃地主不同，经营地主和富农主要是用雇工或用半雇半佃的分益工经营土地，且重在进行商品性生产，具有较多的半资本主义半封建性质。

1933年，据河南31处的调查统计，雇农占农村总人口比例高达19.41%，远高于全国354处的平均数（10.29%）[⑤]。根据有关资料粗略估测，30年代中河南雇工连同其他无地农民约占总人口的13%，大约五六百万人。这些雇农，分为长工和短工（包括季节工）两种，而以前者为主体。30年代中，长工年工资不过20—30元，豫西南一般只有10—15元。同其他省份和全国比较，明显偏低[⑥]。到40年代，由于通货膨胀，长工工资表面上提高了一倍上下，而粮价却上涨了数倍以至近10倍。实际工资大幅度降低。

由于历史的、自然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原因，河南就是自家经营土

---

① 中央档案馆等：《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137、138页，1985。
② 《统计月报》，第2卷，第6期。实际租率均高于50%，如信阳，"每年可产10石之地，地主非收6石不可"（《大同之路》，第2期，第1页）。
③ 《农报》第2卷，第21、25、26期。
④ 章柏雨：《中国农佃问题》，第89、90页，商务印书馆，1944。
⑤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70页，三联书店，1957。
⑥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81页，三联书店，1957。



地的地主和富农，雇用雇农也为数有限。30年代中的调查称："辉县要算大经营发展的地方，35家富农中也只雇了66个长工，平均每户不到2人。许昌、镇平等地的富农，雇长工2个以上的已经不多，他们种七八十亩田，除家工参加耕作外，狭小的面积根本就不需要大量的雇佣劳动。"①

因为农村无地待雇的农民为数众多，使得这一时期的富农、佃中农和"二地主"也获得较便利的发展条件。依据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最经济有效的生产组合，是4个壮农配以一两个童工和两三个妇女，加上2牛1驴，耕作6.67公顷（100亩）土地。一些有壮年劳动力、农具、资金较多又善于经营的农户，凭此向地主租进较多的土地，"力农"发家。如20世纪40年代唐河调查，东七里井村，9户佃中农共有劳动力30人（占全村总劳力的41%）、牲口33头（占全村牲口的70.3%），租进土地62.833公顷（相当于其耕作土地的92%），复雇工25人（占全村雇工的50%）②。除此之外，各地还有一批"二地主"（俗称"管地"、"租头"，"包主"、"庄主"、"揽头"，"包佃人"、"大代地"等）。像30年代伊川较大地主和不在乡地主多将其土地包租给大佃户——"管地"，"管地"再将这些土地分割租给贫农。类似的"二地主"——租佃地主，在其他各县也不罕见。他们一般靠收取"小租"从中获益，每亩或粮数升，或币数角；也有以"帮工分益"制经营者。此类佃富农、佃中农和租佃地主的不断滋发，是本时期农村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因素增长的又一征象。

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村资本主义已经没有自由发展的机会。不断加深的半殖民地（半独立）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化既刺激又遏止了农村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租佃地主的封建地租十分苛重，自行经营的地主和富农如不得其法，反不如租佃有利。而官府的赋税又有加无已，更不如租佃而可以向农民转嫁赋税。当然，不同时期、不

---

① 《东方杂志》，第31卷18号，第6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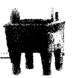
② 河南省档案馆存档，桐柏区党委165:5;166:6。

同地区情况不甚相同。如抗日战争时期豫西田主雇用长工，除去工资（原粮）和吃食外，每年可获得长工劳动成果的5/16，南阳富农且因适应当时大后方的需要从事各种商品性的副业生产，又将存粮“待价而沽”，因此“大发其财”，得以兼并了不少土地①。但从总体上看，全省在整个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这样的富农、这样的机遇并不多。

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增加投入。但绝大多数县乡农民在牲口、农具、肥料等方面投入很少。拿牲口来说，因农家大都无力喂养，所以全省拥有量最大的1935年总计也不过840万头，其中牛、驴约占80%，这些牲口，大部分又归地主富农所有，一般农民尤其中贫农、佃农畜力普遍严重不足。同样，农具和肥料农民也购用很少。20世纪30年代中，严重地制约和破坏农业生产的，还有水利破坏严重，自然环境日趋恶化，自然灾害异常频繁、严重。虽然省级政府也设有水利局，掌理全省水利，常年经费不过2万多元。黄河防治经费不及晚清时期的一半，主管官员又“视工程为营利事业，偷工减料，在所不免，河堤欠固，危险异常”②。所以，全省除豫北、豫南少数县份外，普遍是水利不修，沟渠堙塞，而且愈过益甚。反映在地方志书中，诸如“旱无所蓄，涝无所泄，丰歉一任天时”（夏邑）；“旱则田禾立见枯槁，涝则田禾辄被淹没”（获嘉）；“夏秋大雨时行，洪流激浪，民患漂没，冬春无雨，几同瀚海戈壁”（禹县）；“农业多待天成，向无水利可言，逢旱则束手无策，遇涝辄积水成灾，相沿已久，几有牢不可破之势”（鄢陵）③。甚至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如沙河所经的郾城县境，大都是“播种之后，任其自然，从未有灌溉者，近河田地，农民亦不知利用河水以资灌溉”④。辽阔中原，因此一片苍凉。

据河南省政府统计部门统计，1931—1936年，全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和收获量是有所增长的，前者从850万公顷增至901万公顷，后者

① 河南省档案馆存档，豫西区党委，140；21；《新华日报》，1940年7月15日。
② 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4月5日。
③ 《夏邑县志》卷一；《获嘉县志》卷一；《禹县志》卷四；《鄢陵县志》卷十三。
④ 金陵大学农经系：《鄂豫皖赣四省土地分类之研究》，1936。



从16 877万担增至21 104万担，每公顷产量亦由990公斤增至1 125公斤①。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很值得怀疑。因为这几年全省连年大灾，加上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全省农业很不景气。从学者在许昌、辉县、镇平十多村实地调查来看，1933—1934年耕地面积较之1928—1929年减少了1.57%②。另据若干县份报告，20世纪30年代中较之民国前期粮食单产(每亩)均有减无增，小麦邓县由3—8斗减为2—5斗，汤阴由2—3斗减为数升至2斗，永城麦秋合计由80—300斤减为50—225斤，密县由50—750斤减为40—100斤，息县由4—10斗减为2—5斗，光山只及前时的1/3。抗战胜利后，全省"人民流亡，土地荒芜，致使各种农户均陷于极端不足自给之境"，即使往日"物阜民丰"的豫南，同样"农产因之锐减，几至不能自给"③。全省约计，平均亩产不过80多斤，不到20世纪30年代中的1/2，集中反映出20世纪40年代农业生产的严重衰退。

三、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和高利贷的猖獗

本时期，随着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联系愈益密切，国内和省内近代工商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也有所发展，促使河南的农副产品也加快了商品化的步伐，主要表现在：

(一)作为河南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棉花生产的发展

随着国内棉纺织业的发展，对棉花的需求量随之增大，棉花价格也随之上涨，每亩棉花产值相当于种粮的数倍以至10倍。"于是宜棉之区，农民概行植棉，相率成风。"④适应这种经济和社会的需要，政府机关和一些企业家也进一步加强对美棉良种的推广工作。除了续办开封、安阳、郑州等处棉场外，又增设洛阳棉作试验场，专门从事美棉良种的培育和推广。豫丰纱厂厂主穆藕初主持的郑州农场每年散发的脱字棉种也不下万余斤，1931年又将10多万斤脱字棉种散发附近各县棉

① 河南省统计学会等：《民国时期河南省统计资料》下册，第18页，1987。

②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河南省农村调查》，第63、64页，商务印书馆，1934。

③ 《河南善救公署周报》第57期，第9、11页；《中农经济统计》第2卷，第7期。

④ 《豫鄂皖赣四省之棉产运销》，第17页。

农种植。次年，穆又与中央大学农学院合作，在郑州兴办特约合作棉种场18处，总面积66.7公顷[①]。1934年，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所属的棉业统制委员会复与河南省政府合作，于太康（旋迁安阳，复迁郑州，1936年迁开封）设棉产改进所，于太康、郑州、开封、安阳、灵宝、洛阳等处设立育种场，繁殖脱字棉、斯字棉、灵宝棉，复于太康、郑州、安阳、洛阳、灵宝、商丘、禹县、汝南设指导所、指导区。据估计，从1934—1936年上半年，于29县推广美棉，共2.8万公顷。1936年，该所又向安阳等22县贷放脱字、斯字等棉种41万公斤，领种者14万多户，栽植棉田0.94万公顷，棉农自行筹种的尚不在内。抗日战争后期，国民政府农林部协同中国农民银行举办改良棉种贷款，灵宝、陕县、洛阳等河南产棉县亦在受贷之列，用以种植德字棉531号或斯字棉3号。全省总起来说，从20世纪初开始的棉花良种推广工作，40多年中基本上未曾间断。不过在实际工作中问题不少，对新品种的驯化、保纯和栽培技术很少注意，加上种植技术上未作相应的改进（如仍然过早摘心和株距过大）和土地贫瘠，农民经济艰窘，投入过少，因此大大影响植棉的经济效益。1933年，河南棉花种植面积较湖北多3倍以上，但皮棉总产量却只及湖北的1/3。1936年，全国棉田平均亩产13公斤，河南只有11.5公斤。尽管不如人意处很多，但毕竟对本时期河南棉花生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据估计，全省在1928年棉花种植面积10万公顷，到1937年增至62万公顷。抗日战争期间下降为13.5万公顷，到1947年还只有25.6万公顷。总产量在20世纪20年代，最多70多万担，1936年达245万多担。抗日战争时期，急剧下降，至1946年才恢复至183万多担（一说67万担）。这些棉花约有一半经由花贩——花行——本省和外省棉商——本省棉纺织厂和上海、汉口、天津、青岛等外埠市场等环节，进入各级市场，包括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市场。1933年据55个县的“农情报告”，大约农家棉花除留下53%左右自用外，其余的47%左右均投入市

① 《中行月刊》，第7卷，第2期，第116页。



场[①]。惟其如此,棉花的价格就不是像粮食那样由收成丰歉决定,而是由国内外市场的需要量决定。

(二)烟草(烤烟)生产的发展

烟草是河南仅次于棉花的经济作物,进入本时期后,栽植更多、更广。20世纪30年代中,许昌、襄城一带耕地约24%—40%均种植烟草。禹县好些乡村"几于无家不种,无种不多……小农至罄其田以种烟"[②]。其他如郏县、临颍、宝丰、鲁山、临汝、舞阳、方城、叶县、长葛、郾城也栽培甚多。全省1924—1929年间,烟草种植总面积在1万公顷、总产量在30万担上下,到1938年分别增至6.73万公顷、172万担。以后稍有缩减,种植面积亦有6万公顷,总产量50多万担至200万担,到1947年仍种植5.4万公顷,总产117万担。这些烟草大部分均供应市场,仅许昌一地,20世纪30年代中就有烟行和转运公司数十家,每年烟叶销售额高达1 000万—1 200万元,运出量1 300多万公斤。

(三)油料作物的发展

首先是花生,除了许昌周围各县种植较少外,全省其余各县均发展起此种经济作物。特别是郑州至商丘150多公里的黄河南岸沙壤地带,种植尤多,开封、陈留、杞县、洧川、宁陵、睢县、兰封、中牟、新郑均以花生为出产大宗,其中兰封一地,3/5的耕地均种植花生;豫北新乡、内黄、滑县、濮阳等地也因国际国内对花生油的需求日增,所以种植和出口都不断增加。据粗略统计,全省1931—1935年平均种植面积26万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4.65%,年产22 650万公斤,在全国各省中仅次于山东。这些花生约2/3均运销上海、青岛、汉口、天津、广州等地,其中很大一部分经香港运销美、英、日本、印尼、澳洲。抗日战争期间,外销困难,花生种植缩减(当然与日军破坏、掠夺也有很大关系)。

芝麻也产销旺盛。到20世纪30年代,无论种植面积和总产量,河南在全国各省中均居首位。据约计,1931—1937年间,全省年均种植

① 《中行月刊》,第7卷,第4期,第104页;全国经济委员会:《全国棉纺织厂统计表》。

② 《禹县志》卷七,第5页,民国26年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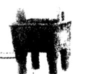
面积39万公顷，总产量466万担，分别占全国的27%—28%。1938—1947年间，年均种植面积降为29万公顷，总产量299.1万担①。产地几乎遍及全省，而以项城、许昌、襄城、临颍、郾城、西平、遂平、商丘、正阳、汝南、淮阳、扶沟、鹿邑、邓县、唐河、方城、舞阳、叶县、信阳、确山、荥泽、获嘉、浚县、新乡为最多，其中不少县份种植面积均在6 670公顷以上，像郾城等县近铁路的乡村，"种之者十属其五"②。全省在1931—1935年间，年平均种植面积占耕地的5.43%，年均产量2.24亿公斤。所产芝麻约一半经由驻马店、漯河、开封和商丘朱集等地销往汉口、衡阳、上海、无锡、天津等地，光驻马店一地，年外运芝麻即近4 000万公斤，又香油1 000万公斤。1946—1947年，种植面积增至耕地总数的6.76%，但总产量却减为1.1亿公斤。

大豆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均仅次于东北、河北和山东。平汉路沿线如信阳、新郑、确山、遂平、西平、郾城以及汝南、正阳、上蔡和宛西地区均以此为出产大宗。1931—1935年间，年平均种植面积60.22万公顷，总产约5.5亿公斤。1946—1947年，种植面积减缩24.26%，总产量减少42.58%。大约有50%—60%——年均400万—480万担均销往外省，以驻马店（年外运约160万担）、开封、商丘、朱集、漯河、周口为主要集散地，大部分销往广州、上海、江苏、西安，成为本省外销的重要货品之一。

油菜籽种植面积最大的是1936年，达15.87万公顷；总产量最高的是1935年，达1 910万担。抗日战争期间缩减较多，至1947年，种植面积恢复到16.53万公顷，总产量121.9万担。其中大部分在本省城乡榨油出售，运销外省不是很多。

上述情况表明，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再依据自家生活而是依据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要来安排农副业生产，由此导致本时期河南商品性农业生产的比重进一步增大，传统的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加快了农业近

① 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和对外贸易统计资料》，第201页。
② 民国《河南通志稿》，第180册（未刊稿）。



代化的步伐。这固然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也促使众多的农民更深地堕入高利贷的剥削网中而不能自拔。

本时期，由于越来越多的农民急于获得资金以济燃眉之急，所以就给高利贷以广阔的活动天地和挑拣放贷对象的充分自由。抵押借贷的比重则越来越大，如30年代中汝南、镇平等12县农民借贷中，抵押借贷占及借贷总数的83%①。据金陵大学师生在河南农村调查，负债者主要是自耕农，而占农户最大比例的半自耕农和佃农则“欲借无门”②。农民的负债面很大，约占总户数的92%③。平均每户负债103元，相当于1公顷土地一年的收入。由此可以窥知高利贷在河南的猖獗程度。

因为本时期高利贷的活动天地特别广阔，农民的生计特别困窘，所以高利贷的剥削率也不断提高。如豫北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已由3分利发展到5分利，“抗战后5分利很少，变成‘大加利’，即100元10个月出40元”，即借粮者亦加息粮5—10倍(3个月)④；豫中1929—1934年间平均年息43.2—46.8分或58.4—62.4分(烟区)，到20世纪40年代，最低100分；豫南在20年代月息4—5分，30年代中最低5分，高的达40分。短短的十来年间，剥削率提高如此之快、之大，这在历史上是未曾有过的(这与40年代通货膨胀也有一定关系)。众多农民无力还债，只好将土地给债主，其给农村经济和社会带来的祸害是十分深广的。

---

① 刘茂增:《河南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关系》，第4652—4655页(抄本)。

② 《农村新报》，第13年第11期。

③ 《农村新报》，第13年第16期，另一统计数字为66%。

④ 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河南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第19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第二节 工矿业

一、近代工矿业

本时期国民政府采取了诸如提高关税、取消厘金、发展近代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业，奖励开办民族企业等措施，河南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业企业因此也续有开办。20年中共新设工厂67个，资本总额590万元，年平均设厂3—4个，年平均投入资本25万元左右，每厂平均资本8万多元。与1919—1927年间比较，无论设厂总数、资本总额和工厂规模都明显不如。不过，1928年前开办的工厂虽多，不少均因经营不善而倒闭，据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1935年调查，称该年全省共有合于工厂法之工厂（使用马力且工人在30人以上者）31家，其中的17家，即54.84%为1932—1935年所开设，说明抗日战争爆发前几年工业中的骨干企业多数是本时期创建的。据1936年调查，全省规模较大的工厂有122家，达到新中国成立前河南工业发展的最高峰。

不久以后发生的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使河南的工业企业受到猛烈摧残，因而又转向衰落。1942年，河南工厂总数88家，在全国未沦陷各省中，只占2.34%；资本总额293.2万元，只占0.19%弱；动力设备825匹马力，只占0.57%[①]。抗战结束后，美货大量倾销河南，国民党又将内战强加于人民头上，河南工业更陷于破产境地，即使最称发达的棉纺织业，1946年，也只有纱锭5.48万枚，只及战前的1/2，全国的2%，布机竟无一台[②]。1947年，外省棉纺织业有较大的发展，河南则否，全省仅有2家纺织厂，占全国（230家）之0.87%；纱锭仅有1.9万枚，占全国（452万枚）的0.42%；线锭0.2万枚，占全国（47.9万枚）的0.42%；布机42台，占全国（6.47万台）的0.06%。全年产量不过纱

---

①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四），第96页，三联书店，1961。

② 《银行周报》，第31卷第4、5期，第19页。



4 704件（全国1 838万件），线644件（全国9.9万件），布11 672匹（全国2 103.6万匹），在全国棉纺织业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其他各业更等而下之，越发成为全国工业特别落后的省份。

近代煤矿的情况也相类似。1928—1948年间新开办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商办煤矿仅有一家，那就是何客星于1935年在宜阳开办的黄沟（普益）煤矿，资本25万元，有工人1 400人，日产煤500吨，1945年停办。另外，有1941年省建设厅创办的洛阳龙门煤矿（资本150万元）和1945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与商民合办的宜阳宜洛煤矿，都用机器生产。据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调查，到1936年省境存在的煤矿有44处[①]。其中以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为最大，次为六河沟煤矿公司，再次为民生煤矿公司，又次为三峰煤矿公司、济众煤矿公司，其他各矿则皆为小规模开采，以土法开采者居多，即间有形式上的机器新法开采，而实际亦皆设备不善，资本短缺，因陋就简，仍沿土法办理。就总产量而言，在1931—1933年，诸大矿减产10.6万多吨，好在小矿增产35万多吨，所以全省总产量尚能保持230万—250万吨。由此，"可证本省大矿事业不特未见发展，且现衰落情形"。而衡量一省煤矿发达与否，"当以其大矿产量情况为准则"，由此看来，"本省矿业前途，实属危险万分"[②]。到全省煤产最高的1937年，也不过303万多吨。

在随后到来的抗日战争期间，中福公司南迁，六河沟和其他诸多煤矿遭日本侵略者的劫夺和破坏，大部分煤矿被迫停采歇业，全省煤产量自然急剧下降。虽然在此期间新开了洛阳龙门和宜阳宜洛两个较大的煤矿，但产量仍远非昔比。解放战争时期，又遭到新的破坏。1947年总产量只有55万多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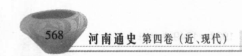
二、手工加工业和采煤业

小工业（大多数为手工工场）和手工业（作坊和个体手工业）本时

---

① 河南省统计学会等：《民国时期河南省统计资料》下册，第77、78页（内部资料），1987。

② 王景尊：《河南矿业报告》，第83、85、116、119、286页，开封新时代印刷局，1934。



期有些变化，分述于下：

（一）手工棉纺织业

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到来和洋布价格的下降，土纱土布，尤其是其中的商品性生产部分，更多更快地被洋纱、洋布所取代。如禹县久负盛名的“禹州布”，正阳陡沟所产的“陡布”，在历史上久负声誉，“近受洋货侵略，衰替殆尽”[①]；鄢陵、汝南、沁阳、修武、项城等过去兴盛的手工纺织业的县份亦与此类似。省城开封20世纪20年代土布交易还很兴旺，1930年10月，以刘峙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在河南建立后，对于世界经济危机期间如潮而至的外货敞开大门，市民购用洋布日多，土布业乃日趋衰落，布贩日常均去四乡兜售，竟有一匹布需时三星期尚未卖回布价者。

取代这些农家土布的，除机织洋布外，还有本地手工棉织作坊和工场生产的纺织洋布。此类作坊、工场在本时期继续有所发展。如新乡1928年开办的中益织布厂，有工人40名，后经易主扩建为新华织工厂，改手推机为脚踏机，工人150名，产府绸、仿绸、条布、毛巾、线毯等，年产值40万元。同地另有“鸿兴”、“民丰”、“益丰”等近十家织造棉布、毛巾、袜子的工厂，均开办于30年代，各有工人三五十人、十数人或数人。在该县的北乡有家庭铁机2 000多张，南乡和西南乡也有2 000多张，建立众多的家庭作坊，产品70%都经布庄运销山西。以前以出产“梭布”著名的孟县，亦有绅商“仿直隶高阳铁机办法组织光裕工厂，竭力提倡”，城乡机户日增，铁机达5 000余张，日出布六七千匹[②]。温县各乡也因“铁机发明”，农户“数口之家，购置一机”者不少，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后上作一村有铁机32张、土机90张，“买线织布”[③]。类似棉织或针织作坊或工场，在其他各县也屡有开办。到1936年，据省政府统计部门调查报告，各县共有绵织厂40多个，职工1 450人，织

① 《正阳县志》卷二，第62页，民国25年铅印本。
② 《孟县志》卷八，第45页，民国22年刊本。
③ 《温县志稿》新排本，第50页；河南省档案馆存档，太行公署1429:1。



布机564张，平均每厂有织工30多人，布机10多台[①]（其中有12个平民工厂）。

不过，被纺织洋布和洋布所取代的主要是旧土布中的商品布，主要发生在东部特别是交通干线上的城镇，广大腹里地区，传统的、自给性的家庭手工纺织业依然广泛、牢固地存在，如汝南县境，民间到20世纪30年代末"时服多用粗棉布"，间有用洋布者，"类多作为应酬庆吊之特用品"[②]；通许农家妇女以纺织棉布作为"最要工作"，"其所制衣料多用土布，少用洋布"[③]。据1935年的粗略调查，省境在有报告的79县中，农家买洋布者占24.3%，纺织洋布者占58.7%，前项约低于全国平均数（29.9%）5个百分点，后项约高于全国平均数（24.4%）34个百分点[④]。可见，全省就总体而言，传统的手工纺织离解体还相差很远，在全国各省中依然是保留特多的省份。

在随后到来的抗日战争时期，灌输市场的洋纱、洋布大为减少，手工纺织因而又得以复苏和发展。如在豫西南，20世纪40年代初编纂的《方城县志》称："近因洋布缺乏，营（土）棉布业者渐遍于全县，运售于洛阳、西安、郑州等处，颇为发达"[⑤]。镇平的人们去外县贩棉入境，妇女用此"以土法纺纱织布者颇多"，除自给外，还供军队采购，并大量运销西北各省[⑥]。南阳城内，收购土布的行店有503家。同样，在未沦陷的豫中地区，手工纺织也"颇为发达，成为农村妇女惟一副业"，各县城和集镇都开设不少花行，"农村妇女拿纺成的纱和织成的布，去街上

---

① 河南省统计学会等：《民国时期河南省统计资料》下册，第69、70页（内部资料），1987。

② 河南省统计学会等：《民国时期河南省统计资料》下册，第431页；《汝南县志》第十一卷，第1页。

③ 《通许县新志》卷十一，第29页，民国23年新豫印刷所铅印本。

④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三），第753页，三联书店，1957。

⑤ 《方城县志》卷五，第2页，民国31年铅印本。

⑥ 《中央银行月报》第9卷，第12期，第3393页。

换取棉花的络绎于途”[①]。许昌一县41万人，有纺车近5.3万辆，织机近0.8万张。1942年据省内25县的报告，在农户总数中有57.7%以手工纺织为副业。因为土布行销兴旺，所以在未沦陷的县份，手工作坊和工场棉纺织业继兴。以下再简述一下其他手工业。

（二）乡间作坊

在新中国成立前，河南各县除了手工棉纺织外，其他手工业主要集中于“八作”（木、泥、石、画、油、漆、竹、扎）、“七坊”（粉、染、酒、磨、油、烟、糖），另外还有铁、铜、银、锡等匠和席、荆、陶瓷、造纸、丝织、皮革等工，凡属城乡人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各个方面都有相应的手工行业。这些都是鸦片战争前后已存在的传统手工业的延续，时至20世纪30年代仍“大都使用旧器，沿袭旧法”，“赖十指生活”；“多系独自经营，父教其子，兄授其弟”；从业者大都在农闲时执业，农忙时务农。这些传统手工业到了本时期，也因一是“受列强经济侵略，在市场不能与外货竞争”；二是“农村破产，人民缺乏购买力”，而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甚且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入境日多的棉、毛、丝织品和煤油、染料、糖、纸、卷烟、火柴、玻璃和搪瓷等制品可以取代的，衰退较快，包括制靛业、造纸业、金属制品，没有相应的“洋货”竞争，或没有其他新式器具替代的，则衰退不显，或能维持原状；交通干线附近的城镇受冲击较大，腹里地带受冲击较小。直接服务于城乡人民日常生活的“八大作”，所受的冲击当更小。

（三）卷烟制蛋等业

在部分手工业受到打击而趋向衰退的同时，随着国内外、省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20世纪一二十年代兴盛起来的仿制洋货或供出口需要的手工作坊和工场也继续开办，主要是：

1. 卷烟业。除在许昌等产烟区出现了不少烟厂（作坊、工场）外，其他地区如临颍县，卷烟业“大有蒸蒸日上之势”。驻马店一镇，开办

① 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第31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的卷烟作坊、工场多达百余家。据省政府统计室调查，到1936年，全省大小烟厂共34家，有卷烟机109台，最大的沈丘烟厂有40台，职工总数3 000多人，年产卷烟5.7万箱。还有不少手工卷烟的作坊或工场未计算在内。总起来看，抗日战争前几年，手工卷烟业在20世纪20年代已有的基础上是有所发展的，不过步子迈得较小。

2. 制蛋业。20世纪30年代，有洛阳的同和裕蛋厂（资本0.8万元）、安阳同和裕蛋厂（资本0.7万元）等新的制蛋工场继续开办，但数量较之20年代少得多。省政府统计室1936年收载蛋厂大小共28家，职工总数4 200多人，年总产蛋品2 100多吨。其中劳动生产率较高、平均每个工人年产蛋品在5吨以上者6家，其余22家当为手工工场或作坊①。

3. 草帽辫和草帽业。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进入20世纪30年代，荥阳、鹿邑、清丰等县执此业者还不少，郑州、洛阳、荥阳、驻马店等地开办的草帽厂，都生意颇佳。但与20世纪20年代比较，此业相对衰退，无论草辫和草帽都售价日低。像郑州，往年草帽厂曾发展到十余家，年产粗细草帽30万顶，到1936年大都关停，只剩数家继续营业。

其他各业的作坊或工场，如开封的中兴造胰厂、安阳的郭天利工厂和振兴铁工厂（两厂均制造轧花机、织布机、高车、水车等）、许昌的新华造胰厂和裕民（面粉）工厂、新乡的新昌（制皂）工业社、巩县的瓷业厂等，均在抗日战争前几年开办，资本大都不过一两千元，产品主要满足当地人民生活需要。

由于东西各国人造丝生产日多，又对中国丝织品重征关税，加上日本等国丝绸的猛烈竞争，河南过去较为发达的丝织业大遭其殃。豫西南柞绸，到1934年，“海外市场逐渐衰落，国内通都大邑亦少采用，较前一落千丈”②。像镇平，1932年后丝价狂跌50%，绸商倒闭90%，到

① 河南省统计学会等：《民国时期河南省统计资料》上册，第299、330页；下册，第73页（内部资料），1986。

② （台）《革命文献》第57辑，第656页。

1935 年只剩下数家勉强支撑。蚕丝绸也同罹厄运。开封原有绸厂 12 家，到 1934 年全部停歇；荥阳、禹县、项城等地蚕丝生产和丝织业也多奄奄一息。

接着，1937 年日本侵略军入侵省境，河南手工业更遭到严重的破坏。好在未沦陷县份，因为抗战期间包括河南在内的后方省区外货入境剧减，遂使"内地工厂，如卷烟、织布、织绸等，次第设立，风起云涌"[①]。河南的手工卷烟业发展尤快，光许昌一地即开办起 150 多家烟厂，有人力或马达带动的卷烟机 200 多台，超过战前全省烟厂卷烟机总量。全省 60 多个县，有较大的烟厂 700 多家，卷烟机一千数百台，年产卷烟 22 万多箱，占领了后方各省近 80% 的卷烟市场。其他如棉织、丝织工场和作坊也开办不少，产品"几垄断后方之全部市场"[②]。造纸、皮革等业亦有较大发展。可是，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货品像潮水似的涌入河南各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不但都市上外货充斥，即外县乡镇亦莫不有舶来品侵入，以致各县甫有萌芽之卷烟、织布、织绸等工厂，纷纷歇业，十有八九"[③]。其他各种手工业概莫能外。加上国民党发动的反革命内战的破坏，全省工场、作坊手工业遂坠入谷底。

（四）手工采煤业

由于河南内外环境与其他产煤省份有所不同，像中福、六河沟等近代煤矿外销不易，生产能力难以充分发挥，而土法开采的小矿既没有什么机器设备，投资不大，可以不付或少付高额贷款利息，也没有机器折旧费，而且工人工资一般只及大矿的一半或稍多一点，组织机构简单，可以节省大笔"事务费"，经营比较灵活，销路顺畅和冬春农闲时添工多采，存货积滞和夏秋农忙时减员少采，因此其吨成本不过 1.4 元左右，几乎较大矿低一半，有些小矿，吨成本且只有 0.8 元，在本地和附近县乡都很有竞争力。所以，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后，手工开采的小煤矿

① 《河南省参议会第一届第二次大会汇刊·提案》，第 138 页，民国刊本。
② 《河南合作》，新第 1 卷第 3 期，第 4 页。
③ 《河南省参议会第一届第二次大会汇刊·提案》，第 138 页，民国刊本。



仍有增设。据报，在密、禹两县，在1930年度领照采煤者五六处，1932年增至15处，1933年再增至20处。综合各种零星记载，1928—1946年全省新开的小煤矿近60家。但这些小煤矿，"率皆资本薄弱，其工作亦无恒率，往往开采不久，即失败停办。是以小矿之产量，恒无定则，按年计算，往往相差甚巨"①。在这样的情况下，省境各小煤矿长期都处于低下水平，很难发展成采用机器和"西法"开采的近代煤矿，即使像历史悠久的禹县三峰煤矿，艰难维持了30多年，仍然不甚景气，每年只在冬春时开工，夏秋即停歇。

三、发展实业的缺陷和阻力

民国时期，地方人士大声疾呼要求"振兴实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业，并为此作了不懈的努力；一些外省投资者也看中了这个资源丰富、原料和工价低廉、受外资挤压相对轻些的省份，前来开办厂矿。然而，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成效却令人失望。

民族工矿业力量幼弱。在整个民国时期，全省工业投资累计不过2 000多万元，而许昌一县，1928年烟叶总产值即达4 000万—5 000万元。也就是说，包括众多的小工厂和停闭企业在内，全省30多年累计投资总额也只相当于许昌年烟叶产值的一半。如与全国比较，据学者估计，1947—1948年，全国民族资本估值为148 492万元②，河南即以2 000万元计，亦不过相当于全国的1.3%，如再扣去众多的小工厂和停闭工矿，那就不到全国总额的1%。拿产值来说，加上煤矿，在最高峰的1936年，总值在全省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不过3.2%（一说4.8%），在国民经济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不到1%。据稍晚的1949年估算，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在全国排名第28位。

近代工矿企业门类残缺。在1932—1935年开设的31家合乎工厂法所定标准的工厂中，投资最多的是棉纺织业，占资本总额的74.82%；次之是打包业，占12.5%；再次是面粉业，占6.7%；其下为电

① 王景尊：《河南矿业报告》，第85页，开封新时代印刷局，1934。

② 许涤新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76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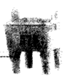
业（占2.91%）、机械业（占1.29%）、打蛋业（占1.21%）、制革业（占0.52%）。规模窄小的卷烟厂和为数寥寥的制皂、玻璃等厂，仍不成体系，欠缺很多，在织染、织麻、毛织、丝织、造纸、榨油、饮料、制茶、制糖、酿酒、橡胶、水泥、砖瓦、陶瓷、搪瓷、制药等业以及矿业中除煤炭外的其他各矿，没有一家近代工厂（间有若干手工工场或作坊）。

从地域上看，为数有限的工厂，主要集中在郑州、安阳、开封、许昌等城市，尤其是使用马达和工人在30人以上的工厂，据1935年报告，有8厂设在郑州，7厂设在安阳，4厂设在开封，4厂设在许昌，另8厂分别设在商丘、汲县、武陟、孟县、太康、陕县和灵宝（每处1厂），包括洛阳、南阳、新乡、信阳在内的其他各县，即或有陆续开设者，亦均为不使用马达或工人不足30人的小厂，绝大多数的县连这样的小厂也没有，近代工业一直是个空白，更谈不上有相对集中的、有较大辐射力和带动力的工业中心城市。

厂矿规模小，资本的有机构成低，技术装备差。工厂平均每厂资本额不过七八万元，为数最多的蛋品厂、卷烟厂尤为简陋，大都为手工操作或季节性生产。据1935年对31家符合工厂法规定标准的工厂调查，纺织、面粉、打蛋、制革、机械、电业、打包和其他各业，总共有动力不过400座，总马力1万多匹，机械总值644万多元①。即便像中福公司这样的最大煤矿，井下采掘仍然与土煤窑一样使用钎、锤、镐、锹等手工工具，凭人力掘进。

进入40年代，更每况愈下，棉纺织业固然如前所述，已一落千丈，次于纺织业的面粉业，资本总额只及全国的0.1%，产量只及全国的0.3%②；卷烟厂在抗战期间虽开办特多，但后方省份新建的20多个近代烟厂却无一在河南，河南只给四川、陕西的烟厂提供烟叶；电力工业更是落后，1935年全省发电总容量不过2 000多千瓦（独立电厂），在北方省份中也居于末位，较之江苏（10万多千瓦）、广东（3.6万多千

① 河南省统计学会等：《民国时期河南省统计资料》上册，第301页（内部资料），1987。
② 《公益工商通讯》第2卷，第4期，第8页。



瓦)等南方省份差距尤大,以致论者称:"河南电气事业殊不发达,虽在中原,尚不如边省。"[①]其他各业也大同小异,致使河南成为资本主义工矿业特别落后的省份。从清末以迄民国,河南发展近代民族工矿业的期望一直犹如空中楼阁。

河南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业发展之所以特别困难,有地域性的原因,如缺乏南方省份那些大官僚、大买办,资金缺乏,筹集困难;风气闭塞,地主富人对集资办厂"谈虎色变";缺乏经营、管理、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近代金融和通讯事业以及市场发育程度均明显滞后:所以省内实业界人士谈其切身体验说,在这个北方内陆省份,"经商之难,十倍于通商口岸"[②]。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已成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宰制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个总体性也是根本性的原因。

帝国主义凭借其侵略特权,培植和驱策历届中国政府为其侵略权益服务,同时又凭借其经济优势、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把持中国的远洋运输和铁路干线,主宰国际市场和金融,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业肆行控制、倾轧和摧残,使其始终处于从属和幼弱的境地。河南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业之所以时兴时衰,艰难曲折,决定的因素就是帝国主义压迫的暂时减轻或继续加重。地方人士在探析各地民营企业亏累时,异口同声地提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外货充斥"。这是完全合乎历史实际的,拿河南最具发展条件的棉纺织、蛋品、烟草、面粉、煤炭等业来说,情势正是如此。

还在20年代初,一方面由于外纱的倾销,"纱价日见其跌",另一方面由于外商争购棉花,"棉价则日见其增",实力微薄的河南棉纺织厂"往往以棉价之成本制成纱后,每包尚得赔洋若干",除去流动资金

① 国民党中央党部经济计划委员会:《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建设》第6章,第3页,台北,1966。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工矿业》,第20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稍多而能预先存储棉花者尚能获得微利外，其他纱厂均告亏累[1]。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期间，中国国内市场国产棉纱每包售价合银160两，细斜纹布每匹售价合银6.2两，而日资纺织厂同样的纱、布售价分别为140两、4.8两。及至国产纱、布被迫降价以争时，日厂又进一步跌价竞争，“务使中国纱无可再跌，无法出售而后已”[2]。深处内陆的河南，同样“因洋纱倾销，加以农村经济破产”，而受祸深重，“成货堆积，各厂亏累日甚一日”，“豫丰”、“华新”、“豫新”、“成兴”等厂先后停业或减产，郑州、陕州等地打包厂工人也因此失业80%[3]。1936年才告复苏，随之又发生了抗日战争，全行业又急转直下。蛋品加工业一度相当兴旺，但其命脉始终完全掌握在外国商行手中，产品完全靠外轮远运欧美。20世纪20年代后，欧美各国增抽关税100%—150%甚至700%—800%，或以中国蛋品含铅量过高而禁止进口，总之是“处处留难”，加以日本蛋品又极力抢占世界市场，遂使河南蛋业“一落千丈”[4]，许多蛋厂被迫停歇。在煤炭市场上，销量最大的沪、汉、津等地，有外资开办的开滦、抚顺、临城、井陉、门头沟等矿或其本国所产煤炭猛烈抢占，因其吨成本差不多低于豫矿一半，所以进展很快。如六河沟煤炭，因有临城、井陉等矿的竞争，只能以安阳以南平汉路沿线为销场。但外资煤炭又远销汉口，致使六河沟煤炭“销售日难”。接着，日本煤炭又跌价倾销，仅仅半年，连开滦煤也滞积13万吨，豫煤更难与抗。随后日本更变本加厉，将抚顺煤和本国煤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中国各埠，如1936年上海、汉口、天津之地华煤每吨售价分别为15元、13元、12.7元，而日煤则分别为9.8元、7.8元、10元。这样，河南煤炭外销市场多被外煤抢占，煤业“危险万状”，有退无进，自属势所必然。

---

① 天津《大公报》，1923年1月27日。
② 《申报月刊》第2卷，第10期。
③ 河南省统计学会等：《民国时期河南省统计资料》下册，第397、447页（内部资料），1987。
④ 《工商半月刊》，第1卷，第7期。



不仅如此，帝国主义还对我民族企业实行直接劫夺。如美国慎昌洋行即利用豫丰纱厂筹资困难，贷款该厂，以“租办”名义，接管了这家河南最大的纱厂，所派驻厂代表一人，每年所费高达 2 万余元，相当于全厂工人半个月的工资；复呼朋引类，安插徒党，致使该厂“组织复杂，名目繁多”，“支薪不办事之大员”壅塞于各部门，成为该厂多年亏累之一大原因①。以后该厂虽转借中国银行资金收回自办，但仍然规定厂中所用机器和各种物料，均需采用美国产品，任其高价敲诈。加上所产之纱“屡受洋纱抵制”，长期经营困难。六河沟煤矿也因同样原因，先后被德商、比商所窃夺，主要职员“均位置洋人，日给多”，“华人之权，尽行消灭”。目的是“不惜先为种种破坏，以动摇该矿的根本，再借债务压迫，去攘夺该矿的主权”②。抗日战争期间，沦陷区所有厂矿更直接遭受日本的殖民掠夺，被侵略军用各种名异实同的方式——“军管理”、“委托经营”、“租赁”、“收买”、“合办”等，夺归日本军方、会社、公司掌管。有些工厂连机器设备亦被拆走。类似这些都说明，处在帝国主义重重压迫和多方摧残下的河南近代民族工矿业，是根本不可能顺利、健康地发展的。

封建主义对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业的压抑和破坏作用也十分深广。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异常苛重的封建剥削，造成农民的极度贫困；自然经济固结不解，机制商品再“物美价廉”，占人口 95% 以上的农民也很少购用。工业品市场十分窄小，资本主义新经济的底土非常瘠薄。加以高利贷十分猖獗，厂矿利润率哪怕常年在 50% 以上，也抵不上一年翻几番的高利贷获息之厚，众多负债经营的厂矿除非能获致高过高利贷利息的水平的利润，方才能吸引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投资近代工矿业。河南工矿业资本之所以缺乏，积累之所以既慢且少，主要原因不是省内货币财富绝对缺乏，而是广泛、严重存在的封建地租和高利贷剥削

① 开封《河南民报》，1933 年 5 月 6 日。

② 《民国时期河南省统计资料》上册，第 444、445 页（内部资料），1987；徐梗生：《中外合办煤铁矿史话》，第 177 页，商务印书馆，1946。

对工矿业利润的严重侵蚀。正因为此,一些企业主,如经营中原煤矿的王印川,就热衷于将其积聚的财富用于开办像"贯川钱庄"这类高利贷机构,并兼并土地3 000多亩。不少地主且凭借其土地把持矿权,坐取煤矿收益。像汤阴"时利和"、"华昌"等矿,每出煤1万斤,地主即提取2.7元(相当于工人所得的1/3);密县民生煤矿,不管盈亏,每亩矿地均须交付地主租价40元,另加所采煤斤的10%。又因各地封建势力盘根错节,勾结官府和土匪,犹如独霸一方的土皇帝,厂矿企业为了少受官府和土皇帝无止境的鱼肉,对他们不得不多方巴结。像成兴纱厂厂主鲁连城就曲意联络县中"巨绅"薛青(国民党大官僚薛笃弼的本家),"借重薛家在政治上的地位和力量扶持帮助"①。一些小企业主无此力量,则等而下之,用"送干股"等法取媚于地方恶势力。就是中福公司也难幸免,光联合办事处职员就多达629人。汲县华新纱厂,职员几乎占全厂人员的1/8,只有4个稍有技术,其余86人"都是国民党党部、军政机关介绍去的"②,常年像蛀虫一样蛀蚀企业的肌体。河南民族工矿业的羸弱躯体里又长上这些封建主义的毒瘤,自然不可能健康成长。

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集中代表——历届中国、河南政府的黑暗统治也给河南民族资本主义带来很大的祸害。民国以来,河南军阀混战、"杆匪"骚乱、枪会、民团与"杆匪"相互争战,十分频繁和酷烈,社会秩序极不安定,厂矿经营活动和生存条件十分恶劣,有关记载在论及不少厂矿之所以难以发展甚或倒闭的原因时,常有"兵匪滋扰,赔累不堪","时局不靖,土匪充斥,矿商咸不敢投资,坐视良好煤田,货弃于地,民生穷困,无法挽救"等慨叹③,就如实地反映了这一点。像六河沟煤矿在开初几年还能有所盈利,但1924年直奉战争爆发,1925年奉军又与国民军争战,接下来又是北伐战争、蒋冯战争、中

① 《武陟文史资料》第1辑,第103页。

② 河南省档案馆存档,太行区党委110:1。

③ 《河南通志稿·矿产志》(未刊稿);胡荣诠:《中国煤矿》,第345页,商务印书馆,1935。



原大战、九一八事变等，几乎无岁不乱，矿区虽紧联平汉铁路，不仅无车运煤，就连自备的机车亦被征用。加上战乱期间，各种物料价格无不上涨，过往的军队又连续勒索，动辄几十万元，遂致连年减产，到1936年产量较1926年减产1/3。省内其他大小企业，无不深受此苦，即使有权势之家作保护伞的成兴纱厂也由此“元气大伤，已濒于无力经营亦无法经营之境”，只好将厂子租给他人，自己则迁避山西另办纱厂[①]。

另一方面，历届中国政府、河南省政府，不仅不采取实际措施（而不是纸面上的表示）扶持幼弱的民族工矿业，反而为虎作伥，协助帝国主义压抑民族资本主义。1930年，新乡一个蛋厂经理在全国工商会议上概述河南情况时说：“各处厘捐，频年屡加，漫无准则，率由各局所巧立名目，任意增收……除厘捐之外，时有敲诈商人之举，稍不如意，便曰我要增加一倍，或曰增加两倍，以示要挟。”[②]而各地所设征税机关又相当繁多，光平汉、道清、陇海三条铁路线上即分别设有此种机构133处、21处、67处，水路由道口沿运河去天津，沿线设有统捐税卡20多处。全省正式设置的厘金总局27处，分卡360余处。厂家在原料采购和产品运销上，由此增加了许多负担和刁难（惟洋商可免）。有些捐税或有关规定，从纸面上看中外一律，但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不实行保护税则、保护运价，这种表面上的“公平”就变成了危害华商的刀子。拿棉纺织业来说，在裁撤厘金以前，国民政府至少在纸面上规定像河南等内地省份所产棉花可以减免税负，裁厘以后，此种优待也被取消。再如煤炭，原定不论外商、华商、大矿、小矿，每吨交煤税0.15元。1931年后改征统税，增为0.3元（后经矿商强烈要求减为0.25元）。开滦、抚顺等外资大矿成本低，却与成本高的华矿同此税率，以故当时人士就评论称：“这简直是为外资煤矿开辟新市场的清道夫。”[③]以上诸种征税办法也照行于河南各地，不过征索更甚于南省。如财政部所派“矿税征收

① 新乡《平原日报》，1949年10月10日；《河南文史资料》第1辑，第167、168页。

② 《全国工商会议汇编》，第224页。

③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916页，三联书店，1961。

专员”前来焦作，规定每吨交矿税0.4元，相当于煤价的10%，难怪中原公司指责此种办法“势必陷全国煤矿于破产之绝境”[①]。

以上种种，仅举其明显可见者，但却足以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中国，特别是像河南这样的北方内陆省份，近代民族工矿业的发展，以及诸如“实业救国”等美好愿望，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

第三节 商业、金融和交通运输

一、商业

本时期省内商业也可以抗日战争爆发为界，前后有较大的变化。

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七八年间，与帝国主义和本国工业资本联系在一起并作为其附庸的近代商业，在此前已有的基础上继续有所发展。更多的商人，适应日趋扩大的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要，着重经营“洋货”和向外埠、外国供应工业原料。农产品的商品化和“洋货”广销河南城镇就说明了这一点。

拿省城开封来说，20世纪初的10年间，“市上所陈新异舶来品，平民皆不乐用”，但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市民日用所需，多舶来品，约在十分六七”[②]。郑州到20世纪30年代初，“市面上多半是洋货，如匹头、香烟、火柴等，穷乡僻壤多有”。据估计，每年由沪、汉两地运销来此的洋布、香烟、糖、杂货总值约1 000万元。漯河一镇，据云每年输入的煤油、英美烟公司的香烟，汉口、上海等地生产的棉纱、染料和绸缎、布匹等京广杂货共一千三四百万元[③]。参与这些洋货运输的，除本

① 《中行月刊》第3卷第4期，第40页。

② 林传甲：《大中华河南地理志》，第93页，民国9年中华印刷局铅印本；河南省建设厅：《二十年度建设概况》，第114、115页。

③ 中央档案馆等：《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177页（内部资料），1984；《中行月刊》，1931(4)，第16页；第5卷，第4期，第22页；第5卷，第5期，第21页。



国、本地一般商人外，还有外国煤油公司、烟草公司直接雇用或就地培植的买办商人或代理商。

不过，这些所谓"洋货"，其实包括不少本国民族工业制品。即便像郑州这样的中心城市，除煤油和化妆品等"时货"大部分来自欧美外，其余包括棉纱、布匹、五金、纸张，"国货占十分之九"；陇海线上的陕县，大宗商货包括洋布、绸缎及各种杂货，多为河北高阳、山东潍县、浙江杭州和本省南阳等地所产的国货；经济比较发达的新乡，除染料来自德国外，布匹、绸缎、杂货、时货等"均为国货"。其余不紧邻交通干线和中心城市的城镇，国货所占比重自然更大①。综合起来看，全省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煤油、烟、染料、洋纱等外国、外省工业制品的行销几遍南北各县，尤其是煤油、染料市场更全为外货所垄断。

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商业资本，自然有各种封建陈迹广泛存留。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规律和利润规律主宰经济活动，排斥不等价交换；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滞后的河南，情况却完全不是如此，商人常年与分散的、贫困的农民普遍进行的是不等价交换。由于河南各县的度量衡异常紊乱，这种不等价交换越发严重。当时的度量衡不仅此县与彼县互异，就是同县各乡也很不一致。像内黄各乡，尺则"各界分歧，长短不一"；斗亦"因地而异，驳杂不一"；秤有"平秤"、"加三"、"截半"、"加三五"、"加二五"之别②。如在太康，秤、尺、斗各有3种，同一麦斗，城内为46斤，四乡有32斤、34斤、40斤不等。"奸商借此牟利，忠实者每为所欺"③。

一些商业资本还与高利贷结合，对农民进行盘剥。如在产烟区，许多烟行商人就向烟农预放高利贷，烟农交售烟叶时，又有"加一五"、"加二成"（即以115斤或120斤作100斤计价）的额外盘剥。棉花商

---

① 诸地情况均见《民国时期河南省统计资料》下册《56个县社会调查》有关各县的"商业"部分。

② 民国《内黄县志》，第260页（稿本）。

③ 《太康县志》卷三，第30页，民国22年铅印本。

行的“放期花”，粮食商行的“买青苗”之类，性质亦与此一样。农民人店购物时无力交付货款，商人允其赊欠，而同样以高利贷形式取偿，如货价100元按月息2分5厘行息，则实给75元的商货，叫做“倒装利”。还有不少商人，不是将其所获利润用于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而是热衷于兼并土地，或则变之为高利贷资本，多方剥削农民。据20世纪30年代南京政府土地委员会于河南12个县调查，承典（最后大都买断）农民土地的，有24.29%均出自商界[①]。偃师人称“梁财神”的大商人梁鸿涛，以其经商所得，买田置地共1 400多亩。像梁这样的事例，在各地都屡见不鲜。类似这些，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河南商业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性质。

这种商业，盛衰与农村经济的发达或衰退关系十分密切。就是像洛阳这样的城市，每年也都以农村秋禾登场，“为商业极旺之季，而各业一年经营，其得失盈亏，无不系于此”[②]。由于农业衰颓，农民困乏，加上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河南自然不可能走向兴旺发达。即如省会开封，过去“商贾云集，商业兴旺”，1932年时货、西装、杂货、酱点等业，倒闭者十有三四，还在营业的，“亏本者十有八九，除大公司亏折数万元不计外，类皆在1 000元上下”。据全省各地232个农情报告员的报告综合计算，商店营业状况相当于以往平常年份的百分率为：1930—1931年为57%，1932年为60%，1933—1934年为63%，1935年为51%[③]。虽然其绝对数值很不准确，但商业衰颓的态势却是十分明显的。

抗日战争开始后的八年，城乡商业遭到日本侵略军的巨大破坏和掠夺，各县商业活动在沦陷初期均几乎停歇。以后，伪政权建立，日本殖民当局又对我社会经济各部门实行严厉的统制和掠夺（见前），给沦陷区的商业带来致命的打击。商业所受损失之巨，是以往历次国内战

① 刘茂增：《河南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抄本）。
② 《中央银行月刊》第4卷，第10期，第2320页。
③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476页，三联书店，1957。



争所没有的。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河南处于后方各省的最前线,敌我交叉的漫长战线也是物资交换的封锁线。国民党军、日军各自于交通要道设置的检查站,实际上是走私牟利的通道。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特于界首设苏鲁豫皖物资管理处,后又与军统同组财政部货运分处,垄断贸易,常年从事大规模的走私。在开封,孙良诚、庞炳勋等部伪军,也收集沦陷区物资运至朱仙镇一带河口,与汤恩伯部交换农副产品。1939年,日军有组织地走私大量商货进入我后方各地,套取大量法币,以动摇法币基础。1940年9月后,日本加强了其对沦陷区物资的垄断和掠夺,贸易减少,但走私仍继续下来,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多与走私商人狼狈为奸,从走私中获取暴利,具体数量已无法统计。一时间,漯河、周口、洛阳等地,都成了走私商货的集散要地。加上通货膨胀,物价变动很快,商业投机之风大盛,适应大后方需要的工场和作坊手工业又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使得国统区内许多城镇的商业趋向畸形繁荣,就连过去热衷于地租剥削的地主也竞起经商,从商业投机中获取暴利。豫西南重镇南阳,县城商铺有30个行业,较战前增加1/3,资本增加1倍以上。内乡的马山口,商铺发展到528家,药材、布匹、京广杂货等行的业务范围广及两湖、广东、四川、安徽、江苏、山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河北各地。舞阳、漯河、临颍、许昌等地,均成为走私货品的重要转运地,"豪绅地主正大量地向商业资本发展","走私而发财七八万的很多"①。

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为了免致物资资敌和平抑物价,曾对贸易实行统制。1938年,设河南省贸易局,次年改建为战时贸易委员会,专责办理本省产品运销并调节各地供求,杜绝土产资敌。1942又改为河南省贸易公司,并对盐、糖、火柴、香烟实行专卖,由官方垄断经营批发业务。1943年后,又对粮、油、棉、盐、布、燃料、纸张等人民生活必需品实

① 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第406、312、45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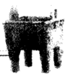
行限价。这些举措，当时虽有其正当性和必要性，但却只能限制一般商民，官僚和国民党军队反可借此因缘为奸，走私发财；地主豪绅因有封建特权可凭，其商业投机活动也并不因此而有所不便。自然，这种“繁荣”并不是建立于工业、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而是抗日战争期间特殊环境的产物，因此就犹同无本之木，形势一变，就会很快萎缩。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商业也随之急转直下，落入民国以来的最低点。其所以致此，除了陇海、平汉等铁路因国民党运送兵员和各种内战物资而减运或停运商货，从而给商品流通带来极大的困难外，直接原因还有：

1. 通货膨胀。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就滥发纸币，造成物价飞涨。1946 年，开封零售物价比 1937 年上升了近 79 万倍，全省各县无有例外。1948 年 8 月开始发行金元券，短短的两个多月中，又滥发 10 多倍。到 1949 年春，省内金元券更是巨额贬值，实际上也等同于废纸，以致许多县乡倒退到“粟易”（用原粮换取日用品）时代。在这样的金融环境下，城乡正常的商业活动已很难进行，一般商民因此破产者日有所闻。

2. 苛捐杂税和无端勒索。为了筹集巨额的反革命军费，国民党政府变本加厉地强征各种苛捐杂税，除了大大增加营业税、印花税等原有税种的税率外，1946 年 10 月起，又开征麦粉、水泥、皮毛、茶叶、锡箔、迷信用纸、饮料品、化妆品等新税。1947 年 9 月，再发布训令，规定“地方绥靖工作所需各项临时支出”可筹征“绥靖临时费”。河南从省县到乡保，从各级政府到各支军队和党（国民党）团（三青团）组织，都可随时随地以各种名义向农民和商民派捐派款。于是，苛捐杂税花样翻新，无奇不有，其给商业带来的打击是异常深广的。

3. 官僚豪绅欺行霸市，垄断商业。内战期间，国民党军政当局为了“剿共”的需要，着力组织、倚重地方封建势力的代表，利用他们掌握的匪化武装（自卫团、民团之类），镇压革命。这些豪绅更因此欺行霸市，鱼肉商民。像光山自卫团副司令张友南，垄断 6 个粮行、2 个杂货行，300 多个小商贩所需商货均得从其手中批发；又与豫华烟厂订立包



销合同，限制商人去外地进货。内乡商业集镇马山口民团团长曹功甫一伙，指挥爪牙，“欺行霸市，敲诈勒索，鱼肉商民，或图财害命，把马山口街市搞得天昏地暗”，仅1946年冬，倒闭的商号就有150余家①。这些都使省境商业“雪上添霜”，营业十分困难。

在这样的情势下，河南商业自然很快就坠入谷底。即在“门面所系”的省会开封，相国寺里亦“冷冷清清，毫无交易”②。洛阳商铺也纷纷歇业，一些商人“竟以聚赌抽头，以维生计”③，大小商号从2 400多家减为1 000余家，连商会会长也都外逃避祸。省内正常商业活动已无法进行，作为国民经济一个重要部门的商业已经陷于完全破产的境地。这是抗日战争后国民党统治给河南社会经济带来的又一个严重恶果。

二、金融业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河南的金融领域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态势，举其要者简述如下：

（一）省、县地方银行的建立

1927年，国民革命军占有河南后，在冯玉祥的主持下，决定建立河南农工银行，实际上就是省银行。总行设在开封，1928年3月16日正式成立。当年，即在郑州、许昌、洛阳、归德、彰德、新乡、天津、汉口、上海、陕州设立分支机构。1929—1949年间，复先后在徐州、南京、重庆、西安、信阳、南阳、漯河、潢川等地设立近50个分支机构，成了近代历史上河南惟一的名符其实的省银行。

该行成立之初，原为官商合办，资本额定为500万元，官商各半。但到1929年年底，仅有商股35万元，官款不仅分文未拨，且透支12万余元。1934年12月，省政府决定改为省营官办，到1942年共由省政府拨付资本400万元。其业务范围为代理省库，发行钞票，经营存、放

① 《内乡文史资料》第5辑，第14、15页。
② 上海《大公报》，1948年2月24日。
③ 《冀鲁豫日报》，1948年4月6日。

款和异地汇兑。1935 年，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后，遵令停发。1938 年，为了抵制日伪套取法币、破坏我金融事业，才重新印发该行钞票，对于活跃抗战时期金融、促进商品流通不无积极作用。其间，曾因日本侵略军之步步进逼，总行先后迁至镇平、洛阳、鲁山、内乡西峡口，1945 年 4 月且一度外迁西安。省内分支机构亦大都停办。抗战胜利后，总行归汴。1946 年 7 月，奉命改组为省银行，旋因开封解放而南迁汉口。1949 年 4 月停业。



河南省银行发行的钞票

1940—1941 年间，国民政府颁布《县银行法》、《县银行总行章程》，要各省组建县银行。河南省政府随即制定计划，通令各县筹设，到 1943 年年底，据报，未沦陷各县已有 65 县银行筹设完成，还有 2 家正在筹办中，在全国各省中仅次于四川，居第二位。后因各县相继沦陷，存留的县银行仅有十多个。抗战胜利后，各县县银行先后恢复，到 1947 年年底，全省共有 71 家。这些县银行的资本，由官商（包括地方法人团体和合作社）共筹，开始时，按照县银行的设置本意，其宗旨和



业务，除代理公库、代收地方附加税外，主要是调剂地方金融，扶助经济建设，发展合作事业。但因各县银行均资本有限，信用不立，所以除了县库存款和机关存款（均活期）外，私人存款极少；放款也很少，加以各县政府随意挪用资金，行员复携款潜逃，时有所闻。除了便于地方土劣以县银行贷款转手贷给农民，进行高利贷盘剥外，根本起不到发展地方经济的作用。

（二）官僚金融垄断资本的确立和法币的发行

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中央银行条例20条。11月1日，中央银行在上海开业。1931年6月，在河南设立的第一个分支机构——郑州支行开业。次年6月，增设洛阳办事处。1933年7月，增设开封支行（后支行均改为分行）。抗战期间，增设漯河、许昌、南阳、渑池等分支机构。后因日军进逼，这些分支机构先后迁往洛阳、镇平、新野、西峡口、鲁山、内乡和甘肃平凉、陕西西安等地，业务活动开展不多。

1933年蒋介石亲自创办的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于1935年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先后于潢川、开封、洛阳、郑州、漯河等河南城镇设置分行或办事处。抗日战争爆发后，除洛阳办事处（1941年改为分行）外，其余均南撤汉口。1942年、1943年，复在鲁山、漯河、灵宝设立办事处。1944年因日军西进，洛阳、灵宝、鲁山行处均西撤并结束。该行的业务，主要亦为经营存、放款和异地汇兑，而尤以办理农贷为重。抗战胜利后，该行在豫各分支机构先后复业，继续发放农贷，但实数有限。

除以上两家新成立的国家银行外，此前即已在河南设有分支机构的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以及其他一些商业银行，经20世纪20年代一度停业后也重来河南设置分支机构。不过，与以前不同，“中国”和“交通”这两个最大的商业银行于1935年均被南京国民政府所接管，变成了另两家国家银行。

民族资本在省内设立的金融机构有：总行设在上海的金城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四明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亦先后于郑州、开封、新乡等地设立行处或寄庄；盐业银行、北洋保商银行、大陆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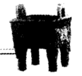
行、中国农工银行，亦分别在河南设置过零星的分支机构。

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官僚资本在河南金融中的垄断地位的集中表现之一，就是发行法币。

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通令实行法币政策：白银国有、银币收归国库，不得继续行用；以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1936年续定）四大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收付概用法币，不得行使现金；其他各银行所发之钞票，已在流通者照常行使，即以此为限，不得增发，已印就而未发之币一律缴由中央银行保管，不再发行。河南各地遵此执行，河南农工银行亦将库存省钞470余万元交由中央银行开封分行保存。

本来，在法币发行之前，河南各县行使的货币非常混乱。硬币有银币、铜币，纸币有河南农工、中央、中国、交通、四省农民、中国农工、中国实业、浙江兴业、中南、中国通商、北洋保商、河北、大中等银行发行的钞券，还有各县商会、商店发行的土票，一些企业发行的工资券、代用券，在当地市场上也像纸币一样行使。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如郑州、开封、安阳、新乡、许昌等，市面基本上行使上列主要银行发行的钞券，但还有不少县城，仍“以现洋作本位”或“以铜元为本位”，行使银元、铜元（有当10、当20、当50、当100、当200诸种），纸币寥寥，尤其是广大农村，更以硬币为主，即使中央银行的钞票也不流通。小范围行使的土票，则屡禁而不绝，一些县份，如泌阳，各商家所发的抵押票、兑换券竟达100余种。这种混乱情况，给商品交流和人民生活带来诸多的不利。通过法币政策的实施，结束了这种延续已久的混乱局面，统一了货币，也有利于商品交换的发展，这是值得肯定的。不过，通过此举，以孔祥熙、宋子文为首的官僚资本劫夺了河南民间的大量现银，成为他们聚敛民财的一种手段。因为统一货币合乎时代需要，所以进展顺利。据报，到1936年6月，省内流通的货币中法币已占73%，到1937年7月，法币至少已占90%。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与日伪进行金融战，河南农工银行经中央批准，将其原来缴存于中央银行的钞票连同新印的钞票共670余万元，又



重新在各地发行，中南、中国通商、中国实业、浙江兴业、中国垦业、四明、中国农工、北洋保商等8家商办银行的杂钞，亦一起允许发行，遂使纸币重归多样化，但法币仍占90%以上。1942年春起，国民政府又发行“关金券”，以1元折合法币20元的比价，与法币并行流通，河南行使不多。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又于1948年8月发行金元券，以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的比率收兑法币。不久，国民党统治垮台，法币、金元券连同官僚资本垄断金融的局面也随之结束。

（三）旧式金融机构的没落

1934年省民政厅第二届行政会议报告书称："各县典当均因军事及种种关系，完全闭歇。"到了抗日战争期间，在豫北、豫东沦陷区，有一批日本和朝鲜浪人又重新开设典当铺，重利盘剥人民。1938年始办时，对当品只估原值十分之二三，每月取息7%—10%。开封一城，即有此类典当铺四五十家。以后纸币贬值，取息自然也水涨船高。这可以说是此种旧式金融业的回光返照。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典当铺也随之消失。

银号和钱庄。进入本时期后，由于政局比较稳定，城乡商品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而许多银行的款项流动主要是公款，民间工商业存放款和汇兑大都还是如往昔一样经由银号、钱庄进行。直到1935年前，省内“金融实权则仍操诸钱庄、银号之手”①。尤其是新型银号，“以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异地汇兑、票据贴现和发行庄票为主，也买卖生金银，在经营方式上公开设立门市，存、放款利率公开挂牌，改用西洋复式记账，注重信誉，注意服务，业务迅速发展”②。与河南农工银行并称为河南金融三大支柱的同和裕银号（总号在新乡）和信昌银号（总号在开封），在二三十年代之交达到鼎盛时期，尤其是“同和裕”，被称为华北最大银号。该号以1.2万元创业，到20世纪30年代初，在省内外设置的分号和办事处达41个，吸收存款1 000万元以上，股金61.76万元，

① 《河南文史资料》第58辑，第169页，1996。

② 邵文杰：《河南省志·金融志》，第1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公积金50万元。1931年，又出资36万元，接办天津大中银行，取得了500万元钞票的印发权，在省内外印发10元、5元、2元、1元、2角、1角钞票。与此同时，大举投资工商业，除于天津开办大东洋行等企业，对日本出口棉花、皮革等商货外，还兴办了一系列工商企业，“企业单位遍及华中、华北以及东北各省，共有103个，从业人员约计2 830余人”①。信昌银号也于省内各地和山西、江苏、湖北、陕西、直隶、山西等省及北平、天津、上海、汉口、济南、青岛、蚌埠、镇江诸城设置分支机构，总数达七八十处，除经营存放款和汇兑外，还兼营粮食、面粉购销和打蛋、榨油等厂。其他如总号设在开封的中权（在郑州、新乡设有分号或办事处）、振豫（在郑州、驻马店设有分号或办事处）、义利永（在郑州设有分号）、晋和、开源、乾元恒、信孚（在郑州、许昌、漯河设有分号或办事处）、豫源成（后改为钱庄）、廉牲、大德恒、德生祥、元和丰，总号设在郑州的华兴，设在许昌的德昌和福茂，设在漯河的义成（在驻马店设有分号），设在周口的永祥等银号，也继续经营存放款和汇兑业务，有的地方，且有新设者。

但时代毕竟不同了。在银行发展和官僚资本依靠国家力量力求垄断金融业的形势下，银号和钱庄操纵河南“金融实权”的局面是不可能长期维系下去的。无论中央、中国等国家银行还是上海、金城等商业银行，“为发展自身营业计，除将本地银号打倒，不足奏效”②。同一般资本不过数万元的银号、钱庄比较，近代银行资本雄厚，信誉更高，服务种类又多，经营手段和方法也灵活多端；“废两改元”和法币政策的实施，更大大减少了银号、钱庄从银两拆兑、票据贴水和内地汇划方面的收入，像“同和裕”那样主要靠旧军阀的支持和官厅存款的大银号，也难以久靠冰山。所以，实力雄厚的信昌银号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即已渐处困境，到1933年9月已亏累9万多元，1933年10月初，开封市面上流传“信昌”亏累的消息，人们纷纷前往提取存款，一周之内，取款

① 《河南文史资料》第1辑，第18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79。
② 《中行月刊》第7卷，第5期，第82页。



230余万元,致使开封总号和郑州分号于12日关停。消息传开,"同和裕"的储户也纷纷来取款,并由开封、郑州迅速扩及"信昌"和"同和裕"各分支机构存在的城镇以及新乡同和裕总号,各号、处亦均关门停业。次年,开封的"福利"、"正兴长"、"宏丰"等也接踵停歇。到1936年,有记述称全省银号、钱庄合在一起不过21家,资本总额212万元①。到了抗战初期,由于一些地方商业畸形繁荣,银号势力有所复苏。特别是成了大后方物资中转地的洛阳,除有从开封、郑州等地迁来的"德泰祥"等银号外,还新开有"蚨源"、"裕民生"、"恒豫"等银号。但1941年后,随着商贸线路的转移,这些银号又迅趋衰落,或停业,或他迁。1945年抗战胜利后,郑州的德泰祥、复元、俊泰、德盛永、豫立恒、宏大等银号,洛阳的宏蚨、裕民生等银号先后复业,但业务活动主要是黄金买卖和商业投机,在金融领域已无足轻重。不久,新中国成立,这些旧式金融机构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四)日本侵华战争中对我金融业的破坏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在连续发动军事进攻,于豫北、豫东沦陷区建立殖民统治的同时,在金融上也进行了种种破坏和掠夺活动。

首先是发行伪钞,吸收法币。1939年春,日伪在新乡、开封设置"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分行(总行在北京),以后又进而在商丘、郑州、许昌设立行、处,大量发行"联银券",掉换法币。1940年,伪河南"实业银行"在开封成立,并在新乡、商丘、安阳等地设置分行,大量印发由半分到1元的7种币券。另外,复印制假法币,在市面通行,以破坏法币信用,又高价收购金银和铜币,大量外运,并向我后方走私大批日货,借以打击我民族工商业和吸收大量法币。敌将各方面汇集来的法币和金银,运往香港、上海外汇市场,换取外汇,持以购买英美物资,以应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并动摇我法币基础。1944年5月后,又向豫中各县灌输伪"中储券",强迫城乡人民使用。不仅扰乱了我金融,而且掠夺了中国人民无数的劳动成果。

---

① 杨客骆:《民国三十七年中华年鉴》,第1187页,台北,鼎文书局,19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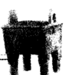
其次是破坏、打击法币。1938年3月，敌公布《旧通货管理办法》，强令沦陷区各县实行。该《办法》将法币分为北方券（中国、交通两行钞票印有北省地名者）和南方券（其他印有南省地名和不印地名者）两种，前者一年后禁止通行，后者当年6月10日后禁止流通；并规定只有“联银券”可以交纳租税，法币则拒用。因为旧法币一时不易禁绝，就强使打折行使。对抗战期间发行的新法币，则更加压低其币值，多要贴水。1939年3月10日，更明令禁止法币流通。规定沦陷区各县法币必须全部封存、上交或限期兑换，嗣后有行使法币者，即处以徒刑或罚金。虽然，由于人民的抵制，法币在沦陷区历年仍在流通，不过与伪“联银券”的比价不断降低，给城乡人民带来重大的损失。

针对日本侵略者上述种种鬼蜮伎俩，国民政府始则于1938年6月颁行《限制携带钞票办法》，禁止旅客携带500元以上法币入沦陷区，并查禁敌货内输，以防法币外流。同时，由河南农工等银行收购金银，限制金银饰物和货品外运，取缔偷运铜币和其他辅币之奸商，以免资敌。（1942年后，情况变化，才将限制法币出境的禁令取消）另一方面，为了保护法币，又重新发行河南农工银行和四明、中南等8家商业银行的已停止行使的钞券。但因国民党军政官员腐败成风，商货、货币和金银走私屡禁不止，大大减弱了上述正确措施的自我保护作用。

（五）通货膨胀

抗日战争前，币值和物价都比较稳定，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一方面由于国民政府年年滥发纸币，另一方面由于日本侵略者的破坏和掠夺，通货膨胀日甚一日，到解放战争时期更达到骇人的程度。有关情况已略见于前，不赘述。

综观本时期河南金融，除了抗日战争期间日本的侵扰外，与前一时期主要不同之点，是官僚金融资本垄断地位的确立，旧式金融业基本上被近代银行业所取代，特别是抗战前的七八年间，长久混乱的金融渐趋正规和相对统一，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可惜为时短暂就情势大变。20世纪40年代，全省金融又重归于混乱，而且愈过益甚，最后在史无前例的通货膨胀中走向总崩溃。



三、交通运输

本时期,陇海铁路向东、西方向延伸,在线路上变化不大,只是客、货运输量有所增加。据统计,1906 年京汉路全线发送 140 多万人,1919 年增加到 400 万人以上。后因连年战乱,客运减少,1931 年后才持续上升。到 1936 年,达 450 万人以上。是年,平汉、陇海(连云港至西安)两线合计发送旅客 710 多万人。货物发送量以 1936 年为最高,平汉、陇海两线合计达 914 万吨。到 1946 年,两线货物发送量只 310 万吨①。

本时期交通运输上主要的进展是公路修筑较多,汽车运输有较大的发展。

1927 年 9 月,省政府成立省道办事处,掌理全省公路建设、管理有关事宜。同年,省政府制定修治全省道路计划大纲,规划了以省会开封为中心的纵横干路和黄河南堤干路,改变了以前枝枝节节、各段自修、互不联接的混乱局面。纵干路分为南北干线(由开封北连封丘、安阳,南通扶沟、罗山,抵湖北宣化店,长 525 公里),东南干线(自开封起,北连阳武、新乡东,南通杞县、夏邑入皖北,长 311 公里),西南干线(自开封起,经尉氏、许昌、南阳、新野入湖北,长 440 公里);横干路分为南部干线(自固始起,东通江苏浦口,西连潢川、信阳、南阳,达荆紫关,长 550 公里),中部干线(自永城起,东通安徽宿州,西连亳州、周口、临汝、洛阳抵潼关,长 690 公里);黄河南堤干路自郑州起,北至京水,沿大堤东连黑岗口到考城入山东,长 235 公里。当时已修成并通车的,共 2 741公里,大部分在平原和丘陵地带,以后才逐步向山区延伸。

1929 年 6 月,省道办事处撤销,成立河南省公路局,办理全省道路修筑、保护及汽车营业管理事宜。此后,省境的公路建设和公路运输渐趋正规。同年 10 月,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公布了 12 条国道干线,其中贯通河南省的有 2 条。1932 年 11 月,南京国民政府召集河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湖南 7 省公路会议,规划建设 11 条国道干线,

① 邵文杰:《河南省志·铁路交通志》,第 110、124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其中关涉河南省的有5条，这5条线路主要是基于军事上"围剿"鄂豫皖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需要而规划和修建的，在省境总长1 806公里，其中铺垫石子或砖渣路面的797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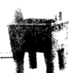
1927年省政府制定的修治全省道路计划大纲也对县道作了具体的规划，1931年部分实施。到1935年，共建成县道153条，长6 372公里；正在施工的尚有89条，长1 601公里。此等县道均由各县乡自行筹款、派夫修筑，道路标准更低，多数均不能维持正常通车。

汽车营运业也有较大的发展。1930年省公路局设长途汽车营业部，负责全省汽车运输事宜，拟定招商承办长途汽车章程，并自置汽车参加营运，于开禹、开周等8线49个站揽运客货，共有各种汽车52辆。截至1935年，全省注册登记的汽车公司22家，有汽车101辆，经营线路32条。另外，还曾于1931年开辟了开封至山东菏泽、周口至安徽亳县、潢川至湖北麻城等省际客运和少量货运。

综计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开初10年，全省"公路通车里程增至5 700公里，新建永久性大桥9座，铺筑中低级路面1 786公里，专业营运汽车增至208辆，汽车营运线路达2 800公里，初步形成以省会开封为中心的公路交通网。但道路质量低劣，涵洞仍然非常短缺；平原路线多沿用驿道而无故弯曲；跨越黄河、淮河等大的河流全赖渡口；铺有路面的公路极少，下雨不能通车，山区路线弯急坡陡，遇到溪流多爬河而过，山洪骤涨即交通中断；营运线路集中在平原地区，全省只有200多辆营运汽车"①。

抗日战争爆发后，豫北、豫东很快沦于敌手，公路多遭破坏，汽车也因战争而多被征发。1938年黄河花园口大堤被炸开，中牟、西华、淮阳等十多县的公路交通设施毁坏无遗。省内公路仅存洛潼、张华等9线，其中只有南洛、洛界、洛潼3线能常年通车。以后，沦陷区扩大，河南公

① 《河南省志·公路交通志》，第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通车里程中如扣去重复里程，实为5 508公里。又同书另处记铺筑路面为1 756公里。本目有关公路交通的论述多据该书，不一一列注。



路交通所受的打击十分沉重。在路线的修筑上,1939 年省政府迁洛阳后,开辟洛阳到陕西潼关、南阳至湖北老河口的省际线路,洛阳成为国统区交通中心。战争期间,只在伏牛山区的鲁山、卢氏等地新修公路百余公里,在卢氏、栾川、嵩县、南召间新修或改善人马行道近 600 公里。但因战争期间铁路运输基本上停止,而"中原王"汤恩伯在安徽界首设立苏鲁豫皖四省边区物资管理处(实是走私处),从江南和沦陷区采购机制品运销后方,又将后方农副土特产品采运沦陷区,转手即获暴利。其他军政官员也起而仿效,许多商人也热衷此道,所以后方汽车运输业仍比较发达,初期有商车 130 多辆。以洛阳为中心,东经漯河至界首,西经灵宝至潼关,与陕西、四川大后方相连,南经叶县、南阳至老河口,与鄂北、陕南相通,开办了洛阳至潼关、洛阳至界首、洛阳至老河口、南阳至许昌、信阳至潢川等 6 条线路。1940 年陕西省开办的华阴至河南阌底镇驿运线,1942 年向东延伸至大营,全程 172 公里,首尾均衔接铁路,营运发达。次年 2 月,与陕西联办西安经河南西坪至南阳的货物联运。此时,全省公路通车里程不过 1 200 公里,其中只一半线路铺有路面;汽车也减耗甚多,省营的公路局只有汽车 42 辆,但完好者只有 17 辆,25 辆均损坏待修。旋因洛阳、南阳先后失守,残存的公路营运线路更屈指可数,汽车亦都迁避陕、甘等省,国统区的公路交通遂完全停止。

在日伪统治区,有开封—商丘、开封—通许、杞县—考城、开封—濮阳、开封—中牟、商丘—柘城、新乡—浚县、新乡—封丘等汽车营运线路,设有开封、商丘、新乡、焦作、安阳等地的自动车(汽车)营业所,主要从事货运,为日军进行侵略战争和殖民掠夺服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省公路局迁往开封,着手恢复全省公路运输,同时也新修了一些线路。到 1946 年年底,有新、旧洛潼路等 20 条线路,总长 2 701 公里,通车 1 491 公里;县道也多所恢复,总长 7 989 公里。省公路局的汽车增加到 73 辆。但是,随着国民党发动的反革命内战日益扩大,刚刚有所恢复的公路交通重新遭到连续破坏。好在过后不久,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伟大胜利,河南的公路交通才绝处逢生。

在公路交通有所发展的同时,内河交通则因河道淤塞日甚而江河

日下。

黄河。曾为豫鲁两省民船集中地的兰封口，到20世纪30年代，“停泊的民船仅二三十只而已”[①]。干流中除了陕县—潼关和开封以下还有木船航行和茅津渡、孟津、柳园、东坝等处渡口有渡船往来两岸外，商船已寥寥无几，船运濒于中断。支流洛河情况较好，自孙家湾至卢氏尚有木船、竹筏可通。尤其是洛河和伊河会合处的洛阳，航运更好，特别是1938年开封沦陷后，黄河船只多迁避洛阳一带，洛阳、巩县之间往来船舶常有数百只，一时之间，因转运走私物资而商务兴盛的洛阳，航运也颇为繁忙。伊河沿岸的栾川、嵩县、伊川等地的商货，亦可顺流运至洛阳集散。抗战胜利后，铁路运输逐渐恢复，伊、洛河的船运遂转归于衰颓。

淮河。淮河水系在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沙河、汝河船筏尚可通联漯河、周口、襄县、舞阳、淮阳、商水、西华、项城、郏县、临汝、嵩县和安徽界首等地，颍河可由正阳关溯行290余公里至周口，更上溯80公里至郾城，水盛时可达信阳长台关，信阳淮河自吴家店以下，狮河自王家岗以下也可通木筏。1938年，花园口黄河大堤炸开后，黄河河水挟带大量泥沙，淤塞了淮河水系干支流航道，加上日本侵略军的连年破坏，使豫东、豫南航运遭到极其严重的摧残。贾鲁河全线淤塞，水运完全停废，沙河、颍河航道也同样淤阻，因此，以前周口、襄城、漯河、逍遥、水寨、槐店等船只集中之地，其航运大为萧条。干流亦因河道淤浅，航运艰难，自三河尖至正阳关，浅滩重重，河水最浅处不过0.5米，三河尖以上同样处于停航或半停航状态。抗战胜利后，各河均因无力修浚，情况依旧，界首至槐店尚能行驶帆船，槐店至漯河水落时只能行小帆船，货运不畅，较之往昔，已不可同日而语。

豫西南的唐、白诸河，因不受黄河溃决的影响，故淤塞情况较以上

---

① 《河南政治月刊》第1卷，第4期，转引自《河南省志·内河航运志》第86页。《河南通志稿》124册，称兰封黄河渡口，“帆樯林立，有粮船行十余家，大船可装货40吨，每年运出货物占全量1/3”。所记不知是往昔盛况，还是渡口南北过渡情形。



诸河轻得多，但水量亦较前减少，航程有所缩短。如在南阳，白河只能在夏秋水盛时行舟，冬春多停。唐河境内，唐河自潭源到社旗，冬日亦因河水过浅而无法行船，泌水也只能于夏季水涨时通船至涧店，邓县湍河水盛时可抵城西文曲集，冬日则仅有10几公里可以航船。淅川、丹江水盛时尚可由荆紫关达陕西龙驹寨，水浅时只能用竹筏。再者，如前所述，由于铁路货运的兴起，由湖北等地运销河南的商货多改由火车运输，所以唐、白诸河的水运事业较前也有退无进。到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占领武汉，封江锁航，各港口又屡遭其轰炸和破坏，唐河、白河、丹江航运屡次中断，民船亦多被日伪军队毁坏，豫西南航运更加衰颓。

卫河。这条豫北大川因年久失修，“冬春则水位枯竭，新乡以上，时或断流”[①]。加以平汉铁路揽载了许多商货，所以即使在水盛季节，如于汲县，“试立河干，极目而望，惟见片帆孤影容与中流而已”[②]。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新乡以下小船大体上还可通航，道口至龙王庙段，河水尤大，往来新乡—天津间的帆船还有500余只，汤阴、内黄、浚县等地河面也有木船往来河面，只是都不如往昔。抗日战争期间，在日本侵略军的破坏下，民船毁坏，货源锐减，整个卫河航运濒临崩溃。就是支流安阳河，原先航船曾多达数百只，在日军占领安阳后，民船多被焚毁或沉于河底，到安阳解放时仅剩木船4只，与往昔相隔天渊。1946年后，经沿河各县人民政府积极扶植、组织，航运很快恢复，龙王庙以上河道上有公营船舶52只，民船225只，成为冀鲁豫区支援前线的一条主要航道。新中国成立后，更日新月异，开始了全新的历史。

---

① 《河南省政府民国二十三年行政计划》，第37页（未刊稿）。

② 民国《河南通志稿》，第125册（未刊稿）。

第四十五章
近代教育文化的变迁

第一节 教 育

一、传统的旧式教育

清王朝出于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对于传统的封建教育相当重视，除由中枢不断遴派学政分赴各省外，各府州县均常设教授（府）、学正（州）、教谕（县）及类同副职的训导等学官。但是，由于封建政治的腐朽，还在清朝前期，这些学校及其掌管的儒学就已有名无实。延至晚清，更每况愈下。学官们的年俸不过银三四十两，所以即使自爱者也不得不靠学官大印为士子和各种不法之徒“印红”赖以“自赡”①，“询所职务，则惟守诸生名册，奉春秋典祀而已，（学）宫墙教室，颓敝充垢”②。作为国家典制设置的“教职”，久已放弃向诸生“传道”、“授业”的“职分”，与原旨完全背离。真正承载全省教育的，乃是各级书院、城乡社学、义学和民间私塾。

书院随清代行政区划，有省、道、府和州县各级（不相隶属），一般

---

① 文武生员应院试录取后，须由本县学官颁给印结，然后才能进谒学政、受领衣衫，出费数十至数百串不等。

② 民国《安阳县志》卷八，第1页，民国22年北平文岚簃古宋印书局铅印本。



清代的私塾

均由相应级别的官府督理（少数由地方绅士筹设、管理），入学者主要是已有功名的地方士子。除像开封等这样的大城市有设置2所以上者外，一般州县大体上均有规模不等的书院1所，其中如开封的大梁书院、明道书院（省办）、武陟河朔书院（道办）、信阳豫南书院（道办）等，均有名于时。各级书院均有官府礼聘的山长主持，课程亦随山长确定，其中最为看重的是程朱理学，等而下之则是八股制艺。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少数书院才有兼修"时务"和近代科学知识者。各书院除日常向院生讲学、授业外，还定期作文评奖，由此培养出一批驰骋科场或学有专长之士。但到了晚清时期，省内大多数书院在日趋腐朽的封建官场的控驭下，也都成了徒有其表的空架子。任山长者，大都是退职还乡的封建官僚，此辈原靠八股得官，本无实学，"宦游数十年，富贵熏其身，案牍劳其形，久不识（八股）时艺为何物（更不用说学术），平生所读书大半遗忘"，至有凭借势力，"以一人而兼掌二三处及五六处者"，而

无官势可凭的“名师宿儒”，反被摒弃[①]。因而，书院功课无不“了草完事”，经费因久被中饱而短缺更甚。像郾城景文书院，虽说久存不废，但山长竟至乏人充任，不过“讲舍数楹，仅蔽风雨，复无藏书”，院生则散居四乡，“或数月一课，或间岁一课，课无定期。诸生……亦复视此为无足轻重”，“久之，遂有以书院肄业多无耻之徒，而敦品积学之士望而不前矣”[②]。也有少数书院一定时期内在重视文教的地方官绅主持下，在培植人才上有所贡献，像前面提到的豫南书院，广购书籍，延聘“名宿主讲”，一时南汝光道所属各州县的举、贡、生、监来院修业者至“斋室不能容”，以致租屋附课，“乡试获售者常十余人”[③]。可惜一则此类书院为数不多，往往人去（官员调任）政亡，兴衰无定；二则所攻研者不过八股时艺，以院生能中举为最高标准，对学术的振兴无大裨益。因此，就总体而论，在近代河南真正承担重要教育职能、直接关系到学术和人才兴衰的书院，是相当衰敝的。到了清末，清廷谕令兴办各类各级新式学堂，这些弱息仅存的书院也都遵令改为中等学堂、师范学堂或小学堂，退出了河南教育史。

官府督理、地方绅士掌管的基层教育机构——社学、义学，承担普及启蒙和识字教育的任务，乾隆以后在各地城乡设置颇广。其中除官府指定专款（主要是学田地租）外，更多的是地方绅商捐田设置，亦称义学。“学以义名，以无力子弟均得资其蒙养，殆犹义田、义仓之意耳”[④]。借此使一些农民子弟接受识字教育，更重要的是讲习封建伦理道德，使能“变化气质，将来或农或商，借以安分守身，不致嗜利忘义，作奸犯科，流为乡曲秕民也”[⑤]。这是社学、义学的基本作用。但是，就是这般最低陋的识字教育，到晚清时期也日趋衰败。特别是19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民战争期间，义学也大都名存实亡。像临颍，城乡原有的社

① 王新桢：《两一子文集》下卷，第53页，民国刊本。
② 《郾城县记》卷三十，第71页，民国23年刊本。
③ 民国《重修信阳县志》卷十五，汉口洪兴印书馆铅印本。
④ 道光《汝阳县志》卷十一，第12页。
⑤ 《汜水县志》卷十，第9页，民国17年上海世界书局铅印本。



学，到1859年(咸丰九年)就全部停废。以后官府虽努力恢复，“民间始闻有读书声”[1]，但成效有限，大非昔比。在这般情势下，作为近代河南旧式教育的真正载体的，只有民间自设的私塾。

近代河南民间私塾大别之有以下三类：(1)门馆(伙食学)，多由有文名的举人、贡生或退职官员在家或择地开设，招生授业；(2)蒙学(散学)，由多家共聘乡里学究设馆教管各家子弟；(3)专馆(家塾)，则是仕宦之家或富室物色有名之士来家教其子弟。其中蒙学主要是教读《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等初级读物。因为入学者多为贫乏农家子弟，“每至登麦刈禾时，辄罢业散去。九月复集，则十仅三四矣。往往修脯不给，复布露而罢”[2]。门馆则比较正规和稳定，生徒要进而讲习四书五经甚至其他典籍，因此又称“经馆”，重在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尤致力于八股时文、律诗、属对等。专馆为数不多，门类不齐，但绝大多数也以应试入仕为标的，只有少数世家大族开设的家塾，同时督导生徒攻读经史百家以至琴棋书画，使之逐步进入学术的殿堂。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闻”，就是后两种私塾共同的政治和社会效用，真正能滋润学术文化者很少。

这些不由官府而由民间自办的私塾无论城镇、乡村都很普遍，蒙学占其中的绝大部分。特别是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如稻作区信阳，“各乡村私塾林立，虽贫民儿童，无不入学读书”[3]。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在普及识字教育上，确实起过积极作用。其间也因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全省性战乱，使各类私塾纷纷停歇，以致光绪年间一部地方志书中有“城内不闻书声，乡间迄少学塾”[4]的记载，但因有普遍的社会需要，所以在七八十年代间即迅速恢复。到了20世纪初，全省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后，少部分私塾添加了一点“维新”内容，包括挂块黑板，搞点体育、唱歌等，但绝大多数均一仍旧贯，从教学内容到方法都少有改变。

---

① 宣统《项城县志》卷三，第47页，民国3年石印本。
② 光绪《鹿邑县志》卷九，第2页，光绪二十二年刊本。
③ 《重修信阳县志》卷十五，民国25年汉口洪兴印书馆铅印本。
④ 光绪《灵宝县志》，卷首周淦序，民国24年铅印本。

民国成立后，从中枢到本省当局曾多次禁办旧式私塾，因实际需要而继续存在者，亦使仿照近代学校进行“改良”。但此等通令均如具文，真正遵行者甚少。民国前期的记载称，即使在省会开封，“私塾鳞次栉比，人民习惯，颇形信赖，地方官不易遽行勒令封闭”；外县更是“恶劣私塾到处充斥”，而“正式学校为数寥寥”①。就全省的基础教育而言，基本上还是旧式私塾的天下，近代学校相形见绌。1927—1949年国民党统治期间，虽不断加强创办学校和取缔私塾的力度，但私塾在河南的基础教育中的主要地位仍未动摇。如许昌县境，据1931年很不完备的统计，共有私塾700余处，学生1.8万余人，较20年代增长数倍；即在学校最为集中的开封城，著名私塾也有60余处，学生千余人。抗日战争时期，学校停歇很多，私塾相对而言更极一时之盛。

总的来说，在近代，河南即使是传统的旧式教育，无论中高级的书院或初低级的社学、义学和私塾，均显得日趋衰敝和滞后，根植在这种旧基瘠土上的学术文化，自然也不可能不受其严重制约，而呈现同样的态势。

二、近代学校教育

仿效欧美资本主义教育制度而创办的近代学校，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南方沿海省区，即已开始涌现，八九十年代间逐渐加多。河南则迟至20世纪初在清廷通谕各省普办学校（当时叫学堂）后才见萌发。其在清末10年间的大体情况，前面已有论列，不再复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从当时官方公布的河南兴学数字来看，成绩好像不小，堪与南北多数省份相颉颃，但此中虚饰的成分很大，在这些官方“成绩”的背后，存在着诸多令人扼腕的弊病，较为突出的有：

1. 泥旧拒新。尽管新办的学校不仅不要学生交纳学费，而且还有颇为优渥的膏火津贴和出身奖励，但城乡青年仍然不愿报名就读，认为“读洋学”就等于“从洋”，而且有碍求取功名。全省最高学府——河南高等学堂只好由省方在各县乡试落榜之士中勉强选出80多人“迫令

① 《河南教育月刊》，1930（1），《专件》、《调查》。



就学”,有不遵者罪其父兄。府、县的各等学校也同样备受冷遇,竟至“物议沸腾,怨声载道”,有人堂习“洋学”者,“人竟不之齿”[①]。以后几年,情况虽不无改变,在省会和外县(如尉氏)也出现了若干公、私立中小学校,但较之外省仍瞠乎其后。

2. 虚冒少实。地方士子固然不愿弃旧从新,各级官员和地方守旧士绅更是多方摧抑新机。州官县官多是科举出身,长年忙于搜刮和多项“新政”,“于学务率视为不急之务”,敷衍、挨延、委卸,成了此辈的通病。禀报的办学成绩,半属子虚。洛阳高等小学堂至1908年,名额不过30名,缺额即有11人。这一方面是由于城乡封建守旧势力顽固地据守其原有的教育阵地和文化壁垒,不愿“从洋”;另一方面,也由于晚清吏治异常腐败,各府州县官吏任期短促,交替频繁,即使“兴学”,也以此作为敛财中饱的一种途径。

即令照官府虚报的办学成绩来说,据1909年省府的官报所概括,“豫省自奉诏兴学,各厅州县以筹款艰难,殊少进步,中学固属寥寥无几,即高等小学,多者三四处,少者一二处,学堂学生较之科举时代之应小试者,实不及三分之一”[②]。全省用于办学的经费,据1909年报告,“不惟不敢与南、北省较,即较之山东等省,亦仅及十分之一”[③]。至于留学生,更远少于南方许多省份和相邻的直隶、山东等省。

3. 表新质旧。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重“国粹”,薄“西学”。本来,清廷“癸卯学制”就明确规定,学堂必须以“忠君、尊孔”为准则,都必须特重读经,恪遵孔孟儒学。河南当局在办学之初,即以本省“风气之开,较诸省稍迟”为由,提出应“体察地方风俗,揣度省会情形,要宜自订课程,不当借资外省”[④]。因此态度特别保守,在有关文告中再三强调,学堂必须“保国粹”,“明人伦”,“重国(孔)教”,而且在监督、总

---

① 冯翰飞:《福慧梅学钞·学堂》;《长葛县志》卷七,第18页,民国19年新时代印刷局铅印本;天津《大公报》,1903年8月17日。

② 《河南官报》,宣统元年(36)。

③ 《河南咨议局决议案》,第27页(稿本)。

④ 邓实:《政艺丛书·内政通记》卷三,第21页,民国刊本。

教习和一般教习的选用上也努力体现。拿作为全省观瞻所系的河南高等学堂来说，始办时即特选山东理学家孙葆田为总教习。孙是个“泥古而不通今，尊中而不重西，且痛斥西学”的腐儒，将《孝经》和《小学集注》分发给学生，要求他们“人通一经”[①]。直到1907年，此种守旧现象才有所改变，但封建尾巴仍未完全切除。各府州县的学堂类似情形者更多，不少学堂与旧式书院、学塾没有太大区别，教师是旧塾师或举、贡、生、监。从开设的课程来看，有的设置国文、图画、算学、书法、修身、博物、舆地、历史、体操等课，虽说“新学”不多，但还算是差强人意的，有些学堂，像洛阳和偃师两县的小学堂，只有读经、讲经、算学、修身、体操等课，每月逢农历三、八，还要作义论札记[②]。总的来看，符合清廷所颁学制的学校为数不多，添置的各种“洋学”课程大都存在于纸面上，不过有几节体育、唱歌、算术，或加点自然科学常识，以此与旧式学塾略显差异而已。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河南一些学堂在课程的设置上有所改进，逐渐具有近代学校的雏形，但封建陈迹存留之多，与旧式学塾长期大量存在一样，在南北各省中仍然是相当突出的。不过，风气所趋，体制所关，确实开办的学堂除了陆续增开“新学”外，也不能不按照规制设置图书馆、阅报所、操场等，购置一些新书和报刊让师生参阅。

三、民国时期的教育

中华民国取代清王朝后，制定了新的学制系统和各类学校的课程标准，学堂改称学校。开头一两年，省内各地乘着辛亥革命的民主新风，“风气渐开，学校进行，较为顺利”[③]。省教育司划全省6个省立中学区，各建省立中学1所或2所，其外各县，自办县立小学。不少县份，都开办了少则几所、多则十余所各类学校（中小学校、职业或师范学校）。尤其是省会开封，1913年春，光女校就冒出数十所。到1915年，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发展到6 337所，在校学生166 168人，教职员工

① 天津《大公报》，1902年8月11日，9月19日。
② 《豫报》，第2号。
③ 《河南教育月刊》，第3卷，第1期。



140 200 人。管理教育的行政机构,1912 年 12 月改提学使司为教育司,属于河南行政公署四司之一。1914 年行政公署改为巡按使公署,于政务厅下置教育科。1917 年 9 月教育厅成立,此后一直是省府四厅之一,负责全省教育行政事宜。县教育行政机关,清末各县奉命设劝学所,主事人称总董,1911 年改总董为劝学员长,1912 年又改称为劝学所长,1923 年改组劝学所为教育局。国民政府前期,即抗日战争爆发前,河南教育有较大发展,学校和学生数量迅速增加。随之而来的抗日战争,教育事业遭到巨大破坏,颠沛流离中,学校数量急剧萎缩。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破坏教育,使大批师生流寓异乡。下面将这一时期的各级教育概况作一简述。

(一)小学教育

清朝末年,河南初级教育主要为私塾承担。1902 年清廷下谕各州县改设小学堂,次年又确定学制系统。1905 年废科举,兴学校,各县小学堂次第设立。到 1908 年,除县城与大市镇外,有些乡村也设立了小学堂。据统计,1909 年全省已设立高等小学堂 166 所,二等小学堂 182 所,初等小学堂 2 948 所[①]。1912 年民国建立,改名学堂为学校,并以秋季为学期之始。但各县小学因多为私塾所改良,多数仍以春季始业,同时学校名称也不一致,有初等实业学堂、蒙养学堂、小学堂等,年限也有长短。1923 年施行新学制,定小学修业年限为 6 年,初级小学 3 年,高级小学 3 年。1927 年始改为初级小学 4 年,高级小学 2 年,高初级合设者称完全小学。

① 《河南教育官报》,第 81 期。

1928—1930年全省各类小学发展概况如下（单位：所）：

年份	完全小学		高级小学		初级小学		合计
	公立	私立	公立	私立	公立	私立	
1928	368	20	60	3	8 513	723	9 687
1929	553	31	115	12	12 745	1 250	14 706
1930			841	41	15 996	1 758	18 636

三年间学校总数几乎增加了1倍。此后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学校数和在校学生人数历年都有增长，1936年，全省共有小学19 467所，在校学生107.5万余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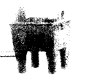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仅沦陷区教育大受摧残（如浚县1934年共有小学213所，在校学生6 677名；1941年仅剩小学47所，在校学生不足2 000人），国统区的初等教育也因战争的影响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大量学龄儿童失学，私塾教育则乘机复兴。1941年后实行新县制，推行所谓国民教育，要求每保都要设国民小学，每乡镇设一中心学校，小学数量有较快发展。1942年，国统区68县918乡镇15 621保，共设中心学校1 581所，国民学校13 117所，其他公私立小学15 028所。虽然学校数量有所增加，但失学儿童比例仍然很大。1941年68县学龄儿童为2 346 582人，在校学生1 124 672人，占学龄儿童总数的48%；1942年在校学生1 376 573人，占总数58.6%；1943年69县学龄儿童为2 373 582人，在校学生1 454 781人，占总数61.3%①。

初级小学课程设置有国语、算术、常识、三民主义、工艺、形艺、体育、音乐等；高级小学另加公民、卫生、历史、地理、自然等科，国民政府时期又加授党义。各校一律采用教育部审定的小学教材。

（二）中学教育

清末开办的中学，皆以府、直隶州治或道治之旧书院改设。1913年，省教育司划全省为6个省立中学区，分别在开封（2所）、汲县、洛阳、汝南、南阳、淮阳及安阳、沁阳、陕县、商丘设立11所省立中学，1917

①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3编，商务印书馆，1936。



年、1919 年又增设潢川、临汝两校,省立中学达 13 所。1927 年中学合并、缩减为 7 所,后有所恢复。到 1933 年,省内共有省立完全中学(高、初中均设)2 所、省立高中 2 所、省立初中 12 所、省立女中 3 所。除省立中学外,部分县亦创办了中学。惟因经费、师资限制,效果不佳。1921 年,教育厅令各县立中学一律停办,此后,郾城、西平、巩县等 10 余县又相继开办。1928 年,省内允准以庙产拨充教育经费,并准每丁银一两增加 2 至 8 角学款,各县教育经费有了保障,不仅小学教育得以扩充,县立中学亦大量增加,1932 年达 53 校,在校学生 6 341 人。

抗战前因省立、县立中学未能普遍设立,故私立中学得到较快发展。私立中学肇始于清末,如开封的知新、正义、中州公学等,嗣因多种原因相继停办。直至 1919 年,始有东岳艺术及明诚中学预备班成立,1921 年后,北仓女中、黎明、两河等校相继开办。1928 年后,郑州、南阳、洛阳、汲县、焦作等地私立中学纷纷设立,1935 年达 61 校,1936 年增至 87 校。据 1934 年统计,全省初中在校学生 19 997 人,其中私立学校 10 149 人,比省立、县立中学合计在校学生人数还多 301 人。

中学课程设置,原遵行教育部课程标准。1927 年北伐军入豫后,教育厅为谋实行国民党党化教育,特组织小学及初中课程标准委员会,拟定河南省暂行小学初级中学课程标准,增加三民主义及中国国民党党史等内容的讲授。1929 年,教育部颁布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1932 年颁布正式课程标准),教育厅遵部令实行。据此,初中设有:公民、国文、算学、博物、生卫、化学、物理、历史、地理、劳作、图画、音乐、童子军等课。高中设有:公民、体育、军训或家庭自护、国文、外国语、算学、生物、矿物、化学、物理、历史、地理、劳作、图画、音乐等课。

抗日战争爆发后,省当局先后组织 3 次战区学校内迁(详见本书第 42 章第 1 节第 3 目),大多数学校则因战乱而停办,如私立中学战前为 87 所,停办者达 44 所,占总校数一半强。即便迁入后方的学校,生员也大量流失,发展中的中学教育受到沉重打击。省教育厅为挽救教育、安置流亡学生,特地派员到豫北、豫东沦陷区招收失学学生,带至后方,分送各校。后因战区来的学生过多,省立各校难以容纳,1939 年 11

月，特在南阳设立一战区中学，到1940年秋，该校共招收学生21班，其中高中7班294人，初中10班588人，师范、特师、简师共4班200人。为尽量收容沦陷区未能撤往后方的青年，省教育厅还于豫北林县合涧村、浚县，豫东扶沟、沈丘槐店（今沈丘）各设一联合中学，每校设高中、初中、师范班共9班（扶沟联中19班）。

抗日战争胜利后，流亡到外地的中学相继返回原址，已停办的学校，也先后复课。但是由于原校舍大都遭到破坏，图书、仪器散失，复课初期困难重重。1946年，各类学校均有较大发展，全省公、私立中学达347所，成为国民政府时期河南中学教育发展的最高峰。

（三）中等师范教育

发展教育首先要有师资。清末省内建有初级师范学堂16所，师范传习所（州县所办）70处。民国成立后，1912年改师范传习所为小学教员讲习科，怀庆、汝宁等府立初级师范学堂改为省立师范学校，中州女子师范学堂改为省立女子师范学校。1917年，各师范学校校名按序号排列，原开封、淮阳、豫南（信阳）、洛阳、河北道（汲县）省立师范学校分别改为省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师范学校，另有一省立女子师范学校。1924年，汝阳道立师范（信阳）改为省立第二女师，1929年又于开封增设民众师范学院。入民国后，西华、扶沟等县相继设立师范学校。到1936年，全省共有省立师范学校5所，省立女子师范学校1所（开封，信阳第二女师已并入豫南师范）、省立乡村师范学校1所（原民众师范学院1931年迁辉县百泉，更今名）、私立艺术师范2所，县立简易师范96所，共计105所，在校学生9 637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开封、淮阳等地省立师范内迁，豫北、豫东沦陷区各县简易师范多因战事被迫停办。1944年、1945年日军侵犯豫西、豫西南，原国统区各县简易师范除8校坚持外，其余全部停办。抗战期间，为实施国民教育培养师资，教育厅先后增设了省立战区师范（1940年秋成立于淅川，初名国立河南师范，1943年改此名。1944年后辗转播迁宝丰、大营、淅川荆紫关，陕西周至）、战区师范第二校（1943年于许昌设立，后播迁至内乡、周至）、省立信阳师范商城分校（1942年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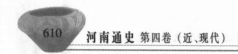
成立),1942—1943 年各行政区先后建立了一批联立师范学校,其中有一行政区联立师范,1943 年创办于密县,五区联立师范 1942 年秋在许昌设立,七区师范系 1942 年 8 月改原区联立中学而设立,校址先后设在周口、项城、淮阳;八区师范亦系 1942 年 8 月由原区联立中学改设,九区师范 1943 年于潢川设立;十一区师范系 1942 年由区联立中学改名。

抗日战争胜利后,各师范大多迁回原址,并有增设。到 1946 年年底,省内共有省立师范 13 所,在校学生 7 131 人;各行政区联立师范 8 所,在校学生 1 500 人;县立师范 79 所,县立初中、县立职业技术学校附设简易师范部 26 处,共计在校学生 10 100 人。

师范学校之学制,1928 年前因生员不同,学制亦长短不一,二年、三年、四年、六年制均有。1928 年 8 月,教育厅制定 3 年制师范学校制度课程纲要,废止 6 年制,省立师范为 3 年制,招收初中毕业生;县立师范于 1931 年奉令改为简易师范,招收小学毕业生,4 年毕业。

(四)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肇始于清末。最早设立的是 1904 年沁阳蚕桑学校。民国初年,省内各中等实业学堂改称甲种职业学校,初等实业学堂改称县立实业学校。1919 年,省内共有甲种职业学校 8 所。1927 年学校改组,部分职业学校合并,共设省立职业学校 5 所(分设于开封、汝南、洛阳、汲县、沁阳)。1931 年 4 月,教育部鉴于国内学校轻视职业教育,已有职业学校毕业生由于教、学方式等问题毕业后大多无实际工作技能,而社会生产落后,人民生计苦窘,为此,要求各地限制设立普通中学,大量增设职业学校。此后,省教育厅对职业教育拟定了发展规划,并予以扶持。1932 年,省内共有职业学校 22 所,学生总数 1 438 人;1934 年发展到 28 所,学生 1 872 人。抗战期间,省教育厅为尽快培养实用人才,对职业教育更为重视,先后在内乡、镇平、嵩县等地设立了 8 所省立职业学校,计有高级班 28 班,初级班 9 班,共有学生 822 人;区立农林学校 5 处,县立职业学校 12 处。1947 年省立职业学校发展到 14 所,县立 23 所、私立 11 所,学科分农、林、工、商、医等。职业教育为社会培养



了一批中、初级技术人才。

（五）高等教育

1912年，省当局接受教育总会会长李时灿等之呈请，成立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次年，又接受李等的建议，建立河南省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两校均在开封）。两校的创建为河南高等教育（大专院校）打下了始基（清末的河南大学堂、高等学堂实为高级中学）。到1923年，原先尚为中等专科学校的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改建为正规的中州大学。这是河南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不过建校初期因陋就简，只分文、理两科，下设哲学、国文、英文、历史、教育、数理、化学、生物、地质等，学制6年（预科2年，本科4年）。1927年中州大学改名为省立中山大学，增设农科（设有农艺系、森林系）、法科（设法律系、政治系、经济系），次年复增设医科。1930年，中山大学改名为河南大学，设5院（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农学院、医学院）16个系。所聘教授如萧一山、范文澜、嵇文甫、郭绍虞、姜亮夫、黄敦慈、林一民、郝象吾、熊绪端、阎件毅、张静吾、郭鑫斋等，多一时人望，开设课程多达一百数十门，教学和科研都相当活跃，图书和仪器设备等也比较充足，成为国内卓有声誉的综合性大学。另外，焦作福中矿务大学（由清末的焦作路矿学堂、民初的矿务专门学校改置），于1931年改名焦作工学院，内设采矿、冶金和土木工程科，也获得较大的发展。新建的河南省立水利工程学校于1929年成立，学制3年（后改为5年）。这样，全省共有高等学校3所，尤其是在规模和质量上，较之北洋军阀统治的民国前期均有很大的提高。

七七事变后，河南大学、焦作工学院等随着战局的变化，辗转搬迁，经历了长达8年的流亡时期。

焦作工学院因地处豫北，首先受到侵华日军战火的威胁。1937年8月，焦作工学院全体师生及教学设备、图书、实习工厂迁往西安，次年再迁入甘肃天水。1939年7月，焦作工学院与迁到陕西的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北洋工学院合并成立西北工学院，迁至陕西固城复课。

1937年冬，日军已进至豫北，省会开封形势紧张。省政府决定河



南大学外迁。当年冬季，校本部及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迁往信阳鸡公山，农学院、医学院迁往镇平。1938 年夏，日军为发动武汉会战，一路沿大别山北麓西进，信阳受到威胁。当年 10 月，羁留在鸡公山的 3 个学院及校本部迁往镇平，以期在此安定教学。不料 1939 年 5 月，一部日军为配合其鄂北随枣地区作战而侵入桐柏、唐河地区，镇平危急，河南大学师生又北越伏牛山，行程 300 多公里，迁至嵩县。医学院在县城，其余院系及校本部在潭头。1944 年春，日军发动河南战役，5 月上旬追近嵩县，师生仓促逃避，图书、仪器遭受巨大损失，不少师生负伤，十余人死难。逃离潭头的师生历经磨难陆续到达淅川荆紫关。创伤还未恢复，翌年春日军又发动了豫西南、鄂北作战，河大师生再次逃亡，安顿于陕西宝鸡附近。

抗日战争胜利后，流亡学校大多迁回原址。焦作工学院先在洛阳关林复校，后迁至郑州，淮海战役前夕受国民党的诱骗迁至江苏省苏州市。河南大学于 1945 年年底迁回开封原址，恢复了文、理、法、农、医 5 个学院，1946 年又成立了工学院，教学、科研有秩序地进行。1948 年 6 月，人民解放军第一次解放开封，数百名河南大学师生投奔解放区。人民解放军撤离开封后，国民党预感到中原必将失守，为阻止河大师生参加革命，调唆、裹挟河南各校师生南逃。在开封第二次解放前夕，河南大学、大梁联中等校师生南逃，河南大学寄居苏州。

1948 年 10 月 24 日，人民解放军再克开封。1949 年 5 月，中共河南省委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决定重建河南大学，省人民政府主席吴芝圃任校长，省人民政府委员张柏园、嵇文甫任副校长。1949 年 6 月河南省人民政府以中原大学留在开封的医学院、师训班 500 余人和河南行政干校 400 多人为基础，正式重建河南大学。吴芝圃派开封市教育局副局长郭海长赴苏州，联系迎接河南大学等校师生返回开封。“河大当时在苏州的教职工和学生 1 200 余人，加上教职工家属，一共近两千

人”①，7月初返回开封。新建的河南大学设立了5所本科学院。新建的河大提出了为工农服务，为河南经济和文化建设服务的方针，采取多种办学的形式和学制，减去陈旧专业和课程，增加了社会急需的新专业、新课程，从而使河南大学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为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发展河南高等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

（六）社会教育

民国时期，社会教育开始起步。各种补习学校、识字学校、平民学校勃兴，图书馆、阅报所相继涌现。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截止到1932年，省内各县共办民众教育馆67处，到1930年全省76县共设立民众学校844处，参加学习人数达2.65万人。抗战时期，教育厅专设一个社会教育股，办理全省补教、电教（电影教育）、家庭教育等。各专区举办过义教民教师资短训班，仅1939年春即培训民师1 090余人。战时有64县设立民教馆214个。

总之，民国时期省内教育有较全面的发展，各级各类学校遍地设立，受教育的人数比清末有明显增加，为现代教育打下了一定基础。

四、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教育

（一）二战时期的根据地教育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领导开辟的鄂豫皖苏区是当时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块较大的农村革命根据地，首府设在河南新集。光山、商城、罗山、固始、潢川、信阳等县成为苏区。苏区的教育开创了河南省从土地革命到解放战争时期所有革命根据地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先河。

1. 干部教育。从1927年秋到1928年冬，豫南苏区在初创时期主要开展以组织武装起义为内容的干部短期训练。1929年11月，中共鄂豫边特委成立之后，豫南苏区的干部教育工作广泛展开，不仅制定了干部教育第一、干部教育重于群众教育和儿童教育的方针，而且各级党

① 潘长顺：《江流天地外——郭仲隗、郭海长纪念文集》，第24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委成立了宣教委员会,在柴山堡开办了鄂豫边特委党务干部训练班,定期对苏区支部委员以上干部培训。1930年到1932年,根据地党团干部训练班取得了突出成绩。1931年5月仅固始团委就开办青年干部训练班5所,共培训干部4 000名。各级各类干部学校普遍建立,学制及课程设置也趋于合理。1930年冬固始县苏维埃政府创办的五楼中学,是豫南苏区建立较早的一所培养一般干部的地方普通中学。学制2年,开设语文、形势教育、数学、军体和唱歌等课程。1931年2月,始建于湖北黄安、7月移校址于河南新集的彭杨军政干部学校,学制3个月,开设课程有政治、军事、经济、合作社、国文、数学、历史、地理、外语、理化、生理卫生等。10月它又举办专业干部教育,分炮兵、卫生、通讯、步兵4个专科。1932年鄂豫皖苏区列宁高级学校在新集创建,学校开设政治、语文、军事、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史地、医学等课程。学制完善,课程开设较系统,标志着鄂豫皖苏区干部教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同时,豫南苏区巩固区均办有"教育行政人员训练班"和"师资训练班",学制2—3月。学员毕业后担任县区教育行政干部和列宁小学校长、教师。新集师范学校是鄂豫皖苏区惟一的中等师范学校,学制半年,开设有教育行政略论、政治常识、社会发展史、国语、算术、地理、历史等课程。

2. 群众教育。1929年秋,中共商城县委及杨山煤矿党支部在矿山创办了工人夜校,组织矿工学习文化知识,开了苏区工人教育的先河。1931年,设在新集桐下坪的"鄂豫皖苏区五一模范工厂"也建立了"工人补习学校",100多名工人踊跃入校学习,成为苏区群众教育识字运动中的一面红旗。1930年到1932年末,设在光山县西卡房村林家湾的"鄂豫皖苏区委员会兵工厂",90多名工人除日夜生产兵器外,还坚持上"兵工厂业余补习学校",刻苦学文化,钻研制造枪弹的技术。此外,赤城县衣工厂、光山县柴山堡衣工厂、罗山县衣工厂、固始县衣工厂均设有工人补习学校,在勤俭办学的原则下对工人进行识字教育。

苏区政府设置了众多的农民识字班或农民夜校来进行识字教育,教材是苏区通用的《工余识字课本》和《列宁小学课本》,教学方法灵

活，对消除农村文盲，提高农民政治素质和文化水平起了重要作用。

3. 儿童教育。1930年，豫南苏区各县开始普遍设立列宁小学。具体办法为：村设列宁初级小学、乡设列宁模范小学、区设列宁高级小学、县设列宁模范学校。列宁初级小学和列宁模范小学，属于儿童教育中的初等小学教育。列宁高级小学和列宁模范学校属于儿童教育中的高等小学教育。

1931年7月，鄂豫皖苏区在新集举行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规定：苏区儿童教育的方针是："苏维埃政府创办免费的学校，专教育工农子弟，养成为工农谋利益，建设苏维埃，去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次年5月10日苏区正式颁布《鄂豫皖苏维埃文化委员会决议案》又明确规定："普遍地发展乡学，使我们苏区里每一个工农劳苦儿童，红军子弟有读书的机会。"为保证这一教育方针的实行，各级苏维埃政府中设立了教育行政机构，负责管理列宁小学，规定了列宁小学的教育任务是提高儿童的文化知识和政治认识，确定了列宁小学必须按照政治化、军事化和生活化的原则进行教育。在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指引下，豫南苏区儿童教育得到极大发展。各县办有列宁模范学校1所，列宁高级小学1—2所，各区办有列宁高级小学1所，各乡办有列宁模范小学1所，各村办有列宁初级小学，苏区80%以上的儿童都上了列宁小学。

列宁小学的学制为初小3年、高小2年。初级小学课程为国语、算术、音乐、图画和体操。高级小学课程为国语、数学、自然常识、社会常识、政治常识、唱歌和军事。教材采用鄂豫皖省文化委员会统一编印的《列宁初级小学国语》、《列宁高级小学国语》、《政治课本》、《社会常识》和《自然常识》、《算术》等。

（二）抗战以后的根据地教育

抗战时期，中共先后在中原建立了豫鄂边区、晋冀鲁豫边区、豫皖苏边区和豫西等几块较大的抗日根据地，开展了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昭示了教育事业发展的新方向。中原抗日根据地的教育以干部教育为主，另外还包括群众教育的中小学校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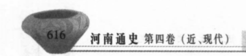
1. 干部教育。1938 年 2 月，中共中原局在竹沟创办军政教导队，彭雪枫负责，其办学方式、组织机构、训练内容、教学方法均参照延安抗大的办法执行。学制 3 个月，共毕业 4 期学员，毕业生分赴豫鄂边区、豫皖边区，为创建这两块根据地、创建新四军第五师、四师和二师，作出了特别重要的贡献。1939 年秋结束，共培训学员 1 400 多人。1939 年春，新四军游击队随营学校在永城县成立，1940 年 3 月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简称抗大四分校），校长彭雪枫。1941 年 5 月迁到安徽。在永城县共毕业两期学员近千名。彭雪枫为毕业生写的“事非经过不知难”的赠言成为学员们的座右铭。

1941 年春，新四军第五师随营学校在鄂豫边区成立，1942 年 2 月 15 日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第十分校”，校长李先念，副校长邝林。它以培养忠实于国家，能在地方和军队中做军政工作的干部为宗旨。学校设预备队、本科班和高级班。在抗战时期培养 8 000 名干部，是豫鄂边区的最高学府。1942 年 2 月，豫鄂边区高级行政干部学校创办，“以培养政治经济干部，担任抗战建国工作，建立民众政权，巩固边区抗日根据地为宗旨”[①]。分高级班和普通班，共设行政和经济两个系。首届招收新生 500 名，学员修业 6 个月，最多时达到 700 多人，1943 年并入洪山公学。1945 年 2 月，豫鄂边区政府在信阳县四望山的浆溪店村创办了豫鄂边区建国公学。8 月中旬日本投降时，600 多名学员毕业，大部分到县、区政府担任领导工作。1944 年秋，豫南抗日军政学校在确山县孤山冲的汪大庄陈家楼创办，首届招生 300 多人，毕业生大部分到新四军第五师工作。1945 年 6 月招第 2 期学员近 300 人，抗战胜利后结业。

2. 群众教育。抗战初期，中原各根据地群众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用各种宣传形式广泛发动群众起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服务团、工作团、话剧团、抗敌后援会、抗日救国会、青年协会、民先、妇救会等，都是在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组织形式。其中话剧成为向群众进行教

---

① 赵李：《1943 年学校教育展望》，载豫鄂边区《新民主》，1943 年 11 月 5 日（创刊号）。



育的主要形式。

抗战中期以后，群众教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是冬学运动的普遍开展。冬学运动的主要任务是政治教育运动、生产运动和文化识字运动，以政治教育为主，识字教育为中心，通过识字教育进行政治教育和开展生产运动，每年冬学都要坚持到第二年春耕大忙前夕，前后有4个多月。1942年冬，边区广大农村开始举办冬学。第一步是培训教师，到秋收后，冬学运动便大规模展开。冬学教育首先以《七七报》为基本依据进行时事教育；识字教学有的采用小学课本，有的结合生活和生产先教农民认识数目及日常用具等字，然后教农民打算盘，学简单的笔算和记账方法。冬学还讲些生产方面的基本技能和知识，组织农民进行冬耕，引导农民搞好冬防，走变工互助的道路。1943年以后，中原各抗日根据地经历了整风运动，中共中央又颁布了冬学运动群众教育的新方针，豫鄂边区、晋冀鲁豫边区的群众教育发展得更快。

3. 中小学教育。中原各抗日根据地的中小学教育，随着抗战形式的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当时比较著名的中小学校有：豫鄂边区实验中学，1943年9月创办，学制4年，初、高中各2年；豫鄂边区实验小学，1943年春于大悟山创办，后迁到信阳县四望山，学制改为3年（初小2年、高小1年），学生多为党政机关的“红小鬼”、勤务员、烈士干部子女；豫皖苏区建设中学，1945年2月由萧县中学与永城中学合并而成，分设师范、中学、建设三科，在校学生逐步发展到1 000多人；豫东中学1941年曾筹备建校，1944年7月1日重建，校址在太康县武旗村；冀豫中学创办于1944年5月（晋冀鲁豫边区一中，1943年7月创办），校址在直南沙区五县流动，到抗战胜利时共毕业学生320人。此外，中原各根据地政府还设置了数以千计的小学。

根据地各边区小学学制为6年，前4年为初级小学，后2年为高级小学。中学学制为4年，初、高中各2年。

各边区中小学课程，初小至少有国文、算术、常识、游唱、形艺等科，高小至少须有国语、算术、自然、社会、体育、音乐、劳作等科，初中至少须有国语、算术、代数、几何、三角、英文、植物、动物、生理卫生、物理、化



学、中外史地、抗战理论等科，高中至少须有国文、代数、三角、立体几何、解析几何、大代数、生物学、物理学、化学、中外史地、抗战理论等科，教材多由边区政府及党委组织编写。

边区小学为适应动荡的战争环境及教师较缺乏的实际情况，主要采用了分组巡回教学法，一方面按学生程度或地区分为10至20人的学生学习小组，教职员实行巡回教学；一方面注意培养国语、算术、自然、社会各科的优秀学生，实行小组长(小先生)制度。边区少数比较稳定的县，如信南县、林县对普通中小学采取学区制，由中心小学领导各村设小学，并成立教师会，每月检查讨论教学工作。

解放战争初期，中原解放区边区人民政府以原先“豫鄂边区建设公学”校址创办边区青年干部研究班，对投奔解放区的300多名青年学生进行短期培训。秋末，改编为“中原军区工作团”，下设4个学员大队。1946年2月成立了中原解放区第一所大学——中原民主建国大学。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解放军主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随后，陈粟大军进入豫皖苏，陈谢兵团挺进豫西，三军协同作战，半年间连克县城80多座，恢复了被国民党军侵占的中原解放区。中原解放区的教育得到迅速发展，教育方针、政策日臻完善。1947年9月，鄂豫皖军政大学率先在安徽岳西县成立，不久改为“中原军政大学”，学员编为政治、军事、司号3个大队和1个文工团。11月5日，豫西军政干部学校在栾川县成立。12月，豫皖苏建国学院在鄢陵县成立。1948年1月，江汉公学在大洪山建立。4月5日，成立了洛阳市干部培训学校。5月4日，豫鄂陕人民军政大学在豫西解放区的鲁山县成立，一共有在校学员2 000多人。

1948年6月，解放军首次攻克开封，河南大学及开封中等学校师生366人投奔到中原局所在地——宝丰，中原局决定以这些进步师生为基础筹建中原大学。7月10日中原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8月2日，中原大学正式成立。同时豫西行政干部学校也在宝丰成立。9月2日，中原军政大学由皖西迁到鲁山，原豫鄂陕人民军政大学并入。12

月，中原大学、豫西行政干部学校、豫皖苏建国学校等校迁入开封。

1948 年 10 月 24 日，解放军再克开封，从此新民主主义的普通高等教育事业开始创立。中原局决定中原大学暂时搬到河南大学校址。中原大学无论在教学内容还是在教学质量上都取得了辉煌成绩。半年间便培养了行政、财经、教育、文艺、新闻、医疗等方面专门人才 4 932 名，为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人才支援。

第二节 学术流变

一、理学和帖括之学

论及近代河南的学术文化，首先要提出的是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理学。就其门派而言，由宋元以迄清初，外省一度为陆王心学所压倒，河南始终一仍程朱旧贯。进入近代后，理学在全国曾短暂地复兴，不久复遭鄙弃，但河南则无此波折，始终一如既往地崇奉几成绝学的理学，出现了诸如李棠阶（沁阳）、倭仁（开封，蒙族）、苏源生（鄢陵）、徐定唐（林县）等一批名重于时的理学家。他们都特别强调"窒欲"、"慎独"功夫，即通过克己内省达到封建道德的自我完善，属于最保守的"主敬派"，人们多称之为假道学。清末民初在大河南北涌现的一批具有资产阶级维新倾向的社会活动家乃至献身于民族民主革命的仁人志士，原先也多服膺宋明理学，年事较长者且终老不移。如积极参加维新活动的李时灿（敏修），"承乡先正（理学）余绪"而进一步"敦大宏肆，浑涵汪茫，岿然为一代灵光"①；著名的革命党人刘纯仁、杨源懋，青少年时都力攻程朱陆王之学；封丘举人牛东藩，原先"潜心性理"，后来投身革命。类似事例屡见不鲜，说明年事稍大的文人学士很少能超脱理学的网罗。1905 年，河南留日学生创办的《豫报》杂志，有一篇文章还以

① 《豫报》第 2 号。



此自喜自慰，说外省多热衷于西学，“惟吾乡尚保洛学不失”[1]。这实在是令人扼腕的悲剧。

但毕竟时代不同了，理学在河南的命运自然也迥异于往昔。光绪年间，一个项城人士说：“今世率以道学为讳，鲜有谈及小学、近思录者，一闻居敬、穷理、圣功、王道之说，如严冬服絺绤，竟斥为不合时宜。”[2]虽然这些话主要是针对全国风气而发，但也兆示着在这样的总态势下，河南理学也难免每况愈下。19世纪80年代经世之学的兴起就透露出此中消息。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民族危机异常深重，维新和革命思潮迅趋高涨，陈腐空疏的“心性之学”受到更大的怀疑和冷落，满怀忧患意识的青年士子纷纷离开先辈故辙，转向西方和日本寻求救国新知。民国前期，当政的旧军阀官僚虽然悖逆历史潮流，热心尊孔复古，各县守旧势力且把清朝的覆亡归因于趋重西学而冷寞了久为“国家元气”之理学，组织起“孔道会”等团伙，致使旧理学一度回光返照，但历史前进的脚步毕竟不可阻挡，传统理学连同孔孟儒学都不可避免地江河日下。到民国中、后期，无论程朱或陆王在河南学术文化界的神圣地位，都成为明日黄花，备受冷落。

理学之外，更多的士子从事帖括之学。

帖括之学，即八股制艺，实际上并不是一种自成理论体系的学术，而只是旧式士子弋取功名利禄的工具，但是由于明清以来封建统治者的倡导，不仅使地主富绅，就是“务农之家，稍致赢余，亦喜课其子弟以科举之术”[3]，因而成了城乡士子世代攻研之“学”。其覆盖面之广，大大超过理学。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废止和清朝的覆亡，这种流毒深广的帖括之学才退出学术文化的主阵地，只是在私塾中有所残留。

帖括之学在河南之所以久盛不衰，既是现实需要所驱使，也与传统

---

① 《豫报》第2号。

② 《项城县志》卷十九，第24页，民国3年石印本。

③ 民国《光山县志》，民国25年开封谦记商务印书所铅印本。

的地方风习有关。近代河南虽然经济凋敝，民生窘困，教育文化落后，但民间尊师重学之风还是久盛不衰的，作为"士"的读书人一直被列为四民之首，"村落中尤尚之，每遇经生学士，倍加恭谨"，"惟其人之言是听，遇事则惟其人之计是从"①。也由于读书可以中举做官，城乡人民，包括许多农民，为了改变祖辈"屡遭冤侮"的可悲处境，"改换'老冤'门庭"，但凡有半碗饭吃，也竭力使子弟入学读书②。尤其是科举时代，青少年子弟更闭门攻读，至有获得功名之后，同村邻里"始识其面"者。

犹如河南人士虽然长久执迷理学而在近代中国学术文化史上无甚建树一样，众多城乡士子刻苦攻读的八股制艺也难以与他省争胜。有清一代112科会试中，豫籍状元只有1人（江浙共79人），榜眼、探花也不过4人（江浙124人），进入近代后所占的比例更小，即在州县一级的童试中，河南应试者多不过千人上下，较之江浙动辄数千甚至上万人者相距甚远。至于文字质量，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河南科场阅卷多年的两位江南人士记述称："河南居天下之中，而风气朴野，词章之学，远逊东南"，"历试各邑生童，见其文理之茫昧，义法之粗疏，暨字学之音训、笔画，纷纭舛错，积弊万端"③。这些记述，都说明河南士子在最热衷的"帖括之学"上，较之南方省区也瞠乎其后，从另一侧面反衬出河南旧式教育的低陋和衰敝。

二、经世之学和西学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沿承一种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优良传统。清王朝在度过了"康乾盛世"后，到嘉庆、道光年间，随着封建社会危机的加深，一种以拯救"衰世"为标志的经世致用思潮就应运而生，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主要在南方省份涌现了一批颇有生气的、反映时代需要的"经世"志士。他们力纠汉学、宋学和帖括之学脱离实际的共同弊端，力求学术为现实的国计民生服务，殚精竭虑地研讨政治、经济、社

① 民国《许昌县志》卷四，第45页，民国12年宝兰斋石印本；民国《禹县志》卷二十一，第47页，民国26年刊本。

② 《项城张氏族谱家传》，第21页；《河南文史资料》，总41辑，第112页。

③ 陈作霖：《庸叟文稿汇编》，首卷，第1、16页。



会、边防等纷至沓来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相应的对策。这种时代新潮在河南这个北方内陆省份，透过理学和制艺的重雾，在一些敏感的学人士子中也有所反映。

如获嘉文士王钊，"学无不窥"，而不死守先辈故辙，鸦片战争失败的巨痛使他敏感地认识到"天下从此多事矣"，于是用其所学，潜心撰作《筹海(防)十三策》呈送统治当局[1]。固始回族学人蒋湘南，建树尤多。鸦片战争时期，他积极为国计民生出谋划策，所提出的一些具体方策(如弛鸦片之禁，课以重税)虽未必精当，但却表现出其"经世"的素志。以后，他又用其旧学、新知，撰作《西法非中土所传论》等篇，指斥"陋儒夜郎自大之见"。其他如项城士子王诜桂、张安雅，封丘士子何家琪，陕县士子张谐之等，也各有"经世"之作问世。进入八九十年代，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此种经世学风在河南士林继续发展。像滑县士子郭云升，有鉴于沙俄不断侵我边境，特作《安边十五策》，专程进京上陈。汜水贡生陈元勋，精研数学、天文、地理、历法，著《禹贡考》、《天文节略》等8种科学著作，还自制多种天文仪器，成为近代河南自然科学的先驱。这些都表明在河南学人士子中也滋生起一股鄙薄理学、努力经世的新风。

经世之学相对于庸腐的理学和"帖括之学"虽有进步意义，但从本质上看，并没有突破传统的"中学"樊篱，其思想武器主要采自中国的古圣先贤。而两次鸦片战争后逐渐东来的"西学"(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则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全新的内容。

中日甲午战争后，全国各阶层人民深深地为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所震惊，维新变法思潮和政治运动在南北诸多省区迅趋高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河南一些社会地位不高的普通士子，尤其是受传统学术羁勒较轻的青年士子，也把眼光转向西方(包括明治维新后迅速走向富强的日本)，从他们那里寻找新的经世良方和救国真理；各类学校在20世纪初的陆续开办，又使得许多青年得能接触时代新知。这样，在

① 民国《获嘉县志》卷八，第20页，民国24年刊本。

19世纪末20世纪初，青年士子中就产生了对于西学的更多渴求。如商丘青年井俊起，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下，寻读外地报纸及《盛世危言》等19世纪60年代维新思想家的著作，“一切中西时务书，尽力搜求，尽力涉猎，不为旧学束缚”。尽管像《盛世危言》这类旧作在南方早已为明日黄花，但对孤陋寡闻的河南青年仍起启蒙作用。井俊起后进入开封河南师范学堂学习，回乡组织“迪新社”，“宣传新思想”①。原先耽志程朱的新蔡刘纯仁，同受甲午战争失败刺激，遍觅各种介绍西学、洋务的书籍，博览中外政治、律法、史地、哲学、外交、财经诸方面的出版物，思想大变，成为河南民族民主革命的积极宣传家和领导人。类似事例，涌现日多，本书前面论及辛亥革命在河南酝酿和准备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新型知识群体和青年学生群体，就是这种时代新潮的产物。

三、近代科学

辛亥革命的积极影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新的政治力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逐步登上历史舞台，尤其是接踵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更给河南社会带来民主主义的巨大冲击。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和学校学生，追求救国真理的条件可谓空前良好，军阀的屠刀并不能阻挡他们前进的脚步。地方人士记述称：1919年前，学生们“可谓循规蹈矩，不脱旧私塾的学风”；五四运动后，“向之杜门危坐、埋头书案者，今则广购新书，注意时事，对于国家之内政、外交，在在关心”，即便是开封以外各县，学生们也“已远非昔比，思想行为亦自大有进益”②。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扫除封建积垢，追求民主和科学，开启探求真理和思想解放的新途径。适应这种时代需要，各种宣传革新、革命的出版物源源输入各地城乡，供处于“学问饥饿”中的知识分子阅读。杞县吴芝圃回忆自己的思想历程说，1918—1920年，他在家乡读

① 井俊起：《雪苑戆叟忆往》，第6页；禹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编：《禹州文史资料》，第1辑，第61页。

② 北京《晨报》，1920年5月18日；河南《民国日报》，1932年1月9日。



书，所学的主要还是私塾中的经书、古文，1921 年后，开始较多地接触康有为、梁启超的著作，阅读《新青年》杂志和"五四"后新出版的各种宣传民主、科学的书籍，1922 年开始，又阅读有关社会主义的出版物，以后两年，进而在北京和开封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变化。尽管这样的先进典型当时为数不多，但五四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启的新机却是巨大的和普遍的。实际情况诚如一部地方志书记述的，"五四而后，新说蔚起，迈进现代……回首民初，其思想变迁，殆不可以道里计矣"①。

处在这样的历史机缘中，马克思主义先是在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中，进而在工人阶级中逐渐传播，由此引发出近代河南伟大的历史剧变。与此同时，随着近代教育的发展，成长起一批又一批新文化哺育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唾弃先辈们的价值取向和学术窠臼，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研讨近代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或从事文艺创作，分别有相当建树，择要论列如下②。

（一）哲学

冯友兰撰作的《人生哲学》（1926 年出版），是一部最早把东、西方哲学结合起来进行论述的专著。冯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哲学史》（1931 年出版）论述了从先秦诸子到晚清康有为、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在体系上和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以其"取材谨严，持论精确"而受到国内外学者的赞誉，后被译为英、法、日诸国文字，至今还被一些国家作为讲授中国哲学史的教材。抗日战争期间，冯又发表《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等著作，把程朱理学与西方的新实在论结合起来，组构成一个富有思辨色彩的哲学体系。虽然这些论著提出的见解并未获得学界的普遍认同，但使作者成为一位有代表性的著名哲学家。

---

① 民国《内黄县志》，第 243 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② 所述主要参照邵文杰：《河南省志》中的《社会科学志》和《著述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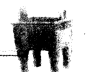
另一著名学者嵇文甫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左派王学》和《船山哲学》在学界也广受赞誉。前者论述了王阳明的道学革新精神以及左派王学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并作出了精当的评价；后者论述了王船山在继承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并阐述了自己的历史观。时人评论这两部很有影响的代表作是“见人所未见，道人所未道”，作者也成为中国思想史研究中最有成就的专家之一。

还有赵纪彬的《中国哲学史纲要》（1939年出版），是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的中国哲学发展简史。其另一部著作《中国知行学说简史》（1942年出版），系统地考察和阐述了中国认识论发生、发展的历史，驳斥了法国哲学家哈克夏否认中国有认识论的谬说。

此外，魏明经的《朱子哲学》、《理学新诂》、《中国古代学术源流及诸子哲学》等书，对中国哲学史上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学术界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二）政治学和法学

近代西方政治学和法学引进河南，开始于20世纪初。河南官方出版的《河南官报》、《自治官报》等新出报刊，主要从预备立宪的角度，在宣传忠君爱国（清朝）的同时，也零星地、片段地介绍西方和日本的政治和法理。河南籍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的《豫报》，特别是《河南》杂志，较多地引述一些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宣传维新或革命，号召人们改变封建主义的政治观念，张钟端撰作的《平民的国家》、《对要求开设国会者之感喟》等文，尤为犀利突出。在这些文章中，作者论证了用暴力——“革命军”推翻清王朝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正当性和迫切性，并引申西方的“天赋民权”说，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起了巨大的政治启蒙和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作用，在中国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上颇有建树。嵇文甫的《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中国政治社会思想史》、《明末的重民思想》、《吊民伐罪与民权思想》等论著，就对先秦诸子以来中国历代的政治社会思想，特别是明末先进思想家的政治思想，作了较为精辟的论述。河南大学刊出的《法学院季刊》



发表了不少文章，在宪法学、民法学、行政法学、商法学、法理学等方面，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有所阐发，或就有关问题开展社会调查。20世纪30年代创办的《河南政治月刊》刊载的一些论文，诸如《三年来的河南吏治》、《我国现行官制之得失》、《论行政效率》等文，结合河南和国民党政治的实际，在行政法学方面进行了探讨。在宪法学方面，如河南大学法律系主任熊绪端针对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宪法草案，发表了《宪法草案初稿中央政制之商榷》等3篇专文，宣传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受到省内外人士的关注。

（三）经济学

清末，官绅和其他社会人士，开始采撷西方一些经济学原理，探讨和改革本省的经济和财政。宣统初年，清廷复派遣专人调查各省经济和财政情况，结集成各省财政说明书，其中有河南专册，罗列本省赋税和财政状况，为整理财政提供参考。作为预备立宪的项目之一，省当局并根据朝廷的统一部署，编列财政预算。在官方出版的《河南官报》上，也先后发表了一些有关经济和财政的专文。发表于《豫报》和《河南》杂志上的文章，亦有不少应用西方经济理论，反对帝国主义经济入侵，维护本国、本省利权。专门的经济学著作则很少看到。

进入民国，有留学日本归来的段世垣作《租税原论》，当是省内第一本根据近代经济学原理，研究赋税问题的经济学专著。五四运动以后，特别是三四十年代，有关河南社会经济的著述或调查报告日渐增多（其中小部分出于外省人士之手）。如省实业厅的《河南全省棉业调查报告书》、《河南矿业报告书》和王景尊的《河南矿业报告》，分别就省内的棉花产销、煤炭产销情况作出了较为全面的论述。省建设厅的《二十年度建设概况》、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的《河南省农村调查》（多豫籍人士参加）、马秉祥的《开封郑州两市办理土地登记之研究》、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的《豫鄂皖赣四省土地分类之研究》、刘茂增的《河南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关系》、孟光宇的《洛阳、陕州之租佃制度》等专书，均先后问世，使河南经济学方面的调查研究不断有所前进。同时省政府各职能部门和一些文教机构，在此期间还陆续出版多种专业刊物，如

《河南建设季刊》等，也都刊发了不少反映三四十年代河南社会经济的文字。虽然，上述这些书刊大都是资料性的，学术上建树不多，但却是此前未曾有过的，对于反映河南的社会经济情况和河南省情颇有参考价值。

（四）文学和语言文字学

河南学人在近代意义上的文学和语言文字学方面的研究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虽时间不长，但成果却不小。就文学而言，影响较大的有冯沅君的《中国诗史》、《古优解》、《古剧说汇》、《中国文学史简编》，李嘉言的《贾岛年谱》，华钟彦的《花间集注》、《戏曲丛谭》，任访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文学史散论》，郭麟阁的《红楼梦研究》（在法国出版）等，或填补了此前文学史研究上的空白，或加强了此前的薄弱环节，而为文学界所称道。

在语言文字学的研究上，如赵荫棠的《中原音韵研究》，在前人《中原音韵》的基础上，对近古语言、音韵勤加考订和标注，很有价值。于安澜的《汉魏六朝韵谱》，综合分析了汉至隋朝的诗、赋、韵文，分列三个演变时期，钱玄同赞其“多发前人所未发”。其他如陈介白的《修辞学》、丁声树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也都受到学界的好评。在甲骨文和金文的整理和研究上，成果尤为丰硕。如董作宾的《大龟四版考释》、《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堪称为甲骨文研究的划时代之作，使甲骨文的研究走上新阶段；董的其他著作如《殷历谱》和《殷墟文字》甲、乙编等书，也获得学界好评。孙海波的《甲骨文编》、《诚斋殷墟文字》、《甲骨文录》、《甲骨文考释》、《说文籀文古文考》等书文，不仅对甲骨文、金文的著录、考释，而且对殷商史中的有关问题，也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在中外学界享有盛誉。另外，关百益的《殷墟文字存真》、《殷墟器物存真》等，也在甲骨文的著录和研究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五）历史学和考古学

这也是河南学人的一个优长学科，研究成果较多。举其要者，如尹达的《中国原始社会》，是国内率先用马克思主义，结合考古资料，研究中国原始社会的一部专著，在近代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开创



意义。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对有关问题提出了全新的见解,可谓国内第一部科学地阐述传说时代的开创性著作。白寿彝的《中国回民小史》、《中国伊斯兰教纲要》,虽然篇幅不大,但在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上却有筚路蓝缕之功。韩儒林的《成吉思汗十三翼考》、《蒙古答剌罕考》等专文,征引繁富,考订精详,对蒙元初史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再如谢国桢的《晚清史籍考》,孙文青的《张衡年谱》,白寿彝的《中国交通史》,荆三林的《史前中国》等,也都从不同方面丰富了史学研究的成果。

在考古学方面,首先要提及的是瑞典人安特生主持的渑池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以后又在荥阳秦五寨等地继续发掘,均获得大批珍贵的历史文物,是为近代河南考古发掘的先声。20 世纪 30 年代初,在外地学人梁思永的主持下,在安阳高楼庄后岗遗址进行了发掘,其成果发表于《小屯、龙山与仰韶》的名作中。1934 年冬,河南省古迹委员会的李景聃等多位学者在永城造律台等地进行了发掘,又发现丰富的龙山文化遗存,为河南省文物考古机构独立进行发掘首开记录。另外,由李济、梁思永和豫籍考古学家董作宾等主持,有河南省教育厅代表郭宝钧和河南大学实习生尹达、石璋参与的安阳殷墟发掘,于 1928 年 10 月开始,延续到 1937 年,获得大量甲骨文片和其他珍贵文物,其成果结集为李济主编的《安阳发掘报告》和《田野考古报告》,备受国内外考古文物界的注意。在此期间,河南省博物馆等单位由何日章等人组队,也两次发掘殷墟,所得的甲骨由关百益编为《殷墟文字存真》出版。

(六)方志学

长久以来,河南就有修纂地方志书的传统,清朝时达到鼎盛,修成的省、县、乡土志近 400 种。但进入近代后,随着经济和文化的衰降,志书修纂也渐少,咸丰至宣统四朝续修成书者不到 60 种。民国前期,虽然战乱不断,但修志的传统仍未中断。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 20 多年,从省到县的修志工作又广泛开展。截止到 1947 年,共成志近百种,现存 90 多种,按年均成书数字计算,可谓历史之最。其中属于省志的,有林传甲的《大中华地理志 · 河南地理志》,白眉初的《河南省志》,均为

私家撰述，比较简陋，但也著录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填补了民初志书的空白。1929 年由刘景向主纂的《河南新志》修成而未能付梓。在此期间，省政府设置了河南通志馆，续修中断百余年的省志，直至抗日战争前，完成了大部分志稿，但迄未杀青，只付印 3 卷，存稿 720 多卷。各县县志大都印刷出版，其中不乏成功之作，如《巩县志》、《许昌县志》、《续安阳县志》等，均以体例精当、资料宏富见长。其他各志亦均参照近代修志理论和编纂体例，谋篇布局，突破了旧时志书的樊篱，注意反映社会经济和民生状况，较旧志有明显进步。

（七）自然科学

民国时期，河南攻研近代自然科学的也逐渐增多，且有所成就。如有机化学家高济宇在有机化学合成、反应以及主体化学和反应机理上的研究，成果卓著，并撰有相应的专著《1.6—二酮和 1.7—二酮环醇异构》和《有机合成及结构证明：环乙烷衍生物的合成新法》传世。动物学家秉志，撰作《中国北方之腹足类》等书，是中国近代动物学的奠基人之一。成为中国微生物学开拓者的方心芳，在菌种的开发和保藏研究上作出了突出贡献，与他人合著之《商粮曲酒之研究》就为时人所称道。原生动物学家陈阅增在美国发表《百尾草履虫的交配型》，引起同行的普遍重视。地质学家高振西的《福建二叠纪地层》，开拓了前寒武纪地层的研究；另一论文《华北震旦纪地质》，开拓了震旦层地质的研究。另一地质学家冯景兰的《两广地质概要》，为该两省地质研究奠定了基础，书中提出的“丹霞地形”，为国内外地质学界所沿用。物理学方面，霍秉权在英国发表了放射性元素 Thz 种射线的能量分布、薄膜云室的性能和使用的论文，引起了原子物理学界的注意。接着霍又发表了放射性元素 R_aZ 种射线能量分布的论文，又在自创“云室”基础上做成了“双云室”，用来观察宇宙线，效果良好[①]。在黄河治理上，张含英编撰的《黄河志·水文工程》、《治河论丛》（正、续编）、《黄河水患之控制》、《土壤之冲刷与控制》、《黄河治理纲要》等连续问世，很有科学价

① 邵文杰：《河南省志·科学技术志》，第 57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值和应用价值。其他如在医学、农学等方面，也有一些豫籍作者的论著出版。

（八）文学艺术

民国时期河南有成就的作家不少，比较突出的，如蒋光慈，其小说《短裤党》，是早期无产阶级文学的成功之作；长篇小说《咆哮的土地》，是反映大革命前后农村阶级斗争的一部成熟作品；《新梦》是一部热情奔放地歌颂十月革命的诗集，在青年中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诗人徐玉诺的诗集《将来之花园》、《雪潮》，小说《遗民》、《我的最后》，鞭挞黑暗的社会现实，真实地反映了河南农民的苦难生活。另一诗人于赓虞的《晨曦之前》、《落花梦》、《孤灵》等，抒发了反帝反封建思想，在当时的诗坛颇有影响。抗日战争期间，河南作家也创作了许多揭露日本侵略者暴行，鼓舞全民抗战的作品。如女作家赵清阁创作的反映太湖抗日游击队斗争业绩的话剧《女杰》，宣扬爱国主义、激励抗日的话剧《潇湘淑女》，以及与老舍合著的话剧《桃李春风》，在当时均很有影响。作家师陀的短篇小说《谷》，深刻地表现了北方农村的凋敝；长篇小说《结婚》，暴露了抗战时期都市的癫狂。姚雪垠的名作《差半车麦秸》，反映了农民在抗战大潮中的觉醒和成长。李蕤的报告文学《豫灾剪影》，深刻生动地反映了1942年大旱时期河南农民的苦难。作家丰村的长篇小说《大地的城》，生动描写了冀南人民的反军阀斗争。诗人苏金伞的诗集《地层下》、《窗外》，也颇受称道。其他如作家曾克的《千里跃进》，作家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等小说，亦脍炙人口。戏剧方面，如李骏声的《岳飞夺状元》，王镇南的《六部西厢》，樊粹庭的《义烈风》、《凌云志》等，均不断为河南戏剧发展史增光添彩。

以上8个方面，豫籍学人、作家都有不小的成就，这在此前河南的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由此缩小了河南在思想文化上与先进省份久已存在的差距，在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方面足以与南北诸多省份并驾齐驱，但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相对逊色。其所以致此，是与时代的进步和近代教育的发展分不开的。众多的豫籍人士不再像其祖辈那样沉溺于程朱理学和八股时文的泥潭中，接受民主、科学以至马克思

主义的洗礼，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于真正的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以服务革命事业，促进社会进步，从而开辟了近代河南思想文化史的新篇章，不断给中华文明作出自己的新贡献。

第三节 乡土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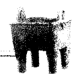
一、戏剧曲艺和庙会神社

近代河南流行的地方戏剧，主要有豫剧（河南梆子）、曲剧、越调，还有大平调、怀梆、怀调、宛梆、大弦戏、罗戏、卷戏、二夹弦、四股弦、落腔、道情戏、四平调、坠剧、豫南花鼓戏、嗨子戏、永城清音戏、土二黄等。曲艺则以河南坠子为主，还有大调曲子、三弦书、河洛大鼓、评书、河南大鼓书等。两者在城乡人民文化生活中均占重要地位，影响也很深广。

（一）戏剧

1. 豫剧。豫剧原先俗称河南梆子、高调、河南讴、靠山吼。唱腔朴实优美，表演细腻生动，语言俚俗活泼，地方色彩浓烈，颇能反映河南民众豪迈、敦朴的性格，长久以来，城乡民众对它喜爱不衰。因受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特色，有以开封为中心的祥符调，以洛阳为中心的豫西调（西府调），还有流行于商丘一带的豫东调，流行于漯河、许昌、周口一带的沙河调，流行于豫北的高调。其剧目大都取材于历史小说，如封神戏、三国戏、瓦岗戏、包公戏、杨家将戏，另有一大部分描写婚姻和伦理道德的戏。在行当上，有四生（大红脸、二红脸、老生、小生）、四旦（正、小、花、老旦）、四花脸（黑、大花、二花、三花脸）之说。其共同特点是以唱见长，在剧情的重要环节均安排有大板唱，往往把各种板路的优美唱腔融会抒唱，使之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豫剧的演出形式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早期是“地摊”和“板凳头”，比较简陋，到清末进为“跑高台”，但一般均仍然在乡村活动。民国初年，进入开封、郑州、洛阳、商丘、信阳等城市，在茶社演出，逐渐成为风



靡全省城乡的成熟剧种，并涌现出不少班社，如开封的义成班、天兴班等；也成长起一批名角。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开封相国寺内建立了永安、永乐、国民、同乐 4 个戏园，连同寺外的其他多处戏园，成为豫剧的主要演出场所，这个省会城市也成豫剧名班荟萃之地。1935 年，河南教育厅社会推广部为了发展豫剧，成立了豫声戏剧学社。在樊粹庭的倡导下，借鉴京剧、话剧的优点，对豫剧的表演、音乐、服饰、行头、化装及剧场管理进行了改革，并建立编导制，使豫剧愈益步入正规。1937 年，常香玉、张同庆等又成立中州戏曲研究社，系统地研究豫剧艺术。陈素真主演的豫声剧院，以马双枝为主演的永安舞台，与中州戏曲研究社在开封同时献演，彼此取长补短，促进了豫西调与豫东调的交流，使豫剧更臻完美。抗日战争期间，陈素真与樊粹庭创建狮吼剧团，在省内外演出了《歼素计》等剧目，鼓舞民众抗战。只是在战争期间，省境豫剧活动暂时处于低潮，抗战胜利后又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可惜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1 000 多个剧目不仅良莠杂陈，而且很少有脚本。新中国成立后，才进入全面、健康发展的新时期。

2. 曲剧。曲剧原称曲子戏、高台曲，是在河南民间的一种说唱艺术——鼓子曲的基础上，吸收其他剧种的艺术成果发展而成的。初期只在街头巷尾、茶馆酒楼、地摊或树阴下演唱，没有固定的形式和班社，也没有锣鼓，只有坠子、三弦、四弦等伴奏。1926 年，临汝县“高跷曲”班子首次登上高台演出，才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新剧种。以后，这种“高台曲”进入汝州、洛阳、禹州、南阳等城献演，并涌现出众多的班社。每个班社或八九个，或十多人，农忙务农，农闲演出，一般不讲价款，随意馈赠即可。

曲剧形成初期，以生、旦、丑角为主，擅长唱功戏。所演唱的大都是民间故事，抒发儿女私情。唱词道白富有泥土气息和浓郁的生活情趣。唱腔由曲牌连缀体与板式变化体相结合，以真嗓为主，真假嗓结合，朴实自然，悠扬缠绵，声韵清亮，抒情性强，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因而受到城乡民众的普遍喜爱。

20 世纪 30 年代，曲剧各行当逐渐建立和不断完善，表演形式也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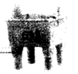
了一定的规则，一些知识界人士积极编剧、导演或成立学校，提高和讲授曲剧，使之愈趋艺术化。抗日战争期间，曲剧艺人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热潮中。著名的曲艺名家王飞庭为曲剧编写了《夫妻从军》、《守义不屈》等20多出现代戏，效果很好。豫剧名人樊粹庭、陈素真对曲剧的演唱也多加指导，京韵鼓师席筱朋为曲剧的音乐伴奏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曲剧艺术进一步提高。文场、武场都日趋健全，各种行当、服饰也初具规模。大小班社在全省各地乃至部分军队中纷纷建立。演出活动也日趋活跃，有些班社和艺人还到安徽、陕西、甘肃、湖北等省演唱，成功地把曲剧推向省外。

抗日战争胜利后，河南省政府以曲剧“淫词浪调，有伤风化”，在全省禁演，致使曲剧一度冷落。以李金波为首的一些艺人将曲剧改为“南平调”，在开封、郑州等地继续演出，迫使省政府不得不认可曲剧的合法地位。在各方艺人的共同努力下，曲剧在全省范围内均得到发展。

3. 越调。越调也叫“四股弦”或“月调”，主要流行于豫西南、豫东和豫北，豫西也有流传。清末，南阳和其他各县的越调班社已发展到100多个。民国初年，开始进入郑州、开封等城市，以其清脆宏亮、轻巧圆润的唱腔倾倒观众。农村的越调班子更为活跃，内乡马山口、许昌张潘镇、方城券桥、舞阳城关及南召、邓县等地均有著名的班社，演唱于四方，极受民众欢迎。

越调的传统剧目有500多个。早期的剧目唱词少，道白多，词句比较古雅，唱词也都按一定的曲牌和调门演唱，称为“正装戏”，不利于演员的发挥。后来增加了许多移植改编的剧目和根据小说改编的剧目，即所谓“外装戏”，唱调多，道白少，通俗易懂。约在清朝末年，外装戏逐渐取代了正装戏。以后即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成为又一个深受民众喜爱的剧种。各行当一般均以唱做取胜，表演质朴粗犷，生活气息浓厚，有“咬牙作响”、“变脸作色”、“口出獠牙”、“响痰在喉”、“七窍流血”等绝活，具有强烈的河南地方色彩。因此，以后虽经受抗日战争的波折，但越调在河南始终久盛不衰。

4. 其他戏剧。除以上三大剧种外，其他多种剧种也在全省不同地



区流行。如大平调，流行于豫北、豫东，表演比较粗犷豪放，动作幅度大，出手画大圈，盘腿跨大步；怀帮（怀庆梆子），因主要流行于怀庆府一带而得名，其行当、服装、化装、脸谱多与豫剧类同，唱腔激昂奔放，在演出中常用“挑后嗓”；怀调，主要流行于彰德、卫辉两府，唱腔高亢激越，古朴粗犷；宛梆，流行于南阳周围各县，旧称南阳梆子、老梆子、南阳调，唱腔音乐粗犷豪迈，激越奔放，所常用的“花腔”比一般唱腔还高8度，假嗓无字甩腔，具有独特的风味；大弦戏，旧后弦子戏，主要流行于豫北，表演粗犷、泼辣，动作幅度大，武戏使用真刀真枪，各行当以台上踢脚、分手亮相、打飞脚为基本动作；罗戏，又名猡猡戏，“黄河两岸有之，不甚普及，乐器以铜笛为主。唱后有讴，类越调，唱字简直，似河南梆子”①，粗豪通俗，富有乡土气息；卷（眷）戏，泌阳、遂平、西平、邓县、内乡、唐河、汝南等地均曾流行，唱腔幽雅婉转，舒展清新，抒情性强；二夹弦，也称两家弦、二架弦，豫东、豫北、豫西都曾相当流行，唱腔真假嗓结合，老调粗犷醇厚，新腔婉转、绚丽、花俏；四股弦，又称五调腔、乱弹，豫北一些县份较流行，一般以真嗓吐字，假嗓甩腔，比较舒展、奔放。其他如落腔、道情戏等，也各有其艺术特色和流行地区，不一一列述。

以上诸种，有些虽源起于外省，但都是在河南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地方戏剧。除此之外，还有诸如京剧、秦腔、汉剧、山东梆子、土簧戏等流行于外省的戏剧，在省内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观众，丰富了城乡民众的文娱生活。

5. 河南坠子。河南坠子简称坠子。因用坠胡伴奏而得名，出现于晚清时期。早期演唱表演都比较简单，只有男演员。后来吸收了莺歌柳、渔鼓道情、三弦书的唱腔、曲目、表演和乐器，乃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成为一种覆盖全省的说唱艺术。清末民初，开封相国寺坠子棚就有不少。1914年后，女性演员亦登场献艺，演唱形式愈加丰富多彩，复讲究手、眼、身、法、步、内、炸、腾、挪等表演技巧，在唱腔上吸收了一些花腔、民间时调、小曲以及山东大鼓、豫剧、越调等的声腔，把这种曲艺形

① 刘景向：《河南新志》第3卷，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排印本。

式推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演出亦由地摊而进入书场，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由于受不同艺术的形式和地域语言的影响，坠子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东路、西（中）路、北路三个地域分支。东路坠子以商丘为中心，唱腔柔美缠绵，伴奏不蹬脚梆，以大书见长。西路坠子以开封、郑州为中心，扩及豫中、豫西各地，硬功大调，字清梆稳，高亢明朗，朴实雄浑，节奏鲜明为其主要特色。北路坠子主要流行于安阳、新乡，系在东、西两路的基础上，吸收了山东大鼓的曲调而形成的，以欢快活泼、玲珑俊俏为特色。三派各有所长，互相促进，使坠子成为河南城乡民众喜闻乐见的主要曲种。

6. 其他曲艺。主要有：大调曲子（开封鼓子曲），流行全省，有汝南丝弦道、周口弦歌社、豫西洛阳曲子、豫北八音会和中州鼓调等支派，共有曲牌近 200 个；三弦书，亦流行全省，因以三弦为主要伴奏乐器而得名，有中鼓三弦（南阳一带）、宜封三弦（尉氏周围）、洛阳琴书（洛阳一带）之分，唱腔有铰子腔、鼓子腔之别，形式上有腿缚节板自弹自唱和一弹一唱之异；河洛大鼓，由洛阳琴书和大鼓书结合而成，主要流行于洛阳、三门峡、焦作、新乡和郑州，后越出省境，活动范围远至山西、陕西、甘肃、新疆的部分县份，基本唱腔有引腔、起腔、送腔、二八腔、流水、凤凰三点头、夹板、平板、悲平板、数板等；评书，流行于全省各地，起初多为坐讲，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增加了武打招数和用醒木、扇子、手帕等作道具辅佐表演；河南大鼓书，因以大鼓为主要伴奏乐器而得名，流行于全省，有豫南大鼓（流行于信阳、驻马店一带）、豫东大鼓（流行于商丘和周口一带）、鼓词或鼓儿词（流行于南阳、许昌、洛阳一带）、大鼓京腔（流行于豫北）及铁板书之分，均以唱为主，辅以说白，演员单人上场说唱，以说大书见长。还有道情、莺歌柳、山东琴书、锣鼓书、相声、故事、迷胡书、乱弹、梨花大鼓、大铙、善书、灶书、快板书、锣鼓曲、小铙、哈蚂嗡、洪山洞等，不详述。

（二）庙会

近代河南民间文娱活动的一个重要场地，是名目繁多的庙会和神



社,一并附述于下。

庙会在河南各县长期普遍存在,一县一般均有百十处,多者近千。如密县450余起,禹县600余起。因其借奉祀某一神灵之名,在其神庙周围举行,故名庙会。但实际上乃是地区性的农村物资交流会,又是农村群众性的文娱大会,借以满足农村低水平的经济和文化需要。

庙会一年四季都有,尤以农事活动较少的农历十一月至次年四月最为集中。如南阳城关有9起庙会,在农历二月、九月间各举行一次,其余7次均在农历三四月间举行。亦有同一地点、同名庙会而分作多次举行者。如林县任村龙王庙会,就分别在农历二月、三月、十月各举行一次。每次庙会,均有当地绅民推举的"会头"或"神头"、"社首"负责筹办,包括购备各处祀神供品,主持仪式,收取费用,组织文娱活动等。任此类会头、社首者,一般是地方士绅或帮会首领和其他有社会地位的人士。会期长短不一,一般是三五日,少则一日,亦有长达月余者。规模也大小不等,"赶会"男女少则数千,一般数万,多的可达数十万,除本地区民众外,邻县、邻省甚至远及边疆和沿海省份的商贩均远道赶来与会。像内乡马山口庙会,四川、山陕、内蒙古、甘青、冀北、华中和西南、东南各省的商号,每年都派队携款前来与会。会期花费,或从庙产中提取,不足则由随会筹措的"戏份子"解决。

庙会的活动内容,主要是祀神、贸易和文化娱乐。参与祀神的男女老少都有,或独家,或结队,从方圆几十里、上百里的地面汇聚前来,除在神前烧香点烛和献供外,还随神庙的特色而进行特定的祭祀和祈祷活动,诸如"上针"、"挂枷"、"挂铁锁"、"抱孩儿"、"摸金钱"等。有的庙会,除接纳大队善男信女入庙参拜外,还将庙中神像抬出,游巡行像,如"城隍出巡"、"游龙王"之类。自朝至暮,摩肩接踵,十分热闹,成为民间一种群众性的宗教迷信和娱乐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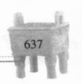
商贸活动,是庙会的中心内容,而且贯彻始终。各行各业从外地赶来的客商和附近地带的小商贩以及出售自产农副产品的农民,从四面八方汇集于此,或趁棚摆货,出售各种农副土特产品。也有一种专业性的庙会,或以药材,或以牲畜,或以农器,或以女红为大宗,有些规模也

不小。如内乡马山口火神会，主要交易中药材，每日有来自南北各省的数万客商与会。只要是会期，大小庙会无不人山人海，一日的交易额少的数千元，多则数万、数十万元。这实际上是一种地方性的中级市场。经由此，小生产者交换了各自的生产品，满足了各阶层民众生活和生产上的各种需要，解决了初级市集所难以解决的问题，使低水平的商品经济得以延续和发展。

庙会的文化娱乐活动也多彩多姿，其中重要的一项是演戏——“唱大戏”。每会会头、社首均事先约请合适的戏班，少则一台，多的数台以至十数台，届时“唱对台戏”以争取观众。较大寺庙原本在前、后均建有戏楼（舞台），会期即在此演出“大戏”。戏楼不够或无有者，则在正对神棚外的空旷地段临时搭建戏台。因农村平时少有比较正规的文娱活动，所以看戏者无论日场、夜场均非常踊跃，每台戏观赏者常至数千人。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群众性的文娱活动，那就是社火。由各乡村神社团体各自组织而成，庙会期间汇集演出，诸如叠罗汉、跪竹马、踩高跷、耍狮子、玩龙灯、跑旱船、擂大鼓、吹唢呐等。外地艺人，如演杂技的、拉洋片的、玩猴的、演曲艺的，以及江湖郎中、算命看相的又错杂其间，使场面更加热闹，盛会气氛越发浓郁。这样，庙会就成为民间多种文娱活动的总汇和乡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庙会有点近似的是赛会，同样普遍于省内各县。这是围绕着迎神、酬神而开展的文娱活动，同时也进行商货买卖。每届会期，由会首率队将神像由庙中请出，安放在特制的“神楼”之中，抬着巡游街市，或安置在村中专门搭建的神棚中供祀。神像出庙后，“神楼”前后均有仪仗队和社火队簇拥、表演。寺庙的僧道也同来参与，击钹奏乐。村人招待亲朋，乐以忘忧，成了各村的特定节日。

无论庙会和赛会，社火均为其文娱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承载者为民间自行组织的各种专业社伙，如火神社、太平社、关帝社、龙王会、土地会、山神会、牛马王会等。所组织的社火队除参加庙会、赛会外，还要在每年农历大年初一、元宵节等传统节日出动，沿街演玩，其形式、内容可谓百花齐放，有大鼓队、唢呐队、寺庙音乐、八音会、龙灯、舞



狮、跑旱船、推小车、踩高跷、"明月和尚戏刘翠"、竹马、"故事儿"、对花鼓、二鬼板跌、打铁、独角兽、高抬大轿、扇子舞、龙舟捉鸭、抬旱杠、大头人和腰鼓、秧歌等。对保存、发展民间技艺,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很有好处。

由于旧时代河南民间迷信神权之风久盛不衰,所以此类围绕着某一神庙、神祇而组建的团伙——神社也遍于各县乡村,而且一村往往不止一社。以巩县(今巩义市)堤东村为例,民国年间即有山神、土地、五龙王、青苗、奎星、瘟神、火神殿、火神宫等神社 72 个。其中最大的火神宫神社算是全村的"公社",负地丁银一两以上的富厚人家才可入,其余 71 个均为部分农户(多则几十户,少则三两户)自愿组合。组合的原则大体上是"富与富结,贫与贫结,商与商结,士与士结"①。社首则轮流担任。因为许多寺庙均有一定的庙产,故神社组织社火活动时,所需经费即由庙产收租所得供应;无租入者,则由入社者按议定数额分摊兑集。



社 火

因为神社是围绕着"神"而建立的,所以其组织和活动中就充满了迷信色彩。除演玩的各类社火满足农村居民文娱需要外,还要进行规模不等的迎神、祀神活动,以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多子多福,消灾免祸。民国年间因为战乱频繁,民生困苦,所以许多人都希冀参与神社敬神活动,借以祈福。一些较大的神社,如巩县大峪沟地区的中王爷(嵩山中岳大帝)社,由将军岭等 10 个村共同组织,3 年一办,在农历十月

① 《巩县文史资料》第 4 辑,第 89 页。

举行迎神、安神、敬神、送神等活动，前后 3 天，规模宏大。会场搭建神棚、客棚、戏台棚、厨棚、鼓乐棚、库棚和柏枝牌楼，有大戏一台，摆列旗、牌和钺斧等全套銮驾。其间，先祭神，继之由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善男信女进香参拜，各村社火随时演玩，异常热闹，最后送神、交社（由下届社头接过）和聚餐，酒饭可多达数千桌。对贫苦人民来说，虽然增加了不少额外负担，但因积习难改，地主富人又努力提倡，所以在整个近代，此种风习均沿袭不变，在延续民间文化上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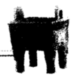
二、乡风民俗

河南地域辽阔，不同地区在自然环境、对外联系等方面颇有不同，但都地处北方内陆，都属于相对滞后的“农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大体相同，所以在乡风民习上既有“小异”（主要表现在衣、食、住、日常礼仪等方面），更有“大同”。不管大河南北，不少地方志书在记述本境乡风民习时，多有诸如“农勤稼穑”、“习劳苦，敦俭朴”、“崇朴黜华、风犹近古”、“安贫乐贱，野无惰农”、“崇礼重信，尊上易使”等笼统文辞，即使晚清或民国时编纂者，也往往沿袭旧志——主要原因当是编纂者感到前人所述情况依然存在，中世纪风情仍随处可见。

政治因素主要是战乱。19 世纪 50—70 年代，捻军年复一年地驰骋于大河南北。在农民“四处起反闹大乱”和封建统治严重削弱的形势下，传统的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也受到较大的冲击。随着农民起义高潮的过去，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随着“同治中兴”而全面恢复（包括“教”和“行”），城乡的社会秩序又被拉回到旧时的轨道，所谓“世道”和“人心”也日渐恢复旧观。后经辛亥革命的冲击，尤其是民国二十来年间，“政局泯棼，战争日烈，连年荒歉，生活维艰，一夫呼啸，如水赴壑，杀人勒赎，习为故常”，“致蔑长幼之序，轻礼义之节，民俗士风，非复古者之旧”①。在如此这般情势下，从社会秩序到伦理观念都受到不小的震荡，传统的乡俗文化在不同地方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变。

---

① 刘景向：《河南新志》第 3 卷，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1988 年排印本；《中原文献》（台北），第 22 期，第 61 页。



经济因素主要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自然经济的松动。这是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和交通(铁路、公路)条件的改善同步而来的。民国《确山县志》记县境在清朝统治时期"化行俗美","近则平汉驶行(火车),交通便利,民俗之改良,已有一日千里之势"①。这种"变俗"态势,在铁路沿线各县均不同程度地出现。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展,"货币权力也日益增大"②。以往为农耕需要而长期维持的多子聚居的大家庭(几世同堂)也因束缚子媳们各自营业求利(手纺织、草帽辫、熬硝等各种手工业和副业)而遭厌弃,家族温情的面纱,宗法思想的束缚,都在"利"的诱导下失去了往日的黏合作用。"娶个媳妇卖个儿",媳妇被诅咒为"分家客",都是由此而来。因而,如20世纪初叶记述禹州情况者,就慨叹风俗日敝,"利之所在,相倾相轧,而同乡、同里不遑顾也,甚至父子兄弟不相善也,争产争继者接踵也,祭葬慎终追远之义不讲,一切型家善俗不修也"③。这些文辞虽然出于保守人士之手,不无夸张之处,但因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态势,确实是存在的,尤其是邻近交通要道地区,前后变化也较大。

然而,河南毕竟是北方内陆一个相对闭塞的省份,从总体上说,民国时期较之晚清差异不是很大。1929年编纂的《河南新志》在概括本省的民性民风时,写出的仍然是这样的文字:"居民十九业农,故温厚和平,淳朴守分,其失在愚拙";"大半居茅茨,食杂粟,衣布衣,用土器,勤苦耐劳,然草昧遗风,鄙塞殊甚";"民性质直爽快,不以浮文缛节相矜夸,亦无阿谀谄媚之陋习,惟惰性较深,惮于革新";"安土重迁,虽凶岁亦少去其乡者"④。就广大农村居民而言,基本上是一仍旧贯,很少有近代气息。

因此,在这个北方"农国",人们看到"无论贫富均讲究置地……至

---

① 《确山县志》卷十,第1页,民国20年铅印本。
② 《资本论》第1卷,第151页,人民出版社,1975。
③ 《禹县志》卷十一,第14、15页,民国26年刊本。
④ 刘景向:《河南新志》第3卷,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排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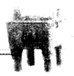
贩夫走卒，亦有十亩、八亩不等”[①]。种地，几乎就是农民惟一的“养命之源”。传统的重农轻商、株守家园成为普遍的风习。清末经商者固然“率不齿于士夫”，民国时仍积习不改，就连旧式手工业也因其连接市场而同样受到“鄙夷”，“所用工艺产品，大半来自省外”[②]。因为认为经商者多欺诈，手工业者又低贱，所以子女婚嫁时多注意趋避。

（一）近代河南民间的各种会社——乡风民习的组成部分

在近代河南各县，除了按照国家定制设有相应官吏或专职人员的县、区、乡等基层政权外，还有民间自行组织的各种会社。诸如文昌会（士子）、五圣会（商人）、鲁班会（手工业者）等，农民组合的会社更名目繁多，有经济性的、迷信性的、公益性的、娱乐性的，一般由具有较高声望或较多财产的人物主持，官府予以认可或不加禁阻。另外，也有一些政治性（或党派性）的会社，性质各异：有由官府督催或控驭的，如联庄会和农会、工会、商会等；有些是与官府敌对的，规模最大的是秘密教门、会党以及民国时期的各色枪会，中共领导的农民协会、穷人会，等等。这些因时因地而异的会社，将社会各阶层民众不同程度地连在一起，交叉成一个松散的社会网络。本节仅就前一部分非政治性的会社从乡土文化的角度略作论列。

1. 对于农民来说，网罗最广的是有关农业生产的会社，如保田会、护青会之类。例如在西平县境，“各乡村均有扶青（扶植青苗之义）会，有自治规约。凡骡马牛驴猪羊入地践食禾苗者，必罚锾若干，以示惩儆。所得罚款，充作演戏酬神之用”[③]。商水、项城等县境设“保田会”，各村农民轮流巡防，除禁止在庄稼地放牧牲畜外，并禁防偷割庄稼和拾取麦穗，兼防盗贼。淮阳一带有“看坡会”，推有“坡头”主持其事，将本村田禾划为若干区，每区各置“看坡”若干人，昼夜轮值，如有损失，由看坡包赔，收获后，各予看坡以粮、钱若干作为报酬。其他各县乡村亦

① 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4月5日。
② 白眉初：《河南省志》卷七，第23页（抄本）。
③ 《西平县志》卷三十六，第6页，民国23年北平文华斋刻本。



均有类似组织，不过名称也不尽相同，一般一村一会，亦有数村联办者。除此之外，有些地方的贫乏农家互结牲口会，或集资购买牲口，共同负担草料，平时轮流饲养，农忙时共同使用；或有关农户自备自养一头，农忙时合笼使用。前一类“护青”、“保田”性质的会社，名义上是全村性的，实际上主要适应地主富农的需要，以防无地少地的农民损害他们的利益。

2. 旨在减少生活困难的各种互助性的合会，俗称“兑会”、“吃会”。这些“会”并无固定组织，实际上不过是临时性的和经济性的组合。发起者称“会首”、“社首”，规模不大，时间不长，晚清时期就已存在，民国时期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更为兴盛，抗日战争时期，由于通货膨胀，经济衰退而逐渐减少。合会的名称和规则因时间、地区不同，互有小异而显大同。如在夏邑，有面会、屋会之类。前者旨在解决婚丧时的开销，人数一般在10—40家。一家有此需要，大家兑面或兑钱，且前往帮忙。后者是解决建房困难而成立的，人数一般10人左右，一人建房，其余各家以人力物力相助。待会员各得助一次后，该会即行消散。再如汤阴县各乡，流行“摆摇会”，也是一种互助性质的组合。有需款较多者，即在亲戚朋友间串联组会，商定每人出钱若干，先供倡会者使用，以后逐年抽签排号，确定得款人名次。“惟此等办法，仅限于中等水平以上人家，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贫人，是无法攀附的。”[①]类似性质的合会，在全省各地城乡均普遍存在。

3. 为了准备各种特殊需要而组合的“会”。如“老人会”，由有年老父母之家联合组成，与会者各兑付议定数量之钱，汇总在一起，谁家老人亡故，即提用所集之款以办丧葬，随后再集以供其余诸家需用，直到轮完为止。亦有组合“行孝会”、“助喜会”者：与会者共兑餐费，每年冬春择日聚餐一次，遇有会员婚丧事宜，会首通知成员各送一定数量之粮、柴、现金，以助其成。再如灶爷会：与会者每隔10多天按约定数量交鸡蛋若干，由会首收齐卖出，以所积款项放账生息（会员亦可借以供

---

① 汤阴县志编委会：《汤阴县志》，第26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用），至农历十二月廿三日（祭灶日），会首将所收本息购买过年需用各物，分予会员。类似会、社还有多种，此不多举。

4. 公益性的组合。如补工会、善会：一村或数村联合，或筹资筹料，或出劳力，在农闲时节在会首主持和指挥下，造桥，修路。因为这是“行善积德”之举，所以参加者颇为踊跃。

亦有富裕之家为聚积家产而举办者，如积金会：与会者举一二人为总管，议定大股（份）、小股钱数，各家认股交款。总管汇总此款，兼并土地或放高利贷，逐年以所得租息再购新田或放新债。参与者各按股份多少分享利益，颇有因此而成为地主或巨富者。

5. 手工业者、商人则各自组织行业性的会社。这些会社中世纪时即已出现，至近代愈益发展。如以产秤著名的长葛，同业者在1865年（同治四年）即成立有“星秤会”，借以切磋和封锁技术，直至民国年间仍继续存在。会规规定：秤工必须交纳会费入会，不入会即不许“出生意”（营业）；如收受徒弟，必须会中同意，不得私收传艺；每年农历正月初十日为会日，届时会众聚集在一起，交流经验，处理纠纷，收徒拜师；学徒三年才能出师，尔后乃可入会，但须给师父无偿劳动一年，等等。其他各种工商业者的结社，可以拿民国时期的豫西南为例，较大的行会性组织有：

鲁班社 木、泥水、竹、柳条、石、皮等业的工匠，按行业各推社首，成立各业鲁班社，然后由这些分社合组成一总社，总社首由各分社社首轮流担任，任期一年。每年会员交纳两次会费，作社首酬金和社中公务花费。春末夏初，总、分社各聚会一次。社务活动主要有：(1)从事行业性垄断，不准会外工匠从事该业，一有发现，其工具即予没收；(2)春末夏初举行“临埠会”，有戏班助兴，招引各方主顾前来交易；(3)应地方官府之命仅以象征性报酬为代价强征的劳役；(4)协调会员纷争，甲匠揽之活未曾完工而主顾改请他匠时，他匠不得承接；(5)确定徒弟义务，必4年从师习艺期满才得出师，出师前所得工资之半归师傅，并不得自行执业，否则师傅可没收其工具产品。满师时，师傅应送徒弟一套工具，尔后徒弟才可独立入会执业。



老君社 铁、铜、锡、窑等匠及厨夫，则组有老君社。其规章与鲁班社相若，只因窑场、作坊因工徒众多，故对有关工徒的利益也规定较多。如工人失业后，至任何同业作坊均须供其食宿（但须为该作坊作无偿劳动），并负责为其介绍工作，等等。

其他会社 其他如剃头匠组有罗祖社，粮食业组有陆陈会，酿造业组有酒仙会，染坊业组有葛仙社，药材业组有药王社，等等。其主要作用均借以保护本行业利益，公议货品价格，以免互相竞争，使买主去任何店铺均无异价。

即使是三教九流、江湖浪荡人，为了保障自己能生存下去，也有自己的组织，"甚至你想做个小偷，也不得不先加入行会。星相家、卖医的、卖卜的、骗子、叫花子、卖货的小贩等，都有他们自己的行会组织。他们里边，有一种黑话，如果你不会那些黑话，想站在街上说是卖药的先生，马上便有人来干涉你的营业"①。

（二）河南人民的日常生活

1. 饮食。"河南虽为农业之区，而物力维艰，水旱频仍，收成不易，故民食大半粗粝。"②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来说，常年有"粗粝"可以果腹，就算万幸，其中有大多数，连"粗粝"都所食甚少。据1929年纂成的《河南新志》综述，产麦区"俗呼麦面为好面，盖不视为家常食料也"，家常食料乃是被称为"黑粮"的粗粮。太行山山居人民，"以树叶为大宗食品，如榆、柳、杨、槐、杏、棠、梨等，取其花叶等部，煮熟浸渍之即可食，或煮后晒干，贮藏备用"。至于佐食之菜，豫西南以芝麻叶、红薯茎叶做菜，"劳动者视为果腹之佳品"；"宜阳、洛宁等县之妇女，有毕生不食肉者；叶县农家，惟年节、麦、秋食盐，余时皆淡食也"③。所谓"南人食米，北人食麦"，对于极度困乏的河南农民来说，久已远离现实。以杞县为例，20世纪30年代中，居民所消费的粮食中，88%为高

---

① 刘兴唐：《豫西南之小生产形态及行会制》，《中国经济》第2卷，第2期。
② 刘景向：《河南新志》第3卷，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排印本。
③ 刘景向：《河南新志》第3卷，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排印本。

粱、黄豆、红薯，仅有12%的小麦，而且主要为富足人家的消耗，一般贫苦农民，8个月食高粱和小米，4个月食红薯①。就全省而言，“即在丰收之年，民间树皮、草根剥掘殆尽，藜藿、菜羹、秕糠充饥多不可得，至如云桑、榆钱、杨花、椿芽、芝麻叶、芸苔叶及甘薯叶等，已为中产阶级饭食之上品”，“冬令日短，贫民一餐即可度日”②。即使中小地主家庭，常年主食绝大部分也是粗粮。碰到灾荒，农民们更只能以麻饼、麦糠、青草、榆树皮、草根、兽皮、棉籽、棉叶、棉饼、破棉絮、观音土、水藻等充饥。

2. 居住。河南民间居室有用草盖顶的草房、用瓦盖顶的瓦房、草瓦并用盖顶的缘边房以及平顶房（顶部不起屋脊）、平板房（以石砌墙、用石板盖顶）、楼房和窑洞，依各家的经济力量而异。前三种最为常见，尤其是草房，更占农村民居的绝大多数；平顶房主要盛行于安阳、濮阳一带；平板房多见于林县、辉县西部山区；楼房主要见于城镇，多为富家所居；窑洞则见于豫西山地北部荥阳以西至潼关和豫北太行山区，又分窑间窑、间墙窑、天窑、地窑、房洞结合窑、锢窑，“以其内空洞穹窿如陶器之窑，故名。前有门窗，内则只或一室，或曲折作复室。贫者床、凳、桌橱等，皆就自然之壁砍成”③。至于村落散布情况，则随自然条件而异。清朝前期，豫北是“大村巨庄，室庐相聚”，南阳、汝州一带，“界连楚省，人鲜土著，多依田结庐，不能萃处”④。这种格局，以后也延续下来。大体上，淮河以南丘陵地带，“多二三家散处为村”；伏牛山区，“平地既少，不易聚居，故少市镇、堡寨，不过十家八家之村，疏布于山坡涧崖，若数十家、百家之村，殊未易见”；平原地区，人多聚居，“一村多至数百户，人烟稠密，鸡犬相闻，因避兵匪，多筑堡寨，防卫之严，俨若城堡”⑤。此种堡寨有历时半年或五六年才筑成者，有的寨墙高2丈，阔1.8丈，四周围以深1.2丈、宽3.2丈的寨濠，许多乡村因此都城堡化

① 《杞征季刊》创刊号，第4页。
② 民国《河南通志稿·礼俗》（未刊稿）；《庚申辉县救荒征信录》，第14页。
③ 刘景向：《河南新志》第3卷，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排印本。
④ 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三，《复奏盗案疏》。
⑤ 刘景向：《河南新志》第3卷，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排印本。



了。在星罗棋布的省境村落中,有一姓自成一村者,亦有以一姓为主杂有其他姓氏者,有许多即以姓氏名村,如王庄、李庄、刘庄、陈庄、赵庄等,反映出长期以来聚族而居的历史陈迹。

3. 衣着。晚清时期,一般男子多穿对襟短褂,冬着短袄或布袍,紧身窄袖;妇女多为大襟布衫、布袄,有的还镶上花边,上衣一般长及膝盖,下半身均穿带腰大裆裤。有钱或有社会地位人家,男女夏秋穿长衫、短褂,冬穿长袍、马褂,女的穿拖地长裙。颜色也比较一致,冬春多黑、蓝、灰、青,夏多白蓝。民国时期有所变化,但不是很大,尤其是一般农村,大体上还沿袭旧习。男子冬季多穿对襟小布衫,外套大襟或"小崛肚"棉袄,春秋穿夹袄,夏穿对襟褂。豫东农民夏季还喜爱无领无袖的"布衫衩儿"。冬日多喜在腰间加束一条长约 7 尺、宽约 1—2 尺的"缠带",劳作或活动时,将下襟撩起,掖在缠带里。下半身多穿敞腰的大裆裤,不分前后,在裤腰下面沿裤脚四周近脚踝处扎一布带。一般均不穿着内裤。有钱人家或政界、学界人士则穿长袍(衫)马褂(或马甲)。青年学生常穿"学生装",近似一种不翻领的西装。妇女多沿清朝时旧习,穿大襟大腰衣裤,讲究的还在袖口、衣边、裤管口加镶滚边。上衣无论单、夹、棉,均为右衽。裤也是大腰裤,婚嫁时着裙。中年以上腿扎绑腿带。城镇有钱人家及政界、学界妇女,常穿高领窄袖的旗袍。凡此种种,均系就一般习俗而言,但在实际生活中,大多数农民均身无完衣,夏日多不穿上衣,冬季亦少有棉袍、棉裤,稍能自给者,也不过一件昼当衣服夜当被子的"崛尾巴小袄"。不少农家,全家只有一条破棉被,挤缩在一起,"几乎与昆虫的冬眠时期是一样的",棉衣也只有一两套,"大凡出恭时或走亲戚,才有这个福气,才能取得这个(穿着)资格"。"每个农民终身只有穿两双布鞋的福气:第一双是结婚时,第二双是死后钻进棺材"。像在登封卢店,"全寨人民,竟无一条棉被"①。所用布料,无论在晚清或民国时,多为妇女自家纺织的土布,只有城镇

① 1947 年《中国经济年鉴·地方经济》,第 137 页;《视察密县十二县灾赈报告》,第 4 页。

绅商及富家世族，有穿着绸缎、呢绒者，“然乡民犹未染其习也”[1]。

三、绅权、族权、神权和夫权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到，旧中国农民普遍受到四条极大绳索的束缚：从中央到省——县——乡级的政权，家族系统的族权，各种鬼神系统组成的神权，以及女子受男子支配的夫权。而作为几千年专制政治基础的，乃是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在近代河南，直接控驭农民的区乡政权就是掌握在这伙地主豪绅手中。因此，表述近代河南的乡土文化，了解农民在习俗上和思想观念上受这四条绳索束缚的程度，就应当叙述一下这块土地上的绅权、族权、神权和夫权。

（一）绅权

进入近代特别是民国时期，河南农村的绅权因特殊的政治因素而恶性膨胀，成为近代河南社会流毒至深的一大“害”。这类地方豪绅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秩序的人格化的代表，主要是由两种人组成：退职乡居之“官”（曾任实职者和仅有虚衔者）和部分获得功名之“士”。前者权势较大，后者人数最多。尤其是在咸丰、同治年间，为了扑灭全省性的农民起义烈火，河南各地官绅遵照清廷诏令，普遍举办团练，组建地方武装，黄河以南还大筑堡寨。任团首、寨首的大都是地方士绅和一部分获有功名的士子。这些人任事之后，“擅生杀，揽词讼，强科派”，以致县官的职权都因此“旁落”[2]，绅权由此大为扩张。其中少数家族且父死子继，绵延多代，近似当地的土皇帝。到了民国时期，许多新式学校的毕业生也步其先辈足迹，由“士”而绅。如记述省立洛阳八中毕业出来的学生，“多是置身政、教两界，成为豫西各县上层人物”；记述私立遂平嵖岈山学校毕业学生，“不论是职业班与师范班，他们中间认为得意的，是做乡镇长与中心学校校长，比较差些的是保长、国民

---

① 刘景向：《河南新志》第3卷，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排印本。
② 《巩县志》卷五，第56页，民国26年开封泾川图书馆刊本。



学校校长与教员"①。总之都挣得或大或小的"绅"的身份。民国前期当政的旧军阀官僚复有意识地提高绅权,包括让各地豪绅充当各种"自治"局、所长和民团首领,包征税款,大作威福,其权威较晚清时期有过之无不及。1927年国民党统治河南后,此种态势并没有根本改变。省、县境统治当局基于"讨赤"的需要,无不动员和组织地方封建势力,让他们充当区、乡、保长,或联保主任、团队队长,继续充当各地的土皇帝。此辈在残酷镇压辖境农民的同时,彼此之间又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全省各县,"无县无派,无派不争"②,更给地方增加了很多新的灾难,此股恶势力也愈益发展。因此,20世纪40年代初,一位外地记者进入豫北,耳闻目睹所得,使他"惊异到了极点":"原来这一带有如春秋战国,大大小小的土霸各自霸占一块地盘,在蒋介石的正统名义下,以极端落后的野蛮的方式实行统治。"③此种他省罕见的政治和社会现象固然是封建王朝长期统治和国民党统治的产物,但与"存古性"特强的河南较为独特的乡土文化也是分不开的。

(二)族权

河南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农田瘠薄者多,加以官僚地主较少,而占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民则为数特多,所以不像华南和江南一些省区的宗族(尤其是名宗大族)有连阡累陌的祠田、祭田之类的族产,即使有之,也不过十数亩、百十亩。这样,借以网络族众、进行宗族活动的族有经济力量十分有限。尤其是近代战乱频仍,宗族的祠堂、谱牒多无力重修,任其废缺。这些都影响宗族的"亲亲之谊",淡化了"尊祖睦族"观念。因此,相对于诸多其他省区,河南民间的宗族活动并不很多,宗族系统的族权也并不十分深重。尽管如此,传统的族权,尤其是民众中间的宗族观念,在全省各县仍然普遍、明显地存在。20世纪30年代中编纂的《获嘉县志》记述四境民众"宗族思想最胜,故敦宗睦族

① 《河南文史资料》第47辑,第121、157页,1993。
② 《自治月刊》创刊号,第45页。
③ 李普:《开国前后的信息》,第187页,新华出版社,1982。

孝友之风，流于庭闱”①，这在全省均有代表性。在许多自然村，村民们代复一代地聚族而居，各族都排列辈分，确定昭穆、世系，定有成文或不成文的族规，推定族长、族正，“治理族众”。任这些族长、族正的多是高辈分中“年高德劭”者，以地主富人为多。较大家族建有祠堂，置有族产祭田，每年清明节集合本族男性族人祭祀祖先。族人有死后无子者，由族长合族人议定立嗣，习惯是由大挨小往下排列，同时议定遗产处置办法。族人有出卖田产者，本族买主有优先权，无人欲购才可让给外姓（民国时法律禁止此习，但少有遵者）。族人互有争执或发生家庭纠纷，邀族长秉公评断。祖墓、祠堂有圮废、族谱有失修者，由族长集族众共修。所订族规，重在强调族人遵守封建伦理道德和统治秩序，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如安阳马氏族规就不准族人“欺赖田租”，违者责罚或送官究治。类似这些宗族自控和宗族观念，直到民国时期，各地都广泛存在。

在作为社会组织细胞的家庭之内，男性家长有绝对的权威，“父子、夫妇、主仆、姑媳之间，俨然有种天然阶级，不容逾越”②。所谓“重人伦，讲孝悌”，久已成为社会各阶层人民共同的伦理准则，即使劳动民众也不例外，“稍有不孝不悌之事及贪财败检之行，则妇孺皆嗤之”③。就是“捻子”、“杆伙”等所谓“盗贼”，对孝悌也一样看重。讲究孝悌固然与历代封建统治者大力倡导有关，但也顺应民心，久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在河南尤其历久不衰。

进入20世纪，特别是民国时期，由于受商品经济和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冲击，上述风习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20世纪30年代修纂的一些地方志书追忆称：旧日风俗敦厚，纲常名教中于人心，“虽愚夫愚妇亦知讲孝悌，重节义，犯上蔑伦之事，绝少经见”；晚近则“世风浇薄，重货利，轻仁义，遂以骨肉之亲，淡若路人”，父子、兄弟既视同等夷，

① 《获嘉县志》卷九，第1页，民国24年刊本。
② 《获嘉县志》卷九，第2页，民国24年刊本。
③ 《灵宝县志》卷二，第3页，民国24年铅印本。



“而一切尊祖睦族之训，益将视为迂腐而不惜破坏藩篱”[①]。不过，这种态势主要见之于城镇和接受近代教育的人士中间。至于广大农村，较为显著的变化乃是数代同堂（同财、同生活）现象日渐减少，因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兄弟妯娌都不愿继续生活在“同财”的大家庭，而想独立门户。所以，越来越多的大家庭被适合新的经济生活需要的小家庭所取代，违背传统伦理的上述“蔑伦”现象在所谓“愚夫愚妇”中间还不多见。但传统族权因这些因素有所削弱，是不可避免的。

（三）神权

有位获嘉人士记述地方民众迷信神鬼的习尚说：以地计之，由城区以及远村，没有一处没有庙宇；以年计之，由开春以迄季冬，没有一时停止祀神；以人计之，由士绅而及农人，没有一家不祈福禳灾；以神计之，由玉皇而及牛王、马神以至一土一木，无不在崇拜之列。上交的赋税无力清完，而祀神的耗费断不能吝省；妻子啼饥号寒可以不顾，却将艰难蓄积的数文铜钱用于瓣香祀神[②]。在有清一代，此种社会风气完全沿袭下来。所祀之神包罗万象，除佛道两教和种种巫化的民间宗教崇拜的神鬼外，连儒家创始人孔子也被教主化了，许多县都出现了兼祀释迦、老子和孔子的“三教堂”，堂中并坐这三位尊神。在省内各县除去较大的寺庙庵观区分佛道两教外，一般民众中间均无所区分，习惯于泛神崇拜。因此，各县四乡广布庙、观、庵、殿，一县少则百来处，多则数百处，终年香火不断。相比较而言，民间神权思想观念之深广，大大超过绅权和族权。

对于这种浓烈的神权迷信之风，清末民初一些维新人士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曾试图有所纠治，包括宣传破除迷信，提庙产办学校等，但见效甚微。执掌军政大权的北洋军阀官僚复有意利用神权，“对于崇拜鬼神、提倡迷信之举，殊为他省所无”[③]。加上辛亥革命后一二十

---

① 《西平县志》卷三十六，第10页，民国23年北平文华斋刊本；《重修汝南县志》卷二十一，第5页，民国27年石印本。

② 《获嘉县志》卷九，第17页，民国24年刊本。

③ 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1月16日。

年间连绵的军阀混战和炽烈的匪乱，人民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只好乞求神灵保佑。因而祀神拜佛、吞符念咒的枪会盛极一时，神道迷信之风更浓烈非常，成了广大农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20 世纪 20 年代末编纂的《河南新志·民俗》称："全省民俗，无不迷信神权。自城市衙署以及乡村山林，凡有人烟处都有寺庙，否则，一老树、一古墓，亦有焚香叩祷。或以红布尺余书为匾额，或植二木为旗杆，森立若林。"淮阳人士采访县境情况，亦称四乡"几乎无家不奉神，无人不奉神"，举凡天神、灶神、财神、火神、宅神、棚神、门神、井神、土地、关爷、马王、牛王、大王、城隍、岳王、观音菩萨、保家姑娘、人祖、三皇、罗祖、老君……均在奉祀之列，就是农具也有农具之神，工具亦有工具之神，甚至老树、旧窑、古墓、巨坑、大桥等，均莫不各有其神[①]。各种手工业，亦各有行业专神。如缝纫行祀黄帝，泥木工祀鲁班，戏班祀唐明皇，理发业祀罗祖，矿业祀老君，等等。至于堪舆、卜筮、星相以及诸种巫术，在民间也相当盛行。凡此种种，都反映出神权迷信之风久盛不衰。就是在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豫北安阳一带，农民无论在劳作时或农闲聊天时，经常性的话题就是"荒唐鬼怪、真龙圣皇的故事"[②]。因此 1927 年，武汉国民政府派来河南从事农民运动的人士报告称"河南农民……迷信较任何省都厉害的多"[③]，不是没有根由的。


村外神庙

（四）夫权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地位十分低卑，河南作为"理学名

① 民国《淮阳县采访稿》（稿本）。
② 《中国青年》，1924(47)，郁青文。
③ 汉口《民国日报》，1927 年 3 月 24 日。



邦”,妇女受各种“闺范”的捆束尤为严重。女子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婚嫁,自此即奴属夫家,诸如“从一而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久为社会公认的“懿德”。清末官方出版物自夸:“中州女风,为各省所不及,其编氓小户,尚节知耻,恪守闺训者十人而九。”[①]翻阅近代编纂的河南地方志书,列女传多盈累牍,其甚者,如民国《商水县志》,篇幅几占全志的1/4。实际上受荼毒的妇女更多,因为官绅们所旌表的多是“富贵荐绅”之家,“其蓬茅之间,往往有匹妇抗节百折不回,志气尤烈者,地方官既无搜访之雅,乡邻绅士辄漠视焉,不以为意”[②]。在如此众多的“列女”中,诸如“事翁姑克尽女道”;“翁滥情嗜饮,氏事之不懈”;“姑性急,时受殴詈,二十年无怨言”;“翁姑病,焚香默祷,祈以身代,刲己肉为汤以进”;“劝夫置妾生子”;“童养夫家,夫死,氏苦节自守”;“幼字某,某病故,女知之,饮毒死”等悲剧性事例,更仆难数。妇女嫁后不到30岁丧夫而守节30年以上者,按例均准呈报旌表,誉之为“柏舟矢志”、“壶范常昭”、“操同松筠”,等等。但是,这些“守节”妇女在日常生活中仍备受歧视,终生不准看戏,不准穿红着绿,不准说笑话,“其妯娌更不以人看待,几无人生之趣”[③],景况十分凄苦。其他相关的社会陋习,如早婚和童养媳,也很普遍。这种风习,给妇女带来的苦难也是相当深广的。

民国期间情况有所变化,但很小。南京临时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南京国民政府连续颁布包括实行一夫一妻制、男女平等、妇女亦有财产继承权在内的多种提高妇女政治和社会地位的法令,制定婚姻法、继承法等,还成立妇女会等社团;省内外许多先进人士更大声疾呼,提倡女权,去除妇女身上的种种封建枷锁。然而,此类法律、法令几乎全属具文,妇女会等社团更是自欺欺人的摆设。广大农村固然悉同旧规,就是在城市之中,亦如1946年地方人士所说,一切也按旧传统进

① 《河南官报》,第10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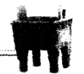
② 王锡彤:《抑斋文集》卷三,第9页。

③ 河南省统计学会等:《民国时期河南省统计资料》下册,第418页(内部资料),1987。

行，虽明明非法，“女子不能声诉”；男子任意纳妾固已司空见惯，即夫死之后继承财产之权“女子尚未得到”[①]。就连比较简单的、不直接损害夫权的放足一项，到20世纪30年代中，全省统计，妇女缠足者还有70%—80%，趋时放足者主要是知识女性和学校学生。有的县长因厉行放足而被县人视为“酷吏”，至有被殴死者。直到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一些县份的乡村女孩和少女还照旧缠足。早婚之风，亦炽盛如昔。有8岁即已成家者。比这更惨的是溺女，西起邓县，东至罗山，以及新野、南阳、镇平等地，“女子既生，由其父母共同议定，养育一女或二女，此后所生则置之死地。贫富皆然”[②]。至于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生活，于民国时期的一些报道中可见一斑。如报道豫西洛宁一带者称：女子十四五岁以后，就“不能随便出大门，不能随便和男人说话，对男子她们要回避……出嫁以后，她们的命运就全交给了她们的丈夫和公婆了。她们得老老实实地侍候丈夫和公婆，丈夫和公婆说什么就是什么，叫做什么就得做什么，打你就挨，骂你就受，累死你是活该。别人有病，你得侍候，你有病，只有受罪；别人有病可以吃药，你有病就听天由命。隐忍是妇德，反抗是不孝。好的让丈夫公婆小姑们吃，自己得吃养分最小最坏的食品”[③]。尤其是再嫁的寡妇，更被视为祸水，或蔑称为“后妖婆”，说她们走过之地庄稼不长，写过改嫁婚约的毛笔都得扔掉以免灾。民谚中有“面条不是饭，女人不是人”，“好马不被双鞍，好女不嫁二夫”，“嫁鸡随鸡飞，嫁狗随狗走”，“娶的妻，买的马，想骑就骑，想打就打”等，在民国年间还普遍流行，说明根深蒂固的夫权，较之清朝统治时期的变化不大。

不过，也应该看到，辛亥革命后的三四十年中，由于种种原因，“妇女不嫁二夫”的戒条已不再是有以往的约束力。这些原因主要有：(1)中枢和地方政府毕竟颁发过一些所谓“维护妇女权益”的法令，农村妇

① 《河南省参议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汇刊·记录》，第21页，开封，1940，民国刊本。
② 刘景向：《河南新志》第3卷，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排印本。
③ 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第39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女在名义上也获得较多的法律保障，国家旌表“节烈”的旧制也不再沿续；(2)一些先进人士的民主主义宣传和城市中零星开展的妇女运动的影响力对封建思想起到了冲击作用；(3)尤其是大灾大乱频繁，农村加剧破产，在严酷的现实的驱迫下，封建礼教的约束力几乎没有了意义。20世纪30年代中的调查报告说荥阳“自男女平等之说倡后，(寡妇再嫁)约束较前减轻”；滑县妇女丧夫后，富家多不让再嫁，贫家守寡3年后再嫁，“社会人士多不加苛责”；汝南有坚持守寡不嫁者，但“多逼令改嫁”[①]。20世纪90年代，汤阴县志编委会调查访问3个乡的361户农户71起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婚嫁事例，其中“自主”者为一两起，“半自主”者为五六起，包办(包括买办、抢亲)者为二十八九起[②]。20年间变化虽然不大，包办婚姻仍占压倒多数，但总算有点新陈代谢的征象。(4)商品性副业的发展，如清丰、南乐一带草辫业的兴起，一些农村妇女一日编辫所得可买粗粮一二十斤。“随着妇女经济生产的提高……家庭地位也相当提高，凡是从事辫业生产的妇女，极少再受丈夫打骂现象，家中零活，就多由男子来做”[③]。类似情况，在其他一些县乡从事手工棉织业和蛋品加工业的妇女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从而使夫权这根绳索的束缚多少有所松解。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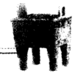
① 河南省编计学会等:《民国时期河南省统计资料》(下)，第413—505页，1987。

② 汤阴县志编纂委员会:《汤阴县志》，第53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③ 《平原日报》，1949年9月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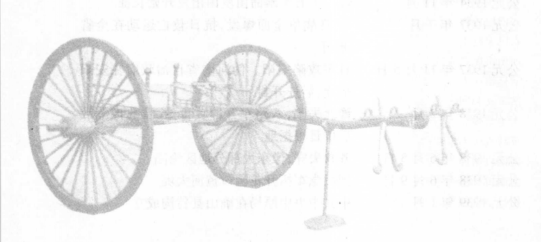
附录一
近现代大事年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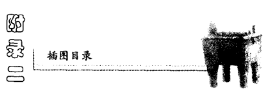
公元 1841 年 8 月	黄河决口，漫灌开封城 8 个月
公元 1853 年 5 月	太平天国北伐军入豫
公元 1854 年	全省各地捻军揭竿而起
公元 1897 年	创办河南机器局，是为河南近代工业之始
公元 1898 年	英国福公司攫夺豫北矿权，1902 年在焦作建矿
公元 1899 年	安阳小屯村首次出土甲骨文字
公元 1902 年	兴办河南大学堂，旧式教育逐渐停废
公元 1902 年	修筑道（口）清（化）铁路，1906 年告成
公元 1905 年 6 月	汴洛铁路开筑，1909 年 12 月通车
公元 1906 年 3 月	同盟会河南支部在开封建立
公元 1911 年 12 月	张钟端等在开封组织革命党人起义，失败
公元 1912 年	清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张镇芳为河南都督
公元 1913 年	白朗农民军起义，纵横豫、鄂、皖、陕、甘等省
公元 1919 年 5 月	省内各地学生集会、游行，声援北京五四爱国运动
公元 1923 年 2 月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北洋军阀镇压，酿成“二七”惨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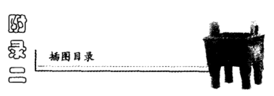
公元 1925 年夏	开封等地学生游行、罢课,响应五卅运动
公元 1925 年 10 月	中共豫陕区委在开封成立
公元 1927 年 5 月	武汉政府出师北伐,北洋政府在河南的统治终结
公元 1927 年 11 月	中共豫南党组织在确山刘店发动秋收起义
公元 1928 年 6 月	工农革命军开辟光山柴山保,后发展为鄂豫边根据地
公元 1929 年 5 月	共产党员周维炯等发动商城起义,创建了红军第三十二师及豫东南革命根据地
公元 1930 年 3—10 月	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发动中原大战,河南人民死伤甚众
公元 1930 年 3 月	中共鄂豫皖边特委成立,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统一
公元 1931 年 5 月	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在新集成立
公元 1931 年 11 月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成立
公元 1932 年 2 月	南京国民政府各部、院迁洛阳,12 月迁回南京
公元 1932 年 10 月	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利,鄂豫皖分局和红军主力退出鄂豫皖
公元 1934 年 11 月	红二十五军奉命由罗山出发开始长征
公元 1937 年 7 月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日救亡运动在全省展开
公元 1937 年 11 月 5 日	日军攻陷安阳。伪河南省自治政府在安阳成立,后迁开封
公元 1938 年 2 月	豫北失陷,八路军开辟冀鲁豫、晋冀豫等敌后抗日根据地
公元 1938 年 6 月 5 日	开封失守,豫东大部分地区沦陷
公元 1938 年 6 月 9 日	国民党军扒开花园口黄河大堤
公元 1939 年 1 月	中共中央中原局在确山县竹沟成立

公元1939年11月	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竹沟惨案”
公元1941年1月	日军发动豫南战役、郑州战役，一度侵占郑州
公元1942—1943年	全省大旱，灾民1 000多万，死亡甚众
公元1943年夏	冀鲁豫等区八路军、新四军实施局部反攻
公元1944年5月	日军发动河南战役，豫中、豫西数十县沦陷
公元1944年9月	八路军各部相继挺进豫西，开辟抗日根据地
公元1945年9月	抗日战争胜利，省政府由卢氏迁回开封
公元1946年6月	中原军区部队胜利突围，全面内战爆发
公元1947年	刘（伯承）邓（小平）、陈（赓）谢（富治）、陈（毅）粟（裕）三军转战中原
公元1948年3—7月	人民解放军发动洛阳、开封等战役，摧毁了国民党军中原防御体系
公元1949年3月	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在开封成立
公元1949年3月	中共河南省委在开封成立，5月，河南省人民政府成立
公元1949年8月	中共平原省委、省人民政府在新乡成立





附录二
插 图 目 录


附录二
插图目录

后 记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及郑州大学、河南大学一二十位史学工作者，历时十几个寒暑，撰写的四卷本近300万字的《河南通史》，近日终于杀青，由河南人民出版社梓行。

撰写《河南通史》是我省史学工作者的夙愿。早在1958年，河南省历史研究所（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前身）创建伊始，就把编写《河南通史》教科书列入该所五年规划纲要。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项计划没有实现。

1986年，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将撰写《河南通史》再次提上日程，由副院长张文彬、所长陈振主持其事，并被列入河南省“七五”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但编写进入实施阶段时，觉得条件尚不成熟。张文彬同志旋调省委宣传部，陈振同志也于1988年调南京师大。经所里研究，决定在“七五”期间先将1984年开始编写的《河南简史》书稿作为《河南通史》的先期成果，定稿出版，为以后撰写多卷本《河南通史》打好基础。于是，张文彬、程有为、王珍同志对书稿进行修订，交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简明河南史》。

1991年年初，近代史研究所并入历史研究所，重新提出撰写《河南通史》一事。确定全书共四卷，约160万字。由省委秘书长张文彬、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胡思庸主持其事，具体事务则由所长王天奖负责。次年初，《河南通史》课题又被列入河南省“八五”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但是胡思庸院长患病医治无效，于1993年病故；张文彬同志后来



也调至国家文物局。几年过去，编写工作没有明显进展。到 1995 年年底，仅完成约 2/3 的初稿。

1996 年 3 月，王天奖同志退休，程有为接任所长。不久，张锐同志调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分管历史研究所工作。次年 4 月，所里召开了《河南通史》编写工作会议，重新拟定编撰《河南通史》的若干规定，将编写《河南通史》作为该所头等大事，加大了工作力度，并争取到省人民政府的专项经费，编写工作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到 1998 年春，全书大部分初稿已经完成。

1998 年 5 月，历史研究所在庆祝该所建所四十周年期间举行了《河南通史》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河北、山东等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省内的著名专家学者高敏、朱绍侯、安金槐、许顺湛、李民等，河南人民出版社文史处处长郑荣、陆树庆，会议对《河南通史》书稿的体例、目录、样章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课题组成员对这些意见择善而从，进行了修改、补充。后经各分卷主编的修订，又由王天奖、程有为同志通读全部书稿，于 2001 年年底交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社又邀请省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葛纪谦，郑州大学教授李民、王兴亚，河南大学教授朱绍侯等，认真审读了书稿，并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课题组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最后的修改补充，方完成定稿。

本书具体分工如下：

第一卷（先秦时期）由李绍连主持编写，第 1 至第 10 章书稿全由李绍连撰写。第八章第三节“诸强国争霸中原”和“先秦大事年表”由程有为撰写。

第二卷（秦汉至五代）由程有为主持编写。书稿第 11 章第 1 节由王秉伦撰写初稿，程有为修订，第 2、3 两节和第 12 章均由程有为撰写，第 13 章第 1 至第 4 节由李绍连撰写，第 5、6 节由程有为撰写；第 14、15、16、17 四章及大事年表，全由程有为撰写；第 18 章与第 19 章的第 1、2、4 三节由王大良撰成初稿，程有为进行了修改补充，第 3 节初稿由王秉伦撰写，陈习刚进行修改补充；第 20 章第 1 至 6 节由王秉伦撰写初稿，李晓英进行修改补充，并补写第 7、8 两节。

第三卷（北宋至清前期）由任崇岳主持编写。第21、22、23三章由魏天安撰成初稿，并进行修订，任崇岳改写、补写了第21、23章的一些节、目。第24、25、26三章由任崇岳撰写。第27、28两章由郑州大学历史与考古系张民服撰写，第29、30、31、32四章由彭勇撰写。第32章的第1、6两节及大事年表由任崇岳撰写。

第四卷（近现代，1840年至1949年9月）由王天奖和王全营主持编写。第33至39章由王天奖撰稿。现代部分初稿原由河南大学的同志撰作。第一、四章由万新芳撰写；第二章由翁有为、陈海岭、杨冰洁、赵金康、邵先崇撰写；第三章由贾少鑫撰写；第五章由席福群、张守泗撰写；第六章由洪煜撰写；第七章由王瑞芳撰写。由于这一部分书稿参与者过多，难免质量参差不齐，体例不一，后由王全营同志重新写成第40至43四章定稿及大事年表，王天奖同志写成第44、45两章定稿。

本书在撰作过程中几易其稿，课题组成员都为此付出了很多的精力和心血。王天奖同志在患病期间仍在审读书稿。遗憾的是他已于2002年4月作古，未能看到该书的出版。

为使本书收图文并茂之效，每册前面均有彩色图版，内文中附有黑白图片。图片的拍摄得到了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和省文物局领导的大力支持。本书的图片由李绍连、任崇岳、程有为及耿瑞玲同志到各地市拍摄，前后历时一年多。河南博物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洛阳博物馆、洛阳古墓博物馆等单位和信阳、南阳、洛阳、三门峡、偃师及其他市县文物管理部门也鼎力相助，提供了一些文物照片。此外，根据需要，又由李绍连同志翻拍了部分国家、省文物考古部门发表的文物照片及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馆藏图书中的历史图片。

本书成于众人之手，虽经主编通改，但文字风格未必完全一致。由于河南历史的研究尚有待深入，再加上撰写者水平有限，本书定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本书在撰写出版过程中，得到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河南省文物管理局、河南省新闻出版局等有

关单位的大力支持。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任领导对该书的编写非常关心,并进行了具体指导。著名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何兹全先生和河南省委副书记王全书同志在百忙中为本书写了序言。杨凤阁、陆树庆、崔大华、卢海山同志也对本书的编写予以具体帮助。河南人民出版社文史处陆树庆处长、郑荣处长、赵向毅处长及历史编辑王卫国、杨卫民、张前进三同志对书稿进行了认真的审读,提出了不少中肯的修改意见。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大量图书资料。在本书即将面世时,我们对上述单位的领导和同志,对所有关心、支持本书编写出版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河南通史》课题组

程有为执笔

2003年3月31日